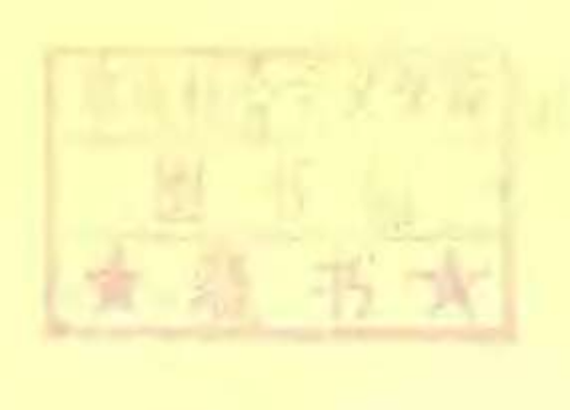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实藤惠秀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日〕实藤惠秀 著

谭汝谦 林启彦 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宁成春

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
中国人 日本留学史（增补版）
东京くろしお出版，1970
译自日本东京くろしお出版社一九七〇年日文版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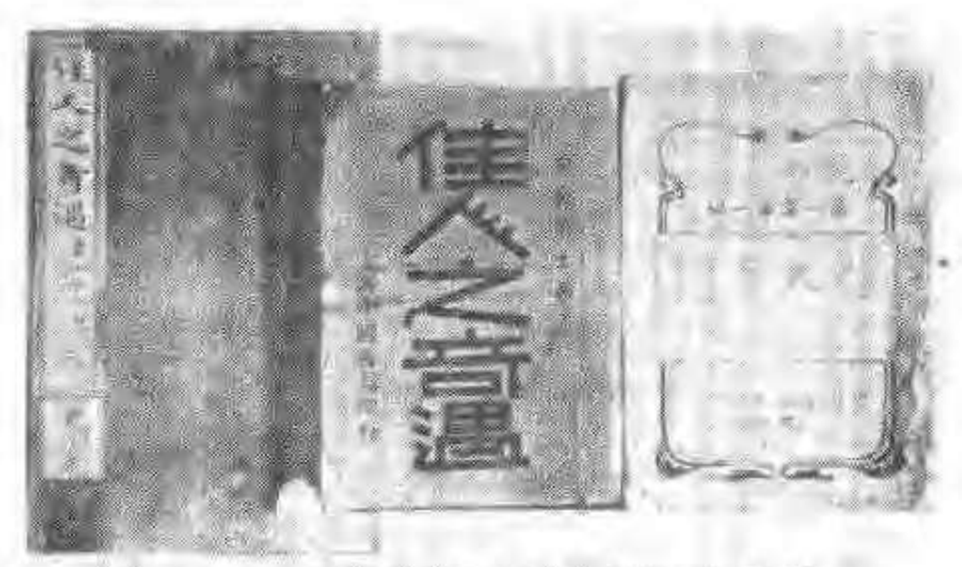
Zhongguoren Liuxue Riben Shi

〔日〕实藤惠秀著
谭汝谦 林启彦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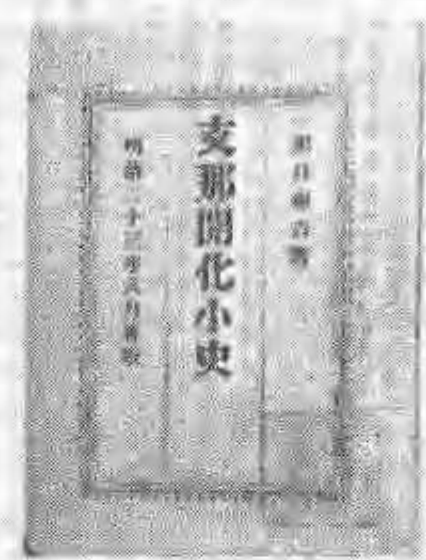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6印张 370,000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200
书号 11002·614 定价 1.9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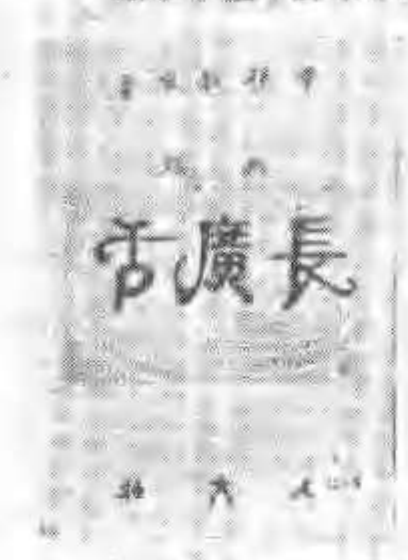
前期中國留日學生在日本發行的雜誌



原本（左）譯本二種（右）《佳人之奇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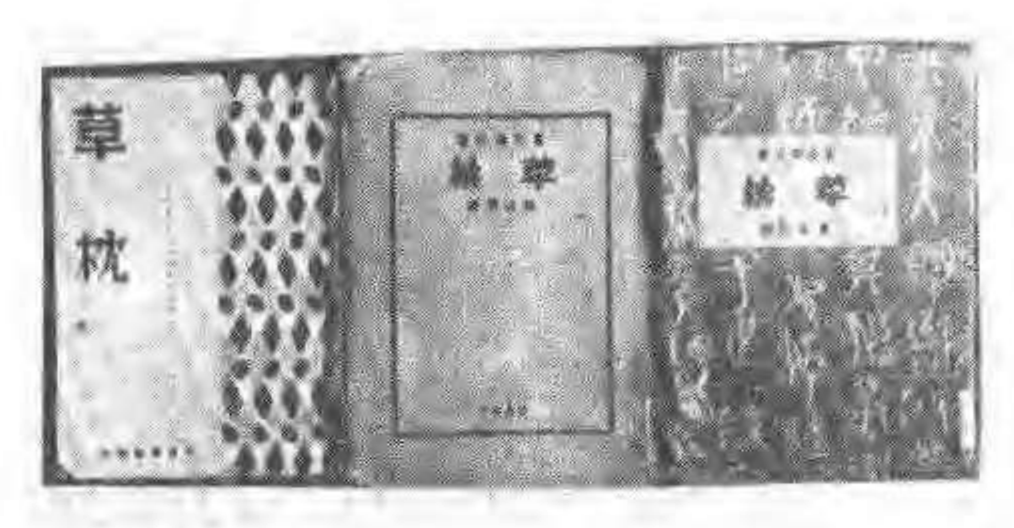



原本（左）譯本（右）《支那開化小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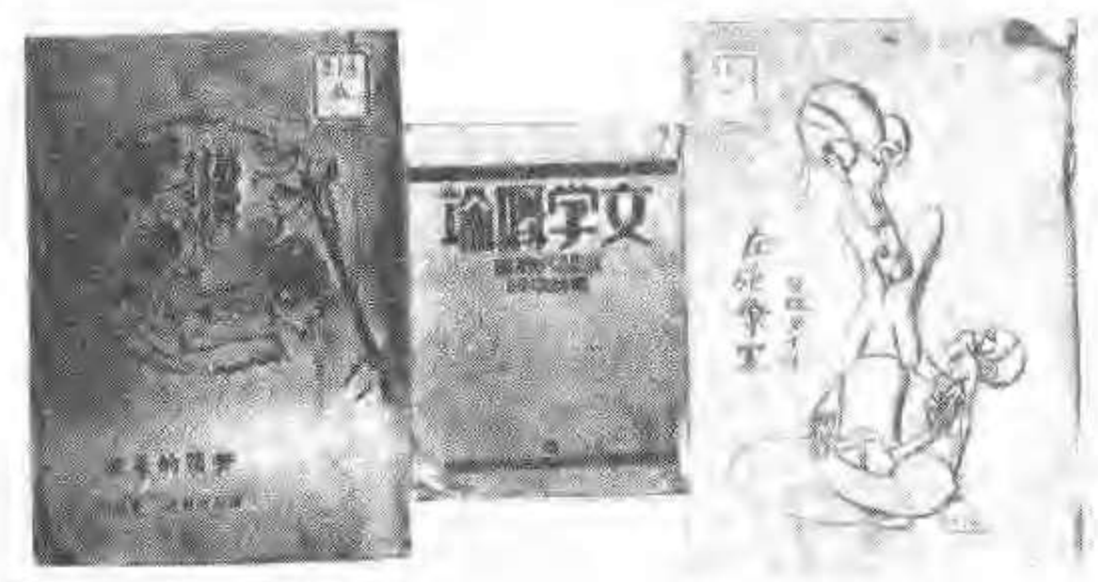



原本（左）譯本（右）《長廣舌》

日本書和它的中譯本







日本書和它的中譯本



後期中國留日學生在日本發行的雜誌

出 版 说 明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是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著作，香港中文大学谭汝谦、林启彦两先生曾将本书译出，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为便于国内研究者参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商请我们在国内出版发行。

本书引证博洽，资料甚多，可供我国研究者参考。著者热情赞扬中日友好，批评分析历史上影响两国人民友谊的各种因素，相信它会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书中对某些历史问题、人物、事件的提法和理解，与国内研究者虽有不同，却无碍于本书著者的上述基本态度。

本书香港版未收“后记”一文；为使我国读者能更深刻地理解著者的心情，在著者要求下，国内版将全文收入。“后记”是由曾丽卿同志译出的。

在本书出版工作中得到实藤惠秀、汪向荣、谭汝谦、林启彦几位先生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

一九八三年二月

译　序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国势日蹇，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非大力培植人才，积极学取西洋近代文化，无以求存图强。故自1872年起，中国即派学生留学西洋。惜当时社会风气闭塞保守，国人虚骄自大的心态犹未消泯，以致留学一事不为社会所重，其成效亦甚微。惟自经洋务运动的无功与甲午战役的惨败，国人始猛然觉悟，日本维新之有成，端在善于学取西洋文化所致。故甲午之后，举国上下，莫不视游学东瀛为富强之要径。盖国人目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竭力输入西洋文化，每能去芜存菁，取精用宏，因而相信若通过日本学习西洋文化，可获事半功倍之效；且东游又有路近、费省、文同各种便利。职是之故，自清末以还，虽国内变乱频繁，中日邦交屡有起伏，而负笈东渡者，始终络绎于途。计自1896年首派留日学生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全面停派止，四十二年间，国人留学日本者总数不下五万人，蔚成中国史上空前的留学运动。而留日运动所造就的一支庞大的知识分子大军，对中国近代政治、军事、教育、文化、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均有相当深钜的影响。

然而，中国学术界对这一富有历史意义而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尚乏较全面而深入的认识。有关留日史的专门研究，亦甚少见。就调查所得，目前可见的专著似仅有以下几种：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1933年）、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1975年）、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台北，1976年），颖之《中国近代留

学简史》(上海，1979年)等。除黄氏之书比较清楚说明清末留日运动历史的发展外，其余诸书，所涉年代虽较长，范围亦算广，但都不免失于疏略，读者即使比合而观，亦难得见留日运动史全貌。

实藤惠秀教授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东京，1960年初版，1970年增订版)一书，出版年代虽比后三书为早，但至今仍为资料最丰富，论述范围最广，而所涉年代最完整的一部学术著作。国际学界对此书的评价，一向甚高。因此，本书中译本的出版，不但可弥补目前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还可启导国人开拓更广阔而深入的研究。

实藤先生《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使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留日学生的日记、书信、著译书刊、口述史料，以及中日文公私档案文牍等，详述1896年至1937年间留学日本运动的缘起和演变、留日学生就读的学校种类及课程，亦论及清末以来留日学界的种种政治组织和活动，又另立专章详细探讨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思想、政治、教育、文学、语言、翻译、出版事业等方面的贡献和影响。此书不但取材广博，立论亦颇平实客观，故面世以来，备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被誉为研究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前叶中日文化关系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且被认为对开拓多方面的专题研究，深具启发作用。美国前哈佛大学中国历史教授费正清博士曾称本书为“资料及例证极为丰富之作”，盛赞实藤先生的研究乃“广泛而先驱性的拓荒工作”，洵为的论。

实藤先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自1928年起即任教于早稻田大学及其附属的学院，以迄1965年荣休。早稻田大学自清末以来即招收大量中国留日学生，设立“清国留学生部”，故与中国的留日史关系至为密切。实藤先生对中国留学生问题发生兴趣，与他长期所受教育和工作的环境很有关系。自二十年代起，先生即着手搜集清末以降有关中日文化关系的史料，并且立下宏愿，要撰

写一部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史书。经十多年辛勤的工作，获得数千种与留日学生有关的图书和资料（抗日战争后期，先生把该批贵重文献赠予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近年改名为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庋藏，使免遭战火，至六十年代经馆方整理后，专设"实藤文库"，供学者研究之用，迄今仍为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问题的宝库之一），先生即以这批资料为基础，于1939年写成《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稿》，由东京日华学会出版（非卖品）。战后，实藤先生重新改写《史稿》，经多次的增订改易，于1960年以《中国留日学生史之研究》一文，荣获日本国家颁授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出版《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1970年再出增订版。由此可见先生对此书写作之严谨和慎重。

增订版的《留日史》，不但扬弃了《史稿》中不少偏激和主观的论点，更把《史稿》中原占极大篇幅的留日运动发展史内容浓缩成为一章，又补充不少战后新见资料，另立章节探讨与留日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历史课题。该书经改写后，使读者对留日运动的历史及其时代意义有更明确的认识。新著显示实藤先生的匠心与造诣，均已超迈往昔。留日学生史的研究，的确可视为实藤先生毕生致力的学术事业。读者不难由本书的撰述经历，体会作者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及其对学术的诚挚态度。

此外，实藤先生又是研究中日关系史、中国近代语言文学和日本语言学的专家，其重要著作有：《明治时代中日文化的连系》（1943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略史》（1955年）、《为了日本语的纯正》（1956年）、《中国的文字改革》（1958年）、《近代中日交涉史话》（1973年）等；编译作品有：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与豊田穰合译，1942年）、老舍《四世同堂》（与铃木择郎等合译，1951至1952年）、王瑶《现代中国文学讲义》（与千田九一等合译，1955至1956年）、中国科学院《中国语文法讲话》（与北浦藤郎合译，1956年）、《大河

内文书——明治中日文化人的交游》(1964年)、《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与郑子瑜合编,1968年)、《中日非友好的历史》(1973年)、《近代日中文化交涉史话》(1973年)、《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1980年)、《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1981年),合共数十种之多。

《留日史》中译本据1970年的增订版译出。两位译者与著者虽然年差半百,但自1968年起即结忘年之交,且曾多次合作,研究《留日史》的翻译工作,因此经常获得原著者的鼓励和帮助。中译本直接引用的罕见中文文献,即多由原著者提供。在译文方面,译者经常通过书信向著者请益问难,必定在最短时间内获得详尽答复。此外,原著者又同意译者订正原著若干漏误,删节过长的引文,更动原著若干章节和段落,务使中译本在外观上与内容上均可达致更佳的平衡。至于遣词用字方面,著者更鼓励译者大事藻饰。著者以上种种虚怀若谷的做法,使译者深为感动。译者复参考新近出版资料,重编留日史大事年表,补加译注和征引文献目录,希望能为读者提供更大方便。

本书的翻译,由开始动笔至定稿完成,荏苒已过十三载岁月。在这段悠长的日子中,由于种种原因,翻译工作时辍时续。使本书未能早日与读者见面,我们惟有向原著者和读者表示最深的歉意。

我们衷心感谢日本京都大学岛田虔次教授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詹逊(Marius B. Jansen)教授先后大力荐介原著,使我们加深对原著的认识,从而促发翻译的动机和坚持翻译的决心。在翻译过程中,承蒙香港中文大学王德昭教授、陈荆和教授、孙国栋教授、王尔敏先生、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黎明先生等师长经常不吝赐教,良深感纫。复承汪向荣先生、萧滋先生、余冠初先生、梁国豪先生、陈湛颐先生、周佳荣先生、李朝津先生、何炳坚先生、何镇中先生等,或润饰译文,或提示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我们还要特别

感谢我们的内子谭丽萍女士和林洁明女士，分别为我们的翻译工作分担了不少劳苦。

对于原著者实藤惠秀先生，我们不但衷心感谢他十多年来对本书翻译工作的指教和帮助，更要感谢他在半个世纪以来献身留日运动史和中日文化关系的研究，以及在战后推动中日友好事业的努力和成就。

译者识力有限，本书谬误之处，与上述诸位师友无关，概由译者负责。冀盼同道先进，不吝批评指正。

谭 汝 谦

林 启 彦

一九八一年三月五日于香港

中译本序

拙作《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承中国青年学者谭汝谦、林启彦二先生逐译，得与中国读者见面，本人感到荣幸之至。译者索序于我，使我想起一些书成后发生的事以及个人一段惭愧的心路历程，拟借此机会向读者坦述。

本书第四章第三节“国号问题”的末段，有如下的结语：

> 从此，即使政府默不作声，“中国”一词也会从日本人口中溢出；而“支那”一词，明治以来运用的次数也许较“中国”一词为多，但无论如何已注定成为日本语言中的死语。

这是 1960 年的话，如今这一预言幸获证实了。

1949年10月以后，日本人不再称中国为“支那”，但却制造了一个新名词“中共”——这是日本新闻界用以称呼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国度的名称，含有又讨厌又轻蔑的意味。虽然，“中国”和“中共”两个称呼曾经同时并存过，但因日本国民之间，称“中国”的比例日见增加，因此报纸和电台，终于不得不放弃“中共”而采用“中国”的称呼，以下是各大报章改称“中国”的日期：

《读卖新闻》从 1962 年 9 月起，

《朝日新闻》从 1964 年 10 月起，

《每日新闻》从 1967 年 12 月起。

至于电台方面，日本国家电视台（NHK，日本放送协会）亦自 1969 年 8 月 28 日起决定取消“中共”的称呼，一律改称“中国”。

这种改正国名称谓的做法，是日本国民督导新闻界而获致成功的。(关于中国国号称谓的变化详情，笔者已另撰《对中国的称谓》一文，加以论述，见《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因此，现在我们翻开较新的辞书，"支那"一词的释义就变成："しな〔支那〕，名词，中国之旧称。"

民国时代的留日学生憎厌日本人开口"支那"、闭口"支那"的程度，已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这是由于大部分日本人对中国存有轻蔑之心，因而招致中国人对"支那"这个名称反感所致。留日学生一听此名，即如芒刺背，心中非常痛苦不安。笔者谨向已故留日学生在天之灵和现在仍健在的留日学生诸君郑重报告，时至今日，这个非常令人厌恶的语汇已从日本语言中消失了。

在本书之末，有篇"后记"，结束时我这样说：

> 在写这本书时，特别考虑到，除了让日本读者给予批评外，我也希望中国的读者给予批评指正。我自问做过一些有愧于心的事，对不起中国朋友，但深感重要的是诚心向中国人表示歉疚，于是写出这篇冗长的书后话。

这本书写成后不久，我以"日本学术界考察中国文字改革代表团"团员身份(团长为土岐善麿先生)访问中国。当时，我曾经把自己在中国以不正当手段拿走的四十多册图书送还中国。中国方面，由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先生和北京图书馆副馆长联同接受。当时，我全身冒出了冷汗。

我以为如此做，自己身上的污渍总算洗清了。但是从一次偶然机会，忽然又想起此事来，不禁愕然面惊、竦然面惧。这是我个人一件非常耻辱的事，但请容我把它说出来吧！

回顾昔日，当日本军侵占中国期间，日本知识分子往往以"研究"为理由，不须向中国政府申领入境签证，便可渡海昂然进入"敌

爱的中国”；而研究费用，实际上是曾经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日本政府从中国敲诈得来的“庚款”的一部分。

日本侵略军以查禁“危险文书”为借口，从中国沦陷区各大学抢夺大批图书杂志，运回日本。我对这种行为，虽也表示愤慨，但仍以“整理”为名，接受了一些资料。我当时曾以早日完成自己编纂中的《中国杂志创刊目录》的理由来自解。今日细思之下，这真是无法无天的罪行啊！

上述的事情，我在“后记”中都有所叙述。可是，在当时尚未理会到问题的实质。如今反省起来，才知道这是最羞耻不过的事。我当时虽没有参加武装侵略中国的行为，但自己心中却已默认了这些行为了。这真是一个不能饶恕的念头。

我当时的想法是：整理好这批杂志，编一个总目录（这已成为事实了），其中完整的一批，当然是留在中国。其余剩下来的一部分，就希望带给东京的中国综合研究所，使能在日本保存下来。再剩下来的一批，就想放在早稻田大学。

这简直是无礼之至！这简直是强盗行为！

在战后的岁月，学生们都说我对中国一边倒，家人都以为我是个中国狂热者，我也相信自己是少数敬爱中国的日本人士之一。

如果是真正的敬爱中国，那么当自己的同胞亮出军刀，在中国土地上大肆暴虐的时候，自己又怎能到中国趁火打劫呢？作为一个敬爱中国的人，又怎么可以把中国的贵重杂志带返日本呢？在敬爱的友人家中，未得友人的许可，便借口说要研究其家传而把大量文献夺走，天下间哪有这样的道理！

唉！我自己当时的潜意识其实与“一般日本人”并无多大的差异。这都是明治以来蔑视中国的教育所造成的恶果。这些事，直到最近我才完全觉悟过来。我知道即使我合着双手，叩头向中国朋友拜歉再三，也不该被饶恕的。

最后，关于本书中译出版的经过，我想也值得向读者说一说。远在 1960 年，当本书初版的时候，有一位香港的中国读者来信请求我授权翻译本书，我当时提出了两个条件，要求他能做到：

1. 本书要在中国内地出版；

2. 脚注要全部译出。

这位先生后来没有回音，中译的事便搁置了下来。

1968 年秋，谭汝谦先生来日本留学，京都大学岛田虔次教授介绍他与我认识，我知道他当时很有诚意翻译本书，而且已经译出一些章节。1973、74 年间，林启彦先生为研究留日学生问题，亦到日本搜集资料，我们因此有缘缔交，林先生亦向我表示了翻译此书之意。我对他们同样地提出上述两个条件，而他们均未置可否，想或被我难住了。1977、78 年间，我忽然接到谭、林两先生来函表示计划合译本书，我才知道他们原来一直未有忘怀这件工作。并且，我还知道他俩虽是同道，且还在同一大学工作，而到合译计划决定之时，才彼此知道对方过去和我结交这段往事。我当时虽很高兴，但仍半信半疑，我想他们能不能做到十多年前我提出的条件呢？料不到两年之后，他们两位已把本书全部译出，而且还很细心地订正原书不少错误的地方，对附注的处理，可以说比原书做得更周到。起初，这个中译本只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中文大学出版社知道我的意愿，便与三联书店北京总店签订协议，由三联书店出版中国国内版。

至此，我的两个愿望全部实现，看到本书能和广大的中国读者见面，我真有说不出的快乐。

实藤惠秀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日于

东京，时年八十四岁

原　　序

千多年来，日本在思想、文学、制度，以及衣、食、住等日常生活上，都深受中国影响。日本人因而对中国敬仰有加，直到德川时代(1600—1867)末年，崇尚中华文物的风尚依然热烈。

踏入明治时代(1868—1912)，日本急剧地吸取西洋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关心渐趋淡薄，但对中国尚未采取轻视态度。不过，从明治初年起，日本步西洋列强后尘，开始在亚洲大陆蠢蠢欲动。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95)中，日本赌以国运，诚惶诚恐地悉力以赴，结果大获胜利。从此，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为之一变，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都轻视中国，并侮辱中国人为“清国奴”(chankoro)。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强占德国在中国攫夺的权益，又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企图使中国沦为日本的属国，其后以“满洲乃日本生命线”为借口，在中国东北制造“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从甲午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五十年，是中日关系最恶劣的时代。就1937年开始的八年侵略战争而言，日本军国主义者蹂躏中国广大幅员要地，残杀一千万中国人，损毁五百亿元的财产。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无面目见中国人的时代。

然而，在这阴森可怖的黑暗时代当中，出现了一线光辉——这虽然只是漫漫长夜中一二颗星星闪烁的光辉。我所指的光辉就是中国人留学日本这件事。从1896年到1937年四十二年间，中国留日学生络绎不绝，人数最多的时候，竟达八千之谱，其盛况在世

界各国留学史上可说是空前的。

日本人有没有循循善诱中国留日学生，使他们过着愉快而有意义的留学生活呢？中日两国能否因为这些留日学生而增进友谊呢？日本接受中国留日学生之后，获得什么利益呢？留日学生通过日本吸取近代文化，从而推动中国革命；对此，日本人能否洋洋得意而引以自豪呢？要解答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在1939年撰写《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稿》一书，探讨留日的原因及留日史的演变。当时，我尚未着手研究留日学生对其祖国的贡献。

其后，我虽然在中国搜集了大量直接间接有关留日史的资料，但在日本投降后，研究留日史的意义却一度在我心中失落了。直到最近，我对中国的看法已安定下来，重新肯定研究留日史的意义，于是决心要把本书写出，花了两年光景才完成。

拙作诸多未备，谬误百出，但相信可为中日两国近代关系史上重要的一环，打开一学术研究的端绪吧！尚祈中日两国同道先进不吝批评教正，不胜感幸。

实藤惠秀谨序

一九六〇年于东京

译　　例

1. 原书纪年多阴、阳二历混用，译本尽可能统一为阳历。但在引文内或其他无法确定阳历日期者，则不改。
2. 原书对中国的称号，因受多种文献记录所影响，往往很不一致。民国以前，日人称中国为清国或支那者居多。民国以后，亦鲜称中国或中华民国，而往往径呼支那。凡此，皆含有轻蔑中国之意，译本尽可能改为中国。惟本书第四章第三节因系专门探讨中国国号问题，故国号悉照旧不改。又征引之中文文献，如称中国为支那者，均不改。此外，若干专门称呼，如“清国留学生会馆”等，特别文件如《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等，则仍保留旧称。
3. 原书以日本人身分著述，故记叙中国人赴日留学或考察时，均称“来日”；称谓日本之处，多呼“我邦”。译本中，此类词汇尽可能译以其他意义相通的词汇，如“东渡”、“抵日”之类，并改“我邦”为“日本”。至于征引文献方面，为求存真，则全不改。
4. 原书引文中，往往有明治时代的古体文，至大正（1912—1925）以降，官书文档之类，亦多保持一定的古体文形式。为存真起见，亦尽可能以晚清的文体译出。
5. 引用文字中，如属引自中文文献者，尽可能查明中文原典以征引之。但亦有少数中文文献，如清末留日学生团体的集会记录或宣传文件等，今日不易得见，原作者亦无法提供原典，则径照原书日文译文重译。
6. 原书引文有时略嫌过长。例如，第七章引用《饮冰室文集类编》共

十七处，作为梁启超自注日本词汇的例证；又译引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第三章第五节全文，以及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本借来的词汇》（《中国语文》第68期）一文全文。译本在不影响原书意向的原则下，尽量删节过长的引用文，以省篇幅。

7. 除原书注释外，为方便中国读者，对书中的中外人名、事名、物名等，酌按其与留日史关系的深浅，或对一般读者的陌生程度而附加译注。

8. 原书错误之处，均尽译者所知加以改正，或于译注中略加说明。至若明显出自排校之误者，则径行改正，或补入订正字句，附以〔 〕号，以资读者参考。

目　次

第一章 留学日本的原因

一 中国留学生的东渡

1896(光绪22、明治29)年旧历3月底,清朝首次遣派学生十三人抵达日本,他们是: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吕烈辉、吕烈煌、冯阊谟、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王某和赵某。这一批学生都是经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选拔试而获派留学日本的,年龄从18岁到32岁不等。当时的驻日公使裕庚原把这十三名学生的教育委诸日本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的,但西园寺氏因兼任文部大臣,故转请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完全负起教育这批学生的责任。

此后,中国留学生人数逐渐增加,1899年增至二百名,1902年达四、五百名,1903年有一千名;到了1906年,有谓竟达一、二万名之多。据笔者研究的结果,1906年留日学生实数约为八千名左右;即使如此,一个国家一下子送出八千留学生,而另一个国家一下子接受八千留学生,这种情况,历史上恐怕不多见吧?

中国一直是日本人前往留学的国家。由公元七世纪开始,日本留学生便冒生命危险从海路负笈中国,即使在镰仓时代(1185—1333)留学僧亦络绎不绝。千多年来,日本不断从中国学习哲学、文学、制度乃至日常的生活习俗。总之,过去日本是送出留学生的国家,而中国是接受留学生的国家。

现在形势逆转,昔日接受留学生的国家变成了送出留学生的

国家。当时日本的报纸杂志虽并未把这十三名中国学生留日之事，当作英雄凯旋或台湾抗日之类的热门新闻去报导；但是对于日本有识之士来说，这当是一件值得惊喜的事。备受青年爱戴的文学者大町桂月，在《太阳》杂志（1902年11月5日号）“时事评论”（教育）栏写道：

> 中国的急务在发展教育，而教育上的急务在派遣海外留学生；近年派遣学生来向昔日的弟子问道求益，真不愧大国风度。

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在《太阳》（1898年8月20日号）发表长文《关于清朝留学生》，说：

> 中国这个衰老帝国，过去昏昏欲睡，奄奄一息，自从甲午一役以来，益为世界列强侵凌所苦，如今觉醒过来，渐知排外守旧主义之非，朝野上下，奋发图强，广设学校，大办报纸杂志，改革制度，登用人材，欲以此早日完成中兴大业。今日清朝派遣留学生来我国，最先虽或因我国公使领事劝诱所致，然实亦气运所使然。……清朝于四五年前，仍对我轻侮厌恶，今一朝反省，则对我敬礼有加，且以其人材委托我国教育，我国应如何觉悟反省一己之重任？……

大町与上田两人的意见，大抵能够反映日本人士对此事的最初反应。

二　中国人对西洋文化的反应

日本有识人士且惊且喜地问：为甚么过去的留学生派遣国——日本，会变成留学生教育国，而留学生教育国——中国，却变成留学生派遣国呢？

一言以蔽之，因为在吸收近代文化上，日本比中国来得快。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要明确地解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明白西洋

与中国及西洋与日本之间的关系。

中国是个文化悠久的国家，不但孕育了卓越的哲学和文学，而且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穹窿建筑等重大发明的发祥地。当中国强盛之时，西洋人因为仰慕中国文化，不远千里而来。而中国则以抚慰朝贡国的态度来款接他们。

到了16世纪，西洋人大抵已从海路抵达中国，而且更进一步来到日本。葡萄牙人于 1516 年抵广东，1543 年抵日本种子岛；西班牙人则于 1575 年到中国，1584 年到日本。

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Francis Xavier)于1549 年抵日本传教之后，就觉得既然日本文化全部来自中国，日本人极为崇尚中国，倘使日本文化的发祥地——中国，也信奉基督教的话，日本亦必步其后尘。因此，他便离开日本，不辞艰苦，打算进入中国，但终未能如愿以偿，在1551年病死于上川岛。这个故事，在日本家传户晓。不论在经济上或思想上，西洋人都以中国为目的，日本并不怎么重要。

16世纪初期，最先抵达中国的西洋人是商人和外交官。不久，耶稣会传教士也来了，著名的有利玛窦 (Matheo Ricci)、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 Verbiest)等人。根据王韬《泰西著述考》，由 1552 年至 1674年，仅属“著名”的教士便有九十二人，而他们多数埋骨于中国。他们用汉文介绍西洋知识的著作竟达二百十一种之多。以利玛窦为例，汉文著作有《天主实义》、《畸人十篇》、《几何原本》、《测量法义》、《万国舆图》、《乾坤体义》等，大抵以宗教和理科书籍为主。

不过，针对拜祀孔子和祖先的问题，教士与教士之间发生了争论，康熙皇帝在1720年颁下禁教命令。以后百余年间，教士再不能在中国活动。

到了 19 世纪，基督教教士复来中国。最早的是英国人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他不但用中文翻译《圣经》,而且在1815年发刊汉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这本刊物不能在中国国内出版,不得已改在马六甲发行,目的在启导南洋华侨和中国国内人士。1833年,别的传教士在广州创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月刊。其后又有《遐迩贯珍》(1853)、《中外新报》(1854)等汉文报章杂志相继刊行。

1877年各教会合办的益智会成立,发行教科书《西学初步》四十二部八十册。又,韦廉臣(Alex Williamson)为了向中国人普及西洋知识,使能发愤图强,振兴国家,组织了广学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出版了二百五十部汉文专书和译本。

总之,16世纪以来,传教士虽然不断引进近代西方文化,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却无接受之意。传教士煞费苦心用汉文写成的东西,大多数中国人亦不加理睬。

三　日本人对西洋文化的反应

日本方面的态度又如何呢?

自1639(崇祯12、宽永16)年以来,日本实行锁国政策,除中国及荷兰以外,禁绝与其他国家通商,仅在长崎一地设立特定通商口岸,连担任翻译的"通事",说说荷兰语是可以的,但不准阅读荷兰文的书籍。

不过,日本人中间,不惜以身试法而立志追求西洋学问的比比皆是。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人,甚至因此而断送了性命。①

1720(康熙59、享保5)年,因为吉宗将军的英断,除宗教书之外,其他洋书获得解禁,洋学又再兴盛起来。利玛窦的《乾坤体义》、《圜容较义》、《经天盖》等书,首先从中国传来,为日本人所热

心阅读。这是利玛窦死后一百一十周年的事。此外，汉文翻译西洋数学的书，例如《职方文算》、《测量法义》、《历算全书》、《数理精蕴》等亦相继输入。②

1850年代，日本大量出版汉译洋书的训点③本或日文译本。英国人合信(Dr. Benjamin Hobson)的医学书《全体新论》于1850年在中国发刊，1857年被伏见医生越智氏在日本翻印。此后，这本书在日本一共翻印了十次之多。美国丁韪良(W. A. P. Martin)著《万国公法》的汉译本，于1864(同治3、元治元)年在中国出版，而第二年(1865)便被日本开成所翻印。这本书先后在日本翻印过五次，到了明治时期成为法学教科书。在幕末时代，这类汉译的翻印本，为数实在不少。

西洋人出版各种洋书的汉译本，目的是向中国人灌输近代文化。但是，新文化的种子在中国被埋葬了，到了日本才发芽、开花。

日本人并不满足于西洋人为中国人而译的近代知识书籍，开始自己动手翻译荷兰书籍。《兰学事始》一书，就记录了关于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人非常感人的事迹。④

---

① 高野长英(1805—50)，幕末兰学者、兰医。早年以翻译西洋生理学《医原枢要》一书，名声大噪。与小关三英、渡边华山、铃木春山等人组织尚齿会，研究西洋事情。1838年著《梦物语》，畅论海外形势，反对幕府驱逐英船来航，坚决主张开国，被捕下狱。其后屡为幕府所迫，自杀而死。
渡边华山(1793—1841)，幕末兰学者、画家。对幕府的锁国政策深表不满，曾著《慎机论》予以严评。1839年因蛮社之狱牵连被捕，于狱中自杀。——译者注

② 据吴秀三：《洋学の发展と明治维新》一文，参看史学会编《明治维新研究》页352及页365。

③ 为了训读汉文，注在汉文旁边的假名和标点，称为训点。——译者注

④ 《兰学事始》原名《兰东事始》，幕末医学者杉田玄白(1733—1817)所作。该书记叙杉田、前野良泽、中川淳庵三人于1771年起翻译荷兰文人体解剖书籍等的经过，兼述德川时代洋学发孕期的情况，是了解“兰学”的重要文献。有关杉田等人翻译《解体新书》的经过，参看吕风爱书译《兰东事始》，刊于《香港留日学友会年刊》第5期(1979年)。——译者注

前野、杉田等人为了翻译《解体新书》，克服重重困难，花费不少心血，工作了四年，易稿十一次，结果于1774(乾隆39、安永2)年出版了译本。

在日本热心洋学的不仅是民间学者。德川幕府于1855(咸丰5、安政2)年设立"洋学所"翻译外国书籍及教授荷兰语文。洋学所后来改名"蕃书调所"、"洋书调所"、"开成所"等，成为东京大学前身。

1861—63年间，洋书调所翻印下列西洋人为中国人而发行的汉文报纸及杂志：《官报·中外新报》(美国传教士于1858年在宁波发刊)、《官报·六合丛谈》(圣公会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在1857—58年于上海发刊)、《官报·香港新闻》(香港英文报纸Daily Press的汉文版)、《官报·中外杂志》(英国传教士麦嘉湖(John Macgowan)于1862年在上海发刊)。①

四　中日近代化的差别

由于中国人既漠视西洋人汉译的近代文化书籍，故更不会进而译印西洋书籍。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译刊的西洋书籍是1847(道光27)年魏源的《海国图志》，但已比日本的《解体新书》迟出了七十四年。

如前所述，中国最早的汉文期刊是1815(嘉庆20)年由西洋人发刊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此后，由西洋人发刊的汉文报纸期刊共有17种之多。例如《特选撮要(Monthly Magazine)》、《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等是。②

---

① 据小野秀雄：《我国初期の新聞と其文献について》一文，参看《明治文化全集》第四卷，页2—20。

② 详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及实藤惠秀：《中国杂志の概观》(收入《日本文化の支那への影响》一书中)。

不过，由于中国人对这类东西漠不关心，所以，就没有及早发刊自办报纸和杂志的打算。反之，在日本，却由政府带头翻译或翻印外国的报纸和杂志，故很早就有自办的报纸和杂志的雏型。

在日本并不是没有西洋人经营的报纸，例如1867（同治6、庆应3）年的《万国新闻纸》。然而，在此之前已有由日本人主办的报纸，例如1863（同治2、文久3）年发刊的手抄本《横滨新闻》。踏入1868年，由于明治维新政局的刺激，西部有《各国新闻纸》、《内外新闻》等，东部则有《中外新闻》、《日日新闻》、《江湖新闻》等，一年之间，竟发行有二十种由日本人自己经营的报纸。

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由中国人经营的报纸一份也没有。中国人自己主办的报纸，以1873年的《昭文新报》为最早。在中国，由西洋人发刊的期刊比西洋人在日本发刊的时间早五十年以上，但中国人自己经营的却比日本人在本国经营的迟了六年。

由日本人发行杂志，日本亦远较中国为早。柳川春三的《西洋杂志》于1867年创刊。配合自由民权运动，日文杂志接踵涌现。在明治二十年代（1887—96），《反省会杂志》（《中央公论》前身）以及成为欧化主义急先锋的《国民之友》之类的大型杂志，为数不少。在同时的中国，一本杂志也没有。中国人主办的杂志，以1896（光绪22）年由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为最早，比日本的《西洋杂志》迟了二十九年。

虽然对于引进近代文化，中国人比日本人方便得多，但他们对此事却不关心。日本的条件较中国恶劣，但却热心从事，故在近代化事业上比中国捷足先登。为了避免分述的麻烦，请看下列两国近代化比较表。（见次页）

在比较表上年差甚微的事项，在质素上却有很大的区别。例如，设立外语学校，在日本是自发的，在中国却是1858（咸丰8）年天津条约之后，受英法两国压迫而设立的。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只

类似事项	日本		中国		年差
	事项	年	事项	年	
外语学校	洋学所	1855	同文馆	1862	7
购买轮船	咸海丸	1857	购入商船亚丁(Aden)号	1872	15
留学	荷兰留学	1862	美国留学	1872	10
工厂	横须贺造船所	1864	安庆军械所	1861	(-3)
文字改革运动	《汉字御废止之仪》	1866	《一目了然初阶》	1892	26
杂志	《西洋杂志》	1867	《时务报》	1896	29
诏令	五条誓文	1868	科举废止诏书①	1905	37
报纸	《中外新闻》	1868	昭文新报	1873	5
电信	东京-横滨间	1869	上海-香港间	1871	2
货币制度	新货币制度	1871	实行法币	1935	64
发式	自由散发	1871	自由剪发	1911	40
火车	东京-横滨间	1872	上海-吴淞间	1876	4
新历	太阳历	1873	太阳历	1912	39
民众政治运动	民选议院设立建议	1874	公车上书	1895	21
国立新式大学	东京大学	1877	京师大学堂	1902	25
立宪预告	国会设立诏书	1881	预备立宪上谕	1906	25
颁布宪法	大日本帝国宪法	1889	中华民国宪法②	1947	58

承认儒学为学问，并不踊跃进入教授外国语和自然科学的同文馆，而日本知识分子的态度恰好相反。

对留学的态度也是一样。幕府正式派遣留学生到荷兰虽是1862(同治1、文久2)年的事。不过，在8年之前，吉田松阴便曾冒着生命危险企图乘搭美国船只出国留学，因而被捕入狱。[③] 日本最早前往荷兰的留学生，也是抱决死的心情和志愿出国留学的。

---

① 似应以1898年清廷下诏变法的诏书来类比。——译者注

② 中国最早一部宪法是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译者注

③ 吉田松阴(1830—59)，长州藩士、幕末的勤王志士。1853年美国海军提督培理率舰队赴日叩关，全国骚然，吉田主张攘夷。翌年，美舰队又再叩关，停泊于下田，吉田与洋学者佐久间象山密谋乘搭美舰出国视察，事发系狱。后于狱中设松下村塾，热心教育子弟，鼓吹尊皇攘夷，1858年被处死。其弟子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久坂玄瑞等，多成为倒幕派和明治维新的重要领导人。——译者注

在中国敷设铁路也不是容易的事。1863（同治2）年，二十七名上海英国商人拟向李鸿章请求敷设上海苏州间的铁路，并未获准。1875（光绪1）年8月，英人获得敷设上海吴淞间铁路权，翌年6月通车。1877年3月，火车辗毙一个中国士兵。苏淞太道冯竣光与英国领事交涉，要求立刻禁止火车运行，英领事不加理会。跟着，南洋大臣沈葆祯也向英领事交涉，亦无结果。最后，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谈判，以二十八万五千两白银买下铁路，命人拆除路轨，原拟把铁路器材运往台湾，因缺乏运费而作罢，结果把所有器材沉入打狗湖底。①

五　从思想上看中国近代化落后的原因

西洋人到中国比到日本为早，对于引入西洋文化，中国亦比日本有利，为甚么中国在近代化事业上反比日本落后呢？探其原因，中国人恒认为中国具有卓越文化，西洋人亦因此而来中国，故不赏识西洋的近代化。

"中国"这名词的含义是：中国是世界中心，文化本源，故中国称为"上国"，其朝廷称为"天朝"。日本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也还是这样尊称中国的。

中国的君主"以家为天下"，是世界之主。汉族以外的人士，一旦成为中国皇帝，亦承受这种意识。元世祖信任马可波罗，该是一种变例。明神宗封利玛窦及清圣祖封汤若望，只是爱惜其"技艺"，并非站在人类平等立场上予以礼遇。准许西洋人来中国贸易，亦以彼等为"朝贡国"，怜其生计，给予必需品（贸易品），也无非是以天地之心为心，施惠舍远人而已。

1653（顺治10）年，见到满洲人在中原已确立权力，为了获得

① 参看张星烺：《欧化东渐史》，页88。

贸易许可，荷兰人杯突高啮(Peter de Goyer) 及惹诺皆色 (Jacob de Ceyser) 以使节身分到北京。他们抵达后，中国方面要求他们行“三跪九叩”之礼，他们答应之后，始获准谒见清帝。此后每年都被接见，可是并未获得贸易许可。

1665(康熙 4)年，荷兰再派范哈伦(Van Hoorn)到北京，亦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获接见，可是始终不能获得通商特权。

1793(乾隆 58)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到北京交涉通商事宜。座驾船沿白河逆流而上的时候，打出“贡使”旗号。抵北京时，皇帝行幸热河，他也到热河去，谒见时清廷要求他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位使节因英国正进行产业革命，是世界最强的国家，而且自己又是英皇佐治三世陛下的代表，不允行这种卑屈礼仪，于是严词拒绝。经过一番交涉之后，双方妥协：必须以英王臣下谒见英王的礼仪去谒见清帝。谒见之后返北京，正要交涉通商问题，英使便被迫立刻离开北京，无功而返。

1816 年，英国又派阿美士德(Lord Amherst)到北京，由于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未获清帝接见，并且即日便须离京，不能从事任何交涉。

后来，中英间发生鸦片战争，1842(道光 22) 年两国缔结了南京条约，虽然其中条文已经订明中英双方应以平等地位相待，可是中国人仍然常常轻视西洋人为“夷狄蛮人”。

1856 年，中国因亚罗号事件与英法联军开战，1858 年战败后，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中亦有一条款规定“凡欧洲人不得称之为蛮夷”。不过，中国人仍然不改变其态度。这就是夸耀本国优越的中华思想。

中国自满自大的原因，固与“地大物博”这个地理因素有关。但是尚有更大的根本的原因：即文化问题，或思想问题，亦即儒家思想问题。

人们相信中国拥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文化，亦即拥有夸耀世界的儒教(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是天经地义的，万世不变的。这不但没有丝毫不足之处，也没有丝毫多余的地方。它尽善尽美，贯通今古，放诸四海而皆准。

只要行乎圣人之道，不管任何国家，任何时刻，都可推行治道。所谓教育，就是使学生记诵这圣人之道。由于它已兼备万物，故不必创造和发展，只须记诵熟习就够了。注重背诵默记的教育因而诞生。官吏就是信奉儒教而协助皇帝统治的人。因此，选拔官吏的科举考试便以五经为中心。文学亦须"文以载道"，载的是儒家之道。儒教成为政治、学问、教育的中心，连风俗习惯都濡染了儒教色彩。

因此，近代文化不容易进入中国。既以儒教为满足，就再无必要输入夷狄的东西。与固有文化相比，近代思想文化，只不过是形而下的东西；至于火车电信之类的东西，就更等而下之了。中国人认为"火车非圣人所乘，电信亦非圣人所用"，总之，不必细顾可也。

1884 (明治 17)年，日本汉学者冈千仞游历中国各地，在慈谿探访曾旅日的王黍园的族人，获得热诚款待。族人中有王砚云这个举人，广有才学，能言善辩。王氏说："李中堂(鸿章)开办招商、机器二局，耗资百万，消耗国力，并无结果，大失民心。"冈千仞不以为然，指出中国人是中了儒教的毒；还解释说，取西洋之所长，以供我用，就是养育国本之道。砚云却愤然说道："机器者圣人不语者也。此物唯有导国人去其质朴而趋赴机巧。"从砚云的一番话，可以窥见：若有人引进西洋文化，便会被斥骂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

六　中国思想的变化与留学日本

18世纪后半期，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数量，逐年增多。进步

的士大夫，不但主张禁烟，而且主张学习外国之所长以保卫中国。龚自珍(1792—1841)与林则徐、魏源等人，便主张严禁鸦片，并学习制造西洋机器("西洋奇器")，讲求富国强兵。

实行禁烟的林则徐(1785—1850)，认为必须与贩卖鸦片的国家绝交，但主张应与要求正当贸易的国家通商。因此他积极地倡导国人了解外国实情，向侵略者学习新式武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此，中国先要振兴新式军需工业，开发矿藏。可惜，这些建议未获朝廷认可。

魏源(1794—1852)翻译了《海国图志》，也是为了知悉外国事情，学习外人所长，使中国富强。他在《海国图志》(1842)的《筹海篇》中说：

> 古之圣人……射御登诸六艺。岂火轮火器不等于射御乎……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①

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随后，在1860(咸丰1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皇帝逃到热河，清朝君臣更受到重大的打击，加上清廷平定太平天国时曾借助西洋人的力量。因此，清廷统治者心里虽然鄙视西洋人为"洋夷"，但也感到弓箭的确无法与西洋武器相比。

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设造船厂，李鸿章在上海设制炮局。1864(同治3)年，李鸿章又在苏州设西洋炮局，翌年收购西洋人在上海经营的大工厂，创办江南制造局，制造枪炮军舰。1866(同治5)年，左宗棠在福建设船政局——这是海军基地兼海军军需厂。1867(同治6)年，崇厚在天津设机器制造局，李鸿章在南京设金陵

---

① 魏源：《筹海篇》三"议战"，见《海国图志》卷一，页45。

机器局。1877（光绪3）年，丁宝桢在成都设机器局，1878（光绪4）年，左宗棠在兰州设机器织呢厂；1881（光绪7）年，吴大澂在吉林设机器局。

为了支援军器的制造，清廷渐次采掘矿藏，敷设电信与铁路。配合武器的制造，清廷亦纷纷建立新式海陆军学校。海军学校有福建船政学堂（1866）、天津水师学堂（1881）。陆军学校有天津武备学堂（1885）及湖北武备学堂等。而海陆军学校则有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

主持建立这种新式武器及设施的官僚称为“洋务派”，他们这一运动叫做“洋务运动”。但是大部分官僚和一般的知识分子都是顽固保守的封建主义者，他们猛烈地反对洋务运动。其反对的理由，总是指别人背叛圣人之道。

当时，来自西洋的学问，例如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等，被称为“声光电化之学”或“西学”。以西学为基础所制造的机器，被视为“机巧”小术，是“不足以语圣人之道，玷污圣人之道”的。

支持洋务论的人，通常抬出西学源出中国说——“西学源于中国，机器亦源于中国”，以为辩解，罗江荷笠者的《瀛海论》① 大概是其先驱吧！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1879）的《学校》自注、王之春《蠡测危言》（1885）的《广学校》、汤震《危言》（1890）的《中学》，及陈炽为郑观应《盛世危言》所写的《序》（1893），全都大同小异，都是西学源出中国说的调子。张之洞《劝学篇》（1898）外篇《会通》，甚至在中国经典中寻求西学渊源，张氏不再满足于光是引用纬书及诸子，而全引经书，其主张与《瀛海论》同出一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遂兴。

---

① 原著曾详引《瀛海论》一段文字，因嫌其说法多牵强附会，故删去不译。——译者注

中体西用说的产生，最先似是出于冯桂芬在1861年所写的《校邠庐抗议》，其文有谓：

> 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①

薛福成以"中学"为"道"，西学为"法"，王韬则以"中学"为"道"，西学为"器"，但意趣则一。

1896年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首次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词语。他说："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劝学篇》的《会通》篇，亦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虽然有人以为是张之洞提倡的结果，其实在当时，这种说法早已流行，张氏不过大声疾呼而已。

其实"西学源于中国"说也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也好，都表露了儒家学说的完全性已有了破绽，并显示出中国已从天朝上国的睡梦中惊醒过来。西洋的文明即使源出中国，但却由西洋人去发展，中国今日不得不把它学回来。不论怎样自吹自擂，说甚么中国之学为本、为道、为体，而西洋之学为辅、为法、为器、为用；说甚么中国人为主人，西洋为仆人，今天却不得不学习此仆人之文化。

于是，引进近代文化的心态才逐渐形成，成为留学外国的思想的根据。

七　留学日本的理由

了解了中国思想的变化，我们便可以讨论留学这件事。那么，

---

① 冯桂芬：《采西学议》，见《校邠庐抗议》，页59。

为甚么大量学生到日本去留学呢?

在1894—95年的甲午之战,日本打败了中国。中国人以为日本的胜利,乃因普及教育和实行法治有成所致。因此战后第二年,中国立刻派遣13名留学生到日本。

日本人因中国学生留学日本,难免会提出如下问题:日本的新式教育或新式法律,都从西洋学来,中国人为甚么不到这种新文化的本家——西洋——留学而来日本呢?

上面提过的大町桂月在《时事评论》写道:

> 从费用观之,留学日本比较便宜;但直接从本家所得者,当远较经重译得来之学问为靠得住者也。

不过,中国当时不作此想。中国在近代化方面大为落后,必须急起直追。向去芜存菁的日本学习,比直接向本家学习,实在简便而有利得多。张之洞在《劝学篇》说:

> 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①

又谓:"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②

其次尚有语言文字问题。中日两国都使用汉字,所谓"同文"之国。张之洞在《劝学篇》谓"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③,梁启超《论译书》举出学习日文较易的五个理由:

1. 音少。
2. 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
3. 文法疏阔。
4. 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

---

① 张之洞:《游学》,见《劝学篇·外篇》,页6。

② 张之洞:《广译》,见同上书,页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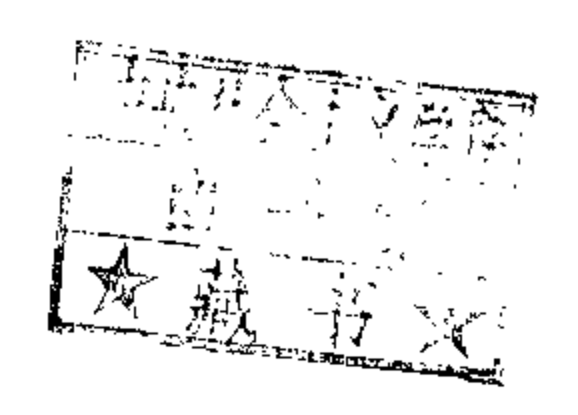
③ 同①。

5. 汉文居十六、七。①

与此关连的是中日两国风俗习惯颇多相似，使留学生在生活上较易适应。

也有以两国距离较近为理由者。② 留学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在中国留学生中，也有当时身负重任的人。祖国一旦有事，可以立作归计。因此，一衣带水的日本，变成理想的留学国。

学费也有关系。比起西洋，日本的生活费便宜得多。根据汇兑行情，在中国国内学校就读的费用，有时甚至可以足够作留学日本之用。因此之故，在汇兑率有利中国的时候，留学生变得特别多。



---

①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上，页78。

② 《劝学篇·外篇·游学》中谓："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

第二章　留学日本的历史

一　最初的留日学生

中日马关条约是在1895年4月17日缔结的。这件事给中国人很大的刺激和教训。他们认识到：日本靠一支洋式军队而获得胜利，这支军队是在具有西洋近代文化的环境（特别是普通国民教育和法治政治）中孕育成长的。故此，旋即出现废除科举的言论，提倡新学（又称“西学”或“泰西学”）的议论也不胫而走。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知识分子集体请愿），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同年6月21日的上谕称：

> 近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时兴举。至整顿厘金，核关税，稽察荒田，汰除冗员，皆于国计民生多所裨补。各省疆吏应各就情势，筹酌办法。以闻。①

1896（光绪22、明治29）年，中国人自己主办的杂志《时务报》创刊，李瑞棻奏请在京师设立大学堂。就在这一年，中国正式决定著手西化。

如前所述，同年旧历3月底，首批13名学生赴日，由嘉纳治五郎承担其教育责任。嘉纳治五郎是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由于这批学生连日文字母也不认识，嘉纳氏不能让他们马上进入高等师范

① 《清史稿·本纪》，页109。

学校。因此，他借用神田三崎町一丁目二番地一所房子，作为校舍兼宿舍；派本田增次郎任监督，吉田氏及后藤氏等人任讲师，开始讲授日本语文及普通学科。至于理科和体育等课程，则在高等师范学校“御茶之水”的校舍讲授。



〔图1〕嘉纳治五郎与最初的留学生
前排左起：本多先生，嘉纳先生，吉田先生
后排左起：朱忠光，冯阊模，唐宝锷

但是，抵日两三个星期之后，韩筹南、李清澄、王某及赵某四人，即离校归国。为甚么呢？第一，他们频频受到日本小孩子“猪尾巴猪尾巴”① 的嘲弄②；第二，他们觉得日本食物难以下咽，恐怕

① Chanchan boshi（チャンチャン坊主）是明治时代（1868—1912）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意指拖着猪尾巴的秃子。有时又呼中国人为 Chankoro（チャンコロ），所指亦大体相同。清末的中国人一般译之为“豚尾奴”或“清国奴”。——译者注

② 《日华学堂日记》明治31年（1898）10月7日条：“晚餐后，学生一同结伴游上野公园，漫步本乡街头，就途中之见闻……予以说明，儿童时有附尾缠绕，呼喊‘猪尾巴’之声，因令之闭口。”

会伤害健康。在此后四十余年，中国的留日学生仍不时感到这两种苦楚。日本人用轻蔑的言词称呼中国，这个问题到了大正时代(1912--1926)，变本加厉。"支那"和"支那人"之类的称呼刺伤中国人的心，留日学生经常抗议，在留学史上投下阴影。

关于食物问题，后来留学生人数增加，中国饭店也跟著增多，连日本人的饮食也受到影响，因此问题并不严重。

到了1899年，嘉纳治五郎所办的，连校名也没有的学校结束了。在这三年间，首批留日学生之中，除金维新和刘麟二人中途退学之外，共有七人毕业。嘉纳治五郎发给这七名学生毕业文凭，证明他们修毕以日本语为"正科"，以化学、物理、数学等为"别科"的三年课程。根据唐宝锷的忆述①，嘉纳校长认为这批毕业生的真实程度，约略等于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三、四年级程度。

在七名毕业生中间，唐宝锷、戢翼翚、胡宗瀛三人转入专门学校攻读。最年轻的唐宝锷在东京专门学校毕业后，转入由该校升格而成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于1905(明治38)年与永井柳太郎等一同毕业，归国后进士及第。唐氏学成返国之后，多次到日本视察，并且长期出任中国律师公会会长，是中日之间的法律问题专家。

戢翼翚后来同时就读于亦乐书院(原为嘉纳治五郎的私塾)及东京专门学校。在求学期间，他创设专门翻译和出版日本书籍的译书汇编社(东京)与出洋学生编辑所(上海)，又与实践女子学校校长下田歌子一同创办作新社，大量翻译及出版日文书籍。他曾经参加自立军之役〔唐才常事件〕，失败后逃亡日本。1908(光绪34)年夏，他为招聘新闻记者从事勤王工作，返回湖北故乡，数年后逝世。

---

① 1939年7月15日，作者在天津日本俱乐部会晤唐宝锷氏。其事详见《唐宝锷氏会见记》，见《近代日支文化论》(东京1941年版)。

唐宝锷与戢翼翚合著的《东语正规》是划时代的日语教科书。虽然，中国并不缺乏日语学习用书，不过一般书籍都把日本语当作中国语看待。例如，"你上哪儿去"这句话，通常成为"アナタ何处行ク"之类不正确的日语句子，并无考究日语助词(テニヲハ)的用法。《东语正规》的方法则有所不同，它从日语发音开始，进而研究变体假名① 和助词。这本书对后来的留日学生有很大的帮助。

嘉纳治五郎与留日学生的教育工作结上不解之缘。1899(明治 32)年，他把三崎町的私塾改名为亦乐书院，努力不懈地从事留学生的教育工作；1902(明治35)年，他又在牛込西五轩町创办弘文学院(参阅本章第六节)。

二　留学政策的确立

1897 年，德国占领胶州湾，翌年俄国租借旅顺和大连，英国租借威海卫，又翌年法国租借广州湾；"瓜分中国"之声四起，中国国势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势之下，革新救国急在眉睫；大家感到为了革新国家，必须先行著手革新文化。就在1897(光绪23)年，作为近代国家基础的国语统一运动开始了②，后来执近代印刷出版业牛耳的商务印书馆成立了，湖南的南学会和时务学堂成立了，中国的邮政事业也开始了。同年，康有为门人徐勤在横滨创办大同学校，专门教育华侨子弟，推日本人犬养毅出任名誉校长。

1898年(光绪 24 年，即戊戌年) 6 月 11 日清廷下诏变法，起用康有为等推行新政，开始所谓戊戌新政。但是，9 月 21 日慈禧太后便幽禁光绪皇帝于瀛台，发出逮捕康有为一派人士的命令，这就

---

① 昔时使用的一种比平假名更接近汉字草体的假名(假名是日语的标音符号和基本字母)。——译者注

② 参看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绪言》，页 1－2。

是所谓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及时亡命日本，但谭嗣同等六人成为维新运动的牺牲者。

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之后，其门人弟子亦纷纷到日本去①。这一批人大都成为留日学生。同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清议报》，不但为留日学生欢迎，而且通过海路输入中国内地。

同年3月，湖广总督张之洞著《劝学篇》，6月上谕令颁布各省。其《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之效：

>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
>
> 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②

《广译》篇则力言翻译日本书籍之必要，并且指出依赖西洋人寻求新学有两种弊端：若先从西洋教习学习，因语言不通，错误百出；又西洋人教学特别缓慢，使学期延长。张氏因而力陈翻译日文的必要：

> 大率商贾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牍条约，法文之用多；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学西文者，效迟而用博，为少年未仕者计也。译西书者，功近而效速，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

① 1899年梁启超设在牛込东五轩町的高等大同学校的学生18人中，多为亡命之客。

②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页5—6。

帅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①

《劝学篇》不啻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劝学篇》问世一年之后，各方反应热烈。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称："联合同志，创为此局。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②

在政治上，张之洞与梁启超意见往往相左，互相攻击，但对于翻译日本书一事，意见完全相同。由此推之，日本书籍翻译及日本留学两事确是当时领导阶层的共同呼声。

同年，姚锡光著《东瀛学校举概》一书。姚氏曾奉张之洞之命赴日考察教育，这本书就是考察报告。内容分普通学校、陆军学校、专门学校、特殊学校等章节，分门别类介绍日本学校。该书在1899年及1900年再版，可见颇受欢迎，正可显示留学的准备工作逐渐完成。

在此之前，为了增进两国亲睦互助，日本一些文武大员不时游说中国政要派遣学生留学日本。参谋总部的福岛安正和宇都宫太郎，历访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及袁世凯，力陈派遣留学生学习陆军的重要。又，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及前司法大臣清浦奎吾等人，趁旅游中国之际，对有力人士缕述新教育的必要。前述张之洞的《劝学篇》，亦极可能受到这类日本人的启发。

1898年旧历3月，总理衙门转述了日本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

该国〔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借悉中国需才孔急，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③

---

①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页14—15。

② 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见《饮冰室文集类编》上，页741。

③ 《约章成案汇览·游学门》所收《光绪二十四年总理衙门复议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折》，转引自《近代中国留学史》，页23—24。

第一个赞成的是御史杨深秀。他制订《游学日本章程》，并且上奏皇帝。6月1日军机处奉旨命令总理衙门奏上具体方案。总理衙门复奏：

> 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以及两广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中，遴选年幼颖悟、粗通东文诸生，开具衔名，咨报臣衙门知照日本使臣，陆续派往，即由出使日本大臣就近照料，无庸另派监督。各生应支薪水用项，由臣衙门核定数目，提拨专款，汇交出使大臣随时支发。①

由于中国政府明令派遣留学生，这样一来，日本留学遂成为一种国策。

此后，张之洞率先派遣志愿学习陆军者四人，又在浙江求是学院派出志愿文科者五人赴日。各省总督也跟着派遣学生留学日本。以陆军为志愿的学生，在东京成城学校接受预科教育；日本人为了收容以文科为志愿的学生，又在东京开办了日华学堂。（详见本章第六节）

在另一方面，罗振玉在上海开设东文学社，陈宝琛在福州开设东文学堂，教授日语及普通学科。自此之后，同类学校在中国国内不断增加。

三　留学生教育论

初期留日学生人数，虽然没有后期之多，但由于中国人来日本留学是前所未见的事，所以颇受日本有识之士的注意。1898年8月20日发行的《太阳》杂志（第4卷第17号），刊载了文部省② 专

① 《约章成案汇览·游学门》，页24。

② 文部省(Ministry of Education)即文化教育部。——译者注

门学务局长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的长文《关于中国留学生》。如果说张之洞的《劝学篇》是对留日学生的欢送词，上田氏的长文就是欢迎词。

首先，上田万年论述留学生来日的意义及日本人在教育上的责任：

> 吾人须视中国留学生之教育问题为我国教育界之一大问题。……不论是在中国独立事业上或中日提携合作上，这一群留学生都是一大力量，与我国派往欧美法为学术研究之留学生有所不同，故吾人必须予以特殊保护及奖掖。彼等留学吾国，窘乏颇多，故不论外务省或文部省，宜具列理由谋之于国会，务以我帝国全国之力，谋求协助彼等获得成功之门径。

基于上述旨趣，上田氏提出下列四项建议：

1. 必须灌输留学生以改革教育之精神，因为只有教育才是改革的根本，才能养成健全的国民思想，从而促进一切文物的发达。他说：

> 吾国国民须觉悟到吾人期望殷切之重大改革须于此批留日学生处着手进行，希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纵使留学生与清国政府并不自知，而吾国之为政者与教育工作者，亦须奖励此等留学生，以养成改革教育之精神为最大义务。

2. 关于留学生之学业，必须采用最科学的教学法，彻底摒弃旧式洋学的教授法。关于日语教学法，上田氏说：

> 希望我国粗通中国语人士，用中日两国语文对照法而教之。……关于文字，起初宜用罗马字母施教，渐次以平假名片假名〔日文字母〕而教之。至于日语中之汉字，须俟一定期间之后，即学会日用会话之后，方可教以日汉音韵之比较。

关于留学生学业进程，上田氏建议：

> 在中国受过普通教育者，即相当于获得秀才学位者，若照前述办法施教，则不出两年，使可粗懂日语文章……再经二三年，即可具备进入高等师范学校或大学之程度。

此外，上田氏认为关于日本实际的文明程度，"直到今时今日尚未达到所向无敌的地步"，如果留日学生光学到日本肤浅的文明便满足，那就功亏一篑了。因此，他主张必须奖励留日学生兼修英语，以便通晓世界文明的真相。

3. 必须施行寄宿制度，理由是"对于中国人，养成在一定时刻准时完成工作的态度，有特殊的必要"；此外，上田氏亦考虑到下列特别问题：

> 况且，当学生在市井澡堂沐浴时，往往须将辫发卷于半边秃头上，不得不与木匠泥水匠之徒混浴；又当彼等于寓所附近散步时，往往遭受日本妇孺之辈"猪尾巴、猪尾巴"(Chanchanpōzu) 之嬉笑怒骂，此种"是可忍、孰不可忍"情绪，长此下去会在不知不觉中，伤害其品件，鲜有不流为寡廉鲜耻之徒。尤其者，于男女之关系，旅日之中国人中，声名狼藉者不知凡几，永田町边，常闻丑恶之声。

故他主张为留学生兴建自修室、食堂、浴室及设备完善之宿舍。倘经费不足，日本外务省或文部省都有"义务"尽力筹措。

4. 为了实现上述理想，必须在外国语学校中建造中国留学生宿舍，因为外国语学校有兼通两国语言的人。此外，上田氏提议留学生必须利用假期，与师友同学一同旅行日本各地。在该文的结论，上田氏说：

> 故吾人兹再主张，日本帝国必须不惜金钱为清国留学生建立完备设施，以完成彼国委托吾人之大事业。……

论者谓：如此耗费国帑，岂能保证他日彼等断不会恩将仇报乎？呜呼！今日不幸尚未见清国人士之中，有此现象也。……

翌年，前驻华公使大鸟圭介，在东京学士院，以《对华今昔感情之变迁》为题演讲，讲词之末段提及留学生：

迩来派遣文武学生，诚睦邻相亲之良策，近日之一大善举也。虽谓时运变迁使然，亦彼国有司之大度宏量，实堪赞佩。祈我有关文武官员，竭诚教导，与衣食住之便，夙夜诱掖，尽至恳之友谊；以酬彼昔师导之恩义，亦盼留学诸君，朝夕黾勉修学，坚忍异邦求学之苦，以俟学成之后，衣锦荣归，将来两国相爱相敬之情，铭刻肝胆，使如左右两手，又如辅车相依，此吾不胜日夜翘望者也。

忆明治五、六年(1872—73)之时，因曾国藩之建议，清国派三十余名学生留学美国，修习各种学问，惜其成绩欠佳，学业不成者甚伙，乃至中途归国。尤盼此次来学诸君，鉴其前车，成就学业，勿忘报国。①

可见日本朝野人士，对留日学生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对他们的期望，也是很高的。

四　留日学生的增加

1899年，亡命日本的康有为离去之后，孙中山却从欧洲来抵日本，章炳麟亦来相会。孙派与康派在日本对立起来。

中国不断反抗各国的侵略，义和团在山东省崛起，是年攻打北京各国公使馆。

就在这一年，留学生的派遣工作有突破性发展。同年10月，嘉纳治五郎主持的私塾改名亦乐书院，收容十一名张之洞派遣的

① 《太阳》第5卷第10号(1898年10月)。

学生入学。尚有六位学生姓名，见于该院教师三矢重松的日记①：

明治32(1899)年10月7日下午，迁校至三崎町一丁目二番地。下午二时，嘉纳先生偕内堀维文氏来校参加与学生的见面礼。在此之前，戢翼翚(湖北人)来校，他现在在专门学校攻读；还有横滨领事之子邹瑞昌(安徽人，25岁)、熊垓(江西人，17岁)、黄大暹(四川人，17岁)、李盛衔(江西人，19岁)等五人。

8日，吕烈煌入学。

18日，吕烈煌父吕长康来校。成“亦乐书院标札”、致书“内堀氏”。

11月5日，在清国公使馆与罗康龄氏谈话，十一名张之洞派遣之学生来校应试。

12月9日上午，嘉纳先生来校，“为学生订制校服”。

12月23日中午，冯阎模为通译，夏偕复等来校。

明治33(1900)年1月15日上午，夏循恺入学，编入第3期。

16日晚，罗会垣等因事与工人争吵。

17日早上，“学生无进食，亦无授课”。林铨玉氏来访。晚上见嘉纳先生，相谈有关学生监督之事。

18日，对学生宣布规则。

27日上午10时左右，赴清国公使馆。

2月14日，清历元宵，停止上课。

22日，嘉纳先生送来饼食分给学生。

4月3日，带领李、罗、王、范、屈、俞诸生，至“越谷观赏桃花”。

同年(1899)，梁启超与横滨华侨商议，在东京牛込东五轩町筹设东京大同学校(加“东京”二字以别于横滨的大同学校，亦名“高等大同学校”)。最初有学生18人，多数是流亡日本的人，包括蔡锷和范源廉。后来校舍迁至小石川传通院旁，校名改为清华学校，由犬养毅任校长，柏原文太郎及湖北留学生总督钱恂二人同任

① 本文所引三矢重松的日记，见于松本龟次郎《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页9—10。三矢其后为文学博士，乃日本文法大家。

监督。

本年四川省丁鸿臣来日参观日本陆军大演习，其《东瀛阅操日记》记录了参观中国留日学生学校的印象。

成城学校 此校有高丽学生五十人，中国留学生四十一人①，学费每年三百圆。中国留学生都由湖北、浙江、南北洋所派遣，于此修习普通学科八阅月，大半通东文东语，亦熟体操。（9月15日）

户山学校 湖北护军营派差办四人入户山学校，专习体操，既半年，即将毕业矣。（9月16日）

第一高等学校 此处有中国留学生四人。（10月18日）

学习院 张芗帅（之洞）的文孙和刚孙在此求学。不时背皮囊，习兵操。（10月23日）

西本愿寺 内有中国学生二人。此二人即去年大谷方丈（光瑞）游湖北，访自强学堂时，所选善东文而喜留学本寺者，由本寺供给一切费用。明年将送之入东京之官立学校云。（11月3日）

以上资料提及的留日学生共109(117)人②。又丁鸿臣的日记称：

又闻福建派遣留学生八人，而湖北派钱念劬（恂）带来学生七一八人，入文武工艺诸学堂，不日到达。（9月10日）

1900年5月12日，义和团发难，6月包围公使馆区域。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北京，12月清廷与列强达成和议。在日本军营受训的中国留日学生因此返国，但其他学生似无变动。

本年是否有新来的中国留日学生，不得而知；但本年8月，唐

---

①② 随同丁鸿臣来阅操的沈翊生，也写了《东游日记》，据此知成城学校有中国学生49人（其中浙江3人，湖北20人，江苏14人，北洋8人，湖北4人），较丁鸿臣所记多8人，成城学校第一届（1900年7月）毕业生有45人，所以沈翊生的记载较为可信。

宝锷和戢翼翚合著《东语正规》出版，12 月日本书翻译杂志《译书汇编》创刊；这些都是初期留学教育的效果，值得注意。（关于《译书汇编》详见第六章第二节。）

义和团事件系因反抗外国侵略而起的，但其结果却使中国人再次认识新学(西洋学问)的优越。孙中山说：

> 所以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所以经过义和团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①

故此，倾心新学便如洪水奔流，不可遏止，而"变法"和"兴学"也变成口号。

1900 年旧历 12 月，上谕各大臣在两个月内必须条议变法要项。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两人上奏《复议新政折》，大力主张留学，特别是日本留学，并论述积极及消极的奖励办法。在积极方面，给予优秀的自费留学生进士、举人等资格；在消极方面，即使具有进士、举人等资格，如无留学经历，则不授官职。同年 9 月 16 日，上谕各省须派学生留学，并须订立奖励及限制办法以督促之。

在这种情势之下，是年到日本考察旅行人数增加了（参阅本书附录三统计表中"东游日记数"）。赴日考察旅行者中间，有的是因留学生安排斡旋而来的，有的是为了招聘日本人教师（日本教习）而来的。例如，安徽省派遣二品顶戴按察使李宗棠专程考察日本教育，归国后除撰写《考察学务日记》外，又出版《考察日本学校记》16 册，李氏还带同自己的儿子润官到日本留学。

---

① 孙中山：《民权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版，页 724。

同年，日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的章宗祥出版了《日本留学指南》。这与李宗棠从外表去考察日本学校的方法不同。这是他身在日本的学校中，从里面去了解而写成的书，故能写出具体的留学生生活。这可以说是以留学前辈的身份对国内人士发出的留学劝掖书。这本书附记各校至旧历6月为止，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及9月行将入学的人数，对留学生分布状态了如指掌。

校　名	留学生人数	备　考
法科大学	3	9月行将入学　1
工科大学	4	
农科大学	1	9月行将入学　5
第一高等学校第1部	2	9月行将入学　2
第一高等学校第2部	2	
东京专门学校日语政治科	3	9月行将入学　78
东京专门学校英语政治科	6	
庆应义塾普通部	1	
专修学校法律科		9月行将入学　2
专修学校理财科		9月行将入学　2
高等商业学校预科	4	
高等商业学校本科	2	9月行将入学　1
东京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		9月行将入学　3
东京工业学校机械科		9月行将入学　2
东京工业学校电气化学科		9月行将入学　1
东京农学校		毕业者　1
蚕业讲习所	3	毕业者　1 9月行将入学　1
高等师范学校		9月行将入学　3
东京外国语学校	1	
陆军士官学校	46	
成城学校	2	最盛时期80余人



〔图 2〕初期的留学生(原载《大陆》第 1 号)

前排左起：金邦平，陆世芬，王璟芳，吴禄贞，张绍曾，

钱承志，范源廉

后排左起：蔡　锷，吴振麟，冯阁模，高　逸，章宗祥，

曹汝霖

以上只记日本普通学校情况，不记专为留学生而设的学校或预科学校(如亦乐书院、日华学堂、高等大同学校等)的学生人数。

同年，女子留学生开始来到日本，亦值得注意(参阅本章第七节)。

我们幸运地知道本年(1901)留学生的确实数目，因为翌年来日考察的黄璟的《东游日记》说：

> 7 月 19 日 9 时，与秦辉祖到支那留学生会馆，章宗祥、曹汝霖、范源廉、陆世芬，沈琨、何厚个等留饭，并赠《同瀛录》。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调查，留学生共二百八十余名。今年倍之。①

① 黄璟：《东游日记》，页 34。

1902年，配合新学发达的趋势，清廷准许满汉通婚，禁止妇女缠足。同年，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各出资本拾万圆，扩张业务，增设编译所，聘请日本人长尾槙太郎(雨山)和加藤驹二为顾问，招聘不少归国的留日学生，出版各种新式教科书。这批教科书大部分以日文书为蓝本编纂而成的。

同年，中国著名学者吴汝纶到日本考察教育，嘉纳治五郎也到中国考察教育。这些活动都显示对留日教育关怀的高涨。

座落东京神田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的清国留学生会馆也落成了，成为留日学生集会、演讲、出版书籍等活动的大本营，显示留日学生的生活也正规化起来了。

此外，留学生人数也增加。鲁迅便是在同年4月到日本留学的。

梁启超在本年所著的《行人失辞》说：

> 现计诸生来者，数已逾四五百人……东京现时留学生数百人中，由官费者不过强半耳。其余则自备资斧，茹根尝胆而来，而近数月来陆续渡航者，几于无船无之。①

镇国将军载振《英轺日记》也记述留日盛况：

> (光绪28年8月)初四日，是日，中国学生五百余人，为欢迎会于会馆，请余一往临存。②

1903(光绪29)年，中国颁布了新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在这新学制推行之前，中国的传统教育是这样的：学校称为书院(宋朝以降)，其讲授内容以儒学为主(西汉以降)，学科包括诗赋(唐以降)、八股(明以降)及小楷(清以降)，以科举及第入仕为目的。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新教育兴起，私立学校纷纷出现(戊戌政

---

① 《饮冰室文集类编》上，页728—732。

② 《英轺日记》第12卷，页370。

变之后，书院多改为学堂)。因为政府并无统一规范，故各级学校程度颇为参差，有识者纷纷提议将各级学校纳入全国性系统，例如，李瑞棻的《请推广学校折》(1895)、康有为《统筹全局疏》(1898)等是；最初实现计划的是张百熙的《钦定学堂章程》，而完成此一计划的是《奏定学堂章程》，这份章程名义上是当时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及张之洞三人合作的，其实是张之洞参考日本学制及《钦定学堂章程》写成的，长期地成为清末教育制度的基本方针。

在这一章程的"学务纲要"项下，有下列一条："各省办理学堂员绅，宜先派出洋考察"，又指定"日本断不能不到"。

同年，张之洞奏定《约束鼓励游学生及自费生立案章程》，主张奖励自费留学生。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又奏订《奖励游历游学章程》。

不过，新学制的"章程"虽然妥善，却未能在全国普遍施行。当时的学堂并不能满足全国读书人的愿望。因此，就有些学生不在国内接受教育而转到日本留学；自费留日学生因而年年增加。后来几年，在急剧增加的留日学生中，大部分是自费生。

本年创刊的留日学生杂志《江苏》称："今岁正月，我江苏留学日京者达百数十人"；另一份留学生刊物《湖北学生界》则称："吾楚(湖北)游学日京者近百人"。据本年6月中岛裁之给张之洞的建议书，"现贵国学生留学日本者，今将达千人。"①

1904年，亦即日俄战争开战之年，中国留日学生大增。驻日公使杨枢的报告《奏陈兼管学务情形折》说："现查各学校共有中国留学生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学文科一千一百余人，学武科者二百余人。"②

---

① 《东文学社纪要》，页96。

② 杨枢：《奏陈兼管学务情形折》，见《约章成案汇览》卷32下，转引自《近代中国留学史》，页54。

五　留学生人数的最高纪录

中国与俄国之间，虽然在1896年签订密约，针对日本；但日俄开战之后，中国标榜局外中立。战争进行中，中国亦未予日本任何援助；反而对日本的国力惊异起来，并且从惊异渐次转为尊敬和信赖。1905年，佐佐友房在中国华南旅行，其游记称：

> 概而言之，彼等对时局之态度，一般同情我国；虽然中日曾有冲突，又有义和团事件，今中国官民对日本咸予信赖。①

同年1月，前高等商业学校校长寺田勇吉，在《中央公论》发表《清国留日学生问题》一文，说：

> 昔日我学于彼，而今日地位逆转，甚多清国人，不论其在国内国外，来学于我者，盛况空前，此实我国之荣誉。凡此，皆我国国民血泪之成效也。然而，达致此种成效，不可不谓泰半生于甲午及日俄二役之效果也。甲午结果，不必细论，即今次日俄战争，结果非清人始料所及，侯捷报频传，清人纷纷负笈来学，又招我有为之士为教习，为彼地所用。②

但是，日本战胜俄国，并非留日学生增加的唯一原因。还有一大原因，也可能是最大的原因，发自中国国内，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如前所述，科举考试是中国读书人唯一的登龙术。它不只是新教育的障碍，甚至可以说："科举一日不废，学堂一日不能发达。"

科举的废除，经过三个阶段：

1．内容改良——最初在1887年，御史陈秀莹奏请每次乡试会试都取算学人才若干名。其后，由于康有为和梁启超上奏，在戊

---

① 《太阳》第12卷第2号（东京：1905年2月）。

② 《中央公论》1905年1月号。

戌新政中，毅然下诏不考八股(戊戌政变后再行恢复)。又于同年6月，因为张之洞和陈宝箴的建议，不考诗赋及小楷。

2. 及第人数渐减——1901年，张之洞和陈宝箴的《筹议变法》三疏，请设文武学堂，同时请求逐渐减少及第人数。1903年，袁世凯和张之洞进而奏请分科递减；同年上奏《奏定学堂章程》的时候，也奏请渐减科举及第额，期于九年之后完全废除科举考试。

3. 完全废止——时代洪流难以阻挡，不待九年，只是两年(1905)之后，由于袁世凯、张之洞、赵尔巽等联名上奏，而清廷鉴于大势所趋，遂于是年旧历8月决定废除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这一决心，可与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五条誓文媲美。

新学取代了传统的登龙术，但学校供不应求；即使增加学校，教师也不足，故须到日本留学。"留日"成为格外响亮的口号。

1904年以后，留日学生年年增加；是年年初就有三至四千学生在日本。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在该年2月1日发行的《太阳》第11卷第2号发表《清国时事》一文，有"三千留学生"之语；佐佐友房在同期的《南清杂感》一文说：

> 来自中国各省学生约二千人，其中湖南省三百五十人，湖北省四百二三十人，皆属张之洞所派者，其他各省如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四川等亦有派遣留学生。

寺田勇吉在1月发行的《中央公论》第20卷第1号发表《清国留学生问题》说：

> 闻目前清国人留学我国者……达三四千人。……《万朝报》甚至谓多达五千人以上。

到了该年年底，估计留日学生达到八千或一万名。

1906年是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共达一万三四千或二万名之谱。

当时，青柳笃恒描述留学生蜂涌来日的情况如下：

> 学堂虽得开设，代替昔时科举；惟门户狭隘，路径险阻，攀登甚难，学子往往不得其门而入，伫立风雨之中；推舍此途而外，何能跃登龙门，一身荣誉何处而求，又如何能讲挽回国运之策？于是，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中国留学生东渡心情既急，至于东京各校学期或学年进度实况，则不暇计也，即被拒以中途入学之理由，亦不暇顾也。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中留学之实情也。

上述描写，并无夸张。据黄尊三《三十年日记》，他为了到日本留学，在 1906 年旧历 4 月 26 日，从湖南到上海，直至 5 月 15 日，好容易才能登上往日本的雄本丸。

那么，留日学生最高人数该有多少呢？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首先，让我们看看一些当时的记述。

1905 年 7 月 17 日，青柳笃恒在《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中国留学生问题》一文说：

> 晚近中国学生负笈来日本留学者日益增多，据消息灵通人士称，数目将以万计，何其盛也。

青柳氏在同年 12 月 8 日发表于同报的《三论中国留日学生问题》，有"都下八千清国留学生"一语。

1906年 1 月《太阳》(12卷1号)时事评论栏"教育"项《清国留学生同盟归国》一文称："清国留学生在东京者，即达八千六百余名。"同年同月《中央公论》(21 卷 1 号)评论栏，XY 生的《清国留学生取缔问题》中说："彼等又曰……我等一万人悉归祖国。"上述各条是1905年后半年的记述。

关于 1906 年状况，当时的记述有以下数种。

1906年11月，青柳笃恒在《早稻田学报》发表《中国子弟何故必须游学我邦乎》，说："现在都下清国留学生数将达二万"；翌年4月，青柳氏《中国留学生与列国》一文说：

> 有谓中国学生留学日本者，其数达一万三四千之巨，此乃一人同时兼具数校学籍，而以校别统合计算所致也。查最近确实统计，文武男女学生共约八千人，包括文武官费生约二千八百人。

青柳氏同年8月在《每日电报》的《清国留学生之减少》一文说：

> 据本年年初之统计，居留我邦之清国留学生竟达一万三千之多。然而，彼等中有为得多种毕业证书而一身拥有几种学籍者。实际人数应为八千左右耳……

又，1908年7月，在早稻田大学清国学生部师范本科第一届毕业典礼上，教务主任青柳笃恒作学务报告时指出：

> 有谓留学日本之清国学生，一时多达一万三四千……其实最高人数仅达八千矣……今则显著减少……

金子坚太郎为伊泽修二郎编的《同文新字典》（同年出版）写序，称："今日，居留东京之清国留学生已达一万余人。"

关于后来的记述，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说：

> 自〔光绪〕二十七〔1901〕年至三十二〔1906〕年五六年间，留日学生达万余，实为任何时期与任何留学国所未有者。①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说：

> 本期的留学教育，以日本最盛，据学部于光绪三十三年的概算，留日学生计有一万二三千人。但在同年，根据各校的统计，约有六千余名；又据《日本学制五十年史》所述，游日学生亦以本年为最多，其数实超过七

---

①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页16。

千人，但学部所述，不免有些夸张。①

综合以上诸说，留日学生最高数目达二万，最低为六千，两者距离颇大。

关于1905年后半年留学生人数，在各说中，《太阳》杂志所称的八千六百余名一说，当最确实。因为一万也好，八千也好，都是大概约数，而八千六百是个实数。而这一实数的产生，当有某些根据。

至于1906年，亦即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各方面都指八千之说。故此，以1905与1906两年，留日学生人数都在八千左右大概是不错的。

虽然，有人以为1906年数目比1905年为高，我不敢苟同。为甚么呢？以当时留学教育大本营的弘文学院而论，该校1902年在东京牛込西五轩町创校，1903年在大塚设分校，1904年增设麴町分校、真岛分校、猿乐分校及巢鸭分校，但在1905年末，由于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不少留学生归国，使麴町、真岛、猿乐町三所分校关闭。到了1906年，归国学生大部分重返日本留学，新来的留学生人数也有增加。倘使新来的留学生较1905年为多，由于新来者大多不能立即进入大学，所以非入专为留学生而设的学校不可，但在这类学校中最具信誉的弘文学院却不能恢复上一年关闭的三所学校，只能在牛込区开设白银分校。纵使白银分校收容人数较多，但亦不可能超过三所分校。特别是专为留日学生而设的学校（参阅下一节），最后的一所是1905年设立的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1906年并无同类学校开设。由此观之，1906年的留日学生人数比以前为多，是不可能的事。故此，我同意青柳笃恒在《中国留学生与列国》一文所说，"据最近确实统计，文武男女学生共约八千人。"亦即1905年及1906年都约有八千人。

① 陈青之：《初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教育》，见《中国教育史》第六编，页628。

简单说来，八千这个数字是从一国派到另一国的留学生人数，数目庞大，正如舒新城所说，“任何留学国所未有者”。

在这大批留学生中间，除男子之外，也有步履维艰的缠足女子、老人[①]和小孩子。他们为接受由小学至大学程度的各种教育而来。他们当中，父子、夫妇或兄妹同时留学者甚多。甚至有全家、全族同来留学[②]的情形。论学历，有的拥有进士、举人、秀才各种头衔。

最先，中国留学生齐集东京，以神田区为中心，逐渐分散于牛込、本乡、麴町、赤坂、四谷、小石川等地区。

中国留日学生的中心地神田，称得上是个留学城。留日学生总部——清国留学生会馆，就在本区骏河台铃木町；本区尚有各省同乡会，各种学会，以及图书杂志发行所。又有以中国人为对象而开设的书店，例如在南神保町的今古图书局、里神保町的中国书林、小川町的大华书局及启文书局等。

神田甚至有专为中国人而设的印刷所和当铺。这一带摆卖香烟的姑娘，如果不会说几句中国语便不能做生意（据青柳笃恒氏回忆）。有房间出租的话，不能光贴日语招贴“貸间あり”，必须贴出汉语招贴“有空房子”才收效（据汤泽幸吉郎氏回忆）。在神田街道上，到处见到中国留日学生卷起辫发，戴上学生帽，样子活象富士山。[③]

---

① 松本龟次郎：《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中说：“老人多有来学一事……象云南省派来某人，已届70岁左右的高龄，但每能凌驾年青人，……认真，热诚地担任班长的工作。……归国以后，到八十余岁，还从事省里的教育事业。”

② 参看单士厘：《癸卯旅行记》，在光绪二十九年二月（1903年3月），离别东京之际所记：“此行也，留两子，一妇，一女婿，三外孙于东京，远别之时，能不黯然，然两子，一妇，一婿分隶四校留学，次第学有所进。”

③ 鲁迅：《藤野先生》中说：“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鲁迅：《朝花夕拾》，页61）

专为中国人学习日语而编著的书，也大量出现。自《东语正规》出版(1900年)之后，至1910年为止，就有以下多种：

出版年份	(书　　名)	(作　　者)	(出　版　者)	(页数) (面表示线装)
1900	东语正规	唐宝锷、戢翼翚	(自费出版？)	244
1900	日语入门	长谷川雄太郎	(广东同文馆？)	109面
1901	日语入门	广东同文馆	善邻书院	135
1901	和文汉译读本(1～4)	坪内雄藏著 沙颂云、张肇熊译	商务印书馆	33—39面
1901	和文汉读法	(张肇熊？)		
1901	(中等)日本文典译解	三上忠造著	教育改良会	74
1902	东文易解(2册)	大　矢　透	泰东同文局	
1902	和文释例	吴　启　孙	华北译书局	209
1902	东语初阶	泰东同文局	泰东同文局	65面
1902	广和文汉读法	畸隐主人		79
1902	和文奇字解	陶　珉	译书汇编社	227
1903	东语完璧	作新社编辑局	上海作新社	619
1903	日语教程	成城学校讲师	湖南编译社	680
1903	东文典问答	丁　福　保	文明书局	41面
1903	(中等)日本文典译释(3册)	三上忠造著 丁福同译		48—68面
1904	四书和文必读	岸田太郎、陈秋元	神户幸彰号	415
1904	和文汉译读本 卷5 卷6	坪内雄藏著 沙颂云、张肇熊译	商务印书馆	40面 46面
1904	汉译日本文典	松本龟次郎	上海·日本堂	442
1905	东亚普通读本(4册)	伊泽　修二	泰东同文局	25—27面
1905	(清人适用)日本语典	井上　友吉	青山堂房书	222
1905	日本文典课本	大　矢　透	泰东同文局	

1905	东语简要	葛梦朴	日语讲习会	185
1905	(新撰)日本文法教科书	木野崎吉辰、杨政	东京·奎文馆	152
1905	日本俗语文典	吴初、孟央	留学生会馆	252
1905	东文法程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商务印书馆	122
1905	中日文通	张鸿潋		183
1905	(汉译)日语辞典	东亚语学研究会	吉川弘文馆	610
1905	日华会话筌要	平岩道知	冈崎屋	252
1905	(中华人适用)日华会话入门	本间良平	大阪屋号	165
1906	(文法应用)东文汉译轨范	门马常次	东亚公司	704
1906	(中日对照)实用会话篇	唐木歌吉	东京·中东书局	242
1906	实用日本语法	岸田蒔夫	东京·明文堂书房	282
1906	(日本文典)讲堂问答	菊地勉	东京·中和堂书房	136
1906	实用日语篇	菊地勉	东京·中和堂书房	156
1906	(汉译)学校会话篇	菊地金正	诚之堂书店	144
1906	(汉文注释)东文读本	小山左文二	二松堂书局	186
1906	东语大观	吴人达	清国留学生会馆	506
1906	标品字典	黄广	清国留学生会馆	374
1906	日语教科书(1—3)	宏文学院	金港堂	165—170
1906	(汉译)日本语文对照读本	语文练习社	语文练习社	172
1906	日本木古文课本	振武学校	泰东同文局	79
1906	日语教程	湘渔	东京·游艺社	628
1906	(东语练习)舌切雀	林房之助编 周颂舜译	东亚公司	54
1906	(汉译)日语文法精义	高桥龙雄		102
1906	(新式)东语课本卷1	中堂谦吉	泰东同文局	196
1906	(汉译)东文法汇编	独一译社	清国会馆 中国书林	281

1906	(汉和对照)日文法辑要	堆波 常雄	观澜社	217
1906	日本语教科书	松本龟次郎	有邻书屋	226
1906	(言文对照)和文汉诂	吕 瑞 廷	武昌·谦吉书社	240
1907	东语会话大成	井 上 翠	东京·国文堂	266
1907	日语名辞类篇	建南云鹤堂	东京·全文馆书局	
1907	(中日对照)日语宝典	施呼本·果清阿	著 者	448
1907	日本文典	芳贺 矢一	商务印书馆	
1907	日清对话编	松平 康国	东亚公司	443
1907	(汉译)日本语文法	松下大三郎	诚之堂书店	400
1908	东中大辞典	作 新 社	作新社	1479
1908	和文读本入门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商务印书馆	40面
1908	(中学)日本文法教科书	和田万吉著 李 徵 泽	文明书局	600
1910	(新撰)日本大辞典	新 兴 社	新兴社	1604

由于留日学生人数众多，留学指南之类的书籍大量出现；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三章第二节详述。

日本当时最大的杂志《太阳》，从 1906 年11月号起，设《清国时文》栏，专为留日学生服务。

六 教育留学生的学校

从 1896 年到 1902 年，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浪潮年年高涨，向着东方的岛国冲来。为中国留学生而办的学校，亦即兼顾大学预科教育及中等程度教育的学校，纷纷在日本开设。现在按开设先后，略述如下：

成城学校

成城学校是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学校。1898 年，日本参谋本部福岛安正等军人，对中国当局力说留学日本的必要，先由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谭兴沛、徐方濂、段兰芳、萧星垣四名秀才到日本。成城学校校长是日本参谋总长川上操六；他欢迎这些学生在该校接受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教育。翌年 1 月，南洋大臣刘坤一、四川总督岑春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陆续派遣陆军留学生。故此，原有校舍渐感不敷应用；决定在牛込河田町设立校外宿舍。该校为留学生编著日语、日文的教科书，热心地从事教育。1900 年 7 月，第一届 45 名学生毕业，升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后逐渐晋升为大将、中将等甚多。

后来成城学校也招收志愿修读文科的学生，直至 1937 年没有留学生为止，留学生的教育工作从未间断；这是一所从事留学生教育最早而又历时最长的学校。

初期，有些在日本陆军留学的学生，不入成城学校，而带同翻译人员入户山学校①，或编入日军连队充当见习军官②。

日华学堂

日华学堂是高楠顺次郎于 1898 年 6 月在东京本乡西片町创立的。创校宗旨是："专门教育清国学生，务使学生速习我国语言，熟习我国风俗，并修普通各科，从而养成修习专门学科之学力。"校

---

① 1899 年湖北护法军派来四名下士入户山学校，曾在外国语学校读书的田中庆太郎(其后是文求堂书店店主)，担任了他们的通译。约半年后，这批学生学成返国。

② 据田中庆太郎的谈话，在 1899 年底或 1900 年初，张之洞所派遣的将校下士约三十名前赴日本，至近卫各连队充任见学［观摩学习］将校或见习下士，都通过即时翻译学习。

内课程如下：

（科　　名）		（目　的）	（修业期限）	（科　目）
A. 正科	(a)普通预备科	入高等专门学校	2年	日语、英语、德语、地理、数学、物理、化学
	(b)高等预备科	入帝国大学科系	1年	法学、文学、工程学、理学、农学等。
B. 特别科	(c)预科专科	为修完普通科而准备入帝国大学者而设	无定期	从(b)科目中选修
	(d)日语专修科	日语速成	约1年	专修日语各科

亦乐书院

高等大同学校

两校成立于1899年，详见本章第四节。

东亚商业学校

该校的前身是东京大同学校，亦即清华学校。改名的理由是：商业与国家兴亡关系密切，内政和外交亦以商业为基础。《清议报》刊《开办东亚商业学校记》一文说：

> 曰内政，曰外交，其才悉此校是赖，商业云乎哉！商业云乎哉！①

该校于1901年4月28日（旧历3月10日）举行创校典礼，来宾有前首相大隈重信、东邦协会总理副岛重臣、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等知名人士，还有横滨有实力的华侨百余人。校长仍是犬养毅，学生一百余名。

东京同文书院

于1902年1月19日创立。在此之前，近卫笃麿组织同文会，1898年与东亚会合并，成为东亚同文会。该会教育事业除包括在中国设立南京同文书院（后来在上海设东亚同文书院），又设立东

---

① 《开办东亚商业学校记》，见《清议报》第78号（光绪二十七年三月），总页4982—4983。

京同文书院，为清韩学生讲授日本语和普通中等学科，作为进入专门学校的准备。开办的时候，校舍设在神田锦町，实行寄宿制度。后来，校舍迁到目白，成为目白中学的附属学校，大正时代(1912—1926)停办。

据 1905 年出版的《日本留学指掌》，两年毕业之后，学生可以申请留校，转入特别科或速成专门学科。

学费：修金三圆；宿费一圆五十钱；膳费不定，通常六圆；煤油费一圆。

弘(宏)文学院①

如前所述，弘文学院为嘉纳治五郎所创立，由亦乐书院发展而来的。

该校于 1902 年 1 月创校，校舍在东京牛込西五轩町。嘉纳氏在同年到中国考察教育，历访当道官员；与他们交换意见，来校入学者因而渐渐增加。于是，西五轩的校舍不敷应用，在 1903 年增设大塚校舍，1904 年在麹町区增设麹町校舍、下谷区设真岛校舍、神田区设猿乐町校舍，巢鸭区设巢鸭校舍。1905 年，因“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缘故，不少留学生归国，使麹町、真岛、猿乐町各校舍关闭，但于 1906 年新设日银分校。

课程除了年制的本科(讲授日语及中等程度普通学科；第三学年分文科及理科两组)之外，尚设一年、八个月或六个月的速成师范科，速成音乐科等。(科目随时增减；又专为日本人而设“清国语言科”。)

据 1906 年 10 月底的《宏文学院一览》，该校有毕业生1959人，在校学生 1615 人，分三十六班。班名多冠以地名，例如南京普通

---

① 弘文学院，亦作宏文学院。最初所用的是“弘”字，因乾隆帝之名为“弘历”，有些旗人的留日学生避讳，乃写成宏文学院，故文献上就有这两种写法。

班、湖北普通班、四川速成师范科班、北京警务科班等。那是因为留学生多数是从各地集体前来求学，有颇强的乡党观念的缘故。

原则上学生必须入住学校宿舍（学费及宿费每年二百圆），但有特别情况者可获准走读。

黄兴和鲁迅初抵日本时，就在这里入学，陈独秀亦出身此校，其后再入高等师范科进修。

1909 年，由于速成科人数减少，学校关闭。直到闭校为止，获准入学者共 7192 人，毕业生 3810 人。

日语教师有：三矢重松、难波常雄、松下大三郎、小小左文二、门马常次、菊池金正、柿村重松、松本龟次郎等人。其中三矢重松和松下大三郎二人，因为在该校讲授日语的关系，后来成为出色的日本文法专家。从这件事看来，留学生的教育工作，是可以反过来对日本文化作出贡献的。

松本龟次郎在 1912 年以后，从事留学生预科教育，亦即日语教育，也是该校日语教师。

振武学校

1903 年 7 月创设于东京牛达河西町，专门从事陆军士官学校或陆军户山学校的预科教育。

以前，准备入学陆军学校的学生都进成城学校。1902 年，九名自费留学生拟入成城学校，但清朝公使拒作保证，故未获准入学，引起纠纷。（详见第八章）由于东亚同文会居中斡旋，日本政府与清朝公使达成协议，于 1903 年 7 月在日本参谋本部开设这所学校，而成城学校的学生全部转到该校就读。（同年 10 月，因清朝公使杨枢和留学生监督汪大燮的请求，成城学校开设文科生班。）

虽然是年清政府曾禁自费留日学生攻读陆军，但驻日公使杨枢在 1904 年旧历 1 月，上《奏陈兼管学务情形摺》，力说每年派送

一定学生(二百或百余人)学习陆军的必要：

> 日本陆军教育，系以忠君爱国，顺服长官为宗旨，并无侈言自由与政府反对之弊。……惟当此列强环伺，我国孔棘，武科较文科更重，未可缓图。①

同年旧历 4 月，练兵处奏定《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16 条。根据此章程，中国每年在各省共选 100 名学生留日，年龄须在 18 岁以上 22 岁以下。振武学校的经费由中国支付。因此，志愿学习陆军的学生人数比成城学校时代为多，但名额大体上固定不变。

修业期限，开始时一年三个月，后来延至三年。一年三个月时期的《课程概要》如下：

日本语	300 节	日本文	222 节
算　术	182 节	代　数	147 节
几何学	110 节	三　角	474 节
地理地文	28 节	历　史	23 节
生理卫生	32 节	化　学	53 节
物　理	71 节	图　画	(？)
典令教范	165 节	体　操	278 节

该校设有宿舍，推行严格的规律化生活。《振武学校规则》的《斋房条规》(学生守则)，便多达七章，共六十五条：

第一章　班长

第二章　讲堂及其余各场所

　　1　讲堂　　2　自习室

　　3　寝室　　4　膳堂

　　5　澡堂　　6　漱嗽所及洗物处

　　7　饮茶所　　8　叙话室

① 杨枢：《奏陈兼管学务情形摺》，转引自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页 57。

9　会客所　　10　养病所

11　厕房

第三章　打扫

第四章　出门，在外住宿，回国

第五章　服装

第六章　杂规

第七章　病人

初期有学生一百七八十名，1907年增至三百人。（大概是改为三年制的缘故吧。）1904年有毕业生49名，1905年121名，1906年则有202名，维持至1911年为止。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说：

> 二十年来中国军界之重要人物底姓名，几十之九可以从明治四十（1907）年《振武学校一览》之学生名册中查出，其影响于中国军政界可谓大矣。①

这番话并无言过其实。

东斌学堂

创立于1903年（或1904年）。在此之前，清廷禁止自费留学生学习陆军。振武学校便有如下的限制，以防革命派青年入学：

> 申请入学本校者，年龄须16岁以上，具备适当学历，连同入学申请书及下列文件，经清国政府派驻东京留学生总监督，呈交清国学生监理委员长：
>
> 1. 清国各省负责官员之咨文；
>
> 2. 驻京留日学生总督之保证；
>
> 3. 学生东渡前后之履历。（以上综合《振武学校规则》第9、第10条）

---

①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页64。

东斌学堂却有不同的作风。该校收容被振武学校拒诸门外而有革命思想拟习军事的自费中国青年；这是寺尾亨博士激于侠义心肠而创办的，可说是私立的振武学校。该校位于芝公园区，维持了5年。寺尾博士在经济上蒙受很大的损失。熊克武、陈铭枢等是该校的学生。

法政速成科及普通科

这是因中国留日学生向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请求开设有关法政的速成科，遂于1904年5月7日设立的。初时一年就可毕业，其后改为一年半。日本语、法学和政治学等科目都通过翻译而讲授。又设有日本语速成科。梅博士是优秀的法学者，对中国处境又有很深的同情，因此跟从他学习的留学生甚多；到1908年，在速成科毕业的学生达1070人之多。

1906年，梅博士访问中国，会见张之洞和袁世凯，接纳清廷方面的要求，中止招收速成科的学生，而改设三年制的普通科。毕业生可入法政大学的预科或大学部继续攻读。普通科的学费每月四圆，学生必须在该校宿舍寄宿。

校中主持留日学生教育的负责人有：校长(总理)梅谦次郎，教务长(教头)富井政章，教务主任(教务主干)秋雅之介、乾政彦，普通科主任保科孝一，日本语速成科教师三矢重松、松下大三郎等。

经纬学堂

1904年9月创立，是明治大学下属机构，校舍在神田三崎町。注册人是吉田义静，但实际负责人是樋口秀雄，教员有纪平正美、上田敏等人。修业期限最短10个月，最长二年。课程包括刑律科、警务科、师范科、商业科等。该校设有宿舍，但经学校许可，学生可以走读。走读生学费每月四圆。1910年停办，六年间入学者

2862 人，毕业生 1384 人。

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

1905 年 9 月 11 日创立。在此之前，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对该校校监高田早苗力陈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必要，故高田偕青柳赴中国考察教育，与当道要员交换意见，6 月归国后着手筹备，9 月正式开校。

修业期限：预科一年，本科二年，补习科若干年，本科分以下诸科：

- 本科
  - 1. 师范科
    - 1. 物理化学科
    - 2. 博物学科
    - 3. 历史地理科
  - 2. 政治理财科
  - 3. 商科

补习科专为本科毕业生准备继续升学者而设，专门探讨投考高等预科、高等师范部和专门学部的途径。

留学生部主事青柳笃恒深信“速是能速，成是不能成”，极力反对速成教育，故该部规定的修业期间比其他学校为长。这大概是《近代中国教育史》称“早稻田除普通科之外，设优级师范科”的缘故吧。

教师除青柳氏之外，尚有津田左右吉、中村仲、渡俊治、皆川秀孝等人。

1905年入学者 762 人，1907 年 850 人，1908 年 394 人；该部于 1910 年 9 月停办。

其他学校

除上列诸学校，尚有不少留日学生教育机构。

路矿学堂：在美土代町，设铁路和矿务两科。

警监学校：寺尾亨所创设。

志成学校：最先设于立教大学内，后来迁到横滨，开办到 1923 年，因关东大地震而停办。

警官速成科：东京警视厅主办。

负责女留学生教育的有实践女学校和成蹊女学校，下一节将有较详细的论述。

中日两国政府对留学教育的部署，略为补充如下。

日本文部省于 1901 年公布《直辖学校外国人入学特别规定》，这是因为留学生不但来自中国，而且来自亚洲各国，而中国留学生人数的增多，可能是制定这个规定的一个原因。

1905年文部省公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清国人ヲ入学セシムル公私立学校ニ关スル规程》），此即留日学生所称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曾引起大规模的反对运动。

1902 年，一群自费留日学生被成城学校拒诸门外，于是展开反对运动，因而暴露了前时监管留学生的办法——由中国各省在日本设留日学生监督，而由清廷驻日公使统一指挥——不能应付实际需要，故清廷改派公使级的专任官——留日学生监督（总监督），第一任总监督汪大燮于 1903 年初到任。其办事处称为留日学生监督处；该处从 1906 年起，亦即留日学生人数达最高峰的时候，每月出版《官报》，刊登关于留学的法令、留学经费、日本的教育理论译文等。这是一份关于留日学生的官方刊物，至清朝覆亡才停刊。

七　女子留学生

在规划新式学制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女子教育没有包括在

内。仅在有关蒙养院(幼稚园)教育的《蒙养家教合一》的一章中,有"以家庭教育来包括女学"一语。换言之,女子要负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即是要把从丈夫处学来的《孝经》、《四书》、《列女传》、《女诫》、《女训》等学识转教其子女,使各自的家庭成为幼稚园而已。当时一般认为:女子一旦接受了新式教育,染了西洋风习,便对教化有害。

当时,某位有心人士在北京(人口约一百万)开设了五所女子学校,每校预定仅收五人,但开学以后,竟无一人来就读,终于停办。

那是中国北方的情况,比较起来,南方风气较新。1844年,英国传教士安达施(Miss Andersey)在宁波创办了女子学校;1897年,中国人经元善在上海开设径正女校。

可是,从中国全体看来,女子教育并不很受重视。与日本比较,中国的封建思想较浓,中国女子所受的束缚较大。

日本自从1872年(明治5年)颁布"学制"以来,小学教育已有"不分男女,父兄有责任要其子女弟妹接受小学教育"的规定。某些地区甚至在"学制"公布前一两年便开办了女子学校。日本的女子教育发达之早是出乎意外的。日本的教育家当中,有人曾经希望使中国女子获得解放,在中国兴办女子学校①,可是未能实现。

1902年,吴汝纶赴日视察教育,前山阳女学校校长望月与三郎向他力说女子教育的必要:

> 固国础之道,在于育英。育英之方法不一,大设学堂,虽谓良法,抑亦末也。欲获人才,须造良家庭。欲得良家庭,须造贤母。贤母养成之道,在教育女子而已。故曰:国家百年之大计,在女子教育。无他,是教

① 《大陆》第1号(1902)上,有下田歌子的谈话,说:"余于七、八年前,即思贵国女子,来此游学,以求辅入文明,余亦知贵国之人,无肯信者,然常冀或有一、二人先尝试,以观有效无效,不亦可乎?"

育之根本，而实巩固国础之法，……贤若孟母，而后有亚圣。无华盛顿之母，焉有开辟美国之伟功耶。女子教育之要，如斯明明也。世之顽冥者，以之为迂远，徒藻男学堂，以欲养成人才。而入学堂者，其心不纯，其知不明，屈于朽木，何以得为栋梁也。先生明敏，既看破此理，而贵国百年之长策，可不以女子之教育为急务也哉。①

吴氏的《东游丛录》成为新教育的指针，故这类意见对中国的女子教育的兴起带来了相当的刺激，这是可以想见的。

养育于深闺而举步维艰的女子留学生最早出现于东京，是1901年的事。最初的女留学生不是只身行动的，而是跟随其父兄或夫婿一齐留学的。到1902年，女留学生有十余名。当时华族女学校的校监，同时也是实践女学校和女子工艺学校的创立者下田歌子女士，曾给这些女学生亲切的指导。

当时某位日本人士，对这批中国女留学生有这样的印象：

中国女子数人，航海来日，在日本教育大家、华族女学校校监下田歌子先生监督之下学习。中国女子留学海外者，自此发轫。可知中国人求学之心渐热也。

此等留学生，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对日本人亦不畏惧，彬彬有礼，为日本妇女所不能及。

留学生中，有夫婿在东京留学者，会晤之际，其应对之仪式，周旋之情况，实称平等。昔闻中国男尊女卑，以今观之，殊为不然。男子对女子如此殷勤郑重，岂以奴隶待女子者耶？②

随着女子留学热潮的兴起，1902年上海有一份妇女杂志《女

① 吴汝纶：《函札笔谈，前山阳高等女学校校长望月与三郎来书》，见《东游丛录》，页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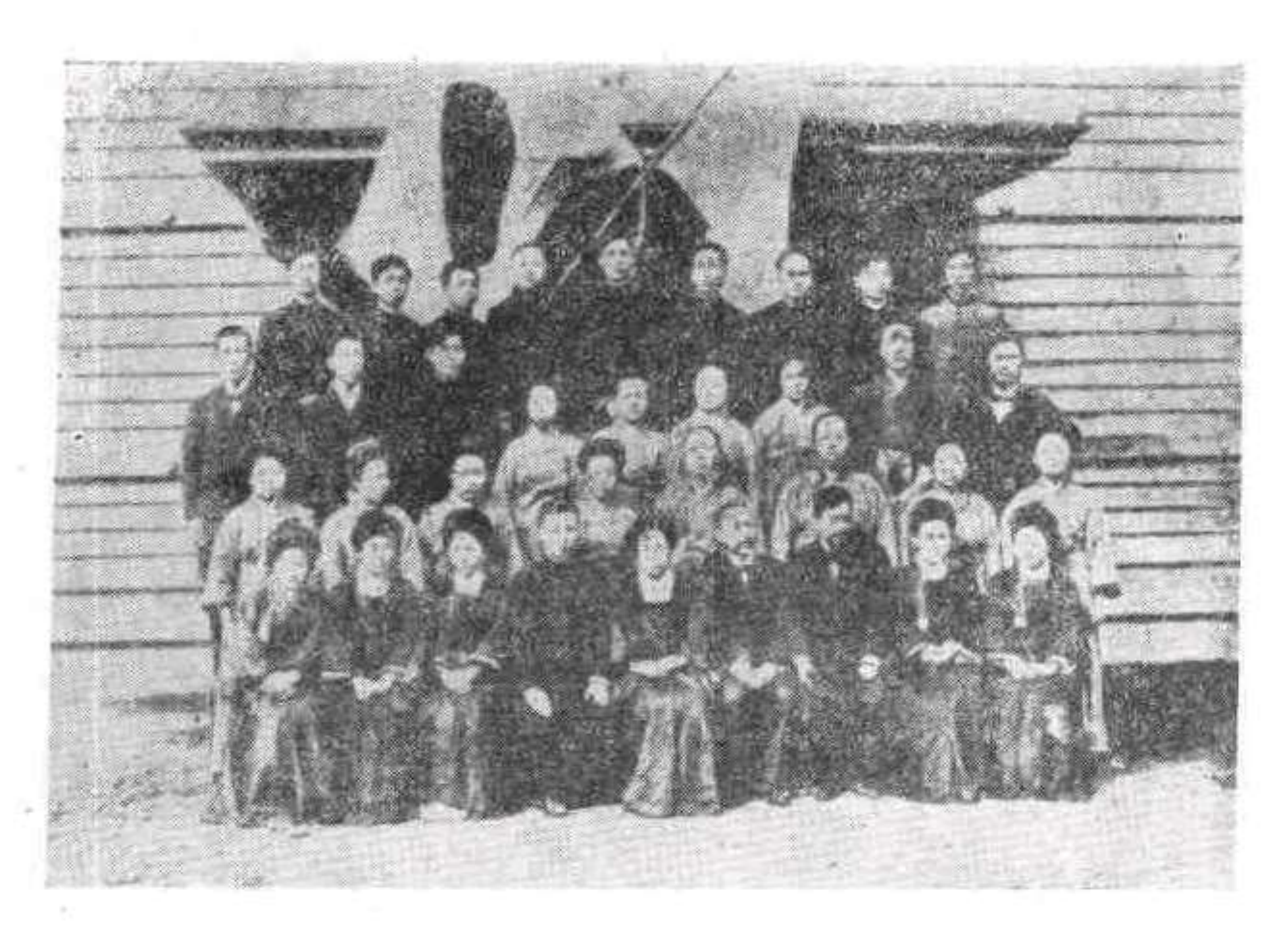
② 《大陆》第1号上，有篇题为《中国女学生留学于日本之声价》的文章作如此的评论。



〔图3〕下田歌子与最初的女留学生（原载《大陆》第1号）
前排左起：胡彬夏，下田歌子，方君笄
后排左起：钱丰保，曹汝锦，王莲，陆彦安，华桂

报》创刊。翌年，又出现《女子世界》（小说林发行）。新学与新杂志互为因果地一并发达起来。其后中国女性留日人数次第增加，而且不一定跟从父兄或丈夫，单身留学日本者渐多。为革命而牺牲的秋瑾，虽然是一子一女的母亲，但目睹国事日非，便毅然卖掉簪珂作学费，离别丈夫，托子于邻里，只身留学日本。1905年湖南省派二十名女学生来读速成师范科；奉天省遣派熊希龄到日本视察教育后，便与下田歌子约定每年遣送十五名女学生到实践女学校肄业。1907年，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派出二十一名学生到实践女学校读师范科。江西省亦派出十名官费女学生。

因此，到了1907年，仅在东京一地，便有接近一百名中国女留



〔图 4〕1906 年 7 月从实践女学校毕业的湖南留学生

学生，并且有留日女生会的组织(最初的会员有七十余名)。

为了方便这些女留学生，实践女学校遂设有中国女子留学师范科(一年毕业)及工艺速成科(半年毕业)。1906 年冬，成〔蹊〕女学校亦设一年毕业的速成师范科。

中国女子留学生，其数目虽仅及男子的百分之一，但其活动却颇引人注目。她们更通过杂志，热烈传播新思想。秋瑾的《中国女报》，以及秋瑾被杀之后，作为"流血之大纪念"而出版的《神州女报》，乃至《天足会报》、《中国妇人小杂志》(以上均在上海出版)，《北京女报》(北京)、《中国新女界杂志》(东京)等，都是这段时间出现的。

也许是由于女子留学和妇女杂志所带来的刺激，中国方面在

1907年3月8日，公布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三十六条和《女子小学章程》二十六条，从此正式规定了女子的新教育制度。虽然其中规则硬性规定男子教员不能在这些学校任教，但女子教育因为这一学制而得以确定下来，实为二千年来的大变革。留日女子学生对此有促进之功，是不难想象的。

八 速成教育

清末的留学教育有两种特征，一为教授的内容是普通学科而非专门学科；二为教育的性质是速成教育而非正式教育。

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公布了统一的新学制，但这只是法令上的规定而已，真正建设新学堂的数量仍少，而且师资亦很缺乏。换言之，就连接受普通科（中学程度的诸学科，与专门学科相对而言）的教育也相当困难。因此，产生了留学日本旨在修习普通学科的变通现象。清末的留日学生并不是都为修读高等或专门之学，也有为了学习本应在自己国家修习的普通学科而留日。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拥有秀才、举人甚至进士的名衔。在中国旧有的学问范围内，他们虽然已是相当好的学者，但象物理、化学等学问，则非要从小学程度学起不可。因此，父子一同赴日游学，也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事。

民国以后，在日本为中国人而办的学校，多仅为学生提供能够进入高等专门学校的预备教育，这些学校亦即日语补习学校。可是清末为中国人而设的学校，除了教日语外，也讲授中等学校程度的普通学科，可算是完全教育，而非预备教育。试看弘文学院普通科每周授课内容（见次页）。

虽然日语是主要科目，但数、理、化、英语、体育等并未受到忽视。

第1学年				第2学年				第3学年			
(学科)	(学 期)			(学科)	(学 期)			(学科)	(学 期)		
	1	2	3		1	2	3		1	2	3
修身	1	1	1	修身	1	1	1	修身	1	1	1
				日语	12	12	12	日语	9	9	10
日语	27	17	12	舆地历史	5			三角术			5
				理科示教	5						
舆地历史		5	5	算术	5	5		历史及世界大势	3	4	5
				几何学			5	动物学	3	3	
算学		5	5	代数学		5	5	植物学	2	2	
				理化学		4(?)	5				
理科示教			5	图画		1	1	英语	10	9	7
				体操	5	5	5				
体操	5	5	5	共计	33	33	33	体操	5	5	5
共计	33	33	33	选修科英语	6	6	6	共计	33	33	33

其次，清末留日学生教育的另一特征是以“速成”的教育为主。特别与民国以后相较，显有巨大的差异。中国人由于对近代化的迟缓感到焦虑，进而谋求革新，开始舍弃向西洋直接学习，转而向取得西学要领的日本学习。所以希望日本提供速成教育。当时的中国人如何渴望其教育能速成的心情，可引邢赞廷批评东京同文书院的话，以见一斑。邢氏不满该院算学、日语和英语各科进度，另行补习，以求速成。他说：

> 算学、日本语，此学堂中进步皆缓，算学，暑假时，别从一师习之，一月中抵学堂五月之一倍半，学堂五月，仅习得半册，暑假学一月，已尽一册又半，其相悬如此。英语现亦不在学堂中学习，晚间别在正则英语学校中学之，学堂五阅月，仅习英语书二册，正则学校三月为一学期，期内能尽五册，亦迟速相悬甚远。①

1902年，吴汝纶赴日视察教育，前后居留了三个月。他一方面

① 吴汝纶：《摘钞日记》，见《东游丛录》，页28—29。

考察各种文化设施，一方面参加文部省主办的有关学制的讲座，并且访问日本朝野知名人士。日本名士从各种立场发表多种意见，但大多主张中国当时必须推行速成教育。其理由为：

1. 中国当时推行新教育比日本迟了三十年。因此，应以三十年前（明治初年）的教育为模范，决不可采用日本当时的教育为模范。

2. 日本在明治初年仅推行速成教育，特别努力在短期内培养师资。

3. 清廷虽以推行速成教育为主，但亦要发展正式的教育。

大学总长山川健次郎指出：

> 大学校宜先设速成科，请他国教师开讲，别设译人译之。或有谓译人不能通各种学问者，此语诚然。然除文学以外，各种学科，大都不外谈理。谈理之事，无有不可明者。且此本为一时之急，非久计也。……速成科外，宜特设正科。①

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说：

> 招募贵国年少有为之士，既通贵国学问者，授以浅近普通学互换智识，两涂并进，务期速成，限以一年，往复无已，递传递广，或足济贵国教育一时之急乎。②

文部大臣菊池大麓亦指出：

> 普通教育，固属必要，然专门教育尤重。……贵国今日欲兴专门教育，不在精求学理，在实际应用。……今欲造就应用人材，当思速成之法。……故一面宜用速成之法，造就应用人材，一面即宜用循序渐进之法，以造就专门全材。③

---

① 吴汝纶：《函札笔谈》，见《东游丛录》，页 40。

② 同上书，页 44。

③ 同上书，页 37—38。

报章杂志也跟着鼓吹速成教育。1903 年，张百熙等奏定《学务纲要》时，与其说奖励，不如说是命令大家留日修读速成的师范科。“若无师范教员可请者，即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师范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①

职是之故，当时日本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大体上是速成的。成为主流的普通科，通常亦仅为期三年。此外，就是“某某速成科”居多。

弘文学院规定，“肄业之年限，凡普通科者定为三年”，“此外，又有速成师范科，速成理化科、速成音乐科等，其年限均系随时酌定”②。据经纬学堂之规定，普通科与实业预备普通科各二年，高等科则一年，其他则有“本学堂为急欲完成学业者设特别科，肄业年限为一年以内”。

据《江苏》第 1 期（1903年）的《弘文学院学生退校善后始末记》所载，当时的弘文学院，除设有三年的本科及速成科外，更设有一年半、八个月、甚至六个月的各种速成师范科。这些速成科，当然是有传译随同授课的。

当时，日本学校甚至出现激烈的竞争倾向，如甲校用一年教授完毕，乙校减为八个月，而丙校更缩成半年。尤有甚者，竟有数月以至数日的速成科。如肥皂制造法等，通过传译的说明，数日便讲授完毕，并且颁发证书，纯粹是商人经商牟利的作风。留学生方面，由于心目中有手持证书愈多愈好的浅薄想法，多集中到这类“学店”来。从事中国留学生教育工作的某些学校和某些教育者，被留日学生指为“学商”和“学店”，实在是对速成教育的极端弊病的讽刺。当时日本的留学生教育，可算中国人在邻国接受的暂时的义务教育，若从其数字而言，虽然足以夸耀一时，但从它的实质

① 张百熙：《学务纲要》，转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页 201。

② 《日本留学指掌》，页 402、407。

程度来看，则不能说已达留学教育的水准。不过对中国来说，则决不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它对中国的改革是相当重要的。如上所言，在“学店”混日子的留日学生固然多，但认真学习的留日学生也不少。

平野义太郎曾说过：

> 法政大学的速成科，学期为一年半，各种讲义都由中国人传译。教师和学生都非常用功，故有连暑假也不休息的学习风气。读速成科的学生，都是在本国有学问基础的人，具有进士出身的人也很多，其中甚至有状元出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在入法政大学速成科以前，便已在中国考取了进士，故虽然是短期，但其成绩却是意外的良好，比三年制的正科生，更为优异。①

速成教育竞争的弊风，随留日人数的增加而日渐滋长。到了1905年，当留日学生人数到达高峰的时候，其弊端更为明显，于是有人对此提出了批评。是年7月17日，青柳笃恒在《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中国留学生问题》的长文，说：

> 挽近中国学生之负笈我国者日多，据消息云将以万计，何其盛也。彼等既于都下隐然成一大势力……
>
> 中国学生游学于我国者，动皆以速成为主，教育彼等之我邦先辈亦有谓速成为必要者。余不敏，不敢苟同。请稍平心静气，推考清国之将来。夫清国者，清国人之清国也，清国子弟之教育早晚必由清国人自为之。惟其清国人得亲自教育其子弟，学问之独立在乎是，国民教育之大事存乎是。彼等清国留学生多以速成为主，在外积萤雪之功仅一年半载，其所得无何。甫尝学问之味，则学业已成，手持毕业证书，洋洋而就归国之途，然犹不能独当亲自教育子弟之责，依然以外国教师之力是赖。如此，则学问之独立者何存，清国国民教育将何日求之？此为区区不肖之微衷，每一思及清国子弟以及东方之大同，常长太息、戚然而忧者也。

① 平野义太郎：《梅谦次郎博士と中国留学生》，见《草原》第4号。

清国今有奏定学堂章程，统一学制，普及天下，其需求教师也固宜矣。虽然，以余观之，今后一二十年间，聘用外国教师亦无不可，但此仅为一时之计。清日两国庙堂诸公及在野有志之士，苟为清国、日本以及为东亚之大局，策划百年不变之大计者，则须中止速成为主之留日教育，而须期以一、二十年，持久不断，钻研新学，以图培养完全有用之材……。

又同年，因文部省第19号通令的颁布而引起的中国留日学生一致归国事件发生之际，日本舆论界有种种评论，有些更以为归国事件的远因乃在于速成教育。

《太阳》第2卷第1号(1906年1月)在"时事评论"的"教育"栏上，有《清国留学生的一致归国》一文，首先对文部省的通令表示支持，认为不问其适当与否，断不能朝令夕改，又认为日本学校对滋惹是非的不良学生施予教育，殊无必要，如他们要去的话，留也无益。接著又对日本的教育加以指责：

文部省前时并未取缔彼等留日学生，此实为错误之策。各校争先大开方便之门，来者皆非有志于正式之课业，故留日学生之数骤然增多，致助长彼等放纵之恶习。其根本之弊，在于开设简便课程，以及漫然出售学术技艺也。凡在日本所派海外留学生，均为精选之优异生，若有肄业于美国管教不严之大学者，其成绩多不足道。何曾有闻各国专为日本学生，而特设简易课程者乎。何以仅有日本学校自愿舍弃师道，专为中国学生苟且施教，却又增长彼等之放纵行为乎。

不久，中国当局也感到速成教育的弊害。学部遂于1906年3月13日，通电各省，传达有关《限制游学办法》的章程，其要点如下：

凡欲入高等专上学校及各专门学校者，须有中学毕业以上之程度，且通晓留学国之语言，方为及格。……

拟习速成科者，不论法政或师范，必须国学与中文俱优，年在25岁以上，于学界政界有实际经验者，方为及格。

但这仅是针对官费留学生而作的规定。

1906 年 4 月，学部奏定每年 8 月举行留学毕业生考试，并于是年举行第一次考试。参加考试的 100 人之中，大多数是留日毕业生，但留日学生全部落第，及格的前五名全是留美毕业生。

这一结果，在日本也成为大问题。《太阳》1905 年 12 月号(12 卷 6 期)的"时事评论"栏说：

> 今年中国之进士考试，留日学生成绩极劣，竟无一人及第。此一事实，岂止关系日本教育留学生之评价！（其成绩不佳原因，系因学生不励精于学问，无普通学科之素养，并以速成为主所致也。）若从日本教育界立场观之，教育中国留学生，岂可不讲求更进一步之措施乎？然东京数十所专以留学生为对象之学校，专以迎合留学生欢心，满足其弱点与好奇心者，比比皆是。对此，当否严加取缔？……以东洋先进教育家自任者，如视若无睹，何配为教育家？而余事姑且不论，文部省当局诸公之信誉何存？

又该志同期的"思潮"栏上，载有《论中国学生的文官考试》一文，说：

> 此次中国政府举行留学生毕业考试结果，美国留学生之成绩良好，而留学我国者成绩大劣。就此事视之，中国考试委员中，不无故意偏袒之处。《时事新报》忧虑此次考次结果，势将引致对留学日本之非议，惟指出与其谓此乃我国教育欠佳，毋宁谓中国留日学生大皆急骛速成教育，欲于短期内获得毕业证书，有以致之。……《读卖新闻》以为中国留日学生考试成绩不佳，原因有三：彼等热中速成，营利学校之弊，以及中国考试方法不良。

留学毕业考试不仅促使日本教育界反省其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政策，在中国本身，也重行检讨过去的留学办法，痛感有实行"限制留日学生"的必要。

同年 8 月 7 日，学部通电各省停止派遣赴日修习速成教育的学生。当时在中国的留日学生教育协会亦遵照此令，限制速成科

学生出国。该会的规约有：

一 普通教育速成科及名非速成而实是速成之学生，一律暂时停止办理。

一 普通科及师范科学生修业期限须延长至三年以上始许毕业。

这种限制，导致日本留学的质素为之一变。也可以说，日本留学渐渐正规化起来了。日本的《太阳》杂志论及此事时说："此亦为匡救留学教育弊害之一法，固非出于排斥及留难留学教育之意"①，这是正确的评论。

可是，速成的风气事实上是不容易一下子纠正过来的。1908年1月3日的《学部奏定日本官立高等学校收容学生名额摺》说：

比年以来，臣等详查在日本留学之人数，虽已逾万，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分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耳。②

由此观之，明治时代（1868—1912）中国留日学生数目虽然值得夸耀，但我们必须有一正确的理解：中国学生赴日，只是借助邻邦去接受暂时性的普通教育；在学业水平上，尚未达到真正"留学"的要求。尽管有上述种种问题，但无可否认，速成教育对促进中国发展新文化，决不是没有功劳的。

九　日本人在中国创办的学校

自从1896年日本开始接受中国留学生以来，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到了1905、1906年间达到最高峰。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日本教师，应中国方面的邀请到中国讲学，他们大多通过翻译进行授

---

① 《太阳》第12卷第7期（1906年7月）。

② 《学部奏咨辑要》第一编所载《限制游学办法》，转引自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页133。

课。对日本来说，上述现象意义非常重大。日本国民不但得邻邦的英才而教育之，同时日本人又受聘为邻邦的家庭教师。寺田勇吉的《清国留学生问题》有此说明：

> 据现在之状况，留日学生人数渐次增加，如《万朝报》云，目前已在五千人以上。加之吾同胞应中国之招聘，于彼地之学校执教鞭者，人数不少。故受教于此等日本人者，定必为数不菲。若将在中国而受日本人之教育者与在日本留学者合共计算，总数恐达数万。我日本之教育对中国之影响实不可谓不大矣。①

日本人到中国当教师，从明治30年代（1897—1907）开始流行，其盛衰与中国学生负笈日本留学盛衰之势成正比例。

应聘到中国的日本教师在中国被称为"日本教习"。日本教习的出差讲授，正确地说，不是"留学"，大概可称之为"留教"吧。就中国人从日本人获得新知识这一点来说，聘请日本教习与到日本留学，其意义和效果是一样的，甚或可能超过之，一个日本教习前往中国教学，其效果会相等于五十名中国学生留学日本。所以笔者把这个问题放在本书中讨论。

实际上，日本教习可分两类。其中一类在中国开办学校，投身于中国教育事业。另一类应中国人开办的学校的招聘，有一定的任教年期。

请先述前者。甲午战争以后，中日两国外交上较少冲突，两国国民的感情亦颇融洽。在日本方面，"中国热"高涨，到中国居留的日本人数由1899年的1725人增加至1905年的16910人（据东亚同文会编《支那年鉴》）。两国间的贸易也随之而扩展。中国方面聘请不少日本人充当军事顾问、法政顾问、外交顾问、教育顾问、农事顾问等。到中国的日本人士中，出现一些抱有"开通中国人风气"的信念的人。

---

① 《中央公论》第20卷第1期（1905年1月）。

在这种气氛之中，日本人亲自开办了一些学校，其中重要者如杭州的日文学堂(1898)、泉州的彰化学堂(1899)、天津的东文学堂(1899)、厦门的东亚学院(1900)、南京的同文书院(1900)、南京的本愿寺东文学堂(1901年左右)、北京的东文学社(1901)和上海的留学高等预备学堂(1905)等。

骤然听来，"日文"学堂、"东文"学堂、"东文"学社等，似乎只是教授日语。其实细查各校科目内容，竟与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就读的学校完全一样。换言之，这些学校除了教授日语之外，亦开设普通学科，而且也分普通科和速成科，修业年限也大致与日本专为留日学生而设的学校相同。

今试以北京东文学社为例说明。① 这所学校是日本人在中国所设立最出色的学校。由热心人士中岛裁之主持。他曾在西本愿寺学校读书，于1891年到中国，足迹遍14省。1898年拜保定府莲池书院院长吴汝纶为师，受吴氏的委托，为其弟子教授日语和英语，收效甚佳。他曾计划开办农工学堂，但因家事返国。1901年2月再到北京，与吴氏商谈在北京开设学校，出任户部郎中的吴氏侄婿廉泉也参与这个创校计划。结果，得《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铁云答应捐助千元，即以北京外城前孙公园的锡金会馆为校舍，由廉泉任总理，中岛裁之任总教习(教头)。1901年2月1日正式开学，定名为东文学社。

当时北京还没有一所新式学校。东文学社最初预定招收学生三十名，但开学时却有六十人申请入学；开学的第二天，增至九十名，第三天增至一百二十名，一星期后增至一百八十名。于是分成两班，有汉学修养的老年及壮年人编入"专门学班"，主要是培养其翻译日文的能力(其后又分"专门科"和"速成科"两种)，少年人则入

① 有关其他学校，详参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东京1939年版)，第6章第3节。

"普通学班"，教授日语及普通学科（其后又分"中学科"和"师范科"两种）。起初由中岛自己一人担任讲授，上午教专门学班，下午教普通学班。但不久学生人数增至二百八十余名，由一人讲授很是困难。适值有些日本人希望一边当教员一边学习中国语，所以学社增聘原口新吉等六名日人，分别担任六个教室的教学工作。

东文学社的入学资格并无年龄限制，只规定"不吸食鸦片者"方能入学，也不收学费，学社的维持费用，全由中岛奔走各方筹募而来①，他或编纂书籍，或当家庭教师，甚至向日本议会求捐助。除了为学校公事奔走的费用外，他本人一文不取，以清廉律己。其他一面学习中国语一面授课的教员，每月亦只领取十元至十五元的零用钱。

由于中岛为人严谨②，对学生的教育又非常热诚③，故学生人数渐次增加，校舍不敷应用，三度迁徙。1902 年教员人数增至十八名，教室增至十七间，在此校执教的日人前后共有五十六人。其中冲祯介、松崎保一和胁光三三人，是日俄战争时六名"特别任务团"的成员，因破坏雅儿河铁桥而被杀；原口新吉其后当了早大的中国语教师，三岛海云后来当了 Calpis（乳酸饮品）公司的总裁；船津输助来华以前，是留日学生在东京出版的《国民报》名义上的督

① 主要的捐助人有：除刘铁云捐 1,000 元外，盐运使杨宗濂承李鸿章之命每月捐助 100 两，日本友人某氏每月捐助 200 日元，袁世凯捐购置设备书籍费用 3,000 元，川岛浪速捐购买印刷机费 300 日元，嘉纳治五郎捐大批书籍，日本驻屯军将校捐物品，荒甲子之助寄赠爱马供学社之用。

② 中岛治校备有"法三章"：1.禁饮酒，2.禁出入花街，3.禁穿用和服；而自己身体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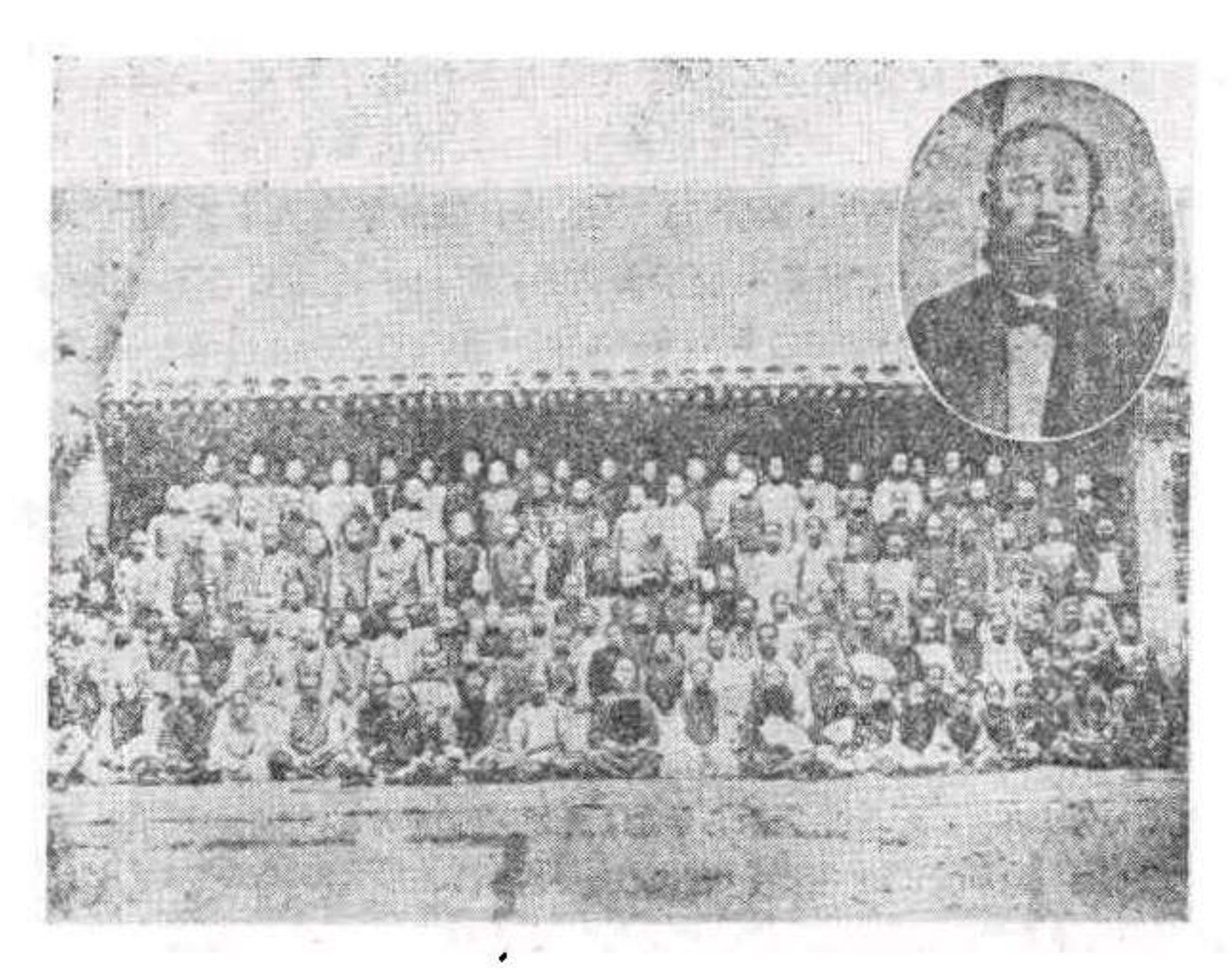
③ 中岛极重身教，希望学生能衷心改过。学生如有纪律问题，他就认为自己教得不够好，于是在学生面前，体罚自己，皮鞭竟至三断四裂，他称此为"天鞭"，学生见此，无不失色自省，不敢犯过。寄宿生因伙食问题闹事，他曾召集学生在食堂内作精神训话，说谕严责，从晚上八时至翌日零晨四时，长达数小时之久。为了学会最新式的体操传授学生，他在百忙中每朝五时便到日本驻屯军军营学习。

印人。这群教师算得上怀抱各异，龙蛇混杂。

教师流动性颇大，理由是他们都是为了学习中国语而来执教的，故学会以后，自然各奔前程。又他们之中，也有转到其他学堂当教习的；这些学堂都因中岛斡旋而得以创办，故可视为东文学社的分支。从这一意义来说，东文学社实在是日本教习的摇篮。

学生入学及退学时间虽无硬性规定，其入学数字如下：

1901 年	801 名
1902 年	331 名
1903 年	141 名
1904 年	189 名
1905 年	137 名
1906 年前半	168 名



〔图 5〕中岛裁之和东文学社学生

该校的毕业生(包括已获得翻译能力而中途退学的学生)，或兴办学堂，或创新事业，都能为社会作出贡献。例如翰林御史蒋式理当上京师大学堂提调，翰林侍讲连甲成为山西大学总办，举人王金绶受聘为北京大学堂教师。

六年之间，内外交煎，苦心惨淡经营，结果使中岛健康大损，迫不得已请求直隶总督袁世凯把学社收归直隶学务处管辖。学部侍郎严修指派留日归国的张瑛绪接手办理，1906 年 7 月 10 日，在该校第六年度第一学期结业典礼上，同时举行转让仪式。

其后校名改为直隶官立中学校，在张瑛绪主持下，聘日人甲斐宽甲掌教务，并继聘日本教习多名为教员。1906 年年底，以经费不足，学校关闭。1907 年正月再度由日本人筹办，复用东文学社之名(教员有铃木直人、齐藤传寿等)，但不如旧日之隆盛。

东文学社创办以后，北京出现了多所类似的学校，规模不一。如冲祯介(一说横川省三)创立的文明学堂、保坂直裁创立的日英语学堂、大柴丑松设立的日语速成学堂、黑权道隆创立的日英速成学校、冲祯介开设的振华学堂(以上全部都是东文学社教员分别设立的学校)，以及佐佐木安五郎(照山)的东亚善邻学堂、佐伯信太郎的八旗中学堂等。日文字母 a i u e o (あいうえお)之声响遍了北京的街头。

十 在中国的日本教习

日本人在中国所办的学校，成为一种示范和仿效的典型，因此中国人招聘“日本教习”渐成风尚。同时，很多日本人亦积极招聘日本教师；而中国人赴日考察教育时，亦往往商妥招聘之事，然后回国。①

① 1902 年吴汝纶赴日视察教育三个多月，曾请托日本派遣教习赴华。

在1900年之前，也有日本教习来到中国。不过，在义和团事件以后，才正式成为一种潮流。应中国招聘的日本教习人数，最多时竟达600名之谱。①

有关日本教习的资料，详见1909年中岛半次郎辞任天津北洋师范学堂教习归国后所著的《日清间之教育关系》一书。该书实际上是1909年11月所作的全中国外籍教习的调查报告。那时，日本教习的全盛期已经过去，但有日人执教的各地学校，为数仍很可观。

（北京）

京师法政学堂　京师法律学堂　北京译学馆　高等巡警学堂　北京电话学堂　京师第一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　艺徒学堂　京师五城学堂　工艺官局　淑慎女学堂　四川女学堂　慧仙女学堂　内城女学传习所　京师第一蒙养院

（直隶省）

保定　直隶法律学堂　直隶法政学堂　模范小学堂　直隶优级师范学堂　高等农学堂

天津　直隶学务公所　直隶工艺局　直隶高等巡警学堂　直隶高等工业学堂　北洋师范学堂　北洋法政学堂　天津两级师范学堂　天津银行专修所　直隶学务公所付设音乐体操传习所

（山东省）

济南　山东全省师范学堂　山东法政学堂　山东高等农林学堂　山东警务学堂

曹州　曹州府普通学堂

芝罘　芝罘毓材学堂

（山西省）

---

① 在1906年7月完成的《东文学社纪要》上，中岛裁之说："今日居于开导之任者，有五至六百人之数。"

太原　山西师范学堂　山西大学堂中斋　山西高等农林学堂　山西法政大学

（河南省）

开封　河南优级师范学堂　河南高等学堂

（江苏省）

南京　两江师范学堂　宁属初级师范学堂　江南实业学堂　兽医学堂　南京高等学堂　女学校　女学堂　高等女学校　旅敏女学堂

苏州　江苏两级师范学堂　法政学堂　高等学堂

（安徽省）

安庆　安徽师范学堂　安徽高等学堂　中等工业学校　安徽师范学堂　安徽陆军小学堂　安徽女师范学堂　布政使衙门幼稚园

（江西省）

南昌　高等农业学堂　法政学堂　医学堂　江西高等农业学堂

（浙江省）

杭州　杭州医学校　高等学堂　法政学堂　浙江铁路学堂　惠与女学校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安定中学堂

嘉兴　桐乡县学堂

湖州　湖州中学堂

（福建省）

福州　福建高等学堂　福建两级师范学堂　工艺传习所　农事试验场　福州幼稚园

（湖北省）

武昌　两湖师范学堂　农务学堂　文普中学堂　湖北商业学堂　湖北法政学堂　方言学堂　湖北女子师范学堂付属小学堂幼稚园　铁路学堂

（湖南省）

长沙　湖南高等实业学堂　优级师范学堂　模范小学堂　明德学堂

醴陵　醴陵磁业学堂

衡州　南路师范学堂　衡州府中学堂

常德　西路师范学堂

（陕西省）

西安　高等学堂　优级师范学堂

三原　三原府高等工业学堂

（四川省）

成都　四川高等学堂　铁道学堂　优级师范学堂　通省师范学堂　女子师范学堂　中等工业学堂　中等农政学堂　成都府中学堂　华阳中学堂　军医学堂

重庆　重庆府中学堂

资州　资州府中学堂

眉州　眉州府中学堂

永宁　永宁县中学堂

（广东省）

（广州）两广优级师范学堂　广东官立女子师范学堂　广东法政学堂　广东高等巡警学堂　广东高等工业学堂

肇庆　肇庆府中学堂

（贵州省）

贵阳　官立农林学堂　官立优级师范学堂

（云南省）

云南　省会中等农业学堂

（盛京省）

安东　巡警总局

营口　营口工程总局　巡警总局　卫生总局　商业学堂

奉天　商业学堂　农事试验所　农业学堂　奉天两级师范学堂　奉天女子师范学堂　奉天森林学堂　奉天工艺传习所　奉天劝业道署　奉天第一蒙养院　奉天第二蒙养院　奉天师范学堂

铁岭　新民府公学堂

康平　蒙古博王府立学校

（吉林省）

吉林　吉林中等实业学堂　吉林农业实习学堂　吉林两级师范学堂
　　　吉林女子师范学堂

当时，中国人聘用的外籍教师总数为356人，其中日本人占311名(男288，女23)，即占总数百分之八十四以上。日本人讲授的科目有日本语、工业、博物、数学、理化、农业、音乐、手工、体操游戏、法政、经济、教育、哲学、地理历史、医学、商业、警务、普通学、电话事务、监狱事务、兵科、保姆、手艺、图画、造花、织物等等。

这是中岛半次郎在1909年11月调查所得的资料，1906年最盛期的日本教习据云有500—600名。又据某些日本教习的谈话和著作，可补充一些中岛所未列举的聘用日本教习的学校如下：

北京　京师大学堂　财政学堂　测绘学堂　八旗中学堂　顺天中学堂
　　　淑范女学校　蜀学堂　会文学堂
保定　农工学堂　编译处　东文学堂　将弁学堂
天津　科学馆
直隶省丰台　日新文社
直隶省定州　定武中学
直隶省赵州　赵州学堂
直隶省河头　正心义学
山西省太原　警务学堂　晋明小学堂
河南省开封　河南大学
江苏省上海　育材学堂　务本女学堂
江苏省无锡　(某学堂)
福建省福州　女子职业学校
福建省厦门　瀛厦书院
湖北省武昌　武备学堂　武昌高等巡警学堂
湖北省汉口　仕学院
湖南省长沙　高等学堂
四川省成都　协立四川东文学堂

四川省彭县　（某学堂）

贵州省贵阳　武备学堂

云南省云南　云南法政学堂

盛京省奉天　奉天武备学堂

盛京新民屯　新民屯师范学堂

蒙古喀喇沁　武备学堂　毓正女学堂

日本教习数目，亦可补加150名，即总数可由中岛所说的311人增至461人。①

这些日本教习之中，不乏知名人士，例如东京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吉和冈田朝太郎，京都大学教授岩谷孙藏、织田万和矢野仁一，其后任帝室博物馆馆长的杉荣三郎，东京最高法院部长松冈义正，监狱学的大家小河滋次郎，早稻田大学教授松平康国、中岛半次郎、氏家谦曹、中桐确太郎和渡俊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安井小太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教授渡边龙圣；此外，名作家二叶亭四迷（长谷川辰之助），其后编纂《井上中国语辞典》的井上翠，东洋史大家藤田丰八，中国研究者西山荣久和神田正雄等，也都在这批教习之列。女性方面有：原在横滨大同学校当教师、嗣因下田歌子推荐到上海务本女学堂，最后任教于蒙古喀喇沁王府毓正女学堂的河原操子，服部宇之吉夫人繁子，岛居龙藏夫人君子及后来在日华学会服务而专门帮助女子留日学生的服部升子等。

日本教习在中国学校授课时间所占的比例，可举保定师范学堂第一教室的上课时间表为例，加以说明：②

---

① 这个数字包括一些兼职人员，其姓名和略历，见拙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页171—185。

② 据《保定师范学堂各改每星期教授时间表及教习姓名表（光绪三十年九月末至十二月末）》一文的统计，参看直隶学务处编：《教育杂志》（1905年6月15日），页6—7。

时 / 学科及教习 / 日	第1小时		第2小时		第3小时		第4小时		第5小时		第6小时	
	学科	教习	学科	教习	学科	教习	学科	教习	学科	教习	学科	教习
第 1 日	农学	竹内	地理	大境	手工	芝本	算学	高	博物	永井	体操	全
第 2 日	教育	中谷	算学	高	理化	关本	体操	全	地理	大境	史学	韩
第 3 日	手工	芝本	文法	步	外国史	大境	算学	高	博物	永井	体操	全
第 4 日	伦理	谷	博物	永井	体操	全	算学	高	农学	竹内	史学	韩
第 5 日	教育	中谷	地理	大境	算学	高	算学	高	外国史	大境	理化	关本
第 6 日	图画	新纳	图画	新纳	经学	胡	算学	高	史学	韩	体操	全

其中日本教习七人：竹内菊五郎、大境鸿藏、芝本为良、水井勇助、中谷延治、关本幸太郎和新纳时哉。中国教习六人(其中姓谷的即谷锺秀，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来中国选举临时大总统时，曾任直隶代表，后来又成为段祺瑞内阁的农商总长)。在每周 36 节课中，日本教习担任 18 节，占总数一半。

日本教习教书的时候，几乎全用日语讲授，故须由曾经留日或在日人所办的学校读过书的中国人传译。固然中国话流利的日本教习可以不用传译，但为数不多。就这点看来，这种教学法和日本国内为中国人办的速成教习的教学法大致相同。

日本教习所得的报酬也没有一定。以刘坤一的三江师范学堂(疑即后来的两江师范学堂)为例，该校在东亚同文会斡旋下，聘任 11 名日本教习的条件是：

(姓名)	(资历)	(学科)	(月薪)	(任期)
菊池镰二郎	文学士	总教习	400元	3年
菅虎雄	文学士	伦理及教育	300元	3年
松原俊造	理学士	物理化学	300元	
志田胜民	法学士	理财及商业	300元	
大森千藏	理学士	博物	250元	
杉田稔	工学士	工业	200元	
亘理宽之助		图画	200元	

柳原又熊		日语及翻译	250 元
那部武二		日语及翻译	250 元
安藤安	农学士	农学	300 元
岸廉一	医学士	医学	300 元

1907 年以后，日本在华教习人数渐少。主要原因有三：（1）留日学生归国人数日多；（2）西洋人在华发展教育事业；（3）对日本教习有不良的评价。这些原因，其实与中国、日本和西洋的三边关系非常密切。现在分别探讨如下。

（1）留日学生归国人数日多

归国的留日学生，象唐宝锷、戢翼翚等早期学生，在中国社会获得了很重要的地位，上文已经交代。不愿登仕途的，在新闻界和教育界活动的也很多。归国的留日学生真正在教育界发挥影响力，相信始自 1902 年左右。《江苏》第一期"本国记事"的《湖南兴学》中说：

> 省城大学堂于正月间改作高等师范学校，与游学回湘诸生新立之师范学校并为盛举。①

该志又报道，北京警务学堂改为高等警务学堂时，原来的十名左右日本教习有半数被解雇，而华籍教习本来只有三四名，却增至十余名。这批新增的华籍教习，主要是日本留学毕业回来的人。

日本教习减少的原因，出于中国留日学生归国者日多，这是当时日人教习异口同声所指出的。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对中国留学生教育的成功的明证。但日人教习的减少，并非是说所有"外国教习"都减少，事实上有欧美教习进入中国，取代日本教习的情况。

（2）西洋人在华发展教育事业

① 《江苏》第 1 期(1903 年 4 月)，页 142。

作为文明先导的西洋各国，看到日本人独占中国新式教育权的趋势，其焦虑不安之情是不难想象的。

1902年，东文学社曾与美国人狄尼氏发生冲突①。在华从事教育事业的日本人士中，也有人担心日本人一旦疏忽大意，欧美人士一定乘虚而入。②

日本人在华新式教育全盛之际，被中国人视为"恶魔"的西洋人，便已着手在边壤地区的蒙古内地开设学校③，他们的态度和服装也尽量做到中国化，对中国人极尽亲切周到之能事。青柳笃恒说：

> 其〔美国人开设之学校〕教职员皆谙中国语，了解中国风俗人情，对于熏陶中国人之子弟，可谓毫发无憾，各地皆无不然。彼等碧眼而垂红毛之辫发，身着中国衣裳，带领学童散步于郊外，何其亲切。此情此景，吾人常见之矣，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也。④

西洋人士一直在等待机会的来临。在1905年，这个机会突如

① 据《东文学社纪要》，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中岛裁之为了应征充任郎郸县学堂教员，曾赴保定拜访直隶教育顾问渡边龙圣。渡边对他说："我们今天所要考虑者，在如何树立日人教习的重要性，至于如何防止其他外国人滥竽充数一事，则为次要。"结果，该职由美国人狄尼氏的华籍门生某人入选。狄尼氏在中国北方着手发展教育乃从此时开始。不久，定州中学及赵州中学的英文教席都由其门人充当。因而日美两国的教育工作者不免发生正面的冲突。例如，赵州学堂的日人教习三岛海云与同校的英语教师梁奎龄（狄尼氏门人）因故冲突，三岛抓着梁的头发，把梁摔出课堂外。

② 中岛裁之指出：若日本人担心新式教育事业会促成中国强大，因而对日本不利，而不承当教育责任的话，其空缺将马上由德、美、法、英等国人士所填补。见《东文学社纪要》，页180。

③ 《太阳》第9卷第1号（1903年1月）的"时事评论"栏上有《清韩の教育と日本宗教家》一文，说："闻蒙古内地，沙漠之间，法、美等国的传教士，次第兴建学校。又闻美国人拉尔逊能用流畅的蒙古语演说。被中国人视为'恶魔'的人，居然这样热心于教育事业。"

④ 青柳笃恒《支那人教育と日米独间の国际的竞争》，见《外交时报》第122号。

其来出现了，因为该年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引起一场风波(事详第八章)。西洋各国俟机而动，由来已久，碰到这个大好机会，于是迅速展开活动。德国让清廷的武官入伍受训，其议会决议补助上海医学堂三万元，又向中国派遣义务教师。1907年，美国有人发表了《中国人不要日本教习》(Chinese don't want Japanese teachers)的文章，讨论有关中国的教育问题，并向日本挑战，引起各方注意。出洋考察的大臣端方访美的时候，与耶鲁大学、康乃尔大学以及卫理斯妮〔女子〕学院签署一项协议，三所学校每年接受一定数额的中国学生免费留学。1908年，老罗斯福总统在该年国会开幕仪式提出咨文，声言"不惜一切协助中国发展教育"，又率先把庚子赔款中的一千多万元归还中国，用以在中国开办留学美国之前的预备教育。

这些措施，直接间接地使西洋人在中国新教育事业的势力增长；相反地，也成为日本教习减少的原因之一。

(3)对日本教习不良的评价

各方面对日本教习的评价都偏低。美国人撰写的《中国人不要日本教习》一文，虽然不是很公正的评论，但颇能掌握日本教习若干弱点，该文说：

> 中国每一所官立学校，皆聘有数位外籍教师，其中多为日本人。对此，吾人不禁有非难之声。日本人之薪酬较泰西教师低廉，故易招聘。彼等仅具肤浅之知识，即以学者自任。……
>
> 故此际排斥在华之日本教习，以其他外籍人士代替，实为当前之急务也。①

① 《New York Daily Tribune》报1907年6月2日所发表《Chinese don't want Japanese teachers》一文，青柳笃恒以《米纸"支那人の日本教师排斥"论》为题，译载于《同仁》。

青柳笃恒在《清国留学生之减少》一文，谈及在华日本教习的缺点时，也和上面引文所指大致相似：

> 俄国等国派至中国之教师，在其本国皆为不可多得之人士，而日本则有派出其本国多余人物之倾向。而且日本教师于讲坛上，动辄据美国某某氏云云，学生闻之，莫不以为日本人但为代销知识而已。……日本教师中亦有品行恶劣者。①

事实上，日本教习当中，学识好、人品高又热心于中国教育事业者，为数不少。但大多数能否称得上为教育工作者，不无疑惑。试看《东文学社纪要》或平川清风的《支那共和史》也可知道。平川说：

> 论及日本的影响，吾人不能沉默的是：当时日本并无对中国进行任何有计划的、负责任的宣传。第一，是人选错误。当时前往中国，在学堂中任教者，品流复杂，一般而言，并不一定效忠于中国。第二，成为中国学生师表的人，对自己的使命，漫不经意。他们为谋自己的衣食先于为中国设想。第三，他们对中国无充分的了解，因而其教授只是机械的，至于应为中国教育何等人才，从未思及。这些错误，直接间接地阻碍了中国学生接受日本影响。②

（4）其他原因

以上是教育上的原因，此外也有政治上的原因。

日俄战争以后，中国国内兴起了"收回利权"的热潮。虽然并未发展成"收回教育权"的运动，但也似乎引发出一定的呼声。

一方面，日本政府对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比西洋诸国冷淡。1904年应聘在保定地方执教的儿崎为槌在《教育研究》发表《中国学生思想界之一般》的报告，指出西洋教习因得其本国政府的援助，其

---

① 《每日电报》，1907年8月。

② 平川清风：《支那共和史》，页41。

留华期间比日本教习为长。他说：

> 闻现今某某强国等不断致力在中国扶植各该国之势力，谓日本人不过为欧美思想之转售者而已，并有奖励各该国教师受聘之事。其国人之应中国之招聘者，颇受优待，不但可带现职，且可从各该国政府另支薪俸等等，多方保护奖励之。目下清政府亦雇用欧洲人，通常首期之期限一至，即须解雇，以便以低薪招聘新人，惟旧人亦多愿以低薪继续受聘。盖此人得自清政府之金钱虽少，其得自本国政府者则多，故优然悠然居留斯地，而能有所作为。见之，实使人生羡也。①

日本政府并没有联络和管理日本教习，只予以冷淡的对待，毫无援助。日本的政治家，甚至有人反对教育中国人的。儿崎指出："一方得本国政府加意之保护，另一方则全无保护，成、败、利、钝之数，不待智者亦可明矣。"② 他所忧虑的事，不幸终于在数年之后便发生了。

辛亥革命爆发，日本人教习几乎全部归国。民国成立（1912年）以后，秩序渐渐恢复，有些人重新应聘，也有少数则因前清时代的聘约未满而续约复职。不过，无论如何，不能与昔日相比了。《支那年鉴》（第3期，第4期）所载的《中国佣聘本邦人名表》的记录中，1914年受聘的日本教习有六十三名，1916年减为二十七名。1936年（民国25年），《申报》所载的《吾国高教所请欧美各国之职员》报导：

欧洲合计309人，

美洲合计387人，

其他8人。

此8人当中，朝鲜占一人，日本人竟一个也没有。这种转变实在令人无限感慨。

---

① 《教育研究》第12号（1904年）。

② 同上。

十一　清末留日学生数量上的减少与质素上的提高

1906年清廷颁布了留学规定，学生要具中等以上的学历，而且要通日本语始许留学。此外，又通电停止派遣速成留学生。（见本章第八节）

1907年留学生已见减少，1909年约有5,000人，其后更锐减；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留学生几乎全部返国。

从1907年的留日人数，固然是减少了，但从质素方面来说，却是毋须悲观。因为学生已经从为"普通学"而留日转变为为"专门学"而留日。由于大家非议速成教育，主张先学好日语才去留学，以便接受专门的教育。于是，为留学作准备的日语教育在中国兴盛起来。1906年在开封的日人教师三宅喜代太写信给中岛裁之说：

> 拜启：近日上谕有云：未通日语而赴日本留学者，其途甚难。故研习日语之风甚盛。本省去年九月所送六十名留日学生中，有25名为习速成科者，而于本年3月毕业归国，故当可派遣同数之学生以代之。盖此乃明确之事，故讲授日语之学校将更昌盛矣。

中村芦舟在上海开办的留学高等预备学校于1907年扩张校舍，正是因为受这种影响所致。

岛田三郎见到这种趋势，写了一篇题为《日本语学校设立之必要》① 的文章，激动地说：

> ……中国政府以能通日本语为留日资格之一，然身居中国，如何始

① 《太阳》第12卷第13号(1907年)。

能习得日语乎？若非设立严格之日语学校而教之，则作为学艺阶梯之日语亦不可习得者也。欲学齐语，应居齐人之中，欲晓楚语，当处楚人之间。居中国而欲修日语，则事倍功半矣。当今之际，宜于两国之间，造一语文上之大桥梁，政府若能专司创建严格日语学校之责，以中国人为教育对象，并与中国官宪缔约，为彼国之学生，教授预备留学之日语课程，则于彼之利，无有过之矣。而彼等学成之后，能以吾国之语文，解吾国之事，以吾国之语文，授吾国之学。此实为日本语文传播于中国之一大通道也。

这些为中国学生开办留学日语先修专门学校的呼吁，不啻为进军的号角，长泽孝享的高等日语学堂想亦因此而设。

1907年，有志入学高等日语先修学校的中国学生就多达两千人。为此，当时的中国驻日公使李家驹与日本文部省交涉，签订协定，由五所日本官立学校(最初十一所)接受中国学生入学。其要点是：

一 自光绪34年(1908)以后15年内，第一高等学校每年招收中国学生六十五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二十五人，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四十人，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二十五人，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十人，合计165人。中国政府补助每名学生教育费每年由200元至250元不等，由中国公使馆交各该学校。

一 以上165名额，直隶、奉天、山东、河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大省各派九名。吉林、黑龙江、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广西、贵州、云南等各派六名。其经费分由各省负担。

一 各校参加入学考试及格者，得选为官费生；学生之教育费(补助费)及学费，每名每年平均为650日元。

这个协定其后按步实施。1908、1909及1910三年间，进入五所日本官立学校的留学生人数共460余人。

这协定签订以前，在日本负责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学校，以教授普通学科为主要目的，日语教育只属附带的，有些甚至根本没有教授日语。可是先修日语，现在成为非常重要。这种先修日语的教育，除了由原来的成城学校、东京同文书院、志成学校等校担当外，还新办一些名为高等日语学堂的学校。

中村芦舟在上海经营的留学高等预备学校，1907 年扩充校舍，增加学额，大概也是沿着这趋势而发展的。

至于中国有关当局，也有人感到留学生抵日之后才开始修习日语是不合算的，因此学部在 1911 年旧历 6 月奏请在北京设立学校，作为日本高等五校的预备学堂，虽然已获批准，但因同年 10 月 10日发生了武昌革命而宣告流产。民国以后，五校特约协定，由于各省经费不足而步调不齐，以致未能按预定计划行事。1907年 8 月，青柳笃恒为文指出："由于中国的排日思想勃兴，近日东来的留学生数字显著减少，这是无可隐讳的事实。……"①1908 年 7 月，在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第一届毕业典礼中，教务主任青柳笃恒演说称：

> 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一时号称多达一万三四千人，这不是正确的统计数字。……那是因为一人同时兼有二三所学校的学籍，却分别累加的缘故。……其实，我以为最多时也只有八千人。今日学生人数已显着减少，官费公费学生合计三千五百人，充其量也不过四千人而已。②

文部省编纂《学制五十年史》的附录《中日亲善教育的设施》亦这样说：

> 中国留日学生最多的时期是 1902 至 1908 年期间。如 1906 年，数目实超过七千人。其后每年人数渐减，至1909 年尚不少于五千人。然

① 青柳笃恒：《清国留学生の減少》，见《每日电报》（东京：1907年 8 月）。

② 《早稻田学报》（1908年 7 月）。

至1912年，其数遽减至一千四百人，这是由于当时中国发生革命，多数学生返国所致。①

由此可见各方数字虽然略有出入，但留日人数渐减，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青柳笃恒的前述演说，提到留日人数减少的四种原因：

1. 短期(速成)学科的全部废止；

2. 中国普通教育机关的普及；

3. 因军备扩张而教育经费削减；

4. 货币贬值。

此外，我们尚可举出欧美诸国的活跃以及日本政治家的冷淡等原因。如本章第十节所述，各国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所引起的留日学生归国风潮，无不鼓掌称庆，认为是夺取日本独占中国新教育权的大好时机。

特别是美国，不单不满足于在中国招收学生留学美国，更在日本国内努力展开同样的工作。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在美国驻日公使馆的协助下，向中国驻日公使馆和与中国留日教育有关的日本学校进行极其详细的调查，范围包括各校留日学生人数、修业期限、教授科目、教授法、学费、宿舍，以至留日学生的膳食问题等等。随后又在东京的神田青年会馆内设立"华人青年会"，开始教授英语，且在早稻田鹤卷町设立分校，在1907年一年之内招收了称为"教友"的学生八百至九百名，不久又在小石川切支丹坂兴建了宿舍。(后来在神田兴建独立的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成为日后中国留日学生活动的大本营。)

经过美国这番努力，留学日本之后，再去美国深造的学生似乎

① 《日支亲善の教育的施设》，见《学制五十年史》，附录页2。

越来越多。①不单是德国和美国，英国和俄国也不断努力在中国的教育事业中争一席位。

正当西洋各国官民一致努力在中国发展教育事业时，在日本国内，民间虽有一些相当热心的人士，政府却采取相反的态度，有些人甚至对中国留日教育事业大加反对。青柳笃恒指出了这种现状：

吾国驻清公使林董阁下于东洋协会演说曰："为数逾万之学生，一时之间委托日本施予教育，清廷固有不是之处，然接纳一方之日本，亦属不当也。"敢问公使阁下，知否多培育一名中国青年，即为日本所以进一步扩张势力于大陆之计也。②

青柳氏又说：

日本向来敬畏西洋诸国，而内心则极之轻视中国，此断乎不可也。……当今首相西园寺公望侯爵就中国留学生之教育，近日曾对余之友人曰："日本因中国留学生之教育事，往往与欧美诸国产生甚多外交上之纷争，余甚感遗憾。余以为欲使日本对欧美外交能圆满进行，当尽速结束对中国留日学生之教育。且中国青年游学日本，抑亦一大谬误也。何哉？盖日本之文明远不及欧美先进诸国，故中国断不能得青出于蓝之誉，即达至与日本同程度之文明亦不易也。中国青年欲求改革本国之资于海外者，不如游学欧美。"如是云云，堪称公允，亦未可知。惟该侯爵果为大日本帝国之大宰相乎？抑将为他国之人乎？吾人不能无疑也。彼于日中两国之关系，持如此冷淡之意见，而与欧美诸国之交际，徒具形

---

① 如[图3]中的胡彬夏女士，其后留学美国，十分活跃，为学生会干事及其机关刊物的编辑等。蔡琛的随笔集《幽默的叫卖声》中的《男女共学》一文说："胡彬夏女士来校演讲……"，又邹韬奋的《经历》中也有："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妇女杂志》，掌笔政的是朱胡彬夏。"

② 青柳笃恒：《支那人教育と日米独间の国际的竞争》，见《早稻田学报》(1907年7月)。

式，何异刀笔小吏执掌例行事务，岂能尽一国外交之能事乎？据此亦可忖知以留法之西园寺侯爵为首之政府之对华政策耳。①

1909年3月，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服部宇之吉发表《对中国人教育之我见》一文，说明欧美各国如何活跃地为中国教育事业而工作，透露了身为日本人而不得不担心和嫉妒的心情：

以前虽亦有日本人在中国经营学校，但除同文书院之外，都是我一人之力办起来的。……但这些事业其实应由国家或公众之力来办理的。②

故此，他主张纵使日本不能效法西洋各国在中国开办大学，至少也要大大扩张日本国内的大学，为中国留日学生提供完全的教育。可惜当时的政府不为所动。

由于速成教育的废止与留学生人数的减少。1909年夏天，曾经拥有五所分校而为留学生教育重镇的宏文学院，首先被迫停办。接着在1910年3月，经纬学堂也停办了。同年9月，早稻田大学的清国留学生部亦跟着关闭。东斌学堂、法政大学、东洋大学等校的留学生部相继停办。只有负责日语先修教育的成城学校、东京同文书院、高等日语学堂等，仍可继续办下去。

在留日学生不断减少的过程中，辛亥革命爆发了。经常关心中国政治前途的留日学生都放下学业，争相回国。因为他们在日本培育和凝聚了一股力量，故此成为推动辛亥革命的核心力量。

十二　民国初年的留日学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孙中山就任为临时大总统。

① 青柳笃恒：《现政府の对清政策を难んず》，见《外交时报》124号（1908年3月）。
② 服部宇之吉：《支那教育に对する所见》，见《中央公论》14卷3号（1909年3月）。

2 月 12 日，宣统帝逊位。3 月 10 日，袁世凯成为正式的大总统。政局稍安以后，对革命有功人士的子弟，很多被派到日本留学。光是黄兴部下的留学生一度就有 600 名之多。

袁世凯成为大总统以后，政治日非，暗杀宋教仁事件和引入外资① 等事，暴露其反动的本质，于是国民党起而反对。1913 年 7 月，在江西爆发了“二次革命”，但由于国民党人士步伐不一，反袁起义仅历一个月即被袁世凯击败，其领导人相率逃亡日本或美国，孙中山先逃到台湾，其后抵东京，1914 年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在他的周围集结了陈其美、戴天仇、居正、田桐等人。大批亡命客和留学生亦追随而至，群集东京。

袁世凯的反动性日益暴露，一心想当皇帝，大搞尊孔运动，一面大事举行祭孔活动，一面要在宪法中规定孔教为国教。一些对辛亥革命感到幻灭而且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现在更看清楚了袁氏的野心，于是展开反帝政运动。《新青年》杂志（1915 年 9 月创刊）成为他们的中心。《新青年》以打倒孔家店为起点，反对旧礼教、旧习惯和旧文学。《新青年》的主笔陈独秀以及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等人都是留日学生。

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文学革命，成效甚速。一个新文学的繁荣时代迅速来临，新文学作家鲁迅、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田汉、张资平等，大部分是从日本留学归来或正在日本留学的人。

1913 年 4 月发行的《谠报》（留日共和党机关刊物）刊登《日本东京留日学生经理员会议处广告》说：“民国成立以来，青年好学之士，纷纷自费负笈东渡，现在东京者已达二千人以上，来者日

① 是指 1913 年袁世凯政府与英、德、法、俄、日五国政府组成的借款团所缔结的借款契约，总额是 2,500 万英镑，利率 5 分，偿还年期为 47 年。袁世凯以这笔借款作为增强北洋军队实力的经费，此举是诱发起第二次革命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人一般称这次借款为“善后大借款”。——译者注

众。"①描述中国留日学生众生相的小说《留东外史》，其卷端说："民国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半天尘雾，一室阴霾，此时此景，即使不肖生(作者)忆起兀坐东京之旅馆，起草《留东外史》之情。"②接着又说："原来我国之人，现居日本者有一万余人，除公使馆职员及各省经理员外，概可分四类。"③亦即不肖生印象中，1914年的留日学生约有一万人之谱。可是，作者在《留东外史补》的记载，数目增加一倍：

> 民国八年〔1919〕十二月，不肖生因个人事业上的关系，重渡日本，旧游重到，物是人非。回想五年前留学生和亡命客的盛况，不禁感慨无穷。五年前〔1914年〕的留学生，公费私费合算起来，人数将近两万。亡命客来来去去，数目虽难以确定，然大小人物及其眷属，以及投降袁世凯后仍顶着亡命客头衔充老袁私家侦探的，总共算起来，也有三千人左右，不可谓不是极一时之盛了。④

因为这是一部通俗小说，当然不能视作真实史料，关于留日学生数目又有一万和二万两种异说，当然不能遽然信之。不过，1914年留日学生之多，是不难想象的。

松本龟次郎的《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说：

> 1913至1914年间，留学生人数颇多，最少也有五六千人，仅次于日俄战争前后的最盛时期。⑤

二万和五六千之间，当然是巨大的差异。我认为较低的估计

---

① 《说报》(1913年4月)。

② 《留东外史》，页1。

③ 同上。

④ 《留东外史补》，页1。

⑤ 松本龟次郎：《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页69。

比较妥当①，故认为松本氏的数字较为接近事实。

由于留学生再次大举赴日，除了一直未有停办的高等日语学堂外，以前从事留学生教育的成城学校和东京同文书院得以复课，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及其在下户冢的分会也开办了日语课。

除了这些复课的学校外，又有下列新设的学校：

日华学院　前宏文学院教授松下大三郎在1909年宏文学院闭校以后，应学生的请求，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等地方，教授日语。辛亥革命后，留日学生再度激增，故借用神田猿乐町数理学院的教室，创办日华学院。但当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在1914年成立后，这学院便与高等日语学堂一齐停办。

浩然庐　这是国民党员殷汝骊在东京大森创设的私立军事学校，主要是收容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的人士。由陆军大学等校的日人教官义务任教，讲授时用即时传译。其后因某种原因关闭，学生转到寺尾博士的政法学校。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　先在宏文学院任教，继而出任北京京师法政学堂教习的松本龟次郎，在1912年3月归国，任教于东京府立第一中学，同时又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户冢支部等处教授日语。旋因留学生的请求，于1913年8月辞去一中的教职，专心主持留日学生的教育事宜。先后借用日本大学及大成馆的教室上课，又得友人（三矢重松、植木直一郎、山根藤七、吉泽嘉寿之丞）的协助，教授日语。自二次革命以来，留日人数不断增加。原有的三、四间课室实在无法容纳，故于1914年1月在神田区中猿乐町新建校舍，校名定为"日华同人共立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日华同人共立"的校名是为了纪念湖南省留日学生曾横海在创校时的功劳），所授

① 当时报章杂志等资料，众说纷纭，有些说四千，有些说六千，有些说八千，也更有说一万的。可是，据日华学会的调查，到1935年为止，总数实为3,781人。见该会《第五版中华学生名簿》。

学科除日语外，还增加了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绘图学等。

这所学校象同类其他学校（如同文书院、成城学校等）一样，没有学年制度，采用讲座式，每一分科每日授课二小时，以两个月乃至三四个月为一段落，准许兼修其他学科，并有减费的优待，新到的留日学生入学时还可以随时增加组别。因为得地利之宜，留日学生集于此地的甚多，约占当时留日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

留日学生的人数，难免时有增减，在激增之时，要全部容纳是不可能的事，骤减之际，要空置大量课室来等待也是难事。但是，松本曾立誓："即使没有一个留日学生，校门亦要永远为他们开放。"为了持久地维持这所学校，[①]由伊集院彦吉和涩泽荣一多方斡旋，得到实业界及其他人士[②]的捐助，在1919年买下了在神田区中猿乐町的校址，增建成三层高、530余坪广的校舍。于1920年3月，更成为财团法人。其后，改由日华学会经营，易名为东亚学校，成为留学生教育的一个大本营。

政法学校　寺尾亨在1914年2月租借神田区锦町的东京工科学校一部分校舍，创办了政法学校。这所学校主要是孙中山和黄兴等一班政界人物，为了收容二次革命失败而流亡日本的人士而设立的；该校的赞助者和当事者大都是中日两国的名士[③]。讲师由多位日本国立大学博士充任。授课时用即时传译，经费初由中国国民党的巨头负担，后由中华民国驻日公使馆人员居间协助，不

---

① 由于当时就业无大困难，故不必考虑因留日学生人数减退引致的教职员的生活问题，但校舍的维持费却是真正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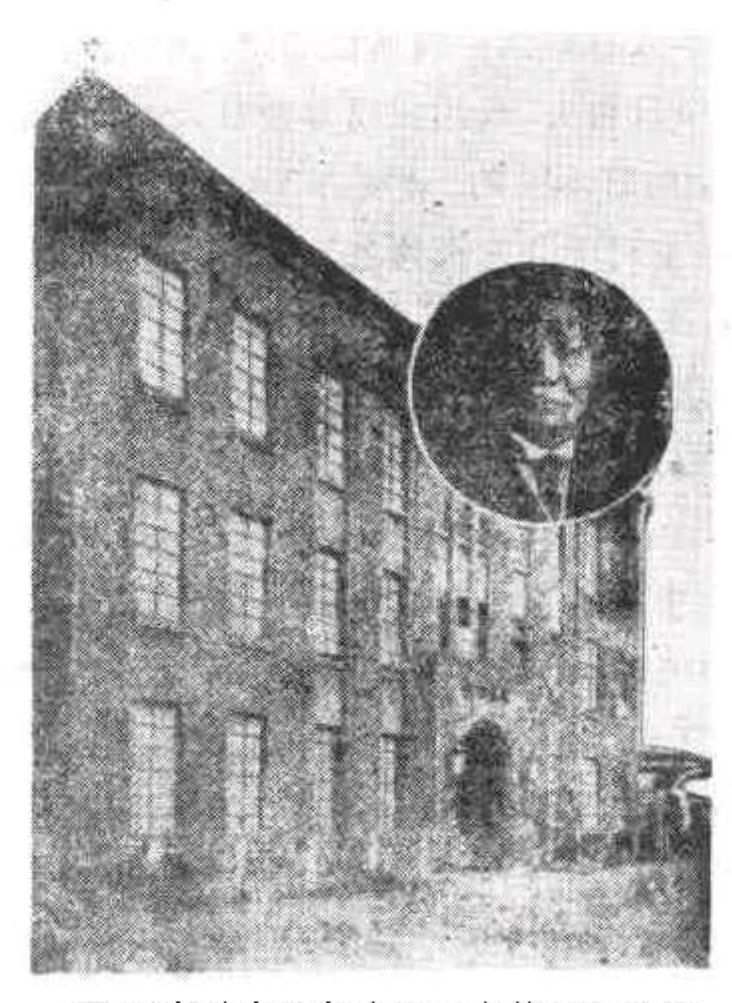
② 主要的捐款者有：三井、三菱、正金、满铁、台银、邮船、古河、东亚兴业等公司；以及门野重九郎、加藤定吉、高木陆郎、岩谷孙藏、服部宇之吉、饭田邦彦、三矢重松、杉荣三郎等人。

③ 据《政法学校纪要》，赞助人有：孙文、岑春煊、王家襄、张继、王正廷、李烈钧、陆宗舆、仇鳌、头山满、安川敬一郎、小池张造、水野梅晓等人　董事（理事）：汤化龙、吴景濂、章宗祥、殷汝骊、刘崇傑、孙润宇、犬养毅、林权助、伊集院彦吉、仓知铁吉等；参事：戴天仇、殷汝耕、钟鑱、张定、川崎万藏等。

足之数再由寺尾博士向日本企业家募捐。

该校本来计划发展成为大学，但时势日非，目标不能达成，1920 年终于停办。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占领了胶州湾。1915 年 1 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的要求。



〔图 6〕松本龟次郎和东亚高等预备学校

二十一条分为五部分：

（1）日本得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并享有敷设新铁路之权；中国不得将山东省内及沿海土地岛屿让与或租与他国。

（2）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的优越地位；日本人得在南满与东蒙享有土地租借权、所有权，以及营业与矿山开采等权益；并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为 99 年。

（3）规定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该公司属下各矿及其附近的矿山，不准他人开采。

（4）中国政府保证：中国沿海所有的港湾和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5）中国政府须聘用日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允

给日本人在中国国内所设寺院、医院、学校的土地所有权；中国警务为中日合办，或须雇用多数日人充任警官；中国所需军械的半数以上，向日本采购，或合办军械厂；日本得在华中及华南建筑新铁路；日本对于开发福建省，筹办铁道、矿山，整顿海港等，均拥有优先权。

这一系列的条款其实是要把中国沦为日本的附属国，所以中国国内发生了抵制日货的运动，而留日学生愤慨地大举归国。日本卒把二十一条的最后数条撤回，才于5月9日得北洋政府的承诺，而中国把这一天定为国耻日。

1916年袁世凯死去，国民党系的逃亡人士相率归国。这一年的留日学生数目，据《民彝》所记："留日学生是国民的优秀分子，而人数之多，亦在四千以上。"① 该志同时刊载李翰章在留日学生总会的演讲，说："今日我国五千余留日同学，追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及宋遯初(教仁)先生……"② 两文所提数目虽有差异，但可见人数已较上年减少了。

1917年，苏联诞生了。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为了打击苏联，想与中国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便秘密地寻求北洋政府的合作。留日学生得此消息，咸表愤慨，组织救国团返国者人数甚多。

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中国要求日本归还山东权益而遭拒绝。愤怒的北京大学学生发动了大示威，焚烧"亲日派"的交通总长曹汝霖(条约的签署人)的住宅，打伤驻日公使章宗祥，狙击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三人皆为留日学生)。全国学生的排日运动风起云涌，抵制日货的浪潮也一天天地高涨，这就是五四运动。

由于世界大战，日本成了暴发户，而国内物价高腾。加之中国

① 《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缘起》，见《民彝》创刊号(1915年5月)。

② 同上。

方面，由于军阀兼并，各省留学费用被挪作军事开支，因此留日学生数目大为减少。据《留东外史补》所载，1919年的留日学生数目较二三年前减少八至九成；归国的学生中，十分之三四是为了表示排日；十分之五六是因军阀的私斗而丧失留学公费。人数减少了八至九成的说法，恐为过甚其词，不过人数减少却是事实。《私立成城学校留学生部沿革》也说："……如1906年、1912年、1916年及1919年几次全体学生归国，都予学校经营者甚大的打击。"亦证明了此事。

留日学生减少的趋势，似乎引起日本方面的忧虑，于是有意改变对中国留日学生冷漠无援的故态，设立了统筹留日学生事务的机关，这便是日华学会。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之际，留日学生如浪潮般地涌回中国去，其中有不少人缺乏旅费。由于这次集体返国与对日感情无关，一些与中国关系较密切的日本实业家[1]组织了"留学生同情会"，筹集十数万元，通过文部省和中国公使馆借给留日学生，让他们可以回国。其后，中国教育部交还这笔款项，于是有人研究要把它用于对留学生有益的事业上。1918年4月，终于作成定案，成立了日华学会财团法人。会长是日本枢密院副议长小松原英太郎，常务理事是前东京府视学官滨野虎吉，顾问大都是中日两国知名热心人士。[2]该会创立的宗旨是："为对中国留日学生聊表薄意，稍减其作客异乡之不便，兼为中国赴日视察观光之人士作东道，期效斡旋之劳。"

---

① 三井物产公司的山本条太郎和日清汽船公司的白岩龙平等是主要倡议人。

② 据1930年1月《日华学报》所载会长细川护立的《庚午の年头に本会の前途を祝す》一文，日本方面的顾问是涩泽男爵（荣一）、清浦子爵（奎吾）、冈部子爵（长景）、山川男爵（健次郎）、近藤男爵、益田男爵、田所美治、丰川良平、泽柳政太郎。中华民国方面的顾问是江庸。

可是，该会成立之际，正碰上共同出兵西伯利亚的问题，愤而归国的留学生认为该会是日本向他们施展的怀柔手段，而当时受委为留学生监督准备赴任的江庸，风闻将被邀作日华学会会长，亦表示不愿前往出任（江庸于1918年5月到任）。小松原会长亦不急求事功，待机而动，徐徐做了些份内的事。相继出任会长的有涩泽荣一男爵（1920年）、德川庆次侯爵（1921年）、细川护立侯爵（1922年）等。

1921年度，文部省补助日华学会15万元经营留日学生宿舍，这是日本政府首次资助民办的留日学生教育事业。

其后，该会所做的工作，包括经营宿舍，介绍和指导留日学生，居间协助中国人赴日视察和观光，发行《日华学报》，后来也兼营东亚学校，成为中国人留学日本的门户和接待处。

1919年2月，长期从事留日教育的成城学校留学生部，获得日本实业家望月军四郎50万元的捐款，这是因为望月访问美国时，目睹美国对待中国留学生最为优裕，使中国留学生对美国发生好感，从而促进中美两国政府及国民之间良好的关系，在慨叹日本官民忽视中国留日教育之余，故有此举。成城学校旋于1929至1930年间在砧村兴建永久的学生宿舍和校舍，与东亚学校同为留日学生教育的大本营。

简言之，民国以后，留日教育史的特征是日本官民大体上对留日教育渐渐关心起来。其原因有：（1）二十一条问题以来，两国国交恶化，留日学生多投身于反对运动；（2）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百物腾贵，导致留日学生人数激减；（3）热心于留日教育的人士，积极起来。

中国留日学生问题亦首次被提到日本国会上，成为辩论的议题之一。

十三　日本国会中关于留日学生问题的议论

明治末期(1900—1912)在北京创立东文学社而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的中岛裁之，为了使中国教育事业得到日本政府的补助多次返国活动，向国会(帝国议会)请愿，但因时机未熟，无功而回。

1918年以降，由于中国学生到日本的日见减少，而赴西洋者则日见增多，日本政治家中终于有人寄予关切。同时，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校长松本龟次郎为首，直接从事中国教育的日本人士也希望此一局面有所改善。因此，自第40届国会(1918)以来，留日学生的教育问题被提到国会上，成为国会的议题，亦第一次成为一项政治的问题。其后的第43届国会(1920)、第44届国会(1921)和第45届国会(1922)，都曾先后辩论这个问题。

第40届国会上，高桥本吉等五名议员提出《有关中国人教育的建议案》(1918年3月20日)说：

> 发扬东洋之文化，为完美之人文社会作出贡献，乃吾国之责任。尤以协助中国人之教育，实为敦睦邦交、确保东洋和平之急务，望政府从速制定适当之措施。

为了作更进一步的说明，高桥氏首先指出中日亲善乃日本国民的要求，但当时的实况却使人感到遗憾。继而他提及西洋人在中国经营的高等学校，说：

> 就读于美国教会大学的学生有3,776人，英国教会大学的学生有3,767人，而在英美合办的协同大学攻读的学生有1,919人，三者合共9,492人。每年约有2,000人从这些西洋人办理的大学毕业。

他指责自己的国家虽然口口声声维护东洋和平，却没有负起这个责任，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希望在日本国民的支持下，能够在中国开办一所大学。接着把话题转到留日学生的事情上，说：

(本建议案的)另一精神是希望日本能改变对留日学生的待遇。1906、1907年之际，东京周围约有中国留日学生一万人以上。那时，我刚从美国留学返国，我以过来人的身份看到中国留日学生的遭遇，不得不对他们寄予深切同情。虽然东京到处都贴有"空房待租"的招纸，而且也有表明欢迎中国人租用的，但欢迎的方式却不敢恭维。日本的私立学校，虽也收容不少中国学生，这不过是为了增加学校的收入而已，其教育方法也不敢恭维。我与宪政会的关君等同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博士门下受教育，校长对我们说了以下的一番话，谓："你们回国以后，若为人道和人类的幸福而努力，将会比在美洲的学生有更大的效果……"

(颇多议员交头接耳)

议长(大冈育造)：请全院肃静。

高桥本吉：亦即是说美国的教育是以对人道作出贡献为目的的教育。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果有这样高尚的理想吗？我相信不得不要大加研究一番。(拍掌声)假如有所谓为日本的利益而教育中国人，中国人是不会对此感谢的。我相信只有为中国人的利益而教育，才真正有利于东洋和平。(拍掌声)

他继续呼吁日本人给予留日学生温情的照顾。他说："不要迫他们住在低级的公寓(下宿屋)，也不要让他们过不三不四的生活，应该使他们接触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日本教育部对留日学生的学校加强注意，并非意味只为限制或管理他们，而应为教育的效果着想。又说："可能的话，开办宿舍或其他适当的设施，"让他们住，让日本的上流社会与他们接触，给予他们参观学习等的方便。最

后，高桥在结论时说："希望政府把这些要求作为国民的呼声切实施行。……因为留日教育问题并非党派间的问题，因此期望得到国会全体赞成，而达成此一志愿。"

就此一问题，议长任命头本元贞、高桥本吉、一宫房治郎、长峰与一、森本是一郎、樋口勇雄、关和知、菊池良一、柏原文太郎共九名议员，组成九人委员会研议。

三日后（23日），关和知及四名人士另外提出《关于日中文化设施之建议案》：

> 关于日中文化设施之建议
>
> 日中两国文化，不仅过往有不可分离之关系，即对将来东洋民族之发展与进步，亦有极大之关系。故讲求两国国民思想教化上融洽协和之道，实为所谓日中亲善根本之义，亦为东亚百年大计之所在也。近来，我国对中国人教育之事业渐形衰退，两国国民亦疏离隔阂。故于此时，大力增强中国人教育之设施，努力诱掖邻邦国民之教化，实为帝国于东亚之责任，抑亦为帝国所以贡献于世界文明者也。政府应从速讲求相应之措施。谨建议如上。

这个建议案与三日前高桥本吉等的建议案同一旨趣，所以一并交付九人委员会研议。

3月26日，委员会主席头本元贞提交报告，上述两议案均无一人反对，故两案合为一案（高桥案稍有修正）处理，提出下列三项要求：

1. 对中国留日学生之教育及待遇，提供更便利之设施；
2. 日中两国合作于中国设立高等教育之设施；
3. 为促进在中国修习日语，应谋求适当之方法。

这个议案卒获无异议通过。

第43届国会中，由清水留三郎提议，小山松寿及其他33名议员和议的《关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之质询书》（1920年7月19日）

这样说：

来日之中华民国留学生归国之后，多成为排日论者，而留学美国之归国者却多成为亲美论者，对此现状，政府将采何种方针？

这是有感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排日风潮而起的质问。对此，政府的答辩书如下：

政府向来为中国留日学生之学习努力谋求种种便利，将来可望渐渐产生更多实效。

1920年7月24日

文部大臣　中桥德五郎

在第44届国会中，清水留三郎也得到30名议员的和议，提出的相同的质询(1921年2月9日)。今次的质询书除了加添总论之外，更提出如下三项问题：

1. 中国留日学生所以成为排日论者，乃因日本对华方针的不一致。

2. 美国在华设有机关，使美国官民与归国留学生能交流意见。

3. "日本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往往受到学校冷漠的对待、公寓管理人的剥削，以及一般日本人的轻慢侮辱，种下不平愤懑的种子。又因为接触中等以上的家庭的机会甚少，难以感到家庭的温暖。故在日本留学之际，既对日本抱有恶感，归国之后成为排日论者，自是当然之理。政府对此所采的方针为何？又今后的对策为何？

同月22日，由中桥文部大臣、内田外务大臣及床次内务大臣连署答辩，大意是政府向来都注意有关问题，今后官民双方更会致力改善。

在同届国会中，一宫房治郎亦提出《关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教育之建议案》(1921年3月24日呈上)，指出：

希望政府实行以下事项：

1. 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提供各种经济上援助。
2. 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开放各种学校的门户，不必计较烦琐呆板的规定，简化其入学手续。
3. 对专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而设、提供以日本语为主之中等程度的预备教育，其成绩昭著的私立学校，予以相当保护，充实其设备，以收完全教育的效果。
4. 我国文部省与中华民国教育部之间，曾协议每年派遣定额官费留日学生入学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千叶医学专门学校。此协议在1922年度将届期满。政府与中国当局，应坦诚交涉，订立永久之协定，且尽可能增加官费留日学生名额，又除上述四校以外，亦应订立广泛收容计划。
5. 应研究中国留日学生之实况，予以善导，使其了解我国真实国情，以达成原有之教育宗旨，使无感遗憾，故当设立中国留日学生教育调查会之类的机关，而以精通中国事情之朝野人士组织之。

一宫议员对此作了补充说明：

留日学生曾达数万之数，但有渐离我国而转向欧美的倾向，对号为睦邻之我国，实为一大可忧的现象。

他继续报告，美国正利用庚子赔款建立留美制度，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又积极活动，伦敦有开办中英大学的计划，法国亦就招收中国留法学生事，正与中国洽商之中。最后，他建议：

当然，极力赞助此等文化事业，民间的努力，固属必要；政府亦当有相当的设施，使该等学生安心留学于我国，或可更广招徕。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贡献，实为本案提出之理由也。

这个提案卒交专责委员会研议；主席坂上贞信于 3 月 26 日代表该委员会提出修正报告，获得通过。

第 45 届议会中，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校长松本龟次郎及其他六

名人士，因得议员一宫房治郎介绍，向国会提交《关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教育之请愿书》，在1922年3月14日获得国会接受。其要旨是“关于中国留日学生教育，政府开办相当之设施，实为必要。据一般之意见，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之教育费应列入预算之中，且应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之教育设施，予以改善。”〔以上引文据《大日本帝国议会志》〕

由于以上一连串的建议、质问和请愿，日华学会获得经营宿舍的补助(见本章十二节)，日本文部省将留日学生教育费列入预算之内，并设立了对华文化事业部。

1908年清朝驻日公使与日本文部省之间有“特约五校”之协定。据此，中国政府为每一名留日学生缴纳200日元至250日元委托费，作为各该校的教育经费。可是，这种例子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纵使国家经费非常困难，也没有不收委托费就不能办外国留学生教育事业的道理。从敦睦国际情谊的观点来看，更是说不过去。这样的议论当时甚盛，终于从1919至1920年间开始，日本谢绝中国方面的委托费，在文部省的预算内，拨出七至八万日元作为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经费。

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在1924年成立。这是由于第46届国会中，政府建议的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获得通过(1923年3月)而得以实现的。这机关利用庚子赔款资助下列事项：

1. 关于在中国应办之教育、学艺、卫生、救恤及其他发展文化之事业；
2. 对居留日本之中国人士推展前项所述之事业；
3. 在日本进行有关中国学术研究之事业。

其第二项，虽然日本政府决定对留日学生给予学费补助，可是留日学生表示一概拒绝。1923年6月26日，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言，认为这些补助，包藏日本文化侵略的祸心，故不能接受。当

时（7月）刊行的小册子《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关于排日问题之宣言》，这样说：

> 最近，中华民国对日经济绝交，励行排斥日货运动，以风起云涌之势，风靡四百余州，大有根本推翻日本在民国的经济地位的形势。日本朝野人士始以产业前途危机为念，一舍向来冷眼苦笑的态度，鸠首凝议，埋头研求对策。此岂非惨淡黑暗的中日邦交前途，流露一线光明，我们不禁欣幸。深盼值此机会，两国国民充分谅解，改善国交。并就排日风潮的因果关系及其对策，聊献一言，供日本人士参考。
>
> 排日的原因，决非如日本人所言，谓系英美所煽动，内政上的利用，或商业上不正当的竞争等等。即如我国人士屡屡宣言反对，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强横地限我国于1915年5月9日下午6时前签订二十一条。我国人对日本的强横无理，实深恶欲绝，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此只好采取消极的抵抗方法，进行排斥日货。其最后目的，在于促使日本反省，撤消二十一条。八年以来，卧薪尝胆，此志未渝。……
>
> 日本最近又抛出对华文化事业，图在昔日中日友好的招牌上涂抹新姿，满以为借此就可以责怪中国人忘恩和不友好，这又是个大错。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不容中国人参加意见，只为日本帝国利益打算，全不计及中国人本身的利益。这分明是日本在中国大陆上实施殖民政策的前驱或附属的事业而已。这是何等奇妙的现象！假使日本真要为中国人谋求利益，但同时在另一面却又用残忍苛酷的二十一条来迫中国人。这种做法，与在中元节赠物他人，而又夺取其家产以至宅地作为交换的情况，丝毫没有差异。象这样的恩惠或友好，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原引文过长，略有删节。——译者）

翌年四月，中国全国教育联合会退还庚子赔款事宜委员会等11个文化团体共同宣言，主张处理日本退还庚款的委员会中，中日两国应占有同数委员，委员长非由中国人充任不可，否则不能接受。当时又出现了两种意见，有人主张交由两国的教育团体来办，也有人主张委托中国的教育团体来办。又由于有人反对使用"对

支”二字，其后，日本政府删去了“对支”二字，决定成立“外务省文化事业部”。

种种事故之后，仅能达成对 320 名留日学生每人每月补助七十日元学费的协定。日本希望借庚款改善留日学生的对日感情，以及增加留日学生人数的愿望，却始终没有实现。

十四　抗日战争前的留日学生

民国以来，日本千方百计地侵略中国，留日学生备受刺激。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军阀挑起柳条沟事件；翌年 1 月 28 日，又制造了上海事变。这两事对留日学生的打击甚大，对东北四省的留日学生打击尤其重大。在九一八事件发生之际，百余名留日学生立刻返回天津，使座落于东京牛込区弁天町的驻日同泽俱乐部偌大的一座建筑物，一时空置无用。

其他省份的中国留日学生，也从 9 月 19 日起全部不返校上课。9 月 23 日，大冈山（关东大地震以后成为留学生密集之区）的东京工业大学的全体中国留日学生，首先决议一致归国。归国运动的浪潮随即波及高等师范和池袋的铁路教习所。这批学生返国后，即飞檄各地，宣传抗日运动。26 日，东京都内十七校的代表齐集于神田青年会馆，决定采取一致行动。29 日，大阪、京都、仙台、名古屋、长崎等地的留日学生也参加了集会，并组成了中华留日学会。为请求归国旅费，派出代表 130 名往东京麻布的中华民国驻日公使馆请愿，其后亦陆续多次提出强烈要求。中国教育部虽谕示留日学生：“此际宜顾虑学生之身分，自尊自重，安心向学。”但他们仍连日在东京青年会聚集，开会商议对策。

10 月 8 日，留日学生监督处发给部分留日学生归国船票。10 日，有 19 名留日学生返抵上海。12 日，15 日亦陆续有人归国，而

自备旅费返国者更络绎不绝。10 月底，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亦全体归国，机关刊物也停刊。

当时，陆军士官学校有中国留日学生近 300 名，在事变发生之时，竟无一人返校，首谋者遭退学处分。其他留日学生则群集青年会，表示不服从学校的命令，因而亦相继被饬令退学。他们就必须返还学校给他们的“受纳金”和借出物品的事，曾数度向留日陆军学生管理处和中国公使馆抗议，又在日本的官厅前举行示威。到10月杪，留日学生几全部返回中国，留下来的不过二十几人。他们归国时，亦拒乘日本的船只，象往常一样改搭他国的轮船。

新落成不久的成城学校留学生部，到了 10 月，课室和宿舍都空无一人。曾平静一时而专心学业的留日学生，又再因上海的战火，相率群聚于留学生监督处，请求发给归国旅费。监督处得教育部的指令，以预备金中的一万九千元充当归国旅费，支付 660 名学生每人二十至二十四日元。这次归国留学生的言行表现，不象沈阳事变时的激昂，只是一团一团的悄然踏上归国之途。

“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事变”使留日学生返国之势不可遏止，有人以为他们不会再返日本。但当上海的战火熄灭后，他们又零零星星地重回日本。回来的大抵回原来就读的学校复课(但须留级)，其中亦混杂了一些新来的学生。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在 1932 年 4 月时，中国学生不过七人，5 月有十三人，6 月十九人，9 月增至七十二人。成城学校留学生部，事变以来不能上课，到了 9 月才复校授课。

1933 年，留日学生人数日益增多。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在同年12月学生人数多至 1,059 名。①

1934 年，人数节节上升，仅仅 9 —10 月两个月间，初次赴日者

① 《东亚学校沿革概评》，见《日华学报》第 55 号。

就多达七、八百名。1935年秋，增势更惊人，仅初来者，估计亦有三千之谱。1935年9月，《留东新闻》第五期刊登的《留日学生突增二千人》一文说：

> 本报创刊之时(著者按：同年6月12日创刊)，曾经多方之调查，留日学生之总数，约四千五百人，已志本报。最近两月，由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出发渡日者，更突见增加。10日前，浅间丸由广州经香港、上海来日，传闻中国留日学生乘该船者多达396人，更有谓五百余人。同时，又据日方之消息，某日本汽船由天津经大连抵日本港口，同船实有华人六百余名。由此可以想见最近离国留日者之踊跃。同时，东亚学校一周之内招收新生达一千名左右(十九班)。故据本报之推测，本月底新旧留日学生当必在六千与六千五百之间。预料本年之内，中日之间，若无其他变化，又欧洲不致发生大战的话，接踵东来者，恐不难达一万之数。此种趋势，关系国家文化之前途，影响重大，望我政府当局，幸勿忽视此问题。①

事实虽非如想象中那么踊跃，但1935年11月末，显示有突破八千之势。1936及1937两年，通常都有五至六千留日学生。这是继1905至1906年、1913至1914年以来的第三次留日隆盛时期。事变后，中国学生再次大批来日，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两三年持续时期，这是甚么原因促成的呢？

主要原因是中国兴起“日本研究热”以及货币汇率对中国有利所致。“九一八事变”以来，各方对日本的注意忽然加强了，其他亚洲诸国及远在西洋的国家均派学生留学日本，② 因而“日本语热”一时成为世界性趋势。

米村耿二所写的《日本语万岁！》一文，刊于1934年12月28

---

① 见《留东新闻》第5期(1935年9月)。

② “九一八事变”以后，印度、缅甸、暹罗等亚洲国家亦派学生留学日本。同时，出生于美国的日裔侨民子弟留日人数亦多，甚至欧洲某国亦派学生留日。为他们提供预备教育的早稻田国际学院因而诞生。

日的《读卖新闻》，说：

> 学日语！学日语！若说举世之中，研究日本的热潮正处蓬勃之际，亦非过言。
>
> 特别是自"新兴满洲国"诞生以来，而以华北停战协定之缔订为转机，中国年青人掀起学习日语的狂热，的确是教人惊喜的事。
>
> "先学好日语，读通日文书，才好谈论中日问题！"，这是最近中国年青人的呼声。
>
> 现在，"教授日语"的广告在上海有增无已。同时，曾经雷厉风行的抵制日货浪潮，似亦一去不复返。约值三百万圆那么大量的日文书籍，光是上海一地，在一年间就能销售净尽。——这是上海四川路日本书店店主内山氏所说的话，不会有错。……
>
> 学日语！去日本！去日本！学日语！这种呼声响遍全中国。
>
> 今年以来，中日关系逐渐恢复正常状态。曾高唱抗日救国的中国，特别是以彻底排日而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亦迅速抹掉排日的色彩而转为亲日。今年四月，清华大学派出学生访日团一行七十余人，由日语主任讲师钱稻孙率领，出发访日。又，中国首都南京市政府选派熊冲氏等12名中学校长联袂来日考察教育文化，此事已见前报。
>
> 然而，最能如实反映这新趋向的，是群集我国为学日语而来的留日学生。今春四月，新学年开始以前，据警视厅外事部亚洲科的调查，中华民国学生有1,200名，"满洲国"学生有300名，早已突破事变前1,403名的纪录。四月底，此数将更见激增，形势大好，仿佛明治末年(1905—1911)中国学生留日全盛时代的再现。秋季以后，他们更将蜂涌而至。……

学习日语热潮的高涨，与上面提到的"新兴满洲国"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相信是为了"抗日救国"而需要深入了解日本，这可从当时中国报纸杂志的舆论看出来。

留日学生数目增减的原因，除与思想变化有关之外，亦与经济有关。1930年代留日学生的激增，中国货币对日元汇价的大幅上

扬(金价下落，银价上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1926年以后，中国银元对日元汇率的变动如下表① 所示，

中国(银元) 100 元对日本(金元)换算表

年月	日元	年月	日元	年月	日元	年月	日元	年月	日元	年月	日元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	123	1	93	1	99	1	102	1	74	1	46
2	118	2	94	2	97	2	99	2	72	2	42
3	117	3	90	3	97	3	102	3	69	3	46
4	110	4	93	4	95	4	99	4	69	4	46
5	112	5	96	5	103	5	97	5	67	5	44
6	112	6	99	6	103	6	96	6	54	6	44
7	112	7	95	7	103	7	93	7	54	7	46
8	105	8	94	8	104	8	90	8	56	8	44
9	102	9	94	9	102	9	87	9	58	9	46
10	90	10	95	10	100	10	84	10	57	10	48
11	87	11	99	11	99	11	81	11	56	11	51
12	87	12	101	12	99	12	79	12	52	12	49
年月	日元	年月	日元	年月	日元	年月	日元	年月	日元	年月	日元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	69	1	98	1	115	1	125	1	105	1	105
2	…	2	98	2	117	2	130	2	105	2	105
3	79	3	100	3	117	3	139	3	105	3	105
4	73	4	97	4	115	4	140	4	105	4	105
5	72	5	103	5	109	5	146	5	104	5	104
6	74	6	102	6	112	6	142	6	104	6	104
7	81	7	103	7	115	7	136	7	104	7	103
8	93	8	101	8	117	8	128	8	104		
9	97	9	109	9	121	9	132	9	104		
10	95	10	107	10	123	10	128	10	104		
11	105	11	109	11	117	11	105	11	105		
12	99	12	110	12	120	12	105	12	104		

据上表，1926 年以后，银价一直下跌。到 1931 年 2 月，跌至银元

① 1926年1月起至1936年6月止的统计数字，是据大藏省理财局的《金融事项参考书》；其后的数字则据《东洋经济年鉴》。个位以下的计算用四舍五入法。

100 元换 42 日元。但其后银价回升；1935 年 5 月，银元 100 元换 146 日元，为 1931 年银元最低价时的三倍半。因此在中国国内"游学"远不及国外"留学"便宜。

1934 年 11 月 5 日的《申报》刊登《留日学生激增——汇兑低落最大原因》一文，说道：

> 中华民国负笈东渡留学之学生数目，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原已渐见锐减。唯去年秋季，陆续东渡者，则颇不乏人。至今春以来，其人数忽倍增。尤以九、十月间，中国与东北地区之留日学生一举而增加千人，实为近年来之新纪录。将来尚有激增之势。但究其东渡留学之理由，盖前因九一八事变之关系一时未便东渡，而近顷则中日感情已渐趋和缓之故。唯最大之理由，实为汇兑之关系。二、三年前，日币一百元须以中国国币二至三百元方能兑换，最近则可以七十至八十元兑日币百元。其差甚远，故在上海攻读，反不如东渡留学为合算，盖较之二、三年前，消费力减少三倍之故。

留日学生人数的激增，势必带来了留日学生教育界或以留日学生为对象的事务上的变化。据《东亚学校沿革概评》所述，1935 年秋，东亚学校竟到了"由于学生激增，12 月多达 1,980 人，为创校以来的最高纪录，校舍诸般设备均告不足，遂不得已停止办理入学申请"的状况。从本年起，东亚学校和成城学校都开设夜校班，最能反映留日学生的泛滥。

东亚学校所拒收的学生到了哪里去？原来类似私塾的学校应运而生。当时，在东京地区类似私塾和补习班的学校，主要有：

（校　名）	（开设日期）	（所　在　地）	（教　师）
大黄学舍		淀桥区户冢町 3 丁目935	秦义雄
经纶学社日语科	4 月13日	丰岛区日白町 3 丁目 3630	社长二宫崎龙介以及教师七名

日本语补习短期讲习会		淀桥区柏木3丁目360，外语学院	麻宮正吾等二人
东京基督教青年会日语讲习会		神田区美土代町7	大岛让次
日语学会		中野区新井町600	大堀良之助
大东日语学院	4月4日	中野区上，原町16，9月起迁至神田区神保町	彭子栋
大捷日本文法讲习会		神田区三崎町，三崎英语学校二楼	汪大捷
日语与华语社		杉并区高丹寺7丁目894	野野村正雄
文渊日语补习学院		神田区一ツ桥2丁目3，中央佛教会馆内	陈文渊
玉泉日语补习学院		神田区一ツ桥2丁目3中央佛教会馆内	于玉泉等二人
伯轩日语学院		神田区三崎町1丁目1	程伯轩
中华日语学院		神田区西神田2丁目10番地16	刘　霖
东方学院		中野区宫阔通3丁目39	橘光三等五人（有宿舍设备）
专修大学日语科		神田区神保町3丁目8，专修大学内	井田启胜等日本讲师五名，中国讲师数名
日本大学日语学科专修讲座		神田区三崎町，日本大学内	七里重惠等六人
法政大学日语科		麹町区富士见町，法政大学内	陈清金等二人
亚细亚语学校	1934年1月	神田区一ツ桥通，救世军内	松浦珪三
东亚日语学院	1934年秋	神田区三崎町1丁目7	好村春基等八人

早稻田日语学院	昭和10年10月	淀桥区户冢町1丁目543	院长小山一雄，主任教授施文藩，及讲师六名

这些学校值得注意的是：除由日本人开办之外，也有由中国人开办的；后者较前者更受中国留日学生欢迎。

这些学校大都设在中野区和杉并区，因为从这些地区去东京市中心比较方便。自从1923年震灾后，留学生密集地带已渐渐由大冈山方面向中央线沿线移动。

这些学校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乃至有关学习日语的一切书籍，其需求量均大为增加。这些书籍不单广泛地为留日学生所用，而且成为中国国内关心日本问题人士的自学用书。故此，有关日语书刊的出版事业，空前隆盛。民国以后，留日学生几乎都用松本龟次郎的著作为教科书，[①] 可是，其他中日人士在这方面的新作亦多。同时，在日语学校的中国教师，为数已远在日人之上，而且在编著日语读本的竞赛中，中国人亦占优势。

---

① 今按松本龟次郎著作的出版先后排列如下，并注明至1935年1月为止所见的重版次数。

（书　名）	（初版发行年）	（重版数）
汉译日本文典	1904年	39版
日本语教科书	1906年	12版
日本语会话教科书	1914年	14版
日本口语文法教科书	1919年	11版
译解日语肯綮大全	1934年	3版

1934年以来新出版之日语书籍目录

(发行年月)	(书　名)	(著　者)	(出版者)	(页数)
1934年7月	(译解)日语肯綮大全	松本龟次郎	东京，有邻书屋	422
1934年9月	日华对照日语助动词助词使用法	许达年	上海，世界书局	189
1934年10月	(速成)日语辑要	渡俊治	东京，尚文堂	397
1935年2月	日语公式成句熟语详解	程伯轩	东京，成光堂	248
1935年3月	国语详解日本口语文法	王玉泉	东京，冈崎屋书店	491
1935年3月	现代日本语法大全(运用编)	张我军	北平，人人书店	248
1935年7月	自他动词对照集	程伯轩	东京，成光堂	74
1935年8月	日语公式成句熟语详解(2)	程伯轩	东京，成光堂	266
1935年8月	日语公式成句熟语详解(3)	程伯轩	东京，成光堂	255
1935年9月	日语华译公式	王玉泉	东京，冈崎屋书店	107
1935年9月	现代日本语日英对译文法及教材		东京，文求堂	202
1935年10月	(最近)实用日语会话大全	王玉泉	东京，中央佛教学苑出版部	447
1935年10月	(活用)日华会话	苏登熙	东京，三省堂	116
1935年12月	中日对照日本语助词研究	叶树芳	东京，笹川书店	185
1936年3月	易解易记日本文言文法	程伯轩	东京，成光堂	287
1936年3月	日本语文文化研究丛书(文艺之一)	井田启胜	东京，东方文化出版社	32
1936年4月	中日对照日语读本	永持德一	北平，东亚公司	376
1936年4月	日汉对照日本口语文法大全	井川恒郎，山下克己，王世法	东京，弘学社	162

1936年5月	高级自习对照日文报纸译读法	罗西	东京，风文书院	322
1936年5月	文语口语对照现代日本语文法	松浦珪三	东京，文求堂	501
1936年5月	第二日语华译公式	王玉泉	东京，日文研究社	
1936年6月	现代日语会话	吴主惠	东京，文求堂	220
1936年7月	（标准）日文自习讲座（前期第2册）	张我军	北平，人人书店	302
1936年7月	（现代）日本语会话全书	橘光三	东京，外语学院出版部	479
1936年7月	日语大文典	曾野一路	东京，学艺社	1217
1936年8月	日语法化读本	俞明著 大冈延时校正	内山书店经售	103
1936年9月	文法中心现代日文综合读本	谢求生	广州，日文专修馆	448
1936年9月	国语详解日本文语文法	王玉泉	东京，冈崎屋书店	402
1936年9月	国语注解日本语基础读本	郭衡宾	上海，中华日语学会	458
1936年11月	英文法比较研究日本语法精解	洪炎秋	北平，人人书店	584
1937年2月	自修适用日语混合读本	袁文彰	上海，生活书店	103

和这些单行本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学习日语用的期刊出现了。用中文编刊日语研究的杂志，是前所未见的；现在，一共出版了七种之多。虽然杂志的寿命长短有异，但足证当时的研习日语风气鼎盛。

日语研究杂志目录

（创刊年月）	（杂志名称）	（出版者）
1934年1月	日文与日语	北平，人人书店
1934年	（现代）日语研究杂志	上海，生活书店

1935年7月	日文研究	东京，本社
1935年7月	日语月刊	上海，东方日文学校
1936年5月	中日文化	东京，成光堂
1936年6月	东文杂志	东京，本社
1937年	中华日语月刊	上海，本社

可是，在另一面，中日关系正日益紧张。从"满洲国"到长城以南，从"河北自治运动"到"冀东政府"，从"冀东政府"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日本军阀侵略的魔掌，一着一着地向前伸，毫无止境。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后，蒋介石也不得不下定决心全面抗日。

留日学生也通过新闻杂志等从事抗日活动，而且常常受到日本官宪的追缉。学习日语热潮和抗日运动也结合在一起。

随着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中日两国展开了全面战争。中国驻日大使馆和留日学生监督处关闭，留日学生全体归国，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遂告一段落。

十五　留学日本的毕业生

留日学生毕业人数

中国留日学生完成日语和普通学科课程后，更进一步入大学或专门学校，与日本学生并肩学习而学成毕业者，究竟有多少人呢？现据1940年10月兴亚院编《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一书的11个附表，综合统计之后，制成《历年毕业于日本各校之中国留学生人数一览表》。（见下页）

《人名调》原书本来也有毕业生人数的统计，合共12,143名。但核算之下，发现五处错误。订正后得出确数为11,966人（平均每年307人弱），比原书所载少177名。

历年毕业于日本各校之中国留学生人数一览表

学校＼年度	一九〇一年	一九〇二年	一九〇三年	一九〇四年	一九〇五年	一九〇六年	一九〇七年	一九〇八年	一九〇九年	一九一〇年	一九一一年	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三年
东京帝大						1				1	2	9	5
京都帝大						1			2	2		1	
东北帝大													
九州帝大													
北海道帝大						2	6	3	1	2	1	2	2
大阪帝大						4	5	5	8	12	9	2	3
名古屋帝大									1		5		
台北帝大													
第一高等学校		1	1			2	7	15	46	16	47	13	27
第二高等学校								1	4			6	
第三高等学校							1	1		2	1	2	4
第四高等学校												1	2
第五高等学校									1	2			4
第六高等学校									4	3	4		3
第七高等学校									1	2			1
第八高等学校												1	4
高校4校													
教育4校								4	3	8	18	14	5
工业18校				4	3	1	8	5	22	32	26	26	35
商业9校			2		3	1		15	9	16	20	17	15
医学23校					3		4	9	6	11	19	4	15
农业11校	1	3	1	2		5	4	4	10	13	15	20	11
早稻田大学		1	2	4	1	12	6	228	96	209	98	32	58
庆应大学												1	1
明治大学							11	51	27	131	152	60	131
法政大学													
中央大学				4	2	1	1	7	38	36	36	21	25
日本大学							2	13	44	65	55	22	60
私大6校										2		1	
陆海军21校	39	25		93				254		74	174	1	
艺术7校											3	1	2
女子14校				2		12	2	5	13	13	6	3	3
合计	40	30	6	109	15	42	57	623	536	682	691	260	416

（续表）

学校＼年度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东京帝大	3	7	10	18	12	10	13	12	15	13	23	16
京都帝大	1	5	4	3	3	6	10	9	19	12	15	18
东北帝大					2				3	2	1	1
九州帝大			1	1	2	5	1	2	3	9	3	4
北海道帝大	1	1	1	1	1				1	2	7	8
大阪帝大	12	9	15	13	5	9	12	5	7	4	5	4
名古屋帝大	5	8	7	5	2	1	5	1	4	3		
台北帝大												5
第一高等学校	35	52	49	39	48	48	49	54	46	46	26	18
第二高等学校	2	7	1	2	6	7	5	4	6	6	3	6
第三高等学校		2	4	1	9	4	3	6	11		4	2
第四高等学校		3	2	1		4	5	7	3	2	1	2
第五高等学校	4	5	2	1	3	9	2	6	8		4	8
第六高等学校	4	1	2	3	3	7	1	6	6	11	10	5
第七高等学校	3	3	3	2		3	5	2	4	6	10	
第八高等学校		4	1	4	2	9	3	3	6	5	11	5
高校4校									1	2	3	4
教育4校	13	26	12	14	5	16	23	20	18	27	35	38
工业18校	38	50	37	32	40	46	34	51	61	52	57	46
商业9校	21	4	6	3	9	10	10	15	10	6	12	18
医学23校	17	35	20	17	22	28	18	15	23	21	19	18
农业11校	9	12	10	4	14	10	7	14	17	17	12	10
早稻田大学	10	13	39	21	27	15	43	22	53	30	30	18
庆应大学	3		1	3	1	6	1			6	11	11
明治大学	64	73	52	29	27	39	71	61	69	61	63	25
法政大学												
中央大学	14	18	27	16	9	13	3	8	1	1		1
日本大学	56	36	71	60	31	39	72	109	79	36	20	24
私大6校								1			1	3
陆海军21校	44	33	22	7	17	51	13	28	28	21	39	17
艺术7校	4	7		6	4	1	3	3	2	2	4	2
女子14校	3	6	1	5	10	9	3	1	1	10	2	10
合计	366	420	400	311	314	405	415	465	505	413	431	347

（续表）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卒业年不明	合计
13	18	13	16	4	4	4	2				3	1	1		249
14	15	20	21	11	14	3	4	6	3	9	13	6	4	1	255
	4	4	3	1	4	3	2	3	3	9	3	1	1	6	56
3	13	11	17	7	8	5	2	4	5	2	5	1			114
8	6	2	5	1	1	1	1				1				68
2	1		2	4	1		1	3		3					165
	4	6	1	1								1			60
														28	33
15	8	10	16	7	14	19	3	3	10	19	11	14	8		872
3	1	1				1	3								75
4	2	1	1		4	1		2	1	1					71
1						1									35
8	2	2		1											72
7	6	4	2												92
3	2	1	1			2	1	1							56
10	6	1	2	5	1		2	4	1	1					91
2	1	1	2	2											18
30	29	17	15	13	20	21	12	17	21	14	9	1	2		520
57	32	14	19	27	21	10	9	9	23	21	21	5	5		979
13	10	17	7	8	14	6	4	10	6	3	9	10	3		342
6	4	6	7	1	5	9	13	11	7	4	9	1	6	1	414
9	11	6	12	9	11	3	7	3	1	10	12	6		8	333
17	15	12	9	20	28	23	19	13	7	19	18	8	4		1383
	13	8	7	6	6	7	2	3	3				1		101
24	22	21	23	33	55	71	42	44	27	87	26	6	3		1787
		2	2	3	9	15	18	7	9	13	25	9	6		118
					1	1	11	13	15	53	3				379
18	23	21	20	20	13									2	1011
3	1				1	5	4	2	4	7	6			14	55
6	28	57	202	166	218	58	14	23	54	24	14		21		1865
3	3	2		2		1	2	1	4	5	2			3	72
8	11	3	5	11	7	10	4	4	4	12	12	2	1	8	222
287	291	266	417	363	460	280	182	186	208	316	202	72	66	71	11966

原书各表是据政府各机关委托各校调查的结果编制的，资料应当相当正确。不过，原书凡例说："本名簿原则上不著录满洲人，以及有海陆军身份与中华民国国籍不明者。"因此，中国东北各省（满洲）的毕业生大部分被遗漏了。又根据原书《按省别毕业于各学校之中国学生一览表》的备考，知道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的数字并不包括实用农学科的毕业生，北海道帝国大学则不包括水产专门部的毕业生，法政大学亦不包括 1928 年以前的毕业生，而日本大学则欠缺 1932 年以后的数字。又该书编纂时（1940 年）已停办的学校，其毕业生人数一概被省略。例如，宏文学院至 1909 年止，有毕业生 3,810 人，该表并无记载。因此，留日毕业生实际数字当远比该表所列为高。

与中国留日学生有关系的五个表

为了综合本章提及的有关资料，特择其重要者制成《有关中国留日学生的五个统计表》，作为本书附录（见本书附录三），今先作一些说明。

1. 留日学生数

这个表是综合本书第二章一至十四节所述各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虚线表示人数不明，有括号的数字表示约数，无括号的数字表示实数。

2. 留日学生毕业人数

这个表据本书第二章第十五节的《历年毕业于日本各校之中国留学生人数》统计表的资料制成；为了配合其他各表体例，略去1938年以后的数字。

3. 东游日记数

东游日记是指中国人的日本游记。甲午战争（1894—1895）以后，中国人的日本游记多少与留日学生有关系。这些游记或为考

察日本学务的记录，或为护送留学生赴日的记录，或为平息留日学生运动与风潮的记录，甚或为留日学生个人的日记等。因此，东游日记是研究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重要资料。东游日记出版数量较多的时候，正是留日学生人数较多之期，可见其与留日史的关系。所据资料主要是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实藤文库”的藏本，网罗虽不完全，但亦可观其大势。

4. 学习日语用书数

日语教科书、自修用书、辞典、文法书，以及日文字母的习字帖等，其数量与留日学生人数关系之深，固不待言。资料根据“实藤文库”藏本。虽网罗不全，但大势可窥。

5. 中国译日文书出版数

译书是留学日本的重要成果之一，本书第五、第六及第七章将详细论述。本表是整理拙编《中译日文书目录》（东京，1945年）而制成的。本表所收书数较《目录》为少，原因是后者著录了一批出版年份不明的书，而本表不能加入计算。如果连那批出版年月不明的译书也一起计算，本表可靠性就会大打折扣。由于出版年份明确的译书，大部分是从北平图书馆藏书目录卡片查检得来，另一部分则是作者的收藏，故多年出版译书数目的准确性应该不成大问题；也就是说，本表似可按年反映译书数量的波动。

从表1和表2来观察在校学生与毕业生的关系，我们会发觉毕业生曲线的波峰比在校学生曲线的波峰迟现三年。举例来说，在校学生数字在1905年出现了高峰，毕业生数字的高峰则迟三年，即在1908年才出现。

留日学生人数与毕业生人数的比例如何呢？1905年有8,000名留日学生，其中1,300名在1904年已经入学，那么6,700名是新来的，而且当中有不少人只读半年或一年便回国。尽管如此，正式读满三年而在1908年毕业于大学或专门学校的学生有623名，故

留日学生人数与毕业生人数的比例为10:1。

关于1927至1937年间在校学生人数，日华学会做了精确的调查。11年间，在校学生每年的平均数是3,344名，而毕业生的平均数是288名，即毕业生是在校学生的8.6%。此时的留学生一般多先学日语半年至一年，然后入大学攻读三年而毕业，即共需时四年；第四年将要毕业的留日学生，应该占全体在校学生人数的25%，但现在实际毕业人数只占8.6%，亦即是约有三分之一人毕业。相反来看，在大学或专门学校就读的留日学生是毕业生人数的三倍。那么，该有相当于毕业生人数两倍的留学生，或转到短期学校肄业，或中途退学返国。

据兴亚院的调查，毕业生总数为11,966名，其三倍应是35,898名。但正如前述，在校学生总数应该加上来自中国东北各地的学生和曾肄业于宏文学院及其他已停办的学校的学生①。又，民国前留日学生的流动率甚高，即以半年或更短时间，获得一纸留学证书的人为数当不少。如果把这些情况一并考虑的话，则中国留日学生总数，至少应有五万人。不过，这是保守的估计。据一般报导，留日学生的总数向来远比这个数字为高。民国以后专门从事留日学生工作的日华学会，在其编印的《日华学会二十年史》(1939年)中，有这样的说法：

> 四十年间，中国青年学生来日留学者无虑十万人。②

1955年12月8日，郭沫若在早稻田大学讲演《中日文化之交流》时，说：

---

① 大槻智雄：《中国留学生状况》，见《草原》第4号(法政大学中国研究新编，1959年1月)。法政大学在1927年及以前的毕业生人数是：专门部803名，大学部102名，速成科1,070名，及其他96名，合计2,071名。

② 《留日学生の动势》，见《日华学会二十年史》(1939年)，页9。

中国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时间一度曾多达两万名。自1896年以来，数十年间，虽然没有精确统计，我推测恐怕前后应有三十万人。①

三十万人这个数字似是每年在日留学人数累加的总和，实际在学的留学生数目应该只有总和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留日学生即使只有五万人，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数目。举世之中，能够送出或接受这么多留学生的国家，似乎都是前所未见的。

上文仅就留日学生数量而言，今进一步论述其质素。要说明这点，似需与留学日本以外国家的情况作一比较。今请看中国人留学西洋的大略。

中国人留学西洋

1. 赴美留学

广东人容闳就读澳门莫礼逊学校后，1846年随同乃师布朗牧师(Rev. S. R. Brown)到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其后容氏说服曾国藩派人留学外洋，从1872年开始，以后每隔四年派出幼童三十名赴美留学，学生年龄12至16岁不等，留学期间为十五年，他们留学期间一面要学西学，同时亦习汉学。可是，当吴惠善担任留美学生监督时，由于留美学生不行跪拜之礼，吴氏认为这些人甫离故国，便数典忘祖，于是命令他们返国。其中有十人已娶西洋妇女为妻，没有随队归国。这120名留美学生之中，日后成名的只有唐绍仪一人而已。

从此以后，长期间没有派人到美国留学。到1908年，因为美国归还庚子赔款一千多万元，中国遂恢复派遣留美学生。当时在中国国内，设立清华学校(其后的清华大学)作为留学预备校，其毕

① 早稻田大学科外讲演部编集《高远》1，页43。

业生多被派到美国深造。至1929年止，前后共派出1900余名。留美学生返国后发挥了很大作用，因此自费生也随之而增加。1910年，留美学生650名中，有443名是自费生①；1924年，1637名留美学生中，自费生占1075名。②自费生大部分是半工半读的学生。

2.赴法留学

1875年，福建造船厂总理沈葆桢，委托曾任该厂监督的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 1835—86），趁任满返国的时候，带中国学生数人赴法学海军。其后，连象这样性质的遣派工作也没有续办。

1912年，由吴敬恒、汪精卫、李石曾等组成留法俭学会，1915年蔡元培等组成勤工俭学会，大力鼓吹留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雇用了5000名中国工人，战争结束以后，法国劳工需求仍殷。因此，李石曾在法国组织了华法教育会，辅导留法学生找兼职。1920年，半工半读的留法学生有一千人左右；并且在里昂成立了中法大学。不久，由于法国物价腾贵，生活转艰，很多人被迫返国。留法学生之中，出了朱德和周恩来等人物。

中国人赴英，赴德留学，都自1876年开始，以研学军事为目标。其后，似无特别发展。

3.赴苏留学

1924年，孙中山采行容共政策，同年2月派蒋介石赴莫斯科研究军事。蒋氏留苏五个月，回国后创建黄埔军校。

1925年，国民党在莫斯科为留苏学生创办中山大学。1927年，国共分裂，留学孙逸仙大学的学生纷纷归国。

---

① 《留美学生年报》第一期（1910年）。

② 据民国13年（1924年）留美学生联合会所编的《留美学生录》，转引自《近代中国留学史》，页136，注(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以后，苏联一度成为中国大陆学生最大的留学国。不过，这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1931年度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留学各国的学生人数如下（仅包括获得中国教育部留学证书者）：

1931年度留学生国别表

（留学国）	（公费学生）	（私费学生）	（合计）
日本	7	296	303
美国	22	124	146
法国	4	134	138
德国	10	57	67
比利时	0	34	34
英国	9	19	28
意大利	0	3	3
瑞典	0	3	3
丹麦	0	2	2
荷兰	0	1	1
瑞士	1	0	1
澳洲	0	1	1
印度	0	1	1
总计	53	675	728

这一年，留学日本的人数是303名；但据日华学会在同年5月调查的报告是2,972名。同年9月18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留日学生大量归国；如果中国《教育年鉴》的数字是表示9月以后的情况，则大致可信。

又据中国教育部在1935年发表的《出国留学生之年度别统计》①，得出最近6年间赴日本及日本以外国家留学的人数为：

---

① 据1935年10月28日《申报》。

(年度)	(日本)	(日本以外)	(合计)
1929	1,025	632	1,657
1930	590	440	1030
1931	83	367	450
1932	227	349	576
1933	219	402	621
1934	347	512	859

这些数字包括公费及自费学生。我们注意到：教育部所发表的统计数字，前后差异很大。尽管如此，两种资料都显示：即使在抗日战争前夕，在众多留学国家中，日本依然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归国后的活动

关于留日学生归国后的活动情况，据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编纂、东亚同文会发行的《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国人名鉴》(1932年版)，在中国政府中担任显要职务，包括政府主席、政府委员、五院院长、五院副院长等，合计 45 名，其学历如下：

日本留学	18
美国留学	6
英国留学	1
法国留学	1
德国留学	1
日本及西洋留学	4
没有留学	14

小岛友于编《现代中国著作家》(1937年，满铁产业调查资料第22编)，录载 322 名作家的学历如下：

日本留学	57
美国留学	48

法国留学	20
俄国留学	12
英国留学	6
德国留学	6
比利时留学	2
日本和西洋留学	2
西洋诸国留学	2
没有留学	167

顾凤城编《中外文学家辞典》(1934年，订正3版) 所录现代作家217名的学历是：

日本留学	39
美国留学	12
法国留学	8
俄国留学	12
英国留学	6
德国留学	6
比利时留学	2
日本及西洋留学	2
西洋诸国留学	2
没有留学	167

上述资料都显示：直至二次世界大战为止，留日归国学生在中国社会各界中都非常活跃。

曾经留学日本的政治家，如周恩来、吴玉章、沈钧儒、黄炎培、林伯渠、董必武、程潜、何香凝、廖承志、陈叔通等。学者或文学家如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成仿吾、周扬、夏衍、艾思奇等，都为中国作出贡献。

在留日学生中，有不少人为创建新中国而贡献一生，也有不少人因为"亲日"而背叛国家民族利益，成为汉奸。① 今按学校略举数

例如下：

东京帝国大学：包括在留日时写过《日本游学指南》、曾是留日学界活动的要角、在五四时代被攻击的章宗祥（法科），创造社成员郁达夫（经济科）、张资平（地质学科）、成仿吾（造兵科）、穆木天，历史学家王桐龄和王信忠，1930年代推动"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曾任汪伪政权考试院院长的江亢虎等。

早稻田大学：包括最早的留日学生唐宝锷，农商总长金邦平，内阁总理宋教仁、国民党西山派的张继、驻日公使汪荣宝、五四运动时被攻击的陆宗舆、司法总长及驻日留学生监督江庸、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五四时代热心于文字改革的国学大家钱玄同、汪伪政权的驻日公使蔡培，文学研究者谢六逸、陈望道等。

法政大学：在梅谦次郎博士指导下的速成科学生多有俊逸之才，包括政坛人物汪兆铭、居正、胡汉民、戴天仇、廖仲恺、王揖唐、沈钧儒、陈叔通、董必武等，以及文学家如周作人（也曾在立教大学攻读）等。

明治大学：包括五四时代的政论家高一涵、戏剧大家欧阳予倩（很多名人录说他出身早大，他本人说只是自习了早大的文科讲义录，出身应是明治大学的商科）等。

陆军士官学校：包括蒋介石、阎锡山、何应钦、张群、蒋作宾等；中国军阀大部分属士官学校出身。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包括《新青年》的主笔陈独秀，鲁迅的友人许寿裳，剧作家田汉，新文学运动早期的作家徐祖正等。

弘文学院：包括成城学校事件的首领、其后成为国民党元老的吴敬恒（稚晖）、抗日战争中任重庆政府内政部长的周钟岳等。

---

① 由于汉奸对其祖国不忠，对世界情势认识不足，错误地走上中国人所不耻的路，备受责难惩处是当然的事。作为日本人，在对他们非难的同时，也必须自觉到，促使他们当汉奸，日本亦负有相当责任。

此外，从第一高等学校毕业的有做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的殷汝耕，“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王荫泰；东京美术学校出身的有何香凝、汪亚尘；九州帝大出身的有郭沫若；九州明治专门学校出身的有夏衍、艾思奇；第七高等学校出身的有汪伪政权的周佛海；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出身的有曾任北大校长和教育部长的章士钊；中央大学出身的有在五四运动中被攻击的曹汝霖；第八高等学校出身的有创造社的成员冯乃超；第三高等学校出身的有文法学者杨树达等。

以上所举，只作例子而已。尚有很多重要人物，未能尽录。

第三章　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

一　一个留学生的日记

为数约五万人的留日学生，他们的留学生活一定是多彩多姿的吧！假如能够仔细地看到其中一二人的留学生活的话，我们就可以约略推知中国留学生生活的实情。我们很幸运能见到湖南人黄尊三所刊行的四册《三十年日记》。黄氏在留日最盛期赴日，渡过了长达八年的留学生活。黄氏的日记，从出发留学日本之日记起，一直到辞去民国大学总务长职务为止，三十年间，从无间断。该书第一册题作《留学日记》，共有四百页之多，据此可以窥见其留学生活的实况。

清光绪31年(1905)，湖南巡抚端方选拔了高等学堂及师范学堂的学生约六十名，以官费派往日本留学。黄尊三是高等学堂的甲班生，得以入选。①

4月10日是六十名留学生出发的日子。天阴下雨，上午各人收拾行李，每人只限带行李两件。下午一点钟，由护送官马邻翼带领，留学生二十余人分乘篷轿，离开长沙高等学堂，到小西门改乘江轮。当时大雨倾盆，衣服行李尽湿，留学生以为天雨正为他们送行，故兴致勃然。他们登船时，同行者有杨庄等五名女学生，年龄在二十岁上下，活泼娴雅，并无畏缩娇羞之态。

① 以下是作者据黄尊三：《留学日记》，夹叙夹引，介绍黄氏留学生活中的经历；所记月日，俱为阴历。——译者注

翌日早上4时，船开行，下午3时抵岳州，由于马上又要航行，留学生一行人连登临岳阳楼观赏的时间也没有，只能在船上饱览风景，并练习日语。

12日上午8时，一行人至武昌。得湖南中学堂（为旅鄂的湘人弟子而设）监督顾诚的款接，下榻中学堂。

两湖总督张之洞拟接见留学生一行人，惟要留学生行跪见之礼，留学生皆不愿，虽经马邻翼及顾诚劝说仍无效。张之洞勃然大怒，下令不放行。他们不得已暂居中学堂，静待解决。

端方与张之洞二人，电报往来。端方同时亦致电留学生，警告他们如果对张之洞无礼的话，会取消遣派他们留学的资格。留学生都表示非常愤慨，扬言如要牺牲人格的话，那么就不留学好了。

> 4月20日，是日天阴雨，自十号由湘出发，至今十天，为此无谓之事，阻滞中途，不能进行，光阴虚掷，未免可惜。中国大官，只顾一己虚荣，不知尊重他人人格，实属可鄙。以自命好士之张香涛，尚不免此辱人之行，他更无论，思至此又未免可慨。①

经过一干人等多方斡旋，双方终于接受了行鞠躬之礼。到了23日接见之日，张之洞随从甚众，护卫甚严，如临大敌。张设西餐宴全体留学生，并赠送各人《劝学篇》及《钦定学堂章程》等书各一部。是日下午3点钟下长江。

24日，过九江、安庆、大通。25日，经南京、镇江，26日11时抵上海。由于日俄战事尚未结束，因海上危险而不能航行。

他们抵上海后第十四日，终于等到了有船去日本；可是又因买不到船票，不能登船。滞留在上海的日子，黄氏一面看《红楼梦》、《随园诗话》，一面练习日语。他初看日语时，似觉甚容易，但认真

---

① 黄尊三：《留学日记》，页4。

学起来，却感到很困难。他表示到东京后，要好好地研究学习。

5月14日，13名由长沙往日本留学的女学生也到了，亦在黄氏一行所住的长春栈投宿。16日下午2时，黄氏一行乘坐雄本丸〔熊本丸?〕离开上海。18日上午九时到长崎。19日下午1时到门司，21日下午5时到神户。留学生中也有些在神户下船，改乘火车去东京的，黄氏则买了到横滨的船票，继续乘船。22日上午7时，从神户出发，23日下午6时，抵横滨。

> 5月24日，上午8点钟下轮，乘小艇，未抵岸，大雨时至，衣服尽湿，10时登岸，至高野屋稍休，用饭。日本饮食，颇简单，人各分食一菜一汤，味极淡薄。食毕，由招待员萧君立诚，导乘火车。下午6点钟开车，7点抵京桥车站。再乘人力车至巢鸭，抵弘文学院时，已万家灯火也。夜膳时，人各一蛋一汤，饭亦仅一小匣，初吃甚觉不适。弘文学院，在日本北丰郡之巢鸭，完全为一乡村，风景尚可，惟属初辟，故道路不甚平坦，设置亦多未完善。其学校，专为中国留学生补习而设，注重日语与普通学科。院长嘉纳治五郎，为日本有名之教育家，尤热心于中国留学生之教育。我国各省学生，入此校者，约七八百人。
>
> 25日，上午，校长引导余辈，参观各处学堂、自修室、浴室等，颇完备而修洁，费省用宏，非中国学校之徒修饰门面者可比。下午，收拾毕，同乡姚静臣，陈遐龄，吴葛初，王毅声等来谈，未几，辞去。同人均于是日剪发，余亦剪之，颇觉轻快。①

翌日，黄氏写信给家人和朋友，晚饭后，觉肚子痛起来，大概由于黄氏水土不服之故。

27日，上午，烟波先生演说，由中国学生任翻译，皆属欢迎勉励之语。下午2时，行开学典礼，教职员到者十余人。嘉纳院长致欢迎辞，并述弘文学院设立的旨趣。

---

① 黄尊三：《留学日记》，页10—11。

28日休息。29日上午9时开始授课，是日黄氏学习了25个日文字母。

30日是星期日，在小石川的西路同乡会有欢迎会。所谓西路，是指以常德县为中心的湖南省西部的地区。从那儿来的留学生有四十余人。黄氏是泸溪人，所以被邀约。但他因病不能参加，甚为惆怅；夜里，又梦返家园。

6月1日，上午上课。因南寮12号室人多而喧闹不已。下午，黄氏搬到6号室静养。

2日，黄氏下课回来。日本警察来检查留学生行李，发觉无可疑之处。惟留学生对此甚感愤慨，黄则认为这是弱国人民的自由被剥夺，心绪激动，一夜难眠。

3日，下雨，由于昨夜的事，留学生没有上课。有些人主张退学，众议纷纷。

4日，仍未上课。在自修室开会，黄氏主张为学业计，忍辱上课，但为激烈派反对。

5日，同乡范静生（源廉）来访黄氏，告诉他留学生行李被查之事并不是院长之意，而是日本政府行政当局搞的，希望大家忍耐上课。

7日，星期日，湖南学生开同乡大会，出席者有三百余人，杨度任主席。讲道德二字之义，黄尊三颇受感动。

> 8日，病体未痊愈，请假，倚枕取《新民丛报》阅之。报系梁启超主办，文章流畅，议论开通，诚佳品也。……梦内子逝去，不禁嚎啕大哭，惊醒，汗流浃背，已五钟矣。①

此后，黄氏爱读《新民丛报》。从9日起，学校开始复课。余暇

① 黄尊三：《留学日记》，页13。

时，他或温习日语，或看《红楼梦》。12日，翻译了两段日本文。21日，去神田的三省堂购书，坐人力车返巢鸭。

9日，膳后，与少留、升吾同访王又村，又村谓吾人初来日本，衣冠多不整齐，恐招外人讥笑，此虽外观，要关国体，余是其言，稍坐即返。①

7月1日开始放暑假。黄氏做了一个日课表，上午学日语，下午看报章杂志。

8月2日②，假满开学。不久，中国留学生因反对日人禁止他们出版及集会的自由，罢课抗议。刚巧当时在日比谷公园有日本人反政府的国民大会，注意力不在此，遂中止罢课。

14日，黄氏阅报章，知悉清廷废除科举制度，非常高兴。此后，他开始学习英语。

26日，同学余莘树吐血。高等学堂一齐来日的同学，大都染病。是气候和食物不宜之故。

27日，孔子诞辰，学校放假。

月底，黄氏接到家书。

9月，黄氏初到上野公园。由于不收入场费，不论贫富，均可自由出入，故感诧异。又到神田的东明馆百货店购物，该店货品齐备，而价钱不二。

24日，弘文学院开运动会。

10月2日，湖南某留学生暗通政府，秘密报告革命党的行动。湖南学生召开全体大会，讨论"某君通敌事件"，议决即时驱逐回国。

11月3日，黄氏初读《民报》，觉其"鼓吹革命，提倡民族主义，文字颇佳，说理亦透，价值在《新民丛报》上"。

---

① 黄尊三：《留学日记》，页13。

② 据黄氏《日记》，应为八月初五日至八月初七日之记事。——译者注

5 日以后，爆发了“留学生取缔事件”，黄氏此后的日记(由冬月 5 日至 25 日止)均用以报导此事。(有关此事，请参看本书第八章所引用的部分)这一事件，使他决定归国。25 日他离开了东京。6 日之后，即 12 月 2 日抵上海。再买棹返回阔别了三年的故乡。(湖南省泸溪)

7 日，黄氏与四位友人乘汽船，10 日到汉口。13 日从汉口出发，20 日到常德。两友人在此下船。24 日，又乘民船出发赴辰州，由于冬季水涸，舟行不易，思归心情更切。

光绪 32 年(1906)正月 10 日，黄氏抵辰州。在昔日念书的虎溪书院停留了 2 日，访问师友。到姚海峤先生家。姚氏留吃午膳。并问他如他日再赴日本，可否带同其子姚巽同往。他答应了。

13日，终于到达泸溪。从上海到家用 37 天，若从东京算起，则已超过 48 天了。而同学李君还要再往前走。

> 抵家已一点钟，入门，问母已否安眠，内子含泪答曰：“老人于去年11月 15 日辞世。”闻之惊绝，泪如雨下。问何病，云：“左肩生小疮。久不愈，疮无脓，色带紫，挤之出黄水不多。医言内病外发，无药可治。临终前数日，只是念儿，无他语。临终，念之尤切。”余泣问何不去电，云：“泸[溪]无电局，信亦迟缓；不济……”①

黄氏因母亲之死受了刺激，病了四日，然后为母丧之事请和尚诵了三天经。后又到各地拜访师友，如是者过了 20 日，国内和日本的朋友纷纷来信，告诉他“取缔规则事件”已解决，催促他返日本。辰州的友人已雇了船，特地来接他同行。于是他把家中一切事务托给妻子，便在 2 月 9 日离家赴辰州，由辰州经五日，抵长沙。因辰州中学堂酬酢事，耽误了一星期，23日遂与 6 名友人一起出发

---

① 黄尊三：《留学日记》，页43。

赴日。30日到上海，因为再留学的学生纷纷集此准备东渡，从3月初1日到初10日的船票，都已沽清。到了13日，终于能够上船。但由于遇大风，船漂到朝鲜沿岸，18日才抵神户。改乘火车，坐了一整天，19日晚上到新桥。宿西路同乡会。

23日，搬到同乡张少留居住的神保町的菊广馆暂居。少留在正则英语学校学英文。对斋藤校长甚为称赞，又称留学生在该校学者不少，并告黄氏谓将来如要入正式学校，英语日语都是很重要的。黄氏信服其说，请代办入学手续。由于尊三这次是再到日本，所以有下面的一番反省，他知道非专心求学不可，也知道求学先要立志，志如不立，学亦无用。他服膺王阳明致良知之说，以为是学问的根本。

正则英语学校中有吴景鸿其人，年已在四十岁以上，头发虽然落了不少，但热心向学，使黄氏惊叹不已。

27日下午，黄氏与友人到上野公园，当时的情景是：

> 下午同友人至上野看樱花，花盛开，艳丽香醋，颇足悦目快心，游女如云，有散步者，有坐矮椅上品茶者，更有种种游戏，点缀其间，雅俗共赏。闻樱花为日本之特产，他国无之，花肥叶茂，名亦不一，最美观者，名八重樱，花片重叠如堆锦，灿烂夺目，日人尤心醉之。①

29日，神田大火，毁屋数百家，日本人的屋宇多用薄木板建造，而屋宇栉比，一遇火灾，很易蔓延，幸而灭火法较佳，故能较快扑灭。

此后数日皆上午上课，下午温习。不外是同乡友人往来造访，又或到公使馆取留学费用，到丸善买书……

> 4月7日，本日放假。上午至日本桥买书，下午陈骏初来，稍谈，去

---

① 黄尊三：《留学日记》，页49。

后，写寄黄镇臣一函，附印章一颗。镇臣自去腊取缔规则风潮起后，代表去上海筹款，组织中国公学于虹口，集留日回国学生千余人，现任公学教务长；闻学校筹备人员中，有姚君鸿业者（即姚宏业——译者按），因当日筹款不易，愤慨时事，竟投身黄埔江以殉，于是人人感激，巨款立积，学校遂因之成立，若姚君者，真可谓杀身成仁者也。①

11日，去看靖国神社的大祭。黄氏有"见社中所陈列之甲午战争之战利品，令人愤慨。留学生某君，愤慨之余，竟推翻之而去。是亦一快事也……"的记载。

14日，黄写信给上海中国公学的黄镇臣，请其代为预订《上海时务》。

27日，数日前友人姚靖臣染病，昨夜黄氏到姚留医的医院，看护到深夜。今天见姚病情稍见好转，故到中国留学生会馆，买《满洲最后之处分》一书，又转到三崎洋服店，定制夏衣一套。

闰4月3日开始，黄氏聘日人每晚教授日语一小时。

5日，黄氏至西路同乡会叙会，有新来留学生五人，寄住于此。又捐助自费生款项五元。

22日，黄氏到浅草看活动映画，入场费五钱。

5月11日，黄氏迁居到神保町的花月馆。

13日，黄氏订购《朝日新闻》。

19日，黄氏学日本语已近一年，稍有信心，故试译日本历史。

21日，黄氏因已学了差不多一年的英语和日语，故想稍习普通学科，拟入早稻田大学。（很多同乡友人已在早大念书）

28日，黄氏做了一个杀湖南巡抚而独立的梦。正在兴奋之中便醒了。他虽然也赞成革命，但为了学业并没有参加。

6月6日，第一次"日本友人前田来访"，整整八年中，连这人

---

① 黄尊三：《留学日记》，页51。

在内，黄氏一共有五个日本友人。不过他们来访的时间却不长。

8日黄氏与巾锦江一起去神乐坂吃日本菜。

14日，黄氏转到早稻田甲阳馆住。

> 早稻田大学，为日本私立大学之一，地属乡村，隔市场稍远，为日本人隈伯爵所创办。初办时，规模不大，学生不过二三十人。其后经大隈苦心经营，收买周围村地，建筑旅馆，遂日见繁盛，学生亦渐增多。大学中除大学专门两部外，并有留学生部。专为留学生补习而设，普通科一年卒业，升入特别预科，半年毕业，升入高等预科。并设有专门部，普通科毕业不入大学者，可升入之。专门部分法、政二科，大学部则分法、政、文三科。其文科为最有名，政法次之。中国学生之在此校者，约七八百人，日本学生不下三千人，故乡村之早稻田，随文化之进步，一时变成繁盛之区。①

26日，清光绪帝寿辰，公使馆悬旗志庆。但留学生除少数外，多漠然视之。

7月20日，黄氏觉得最近几乎每天都和友人来来往往，耗费时间，甚感可惜。可是，这是留学界的风气，一时没法改变过来。因在烦恼时，这样可得一时之安慰，实无可奈何之事。

23日，去早稻田大学听高田早苗的演说。虽然学了一年的日本语，但程度仍低，听不懂。黄氏认为非要更加努力学习不可。

24日，早稻田的普通预科开始授课，自此日起，黄氏每天都很认真上课。

8月8日，因为张少留返国，黄氏到神田的中国书店买了六部教科书（给其弟），两部教育学的书（给石源铎），又照了相（给妻子）托张氏带回去给他们。

23日，黄氏去东五轩町的林馆访周道腴老师，周氏为高等学

---

① 黄尊三，《留学日记》，页62—63。

堂时代的地理教师.

9月3日，早大开运动会,停课二日。黄氏因不喜欢运动,故留在宿舍习算术。

4日,黄氏为同宿的日本友人前田翻译英文信。

15日，因英语的补习教师辞职，故黄氏每天都在返早大上课前,由7时起到青年会的英语讲习会学习英语一小时。

10月17日，是黄氏二十三岁生日，友人在中国菜馆为他庆祝。

11月，中国国内有湖南醴陵的起义，东京则有《讨清檄文》的流传。

12月2日，黄氏到顺天堂医院探望友人路笠农的病。这家医院对中国人的态度甚好。留学生有病的,多到这里医治。

1907年(光绪33年)正月1日(阳历2月13日)起,黄氏改用阳历纪年。因为这一天，尊三买了一部附有阳历纪年的《明治日记》。日记栏外,还有英语和日语的格言,他每日都把它翻译出来,而且作为个人修身的信条,所以在《三十年日记》之中,随处都可见到这些格言。

4月,[①] 因友人怂恿，黄氏投考高等预科，因入学测验中英语不好,没有考上,仍继续读普通科。

7月6日,暑假之中，为便利去正则英语学校，黄氏与两友人搬到竹早町居住。(同住的有向北翔，返国后，成为民国大学的同事。)

8月15日,黄氏访同乡宋教仁。

> 坐电车至大塚访宋遯初。谈及国事，遯初言满清绝不知国家为何物,不革命无以救亡,而革命则端赖我辈,并劝余入同盟会。余谓革命余

① 以下记事月日,全用阳历。——译者注

固赞成，但非空言所能成功，贵在实行。而奔走国事与求学，势难两立，余学业正在半途，今何可遽弃。至入会不过一种形式，目前既不能实行，何必岌岌取此形式。遯初颇肯余言，出示其近日感事诗，有云：

去国已三载，思家又一秋，

亲忧繁白发，国怨垢蓬头。①

31日，早大开课，黄氏移居户塚光荣馆。出居所不远，即见稻田，有离都市尘垢之趣。

9月开始，黄氏进入特别预科。

10月17日，因造大隈校长之铜像，学校休假10天(这是早大的秋季假期吧)，早大此时已有学生七至八千人之众。

22日，由于光荣馆只有日本学生，饭菜是纯日本式的，黄氏乃移居甲阳馆。

1908年3月27日，特别预科的毕业试合格，黄氏升读高等预科。始读莎士比亚及其他西洋文学作品。

7月5日，黄氏搬到小石川原町的冰川馆避暑。暑假的日课表是：

6时起，10时睡。上午看英文，《莎翁文集》，《鲁宾孙漂流记》；下午，练习日文，日语。灯下作英文日记。②

26日，改日课表。

6时起，7时日记，8时至12时，英文，下午，看日本小说，晚读《左传》。③

8月9日，黄氏从友人学月琴，因为被人指责嘈吵，转到早稻

---

① 黄尊三：《留学日记》，页108。

② 同上书，页136。

③ 同上书，页139。

田的山泉屋居住。

18日，黄氏游江户川，不期然想起秦淮河。

27日，黄氏读到一段新闻，谓有家人三人的医生的每月开支为24日圆，而他每月所领的官费留学费用则有33元。与此医生较比之下，觉得自己颇为奢侈，故做了一个支出预算表：（以日元计算）

房租（饭菜在内）	11元	学　　费	3元3角
		书纸笔墨	2元
添菜	2元	衣服鞋袜	2元
客饭菜	3元	特别捐项	1元
茶	1角	医药费	5元
烟	5角	电车费	3角
信纸	2角	洋皂牙粉	1角
剃头	2角	报纸	3角5分
洗衣	4角	额外费用	1元
洗澡	6角		

以上总计每月约28元1角（计算有误，应为33元5分。——译者）

29日，卖掉数十册书而只得20钱。黄氏认为受骗，决定今后就算怎样拮据，断然不作卖书之想。

31日，黄氏迁到房租较低的鹤卷町的宫前馆住。

9月2日，因患病而致经济困难，黄氏向朋友借20元，此属在日的首次借款。（也有借钱给友人的事。）

4日，预科的第2个学期开始，改了时间表。（按每星期计算）

英作文文法	6节	汉文	4节
英文讲读	9节	历史	2节
英文会话	1节	伦理学	1节
英文默写	1节	论理学	1节

英文音读	1节	日本作文	1节
国文文典	3节	体操	1节

10日，宿舍的中国学生既弄乐器，又唱歌，又调戏日本女人，实在太嘈吵，黄氏搬到都留馆住。

这期间，每日上学，晚上准备功课，既没有时间读课外书，也没有时间与友人聊天，日记也断了多天。

1907年，1月5日，黄氏第一次到本乡座看日本演戏，新旧戏皆不用锣鼓。

22日，旧历的元旦，黄氏想起了故乡。

4月7日，黄氏来日已有三年半，想到自己还在预科，未能入专门学校就读，倍感哀伤。黄氏喜欢的是思考和艺术感情的学业，所讨厌的是语言的死记忆，但只有徒呼奈何而已。当他厌倦英文文法的时候，便拿起诗词来读。

10日，孙中山先生在神田锦辉馆演说，人群涌至，黄氏也去了。莅会听众有六七千人，几无立足之地，众人虽久立而不觉疲倦，想是精神的鼓舞所致。

6月22日，高等预科第三学期的考试完结。由于离国已三年半，黄氏打算到了暑假，和张凌云一道回国。但考试刚结束后，又因患病，不能动身。

28日，考试结果公布，黄氏仍不合格。张少留劝他到明治大学入法科。他说自己虽不喜欢法律，也姑且试一试吧。

7月3日，黄氏搬到小石川金富町姓古川的人家去住。

4日，黄氏到神田买了几部英文小说和日文小说如《白鸟集》、《不如归》及《杜诗》各一部，作为暑假的读物。

5日，由于高等预科考试用脑过度，黄氏常觉头晕，故去山田脑科医院接受电气治疗，一星期三次。

10 日，同居的日人斋藤来看尊三，对他说："如果再用功下去，你的病是不会好的"。遂约他去浅草活动一下，并请他吃日本菜，黄氏无法推却。是日终于吃了生鱼肉一片。

24 日，黄氏同日本朋友到德文学校及音乐学校取章程。他本来打算入立教大学读文科的，但他的朋友多认为立教大学是为传教而设，不及明治的法科好。

这些日子，黄氏为了应付入学考试，暂时停学德文，专心一意搞好英语。

8 月 1 日，因为公寓的食用差，女主人又狡猾，黄氏搬到水道端町的岩田干一家，住八叠的房间。

5 日，黄氏向公寓的管理人借来《燕尘》10 册。这份杂志是居留北京的日本人办的。尊三看了之后，对日本人留心中国事务之透彻精微，颇感惊讶。友人罗君向他进言，谓若能将妻眷接来进女学堂，将来对公对私都有好处，黄氏因此写信与妻子商量。

8 日，黄氏与友人同读报，见日本未得中国政府同意便改筑安奉铁路的记事，同感愤慨。

15 日，山县元帅曾有言曰："目的既定，不胜，惟有死而已。"黄氏感愤于斯言。

22 日，黄氏送友人汤素留学美国，听基督教的讲道。

27 日，黄氏因求学与革命不能两存而感到苦恼。

9 月 8 日，黄氏参加明治大学入学考试，由 9 时至 4 时。

10 日，黄氏至神乐坂买《民报》返舍，读到 11 时。

11 日，《民报》有陈天华的绝命书，黄氏反复读之，不胜惭愧，决心从此以后（2 时 25 分）做一个新人。

15 日，为与罗百仓同住，黄氏搬到神田光荣馆。

17 日，明治大学入学试放榜，黄氏合格。

10 月 26 日，黄氏看到伊藤公（博文）被暗杀的新闻。日记有

“此一击也，足以寒侵略家之胆，而振亡国之气，是亦大快人心事。”数语。

> 27日，八时上课，教习演说，谓伊藤之死乃日本帝国之大不幸。虽然，诸君勿以公死而短气，诸君当各自发愤，以伊藤自勉，并以公之志为志，则公虽死，而日本国力之发展，当更胜于公生之日云云。余闻之，颇为感愤。知日本人之侵略主义，已深入人心，而其爱国心及自负心，真是使我国民愧死。下课后，友人约至料理馆痛饮。（尊三不大饮酒。）归来独坐，作《我之伊藤观》。（大意谓，伊藤侵略朝鲜而未及满洲，此为中国之第一大幸，伊藤死去为第二大幸，安重根之名可垂不朽。）①

11月2日，黄氏拟到美国留学，本已开始运动熊秉三（其后任国务总理）以求助，但是日接美国友人汤松来函，谓留学日本较留学美国为佳，黄遂中止此行。

12月17日，尊三与罗百仓议论中国的教育问题，他认为文、言应该一致，文字亦须力求简明易晓。

28日，锦辉馆开留学生大会。各省推举干事4名。湖南选出宋教仁、刘松衡等。

1910年1月3日，西路同乡会决定办地方自治杂志，请尊三当编辑。他为此购了《自治要义》、《自治精髓》，开始翻译。

27日，向泰晤士报社订购英文周报，订费四圆。

2月13日，定每星期日与友人聚会一次，或讨论学问，或讲述时事。第一次在尊三家中举行，出席的有八人，会谈由下午1时至4时止。各人觉得此会很有益处，决定下次在凌云的居处聚会。

23日，因为经济困难，以“留学通帐”为担保，向左仲远借30元使用，左答应以月3分的高利借给他，故本利归还时是33元〔39元?〕。左是亡命客，虽以日本资本家的金钱做高利贷，惟对革命颇

① 黄尊三：《留学日记》，页198。

尽力。

4 月 3 日，因见报章报导汪精卫暗杀摄政王不遂之事，尊三写了文章谈自己的感想。

8 日，五日前熊芷斋托他翻译的西洋历史，至今天全部译完。

9 日，黄氏至土桥俱乐部看留学生演剧。

17 日，长沙大暴动的消息传来，尊三对外国出动军舰干涉之举甚为愤慨。

6 月22 日，因妻子来信催促，尊三起程返国。29 日抵上海，见市容污秽不堪，颇感不舒服。7 月 1 日过南京，遇扒手。7 月 9 日经洞庭湖，与日本的卖药商梅田夫妇同行。12 日从常德向西，水浅不能行舟，故改乘轿。路上少行旅而山路难行，故要讨好轿夫，且行且歇。山中行程，险象横生，有六日不能安睡。终在 7 月 19 日抵家。从东京出发之日起计，已第 27 日了。

在家 44 日，尊三除与亲戚朋友叙旧，料理家事之外，尽是照顾其弟的教育。本来打算于 9 月新学期开学以前赶返东京，但由于其弟四书讲义的讲授尚未完毕，故延迟了十天始起行。

9 月 18 日，黄氏到东京，返回原来的公寓一看，已尽为他人租去，故搬到都馆。

20 日，由于很多事情都需用钱，黄氏把手表和眼镜拿去押当。连日来酬酢甚多，累极，故睡前忘记熄灯。正酣睡中，有一女子投怀送抱，黄氏婉言相拒，彼女遂恨恨而去。这种事情，黄氏到东京以来，算是第一次。

26 日，大学部第二学年讲课开始。黄氏所习学科如下所列：

民事诉讼	岩田	2 节
民法物权	横田	2 节
民法债权	横田	2 节
	饭岛	2 节

商法总则	松波	2节
商行为	青山	2节
会社	三桥	2节
刑法各论	三木	2节
行政法	上杉	4节
法理学	筧克彦	2节
英法	立石	3节
平时国际公法	高桥	2节
战时国际公法	秋山	2节
英语		2节
独语		2节

计14科目　33节

他每日的生活秩序表如下：

6时至8时，读英文报纸。

晚饭后阅读日本的杂志、中国杂志、《通鉴》、《左传》。

10时半记日记。

日间上学。

星期六晚休息。

星期日读报纸，休息。

10月1日，学校发起组织辩论会(仅留学生参加)，尊三负责起草规则，写了十余条。

11月14日，友人请他合作翻译《货币论》。他虽然没有时间，但一因“经济困难”，二因友人盛意邀请，故承诺了。

18日，明大校长岸本良雄出席明大留学生会，感谢留学生对新校舍的捐款。

19日，西路会场开会欢迎胡学仲。胡君在士官学校快要毕业之际，因涉嫌与陆军军事文件遗失案有关，囚狱两年，终被释放。胡

君诉述其狱中的苦况,吴小仙赞胡为豪杰。

20日,开演辩会。黄的讲题是《国体意义与公共目的》。

30日,黄氏迁居神田贺町的今井馆。至此,他自己也觉得常常迁居不大好。他在八年间共迁居 20 次。

1911年起,他改用加藤咄堂编的《修养日记》,并继续译出其中的格言。

1月6日,黄氏读宪法与国际法。他不赞成上杉氏有关主权的解释。他认为日本的宪法是君主国的宪法,而上杉氏又是官僚学者,故上杉之说,无足为怪。

> 19日,日本社会党幸得秋水等二十四人,内妇人一,名菅野平子,僧人一,名愚童,俱于本日宣告死刑,举国为之震动。余谓此世界之大问题,东亚之大问题,不仅日本一国之问题。然此事既已发生。日本社会问题,从此开端,而皇室根本动摇也。①
>
> 2月7日,日来读国际法,于主权二字颇有领会。我国名为完全主权国,实则一不完全主权之国家,任人保护,任人租借,任人协调。所幸对内主权,尚未完全落入外人之手,若再并此而失之,虽不瓜分,亦不国也。噫,以数千年大汉之天下,今竟为孺子作牺牲,中国尚有人乎?②

18日,黄氏去听刚从中国回来的冈田朝太郎的演说。今日报载俄国出兵伊犁,英国亦以保护商业为名出兵云南。

19日,黄氏阅报,知英俄交涉有濒于破裂之势,中国政府尚束手无策。他愤慨已甚,掷报于地。又至早稻田赴友人的谈话会。他在会中发言,认为现时已非文字宣传之时,唯有一齐返国革命一途。是夜黄氏不能安眠。

22日,黄氏与友人熊芷斋争论革命与立宪问题,正在高言激论,争至面红耳赤之际,下女来报"有客至"。

---

① 黄尊三:《留学日记》,页302。

② 同上书,页310—311。

26日，留学生于神乐坂之高等演艺场开演说大会，讨论伊犁、云南事件，出席者有千余人。有呼吁脱离清廷统治而独立，有要求编练国民军，人人欲争上台演说，秩序混乱，议而无决。尊三建议各省派出代表二人表决。结果南方省份多附和，推出二十余人，惟北方省份则多不顾而去。会中热心国难的人，纷纷捐出运动资金，并决议至使署请公使李家驹及留学生监督胡子静捐款。惟此二人闻讯先遁。学生们在使署外候至10时仍未获接见，不得已散去。

27日，尊三早起，即往访各省代表，又到山冈医院探望宋教仁。

3月4日，留学生在江户川亭召开对英俄外交大会，向清朝政府发出电报，要求停止一切屈辱外交。

6月20日，学年考试完结，黄氏获满意的成绩。

7月2日，向北翔来访尊三，邀同往片濑避暑，宿于石匠之家。房租连饭每月每人十元(菜金除外)。

8月4日，和尊三一起留学的张少留与日本妻子冈本生了一子一女，因这次毕业要回国，大为烦恼。尊三劝他向友人筹款，使能一同回国。

15日，黄氏与友人共译《货币论》及《西藏》，但因为两人文字内容不一致，而且有文责问题，故觉得共译结果并不好。

9月15日，四川省发生反对铁路国有运动，风潮甚炽，民意已不可侮。

10月31日，四川铁路风潮日盛一日，革命党人纷纷归国。尊三也感到不久将有大事发生，不得不及早安排归国之计。

11月2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尊三欣喜之余，绕室徬徨不知所措。同居的日本友人来祝贺。

4日，留学生召开全体大会，决议一齐回国，作革命军的后援。

15日，革命军占领上海。尊三决定归国，向学校申请休假两个

月，又向同盟会的左仲远借30元，另用衣服和书籍做抵押又得30元。至邮船公司购船票时，始知一星期内的船票已售清，故只有等待下周的船期。

16日，各地将军宣告独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在石家庄首先发电赞成共和，清廷大为震怒。

22日，黄氏与友人20余人登上归国之途。船上挤满了留学生。船长为三等舱的留学生供给二等伙食。

27日，尊三抵上海。是日报纸全部报导革命军的消息。

28日，尊三到中国公学访黄兆祥，黄氏告以南京政府将于短期内成立。

29日，上海各界在张园召开国民大会。太太和小姐们纷纷捐献贵重金饰。

30日，日本某报章刊出干涉革命的议论。尊三读后愤极，写了《就武昌起义请日本政府及国民严守中立》一文。

12月1日，左仲远从日本返，宿日本旅馆。尊三往访仲远，与他一齐赴南京会宋教仁，陈述自己的意见。2日晚，返上海。

14日，张园开大会，欢迎孙中山。

17日，尊三等数十人推熊秉三为首领，组成共和协会。

18日，尊三发函促湖南都督谭延闿拨款接济东京留学生归国。

1912年1月，黄氏返长沙会谭延闿。日本留学生中也有些人加入省政府工作。

2月18日，黄氏离长沙，29日抵东京。

3月17日，黄氏宿于小石川的苍龙窟，埋首温习功课。因自武昌起义以来约有半年，头三个月请假返国，而再过两个月便届毕业之期，为了应付八科的毕业考试，故非用功不可。

25日，黄氏托早大友人代购《早大讲义录》。

4月2日，张少留抛下冈本亲子，独自返国。尊三对冈本甚表

同情。

6 月 24 日，考试完毕。

7 月 1 日，黄氏往大森租房子。

5 日，东京友人来函，得知毕业考试已合格。尊三见到八年间的苦辛总算有了结果，心情舒畅。

7 日，尊三写信告诉家人毕业的消息，并嘱以后不必再寄信来。

12日，屋主之妻做寿司① 款宴尊三，鱼则火烤而食。

17日，尊三归国。五大箱书籍则托邮船公司代运。与向北翔、张凌云一起从新桥出发，送行的有九人。18日，一行人从横滨乘大疑丸号轮船返国。

24日，抵北京。

黄氏归国后，黄氏的友人中有不少人在政界中活动，而他的周围也常有宋教仁、熊秉三等人来往，从事政治活动。1913年 4 月刊行的留日共和党人士的机关报《说报》(在东京印刷，上海发行)，其发起人有黄尊三、彭世躬、何遹祺和蔡培等人。但尊三似乎始终以教育事业为主业。他做过中国公学、江汉大学、民国大学等教授(最后任民国大学的总务长)。在此期间内，他从日本邮购了不少书，翻译出版的书似也不少。在他的日记中记录由他编译的书即有八种之多，是著作抑是译述则无从知道。在《中译日文书目录》中载录了两种，确知是他翻译的：

姉崎正治著，黄尊三重译：《释社会问题》，内务部编译处，1920年。

穗积重远著，黄尊三、萨孟武译：《法律进化论》共二册（商务印书馆之法政名著本），1929—30 年。

---

① 寿司类似中国的饭团。——译者注

二　留学日本的指南

清末时期，留日学生人数次第激增，为适应这种情势，留学日本指南之类的书也相继出现。其中重要的如：

(书名)	(著者)	(出版年份)	(出版者)
东瀛学校举概	姚锡光	1899 1900	京师版 皖城版
日本学校述略	姚锡光		浙江书局
(此书是《东瀛学校举概》的摘要本)			
日本游学指南	章宗祥	1901	
日本留学指掌	崇文书局编集	1905	东京崇文书局
留学生鉴	启智书社著译	1906	东京启智书社
东瀛游学指南	木川如一 田中龟治 编译	1906	东京日华堂

上表之中，《日本游学指南》(以下略称《指南》)是曾经当过留学生领袖的章宗祥所写的。《留学生鉴》(以下简称《鉴》)则是某一留学生所写。二者都是本行人的著作。从这里可以清楚知道留学生的心情和他们生活的情况。以下试节引其文，以见留学生生活的一斑。

总　论

《指南》这样说：

游学之事，非始于今日，锁国时代，南人学于北者，即谓之游学。近世各国交通，乃有游学外国之事。游学之益何在？曰：人有恒言曰："百闻不如一见"，欲取他国之长，以补吾国之短，非亲历其境，不能得其益也。日本维新元勋若伊藤侯等，其始皆学于外国，吸取其文明，归而散之其国，遂成今日之富强。近年日本游学外国者，总计官费自费，年复不

少。其尤盛者，有富室岩崎某，其子弟七、八人，自最稚者以外，悉游学各国，无一家居者。其知己国之不足，而热心以效他国之长若是。以日本今日，已足介于列强，相与并存，而其国人向学，尚如此其盛。何况吾国于所谓新学问者，尚在最幼稚之时代，然则有志之士，宁可复蜷居乡里，以终吾世耶？然而游学之事，亦不大易言。

凡天下之理，自最下层欲一跃而至于最上层，鲜有不颠者。欧美各国之文明，以今日之吾国视之，其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故吾之游学于彼，则所谓自最下层而欲至最上层耳。吾国今日之程度，非得一桥，以为过渡之助，未见其能几也。

今日之日本，其于吾国之关系，则犹桥耳。数十年以后，吾国之程度，积渐增高，则欧美各国，固吾之外府也。为今之计，则莫如肖就日本。文字同，其便一；地近，其便二；费省，其便三；有此三便，而又有当时维新之历史，足为东洋未来国之前鉴。故费本一而利十者，莫游学日本若也。况数年以来，东游之效，已有实验可征。吾国有志之士，大之为国，小之为己，其有奋然而起者欤。①

《鉴》亦指出：

吾人不远万里，乘长风，破巨浪，离家去国，易苦以甘，津津然来留学于日本者，果何为也哉？留学者数千人，问其志，莫不曰："朝政之不振也，学问之不修也，社会之腐败也，土地之日狭也，强邻之日薄也，吾之所大惧也。吾宁牺牲目前之逸乐，兢兢业业，以求将来永永无暨之幸福，此则吾之所大愿也。"斯言也，不唯留学生人人能言之，鄙人亦颇常言之。然窃自思，志望如此，他日果能达此目的与否，尚未可知。用是抑郁，求所以副其目的之具，盖舍学问而外，无他涂矣。……

吾人生长中国，无学无问，逐逐然终日潜心于功名富贵之间，一旦得志，则锦衣金屋，口能指，颐能使，乡里畏如神明，官吏引为知己。若其失志，则贫无立锥，亲族唾弃，朋友绝交，乡里贱如马牛，官吏指为匪类，数

---

① 《日本游学指南》，页1—2。

千年来，已千锤百炼，铸成此种风习，故所竞争者，唯在功名富贵，而不在乎学问。以学问为竞争者，势必窘其身。……

现时最适用之竞争，其为学问矣乎！……吾人既生于世，则必同具有一求生之目的。前此唯竞争于国内，故学问非所适用。今也国外之竞争，以次参入。人皆以学问制我，弱我，鱼肉我，我之土地财产将取而入彼橐中。……学问乎！学问乎！乃吾人今日所应竞争者乎！

旅行然后知居乡之可贵，出国然后知国家之可贵。吾人当逍遥容与于闾里时，国家观念，未甚发达，唯知排斥外国，而忘自国之情形。及至履东以来，言语不适，风俗不同，饮食异宜，居处异制，于是思国之念，勃勃然生。夫此犹其小焉者也。居停主人，学中教授，一言一动之间，虽以客礼遇而不至轻视，而即从此客之一字之观念，毕呈其外而不亲之情。以此点以观察其隐，内人外人，不啻有霄壤之判。……于是乎思国之念，又勃勃然生。夫此犹其小焉者也。不见夫舰队之欢迎乎！不见夫孔罗多〔黑田?〕之欢迎乎！万岁之声，不绝于途；悬旗结采，曜如晚霞。以视吾国之自来自去者，其相去果何如也。……至于此，不唯遽生思国之念，且欲亟强吾国。……（实藤注：此为留学生目睹日俄战争的凯旋情形而起的感动，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心受此刺激而逐渐昂扬起来。）

强国之第一义，曰政治之改良也，然非学无以为改良之具。曰社会之整饰也，然非学无以为整饬之具也。曰土地之保存也，然非学无以为保存之具也。曰强邻之平等也，然非学无以为平等之具也。学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且夫有一日之世界，则有一日之竞争，有一日之竞争，则有一日之学问。日日有竞争，日日有学问，事事有竞争，事事有学问。……①

可见留学生负笈东渡的目的，就是要讲求救国的学问和与列强竞争的学问。至于《鉴》作者的用心、编写的体例，是这样的：

余留学数年矣，马齿加长，而学业未进，然幸身体壮健，所为亦鲜有舛误。盖于暇时，辙考察日本学生趣向之方针，卫生之秘诀，积之既久，

① 《留学生鉴》，页13—16。

都为一帙,常供座右,以当箴铭。本之以行,故如夜行之有烛,无蹉踬之虑也。去岁友人多劝付梓,以鲜暇不果。兹特删繁就简,并辑译日人议论数种汇刻之,题曰《留学生鉴》。盖凡为留学生者,手置一编,其得益良非浅鲜,至于文字之间,非此书所重,不暇计其工拙焉。

首论为学之道,次论卫生之法,次述游戏之事,次述应时之用。为学生者,能以此为标准,则不唯目前即可适用,达将来远大之目的,此尤其基础焉。愿其勉之。①

留学的经费

关于留学的经费,《指南》有详细说明,今照原文所记,一一列出,以供读者参考:

经费者,游学之母也。欲计游学,以筹经费为第一义,然吾国之人,往往以为至外国游学,费用不赀,其实不然。日本物价,虽三倍于吾国,然一般学生社会,其节俭之状,较之吾国苦学之士,有过之无不及,故核算其费用,若力意减省,则吾国志士能自办者,尚不鲜也,今列举各项必不可少之费,说明如下:

第一节　学费

学费分为二种。一受验料,即贽金是也。初入学时纳之。一授业料,即束修是也。官立学校,大抵分二季或三季征收。私立学校,则有总征收者,亦有每月分征者,其额如下:

一、受验料

官立学校　自一元至五元不等

私立学校　自一元至二元不等

二、授业料

官立学校　每月自一元至二元五角不等(间有三元者)

私立学校　每月自一元至二元不等,每年以十月计算,夏季休假二月概不征收。

① 《留学生鉴》,页18。

第二节　旅费

旅费者，专指住宿费而言。住宿有三种方法。一学校寄宿舍。一下宿（即常年租定客栈）。一租屋。三种之中，各有便利之处，听各人自定，其费约定如下：

一、学校寄宿舍，每月约五六元左右

二、下宿，分为三等。（下宿之外，复有所谓贷间者，即住家之中以其余屋出租之谓。其居停亦颇有极亲切者，价约与下宿等，而房屋较清净焉。）

上等　房屋每月约五六元

　　　饭食每月约十元

中等　房屋每月约三四元

　　　饭食每月约七八元

下等　房屋每月约二元

　　　饭食每月约五六元

　　　此外尚有炭费油费每月约一元左右。（又下人赏费一元或半元随意。）

三、租屋，每月房饭一切约十元至十二元左右。

住宿之法，大都有此三种。寄宿舍价最廉，规则亦佳，惟与日本学生杂居，稍有不便，又学校不尽有寄宿舍，故不能一律而论。下宿最便利，一切均由旅店主人招呼，且随时迁徙，均可自由，惟下宿中人类最杂，良莠不一，交际最宜留心。租屋非得四五人不办。此法最为适意，一切习尚，可以从我之意，惟终日与本国人同居，语言之进步，不无稍阻，故最好俟半载或一年以后，然后约伴租屋，最为得计。此外又有寄居日本人家中之法，然中上之家，大抵不愿寄留外国人。下等人家，则又无味，故颇不易言，若得熟人能介绍至中上以上之人家居住，则更佳矣。

第三节　书籍及笔墨纸费

日本大学校及各专门学校，大都均用笔记。（即教师口讲而学生笔述之谓。）故用教科书者甚少。此所谓书籍，专指教科书而言。每月匀计约得二元左右已足。若论各种参考书，则需用甚多，不能豫定。至笔墨

纸费，每月约一元左右。总计二项费用，每月约三元左右，然此固至简之数也。

第四节　杂费

杂费者，指一切零星费用而言。如剃头、洗浴、洗衣、新闻纸、邮票等类，每月节省用之，约二元左右可足。兹为略举各项价目如下：

剃头　每次一角二分或一角五分（辫发须随时自理，日本剃头店无能之者）

洗浴　每次二分（日人最尚洁，约间日须一次，学生社会均然）

洗衣　每件大者四分，小者一二分不等

新闻纸　每种约三角

邮票

其他杂费

第五节　衣服费

日本各学校，各有一定服饰，谓之制服，故凡入其学校者，必服其制服，以归一例。今就寻常学生衣服，约定价如下：

冬服一套　约八元至十元

外套一件　约八元至十元

夏服一套　约三元至六元

帽靴及衬衣等　约五元左右

衣服费约计如上，然此不必每年新做，故初到之时，费用稍大，此后不过随时添补而已。

第六节　交际费及旅行费

凡外国人与本国人不同。与日人来往，不能无应酬之举。譬如，教习及同学等，须随时酬劳之，则更加一层亲切，又或彼等先施，则不能无以答之，此交际费之所以不可少也。旅行费者，大都在假期中用之。各学校学生，至放假时，往往至各处旅行，或夏期至山中避暑，又有至各地方工厂学校等参观者，学校给以凭票（惟官立学校有之），随处可以进去，谓之实地研究，又谓之修学旅行，此亦于游学最有益处，且可以借此入其内地考察一切，惟费用甚巨，不能豫定。以上二项，均随各人之境遇，以

为支用之方，无从算入正项费用之内也。

以上所列，大概不出此数种。今就其至俭之数，核算一表如下：

	（月　额）	（年　额）
学费	1元至2元半	10元至25元
旅费	6元至9元	60元至90元
书籍、纸墨、笔费	3元	30元
杂费	3元	30元

夏期放假二月，不算在内。总算在内，则再加旅费及杂费二月可也。

总额	13元或18元左右	150元或200元左右

（夏期放假二月亦算在内）①

留学的程序

关于留学的程序，《指南》亦有详尽的介绍，今不避烦赘，为读者详引出来：

游学有种种方法。启行时舟车一切，如何情形。到日本后如何情形，及进学校时如何办法，均游学者所急欲知之者也，兹分节略述之。

第一节　上路之情形

凡自吾国至日本，分为南北二大道。南省各地，以上海为出发之地。北省各地，以芝罘为出发之地。自芝罘动身，可买船票至神户。由神户换坐火车到东京，凡火车行十七点钟，计路程共十日。自上海动身，可买船票至横滨，换坐火车到东京，凡火车行一点钟，计路程共七日。若买票至神户，由神户坐急行火车至东京，则五日可到。到日本之第一埠，为长崎，其次为马关，其次为神户，其次即为横滨。各埠除马关外，均为从前通商口岸。吾国有领事馆焉。商人以广帮宁帮为最多。此外各帮均有。若有相识之人，则到埠停船时，可以上岸访之，托其引导一切，并可望其

① 《日本游学指南》，页23—27。

代为招呼，惟船每到埠，停几多时刻，及何时开船，均有一定，必须打听明白，先期回船，否则恐有失悞，船或先开，受累不浅也。

凡自吾国至日本船只，有英国公司、法国公司及日本邮船公司。其中以日本船为最亲切便当。若言明留学生，则看待更好，其船中理事等，大都从学生出身，故于学生另有一番看待，盖同类使然也，其船价分为三等，亦列举如下：

自芝罘至神户

一等65元　二等45元　三等18元

自上海至横滨

一等54元　二等33元　三等12元

自上海至神户

一等42元　二等26元　三等10元

凡轮船至神户或横滨后，须换坐火车，再到东京，其车价亦分三等如下：

自神户至东京

一等12元　二等7元　三等4元

自横滨至东京

一等9角6分　二等5角6分　三等3角2分

凡无论舟车，一等客舱，大抵系官员及富商等乘坐。二等及三等则寻常人均来坐之。日本学生，则往往坐三等者居多，取其廉也。三等舱固为最下，然较之吾国航船，及轮船之散舱，则舒服远矣。惟火车若行李过多，(凡行李以少为贵，衣服有学校制服，故可不必多带。中国书籍，固不可少，然有图书馆可以借阅，故不带亦可）则反不如坐二等之得，因各等应带货物，其磅数均有一定，三等磅数最少，而另加则甚昂，且路途稍远，须在车中过夜，则二等为最宜，三等则恐人数过多，不得坐地，晚上甚不便也。

第二节　到岸之情形

到神户或横滨上岸时，如该埠有熟人，可于到长崎发一电报（价甚廉，不过一、二角)，或发一信，嘱其某日某时，至该船来接，则一切可有招

呼，否则可先至日本客栈托其招呼一切，亦甚妥当。凡船到埠时，即有无数接客，至船中招揽生意，身上均穿店中号衣，一望而知，可择定一家，将行李几件，一一点清，交付与渠，搬运一切，均听渠为之，万无一失。上岸时，即由渠引至店中，暂时休息，然后再托渠代买车票上京，最为妥当。（凡行李几件由本栈按数发出铜牌，到时凭牌领取，惟零碎小物，均须手携也。）日本客栈，大都均靠得住，其中招呼吾国人最熟悉者，今略举如下：

神户　田中屋

横滨　高野屋　山崎屋

上岸以后，行李一切，均须先搬至税关，待其查验，行李上可贴明留学生字样，关吏较为亲切，然万不可因此夹带私货，自失体面。又钥匙须随身带，否则匆促之间，欲开箱时，殊不使也。上京最终之停车场名曰新桥，此处即为东京。东京多少必有熟人，在未上车之先，可先发一电，言明某时开车，某时可到，嘱其来接，必可无误，否则下车后，可即至停车场侧，购买东洋车票，不必先付钱，但告以某处某地，到后然后照票付钱亦可。行李可暂存车栈，随后往取，惟铜牌万不可遗失。此最宜留意。凡初到时，总未免人地生疏，故在本国未动身之先，最好宜先托人介绍在东某人，则到后一切，即可由某人招呼，若毕竟无人，则到京后，可坐车至中国公使馆，告明来由，托馆员或馆中留学生招呼一切，亦无不可也。

第三节　入学之情形

凡学校分为二种。一官立学校，即由国家设立者；一私立学校，即由民间设立者。进官立学校者，必须吾国钦使或领事等先行咨照彼国外部，转达文部，故必须钦使或领事作保。进私立学校者，则无须乎此，但须资格稍深者作保，或中国人或日本人，均无不可。官立学校，去年曾定外国留学生之例，今照译如下：

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委托生规则（明治33年7月4日文部省令第11号）

第一条　凡外国人进文部省直隶学校（即官立学校），不照学校通则，于所定学科中，肄习一科或数科者，必须其本国公使或领事咨送，

始能许可，作为外国委托生。

第二条　凡外国人入学时，必须其本国公使或领事之委托书，与入学志愿书，同呈于帝国大学总长或各学校校长。

第三条　帝国大学总长及各学校校长得以上志愿书时，必察看其有相当之学力，始能许可。其学力未到者，不在此例。

第四条　凡外国委托生，卒业时试验有成绩者，亦得给予凭据。

第五条　凡外国委托生，于一切受验料及授业料，可免征收。（按此条近尚未实行，随各学校校长之意而定，有征收者有不征收者，不一例也。）

第六条　本令应有之细则，由帝国大学总长及各学校校长，经文部大臣之认可，随时定之。

第七条　本令施行之前，凡外国人已进各直辖学校者，以卒业为止，可以不在此例。

据以上规则，进官立学校之情形，可以概见。私立学校，亦大率类是，惟不必公使或领事咨送耳。①

留学生生活上的问题

又有关留学生生活上的问题，《留学生鉴》一书，对细微事情亦详加说明。今录其目次，盖亦可推见留学生生活上的问题所在。

《留学生鉴》目次

第一章　立志

立志之方针

坚忍之志操

第二章　勤勉

勤勉之效力

勤勉之顺序

第三章　忍耐

① 《日本游学指南》，页 27—32。

游学之注意

游学之学费

游学之期节

入学试验

旅中之注意

宿所之选定

寄宿舍

下宿屋

东京游览地

第二十四章　日本苦学生之情状

劳动

自活之方法〔工读法〕

新闻配达〔报纸派送〕

新闻卖子〔报童〕

牛乳配达〔牛奶派送〕

写字生

人力车夫

第二十五章　东京学校一览

普通学校之部

专门学校之部

杂学校之部

第二十六章　文字杂记

省文

偏冠之名称

类字集

假名遣〔日本字母拼缀法〕

字音假名遣〔假名遣的一种〕

万叶假名

第二十七章　邮便电信

普通邮便种类

邮便禁制品

邮便物之容积制限

内地小包邮便料

特别邮便

邮便汇兑

电信

电信符号

第二十八章　世界第一 ①

此书可说是留学生的百科全书。由此可知当时的留学生所关心的事(譬如演说法、剑舞等)。与《指南》比较,成书时间仅五年之差,但可见留学生对日本的认识已大大增进了。(例如以万叶假名作为问题等)。

是书与《指南》颇有重复之处,今特引录其第 23 章《东京之游学》,以供参考。

东京为日本全国之首都,百般施设,无一不备,真学问之渊薮、学校之中心也。故苟拟备一科一艺者,则不远千里,无不年年岁岁,负笈而来,独是东京固是绝好之修学地,而又为可恐之魔窟。种种诱惑拥于前后左右,为学生者,志操不坚,气象不肃,鲜有不误入迷途而堕落腐败者。故游学者,要能一意贯彻其目的,不为外界所引,不见哂于乡里,是所甚愿者也。

学　费

游学之主要物为学费。学费之豫算,亦随其时物价之高低,及其学校之种类,不能一定。兹述其大体于下:

(一)月俸及下宿料　月俸,若在学校之寄宿舍居者,宿料与食料大抵一个月以六七元为率,又下宿料者,通常七八元以上,此外又有灯油

① 见《留学生鉴》目录。

金、炭金等开消，约一二元之位。

（二）授业料　即每月之月谢，亦因其学校而异，大抵在一二元间。又官立学校中，一年之授业料有分为二期计算纳之者。

（三）杂费　买书籍笔墨纸等金及其他之零用金等，每月三四元乃至五六元。此外设又因其学校所定之制服须仿造之，是为意外之费。

（四）一月之概算　合各项大抵一月十二三元至十六七元之谱。此乃不可减之费。又此外尚有入学金、桌椅及书籍等之购入费，铺盖汗衫袜鞋等之购入费，其他不时之费，不可不预为筹画。

游学之期节

东京学校大抵从九月十一日之顷开始者多。四月开始者亦有之。

入学试验

官立学校，则于每学年之终，试验次年之新学生；又有因人员不足之时，行补充试验者。皆招学生入学之试验也。私立学校，则无论何时皆得入学。唯中途入学，程度差异，试验时不及格，势必降一学年，欲捷转纡，反不若自始至终之为得也。

旅中之注意

日本教育尚未普及，小窃为多。于人众之停车场尤甚。又汽车中，亦时有小贼扮为客人以行窃取者，须十分留意。所有时计及金银等品物，藏之宜坚。掏儿恶汉，言之可惊也。

宿所之选定

既到东京，不可不早撰定宿所。适于学生之宿所者，有学校之寄宿舍与下宿屋二种。前者学校之附属也，后者市中为商卖者也。寄宿舍因附属于学校，故其照应甚周到。下宿屋以无监督，故所宿学生之内，往往有懦弱怠惰者。荒疏学业陷于惰落悲境，往往见之。甚至有一种下宿屋，不用主妇，不用下女，专以年轻女子以诳学生者。故诸君选下宿屋时，当求其严肃者投之，而后能正其志操，克己用功。

下宿屋最多之区域揭示于下：

本乡区　下宿户数　　凡四百

神田区　下宿户数　　三百七十

芝区　　下宿户数　　二百五十
麴町区　下宿户数　　一百五十

东京之游览地

东京内游览之地甚多，上所记者，不过最有名之数处而已。于休息之日，披襟曳杖，逍遥于此等之地，亦愉快之一事也。

上野公园（在东京之北方，老树繁茂之下，有不忍池，其中游览之地甚多，为市内第一之大公园。）

浅草公园（在上野公园之东，为有名观音之所在也。可观之物等甚多，游人常群集。）

芝公园（在东京之南，境内极幽静，有德川氏之灵庙，又有山名丸山，眺望甚佳。）

靖国神社（在麴町区九段坂之上，以祀为国家之忠死者。）

日枝神社（在麴町区，名山王公园，境内幽静之地。）

隅田堤（又名向岛，在浅草公园之东，大川一带，长堤如蚊，樱花繁茂，最为有名。）

飞鸟山公园（在上野北里许丘上，可以眺览。）

帝室博物馆（在上野公园，古今内外之珍品宝物至动植矿物之标本，无一不备）

东京教育博物馆（在本乡汤岛三丁目，关于教育诸种之物品皆毕集）

动物园（在上野公园，集合珍禽奇兽而饲养之）

帝国大学植物园（在小石川区白山御殿町，内外各国之草木甚多）

帝国图书馆（在上野公园，和汉洋之书籍凡藏有二十万部，每日平均有三百余人之阅览者）①

三　留学生的日常生活

黄尊三为反对留学生取缔规则，决心归国。在友人为他开送

① 《留学生鉴》，页63—68。

别会之日(1905年12月15日),正是另一位湖南省出身,名叫 So Kau-man①〔苏高曼——音译〕的人留学日本抵达上海之时。苏氏从到上海那一天起,便开始写日记,一直记到第二年的6月12日,因母亲去世而归国为止。这本日记名为《琐琐录》(稿本),共2册。据此,可知他出自湖南省的名门,其叔父且曾远赴西洋任公使。他当年32岁,中过科举(到日本后,在旧历1月2日公使请他参加茶会。被邀请的不过40人,他是其中之一。拍了照片纪念,他还后悔自己没有穿礼服赴会)。他和黄尊三不同,他是私费留学生。

32岁的苏氏,在读书人当中算是年青的。他为人认真,循规蹈矩。由于留学生取缔规则的风潮,不能即时前赴日本,故直到翌年1月14日依然留在上海。这段时期,他开始学日本语。在日记中,他常常反省自己的言行,以及与朋友讲求品德的修养,有时也会终夜不眠,谈论国事。这些表现都和黄尊三相似。

他到日本后,知道有禁止未成年者抽烟的例规,因感于抽烟的祸害,遂对同宿的友人实行戒烟。虽然他说"遗憾的是未能使全体留学生都一起戒烟",但亦足见他并非是个徒具空言的人。

他决定在东京的学生公寓居住,但对自己能不能适应日式的生活感到不安。因此,他到处拜访友人了解情况,友人亦往往肯对他讲述自己失败的经验,给他很多有益的指导。

某一前辈,给他看一本叫做《留学生自治要训》的书,上面详细写着应注意的事项。这是当时在留学界非常流行的一本讲述留日生活心得的书。今摘其要项,引录如下:

留学生自治要训:

一 往来道路须靠左行。

一 在路上遇见友人,不可扬声呼唤,也不可久立路边闲聊,稍作倾谈,

① 他的日记上写的也是ソカウマン(Sokauman),不知汉字怎样写法。

行过礼即宜分手。

一　不可随地吐痰。

一　不可随地小便。

一　前往参观时，要认清出口、入口，不可大声谈话。

一　进入陈列所时，不可随便打听价钱。

一　对下女①要庄重（不可开玩笑）。

一　电车满座之时，应让座与老人、小孩和妇人。

一　电车内不可抽烟，或盘腿而坐。

一　待车停定后，始可上下电车。

一　室内要打扫干净。

一　不要穿著拖鞋进入屋内。

一　夜间不要大声呼叫。

一　厕所的木屐和草鞋，只许在大小便时穿著。

一　大小便要排在便器中。

一　入浴之际，先把下半身洗干净，才可进入浴池里。

一　痰要吐在痰盂里。

一　就寝时要熄灯。

一　不能代收别人的挂号邮件。

一　同住者写信时或温习时，不要在旁打扰。

一　他人书桌上的书籍或抽屉中的物件不可乱翻。

一　慎密保管手表及金钱。

一　衣服要清洁。

一　夏天也不可赤身露体。

一　访友之时，请先打听是否在家，呈上名片，当入屋时，要脱下鞋子进入。

一　在室内应坐下，不可徘徊打转。

一　出入房间之时，应要行礼。

---

① 下女相当于中国的女佣人。——译者注

一　在吃茶果子时，应用筷子夹起，放在左手手掌中才吃，不可把筷子立即送入口中。

一　食物掉落在席上时，应该拾起放在厨房一角，不能再放回口里。

一　不要随便打听别人的年纪。

一　出入之时，要记得关上门户。

一　不可吃冰。

一　日本的米难消化，不可吃太饱。

一　要多运动。

在这日记中，还记着"闻贵州李君，因读书之声吵耳，被爱知社之学徒殴击，因此甚为怅然"，指出此乃不好好遵守这个"自治要训"所致。

在日本长久留学的人，多养成日本式的生活习惯。就算返回中国，由于不高声谈笑，人们便知道其人当是留日学生——这些事在中国小说中，多有描写。又中国公学（由反对日本取缔规则而罢课归国的留日学生所创办）学生穿着木屐的事，也往往被人引为佳话。

四　中国留学生会馆

留学生在学校的生活，大体可从黄尊三的日记想见之。在公寓和路上的生活，则大体可从《留学生自治要训》所记推知。此外还有一种留学生的生活情况，这就是他们的团体生活。

正如孙中山所言①，中国人的乡党观念强而国家观念弱。可是当留学生到了日本后，由于彼此有着共同的利害，便产生了作为"中国人"的意识，因此也就感到有团结起来的必要。既然需要团结，就要有大家聚集的场所。在清末时期，有清国留学生会馆；民

① 参看《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第五讲。

国以后，有中国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简称中华青年会，又称青年会）。

清国留学生会馆在1902年建成[1]。在这个会馆出现以前，初期的留学生有所谓"励志会"的组织。该会会员有范源廉、曹汝霖、蔡锷、章宗祥等，都是留学生的领袖。其后，以这些人为首脑，并得驻日公使及其他方面的协助，留学生会馆遂告产生。馆址在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18番地（现在的骏河台2丁目3番地）。沿着从水道桥车站向御茶之水车站的沟渠的内侧山坡（皂荚坂）的顶部，隔着沟渠可望见本乡一带的人家。在皂荚坂的那边，又可见到小石川，牛込方面的人家，正对着的是九段台地。日语教师松本龟次郎描述如次：那座建筑物有两层高，正面至少有五间（三十尺）之宽。纵深我想是在8至10间之间。正中有走廊通过。楼下设接待室、会议室、事务室等多种房间，二楼则是教室。"在这座建筑物之旁，另有一户门牌细小的家。住着一个姓细川的男人[2]，兼做传达工作，又推销这里出版的书，生活过得颇为写意。"[3]

这里是留学生的世界，仿佛是中国在日本的缩影。它是策划留学生全体活动的机关，有会议场、演说场、日语教室和俱乐部等，更是留学生书刊的翻译和出版的总部。

松本龟次郎在《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中指出：

在今日的中国青年会会馆设立之前，留学生用这里作为集会的唯一的场所。

---

① 关于1902年建成的考证，详见实藤惠秀著《清国留学生会馆》（《东亚文化国》第三卷第二期所收）一文。

② 细川是指《东语简要》的作者兼发行代表人细川小三郎。该书在日本语讲习会中用作教材。又鲁迅的《藤野先生》也曾提到，谓："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朝花夕拾》，页61）

③ 未详出处，据所引转译。——译者注

关于留学生的公共事务，常在这里商议决定。譬如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以及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运动的有关会议都在这里进行。来自中国的视察人员抵日时，也会循例会晤这里的干事。

1902年，奉袁世凯之命到日本视察农务的黄璟在他的《游历日本考查农务日记》上说：

> 九钟，与秦辉祖至支那留学生会馆。章宗祥、曹汝霖、范源廉、陆世芬、沈瑶、何厚僴等留饭，并赠以《问瀛录》……会馆章程、政法丛书、《译书汇编》。乃法政大学学生吴振麟等课余所译录，关于政治学术之书也。已印刷成编，南洋大臣已通饰所属全部购阅。①

同年清皇族载振所写的《英轺日记》也记有：

> 是日，中国学生五百余人，为欢迎会于会馆。请余一往临存。余于午初刻，率同参议、参赞各员赴会馆。使馆参赞铨林、翻译冯国勋咸在。会馆为学生总长暂租，在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田(町)19番地。房屋甚窄迫。余下车，诸生排班胥谒，彬彬有礼。余因近时学派歧杂，异说朋兴，爰将为学大旨，为诸生勉励数言。②

1903年抵日游览的周锠之所写的《东游日记》，这样说：

> 赴清国留学生会馆，晤张肇桐，捐金百元。③

李宗棠的《劝导留学生日记》中所录的公使杨枢的《学界风潮始末记》之中，所称"总会干事"即指会馆的干事。总会当是留日学生总会之意。

吴汝纶在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发生之时，会见日本外务长官珍田舍己，向他建议说：

---

① 《游历日本考查农务日记》，光绪28年7月19日条，页34。

② 《英轺日记》卷12，光绪28年8月4日条，页7。

③ 《东游日记》，光绪29年4月22日条，页16。

若欲明其〔留学生〕来历，则近来学生会馆有干事。若五人保一人，决无他虑。①

由此亦可窥见会馆干事的权威。

这些干事除了协商处理在日本发生的问题外，对新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加以照拂。《清国留学生会馆招待规则》有如下的规定：

一　东渡留学之士，因人地生疏之故，本馆特设专门部门，代为招呼，凡致函本馆者，本馆即尽招待之义务。

一　招待之地方有二，一在横滨，一在新桥。凡由神户上岸者，本馆之干事当至新桥招呼。由横滨上岸者，本馆之干事，当在横滨招呼。其于神户、上海、天津三处一律有本馆之赞成员，代为经理。即：

神户　冯悦甫君　神户市山下町清国领事馆

神户　孙实甫君　神户海岸仲通清商盛源号

上海　王培孙君　上海大东门内育材学堂

天津　张亦湘君　天津玉皇阁前日日新闻社

一　各省之东渡留学者，固可至本馆赞成员所在之处就询，并购买船票。一切情形，可于动身前七日先行致函本馆，以便于该日前往招呼。

一　取天津航路至神户登岸者，船抵长崎后，发函致冯君或孙君。言明乘坐何船，何日何时可至神户也。至时，二君代为照料，于神户易车之后，可托二君代为电知本馆（电费约二——三角）并车于何时抵京，本馆干事即至新桥招呼。

一　取长崎航路至横滨登岸者，可由长崎或马关致函本馆，谓船于何日何时至横滨也。届时，本馆干事即至横滨招呼。

一　东渡之士，行李物件，极力以少带为便。其烟、酒、绸缎各项入港时应课税者，决不可携带，以免多生枝节。

一　到京之后，或入预定之学校寄宿，或暂寓旅馆，一律听本人自便。

---

① 吴汝纶：《摘钞日记》，见《东游丛录》，页26。

一 本馆招待干事之一切费用，一律由本馆公款供给，至其本人之一切费用，则由本人自理。

一 本馆各处之招待人员，若有更动，当随时登报申明。

这些工作，一直都进行着。所以黄尊三的《三十年日记》中，在船抵横滨时，有"招待员萧立诚君引导乘搭火车"一条。苏高曼的《琐琐录》中也记录了在上海见到会馆干事钱承志。当他到横滨时，先他一步返抵横滨的钱承志又来迎接他，为他买车票，随行照料，到东京，又带他到爱宕山的旅馆。

会馆的二楼是教室。时常有日本语讲习会的开设。泰兴、葛梦朴合编的《东语简要》的封面就有"清国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会出版"的字样。

会馆有时也有跳舞的练习，试看鲁迅《藤野先生》的记载：

> 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①

鲁迅对此事，虽然不大高兴，但他显然也同意这是留学生的出版本部。

建此会馆的励志会会员，本来已创设了译书汇编社。此社既编印杂志《译书汇编》，又出版了很多书。开始时，是以东京牛込区喜久井町20番地和东京本乡区丸山新町19番地两处作为发行所的，但《译书汇编》第2年第三期(封面是3月号，封底内是明治35年6月发行)的"代派所"(即经销处)，则是清国留学生会馆。(到了1903年的旧历正月初一日，留学美国的严一所著《进化要论》出版时，就由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18番地译书汇编社发行了。由此

---

① 《朝花夕拾》，页61。

可知这个社已迁到留学生会馆去。)

继《译书汇编》后有《游学译编》，其发行所是湖南人组织的湖南编泽社。《游学译编》第六册(1903 年 3 月)封面里有特别广告，说：

> 本社编辑部现移置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 18 番地，凡有意惠函请迳寄此处为祷。

在这册的通告中刊出了《劝同乡父老送子弟航洋求学书》一文，长达 26 页。① 可说是较会馆的《招待规则》更为亲切周到。

在这杂志中所见的会馆名称并不一致，有：清国留学生会馆、支那留学生会馆、中国留学生会馆等三种称呼；而其他刊物亦有类似的称呼，但以称清国留学生会馆者为最多，大概这是当时正式的名称吧。

自始即以留学生会馆为发行所的有福建留学生组织的闽学会。此会亦有发行单行本。

湖北法政编辑社亦设在会馆中。出版讲义式的《法政丛编》24 册，及其他刊物。

早稻田大学学生卢弼等于会馆中设政治经济社，翻译出版早稻田大学教授的书。

留学生会馆不仅是这些团体的根据地。个人刊行书籍时，亦多以此会馆为发刊所或经销处，不能一一尽录。

留学生办的杂志《江苏》和《湖北学生界》(后改题为《汉声》)的出版部都是留学生会馆。这虽是地方性的杂志，但事实上它们的水准却比中国国内的杂志还要高，拥有广大的读者，具有很大的影

① 《浙江潮》第 7 期(1903 年阴历 7 月)页 30 刊载的《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中有说明。虽然地方性的差别仍然存在着，但各省的留日学生均希望内地多遣派学生出国，此为当时一般的风气。

响力。

大量购买这些书和杂志后，兴冲冲地走下皂荚坂的留学生中，鲁迅也是其中一人。这些书刊藏在他们的归国行李中，流传到湖南、四川、广东等地……将新文化的气息传遍中国。

清国留学生会馆就是这样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05年，当反对《留学生取缔规则》运动发生之时，各省代表曾于12月3日在这会馆中商议对策。由于日本政府当局拒绝了留学生的要求，留学生决议集体归国。在12月24日发出的"总会公布"中①声明：因为一齐归国，已将留学生会馆移交屋主。但翌年又因很多留学生重返日本，会馆得以仍旧继续维持下去。不过，会馆的结束的原因，却已蕴藏在这次事件中。

日本既然独占了中国留学生的教育，西洋诸国自感不快。在那时候发生了这事件，各国当然拍手称庆。在事件初起之时，美国政府已通过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进行活动了。该协会派出赖安博士及张佩之前赴东京，在美国驻日大使协助下，对清国驻日使馆及日本各学校的留学生人数、学习情况及生活情况等展开详细调查。1906年春，在神田的日本青年会馆中有华人青年会的组织，此即后来之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

该会因教授英语，吸收了很多会员。1907年，在早稻田设分会。1910年，更脱离日本青年会馆而独立，设本部于北神保町，从此成为中国留日学生的大本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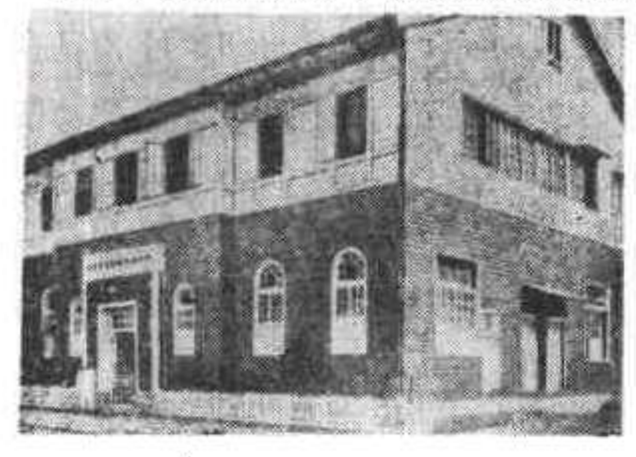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从出版的书籍刊物来看，清国留学生会馆的最盛时期是1906年。到了1907年，会馆出版的书却只有《最近统合外国地理》(山上万次郎著，谷钟秀译)和《东语简要》第四版两种，似乎都是无关重要的书。约在这一年的前后，皂荚坂上的清国留学生

---

① 李宗棠：《东游纪念》之七《劝导留学生日记》，页34。

会馆似亦由衰微而至关闭。以后，基督教青年会逐渐成为留学生聚会的新场所。

在大正时代，北神保町的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中华青年会馆），成为中国留学生反对二十一条款，反对西伯利亚出兵和反对日本其他的对华侵略的群众运动的参谋总部。



〔图 7〕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后期）

会馆虽毁于1923年的东京大地震，但不久即行重建。原有的会馆似是三层①，重建的却是两层和木造的。楼上是宿舍，楼下则有讲堂，食堂及留日书店、洋服店等。讲堂还时有留学生的戏剧表演。又根据食堂的规定，除了特定的菜肴外，馒头、米饭都可无限制地取食。留日书店中有许多中国的新刊书和杂志发售。

这个青年会在1935年1月8日失火焚毁，在来不及修复的期间内，中日两国已卷入了那场不幸的战争之中。

① 王拱璧:《东游挥汗录》第七章第8页记:"由'维新号'赴神田区警察署，经过中华青年会门口，时余居此会临街三层七号，闻声推窗，……"，可见最初会馆有三层。

第四章 留学生与日本人

一 部分日本人的好意

为感恩图报而教育留学生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军政人员之中马上有人向中国高官说项，力陈中国人有必要留学日本。参谋总部的福岛安正大佐及宇都宫太郎少佐，历访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袁世凯，大力主张派遣陆军留学生。而贵族议院议长近卫笃麿，前司法大臣清浦奎吾等人，在旅游中国的时候，也对有力人士力陈教育之重要。张之洞撰写《劝学篇》也可能受到这些日本人的启示。1898年3月，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对总理衙门称：为了增进中日友谊……日本愿意负担二百名中国留日学生的经费。① 因此，从1898年起，中国派遣大量留学生到日本。但是，到底日本政府有没有承担留学经费，就不得而知了。②

为了中日友好而教育中国留学生，这是日本一贯的对中国人的教育观；直到1930年代，这句话依然经常挂在日本人嘴上。尽管如此，妨碍中日友谊开花结果的原因，偏偏发生在日本方面。

不过，在留学史早期，当上述教育观形成之初，日本人的确抱

①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页24。

② 根据《日华学堂日记》，去外务省领取留学生教育费的记录是有的，但这笔费用，究竟由外务省负担抑由清政府的公使馆经外务省而发出去，则不得而知。

有协助中国独立这番大公无私的诚意。在这番诚意的背后，隐藏著日本人对于多年来承受中国恩惠的感谢之念。如前所述，前驻华公使大鸟圭介于1899年在学士馆演讲《对华今昔感情之变迁》时，就强调当日教育中国留学生，是为了“以酬往昔师导之恩义”。①

同年，日本在栃木县举行陆军大演习，陆军省邀请中国文武官员莅临参观。四川省派遣武官丁鸿臣及文官沈翊清赴日。二人于阳历10月27日拜会参谋总长大山岩元帅，受大山元帅的谈话所感动。丁鸿臣记录当时情形如下：

> 拜参谋总长大山元帅，言中日协力之事。谓唐以来，日本饮食、衣服、起居、学问之事，皆中国贶之。今日之愿助力者，不惟辅车唇齿之义，亦以报往日之赐。意至谦笃。②

沈翊清亦记道：

> 大山总长云：“汉唐以来，中国以汉文为日本开风气，兹日本所讲求各国武备，如可采择，亦所以报中国也。”大山元帅魁梧奇伟，谈吐亦温雅。③

以上虽然并非针对留学生而言，但早期日本人对留学生之态度相信不会相差太远。

日华学堂的教师

1899年，高楠顺次郎创立日华学堂。该堂堂监（教务主任）宝阁善教的日记，详述留学生教育情况；下面两段记录，可见其欣慰心情的一斑：

> 明治31（1898）年10月30日　星期日　晴　早餐后分发洋服的附

① 《太阳》第5卷第10号。

② 丁鸿臣：《东瀛阅操日记》卷上，页37。

③ 沈翊清：《东游日记》，页22。

属物品给学生。他们一齐动手穿着新制的洋服，卷起辫发，戴上帽子，穿上皮鞋，一身学生新装，判若两人，喜不自禁，在镜前照来照去，好象女孩子穿上最漂亮的衣裳一样，乐不可支。一同走访孙君，共赴厚生馆①。见到他们沾沾自喜，得意洋洋的样子，我也情不自禁地感到愉快……黄昏返校，学生都说整日散步颇为愉快。

12月19日　本周放假，承梢原，高楠诸先生委托，我编造日清学校创办经费及百余留学生寄宿经费之预算，并且编订修业期限五年的课程计划，花了一天工夫。晚饭后与学生谈话，尝试勉励他们立定决心，学业未成，誓死不归。

由此可见这所学校的教师对其学生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真诚地从事教育。

明治32（1899）年5月27日　郑康耆携乃父促其立刻归国的家书往见教师田代氏，该氏用日文写了篇送序，诚恳地劝郑生再来留学。

5月31日　大雨　孙勤氏来校，拟用酒食招待旧生，但我们依本校规定，予以谢绝。

6月13日　杨廷栋起程归国，教师土屋氏偕学生七人送别于新桥，而教师梅原氏赠以送别诗，舍监田代氏赠以长篇日文送别序。

8月4日　吴振麟今晨起下痢数次……是晚田代氏偕校工二人，拭擦吴生赴厕途中所遗粪便，看守病人至午夜12时。②

后来，宝阁友人广江万次郎在中央商业学校的刊物《宝阁先生追悼号》，作了如下的追思：

［宝阁君］在大学就读期间，接受高楠顺次郎博士的委托，负责监管中国留学生。他住在学生宿舍，起居饮食都和学生在一起，朝夕照顾；宝阁君也是学生身分，故其表现非常出色。的确，以宝阁君的性情，最适宜担任教育工作。我多次到其宿舍探访，这不但是为了交谊，而且为了察看实际情况，因而发觉中国学生非常钦服宝阁君，且勤奋向学。他自己

---

① 厚生馆，即卫生健康馆。——译者注

② 宝阁善教的《日记》。

亦于学业之暇，以辅导帮助学生为唯一乐事，其态度实在是和蔼可亲。

中岛裁之与东文学社

本愿寺学校的创办人中岛裁之，1891 年访问中国，游历十四省；1898 年，成为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吴汝纶的弟子。当时，他遵从吴氏意旨，为其同学讲授日语与英语。1901 年 2 月，他在北京拜谒吴汝纶，商谈创办东文学社的事。由于吴汝纶侄婿廉泉的斡旋，获得《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一千元的资助，借用北京外城锡金会馆开始讲学；六年间共有 1767 人入学。

为甚么中岛氏投身教育中国人的事业呢？照他的解释是：第一，“余非以利害关系，始力谋开发中国风气者；而实纯出于一片宗教心情，冀将一己之所欲而施之于人。”① 第二，“余之所以于贵国从事教育工作，系拟报答贵国昔日之恩义也。”②

中岛氏这样热心于中国人的教育，倘若中国因而强盛，对日本来说，岂非造成危险？中岛氏有以下答案：

1. 中国一旦步入开明盛运之域，则与日本之贸易便会增加，而日本对外输出亦将增加。

2. 日本在非常时期，可以向清廷借债。

3. 邻邦能够抑制强国，日本始能永享安定，而有利于国家发展。

4. 从历史上观之，中国虽以四百州之大，亦未尝毁灭日本。

5. 中国人以利字当头，讲求个人本位主义，故国家主义不会在中国形成。

中岛氏食素禁酒，以教育为乐。学生不必交付学费。若为学校筹款，千方百计，他亦不以为耻；但是对于无缘无故的捐赠，他一定坚决拒绝。学生如果不听话，他总是认为自己有所不逮，学生才会如

---

① 《东文学社纪要》，页 180。

② 同上书，页 164。

此，于是以鞭子鞭挞自己，直至鞭子三断四裂而后止。学生见到此种情形，往往惶恐失色，从而不敢再犯，改过自新。

鲁迅与藤野先生

中岛裁之先生在中国热诚地讲授日语；与此同时，藤野先生在日本亲切地教导鲁迅。鲁迅离开胡混学生渊薮的东京，转入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而担任骨学一科的是藤野严九郎先生。鲁迅回忆藤野先生，说：

>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
>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
> “可以抄一点。”
>
> “拿来我看！”
>
>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①

藤野先生不但关怀鲁迅的学业，而且能体察他的情绪。在开始做解剖实验之前，藤野先生便担心鲁迅这个中国学生因敬重鬼神，肯不肯解剖尸体呢？

当鲁迅因幻灯片事件决定放弃学医，离去仙台，向藤野先生辞行，先生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在鲁迅出发前几天，先生请鲁迅到家里去，送给他一帧照片，

---

① 《藤野先生》，见《朝花夕拾》，页63。

后面写上"惜别"二字。

返国之后，鲁迅并没有忘记藤野先生。他把先生改正的笔记，钉装成厚厚的三册，慎重地保存。藤野先生所送的照片经常挂在他的书桌前，每当他夜间工作疲倦，正想偷懒之时，仰面一见藤野先生又黑又瘦的面孔，便立刻受到激励，鼓足勇气，再工作下去。

二 一般日本人的态度

竹内好在《藤野先生》一文的"解说"中指出："作者对藤野先生所以表现如此敬爱之情，大概是忘不了周围的黑暗吧！"①

"周围的黑暗"是指甚么呢？那是指一般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这态度是一片黑暗的。由于周围都黑暗的缘故，一两线幽光的出现，就分外引人注目。

请看鲁迅的周围，与鲁迅最接近的日本同学吧。他们认为"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学生会干事因此到鲁迅寓所搜查其笔记，翻检一番，企图证明藤野先生泄漏试题给鲁迅知道，并给鲁迅一封匿名长信。信中第一句话是："你改悔罢！"

这类情形不仅在仙台发生。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翻然改态，蔑视中国人。蔑视中国留学生的不只是他们的日本同学，社会上一般日本人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更是等而下之。如前所述，上田万年在其《关于中国留学生》一文，察觉到留学生蒙受极大委屈，他们的生活，实已处于"是可忍，孰不可忍"② 的境况中。

面对日本人的轻蔑，中国人心里作何反应呢？在梦芸生1906年的警世小说《伤心人语》中，有不少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故事，其中

① 竹内好译：《鲁迅选集》第 2 卷，页 286。

② 《太阳》第 4 卷第 17 号（1898年 8 月 20 日）。

有《车夫与留学生问答》这一出活剧：

> 在日本，认字的人甚多，连车夫走卒亦看报纸，也知外国事。
>
> 日本自战胜俄国以来，举国上下都轻视中国人。即使拉着黄包车走路的车夫，也常常回头与坐车的留学生聊几句。以下是车夫和某个留学生的对话。
>
> "日本和俄国打起仗来，现在日本打赢了，你知道吗？"
>
> 留学生因初次来到日本，听不懂话里的意思，就马上回答说：
>
> "是，知道。"
>
> 车夫见此，更显得意之状，笑着说：
>
> "这样一来，老兄，你不羡慕吗？"
>
> 留学生还是听不明白，只有应道：
>
> "是，是的。"
>
> 车夫知道自己的话，对方大概也听不懂，就继续说下去：
>
> "对着支那人，讲甚么话，他们都听不懂的啊！"
>
> 这样的对话，东京的留学生一日之中不知碰上多少次。听了使人内心悲恸。一提到这种事，任何人都要生气。若不是自己亲临其境，亲见其事，个中苦痛，恐怕不能了解。

其实清末的情况尚不算太坏，因为两国政治纠纷并不太多。一入民国时代，日本进行其露骨的侵略政策，步步紧逼，中日两国间的冲突因而更尖锐起来。民国以来，中日间冲突的事件，其大者计有：

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款；1918年，日本迫中国共同出兵西伯利亚；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主张接收德国在中国的"权益"（为反抗日本侵略，爆发了五四运动）；1929年，日军为了阻止北伐军的前进，发动了济南事件等。这些都是日本接二连三搅出来的、令人不能容忍的侵略行为。最令人发指的就是"九一八事变"和"芦沟桥事变"，其间小型事件更不断发生，使留学生非常愤慨。

日本当政者的国家优越感及其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影响著一般的日本国民，使人人都怀着对中国和中国人轻蔑的态度。直到投降前，日本小孩子嘲弄别人时，常常爱说："笨蛋笨蛋，你的老子是个支那人！"

郭沫若的自传小说《行路难》，记述留日学生爱牟的辛酸事迹。爱牟一家原住福冈箱崎，由于积欠房钱，被房东撵了出来。他忍痛典当了《歌德全集》，拿了钱到唐津找房子。房东太太看来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他用日本姓名顶报上去。此时，留着两端向上翘曲的"该撒"式髭的房东带着一头 pointer 猎犬回来了。房东比他的猎犬还要敏锐，两眼向爱牟一相，便问："唔，贵国呢？是上海？还是朝鲜？"爱牟以为自己真面目被识破，于是答道："我是中国留学生。""哦，支那人吗？"房东太太的口中平地发出了一声惊叫。爱牟逃到岸边，远眺连接祖国的大海，思量着：

> 啊，这儿是遣唐使西渡我国时的旧津。不知道那时候的日本使臣和入唐的留学生，在我们中国曾经有没有受过象我们现在所受的虐待。我记得那阿部仲麿到了我们中国，不是改名为晁文卿了吗？他回日本的时候，有破了船的谣传，好象是诗人李白做过诗来吊过他呢，钱起也好象有一首送和尚回日本的诗。我想，那时候的日本留学生，总断不会象我们现在一样连一椽蔽风雨的地方也都找不到罢？我们住在这儿随时有几个刑事侦伺。我们单听着"支那人"三字的声音，便觉得头皮有点吃紧。啊啊！我们到底受的是甚么待遇呢？
>
> 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在说这"支那人"三字的时候便已经表现尽了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字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啊，你们究竟意识到这"支那"二字的起源吗？在"秦"朝的时候，你们还是蛮子，你们或者还在南洋吃椰子呢！
>
> 啊，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你要知道我假冒你们的名字并不是羡慕

你们的文明；我假冒你们的名字是防你们的暗算呢！你们的帝国主义是成功了，可是你们的良心是死了。你们动辄爱说我们"误解"了你们，你们动辄爱说他人对于你们的正当防御是"不逞"。啊！你们夜郎自大的日本人哟！你们的精神究竟有多少深刻，值得别人"误解"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你们别要把别人当成愚人呢！你们改悔了罢！你们改悔了罢！不怕我娶的是你们日本女儿，你们如不改悔时我始终是排斥你们的，便是我的女人也始终是排斥你们的！……①

在夏衍的剧作《法西斯细菌》第一幕，留学生赵安涛说：

国家到了这个田地，我再也不能安心住下去了。号外满街飞，我在街上走，觉得每一个日本人的眼光，都是一根刺……。（俞实夫默默地点头）②

民国以后，日本人对中国人轻蔑（或憎恶）变得更厉害，这一点当局也承认。1922年3月9日，荒川五郎在众议院就《关于退还庚子赔款之建议》发表演说时，承认：

负笈东来之留学生……将来前途皆未可限量者，惟我辈日本人平素对彼等之待遇，实多值得遗憾。连宿舍之女佣及商店之伙计，亦持冷骂冷笑态度。……是以彼等学成归国之后，殆成排日之急先锋，是亦不得已者也。

如前所述，留日学生多与其留学国——第二故乡为敌，投身于排日和抗日运动；最大的原因是他们留日时，早就看穿日本侵略的野心。留学生王拱璧在其《东游挥汗录》的序文写道：

余游学日本，恰似被盗苦主游观盗窝。无论何处，皆可发现其赃物盗谋。又似老幼被虏，偶入虏居，得见宗翁之粪，酿儿之脍，鼎镬杂陈，奋房饕飧，纵使精神麻木，意志疏懒，亦思呼号家人御盗伐虏。③

① 《沫若文集》5，页178—186。

② 《夏衍剧作选》，页152。

③ 《东游挥汗录·冠辞》。

日本国策使一般日本人的眼光刻薄起来，经他们说出的“支那”一词令人难以容忍，留学生坚决反对这个词汇，而日本人也顽固地予以反驳。这个国号问题，简直是留学生与日本人之间恶劣关系的象征。

三　国号问题

在明治时代，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的绰号是“猪尾巴”或“豚尾奴”。甲午战争后，这个称号，便开始流行起来。在《画报·近代百年史》第6集第483页，关于甲午战争之后的情况，有这么一句话：“小孩子侮辱居留日本的中国人的情景，使外国记者也大皱眉头。”在一幅图画上，有两个中国人为日本小孩子所侮辱，傍边虽然有日本警察，并不加以制止。这幅图画附说明如次：

> “日本胜利！支那败北！”——清国人走到街上，总是听到日本小孩子这类侮辱性的叫嚷，而日本警察总是视若无睹，袖手旁观。



〔图8〕中日甲午战后的街头景象

从这时候起，日本人所称“支那”这个名词，似乎另有含义。

首批留日学生十三人中有四人中途退学归国，原因之一就是

忍受不住"猪尾巴！猪尾巴！"这种嘲弄。

这时候，中国人对于"支那"或"支那人"这种称呼，似乎尚未产生反感。留日学生所发行的《大陆》杂志的发刊词，有这么一句话："善哉！我支那之大陆乎？……陋哉！我支那之大陆乎？"

"支那"这一称谓，不但出现于中国人的文章，甚至用作书名。例如：

《支那三百年史》，三宅雄太郎编辑，上海开明书店发行。

《支那史要》，市村瓒次郎著，陈毅译，上海广智书局发行。同书的另一译本是《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支那少年编译，上海支那翻译社出版。

增田贡《清史揽要》被故意改题为《支那最近史》，由上海书局翻印。

梁启超笔名之一是"支那少年"。他的著作《李鸿章》封面上用"支那之怪杰"为题签。黄兴等人所创办的杂志，题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

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存藏好几册毕业记念题名录，称作《鸿迹帖》。其中第四册（1907年度的一部分）共有九十五人执笔题字，有卅三人只写姓名，不附籍贯，但有六十二人附记籍贯。这六十二人自称国号如次：

支那	18
清国	12
中国（包括"中华"）	7
不附国号者	25

在这里，使用"支那"国号，是含有否定清政权的革命意义的。

1911年版《普通百科大词典》所收"支那"和"支那语"多条，并无任何厌恶的含义。

在以留日学生为题材的著名通俗小说《留东外史》（1916年起

陆续刊行，共十集)中，有以下一段故事。

> 暑假期中，黄文汉游箱根，宿于汤本的福住楼，正想出外散步之际，碰上陆军少尉中村清八，便交谈起来。
>
> "贵国是清国吗？"中村问。
>
> "不是。"
>
> 中村感到有些诧异，又问：
>
> "是日本吗？"
>
> "不是。"
>
> "那么，是朝鲜吧！"
>
> "不是。"
>
> "那究竟是何处呢？"
>
> 黄文汉正色地说：
>
> "是世界各国公认的中华民国。"
>
> 中村随即大谈中日亲善论。黄文汉听后，有意要戏弄中村一下，便说中国若为列强所并，则尤希望为日本所并，借此以试探中村的真意。中村听罢，眉飞色舞，说道："日本若出兵十万，一年之内即可平定四百余州。西洋人因为不放心，所以不会依你们的意愿做事的"。黄文汉因此又问他："中国一旦强大了，对日本是好的呢？还是坏的呢？"中村又谓这不会成问题。黄文汉砰的一声敲打桌席，大声喊道："日本没有中国，能活下去吗？铁呀、米呀、棉呀、都是从中国输入的。"说著更向中村挑战，要和他角腕力。中村自知理亏，只有鬼鬼祟祟地走开，以后再没有出现。①

在这本小说里，周正勋被日本人嘲骂为"豚尾奴"，作者的注解说：

> 日文字典中、并无此字。其义不得知，大抵为日人用来骂中国人之词也。②

① 《留东外史》第1集，页99—103。

② 《留东外史》第2集，页101。

从上面两个故事看来，在大正时代(1912—1926)初期，“支那”一词似尚未成为问题。但是，以“支那”为国号，由于不知道日本人的葫芦里卖甚么药，中国人心里毕竟还是有点不舒服的。

听到日本人口称“支那”而感到不快的，是在二十一条、出兵西伯利亚、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事件，日本的野心接二连三暴露以后的事。

在王拱璧《东游挥汗录》(1919年11月初版)，收录了《日本外交之概略——对支根本政策》一文①，有下面一段话：

倭近五十年来之外交真相，舍对华而外实无外交价值之可言。盖倭人自战胜前清以后，即称我华为“支那”，垂为国民教育。且多方解释支那二字若无意义适可代表华人之蒙昧者，于是支那二字乃风行三岛，以资倭人轻侮华人之口实。每逢形容不正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种教育早已灌输其国民之脑海。迨至今日，虽三尺童子，一见华人，亦出其一种丑态，曰：“支那人”、“支那人”。恍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也者。此皆由于倭人“对支根本政策”作成之教育，绝非一朝一夕之故，况现在倭人正事推广此种教育，以增长其国人之侮华程度。②

在这段文字之后，王拱璧做了注，指出“支那”二字从印度而来。“支”即为隋，而“那”是语尾。本来是“摩诃至那”(大隋)之意。他这样说：

纵有人称我国以外号，亦当称“摩诃震旦”。今假扮[日本]以宗承华夏之族，吟哦汉文之种，讲诵佛经之地，不惟中华民国四字、中国二字为彼邦所不齿，即摩诃震旦亦靳不我称。称我支那又将冠词“摩诃”二字削去。报界及著作俳演均仅用“支那”二字，政府公牍则舍“中华民国”四字之简，而用“支那共和国”五字之繁，是对我不但无国际敬仪，并不以国家

① 作者认为这是一位留日同学净生的作品。——译者注

② 王拱璧：《东游挥汗录》，页10。

视我也。是我中华民国成立八年而倭人尚不承认也。犹忆当民国肇造之初，倭人闻我将以“中华民国”名我国。即由著名浪人某图请我民党领袖，易以“大汉”，希冀离我五族，从可知堂哉皇哉之“中华民国”四字早为岛国君民所不喜矣，推其用心，直不愿地球上有中华民国之产出也。①

从这时候起，留学生对出自日本人口中的“支那”一词，非常反感。在下面篇幅，我们对一些文献略加注释，并追溯这个词汇的历史。

首先略谈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语言和文字都是用来传达思想与感情的。但是，两者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②

大体上文字可以改变语言，但不能改变一般通用的语言。在语言上，有男性、女性的音调；即使在同性的语言上，也因人而异，有多种不同的个性，有高有低，有强有弱，因而得以表露喜怒哀乐的感情。故此，语言是多方面的，而文字是单方面的。

若从文字立场来看，“支那”这一词汇是中国人用汉字音译印度语而来，千多年来，没有变化。不过，在尊敬和鄙视的场合，其音调完全不同。因此，出自日本人口中的“支那”一词，其音调也有变化。后来他们用明治时代对所谓“豚尾奴”的态度去对“支那人”，故使中国人反感。故此，在明治时代留学生觉得没有问题的“支那”一词，后来却成为大问题。

五四运动前后，留学生不断反对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郁达夫在其小说《雪夜》记叙自己在东京的经历。当时的东京有小石川区植物园，郊外武藏野有井之头公园，都是幽雅胜地。

你若于风和日暖的春初，或天高气爽的秋晚，去闲行独步，总能遇到

① 王拱璧：《东游挥汗录》，页 17。

② 详见实藤惠秀著：《日本语の纯洁のために》中的《言语と文字はどうちがうか》一节。

些年龄相并的良家少女，在那里采花、唱曲、涉水、登高。你若和她们去攀谈，她们总一例地来酬应；大家谈着，笑着，草地上躺着，吃吃带来的糖果之类，象在梦里，也象在醉后，不知不觉，一日的光阴，如箭也似的飞度过去。而当这样的一度会合之后，有时或竟在会合的当中，从欢乐的绝顶，你每会立时掉入到绝望的深渊底里去。这些无邪的少女，这些绝对服从男子的丽质，她们原都是受过父兄熏陶的，一听到了弱国的支那两字，哪里还能够维持她们的常态，保留她们的人对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想象不出来的。①

郁达夫的《沉沦》中出现了这么一个场面：作为留日学生的男主角，在听到一位漂亮的日本餐厅女侍应问："贵国是哪里？"，就结结巴巴地欲言还止。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他全身发起抖来，他的眼泪又快滚下来了。②

郭沫若在《关于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态度》一文说：

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本来支那并非恶意，有人说本是"秦"字的音变，但出自日本人口中则比欧洲人称犹太人还要下作，这态度最显明地是表现在他们表示国际关系的文字惯例上。

英支、法支、德支、美支、俄支、鲜支、满支，中国始终是处在最劣等的地位的。这些表现稍稍留意他们的新闻纸，便可以明白。而且最可佩的

---

① 郁达夫：《雪之夜》，见《宇宙风》一卷六期(1935年12月)。

② 郁达夫：《沉沦》，《郁达夫全集》，页29。

是他们的整齐划一。①

1930年，中国政府对1919年以来留学生所关注的国号问题作了反应。据同年5月27日《东京朝日新闻》报导：

今起禁用"支那"称呼——国民政府训令外交部

〔南京26日电〕日本人称呼中华民国为"支那"，素为中华民国所厌恶，今日国民政府对外交部发出训令如下，显示其禁绝"支那"称呼的决心。

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十日后，在6月5日《东京日日新闻》的"角笛"栏（读者来函栏）上，出现了下面一篇文章：

"支那"与"中华"

据南京电讯，支那政府已决定不接受一切来自日本政府而使用"支那"一词的公文。今后的公文往来，一律要称支那为"中华民国"。

但是，"中"及"华"之语，是自古以来支那对夷狄傲慢的自称。然而，在支那境内的东夷西戎及南蛮北狄，久已统属于所谓"中"或"华"的版图内，故对内部而言，早该没有中、华、夷、狄之别。

今日对外拟用"中华"之名，其实含有鄙视列国为夷狄之意，对列国可谓无礼之极。故此，支那在讨论使用不使用"支那"称呼之前，实宜先行以适当文字，取代"中华"二字的称呼。

况且，支那政府并不能判明"支那"一语的起源。此语自远古时代使用以来，并无包含侮辱之意。就法理而言，支那政府理论上当可决议正

① 载于《宇宙风》1936年9月。

其国名为中华民国，而不作支那。惟坚执拒绝一切习惯使用之称谓，态度则未免过激。尤其是中华民国本身自写的英文名称作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其中的 China，敢问难道不是支那吗？（七朗）

同栏在 6 月 8 日刊出以《中华之称呼》为题的短文，驳斥上文：

正如七朗氏在本栏（5 日）所指出，国民政府决定拒绝接受使用"支那"一语的公文，同时自订英文名称为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确不免使人感到有些矛盾。不过，对方希望改称为"中华"或"中国"，我国是没有理由置喙的。

人的姓名，即使不合乎其本人性格，谁都不会因此而不称其姓名。国名既然是专有名词，不管它是否傲慢抑或无礼，大概亦不应去之而后快吧！准此以言，我国"日本"这个名称，在外国人看来，也许亦会认为是个自尊自大的名称啊！

"支那"一语，即使不含侮辱的意思，但究竟并非正式的国名。若仍坚持用之，就好比以绰号称呼人家，难免招惹别人的不快。我们不但不应责难其国名过于美丽，要求改易，反应承认彼等所认为正当的名称。这才是民族间交际的正当礼仪。

有关此次远东大会的报导，多数新闻报章已改称中国为"中华"，本人甚为高兴。新闻界走在社会的前端，今后的报导，极应作如是的改革，是所至祷。（实东）①

1930年底，虽然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国"为"中华民国"，但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及口语，仍然沿用"支那"名称。对此，留日学生每投书报纸要求停止使用"支那"一语，而日本人亦投函反覆辩驳。总之，日本人并无决心放弃"支那"一词的使用。

1940年，当中日战争之际，大众作家菊池宽以国民使节身份访问占领区后回来，在《文艺春秋》杂志撰文，主张日本"此时似宜改掉对支那人的称呼"，颇引起社会的注意。1941 年，大政翼赞会为

① 实东为实藤惠秀的笔名。

了"宣抚"占领区的人民，呼吁停止使用"支那"一词，改用中国称号。虽然改变称号的问题在新闻杂志上热烈地讨论过一阵子，但最后还是没有效果。

日本人喜用"支那"而拒用"中国"的心理，直到战后依然继续保存下去。具有这种心理的人，以从事中国研究及与中国有关系的人为多，其他人士对这个问题大体上并不关心。让我们举津田左右吉和谷崎润一郎两人的作品为例吧。

> 我一直称支那为支那，用日文字母写为シナ。支那这个名称，并不是自古以来支那整体的地理名称、民族名称、或我们所指的国家名称，而是秦汉唐宋等不断变化的王朝的名称而已。当我们考虑把自古以来的支那视为一历史整体之时，以"支那"一词称它最为恰当，而且此亦为世界所通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名，是该国成立之后的名称，并非自古以来支那的通称。秦汉唐宋等实为王朝之名，其名互异，但同为支那则一。故在正式场合及政治意义上，须以中华民国的名称作为今日支那的国名，但不能同时以之指称昔日的支那，特别在指称古代文化的时候，我们断不能用此。又，"シナ"一词多写成"支那"，原无任何字义，有人写成"至那"或"脂那"，亦有人写成"震旦"或"振旦"（震、振二字互通），我则写作"シナ"。此名虽然出"秦"字而来，但其意义却与"秦"迥异。（津田左右吉）①
>
> 甲午战争时，吾人称中国人为"Chanchan"（猪尾巴猪尾巴），又称之为"bōzu"（"坊主"，秃子）。此与欧美人士称吾人为Jap之意义相同。然而，说Chanchan时，其音色尚带些许好感，Jap就完全不是滋味。Chanchan是因当时日本小孩子觉得有趣好玩而来，至于连着bōzu一同称呼中国人者，都是幼童。不过，这个对中国人甚为无礼的称呼，到了他们废除蓄辫之后，我们亦渐渐不再使用。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约是1946年左右，报载郭沫若氏的谈话："日本人称我们中国人为支那人，这是令人不愉快的事。这是他们轻侮中国人的证据，今后宜加改正。"——正确字

① 参看津田左右吉著：《シナ文化研究の态度·附言》（见1949年3月《新中国》第1号）。

句我已记不起来，但我的确是读过这样内容的新闻报导。象郭氏一样精通日本事情的人，也作如是观，真使我感到意外。战后，我们不再使用引起中国人如此不愉快的支那一词，而尽量使用"中国"去代替，这都是事实。我辈文人，有些人使用支那一词，其心理与欧美人士使用 China 一语，并无二致，故不得谓此词在战前含有轻蔑之意。(实藤注：对于古代来说，容或如此，对于现代来说，则不无可疑之处。)又，日本内地自古便有"中国"这个地名，用起来容易与支那引起混淆，故有时不得不以"支那"称呼中国，其情形与称"露西亚"为"苏维埃"(Soviet)一样。①

大正时代(1912—1926)以后四十余年间，日本人拒用"中国"这个称呼，大抵有四种理由：

1."中国"是个傲慢的名称；

2.作为历史上的通称，除"支那"之外，便无更好的名称；

3."支那"，亦即 China，是世界性的名称；

4.日本国内有"中国地方"这个地名。

以下让我们仔细分析这四种理由可否成立：

1.中国是个傲慢的名称——这是通晓中国古典的汉学家的意见。他们认为支那人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是极其无礼的事！"中国"是个自高自大的称号。古代的中国，自以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而称东邻民族为东夷，西邻为西戎，南邻为南蛮，北邻为北狄。四周都是野蛮人，唯我独尊，故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这不是傲慢又是甚么！要日本人使用这一自高自大的称号，岂非一种侮辱。

日本人之中也有承认"中国"这个称号是理所当然的。古代日本人的确是以上述意义看中国的，因为事实上中国是东亚文化的中心。直到与中国接触之前，日本文化尚未发达。日本过去非常

① 1954年1月《老いのくりごと》，见《谷崎润一郎全集》第28卷，页252—253。

崇尚中国文化，派人到中国留学；这一点，只要翻开日本历史便会明白。在室町时代(1333—1600)，中国钱币成为日本的货币。足利将军虽受属国的待遇，叩头向中国要钱，依然感到荣耀。故此，在古代的日本，不但从中国输入精神文明，而且亦有过接受中国的物质援助的时代。

不过，光看古代事物是不够的。中国对自己的古代容或感到骄傲，但在鸦片战争以后，已痛感国势衰弱。这种衰弱不仅是在国势方面，连学问方面也承认了落后。这一点，中国人在五四运动以后，知道得更清楚。与西洋比较之下，总觉事事不如人。故此，中国人已把中国这个国名看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在中国二字旁边或下面，划上了一画"专有名词线"，除了表示是一个名称外，别无其他含义。

若不明了上述的演变便贸然说："你的名称好得可以，不许讲！"——就未免太不合情理了。即使个人命名，大都取个好听的名字，既是专有名词，当然人人都可用。更何况是国名！"日本"这个名称又何独不然？所谓"日本"，即指太阳的出处，亦即意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地方。其实，当地球是球体的事实已成为常识的今日，我们根本就不能再说甚么日出之处之类的话。但是，日本一词还不是照用不误？汉学者流所指"古代支那自高自大"，这一点说得不错；但他们忽视以后的演变，因而犯了错误。

2. 作为历史上的通称，除"支那"之外，便无更好的名称——对东洋史学者来说，这是个不可变动的结论。他们认为支那这个国家，自古以来便是一个"易姓革命"的国家，王朝老是变动，不象日本一样"万世一系"。秦、汉、唐、宋、元、明、清等不断改朝换代。要称呼总体的支那，没有比支那更好的名称了。这似乎是言之成理的说法。

但是所谓"中国只能有支那一个称呼"，到底是甚么时候和在

甚么地方说起来的？时间这个问题容后讨论，让我们先看看支那一词究竟先在甚么地方说起来的。这似乎是在日本！因中国人通常是不会使用支那一词的。

那么，日本人所称"支那"一词，何时开始？

我辈在明治时代出生的日本人，是在一片"支那、支那"声中成长的，自幼便以"支那"去看待中国。但稍为翻阅古籍，便可知道支那一词，从前叫做"唐土"或"唐"。

然则，"支那"一词何时传来日本？如何萌芽？又如何发育起来的呢？

关于支那一词的词源，有五种说法。至于这个词汇在日本成为学术上和历史学上的问题，则是甲午战后的事。日本人在此时喜用支那一词是有其原因的。一说谓此时的支那是指"印度支那"；另一说谓因"支那"在印度语中，表示智慧之义，而中国人有优越的智慧，故得支那一名。最易被人接受的一说是：秦始皇声威远被印度，而秦字的读音是 Chin，印度人在 Chin 之后加上母音，向东流入中国，向西传到欧洲。在欧洲，中国读作 Chi-na、China 或 Chine。中国唐代不少僧侣到印度学习佛法，在该国听到别人称中国为 Chi-na。正如一般出洋人士一样，这些僧侣也爱仿效别国语言，故称中国为Chi-na（支那）。在他们所译的佛经上，往往出现"支那某地某人译"字样。这时候，Chi-na 是个时髦的词汇。Chi-na 的写法有"支那"、"脂那"、"至那"等。Chi-na 作为国名，也沿用印度语的读音，写成"震旦"或"振旦"。所以，对中国人来说，上述的名称其实都不过是用汉字写出 Chi-na 这个外来词的结果。

在日本古代，支那一词不过是偶尔用用罢了。例如，1106（嘉承 1）年出版的《东大寺要录》扉页，有"印度支那未尝见闻矣"一语。在这里，好象有追逐时尚、标奇立异的味道。在《今昔物语》中，有支那国。空海大师在其诗集《性灵集》中，有"支那台括曼殊庐"

之句。这段时期，或称中国为汉土，或称中国为中华，这些称号都已成为大家习用的陈词旧语，而“支那”一语，却别具一番新鲜韵味。

必须指出的是：《东大寺要录》、空海《性灵集》之类的著作，仅为学者所诵读，一般人无从问津，故支那一语并未成为日语词汇。

“支那”在甚么时候成为日语词汇的呢？就笔者所知，似以1713年为最早。当时，罗马人史多提(Sidotti, Giovanni Battista, 1668—1715)漂流到九州的屋久岛，旋被解送至江户（东京）幕府。幕府命学者新井白石调查其身世。白石趁调查的机会，从史多提处了解世界的情状，并作了笔记，后来整理，而成《采览异言》一书。这是一本关于世界地理的书，也有提及日本的事情。例如，称日本为Jāpan，注以“日本”字样。该书也提到虾夷，除以日本字母（假名）标出外，还用汉字“野作”（イエゾー）标示。印度则以“应帝亚”(India)三个汉字表出。关于チィナ(Chi-na)，则在左下角附以小号“支那”二字。而欧美地名，则全部用汉字拼写。当时用汉字标记的地名，虽然不难读，对于白石之流，是不得已的做法。白石用汉字标记地名的秘密，大抵是以《坤舆图说》为准绳的。《坤舆图说》是在中国出版的关于世界地理的书。中文没有字母（假名），地名全以汉字标示。白石参考过这本书，故此用汉字标示用日文字母写成的地名。从史多提处，白石听到Chi-na的读音，而他又见过“支那”二字，因此便以“支那”注释チイナ(Chi-na)。

在江户时代(1600—1868)，チイナ(Chi-na)或支那是常用的词汇吗？不是的。它只在一些地图上出现。《采览异言》一书可以说是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地图，中国全部以汉土称呼；在此之后的地图，多改用支那（但不是所有地图都如此）。

支那一词也曾在日本人的漂流记出现过。江户时代，日本人常常漂流外国。有些漂流者漂流到美洲，也有漂流到俄国去。他

们在美洲听到美洲人称呼中国为China，在记录时就写上支那二字，例如："シナのホンカンには"（在支那之香港）。特别有趣的是：他们给支那做一个注脚——"唐、唐土、唐山也。"这显示一般人对支那一词尚未熟悉。

新井白石死后约一百年，佐藤信渊写成了惊人的《宇内混同秘策》(1823年，文政6年)。这本书肯定日本是个神国，有能力征服全世界；先从满洲进入大陆，并吞支那，随著便可使世界各国沦为日本属下的郡县。本书强调中国懦弱，中国人卑鄙无耻。在此之前，是个崇拜中国的时代。住在江户山之手的汉学者，眺望品川海，不禁兴奋地说："啊，这个海是连接汉土的啊！"自本书起，轻视中国的思想开始出现了。该书称中国为支那。新井白石的支那是个单纯的地理名词。佐藤信渊的支那是否也那么单纯呢？显成疑问。

新井白石输入支那一词，相当于播种。日本的地图和漂流记使用该词，无异浇水施肥。但该词尚未能在日语生根，更谈不上萌芽发育。

支那一词在日语生根成长，似是明治时代(1868—1912)以后的事。这一点，我们可从舞台剧本推测而知。顺着默阿弥的剧本及其他书籍写作年代，便知明治以前的作品并不使用支那一词。1869(明治2)年的《遗失的药》(忘れ药)却有"支那"一词，附上"morokoshi"(唐土)的注音，但只在"从支那(唐土)到天竺"这句话中出现了一次。在这剧本内，"唐人"一词多得很，"支那人"一词却未出现。

同年出版的村田文夫的《西洋闻见录》，有《支那海贼船》一目。这里所称的支那是西洋人的口吻。1870(明治3)年出版的中井弘的《西洋纪行·航海新说》，出现了"支那海岸"及"支那人"两个词汇，但也是出自西洋人之口的。

1872(明治 5)年,假名垣鲁文的《世界都路》出版,在支那及唐土二词的傍边,都加以注音。同年,日本政府发表"外国雇员一览",其中对"支那"含有恶意,那是因为与欧洲人比较的结果。

1873(明治 6)年出版的翻译书《万国奇谈》,收有《支那的万里长城》一目。同年出版的英国人斯温霍(Robert Swinhoe)原著、箕作麟祥等译《北支那战争记》(*Narrative of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 London,1861),也用"支那"一词。不过,1874(明治 7)年出版的默阿弥的剧本《三个残废人》,仍然使用"唐人",而不用"支那人"一词。

1875(明治 8)年,《吉备大臣支那谭》出版。在该书出版前一年,外务卿副岛种臣为台湾生蕃事件赴北京谈判,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终于获得赔款五十万两而归。该书影射这段史实,叙述遣唐副使吉备真备(Kibino Mabi,693—775)抵达唐朝之后提出种种难题,令唐人惊奇的故事。在剧本内,"支那"一词再不是模拟西洋人的用法,而是首次以日本人口吻出之。

但这并不是说,作为日语词汇的"支那",已经安定下来。1879(明治12)年出版的默阿弥的《漂流奇谈》使用了"支那人"一词,但出现于同年出版的冈本监辅汉文译本《万国史记》首页的"支那"一词,依然附上"China"这个注音。注音的出现,显示支那一词尚未成为通用的日语词汇。

这时候,前上州高崎城主大河内辉声住在东京浅草今户町,其住宅的二楼全是中国式陈设,用来款待其汉诗汉文教师王桼园寄住。1878(明治 11)年 1 月 3 日,大河内与王桼园笔谈。

"请教支那一名之所由兴。"

王桼园曰:"大抵为天竺国上奏中华皇帝时,称之为支那皇帝而起者,于中华则为唐之时,其事见于《佩文韵府》。"

由此观之。这时候日本人似乎仍然感到"支那"一词是个问题，需要向中国人请教。

1880（明治13）年出版的默阿弥《霜夜之钟》反而称中国为"唐"。而1881年出版的外山正一编《新体诗抄》，则称中国为"支那"，很可能把该词当作新词汇使用。总之，"支那"一词，仍未成为日语的通用词汇。

1887（明治20）年，默阿弥出版了《花井梅》。该剧称中国为"唐土"、"支那"，而称中国人为"南京先生"（南京さん）。

1894（明治27）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该年10月，竹柴其水的剧本《会津产明治组重》出版。剧中人物有中国人一人，他是旅居东京筑地的华侨道昌忠，娶日本女人阿兼为妻。该剧有一幕描叙一群住在筑地的女掌柜对于爆发甲午战争的看法。阿兼和她的邻居阿铃、阿仙等，都昧于当时的国际形势，还以为在朝鲜半岛上进行的中日战争，与十七、八年前在日本发生的"西南之乱"是同一宗事情。① 这种人在东京城多得很。由此观之，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一般老百姓并没有使用"支那"这个词汇的。在这剧本上，"シナ"出现了二十七次，"南京"十七次，Chanchan 也不时出现。很明显，上述词汇在这里是充满轻蔑意味的。

1895（明治28）年，李鸿章到马关议和，结果日本获得二万万两赔款及占据台湾。日本人因此洋洋得意，对中国的态度变得轻蔑起来。"支那"一词也从此在日本语言中生根，而且很快便融混了轻蔑之意。

关于支那一词何时开始在日本使用这一问题，恐怕有人觉得我们的考证太过琐碎。不过，由于主张"要称呼总体的支那，没有比'支那'更好的名称"的都是历史家，我们不得不从历史上追溯这

① 原著有一段对谈文字，反映日本妇女对国际大事的无知，略嫌累赘，故略去不译。——译者注

个名词的由来。

如上所述，我们明了"支那"一词的沿革是这样的：始创于印度，先传到中国，再传到日本；进入日本之后，播下了种，又加以浇水栽培，经过漫长的岁月，才在日本语言内生根。

从历史发展过程上看，不论过去或现在，日本人所使用的"支那"一词，在日本原来是无根的。日本人用"支那"去取代二千年来沿用的"中国"，只是最近六十年光景的事。关于这段史实，历史家本身是曾想过的，对一般的人也当谈论过的。但正如前所述，由于好恶的感情先入为主，学问的界线也就模糊起来。

只要我们一翻开史籍，事实就摆在眼前。从前我们说"唐土之唐帝玄宗"；1895年以后，改说"支那之唐朝玄宗皇帝"。在过去五十余年间，硬不肯说"中国之唐朝玄宗皇帝"。

此外，似乎还有其他误解。有人以为"中国"是"中华民国"的简称。万没想到这完全是错误。据曹亚伯的《武昌起义》，革命军于1911(辛亥)年10月11日，在谘议局议定十三条重要方针。其中第二条是："称中国为中华民国。"① 这就是说，中国并不是中华民国的简称。

3.支那即China说。有人以为China一词是世界性的名称，故应可接受。所谓世界性名称，亦即学术性名称。这一说法，骤耳听起来似乎并无问题，其实也大成问题。理由很简单，世界上人口最多(六亿以上)的中国，并不自称"支那"；也就是说："支那"并未成为世界性名称。事情很明显，世界性云云，并非那么"学术性"。

4.称中国为支那，就会与日本的"中国地方"引起混淆。这就是说：完全是为了避免玷污日本语的纯洁！很多人都相信这一套，我也不例外。正因如此，我认为必须改称支那为中国。这不但为

① 转引自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五)，页130。

了敦睦邦友，而且为了改正日本本身不合理的地名。日本国内的“中国”是甚么意思呢？原来古代官吏往来于京都与九州太宰府之间，“中途之国”的中国地方是必经之路，“中国”由是得名。现在，太宰府已经废除，京都也不再是首都，“中途”的意义也失去了。虽然地名所含的历史与现实不同，不一定要更改。例如，今日不再用弓，却仍然保存“弓町”这个地名。但是，如果对其他事情有所妨碍，地名也非不可更改的。例如，因政治理由，江户改称东京。倘使有很好的理由，历史性地名是可以更改的。“中国地方”这个地名，有其历史因由。但现在这些因由不复存在，而且更与邻邦的国号混淆起来。广岛有份报纸叫做《中国新闻》，假如有“中国的禾稻生长状态”这篇报导，很可能是报导中国的新建设。在同一份报纸上往往出现同一地名变成兼指外国与国内事宜的现象。因此，为了日本语言的纯洁，我希望废弃这个名称。我想现在是改称“中国地方”为“西部地方”的好机会。日本国内已经有“中部地方”、“东北地方”这些地名，因此我想本州“西部地方”这一名称，不但地理上贴切，而且从国际关系的考虑上也是应该接受的。这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教育问题。倘使由国会通过，教育部便可改订教科书，上述地名便可迅速普及了。

除了上述四说之外，还有以下的奇说。即支那人不喜欢“支那”二字。“支”有“支店”之嫌，而“日本”有“本家”之嫌。因此，如果不写汉字，改用假名“シナ”，就不成问题了。——这简直是小儿之见。今日中国人讨厌的并不是字面问题，而是“支那”一词的读音——包容了轻蔑感情的读音。该词在清末并未混入轻蔑的感情，故相安无事。该词必须废除，并非为了文字问题，而是该词的调子令人憎恶的缘故。

在中国也有奇说，且与日本人的意见大异其趣。王拱璧《东游挥汗录》所收《日本外交之概略》一文说：

然则支那二字，在倭文中果有何等意义乎？支那，倭音读西那シナ，有将死之意，有物件（俗语东西）之义，又与ヒナ音相近，ヒナ释雕泥木偶也。既不遵印度原音，又不译印度原义。①

上述说法虽然都牵强附会，却反映出留日学生对包容了轻蔑感情的"支那"及"支那人"语调，无不反感。

总之，日本出现多种多样反对改变"支那"一词的论调，完全违背中国人的意愿。直到战败投降，才有转机。

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务次官发出《关于避用支那称呼事宜》通知，下达各新闻杂志社、出版社；同年7月3日，教育次官也将通知转发各大学和专科学校等。通知内容如下：

往昔通常用支那二字作为中华民国之国名，今日应改用中国等称号。查支那之称呼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要言之，除不再用支那一词之外，不妨使用：

中华民国、中国、民国

中华民国人、中国人、民国人、华人

日华、美华、中苏、英华

至于在历史性、地理性或学术性叙述之场合，例如：东支那海、日支事变等，万不得已时方可破例使用。

又，现今之满洲即称满洲，不得称为满洲国，附带通知如上。

这一通知在新闻界及出版界发生相当效果。但是，对于一般口语影响不大——中国一词，日本人总觉得难以上口，因为那时中国国内，国共正进行内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翌年，朝鲜爆发战

---

① 《东游挥汗录》，页17—18。

争，中国出动志愿军，抗美援朝，给装备卓越的美军重创。加上以后蒸蒸日上的建设事业，连古昔圣人都束手无策的治水工程、大桥、钢铁增产、粮食增产、文字改革等，不管喜欢不喜欢，日本人不禁咄咄惊奇，叹为观止。

从此，即使政府默不作声，“中国”一词也会从日本人口中溢出；而“支那”一词，明治以来运用的次数也许较“中国”一词为多，但无论如何已注定成为日本语言中的死语。留学史中的“支那”，却不幸地一直成为日本人与中国留学生纠纷的症结，直到留学史闭幕才结束。

第五章 留日学生的翻译活动

一 留日学生对新文化的贡献

中国学生在日本虽受尽屈辱，但留学者仍然不绝于途。他们忍辱负重，期待学成之后，参加救国的神圣工作。

事实上留学生从日本学了不少东西回去，这对于建设新中国发生很大作用。郭沫若在《中日文化的交流》一文说：

> 中国就是这样地倾力向日本学习，更通过日本学西洋的文化。由于当时受到某种客观的条件的限制，中国的资本主义阶段的革命并未成功。但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却有巨大的收获。这个收获，既有助于打破中国古代的封建的因袭，同时又有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作用。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很多方面受了日本的影响的。①

郭氏所称的"通过日本学习西洋的文化，……促进中国近代化"的运动，其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了法律、经济、教育、文学、科技等等。例如在法律方面，清末法律修订馆聘用冈田朝太郎、小河滋太郎、松冈义正、志田钾太郎等日本法学家为顾问，并得一批专攻法律的留日学生的协助，编制了中国的新法律。教育方面亦然，最初的新式教育全是留学日本的产品。这种日本式教育的形成，只要阅读郭沫若自传小说《我的童年》就会明白。

---

① 见《高远》，页 45。

新文学与留日学生的关系特别深切。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不但在日本编纂，而且在日本出版。创造社也是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田汉、冯乃超、陶晶孙等人在留日期间成立的。最先，他们发刊油印的日文期刊«Green»，不久便印行活字横排的《创造季刊》、《创造月刊》、《创造周刊》、乃至《创造日》等刊物，开展积极的文学活动。郭沫若指出："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而日本文坛的毒害也就尽量的流到中国来了。"① 由于日本文学的影响，张资平等作家大写殉情文学（例如《苔莉》），影响所及，竟然使殉情的风气也在中国流行起来。②

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经鲁迅翻译介绍，常常在中国的文艺论战中被引用。中日文学的关系，委实太密切了。③

中国的新剧也是在日本诞生的。春柳社在日本成立，而田汉的南国社，大体上也是模仿小山内薰的筑地小剧场而建成的。关于这件事的真相，可阅《南国》第2卷第1期的《我们的自己批判》一文。

1935年4月，"中华同学新剧"这个团体（后改称"中华话剧同好会"及"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在东京一桥讲堂上演了曹禺的四幕话剧《雷雨》。虽然这是一部叫人惊异的社会问题作品，可是因为种种缘故，当时还不能在中国国内公演。然而，"在[中国]人不知不觉之间，《雷雨》突然为一群流浪东京的爱好演剧的青年搬上

---

① 郭沫若：《桌子的跳舞》，见《沫若文集》第10卷，页333。

② 参看拙著《日本文化の支那への影响》中《中国情死考》一节。

③ 有关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密切关系，请参看拙著《日本文学の支那への影响》（收入《日本文化の支那への影响》一书）、以及中村忠行的《中国文艺に及ぼせる日本文艺の影响》（《台大文学》7卷4期、7卷6期）、《德富芦花と现代中国文学》（《天理大学学报》1卷2—3期）、《新中国未来记考说》（《天理大学学报》1卷1期）、《晚清における文学改良运动》（《国语国文》21卷1期）、《晚清儿童文学界の一侧面》（《天理大学学报》18辑）等文。

舞台。"① 又,"中华话剧同好会自本年春上演《雷雨》以来,国内亦争相演出这个剧本。"②

大概是大势所趋的缘故吧,同年(1935)年底,除了前述"中华同学新剧"之外,还诞生了"中华国际戏剧协进会"和"中华戏剧座谈会"。这三个新剧团体都是留日学生的组织。"新剧"在1935年10月12、13两日假一桥讲堂作第二次公演,"协进会"在11月6、7两日假筑地小剧场作第一次公演,而"座谈会"也在11月29、30两日在同地演出;这些团体仿佛在作戏剧比赛。

这三个团体在1936年合并为"中华戏剧协会"。到了1937年,又诞生了一个新团体——"中国留日剧人协会"。这三年间(1935~1937),新剧运动不但为留日学生所关心,而对中国国内的冲击亦复不少。在演技、布景和效果方面,很多日本艺术家提供的指导和帮助,博得了中国留学生的衷心感谢。③

留日学生剧团公演目录

(中华同学新剧)

第一次公演　1935年4月27、28、29日　一桥讲堂——曹禺:《雷雨》(四幕)

第二次公演　1935年10月12、13日　一桥讲堂——洪深:《五奎桥》(独幕);李健吾:《这不过是春天》(三幕)

(中华国际戏剧协进会)

第一次公演　1935年11月6、7日　筑地小剧场——袁牧之:《一个女人》(独幕);久米正雄原作:《何地客翻案·牧场兄弟》(三

① 《杂文》第1号。

② 《留东新闻》第5期(1935年9月27日)。

③ 参看中华国际戏剧协进会第一次公演的节目表,负责"灯光"的有:冈田狼之助、吴怀斌,担任"顾问"的有:伊藤熹朔、岩村成允、杉野橘太郎、铃木英辅、近藤春雄、欧阳予倩、唐槐秋、青柳信雄、河合信雄,当"赞助"的有:伊藤智子、木村太郎、寺田太郎、寄山弘、岩村成正、岩村成典等人。

幕)；马彦祥：《打渔杀家》(独幕)

第二次公演　1936 年 4 月 18、19 日　筑地小剧场——Madam Gregory 原作、文津译：《月亮上升》(独幕)；山本有三原作、克明译：《婴儿杀戮》(独幕)；斐琴：《夜明》(三幕)

第三次公演　1937 年 3 月 19、20、21 日　一桥讲堂——曹禺：《日出》(四幕)

(中华戏剧座谈会)

第一次公演　1935 年 11 月 19、20 日　筑地小剧场——吴天：《决堤》(独幕)；果戈里原作：《视察专员》(五幕)

(中华戏剧协会)

第一次公演——田汉：《洪水》；(佚名)：《姨娘》

第二次公演——朱可夫原作：《孩子们》

第三次公演　1937 年 1 月 11、12、13 日　一桥讲堂——托尔斯泰原作、田汉改编：《复活》(四幕)

(中国留日剧人协会)

第一次公演　1937 年 1 月 29、30、31 日　筑地小剧场——易卜生原作：《娜拉》

第二次公演(预定)——茅盾原作：《子夜》

以上不过略举数例而已。至于深入研究，将来宜分门别类逐一讨论。本书只能探讨若干与留日学生有关的基本问题：第一，留日学生是如何翻译日本书籍的；第二，由翻译所引致的两种现象：中国印刷和装帧的改变，及现代汉语与日本词汇的摄取。其实，这两种现象都是中国近代化不可缺少的要素。

二　翻译的必要性及留日以前的翻译

甲午战争结束那年(1895)的年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请求开设官立书局，说：

臣等公同商酌，拟援照八旗官学之例，建立官书局，钦派大臣一二员管理，聘订通晓中西学问之洋人为教官，常川住局，专司选择书籍，各国新报及指授各种西学，并酌派司事译官收掌书籍，印售各国新报，统由管理大臣总其成，司事专司稽察。①

翌年——即首次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一年(1896)的1月21日，孙家鼐被委任为留学生监督。同年，孙氏提出《官书局奏开办章程》，官书局事务包括筹设下列设施：1.图书馆；2.出版社；3.博物馆；4.学校。关于出版社，《章程》说：

拟设刊书处，译刻各国书籍，举凡律例、公法、商务、农务、制造、测算之学，及武备、工程诸事，凡有益于国计民生与交涉事件者，皆译成中国文字，广为流布。②

同年五月，侍郎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李氏认为去年战争结束之后，虽然皇帝力图一新庶政，谋求自强，明诏擢用通达中外事情能周时用的人材，事实上未能达到目的，因为京师及各省州府都未开办学堂。他主张不但要推广学堂，而且要开设藏书楼(图书馆)、创仪器院(实验室)、办译书局(翻译局)、广立报馆(新闻杂志社)及选派游历(外国留学及考察)。以下是李氏关于开设翻译局的意见：

三曰开译书局也。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与西人交涉而不能尽知其情伪，此见弱之道也。欲求知彼，首在译书。近年以来，制造局、同文馆等处，译出刻成已百余种，可谓知所务也。然所译之书，详于术艺而略于政事，于彼中治国之本末，时局之变迁，言之未尽。至于学校、农政、商务、铁路、邮政诸事，今日所极宜讲求者，详哉言之，今此等书悉无译本。又泰西格致新学，制造新法，月异岁殊，后来居上，今所已译出者率十年以前之书，且数亦甚少，未能尽其所长。今请于京师设大译

①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页46—47。

② 同上书，页48。

书馆，广集西书之言政治者，论时局者，言学校、农、商、工矿者，及新法学近年所增者，分类译出，不厌详博，随时刻布，廉值发售，则可以增益见闻开广才智矣。①

既为日本所败，而又遭列强窥伺的中国，应该如何认真从事新学呢？中国人认识到不仅要派遣学生出洋留学，而且肯定翻译比留学更是当前急务。至于留学的目的，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为了培养翻译人材。

1896年7月，梁启超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新式杂志——《时务报》。从编例上看，该杂志分为论说、上谕、奏折、资料（学校规则等）、外国报章杂志翻译、及文艺各种专栏。其中外国报章杂志翻译栏，从第三号起，细分为英文、法文和东文（日本文）三部分，而日文翻译由古城贞吉② 负责。根据《时务报》第4号“本馆告白”内“本馆办事诸君名氏”条（参看〔图9〕），古城氏是《时务报》六个职员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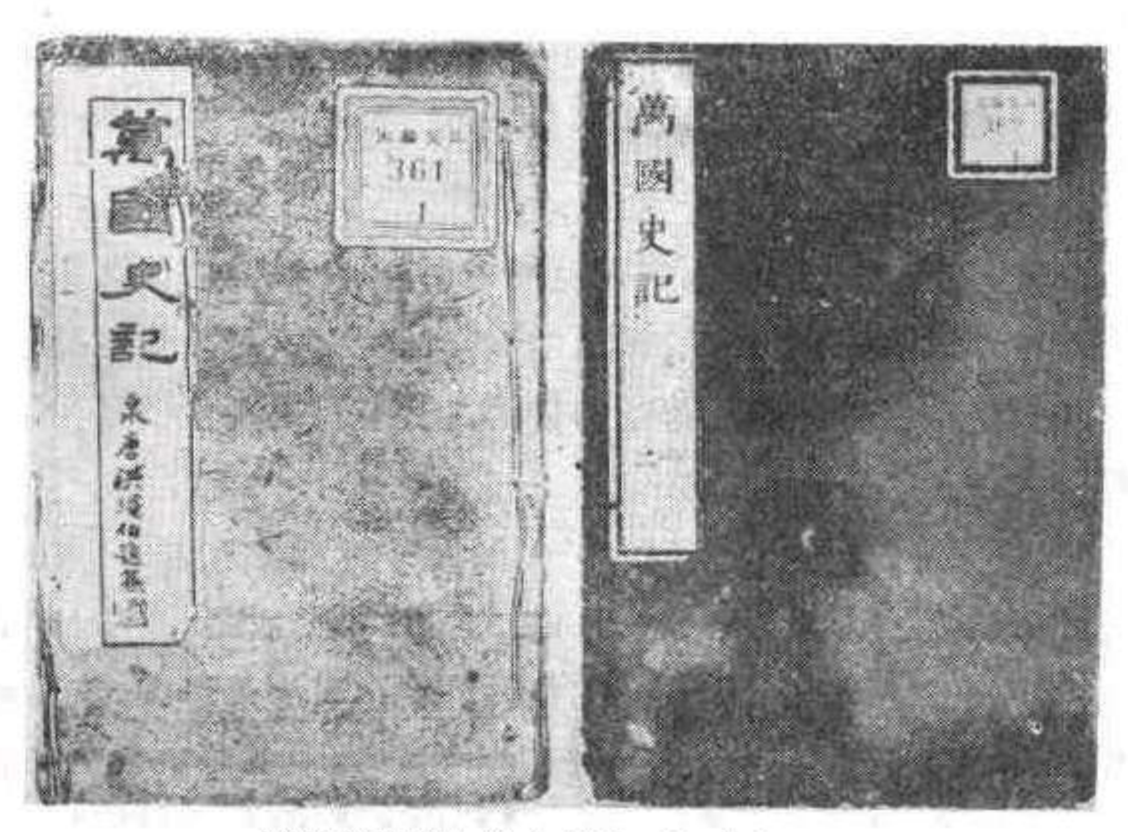
〔图9〕《时务报》第四册卷末的“告白”

从《时务报》第一期起便连载的《华盛顿传》，原是黎汝谦所译的旧稿。连旧稿也要刊登，可见当时梁氏等人的焦急心情，也可以窥见当时翻译人材短缺的一斑。

出版译本是急不容缓的事，中村正直选、冈本监辅译的十册《万国史记》便是例子。这是冈本氏在1878年用汉文翻译的书，

①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页6—7。

② 古城氏后来担任东洋大学及庆应大学的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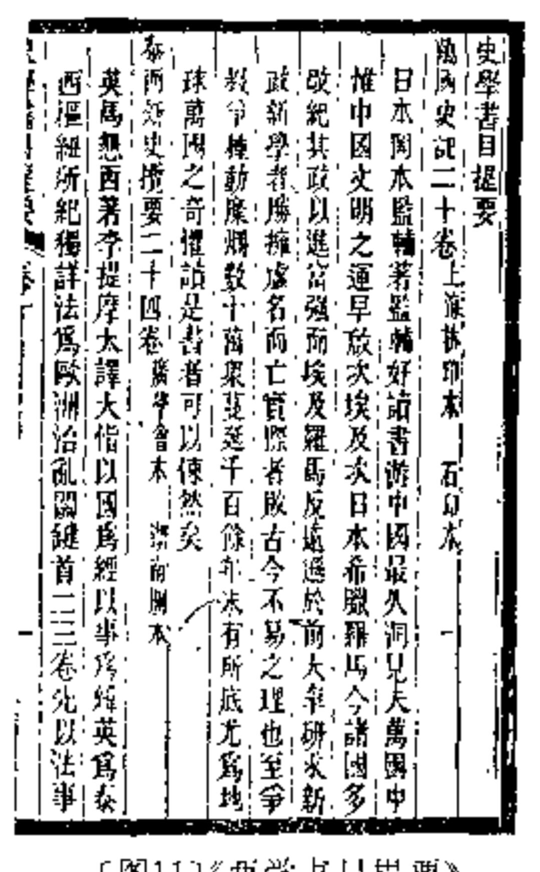


〔图10〕《万国史记》原本(右)与译本(左)

1895年在中国重刊。由于这是一本用汉文撰写的世界历史的书，所以就不必重新翻译即可在中国刊行。① 这部书颇受当时中国读书人欢迎，梁启超《西学书目提要》的《史学书目提要》项把它列在最前头，而《东西学书录》亦把它放在第一位。在翻译及出版事业兴盛之前，由于迫切渴求对新事物的知识，留日学生不断翻印日本人报导和介绍新知识的汉文书籍。1896 年，亦即第一批留日学生抵达日本的同年，冈千仞、河野通史合译的《翻译米利坚志》(二册)被翻刻，而石井忠利著《战法学》于 1897 年被重刊。

1897 年，梁启超起草《大同译书局叙例》。他认为变法之先，须有介绍新法的书籍问世；倘先学西方语文然后从事翻译，便不能应付当前之急务。京师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上海制造局之类的机构，在三十年间，译书不过百种，恐怕再过三十年，亦只不过共得

① 此书出版以前，日人以汉文撰写的书籍在中国翻刻的有：1875年在广东出版的《日本外史》，1879 年在上海出版的《日本外史》。这是为了解日本而出版的。



史學書目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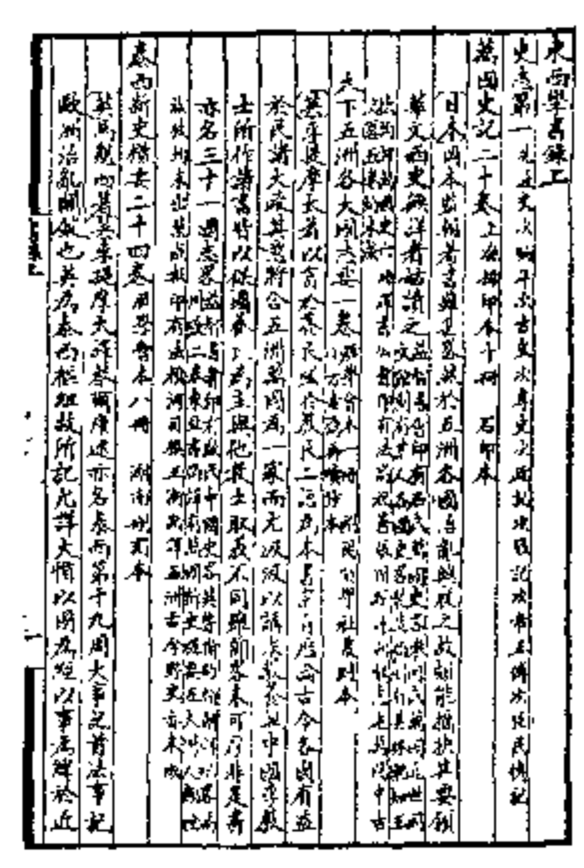
萬國史記二十卷　上海排印本　石印本

日本岡本監輔著監輔好遊書遊中國最久洞見天萬國中
推中國文明之運早旋次埃及次日本希臘羅馬今諸國多
廢絕其政以進富強而埃及羅馬反遠遜於前大半研求新
政新學者勝擁虛名而亡實際者敗古今不易之理也至爭
教爭權動糜爛數十萬衆蔓延千百餘年未有所底尤為地
球萬國之奇權讀是書者可以悚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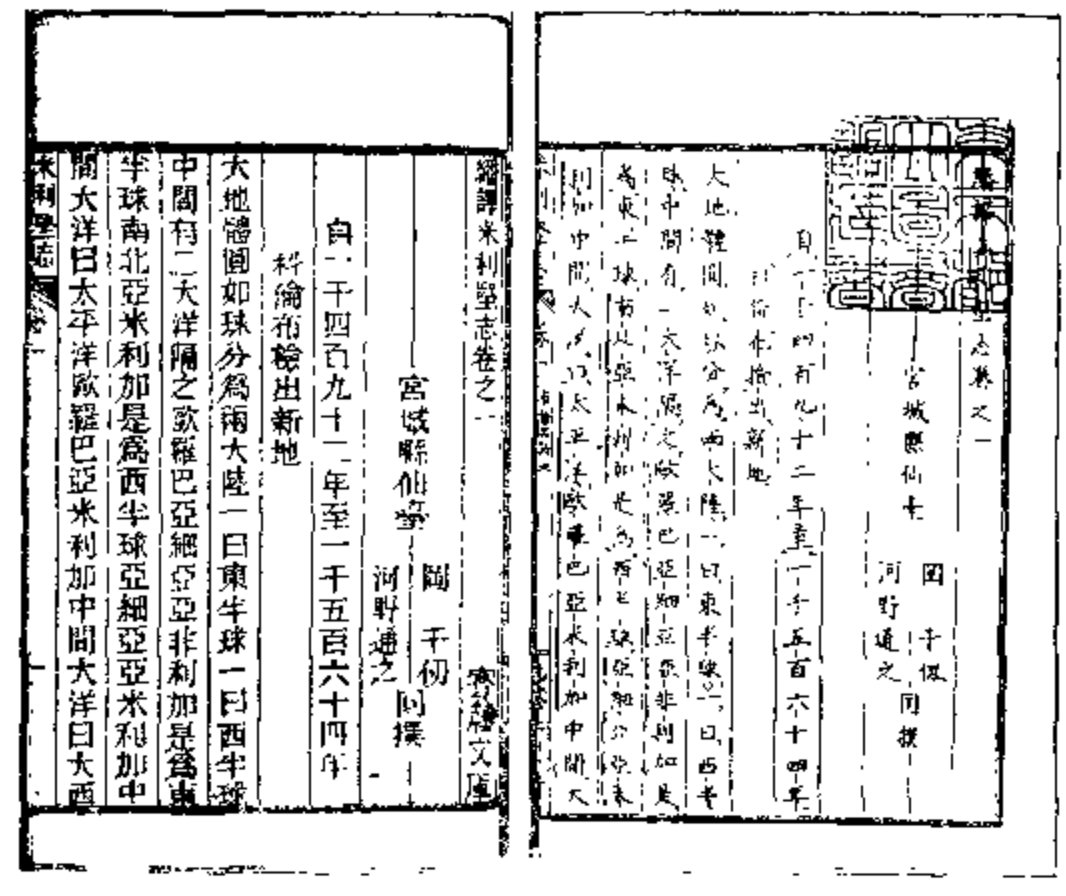
泰西新史攬要二十四卷　廣學會本　湖南刻本

英馬懇西著李提摩太譯大指以國為經以事為緯英為泰
西遲經所紀獨詳法為歐洲治亂關鍵首二三卷先以法事

〔图11〕《西学书目提要》中的《史学书目提要》



〔图12〕《东西学书录》



翻譯米利堅志卷之一

宮城縣 仙台 岡千仞 河野通之 同撰

自一千四百九十二年至一千五百六十四年

科綸布檢出新地

大地體圓如球分為兩大陸一曰東半球一曰西半球
中間有二大洋隔之歐羅巴亞細亞亞非利加是為東
半球南北亞米利加是為西半球亞細亞亞米利加中
間大洋曰太平洋歐羅巴亞米利加中間大洋曰大西

〔图13〕《翻译米利坚志》原本(右)译本(左)

二百种,"是以愤懑，联合同志，创为此局，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①

1897 年,罗振玉等人在上海出版《农学报》,最初是半月刊，后来改为旬刊。这是藤田丰八(剑峰)等人用汉文翻译日本的农业书籍的丛刊。从 1898 年起，这部杂志转由香月梅外经营,一共出版了三百一十五册书籍。今天我们无法知悉全套书内容，但就实藤文库所藏《农学丛书》第一集的九册书中(《农学报》合订本)②，便有下列的专著。这虽是极少的部分，但亦可略窥全书之一二：

(书　名)	(原著者)	(译　者)	(重译者)
农具图说	〔法〕蓝涉尔苍	吴尔昌	
奇埃哀安摩太风车图说	〔美〕风车公司	胡濬康	
泰西农具及兽医治疗器械图说	驹场农学校	藤田　丰八	
代耕架图说	王　忠	(李树人校)	
福田自动织机图说	大陇制造所	川濑仪太郎	
制纸略法	今关常次郎	佐野谦之助	
实验罐藏制造法	猪股德吉郎		
畜疫治法	〔美〕	宗我　彦麿	萨　端
山羊全书	内藤　菊造		
牧羊指引	后藤　达三		
人工孵卵法	杨帅(罗振玉附记)		
马粪孵卵法	〔美〕胡儿别上	大宿保之助等	山本　正义
家禽疾病篇	屈　克	赤松　如一	山本　正义
水产学	竹中　邦香	山本　正义	
金鱼饲育法	奎五峰(姚元之录)		
奥国饲蚕法	〔奥〕哈昂五	佐佐木忠二郎	井原鹤太郎
蚕体解剖学	佐佐木忠二郎	山本　正义	
脓　蚕	佐佐木忠二郎	井原鹤太郎	

① 《饮冰室文集类编》上，页 711。

② 第二集(第 12 至 20 册)，出版于 1900 年.第一集应是在 1899 年出版。

蚕桑实验说	松永　伍作	藤田　丰八
饲育野蚕识略	(法)魏　雷	陈　贻　范
湖　蚕　述	江　曰　桢	
养蚕成法	韩　理　堂	
粤东饲八蚕法	蒋　　斧	
制　絮　说	杉山源治郎	井原鹤太郎
害虫要说	小野孙三郎	鸟居赫雄
驱除害虫全书	松村　松年	
京师土产表略	寿　　富	
江震物产表	陈庆林	
南通州物产表	陈启谦	
宁波物产表	陈寿彭	
武陵土产表	李致桢	
善化土产表	龚宗遂	
瑞安土产表	洪炳文	
札幌农学校施设一斑	札幌农学校学艺会	沈　纮
杭州蚕学馆章程		
蚕业学校案指引	东京丸山舍	安藤　虎雄
瑞安务农支会试办章程		
整饬皖茶文牍		

上列书籍的译者吴尔昌、胡濬康、萨端、陈贻范、沈纮等人，大概是罗振玉所办的东文学社的学生。在《畜疫治法》一书有“东文学社译书之二”字样，故可作上述推想。这批翻译者可能都是在中国国内修习日语而成为翻译日本书籍的先驱。

此外，在藤田丰八所译的书籍中，虽然《物理学》(十二册，饭盛挺造原著)和《颜料篇》(二册，江守襄吉郎原著)两书，曾作为江南制造局的译书出版，而《蜜蜂饲养法》(花房柳条原著)一书，亦曾作北洋官书局的译书出版，但三部书的原稿都可能是在《农学报》刊登过的。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戊戌新政。在《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上，康有为断定中国为日本所败，是因为中国闭步自封，没有输入新法、新学和新器。康氏慨叹翻译洋书的困难，说：

臣愚窃窃思之，以为日本与我同文也，其变法至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矣，但工艺少阙，不如欧美耳。译日本之书为我文字者十之八，其成事者少，其费日无多也。请在京师设译书局，妙选通人主之，听其延群通学，专选日本政治书之佳者，先分科程并译之，不岁月后，可大略皆译也。①

康氏提议大量翻译日本书以代替科举考试。

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著《劝学篇》一书，在《广译》篇指出依靠西洋人翻译洋书有两大弊端。第一，国人精通西洋语文者甚少，故多误译；第二，西洋人故意拖延教学，费时甚多，不能应急。接着，张氏论述各种外国语的用途：

大率商贾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牍条文，法文之用多。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②

最后张氏比较翻译洋书与日本书的功效：

学西文者，效迟而用博，为少年未仕者计也，译西书者，功近而效速，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③

康梁派与张之洞虽政见不同而互相攻击，但在奖励翻译日本书这一点上，却采同一步伐。1898年，细田谦藏译《日本军政要略》（陆军经理学校的教材），由南洋公学出版；而古城贞吉译《日本学校章程三种》，则由时务报馆出版。后者的出现，似乎与张之洞派

① 康有为：《戊戌奏稿》，页44。
②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页14右。
③ 同上书，页15右。

赴日本考察的姚锡光的《东洋学校举概》相呼应。古城贞吉译绪方南溟著《中国工艺商业考》二册，亦由时务报馆出版。这类由日本人为中国人而汉译的书籍，与《万国史记》之类专供日本人阅读的汉文书籍不同。在留日学生养成翻译能力之前，这类书籍对引进新知识起了一定作用。在 1899 年出版的同类书籍有下列四种：

（书　名）	（译　者）	（出版者）
日本警察新法	小幡严太郎纂译	东京，善邻译书馆
大日本维新史（2 册）	重野　安绎	同上
支那通史（5 册）	那珂　通世	上海，东文学社
战法学	石井忠利译　王治本校订	东京，国光社

上列各书只有那珂通世的书，专为日本人而写，但因为该书在中国印刷，亦可算入此类。其余三书都是专为中国人而写而在日本印刷的。这些书，可以说是在当时日本"清国热"气氛中诞生的营利主义的初期产品。

1898 年以后，留日学生翻译的书籍出现了。1900 年，留日学生的第一个译书团体"译书汇编社"也成立了，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论述。现在先谈 1901 年在上海诞生的《教育世界》。这是《农学报》创办人罗振玉和王国维编辑的刊物，发行 116 期之后才停刊。从分类纂辑的《教育丛书》第二集和第三集观之，日本人的汉译仍然继续不断出现：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重译者）
教育学教科书	牧濑五一郎	王国维	
哲学小辞典			
家庭教育法	利根川与作	沈　紘	
简便国民教育法	清水　直义	沈　纮	
社会教育法	佐藤善治郎	沈　纮	
实业教育	〔美〕	一户　清方 上冈市太郎（汉译）	

女子教育论	永江　正直	钱　　单
心理的教授原则	杉山　富槌	（译者不明）
小学教授法	东　基　吉	沈　　纮
理科教授法	矢泽米三郎	（译者不明）
教授法沿革史	大濑甚太郎 中川　延治	（译者不明）
欧美教育观	日本育成会	沈　　纮
日本近世教育概览	（著者不明）	
孔门之德育	亘理章三郎	（译者不明）
自助论	〔英〕斯迈尔	中村正直（日译）　中村大来（汉译）
爱美耳钞	〔法〕卢骚	山口小太郎 岛崎恒五郎（日译）中岛　端（汉译）
西洋伦理学史要	〔英〕	王国维
费尔巴尔图派之教育	〔美〕	中岛　端（汉译）
海军机关学校内则		（译者不明）
学校卫生书	坪井　次郎	（译者不明）

三　中国人最早的中译日书

中国人第一部汉译日文书是在 1899（光绪 25、明治 32）年出版的。那是桑原骘藏原著樊炳清译的《东洋史要》（四册），由东文学社出版。其后，该书由屠长春增补，文学图书公司出版。①

于 1898 年，罗振玉在上海设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本语文，而教学工作则委藤田丰八任之。由于樊炳清的译本由东文学社出版，看来他似曾在该社学习日文，然后才从事日本书籍的翻译。

樊氏是东文学社的学生，这一点也可从下面事实推断。1900

① 中国人第一部汉译日文书似是姚文栋译《琉球地理志》，1883（光绪 9、明治16）年在东京出版，原著者是日本政府。第二部是陈廷工译《欧美各国政教日记》，1889（光绪 15、明治 22）年在上海出版，原著者是井上圆了。详见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代序）》，见于谭氏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年），页 56。——译者注

年《农学丛书》中有《畜疫治法》① 一书，而汉译者是萨端。《畜疫治法》是"东文学社译书之二"。该书既有"东文学社译书"字样，可以肯定译者是东文学社出身的人。1901 年，萨端和樊炳清还合译了小川银次郎、佐原笃介二人合著的《东洋史要》一书。

东文学社社长罗振玉后来负责《教育世界》期刊发行工作，而由教育世界社刊印《科学丛书》。樊炳清所译的教科书，很多都收录于《科学丛书》内。

因此，樊炳清是中国最早翻译日本书籍的人。他并没有到日本留学；他的日文是从居留中国的日本人（藤田丰八）学来的。培养出第一个翻译日本书籍的人，这是东文学社的功绩。

四　留日学生翻译团体

留日学生的翻译团体，主要有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湖南编译社、普通百科全书、闽学会等。

译书汇编社　甲午战争之后，虽然最初的日本书籍汉译本，大都出于中国国内修习日语者之手；不过，留日学生在留学之后第五年——1900年，已有实力去翻译日本书籍，并且组织译书团体。第一个这样的团体是译书汇编社。

译书汇编社社员名录

戢翼翚　字元成，东京专门学校毕业生

王植善　字培荪，上海育材学堂总理

陆世芬　字仲芳，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生

雷　奋　字继兴，东京专门学校学生

杨荫杭　字补塘，东京专门学校学生

杨廷栋　字翼之，东京专门学校学生

① 原著者为美国人，日本人宗我彦磨译，萨端重译。

周 祖 培　字仲彝，前东京专门学校学生

金 邦 平　字伯平，东京专门学校学生

富 士 英　字意诚，东京专门学校学生

章 宗 祥　字仲和，帝国法科大学校学生

汪 荣 宝　字衮甫，庆应义塾学生

曹 汝 霖　字润田，明治法学院学生

钱 承 志　字念慈，帝国法科大学校学生

吴 振 麟　字止欺．帝国法科大学校学生

社长戢翼翚是首批 13 名留学生之一，其余社员大部分是日华学堂毕业生，而当时仍在东京专门学校攻读。

译书汇编社主要的业务是出版《译书汇编》月刊。译文多分期连载，没有通卷页码，内容每期不同。编辑法好象编教学讲义一样，每一编刊完之后，便出一单行本。

创刊号刊登下列译文：

(书名)	(原著者)
政治学	〔美〕伯盖司
国法泛论	〔德〕伯伦知理
政治学提纲	〔日〕乌谷部铣太郎
社会行政法论	〔德〕海留司烈
万法精理	〔法〕孟德斯鸠
近世政治史	〔日〕有贺长雄
近时外交史	〔日〕有贺长雄
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	〔日〕酒井雄三郎
民约论	〔法〕卢骚
权利竞争论	〔法〕伊耶陵

上述西洋人的著述的中译，当是从日文译本重译过来的。

除了翻译和出版工作之外，译书汇编社还照顾新到留日学生，而且代理日本书籍在中国内地销售事宜。在一定意义上，它象个

留日学生中心。所以，1902年初，以该社社员为骨干的清国留学生会馆得以建立，是理所当然的事。

该社是文化运动初期的产物，最初似乎颇有财政困难。推其原因，当时中国甚少定期刊物，读者不免耽忧该刊何时会停刊，故不踊跃长期订阅。最先每期印一千份以上，而销量仅及十分之一、二。不过由于该刊内容新鲜，国内读者纷纷订阅，有时甚至要重印。

《译书汇编》是1900年12月创刊的，翌年刊行下列单行本：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波兰衰亡战史	涩江保	译书汇编社同人
国家学原理	高田早苗	嵇　镜
国法学	岩崎昌 中村孝	章宗祥
各国国民公私权考	井上毅	章宗祥

据《译书汇编》第七期（光绪27年、1901年7月30日发行）的"已译待刊书目录"，有以下译书：

（书名）	（原著者）
政治进化论	〔英〕斯宾塞尔
社会平权论	〔英〕斯宾塞尔
教育论	〔英〕斯宾塞尔
政党论	〔德〕伯伦知理
今世国家论	〔法〕鲍罗
理学沿革史	〔法〕阿勿雷脱
欧洲文明史	〔法〕尼骚
教育论	〔法〕卢骚
平民政治	〔美〕勃拉司
政治泛论	〔美〕威尔孙
社会学	〔美〕吉精颜斯

教育论	〔美〕如安诺
东西洋教育史	〔日〕中野礼四郎
美国民政	〔美〕莫里
国际论	〔日〕陆实
国法学	〔日〕有贺长雄
文明之概略	〔日〕福泽谕吉
明治历史	〔日〕坪谷善四郎
外交通义	〔日〕长冈春一
加藤讲演集	〔日〕加藤弘之
国际法论	〔法〕罗诺而
自助论	〔英〕斯迈尔
新闻学	〔日〕松本君平
国家学原理	〔日〕高田早苗
近世二英雄传	〔英〕格里飞司
经济学史	〔日〕井上辰次郎
俄罗斯史	〔日〕山本利喜雄
十九世纪	〔日〕博文馆编
丈夫之本领	〔日〕铃木天眼
政教进化论	〔日〕加藤弘之
近世海军	〔日〕福本诚
近世陆军	〔日〕新桥荣次郎编
万国国力比较	〔英〕默尔化
国法学	〔日〕岩崎昌、中村孝

上列各书，有的似未出版(或未在该刊发表)，但可察知这批留学生早期的昂扬志气。

我们推定西洋诸国书籍的译本全由日文重译，是因为该社社员全属留日学生，并无留学西洋诸国的学生。

根据《译书汇编社出版及发行书目》(刊于1903年发行的《日本明治维新百杰传》封底)，该社又加添下列译书：

欧美日本政体通览

日本制度提要

法律学论纲

最近俄罗斯政治史

法制新编

欧洲财政史

日本财政之过去及未来

波兰衰亡战史

美国独立史

日本维新活历史

名学

物竞论

生物之过去及未来

论理学

女子教育论

比律宾志士独立传

累卵东洋

爱国精神谭

学校建筑模范图

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评论当时(1901年)的译书汇编社说：

> 客冬今春以来，日本留学生有《译书汇编》、《国民报》、《开智录》等之作。《译书汇编》至今尚存，能输入文明思想，为吾国放一大光明，良好珍诵。然实不过丛书之体，不可谓报。①

冯自由在《辛亥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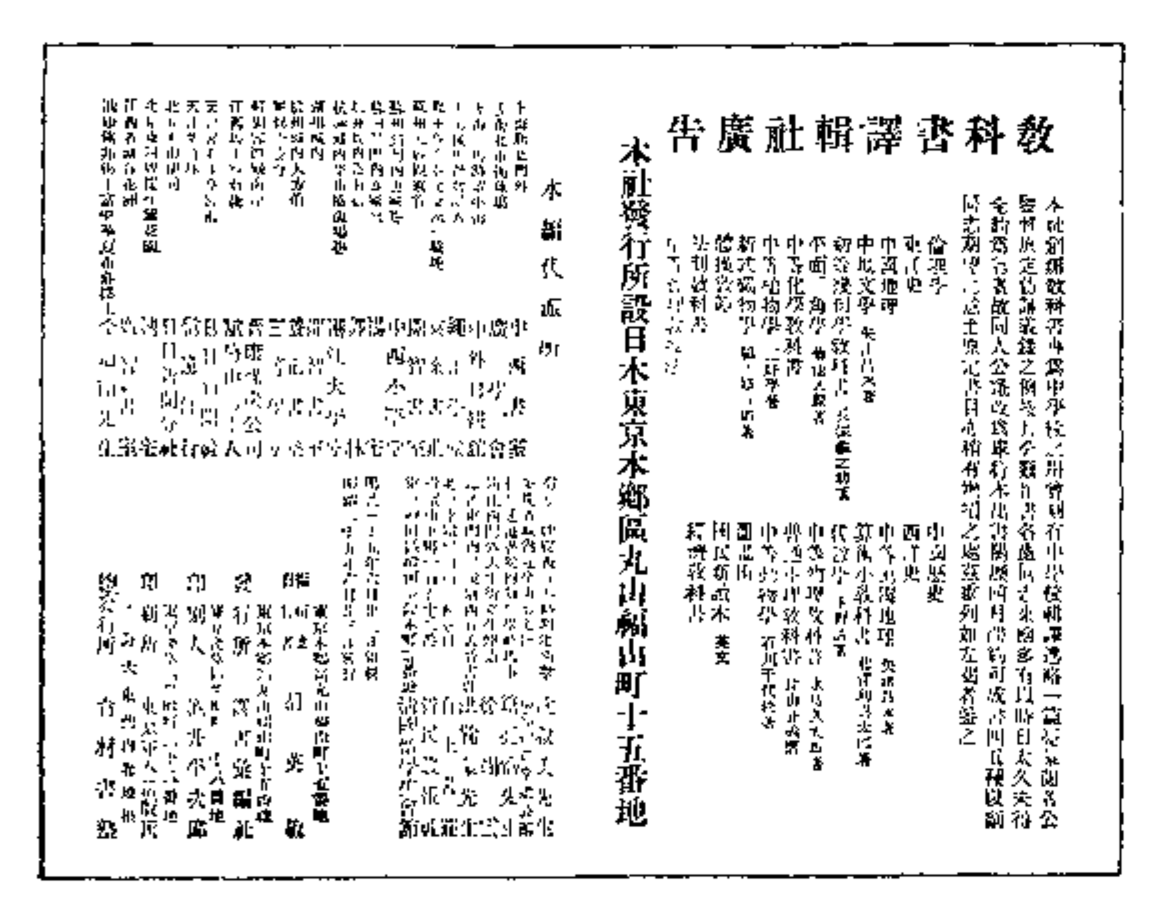
> 《译书汇编》……留学界出版之月刊，以此为最早。所译卢骚《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斯宾塞《代议政治论》等，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②

---

① 《饮冰室文集类编》上，页794。

②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页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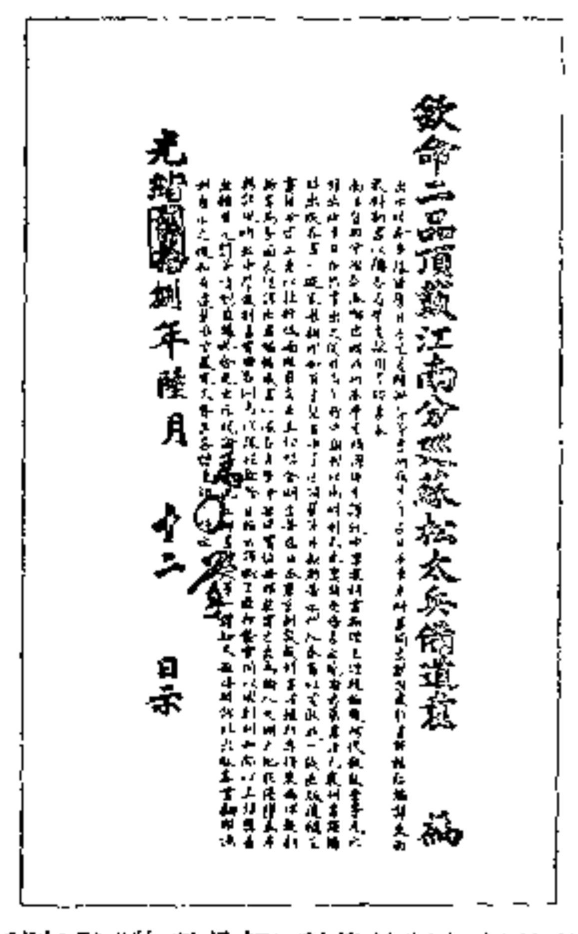
教科书译辑社 这可以说是译书汇编社分社。在《译书汇编》第二年第三期(1902 年 6 月)的封里，标明发行所在东京本乡区丸山福山町十五番地，而在封里前一页的“教科书译辑社广告”，亦标明“本社发行所设日本东京本乡区丸山福町 15 番地”。又据教科书译辑社第一部出版物《物理易解》的版权保护书，说：“据留日学生陆世芬等禀称：窃生等在日本东京纠合同志，设教科书译辑社，编译东西教科新书，备各省学堂采用。”① 而陆世芬在译书汇编社 14 名社员中名列第三位。由于其发行所与译书汇编社相同，又在《译书汇编》刊登广告，可见教科书译辑社是译书汇编社的分社。译书汇编社以翻译大学教材为主，教科书译辑社则专译中学教科书，两社业务因而有所差别。教科书译辑社最早的出版计划，包括下列书籍：


教科書譯輯社廣告

本社發行所設日本東京本鄉區丸山福山町十五番地

〔图14〕《译书汇编》第二年第三期封底及封里广告

① 据《物理易解》一书的版权保护令。参看图版 15。


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 為

光緒貳拾捌年陸月 廿二 日示

〔图15〕《物理易解》所载的版权保护状

(书　　名)	(著　　者)
伦理学	
东洋史	
中国地理	
中(中等?)地文学	矢津　昌永
初等几何学教科书	长泽龟之助
平面三角学	菊池　大麓
中等化学教科书	
中等植物学	三　好　学
新式矿物学	胁水铁五郎
体操教范	
法制教科书	
中等管理教授法	
中国历史	
西洋史	

中等万国地理	矢津　昌永
算术小教科书	滕泽利喜太郎
代数学	上　野　清
中等物理教科书	水岛久太郎
普通生理教科书	片山　正义
中等动物学	石川千代松
图画术	
国民新读本	（英文）
经济教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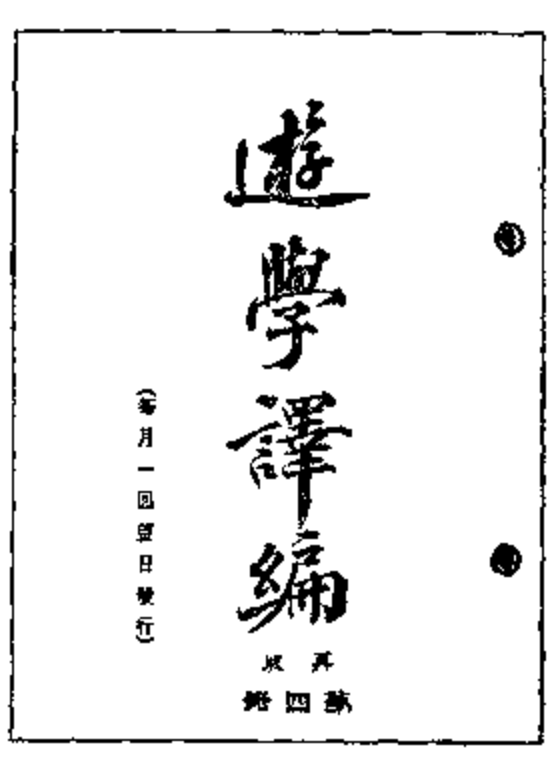
湖南编译社　该社由1903（光绪29）年起发行月刊《游学译编》（参看〔图16、17〕）。这本杂志不但和《译书汇编》一样选译单行本书籍，而且也选译报纸杂志的论文（多与中国有关者）。除此之外，该社曾刊出广告，出版下列单行本：

（书　　名）	（著　　者）
支那教育问题	嘉纳治五郎
新国民之资格	塚越芳太郎
六大强国	
日本维新二大杰（西乡隆盛与福泽谕吉）	
学校实践管理法	
哲理微言	井上円了、川尻宝岑
史学原论	浮田　和民（杨毓麟译）
国家学	有贺　长雄（许直译）
十九世纪欧洲教育之大势	中野礼四郎
独逸国家法教科书	
英汉对译万国地名表	
国家生理学	
新国民之资格	
新编成城学校日语教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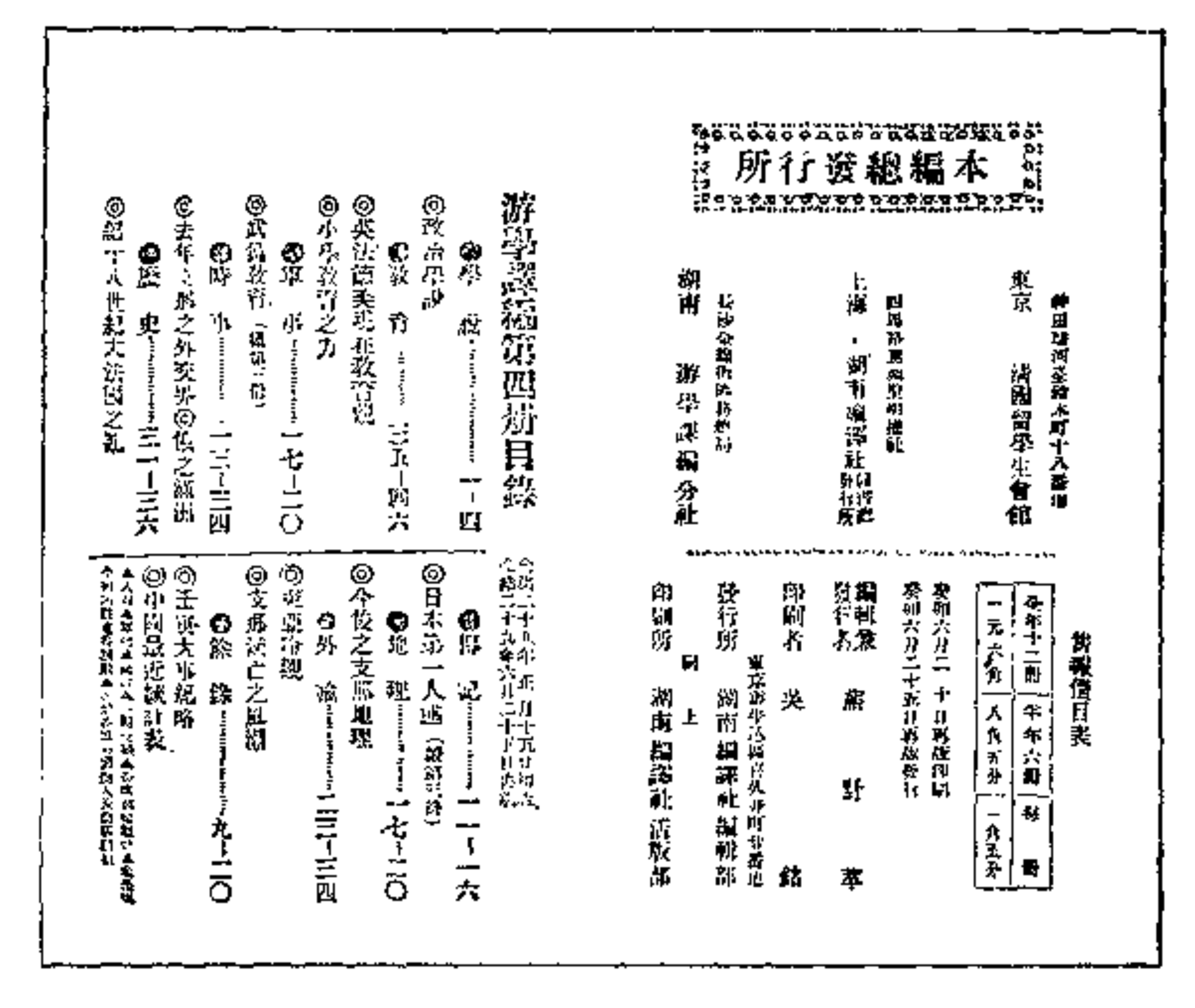
同纯学术性的译书汇编社比较，湖南译编社略带政治倾向。与此同时，《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以各省份为单位的杂

志也相继出现；这些杂志的政治气味却又比《游学译编》为浓。虽然这份月刊经常引用日本的学说和时论，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其为翻译杂志的性格。顾燮光在《译书经眼录》(1904)的《述略》中说：

> 留东学界，颇有译书，然多附载于杂志中，如《译书汇编》、《游学汇编》、《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各类，考其性质，皆借译书别具用心，故所译以政治学为多。①



〔图16〕《游学译编》第四册的封面


本編總發行所
東京 清國留學生會館
上海 ・ 湖南編譯社
湖南 游學譯編分社

報價目表

癸卯六月二十日印刷
癸卯六月二十五日發行

游學譯編第四册目錄

〔图17〕《游学译编》第四册封面里页和目录页

这类杂志所刊登的论文，经常引用各种日本的学说和时论，而在引用的时候，不时混入翻译资料。

普通百科全书　1903年，范迪吉等译《普通百科全书》100册，由会文学社出版。这是当时日本中学教科书和一般大专程度参考书，由范氏等人选译，石印旧装出版，真是件大事业。内容分类如下：

（书　名）	（著　者）
宗　教·哲　学	
宗教哲学	姉崎　正治（译）
世界宗教史	加藤　玄智
西洋哲学史	蟹江　义丸
东西洋伦理学史	木村鹰太郎
论理学问答	富　山　房
哲学泛论	藤井健治郎
文　学	
帝国文学史	笹川种郎
教　育	
教　育　学	熊谷　五郎
教育学新书	富　山　房
教育学问答	富　山　房
教授学问答	富　山　房
学校管理法问答	富　山　房
政　治·法　律	
税关及仓库论	岩　崎　昌
国法学	岩　崎　昌 中　村　孝
民事诉讼法释义	梶原　仲治
议会及政党论	菊地　学而
法律泛论	熊谷　直太
行政裁判法论	小林　魁郎

①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页98。

商法泛论	添田敬一郎
日本帝国宪法论	田中 次郎
政治泛论	永井 惟直
国际私法	中村 太郎
国际公法	北条 元笃 熊谷 直太
民法总则篇物权篇释义	丸尾 昌雄
民法债权篇释义	丸尾 昌雄
民法亲族编相续编释义	田 丰
日本法制史	三浦菊太郎
政治史	森山 守次
经济泛论	池袋秀太郎
财政学	鲁川浩

地 理·历 史

日本历史	木寺柳次郎
东洋历史	幸田 成友
日本风俗谈	坂本 健一
日本新地理	佐藤 传藏
万国新地理	佐藤 传藏
帝国文明史	白河 次郎 国府 想德
万国地理学新书	四道新之助
帝国历史	富 山 房
万国历史	富 山 房
地理学新书	富 山 房
帝国历史问答	富 山 房
日本历史问答	富 山 房
世界历史问答	富 山 房
日本地理问答	富 山 房
世界地理问答	富 山 房

西洋历史	吉国　藤吉
日本旅行地理	山上万次郎
万国旅行地理	山上万次郎

自 然 科 学

植物新论	饭　塚　启
霉菌学	井上　正贺
日用化学	井上　正贺
动物通解	岩川　友太 佐佐木忠次
有机化学	龟高　德平
时学及时刻学	河村　重固
气中现象学	小林　义直
测量速成法	小船井里吉
地质学	佐藤　传藏
星　学	须藤传治郎
分析化学	内藤　　游 藤井　光藏
动物学新书	八田　三郎
化学问答	富　山　房
动物学问答	富　山　房
植物学问答	富　山　房
矿物学问答	富　山　房
数理问答	富　山　房
植物学新书	富　山　房
矿物学新书	富　山　房
地文学新书	富　山　房
地文学问答	富　山　房
生理学问答	富　山　房
物理学问答	富　山　房
初等算术新书	富　山　房
初等代数学新书	富　山　房
初等几何学新书	富　山　房

无机化学	真岛　利行
新撰三角法	松村定次郎

实　业

船舶论	赤松　梅吉
植物营养论	稻垣　乙丙
农艺化学	井上　正贺
土地改良论	上野英三郎 有働　良夫
森林学	奥田　贞卫
农学泛论	恩田　铁弥
肥料学	木下　义道
农产制造学	楠　岩
气候及土壤论	佐佐木祐太郎
应用机械学	重见　道之
商业经济学	清水　泰吉
简易测图法	白幡郁之助
运送法	菅原大太郎
畜产泛论	高见　长恒
畜产各论	田口　晋吉
栽培各论	田中节三郎
商工地理学	永井　惟直
森林保护学	新岛　善直
农用器具论	西村荣十郎
提要农林学	本多　静六
栽培泛论	横井　时敬
农业经济论	横井　时敬 泽村　真

其　他

郵线学	海野力太郎
美术新书	富山房

这套书可以作为本年度汉译日本书最高成绩的代表。

闽学会　1904年，福建省留学生组织闽学会，发行《闽学会丛

书》 据该会第一部书《西力东侵史》(日本斋藤阿具著，闽县林长民译)所刊广告，其出版计划如下：

出版书目

(书名)	(著者)	(译者)
哲学原理	日本哲学大家	王学来
史学原论	浮田　和民	刘崇杰
人种志	鸟居　龙藏	林楷青

近刊书目

(书名)	(著者)	(译者)
国际公法精义		林藏编译
社会进化论	有贺　长雄	萨　端
泰西格言集		高凤谦辑译
国际地理学	守屋荒美雄	杨元昌

已译书目

(书名)	(著者)
近时外交史	有贺　长雄
最近时政治史	有贺　长雄
南清贸易	小山　松寿
今世外交史	酒井雄三郎
进化新论	石川千代松
货币论	高田　早苗
新式地文学	岩崎　重三
欧洲教育史要	谷本　富
社会问题	大原　祥一

当然，除上述团体之外，个人翻译而由中国书店出版的书籍为数亦不少。

五　留日学生的译书与中国的教科书

留日学生所翻译的书，有一般大专程度参考书籍，也有专为中国国内学校而译的教科书；大部份在日本印刷，但运返中国销售。

教科书情况如何呢？国民政府教育部编《教育年鉴》所载《教科书之发刊概况(1868—1918年)》一文，记述1903（光绪二十九）年情况如下：

三八　光绪二十九年，京师大学堂刊有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一本，内分十六门目，修身伦理门，称修身重私德，伦理重公德，列入《弟子职》、《曲礼》、《朱子小学》、《近思录》、《人谱类记》，及教育改良会编商务印书馆本之《高等修身教科书》，广智书局本日本元良勇次郎之《中等教育伦理学》，江楚编译局本日本井上哲次郎著、樊炳清译之《伦理教科书》等数种。

字课作文门，列入蜚英馆本张维新《初级普通启蒙图课》、王筠《文字蒙求》、苗夔《说文建首字读》，文明书局本之无锡三等学堂《蒙学课本》、戴懋哉《汉文教授法》及马建忠《马氏文通》等书。

经学门，列入《四书集注》、《明监本五经》、《古注十三经》、《经典释文》、洪亮吉《传经表》、《通经表》、《皇清经解》等书。

词章门，列入梅曾亮《古文词略》、姚鼐《古文辞类纂》、《今体诗抄》、王士祯《古诗选》等书。

中外史学门，列入鲍东里《史鉴节要便读》、潘世恩《读史镜古编》，普通学书室本之日译《普通新历史》，广智书局本日本市村瓒治郎著、陈毅译之《支那史要》，东文学社本日本那珂通世著之《支那通史》，振东室本日本河野通之辑之《最近支那史》，作新社译本之《世界近世史》，东文学社本日本桑原著、樊炳清译之《东洋史要》，金粟斋本日本小川银次郎著、樊炳清译之《西洋史要》，东亚译书会本日本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之《欧罗巴通史》等书。

中外舆地门，列入作新社编之《世界地理》，丸善本日本矢津昌永著、吴启孙译之《世界地理学》，舆地学会译印之《大地平方图》、《皇朝一统总图》、《五大洲总图》等书。

算学门，列入商务印书馆之《普通珠算课本》，益智书局本美狄考文著、邹立文译之《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美华书馆本美罗密士著、潘慎文译之《代形合参》，利玛窦、伟烈亚力译、徐光启、李善兰笔受之《几何原本》等书。并称此门科书甚多，参考丁福保撰《算学书目

提要》云。

名学门，列入西学启蒙本英哲分斯著、艾约瑟译《辨学启蒙》，金粟斋本英穆勒著、严复译之《名学》等书。

理财学门，列入作新社本杨廷栋著《理财学教科书》，文明书局本日本天野为之著《理财学纲要》等书。

博物学门，列入英傅兰雅著、格致须知本《动物须知》、《植物须知》、《全球须知》，英约瑟著、西学启蒙本《植物学启蒙》，作新社译《植物学教科书》、《中等植物学教科书》、《动物启蒙》，科学丛书本日本藤井健次郎著、樊炳清译之《近世博物教科书》，五岛清太郎著、樊炳清译之《普通动物学教科书》，译辑社本美斯起尔原本、何燏时译补之《中学生理教科书》等书。

物理化学门，列入格致须知本英傅兰雅著之《重》《力》《电》《声》《光》《气》《水》《热》等八种，科学丛书本、日本木村骏吉著、樊炳清译之《小物理学》，开明书店售教科书译辑社本日本水岛久太郎编、陈榥译补之《物理学》，会文学社本美那尔德著、范震亚译《化学探原》，科学丛书本樊炳清译《理化示教》等书。

地质矿产学门，列入益智书会本英毅士著、李庆轩译《地学指路》，英傅兰雅著《金石略辨》等书。

同时，大学堂译书局译成之书，尚有罕木杨斯《密算法》一卷，威理斯《形学》五卷，洛克平《三角》一卷，裴立马格纳《力学》一卷，额伏烈特《动静力学》、《气水学》、《热学》、《光学》、《电学》各一卷，《垤氏实践教育学》五册、《欧洲教育史要》三册，《中等矿物学教科书》、《东西洋伦理学史》、《格氏特殊教育学》、《独逸教授法》各一册。

三九　同年，江苏编译官书局出版樊炳清译《伦理学教科书》四本。又木板本小学堂用《诗歌》四卷，程先甲编木板本《高等国文教科书》二篇。又木板本《蒙学课本》、《算学歌诀》、《算法初级》一本，算式用汉字一二九十直列者，载明六岁至九岁儿童用云。徐虎臣选译本版本《普通新代数》六卷，系用甲乙丙丁天地等为代字者，凡例有文辞以简易为主，期合教科书性质云。又木刻本英国罗式古著、孙筠信译、石印本《化学导

源》二卷，每课每节之后，均附以试验法，末附以考试问答，另有附图。此外又有沈纮译之《高等小学几何学》，学海指针社编之《小学万国地理教科书》，樊炳清译之《伦理教科书总说》、《几何画法》、《植物学实验初步》、《地文学简易教科书》，沈纮译之《矿物学教科书》、《生理教科书》，徐有儿译之《小学理科》，桥本海关译之《经济教科书》等数十种，多系译自日文者。①

由此观之，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教科书为数并不多，而西洋人为中国人所写的却相当多。标明为日本原本的书物亦不少，其实凡以"教科书"为名的书籍，都可看作"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东西"。说起来，"教科书"这个词汇，也是从日本输入的。

1955年12月8日郭沫若在早稻田大学，以"中日文化的交流"为题演讲，回顾他在四川读中学时的光景，说：

中国为了向日本学习，在派遣大批留学生去日本的同时，又从日本招聘了很多教师到中国来。我们当时又翻译了大量的日本中学用的教科书。我个人来日本以前，在中国的中学所学的几何学，就是菊地大麓先生所编纂的。此外，物理学的教科书则是本多光太郎先生所编的。②

可见清末民初新式学堂的教科书，大部分是留日学生的译著。

六 《东方杂志》广告所见的译书

《东方杂志》是中国的商务印书馆于1904（光绪30）年3月11日创刊的洋装刊物。创刊号本文有256页，是份大型杂志。在该号的前、中、后部用青红二色刊出了商务印书馆新书广告。今按原著者国别而分为：A. 日本人原著，B. 西洋人原著，C. 中国人原著等三类的书，列表如后：（有 * 符号者为教育部审定）

①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页118—119。

② 原载《离远》，页45。

A 日本人原著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政治一般	桧前保人、上野岩太郎 池本吉治、绪方　直清	出洋学生编辑所
欧美政体通览	上野　贞吉	出洋学生编辑所
万国宪法比较	辰巳小二郎	戢　翼　翚
宪　政　论	菊池　学而	林　　棨
议会政党论	菊池　学而	菊池　学而
德国学校制度	加藤　驹二	中国国民丛书社
广　长　舌	幸德　秋水	中国国民丛书社
日本武备教育		本　　馆
日本监狱法	佐藤　信安	中国国民丛书社
世界文明史	高山林次郎	商务印书馆
支那教学史略	狩野　良知	商务印书馆
世界近世史	松平　康国	中国国民丛书社
欧洲最近政治史	森山　守次	商务印书馆
埃及近世史	柴　四　郎	商务印书馆重译
希　腊　史	桑原　启一	中国国民丛书社
罗　马　史	占部百太郎	陈时夏　章起渭 章师濂　胡叙畴
*理财学精义	田尻稻次郎	王　季　点
经济通论	持地六三郎	商务印书馆
国　债　论	土子金四郎	王　季　点
地方自治财政论	石塚　刚毅	友古斋主人
欧洲财政史	小林丑三郎	胡　宗　瀛
清史揽要	增　田　贡	商务印书馆译订
*西洋历史教科书	本多浅治郎	出洋学生编辑所
日本政治地理	矢津　昌永	陶　　镕
*矿质教科书	据日本矿学诸书辑编	商务印书馆编译
*论理学纲要	十　时　弥	田　吴　炤
*心理教育学	高岛平三郎	田　吴　炤
东西洋伦理学史	木村鹰太郎	商务印书馆

新说教授学	槙山 荣次	商务印书馆
读书法	汗卿政太郎	商务印书馆
拿破仑传	矢岛元四郎	范枕石
纳逊逊传	中村 佐美	何震彝 刘张侯
各国宪法略		出洋学生编辑所
各国国民公私权考	井上毅	出洋学生编辑所
明治政党小史	东京日日新闻	出洋学生编辑所
新闻学	松本 君平	商务印书馆
扬子江	林安繁	出洋学生编辑所
帝国主义	浮田和民	出洋学生编辑所
造化机新论	细野顺	出洋学生编辑所
日本学校章程汇编		陶森甲编辑

以上共四十种。

B 西洋人原著

(书 名)	(著 者)	(日本译者)	(中国译者)
新译俄罗斯《露西亚帝国》	〔法〕波利	专门学校	中岛端
群已权界论	〔英〕穆勒约翰		严复
社会通诠	〔英〕甄克思		严复
政治学	〔德〕那特硁	李家隆介 小崎哲藏	戢翼翚 王慕陶
政治泛论	〔美〕威尔逊	高田早苗	商务印书馆重译
万国国力比较	〔英〕默尔化	专门学校	出洋学生编辑所
国际公法大纲	〔德〕留七特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海参崴公董局城治章程	〔俄〕官本		李家鏊
俄租辽东暂行省治律	〔俄〕官本		李家鏊
普鲁士地方自治行政说	〔德〕莫塞	野村靖	商务印书馆重译
泰西民族文明史	〔法〕赛奴巴	武泽野之助	沈是中 俞子彝
欧洲新政史上编	〔德〕米勒尔	稻田孝吉 绫部竹之助	商务印书馆重译
法兰西史			商务印书馆编译

俄罗斯史	〔俄〕伊罗瓦基伊	八代六郎	商务印书馆重译
日耳曼史	〔英〕沙安		张　　铸
苏格兰独立史	〔美〕那顿		商务印书馆
英国度支史	〔英〕司可得开勒		华　　龙
哲学要领	〔德〕科培尔	下田次郎	蔡元培
德国工商勃兴史	〔法〕伯罗德尔	文部省	商务印书馆重译
万国商业历史	〔英〕器宾	林曾登吉	商务印书馆重译
伊索寓言			林纾、严培南、严璩
* 化学教科书	〔英〕史砥尔		谢洪赉
* 生理学教科书	以法儒包培尔原著为本旁据他书		商务印书馆编译
理财学课本	〔美〕华克		颜惠庆
克莱武传	〔英〕马可来		商务印书馆
辟地名人传	〔美〕爱德华		王汝宇
版权考	〔美〕罗伯孙 〔英〕斯克罗敦普南		周　　仪

以上二十七种中，能断定是中国人直接从西洋人著作翻译过来的，只有严复和林纾等所译的二种。标明从日本书重译过来的有十一种。其余十三种之中，可以说大部分（甚或全部）都是从日本书重译过来的。

C　中国人原著

（书　　名）	（著　　者）	（备　　考）
新撰日俄战纪		分期刊行
近世陆军	陶森甲编辑　出洋学生编辑所校订	
* 亚米利加洲通史	戴彬编辑	
中国历史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编辑	中学堂用
最新中国史教科书	姚祖义编辑	高等小学堂用
国史初级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编辑	高等小学堂用
普通新历史	普通学书室编辑	高等小学堂用
* 瀛寰全志	企英学馆编辑	中学堂用

万国地理新编	陈乾生编辑	高等小学堂用
文学初阶(6卷)	杜亚泉著	初等小学堂用
*马氏文通	马建忠著	
汉文教授法	伟庐主人译辑	
*格致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编译	
*矿物学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编译	
*普通珠算课本	诵芬室主人	
中国通览	商务印书馆译辑	
中国历史问答		
世界历史问答		
普通博物问答		
地文学问答		
生理学问答		
富国学问答		
学校管理法问答		
华英音韵学字典集成	企英译书馆编校	
华英字典	商务印书馆编译	
袖珍华英字典	胡文甫、吴慎之编辑	
中西文合璧教科书		(28种)
英文教科书		(17种)
义大利独立战史		
美国独立战史		
普奥战史		
尼罗海战史		
法国战史		
飞猎宾独立战史		
日本近世豪杰小史	商务印书馆编辑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24册)
资治通鉴		(60册)
纲鉴易知录		(16册)
王船山《读通鉴论》		(10册)

十一朝《东华录》览要		(28册)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12册)
农　话	陈启谦编辑	
绣像小说		(半月刊杂志)

以上八十六种书中，除英语教学用书四十八种外，中国人所著的三十八种，大都与日本有密切关系。例如，《新撰日俄战记》(分期刊行)就明言："日本博文馆、金港堂、秀英社、富山房皆刻《日俄战记》，书仿其例……"，其内容似亦多以翻译日文资料为主。

《近世陆军》为陶森甲所"编辑"，而陶氏是《日本学校章程汇编》的编者。《近世陆军》不称"著"，而称"编辑"，复标明为出洋学生编辑所"校订"。该所是留日学生组织的翻译团体，其中心人物是戢翼翚。这里所称的"校订"，可以作为该书以日本书为底本的证据。

《普通新历史》(高等小学堂用)为普通学书室编辑，明言："是书以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所著《东洋历史》为蓝本，取其序次……。"

《瀛寰全志》(中学堂用)为企英学馆所编辑，自称："并从日本定制铜版数百幅，插印卷内，美丽精致，光彩照人。"从该书所言的数百幅插图，可以想象其内容亦当以日本书为蓝本。

《矿质教科书》与《矿物学教科书》在广告上并排，都作"本馆编译"。前者"是据日本矿学诸书编辑而成"，属于A类；后者并无标注，属于C类。不过，后者的出版说明称："是编与前书(《矿质教科书》)性质不同。前书注重纲要，此书务条分缕析，以便学者……用与前书相得益彰。"据此，或可肯定原本也是日本书。

此外"编辑"或"译辑"十一种，大概都是从日本书重译过来的。

《义大利独立战史》以下六种战史之中，《美国独立战史》为日本澁江保著、东京留学生译，《普奥战史》为日本羽化生著、赵天骧

译，《飞猎宾独立战史》为日本宫本平著、中国同是伤心人译。由此推之，其他三书也可能译自日本书。

又《日本近世豪杰小史》虽是"本馆编译所编辑"，全是集合日本人的汉文著作而成的。

此外，《中国历史问答》等七册"问答"书，不记著者姓名，但从书名便可推定从日本书译来的。

可以肯定是中国人的著述者，只有《马氏文通》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七种古典书籍。

以上A、B、C三类合计153种。若除去英语教科用书48种外，余下105种。在105种中：A类40种，B类11种，C类3种，共有54种，约占全体51%，很明显是日文译本或重译本。若加上被我们推定的日文译本，则105种书中，会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受日本书的影响的。

七　各国译本比较表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阅读新书以学习新学（东西洋学问），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当前急务；此类读书指南陆续出现，例如：

（书　名）	（著　者）	（出版年代）
西学书目表	梁启超	1896年
读西学书法	梁启超	1896年
东西学书录（3册）	徐维则	1899年
增版东西学书录（6册）	徐维则　顾燮光补	1902年
新学书目提要（4册）	通雅斋同人	1903年
古越藏书楼书目（8册）	徐树兰	1904年
译书经眼录	顾燮光	1927年

从上列目录观之，可以想见时人渴求有关东西洋学问的书籍的情

况。

最后的《译书经眼录》虽然1927年出版，其内容却只收录1901年至1904年间出版的书籍。杨寿春就其收录内容，编制了一览表：①

类别＼原本	日本	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俄国	其他	合计
史志	87	8	10	3			17	125
法政	35	5	2	2	6	2	18	70
学校	39	3	1				5	48
交涉	2	5		1			1	9
兵制	6	1		3		13	9	32
农政	4		1					5
矿务	5	1						6
工艺					1			1
商务	2						1	3
船政	1							1
理化	10	2	2	2			5	21
象数	6	1	1	1				9
地理	34	5	3				4	46
全体学	14		3				1	18
博物	9						4	13
卫生	6	1	2					9
测绘	2				1			3
哲理	21	9	2		1		1	34
宗教	2	1						3
体操	5				1			6
游记	3							3
报章	1	2					3	6
议论	15	2	2	1	2		1	23
杂著	8	1					4	13
小说	4	8	3	2		2	7	26
(合计)	321	55	32	15	25	4	81	533

①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页99—101。

从上面的一览表看出，译自日本书占60%强。译自西洋诸国者，主要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重译过来的。由此观之，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东西委实不少。虽然，这种情况后来略有变迁，但大体上直到清朝末年(1911)，日书中译，盛况依然。

八　清末翻译的特色

清末留日学生学习的对象，以"普通学"和"宪政"为主。要实行宪政，必先普及教育。因此，这一时期翻译最多的是关乎教育(包括各科教科书)和法律的书籍。这类书籍的大量出现，成为出版界的一大特色。

罗振玉将《教育世界》登载的译文，分类辑录在《教育丛书》(直接关于教育的书籍)和《科学丛书》(关于普通学的书籍)中的，便有好几集，每集几十册。

会文学社刊行的《普通百科全书》，共一百册，前面已经提过了。湖北官书处的《师范教科丛编》有十四册。东亚公司(这是日本博文馆等合营的公司)的《普通科师范科讲义》也有十四册。此外有《湖南师范讲义》，但册数不明。

法律方面的书籍，群益书局的《法政讲义》有十五册，湖北法政编辑社的《法政丛编》有二十四册，丙午社的《法政讲义》第一集有二十九册、而第二集的新书预告有十四册(完成与否，不得而知)。此外，《早稻田大学政法理财科讲义》有十二册，戢翼翚、章宗祥、马岛渡、宫地贯道共同编辑的《政治类典》有四巨册。《六法全书》的全译本——《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则有线装八十册。

至于这一时期有名的译者，有国学大师章炳麟(译岸本能武太《社会学》)，日后知名中外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译井上圆了《妖怪学讲义》及下田次郎《哲学要领》)，还有王国维(译中村五六、顿

野广太郎《日本地理志》)等等。

九　文学书籍的翻译

民国初年是留学生人数激增时期。然而，翻译事业反而不振。翻译的是《冈田式静坐法》、《日本柔术》、《近世催眠术》之类实用性书籍，出现前所未见的趋向。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文学革命使白话文学成为文学正宗，思想革命使民主与科学受到尊崇。

曾经留学日本而在北京生活的鲁迅，创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充实了新文学理论。就在这时候，他所译的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也出版了(1922年)。后来，他一面创作，一面翻译了下列日本书籍：

(原作者)	(书　名)	(出版年代)
夏目漱石等	现代日本小说集	1923年(同周作人合译)
厨川白村	苦闷的象征	1925年
厨川白村	出了象牙之塔	1926年
鹤见祐辅	思想·山水·人物	1928年
片上伸	现代新兴文学诸问题	1929年

上述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一个青年的梦》，因其内容是讴歌反战，颂扬和平，又加上鲁迅胞弟周作人对武者小路的“新村”所作的访问与介绍，使该书大受欢迎。结果，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大量地被翻译；光是单行本，便有下列数种：

(书　名)	(译　者)
武者小路实笃集	周作人等
新　村	孙百刚
武者小路实笃戏曲集	崔万秋　杨云飞

孤独之魂	崔万秋
四人及其他	王古鲁　徐祖正
人的生活	毛咏棠　李宗武
母与子	崔万秋
忠厚老实人	崔万秋
爱　欲	章克标
妹　妹	周白棣
戏曲研究	沈章白

厨川白村的著作，除了鲁迅所译二种外，尚有下列译本：

（书　　名）	（译　　者）
文艺思潮论	樊从予
苦闷的象征	丰子恺
近代的恋爱观	夏丏尊
走向十字街头	绿　蕉　刘大杰
北美印象记	沈端先
欧美文学评论	夏绿蕉
文学十讲	杨开渠
近代文学十讲（2册）	罗迪先
恋爱论	任伯涛
小泉八云及其他	绿　蕉
欧洲文艺思想史	黄新民
文艺思想论	汪馥泉

因此，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一度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准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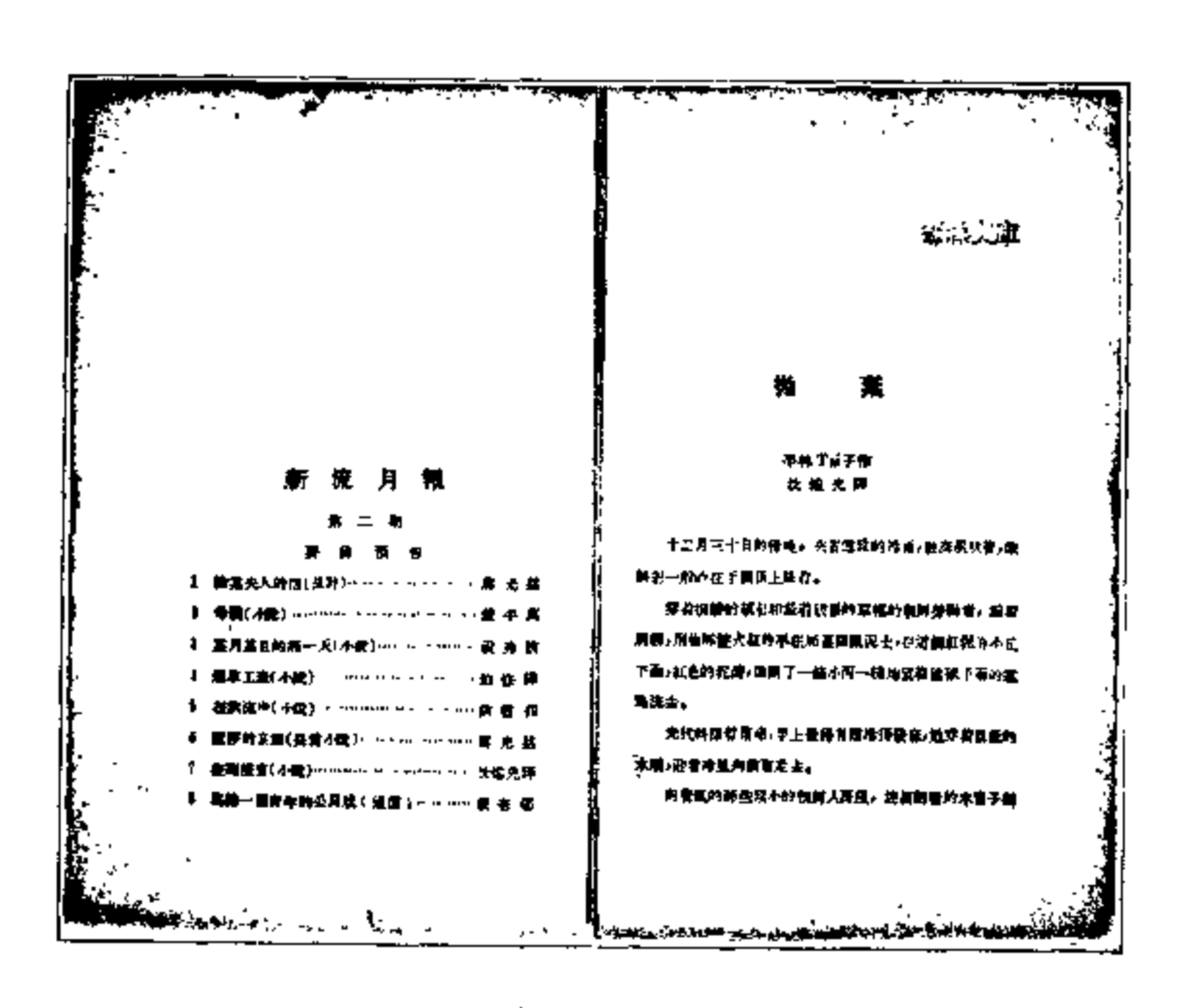
中国新文学主要人物，不论语丝派（鲁迅等）也好，创造社（郭沫若等）也好，几乎全是留日学生。是故，20年代至30年代翻译了很多日本文学作品。现在把有五种以上作品被译的作者姓名列下：

秋田雨雀	芥川龙之介	有岛武郎	小川未明
菊池宽	藏原惟人	小泉八云	佐藤春夫
谷崎润一郎	夏目漱石	片岗铁兵	本间久雄
宫岛新三郎			

实藤惠秀编《中译日文书目录》收录作家 141 名，作品（包括理论著作）324 种。

由于大量日本文学作品被翻译，郭沫若评论中日文学关系时，说：

> 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彗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建树，总还没有前两派的势力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两派的影响。
>
> 就因为这样，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而日本文坛的毒害也就尽量的流到中国来了。①



新流月報

第二期

〔图 18〕《新流月报》第一期

① 郭沫若：《桌子的跳舞》，见《沫若文集》第 10 卷，页 333。

芥川龙之介自杀之后，中国文艺杂志立刻出版追悼专号，而日本人的作品也经常出现于显著的卷首。中国人颇难理解的“情死”(为殉情而双双自杀)，由于张资平在他的小说《苔莉》加以描绘，竟然在中国男女青年中间流行起来。①

十　社会科学书籍的翻译

五四运动以来，工人运动及社会运动频繁，孙中山亦采容共政策。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1926年开始北伐。

这种情势之下，关于工人问题、社会问题等的社会科学研究兴盛起来，译自日文的书籍占压倒性的大多数。例如，单是河上肇的著作，便有下列译本：

(书　名)	(译　者)
救贫丛谈	杨山木
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史的发展	林植夫
经济学大纲	陈豹隐
人口问题批评	丁揖一
新经济学之任务	钱铁如
唯物论纲要	周拱生
社会变革底必然性	沈绮雨
经济原论	邝摩汉
马克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李达等
唯物史观研究	郑里镇
马克斯主义经济学	温盛光
近世经济思想史论	李天培
唯物史观的基础	巴　克
社会主义经济学	邓　毅
社会主义社会组织	郭沫若

① 请参阅拙著《日本文化の支那への影响》中《中国情死考》一节。

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斗争	江半庵
劳资对立的必然性	汪伯玉
通俗剩余价值论	钟古熙

这方面的作者，有五种著作以上被翻译的有：

安部矶雄	石浜知行	上田贞次郎	加田哲二
河田嗣郎	河西太一郎	北泽新次郎	堺　利彦
高桥龟吉	高畠素之	长野　朗	波多野鼎
林癸未夫	堀江归一	室伏高信	山川　均

这方面的译本共有 374 种。①

十一　自然科学书籍的翻译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翌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发生；留日学生因而离日返国。不久，事态稍缓，中国学生又涌去日本，出现第三次留日高潮。

"九一八事变"以前，研读文科的留日学生占多数；事变之后，留日学生也认识到空理空论不能救国，于是热衷于研读自然科学。日本书籍的翻译事业，亦以自然科学书籍为主，巨型的专门书籍因而被翻译过来。

当时中国最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量占全国总量之一半)所出版的《大学丛书》水准极高，其中收录了好几种日本自然科学者的著作：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近世妇人科学	木下正中、清水由隆	汤尔和
生物学精义	冈村　周谛	汤尔和
行列论	藤原松三郎	萧君绛
农林种子学	近藤万太郎	杨开渠
水力学	歌原　定二	刘肇龙

① 据实藤惠秀：《中译日文书目录》作的统计。

昆虫学通论	三宅恒方	缪端生

永津嘉一郎的《理论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制造化学》诸书，孔庆来辑译为《化学集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馆出版的其他丛书，例如"万有文库"、"科学丛书"、"算学丛书"、"自然科学丛书"、"新知识丛书"、"百科小丛书"、"地学小丛书"、"算学小丛书"、"自然科学小丛书"等，亦有日本书籍译本。特别是"自然科学小丛书"，收录日本译本四十二种。日本人林鹤一关于数学论著的中译本，在"算学丛书"和"算学小丛书"中，就有二十种，很值得注意。包括清末启蒙时期，从日文书翻译的自然科学中译本共有540种之多。[1]

当然，这时期的译书，并不限于自然科学书籍，文艺及社会科学的书籍也大量翻译，其盛况可与清末媲美。[2] 虽然如此，自然科学译本比率剧增，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一段时期的特征。

十二　日本书籍的中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1896年首批学生赴日至1937年七七事变的四十二年间，日本书籍的翻译数量虽有起落，但并无间断。精确总数虽不得而知，实藤惠秀编《中译日文书目录》收录的单行本数目如下：

宗教·哲学	113种	自然科学	347种
文学·语学	324种	实　业	177种
教　育	140种	医　学	193种
政治·法律	374种	军　事	132种
经济·社会问题	374种	杂　类	84种
地理·历史	344种	（合　计）	2602种

① 此为拙著《中译日文书目录》中著录的自然科学347种、医学193种的合计数字。

② 1931年1月发行的《中国新书月报》（第2卷第2期）中有若虚所著《评中国著译界》一文，其中说："翻开新刊书一看，十之八九为日本来之作品"，据此可知。

以上数目是编者自1929年以来，长期搜集实物及从目录(包括北平图书馆全部书目卡片，与报章杂志的广告所得来的，务求完备。不过编者仅收录单行本，下列各种书物概不采录：

1. 在期刊杂志译载者；

2. 不明是否为单行本者。例如，《东西学书录》卷一页32所记："伊达邦成传一卷，农学报本，柳井录太郎著，沈纮译"，《农学报》是期刊名称，其分类汇编"农学丛书"中，有些每类只有一册，也有数类合为一册。由于编者未得见实物，故不采录。

3. 与西文译文混合的单行本。例如，《新学书目提要》所述："俄国蚕食亚洲史略……分为上下二编，自题养浩斋主人辑译。上篇盖日本人佐藤宏之编。下篇即为英国人克乐诗之说。"由于与英国人著作译本混合，不予收录。

4. 怀疑为译自日本书籍但无确实证据者。例如，《新学书提要》所指："那特硁政治学，商务印书馆本……那特硁曾为日本之帝国大学教授……中多日本名词，或就和文转译也。"此处标示"或"字，故不采录。①

实藤氏的目录是以上述态度编成的，所收项目仅限于此，其实日本书籍的汉译，远比上列数目为多。②

这许许多多的日本书籍中文翻译，产生了甚么结果呢？以下两种情况似乎不容忽视：

1. 在日本印刷的影响下，中国的出版物，从线装单面印刷，改为洋装两面印刷。

2. 现代汉语由于融汇了大量日本词汇，中国文体为之一变。

上述情况，分在以下两章详述。

---

① 拙著《中译日文书目录》，页202—203.

② 详见实藤氏监修、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1980年)。——译者注

第六章　对中国出版界的贡献

一　印刷术的发明与西洋印刷术的东渐

纸和印刷术，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它们对人类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公元八世纪的时候，印刷术已成为一种普遍应用的技术。① 到了十一世纪，毕昇更发明了活字。最初用于印刷的，是用黏土制的活字，其后更出现了用木制的和铜制的。总之，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一项名耀于世的贡献。

韦尔斯(H. G. Wells)评价中国人发明造纸术的贡献时曾说：

> 即谓欧洲再兴之得力乎纸亦未为过也。造纸之术，创始于中国，其应用盖约在西元前之二世纪……十三世纪末造以前良纸名笺大都非欧洲所产，十三世纪而后，亦仅以意大利所产者为佳。②

可惜韦氏没有明言西洋印刷术的兴起，其实也是受到中国影响的。张秀民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中，补充说明了这点：

> 莱麦撒(Abel Remusat)以为中国人所发明之航海罗盘针、火药、钞币、纸牌、算盘，皆由蒙古输入欧洲，活字版印刷术同时亦由远东而输入欧洲。③

---

①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页64。

② H.G.Wells 著，梁思成译：《世界史纲》第二册，商务1935年版，页645—646。

③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页184。

西洋的活字印刷术从中国得到启发而发展起来后，又转过来传入中国和日本，影响两国近代文化的发展。陆费逵在《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中，把西洋的印刷术传入中国之事比喻为"外孙回外婆家"，传到日本之事则比喻为"另一个外孙往游日本"。①

一般人认为西洋的印刷术是在十五世纪时，德人谷腾堡(Johannes Gutenberg)所发明的。由中国的印刷品得到启发的印刷术更成了推动近代文化的原动力。

1807年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到广东，为了要做文字的传道工作，雇人刻了字模，准备铸造汉字活字。可是刻字的人却害怕为官厅所知而惹祸，烧掉了字模的底版。

马礼逊逃到澳门，得中国人的援助，终于铸成汉字活字。1815年，成功地出版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杂志，1819年又出版了《新旧约圣经》。

1834年，美国的教会买了一套木刻汉字活字回波士顿，并以此为模型制造了铅活字，用来印刷教会的书刊。

1836年，法国人葛兰德(W. C. Grand)在澳门制成了组合式活字(例如和字是合"禾"和"口"字而成)，但由于型体不整齐，终于停止了这个尝试。

1844年，美国的长老会在澳门成立了花华圣经书房，以谷玄(Richard Cole)为主任。谷玄用现在的4号活字印刷了许多书。这所书房在1845年迁到宁波，其后易名为美华书馆。1858年姜别利(William Gamble)出任印刷主任，他用电胎法成功地制出字母，并且铸造了大小不同的七种活字，使之与西文活字的1至7号的大小相当。从此汉洋两种活字的大小便取得一致。

---

① 《中国出版史料补编》，页274。

美华书馆1859年迁到上海，并且还能供应日本的假名活字，故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和、洋两种文字书籍，多亦委托上海美华书馆印刷。平文(James Curtis Hepburn)编制的和英辞典《和英语林集成》，是由美华书馆印刷的。1867年，为了担任本书的校正工作，岸田吟香也去了上海几个月。

这时候，日本也有些人苦心研究发明活字。象江户的木村嘉平，长崎的本木昌造便是。

1869年(明治2年)，本木知道姜别利要返回美国，便请他经过日本时稍作逗留，向他请教了活字的制法。因此，维新后不久，日本便能够进行活字印刷，而无须依赖外人协助。

1876年在费城(Philadelphia)举行的美国独立100周年纪念博览会中，日本展出了自制的小型印刷机。到该博览会视察的中国使节李圭见后，曾激赞说："印书活字版甚精，皆日本人做西法自制，青出于蓝。"(《环游地球新录》)

其后，日本制的活字逐渐改良，并且销售至中国。1883年，筑地活版所因此而扩张营业，设分店修文馆于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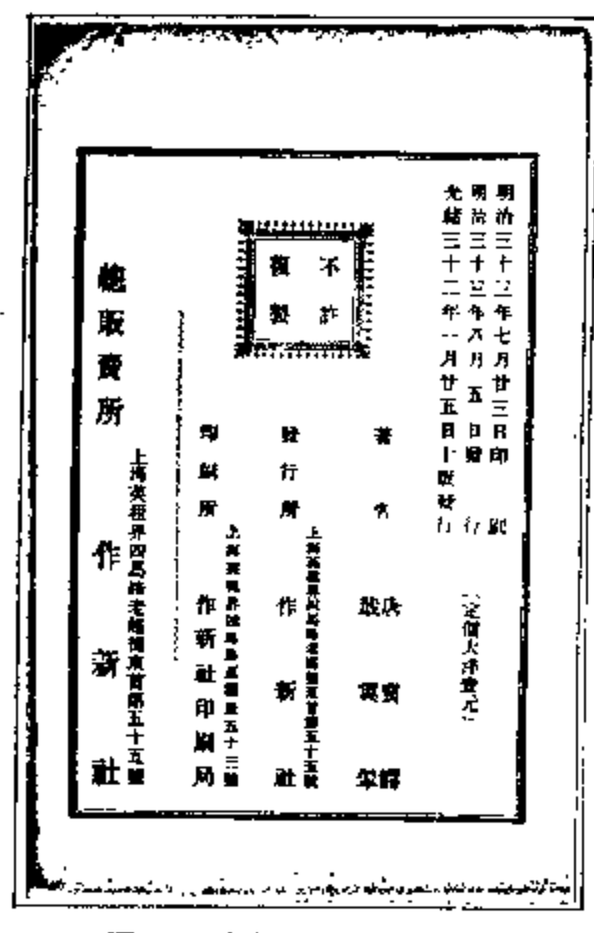
留学生开始到日本留学的第二年，上海出现了商务印书馆。顾名思义，这是为印刷商务的书籍而设立的印书馆。这所印书馆的产生，实因当时留学生来日后涌现的新空气所孕育而成。该馆所用的机械和活字主要是日本的制品，故其印刷鲜明，获得好评，不久成为中国最大的出版社。

二　留学生的出版物与中国的出版样式

中国的留日学生，在留学的岁月中，努力地从事著书和翻译的工作。

最初出版的书籍是为了学习日语而编的教科书《东语正规》。

这本书出版于1900年(明治33年)8月。著者是唐宝锷和戢翼翚。他们在嘉纳治五郎门下受了三年的教育后，转入东京专门学校就读。



〔图19〕《东语正规》封底里页

这本书，单以内容而言，较过去学习日语的入门书远为充实，也是中国人第一部科学地研究日语的书，值得作特别的介绍；同时，在形式上(印刷、制本)，这书也是划时代的作品。

所谓划时代，是指这本书用洋纸和表里两面的印刷，且用洋式装订。

日本自明治初期以来，印刷和装订书本都是用洋式的，故并非特别罕见。但对于中国来说，却是空前的事。

如前所述，在明治维新以前，中国的印刷虽已使用了西洋人制造的新式铅活字，但在印书之时，却还是只印一面，而把纸对折起来，订装成书。

马礼逊等传教士开创的出版事业，逐渐蓬勃地发展。1842年，随着南京条约的缔结，传教士获得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便利。他们便在各地建立教堂、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医院等，并且设有印刷所，出版一些宗教和科学的启蒙书籍。

1877年，随着这些教会出版事业的扩大，合作经营的时机遂臻成熟，于是作为教会的共同事业的益智会便告诞生。益智会出版的丛书《西学初步》共有42部80册之多，但都是单面印刷和对折装订的。

1887年，广学会创立，陆续出版一些关于历史、自然科学、伦理、宗教及时事问题的书刊，其程度却较教科书水准为高。例如花之安(Ernst Farber)的《自西徂东》五册(1884年香港初版，1893年广学会重版)，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时事新论》三册(1894年)和《泰西新史揽要》八册(1896年)，林乐知(Young J. Allen)的《中东战纪本末》12册(1897年)和《全地五大洲世俗通考》21册(1903年)，李思伦白(Lembert Rees)辑译的《万国通史》30册(1900—1905年)，等等。

就其内容而言，固然是新的东西，且还加插了不少地图、图版、照片等，但即使如此，却仍不脱历来的单面印刷和对折装订的样式。象《万国通史前编》，是18.2cm×30.4cm的大开本，在线装书而言，算是属于豪华的了，但却不是洋装本。《万国通史前编》和《东语正规》正好是同年出版的书。

西洋人为中国人的启蒙而推动的出版事业，为甚么仍用这样的旧形态进行呢？

原因之一，是为了保存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的传统，寓有"力求不抵触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和尽量避免引起磨擦"的深意。其次，当时的西洋人，将世界各国划分为文明、半开化、未开化和野蛮四个阶段。而以日本为半开、中国为未开之国。他们认为对未开之国直接输入文明的事物，是有害的。

中国本身的出版界，情况又如何呢？1891年，伦章造纸厂在上海创立，出产洋纸。[1]但在中国出版的书籍却还是单面印刷，对折装订的，即使是新式印刷所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品也不例外。《东语正规》在日本出版的同年，上海出现了《亚泉杂志》，这是中国人自己编刊的第一种科学杂志，书中出现了化学符号，旧装也不见得不

① 《中国书的故事》，页79。

相称，而单面印刷和对折装订成书的形式却一点未改。①

这样说来，以洋装印制的《东语正规》可说是中国印刷史上有革命意义的事件。《东语正规》是在明治 33 年7月 23 日印刷、同年8月 5 日发行的(见〔图19〕)，最初似乎是自费出版。② 明治 35 年以后，由译书汇编社增补再版。这可从明治35 年 6 月发行的《译书汇编》第 2 年第 3 期的广告得知。

在此以前，即明治 31 年 10 月，梁启超在横滨发行的旬刊杂志《清议报》，虽然是在日本印刷，但依旧保留着对折装订的样式。即使在《东语正规》出版之后，该志还是依然故我。在连杂志也不用洋装的中国书刊之中，以洋装的姿态出现的《东语正规》，是应受重视的。

譯書彙編社發行書目

再版和文漢讀法
東語正規
累卵東洋
物競論
日本遊學指南
波蘭衰亡戰史
國家學原理
女子教育論
日本制度提要
和文奇字解

〔图20〕《译书汇编》第 2 年第 3 期广告

1900 年《东语正规》的著者之一戢翼翚和其他同志组成的译书汇编社在东京诞生。此事详见本书第五章“留日学生的翻译活动”。这个社的机关杂志《译书汇编》的创刊日期是 1900 年 12 月 6 日。它与《清议报》不同，开始便是洋装的。在中国，自甲午战争以后，杂志的出版如雨后春笋。1896 年，梁启超主编的第一种杂志《时务报》创刊。1897 年，维新派支持的《知新报》③、《湘学新报》、《农学报》等亦相继诞生。1898 年

① 参看实藤惠秀著：《日本文化の支那への影响》一书中的《初期商务印书馆》。

② 参看明治 34 (1901)年 7 月发行的《译书汇编》第 7 期的新书广告。

③ 实藤原书所记为《新知报》，按实为《知新报》之误。——译者注

《无锡白话报》、《蜀学报》、《工商学报》也出版了。但这些杂志却全都是旧装的。《工商学报》诞生的第二年(1899)，在日本横滨创刊的《清议报》也不例外地沿袭中国杂志的印制传统，虽然用活字印刷，但仍保留对折装订的款式。① 所以，留学生在日本所发行的《译书汇编》成为中国杂志采用洋纸、两面印刷和洋式装钉的鼻祖。

关于《东话正规》何以在日本印刷之事，其再版的序文有如下说明：

以东文之书，殊未便于中国发刊，不得不于东付刊之。

这里所谓"未便"，实指以假名编入书中所引起的不便。

其次，为何《译书汇编》和译书汇编社出版的单行本，也要委托日本的印刷所印刷呢？其理由是：

1. 委托日本的印刷所印刷比把原稿送到中国去出版更为便利，特别是便于校正的工作；

2. 日本的印刷较中国为优，插入图片及图表时，委托日本的印刷所更为便利；

3. 用假名时较为便利。

日本当时书籍的装订，除了特殊的东西外，全部是洋装的。中国书的印刷和装订的改革就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这与学生到日本后剪除辫发，同样是使人感到新鲜的事物。

这种两面印刷和洋式装订是如何发轫于日本而传到中国的呢？以下我将利用实藤文库的藏书与所编的《中译日文书目录》，比较日本和中国的印刷界，以说明洋装本如何逐渐传到中国的情况。

---

① 《清议报》以前的中国杂志是木刻或石版印刷的。其中商务印书馆印刷的《亚泉杂志》(1900)既用活字印刷，又用对折装订，可说是一种新的形式。

三　旧装本之中的洋装本

《东语正规》和《译书汇编》出版的第二年，即1901年，中国书的出版情况是怎样的呢？

首先，看看中国方面的情形。有新内容的书刊，较引人注目的有如下所列各种。但全部都是旧装的。

(书　名)	(编著者)	(发行所)
时务通考续编(16册)	点石斋	点石斋
格致丛书(32册)	徐建寅	中西译书会
钱辑财政考(4册)	钱恂	
中西蒙学便览(2册)	恩光	
威廉振兴荷兰纪略(2册)	Dr. W. E. Macklin 译者不明	广学会
新政真诠(6册)	何启①	格致新报社
万国政治艺学全书(53册)	鸿文书局	鸿文书局
黑奴吁天录(4册)	Uncle Tom's Cabln 译 林纾、魏易译	武林魏氏

其次，再看看日本书的汉译情况，可数出者有29种，其中22种在中国出版，都是旧装的。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发行所)
泰西教育学(2册)	能势　荣	叶　瀚	金粟斋
日本皇室典范义解	伊藤　博文	沈　纮	金粟斋
东洋新史揽要(7册)	石村　贞一	游瀛主人	时学庐
大日本中兴先觉志(2册)	冈本　监辅	(原汉文)	开导社
西洋史要(2册)	小川银次郎 佐原　笃介	樊炳清 萨　端	金粟斋
拳匪纪事(6册)	佐原　笃介 沤　　隐	(原汉文)	普通学书室

① 《新政真诠》的著者是何启和胡礼垣。——译者注

日本地理志（3册）	中村　丘六 頓野广太郎	王国维	金粟斋
日本历史（5册）	荻野　由之	刘大猷	教育世界社
万国地志（3册）	矢津　昌永	樊炳清	教育世界社
西巡大事本末记（6册）	吉田良太郎	八咏楼 主人铢	上海书局
新编小物理学	木村　骏吉	樊炳清	教育世界社
普通动物学	五岛清太郎	樊炳清	教育世界社
近世博物学教科书	藤井健次郎	樊炳清	教育世界社
中等植物教科书	松村　任三 斋田功太郎	樊炳清	教育世界社
制羼金法（2册）	桥本　奇策	王季点	江南制造局
男女婚姻卫生学	松平　安子	诱民子	香港永利源
中等日本文典译解初编	三土　忠造		教育改良会
泰东之休戚	西　师意	（原汉文）	河北译书局
实学指针	西　师意	（原汉文）	河北译书局
大学义疏	西　师意	（原汉文）	河北译书局
史　眼	西　师意	（原汉文）	河北译书局
新撰东西年表	井山　赖图 大槻　如电		小方壶斋



〔图21〕《仁学》的旧装本和洋装本

谭嗣同的遗著《仁学》，1899年在日本出版时是旧装的，到了这一年的国民社版（神田、爱善社印刷）出版时，则是洋装本（见〔图21〕，发行所除了日本的国民社外，尚有上海新马路的出洋学生编辑所）。《国民报》是革命派所发行的杂志，而戢翼翚是重要的成员。国民社和出洋学生编辑所与戢翼翚都有关系，由此可见旧装在日本变成洋装时的端绪。



〔图22〕《波兰衰亡战史》封面

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和文汉译读本》。此书是把日本坪内雄藏所编的《国语读本》中的汉字全部注上片假名的读法，而在假名之处则注上汉文的同音字。这就是所谓“和文汉读法”。这种学习日语的方法，其实是把日本人的汉文训读法倒转过来。不过，这本书是旧装的。

另一方面，在日本，译书汇编社除发行《译书汇编》外，还出版了下列的单行本，正如第五章所述。这些书全部都是洋装本。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波兰衰亡战史	涩江　保	译书汇编社同人
国家学原理	高田早苗	嵇　镜
国法学	岩崎昌、中村孝	章宗祥
各国国民公私权考	井上　毅	章宗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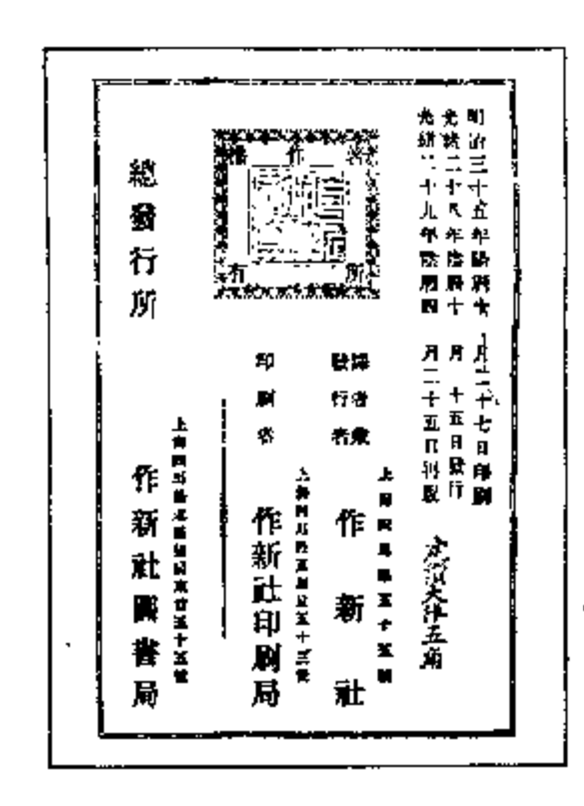
又忧亚子译大桥乙羽著的《累卵东洋》，由神田爱善社印刷，以洋装本出版。封底里虽记有“译者兼发行者：大房元太郎”，但观其译序，则说：

庚子之仲春，于书肆见乙羽生所著之《累卵东洋》一卷，市而读之。言英人蚕食印度种之虐政之惨，黯无天日。甚至食盐赋税，照原价加重三十倍。呜呼，此真足为吾中国之车鉴，译以汉文，将欲刊行之。①

可知忧亚子者，实为中国人。又此忧亚子于同年尚著有《和文汉读法》一书，由此亦可知确是中国人。封底里的译者作大房元太郎，或者是由于政治和法律的顾虑所致吧？

同一年，在上海也出现了一家名为作新社的出版社，专门出版洋装书。

女子教育论　成濑仁藏著　杨廷栋、周祖同译
物竞论　　　加藤弘之著　杨荫杭译


定價大洋五角
譯者兼發行者　作新社
印刷者　作新社印刷局
總發行所　作新社圖書局

〔图23〕《白山黑水录》封底里页

这家出版社是留日学生戢翼翚与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合作开办的。下田女士在这一年开始从事中国女子留学生的教育。她同时又邀请戢翼翚教她和一位姓逸见的人学习中国语。她希望为中国人出版一些更好的书。实践女学校的一笃志家知悉此事，捐助了十万元给她。因此，她便与戢翼翚和逸见氏商量，在上海创办了作新社。担任该社的编辑和印刷职务的工作人员中，有不少是日本人。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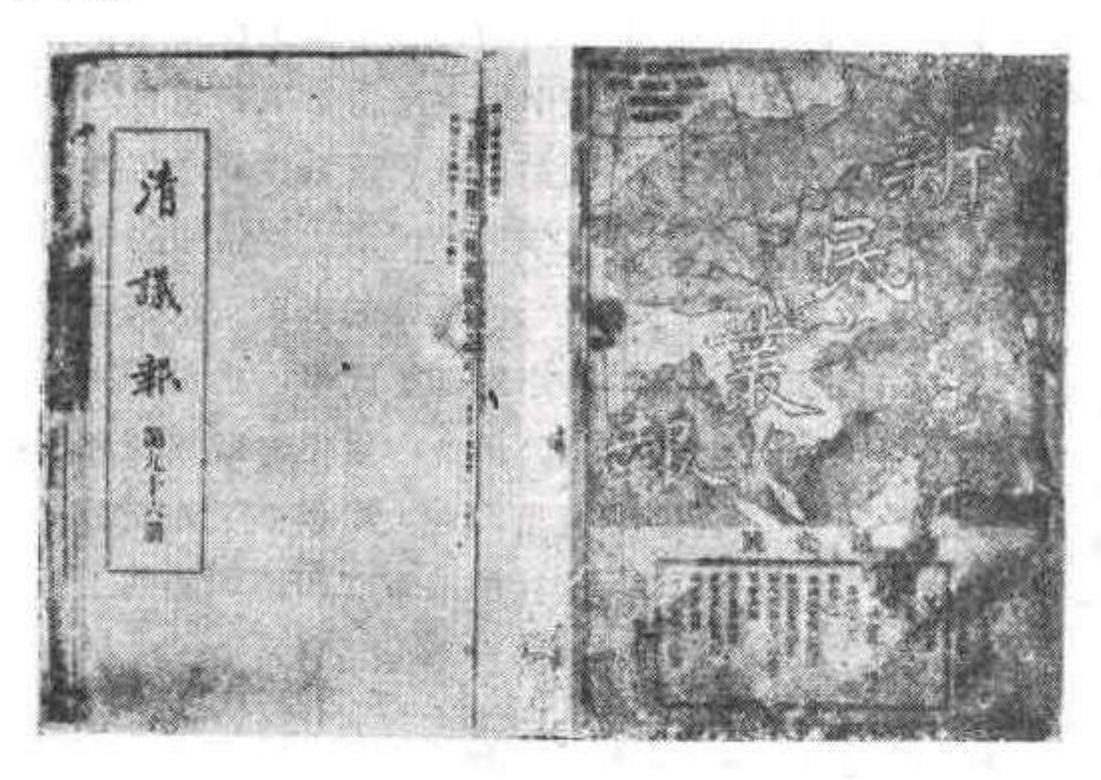
① 大桥乙羽著，忧亚子译《累卵东洋》一书的译者序。

② 中国方面的记录，王汉章的《刊印总述》中这样说："作汴梁卖书记之王立才设开明书局，梁启超弟子何澄一（天柱）设广智书局，竟印新书，颇为三十年来文人所景仰。未几又有作新社（按：系兴中会戢翼翚等创设）……"（《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页366）。

由此社出版的《白山黑水录》一书封底内页所记文字(见〔图版23〕)看来，印刷者虽然是“上海四马路惠福里53号作新社印刷局”，但印刷的日期却是“明治35年阳历10月27日印刷”。与此相同的例子是《世界近代史》的封底内页，同样也印着“明治35年阳历11月25日印刷、光绪28年阴历11月1日发行”，假如是在上海印刷的话，“明治35年”这些文字是不该出现的，我想这大概是在日本印刷的吧！

这家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些日本书的汉译本和学习日语的书，全部是洋装本。《东语正规》其后亦由作新社出版。①

戢翼翚身兼译书汇编社、作新社、出洋学生编辑所、国民社和国民报社等出版机构的重要领导者的职位，对推动中国出版事业的近代化有一定的功劳。如果说戢氏是中国书刊洋装化之父，似亦不为过。



〔图24〕《清议报》封面　　〔图25〕《新民丛报》封面

① 笔者买到的是作新社的第10版。现藏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实藤文库”内。

四　洋装本的发展

1902年1月起，梁启超停办《清议报》〔图24〕，改出《新民丛报》〔图25〕。10月以后，又刊行了"中国最早的文学杂志"《新小说》，二者均为洋装本。

这些刊物的印刷和装订的样式，受《译书汇编》的影响是明显的。被称为"中国新闻事业始祖"的梁启超，即使曾声言以"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态度来追求时尚，尚且不能首先由他自己开始改旧装为洋装，而在他逃亡日本三年以后，才从留学生杂志得到启示，开始踏进洋装本的境域，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日后回顾起来，才知道这虽是不大的改革，但在当时情况下，也不是容易的事。

这一年，在中国方面出版面具有新内容的书，主要有下列各种，全部都是旧装本。

（书　名）	（著　者）	（发行所）
增版东西学书录（6册）	徐维则辑 顾燮光补	
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		京师大学堂
万国政治艺学全书（53册）	朱大文 凌赓飏	鸿文书局
五洲述略（6册）	萧应椿	紫藤华馆
外国尚友录（6册）	张元声	明达学社
觉颠冥斋内言（4册）	唐才常	
最新经世文编（8册）	宝善斋	宝善斋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18册）	甘　韩	绛雪斋书局
皇朝经世文三编（16册）	陈忠倚	上海书局
欧洲十九世纪史	美国人原著 麦鼎华　译	

同年，日本书的中译本，以旧装本出版的有43种。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发行所)
哲学要领(2册)	井上　圆了	罗伯维	广智书局
中等教育伦理学	中岛　力造	麦鼎华	广智书局
日本学制大纲(4册)	泰东同文局	(原汉文)	泰东同文局
日本新学制	文　部　省	天津,东寄学社	天津,开文书局
英国宪法论	天野　为之 石原　健三	周　达	广智书局
族制进化论	有贺　长雄	广智书局	申报馆
英国制度沿革史	工藤　精		广智书局
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	酒井雄三郎	华文祺	教育世界社
明治政党小史	东京日日新闻社	陈　起	广智书局
日本变法次第类考初集(7册)		程尧章	政学译社
社会学	岸本能武太	章炳麟	广智书局
欧洲财政史	小林五三郎	罗　普	广智书局
社会党	西川光次郎	周　子	广智书局
经济教科书	和田垣谦三		广智书局
世界通史(10册)	石川　利之	(原汉文)	中外书会
支那史要(4册)	市村瓒次郎	陈　毅	广智书局
新撰日本历史问答(2册)	冈野英太郎	逸人后裔	广智书局
东洋史要	小川银次郎	屠长春	普通学书室
亚西里亚巴比伦史	北村　三郎	赵必振	广智书局
满洲旅行记(2册)	小越　平陆	清克济	广智书局
万国史纲目(8册)	重野　安绎	(原汉文)	东京劝学会
日本全史(15册)	高谷　疑夫	(原汉文)	世界教育社
中国文明小史	田口　卯吉	刘　陶	广智书局
支那文明史论	中西　牛郎	普通学书室	普通学书室
世界地理志(3册)	中村　五六	桶田保熙	金粟斋
日本维新三十年史(6册)	博　文　馆	罗　普	广智书局
回裔大事记(6册)	长谷川雄次郎		三乐书屋
十九世纪外交史(2册)	平山　久	张　相	杭州史学斋
普奥战史	羽　化　生	赵天赛	商务印书馆

泰西通史(4册)	箕作 元八 峰岸 米造	华文祺 李 徽	文明书局
支那最近史(4册)	增田 贡	(原汉文)	上海书局
欧洲文明进化论	民友社	陈国镛	广智书局
日本政治地理	矢津 昌永	陶 容	商务印书馆
俄大彼得帝传	山路敬一郎	张稷先	江左书林
西巡回銮始末记(6册)	吉田良太郎		上海书局
地球之过去及未来	横山又次郎	冯 霈	广智书局
欧亚各港史	参谋本部	广智书局	广智书局
生徒心得	陆军士官学校	王肇鋐	工防营
修辞学	饭田規矩三	蒋方震	广智书局
日本维新慷慨史(2册)	西村 三郎	赵必振	广智书局
扬子江流域现势论	林 繁		广智书局
东亚现势论	持地六三郎	赵必振	广智书局
理学钩玄	中江 笃介		广智书局

其中，泰东同文局是滕山富太经营的。东京劝学会是岸田吟香所经营的，二者虽同设于东京，但印的书都是旧装的。这与上海的广学会相同，是为了投合中国人的爱好。

这年，译书汇编社出版了十数种洋装本的新书。据6月发行的《译书汇编》第二年第三期的广告《译书汇编社发行书目(已刊)》，有如下诸书：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再版和文汉读法	晦阴主人 忧亚子增广	
政治小说累卵东洋	大桥 乙羽	忧亚子
物竞论	加滕 弘之	杨荫杭
日本游学指南	章宗祥	
女子教育论	成濑 仁藏	杨廷栋
日本制度提要		周祖培 本社同人
和文奇字解	本社同人	

名　学		杨荫杭
政学入门	本社同人编	
财政四纲(角缩版)	钱　恂　编	
最近支那论		本　社
欧美日本政体通览	巅涯生(章宗祥)编	
法律学论纲		巅涯生
外国国势一览	巅涯生编	
欧美各国最近财政及组织		本　社

其中,《再版和文汉读法》、《日本游学指南》、《和文奇字解》是中国人编著的,其余都是日文书的汉译。

《女子教育论》与《物竞论》,前年是由作新社出版的,译者也都相同。我只看到了作新社版的,而未见译书汇编社版的书。就此,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1. 既有作新社版,也有译书汇编社版。不过由于译者相同,故只是书的封面不同,内容则是一样的。无论怎样,都可以证明译书汇编社与作新社有密切的关系。

2. 若以为是由"译书汇编社"发行的话,则所贩卖的或者就是作新社版的。由于前年出版的《累卵东洋》一书亦列入此书目之中,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笔者较倾向于此一说。

作新社出版了《白山黑水录》和《世界近世史》,前者是小越平陆著《满洲旅行记》的译本,后者的原著者是松平康国。封底内页虽有上海印刷的字样,但印刷的日期是明治纪元,恐怕也是在东京印刷的吧!且后者还附有三幅着色的地图。由此观之,益可相信它是在日本印刷的。①

这一年,留学生又组织了教科书译辑社,开始翻译和刊行中学教科书。这可说是译书汇编社的姊妹团体。其出版物中有一种为陈榥著的《物理易解》,纸质、印刷图版都与日本的教科书一样,且

是东京并木活版所印刷的。

同年，大学者吴汝纶到日本访问，视察教育，获日本朝野上下欢迎。即使在吴氏足迹不到的地方，当地的报章也发表欢迎他的社论。[②] 对吴汝纶来说，此行的观感和收获甚丰。他把这次游历的观感写在《东游丛录》中。这本书由东京的三省堂代为印刷，是布面精装的洋装本。该书出版后，在中国获得异常的好评，不久又出版了《重订东游丛录》。由于是旧装本，遂分成四册。

这是清楚地显示出当时日本与中国出版界的关系的一个典型例子。吴汝纶既是备受尊敬的古典学术的大宗师，同时也是对新学有充分了解的学者，对日本文字的改革问题有他的见地，他还是简体字运动的支持者。他把自己在日本的视察纪录交给三省堂印刷，相信正是这个缘故。从明治初年以来出版的东游日记，到此时为止，总计已有五十七种。[③] 可是用洋装的连一部也没有。吴氏的《东游丛录》是这类游记洋装印制的滥觞。假如可能的话，吴氏的书也许会以洋装本再版的。不过，在中国，这究竟是不可能的事。故再版时，即改用宣纸铅印，分为四册。

吴汝纶之子吴启孙，当时正在日本留学，在这年将《和文释例》

---

①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所载净雨的《清代印刷史小纪》一文，是这样说的，"石印既行，印图大易，故有绘印时事者，如上海之《点石斋画报》、《书画谱报》、《求我报》、《蒙学画报》等，然皆单色印刷。迨富文阁、藻文书局等出，乃有彩色石印，而其出品色彩无深浅之分，单调粗浊，所谓平色版而已。

日本之石印术，初得之于我国之上海，继自研究，乃转青胜于蓝。光绪二十余年，法人在沪设法兴书局，聘日人制彩色印版，始能印浓淡分明之图画，色彩判别阴阳，深浅各如其度，殆能与实物仿佛。其法以金钢砂将石磨粗成许多之散布微颗粒，一如网目之状，谓之砂版。治上海商务印书馆聘日人和田、冈野、松冈及细川等彩印技师，此道益精，仿印山水花卉人物，设色能与原底无异。"(页357)

② 此可从中国人翻译日本报章记事编印成册的《东游日报译编》(华北译书局出版)见之。

③ 据实藤惠秀：《东游日记目录》(未刊)统计。

交由文明书局出版，由秀英舍印刷，是洋装书中的上品。

同年，东京泰东同文局出版了大矢透的《东文易解》，是用旧装的。与吴启孙的《和文释例》洋装本比较，不得不承认吴氏父子的进步性。

这年夏天，俞复、廉泉在上海创立文明书局。开始出版小学用的教科书三十种；① 同时还出版中学用或一般用的书，其中一种为高田早苗著、嵇镜译的《宪法要义》(未见)。文明书局出版的书籍，最初多属旧装，只有吴启孙的《和文释例》是洋装的。由此看来，这本《宪法要义》恐怕也是旧装的吧。不过嵇镜也译了高田早苗的《国家学原理》，由译书汇编社出版，却是洋装本，故《宪法要义》的制本问题，暂不敢论定。

上海的出洋留学生编辑所出版了福本诚著、马君武译《法兰西近世史》，是洋装本，不难想象这是在东京印刷的。

可是，这年 8 月，一份叫《新世界杂志》的洋装本杂志在上海发行。其印刷不鲜明，切裁不一。以当时的印刷水准看来，当是出于中国人之手。这应可说是中国第一次用洋装本印制书刊的尝试。

1900 年由留学生开始的洋装本，到 1901 年，经译书汇编社、作新社、出洋留学生编辑所的努力而得到推广。1902年，又有吴汝纶父子的进步的尝试，终于有中国自己印刷的洋装本杂志的产生。如果以 1900 年为中国书洋装印刷萌芽之年的话，接着的 1901 年是幼苗茁长之年，到了 1902 年，小幼苗已长出幼枝来了；同时，在遥远彼岸的中国，更萌出了一支新芽。

五　旧装本和洋装本的对立

1903 年，这棵新树的枝干都有增长，已经有与古树争长之势。

① 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页 118 所记统计。

这一年，可以说是新旧对抗，平分天下的一年。所以如此，实有以下种种原因。

这年，留日学生增至一千名。这些留学生发行了《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游学译编》等杂志，全都是洋装本。与此同时，留学生也出版了很多洋装的日文书中译本。因此，这一年的中译书刊就有 187 种之多，呈现空前的盛况。

中国出版界方面，也起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中国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① 与日本的出版机构金港堂达成合作经营的协定。

据商务印书馆创立 35 周年的纪念刊物《最近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931) 中《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一文说：从 1903 年，双方各出十万元资本以扩大经营事业。同时，编辑阵容之中，增聘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槙太郎(雨山)、加藤驹二等作顾问②，印刷技术方面，亦输入了日本的技术。③

1903 年，该社招聘了印刷技师前田乙吉、大野茂雄，教中国的技师网点照相的制法。1905 年，又招聘了彩色石印技师和田璘太郎、细川玄三、冈野、松冈、吉田、武松、村田、豊室等，输入彩色石印技术，此外，又聘请了三品福三郎、角田秋成，向他们学习凹版印刷。到了 1908 年，更招聘了木村今朝男，学习平版印刷术和洋铁印刷术。于是，印刷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正因为商务印书馆从日本输入了编辑、印刷的进步技术，不久便一跃而成为中国第一家大出版社。

---

① 1897年创业之际，向日本购入印刷机，1900年购买上海的修文馆印刷所(日资)的全部机械。1901 年设编译所，以蔡元培为所长，除印刷外，亦开始出版书籍。

② 据《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有如下的记述："文明开办之后，商务方编印教科书，由张元济、高凤谦主持，日人长尾槙太郎、加藤驹二等任顾问。"

③ 参看《最近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所辑的《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一文。

1903年以来，从日本输入了资本，招聘了编辑顾问和印刷技术指导者的商务印书馆进行大规模的教科书编译和出版的事业，同时也把出版范围扩张到一般书籍去。1903年出版的书籍，就实藤文库中有实物可见的，是旧装、洋装并见。

（书　名）	（原著　译者）	（译　者）	（装　订）
日本明治法制史	清浦奎吾	商务编译所	旧
日本近世豪杰小史（2册）		商务编译所	旧
纳尔逊传	中村佐美译	何震彝重译	洋
卖国奴	登张竹风译	吴梼重译	洋

《卖国奴》是“说部丛书”的第一部。“说部丛书”是翻译世界文学作品的丛书。以此为先导，商务印书馆陆陆续续出版了不少这一类的书。

这里有一件事要注意的。以前作新社、出洋留学生编辑所、文明书局等洋装书，虽然自称是上海印刷，实际上却毫无疑问地是在日本印刷和装订的。可是商务印书馆的书籍，却真真正正是在上海印刷和装订的，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年的11月，北京产业画报馆印刷的洋装本杂志《商务报》创刊，同样也值得注意。这充分表明洋装本在中国的南北方都萌芽了。

不过，其他的出版物，其后依然多在日本印刷。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与日本印刷的中国书籍，在此后数年间，继续维持着正比例的发展。

当时的文明书局，在这一年，一方面出旧装本，一方面也增加出版洋装书。见下表：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装　订）
续哲学妖怪百谈	井上　丹了	晴腊园主（徐润臣）	旧
东文典问答		丁福保	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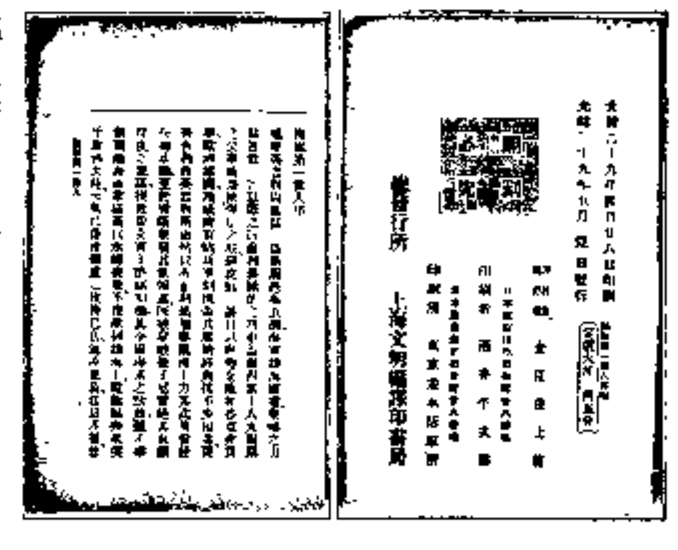
中等日本文典译解（3册）	三土　忠造	丁福同	旧
改正世界地理学（3册）	矢津　昌永	吴启孙	旧
西史通释	浮田　和民	吴启孙	洋 （芝区三田印刷所）
海军第一伟人（纳尔逊传）	岛田文之助	侯士绾	洋 （并木活版所印刷）
华盛顿	福山　义春	丁　锦	洋 （文明书局活版所）

《华盛顿》也许是在上海印刷的。不过，一见“版权所有”的括弧，就可窥见其与日本的密切关系。

在上海，诞生了一家名为通社的出版社，发行洋装本的“通社丛书”。这年还出版了：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自助论	中村正直	羊杰
伊大利亚史	坂本健一	通社编译部
世界之大问题	岛田三郎	通社编译部

这些书无论印刷、广告和纸质等，全都是日本印刷的式样，只是活字形体稍有不同。该社的印刷所在上海铁马路鸿安里底的中新活版部。以后，通社亦大量出版日文书的中译本。



〔图26〕《海军第一伟人》第一页（左）与封底里页（右）

在东京，湖南编译社出版《游学译编》月刊杂志的同时，也刊行了井上圆了、川尻宝岑共著的《哲学微言》、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杨毓麟译）、成城学校讲师述、湖南编译社的《日语教程》（翔鸾社印刷）等书。其上海的发行所则为四马路惠福里的明权社。又，明权社也是《江苏》

杂志的总经销处。

上海明权社不仅做代销，也营出版。汪荣宝、叶澜共著的《新尔雅》即由它出版。印刷则在东京并木活版所。

福建省的留学生组织了闽学会，出版“闽学会丛书”。这年刊行的书就有如下数种，亦由东京并木活版所印刷。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西力东侵史	斋藤　阿具	林长民
哲学原理	井上　圆了	王学来
国家政府界说	民　友　社	萨君陆
国际法精义		林棨编译
社会问题	大原　祥一	高　种
史学原论	浮田　和民	刘崇傑

译书汇编社出版的《日本行政法纲要》(董鸿祎译)，及留学美国的广东人严一著的《进化要论》等，亦在东京并木活版所印刷。

又译书汇编社的上海总经销是四马路东首的开明书店。开明书店本身也出版中译的日文书，如：

(书名)	(著者)	(译者)
东西教育史	中野礼四郎	蔡艮寅 贺廷谟
德意志史2册	白石　真	人演社
日本维新百傑传	干河岸贯一	(原汉文)



〔图27〕《白山黑水录》等四种书的封面

前二书未见，恐怕是洋装本吧。《日本维新百傑传》是东京并木活版所印刷的洋装本。

作为出版洋装书的先驱的作新社，以及前年在东京成立的教科书译辑社和开明书店之间，似乎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参看图版27中三者出版的书的封面的题字都是张廉卿的书法，可以见之。

以上，虽然全部论述了新兴势力影响下的洋装本发展的大概，但也不是说旧装本已形衰落。如果以数量计，旧装本仍是居多数的。具有新内容的一般性书籍，循例是用旧装出版。检其主要者一看：

（书　名）	（著　者）	（发行所）
各国政艺通考(24册)	文盛堂	文盛堂
新时务通考(8册)	储丙鹑等	富强斋书局
泰西各国名人言行录(6册)	张兆森	上海书局
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21册)	林乐知辑译 任保罗译述	广学会
科学丛书(2集)		教育世界出版所
奏定学堂章程(5册)	张百熙等	湖北学务处
选定经济丛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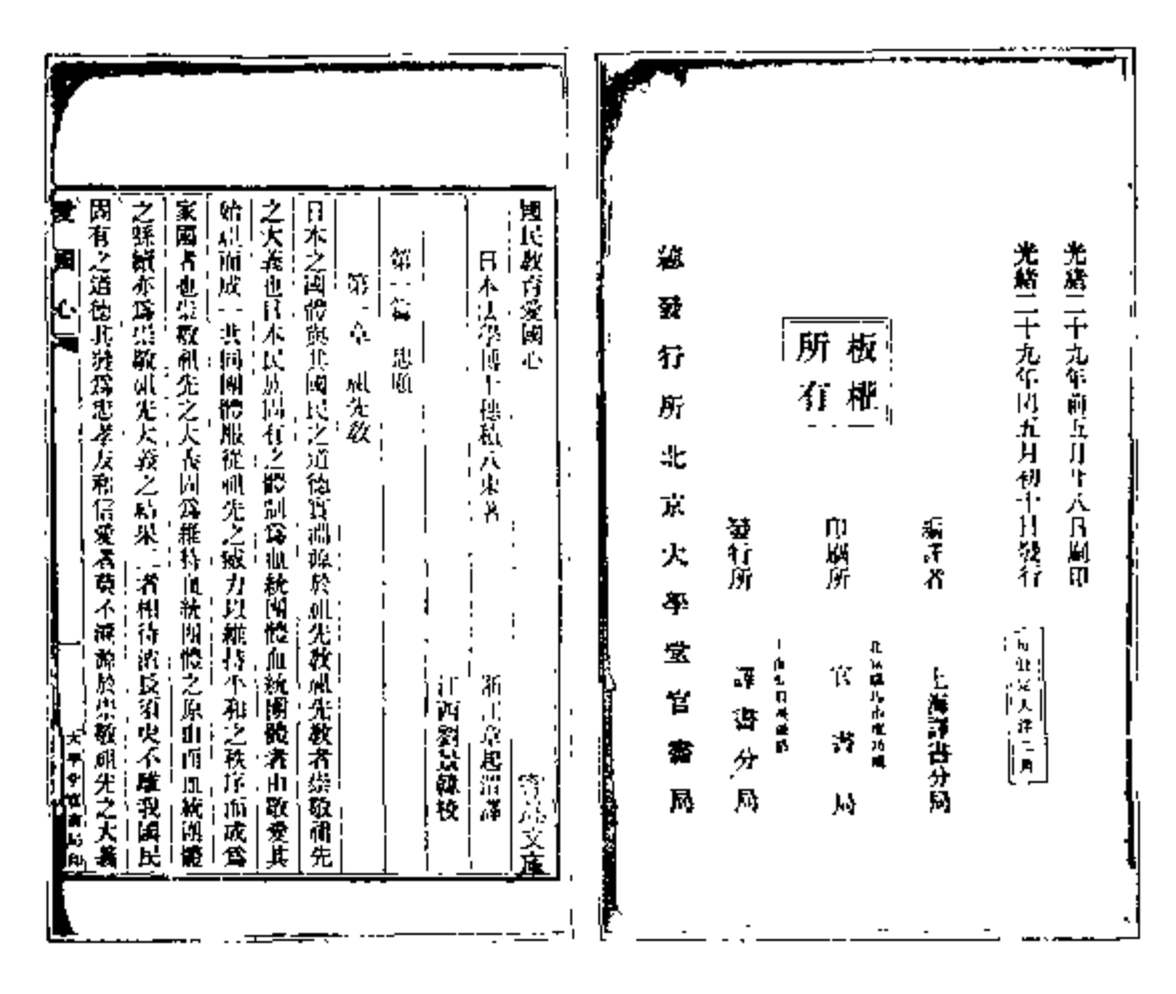
其中《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① 一书，是通过全世界的妇女生活而论述其文化的概况，书中加插了许多照片和图版。其内容最适合洋装，可是由于是西洋人印制的，到了这年还是旧态依然。由此可见其受洋装本所迫的情形。这是广学会出版的大套的启蒙书的殿军，其后已不复见。

这年，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印刷的书有穗积八束著、章起渭译的《国民教育爱国心》。这是由“管学大臣审定”，作教科书用的。但还是旧装本。虽然是旧装，但封底里已有印刷。这种款式也是这

① 参看实藤惠秀：《西洋人の中国女性观——“全地五洲女俗通考”のこと——》，见《新中国》第6号。

时开始的。与日本的印刷品同一类型。(参看〔图 28〕)

这年,汉译的日本书有 187 种之多,数量可谓空前。但其中有 100 册是由会文学社出版的“普通百科全书”。选择了日本的中等学校教科书一百册译出,用同一形式的旧装本出版。如果减去这套书,剩下来的 87 册,其中有旧装的,也有洋装的。总计起来,旧装本仍占多数。这个现象,多是由于以前既有的趋势,或是已往的出版计划的延续而做成的。


國民教育愛國心
日本法學博士穗積八束著
浙江章起渭譯
江西劉景韓校
第一編 忠順
第一章 祖先教
日本之國體與其國民之道德實淵源於祖先教祖先教者崇敬祖先之大義也日本民族固有之體制為血統團體血統團體者由敬愛其始祖而成一共同團體服從祖先之威力以維持平和之秩序而成為家國者也崇敬祖先之大義固為維持血統團體之原由而血統團體之繼續亦為崇敬祖先大義之結果二者相待消長須臾不離我國民固有之道德其猶為忠孝友和信愛者莫不淵源於崇敬祖先之大義
愛國心
大學堂官書局印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廿八日刷印
光緒二十九年閏九月初十日發行
每部定價大洋二角
版權所有
編譯者 上海譯書分局
印刷所 官書局
發行所 譯書分局
總發行所 北京大學堂官書局

〔图28〕《国民教育爱国心》的首页(左)
与封底里页(右)

1904 年以后,中国出版的书刊,大体已洋装化了。到 1905 年,洋装本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03年可以说是中国出版史上的新旧交替的分水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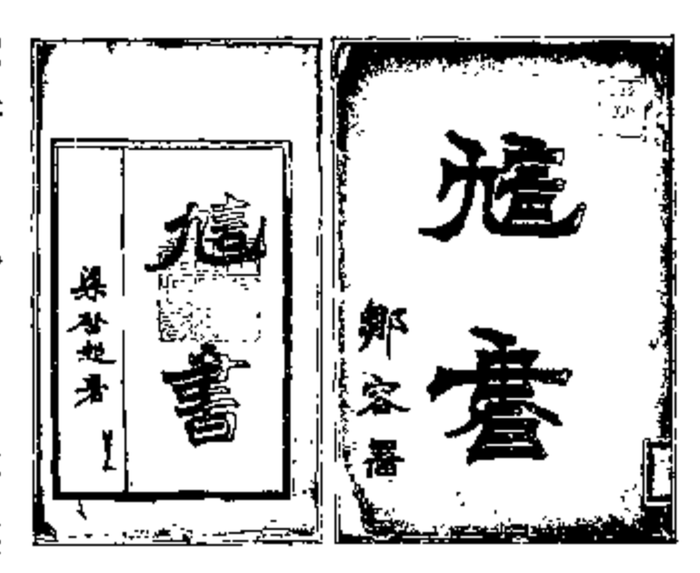
六　洋装本的胜利

1904年，中、日两地的中文书刊，洋装本占了优势，中国的新出版物，大体都是洋装的。

这年中，汉译日文书17种之中：洋装本，6种；旧装本，3种；情况不明的8种。这个统计与去年比较，似无任何特别重要意义，但若就以下各点来说，则可见有了很大的变化。

1899年出版的《訄书》（章炳麟著），这年改用了洋装本（翔鸾社印刷），谭嗣同的《仁学》也由旧装改为洋装。虽未必有显著的重要性。不过，从来以旧装本发行新内容的书刊的广智书局也开始出洋装书，实在是一个大变化。象饮冰室主人著的《中国之武士道》，在这年由东京京桥弓町三协合资会社印刷，用洋装本出版。这家出版社，翌年起，出了很多洋装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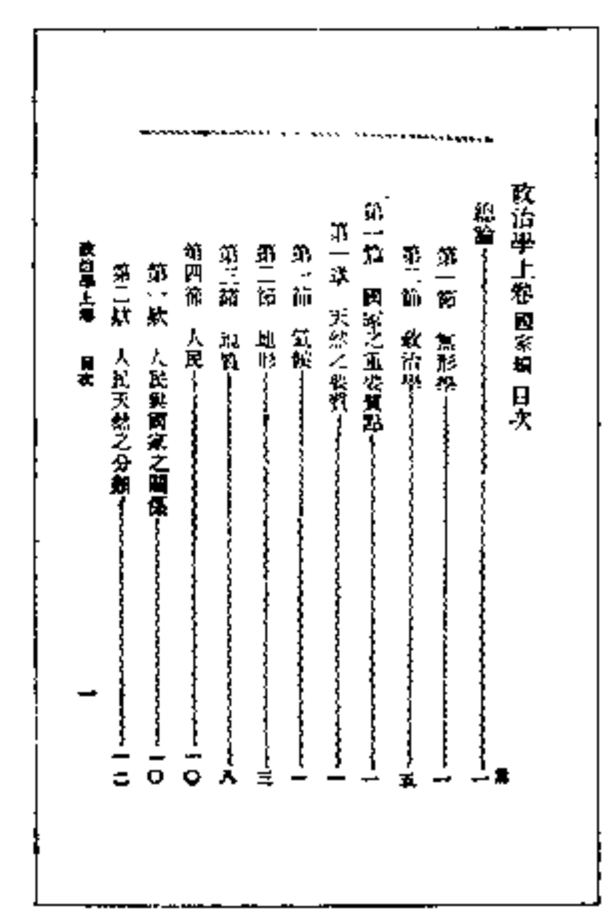
广智书局版中有冯自由译的《政治学》。实藤文库所藏的本子没有封底，所以出版者不明。不过，其用于补白的插图，全是日本的图片。（参看〔图30〕）



〔图29〕《訄书》旧装本（左）与洋装本（右）

再看广智书局出版的其他书籍，其印刷所是上海英租界大马路同乐里。这本《政治学》封底里所印的恐怕也是一样的吧。即使其印刷不是由日本的印刷所承担，我想印刷的机械是日本制的，恐怕不会错。与广智书局关系密切的《新民丛报》，每号必刊有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的广告，亦可以证实这种关系。

以此观之，可以窥见当时中国与日本印刷界的密切交流状态。




政治學下卷行政編終

〔图30〕《政治学全编》的目次（左）与末页（右）

较广智书局的出版改为洋装更有决定性作用的事件是《东方杂志》的创刊。这本在1月25日创刊的杂志，是新兴的和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发行的综合杂志，它一直出至1949年，是一部有份量的杂志，自始即以洋装本出版。

回顾自1900年《译书汇编》在日本出版以来，留日学生在日本刊行的杂志全是洋装的。受此刺激，梁启超主编的杂志也在1902年改为洋装本。这些影响，也在中国的最大的杂志《东方杂志》中反映出来。

《东方杂志》是兼有日本的《太阳》和《中央公论》的形式的一份大杂志，而它以洋装本出现，正象征着中国出版界以洋装书为本位的转变。

1905年是中国出版界洋装书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据《邦书汉译年表》①，这年中，汉译的日文书增加至 48 种，而没有一部是旧装的。

中国人的著作，带有新的内容的书，也都改用新的外形——洋装本来出版。康有为所著的《欧洲十一国游记》(广智书局印刷、广智书局发行)是如此，清国公使馆编辑的《日俄战时纪要》(日本三省堂印刷)也是如此。

京师译学馆印行的《汉译新法律词典》的印刷所是牛込的秀英舍，这是布面精装的上品洋装书。

湖北官书处的"师范教科丛编"中有：1. 教育学，2.(不详)，3. 伦理学，4. 教授法，5. 管理法，6. 学校制度，7. 法制经济学，8. 化学，9. 物理学，10. 11.(不详)，12. 动物学，13. 植物学，14. 音乐等14册，都是秀英舍印刷的。

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也在这年创刊，前后共出 26 册，其印刷所是神田的秀光社。

七　日本印刷公司印行的中文图书

如上所述，留日学生在日本为了从事翻译出版活动，要倚靠日本的印刷公司代为印刷，因而旧装的中国书变为洋装书。其后，这个变化传到中国去，使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等出版的书刊次第由旧装改为洋装。

这样，尽管在中国已出现了洋装本，但由于留学生有翻译上和印刷技术上的需要，其后，假手于日本的印刷所印刷的风气依然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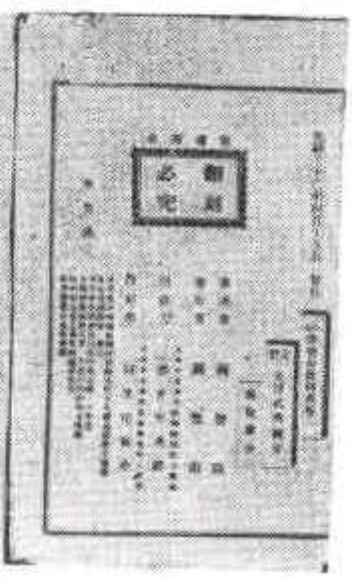
举例来说，1906 年，江苏师范生编辑《江苏师范讲义》历史、地

① 实藤惠秀编，未刊稿。

理、……音乐、体操等 16 册，是编译日本的教授的笔记而由东京并木活版所印刷的。《教育年鉴》有“装订印刷均佳”的评语。

蒋智由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也在同年出版。无论是封面和正文的编排，全部是日本式的。虽然用线来连缀成书，但书页的两面都印刷，这正与当时日本的教科书同一样式，大概由于它是由东京的同文印刷舍印刷所致。





〔图31〕《中学修身教科书》的封面(左)与封底里页(右)

当时，承印中国书刊的印刷所有浅草的东京并木活版所、牛込神乐坂的翔鸾社、牛込市之谷的秀英舍第一工场、神田爱善社、秀光社等家。其中似乎以开始印《译书汇编》的并木活版所得到最多留学生的订单。

并木活版所在浅草区黑船区 28 番地，其印刷人大抵为酒井平次郎。到了 1906 年，酒井平次郎在同区新猿屋町二番地开办了同文印刷舍，这可以前述的《中学修身教科书》的封底里得知。可能是因为大量的留学生的订单涌到，旧有的并木活版所应付不来，故要在邻近的新猿屋町设立专门印刷汉文书籍的同文印刷舍。其证据可从 1907 年刊行的山上万次郎著的《最近统合地理》的中译本和孟传琴的《日本各政治机关参观详记》等书的封底里得知。这些书全部是黑船町 28 番地并木活版所印刷的。又 1908 年刊行的工藤武重《日本议会史》的中译本（东京多文社，上海群益书社）则由浅草茅町一丁目七番的同文印刷舍印刷，印刷人是酒井平次郎。

“同文”是指中日两国是同文的国家之意。当时，出版社命名

为同文馆，是为了博取留学生的好感之故。

1907 年，即同文印刷舍从井木活版所分离出来的第二年，产生了日清印刷有限公司。其设立的宗旨中有："随着清国文明启蒙的发展，在其本国及居留我邦的清国人士，倚赖我邦印刷者正逐年显著地增加。"① 所以这间公司以接受中国人的印刷订单作为其营业方针之一，因此取名为"日清"。

随着留学生的出版物的增加，产生了由中国人印刷中国书的要求。中国人办的印刷所终于在东京诞生了。据《粤西》创刊号(1907 年 11 月)的广告，有如下的标题：

> 看看看！东京留学界之中国印刷所出现！

而它的内容则是：

> 自东京留学界发达以来，我同胞孜孜以输入新智识为急务。于是掷金钱予日本之活版社者，比年以来，盖已百万余圆。益处固多，所损亦云钜矣。吾中国地大物博，为购换文明计，此区区者虽云原不必吝。……文语既异，情感难通，因而欺骗留难，在所不免，费时涉讼，层出不穷，当此国危时急之际，吾同胞徒消耗其有用之光阴，已觉可惜。况复以高尚之人格，日津津然与市侩较长短，所失宁有涯耶。敝所有鉴于此，特不惜重资，购买机械，修筑工厂，聘请匠役，刻已告成。凡厂中司事悉延学界中谙印刷之事务者任之……
>
> 三大特色
>
> 1. 本工厂由中国新女界杂志社与本国数人合资创办。实无丝毫之外股(外国股份)，不同于日清合办者，故不致侵我主权。
> 2. 监厂及外务各员，悉用华人，款接来宾，务极和洽，无文语不通之患。
> 3. 本工厂现购备上等机械三台。……现役工匠二十余人。……
>
> 日本东京小石川区竹早町 34 番地
>
> 中国新女界社合资印刷所谨启

① 《七十五年の歩み》(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史)，页 1760。

虽然在这里印刷的书籍似乎不多，但却含有文化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中国留日学生要求出版权独立的高扬意气，在这件事上表现无遗。

八　日本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日文书

上文所述的作新社、泰东同文局，劝学会等是日本人开设的译书出版社。到了留学生的最盛期，原有的大资本出版社亦对中国书的出版表示欢迎。其中之一是富山房，另外一家是由博文馆的大桥新太郎及其他人合组的东亚公司。除出版了《普通师范讲义》十四册外，也出了《农学丛刊》，巖谷小波的童话故事对译本和学习日本语的书等。

1906年，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了《政法理财科讲义》(参看〔图32〕)，其代销处是商务印书馆。

又《汉译学校会话篇》(1906年，神田的诚之堂书店发行)的情况也相同。神田的诚之堂书店，其"大清国的专买处"是上海的中国教育机械馆。此外，同样的情形也很多。

由此可见当时中日两国出版界的友好状态。



〔图32〕《早稻田大学政法理财科讲议》的封面

到了留学生最盛期，出现了很多专为出版中国人用书的出版社。神田的奎文馆书局以

《法律经济辞典》为首，陆续出版了五至六种教科书式的书。神田的诚之堂书店亦出版了《汉译东瀛游学指南》[1]和日语的读本。

这些书的译者全部是留学生。以此而言，使人感到这恐怕不是留学生自发的翻译，而是受日本出版社的邀请而做的。

不过，由于这些书大多是布面精装的上等制品，它给予中国印刷出版界的刺激是不能否认的。

九　从日本传来的洋装本

为了传播近代的知识给与中国人，出版启蒙书籍的工作是由西方人先开始的。但书籍的外形，或者书籍的体裁，仍是中国旧有的线装书型式。

留学生到了日本，为了出版日本书的中译本，遂委托日本印刷所代为印刷。因此，由单面印刷、对折装订改变为双面印刷和洋装。

双面印刷及洋装制本的书，逐渐也在中国的新书店中销售发行。中国的书店中，日本印刷的洋装书籍和上海印刷的洋装书籍虽并列其中，但西洋人经营的广学会的出版书刊却迟迟未能摆脱它的老样子。那些在中日战争（甲午战争）后曾为中国读书界所异常欢迎的广学会的出版物，[2]其后已不再震动知识界了。广学会

---

① 笔者所据为诚之堂书店发行的《汉译学校会话篇》（1906年8月）卷末的广告，原书未见。拿它与木川加一，田中龟治编译的《东瀛游学指南》比较，则撰序文的三人的出现顺序相同，页数、定价亦仅有少许不同，故其内容当相同。

② 广学会发行的书籍，最初读者甚少。免费赠送，读者稍增。至中日甲午之战后，全国皆表欢迎。从其销货账目就可知道，1893年为800余元，1895年为2,000余元，1896年为5,000余元，1897年为12,000余元，1898年为18,000余元，五年之间，上升20倍以上。（据李提摩太著、蔡尔康译：《广学会第十一次年报记略》，见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第三编卷四，页82—85。）

变成仅出版教会书刊的机关。中国读书界已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蕴藏着新文化的日本系的读物上去。

除了古典书籍的重刻以外，洋装书的倾向至今依然持续着。因为无论在节约用纸的数量、减少藏书的容积及增加阅读的速度等方面，均有数之不尽的方便和好处。

中国的印刷，制本成为现在的样子，是经过日本和留学生的文化活动而加速形成的。这一点是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的吧！①

---

① 由开始至最近为止，洋装本书籍的封底里的印刷，中国与日本是相同的。但自1959年全部改为横排后，封底里的印刷移到封面里。

第七章　现代汉语与日语词汇的摄取

一　中日语文共用汉字的基础

远在明治时代〔1868—1911〕以前，日本便已从中国学来汉字。很早以前，日本人便借汉字来书写日本固有的“大和言叶”①；这些假借的汉字，亦称“嵌字”。因为中国人不用这些“嵌字”，“嵌字”只用于日本语文，故较为特殊。除此之外，其他汉字都是中日两国共用的。

日本的汉字，都是从中国一点一画地学过来的。所以倘使某字的写法在中国加多了一画时，日本也跟着增加一画；减少了一画，日本也跟着减少一画。② 对于成语，日本人亦墨守中国的成规。

明治以后，当西洋新文化传入之际，〔明清两代〕西洋人所作的汉译，在日本颇受欢迎。这段期间由西洋传入的词汇，不论在中国或日本，都是相同的。例如“几何”一词，来自利玛窦（Matteo Ric-

---

① “大和”是日本民族的别称；“言叶”有语言的意思，“大和言叶”（Yamato Kotoba），指日本固有的语言，特别指平安时代（约公元八世纪至十二世纪）的雅言。按日本现代词汇通常分为四类：大和言叶，字音语（大多来自汉语），西洋外来语，及以上三类的复合语或派生语。其中“字音语”所占最多，在上田万年、松井简治编的《大日本国语辞典》（东京，1915 年10月初版、1953 年 3 月再版）中，“字音语”便占 60% 以上（见金田一春彦《日本语》，东京，1968 年 9 月，页 20）。“大和言叶”被“字音语”取代，残留在现代日本语的数量不多。汇集“大和言叶”的最早书籍，有 11 世纪初期刊印的《类聚名义抄》等书。——译者注

ci)所译的《几何原本》，至今仍为中日语文所通用。

在幕府末期及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除了通过中国学习西洋文化之外，还开始直接从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等地努力输入新文化。正如《兰学事始》[③]所描述的，这种努力是大规模地展开了。当输入西洋新事物及新思想时，日本人不使用原语，但借汉字径造新词汇。大槻文彦的《箕作麟祥君传》，曾对这种苦心作如下的描写：

在此之前，即明治二年〔1870〕，当麟祥君在〔东京帝国〕大学南校[④]的时候，政府任命他翻译法国刑法。竣工之后，又马上翻译了民法、商法、诉讼法、治罪法、宪法等等。后来，这些翻译都被教育部公诸于世。由是，我国人开始知晓法律为何物。然而这些译本有不少误译的地方。当时，法学仍然未开，麟祥君仍未通晓这门学问；没有参考书，没有字典，又缺乏指导老师；遇到难解的词句，麟祥君惟有独自苦心钻研；当时，我国人仍未具有近代法学意识，故此没有可资枚举的成例；他不但苦无可用的译语，即使向那些汉学专家请教，亦毫无用处。虽然创造了新词语，由

---

② 实藤氏所称日本在汉字字形上一律向中国看齐的原则，似应有一个时间上的界说。在明治时代或以前，日本人坚守这个原则，似无疑问。但是，在1910年代，便开始动摇了。例如，日本"临时教育调查会"在1915年，便有"国语国字国文改善建议"；在"国字"部分，对于当时汉字字形混乱情形不满，感到有"改善"的必要。20及30年代，动摇的程度更加明显。1925年的"字体整理案"和1937年的"汉字字体整理案"，对于混乱的字形，决定大规模地加以"整理"。1946年公布了"当用汉字"（常用汉字）1850个；1948年又制定了"当用汉字字体表"，规范了1850个汉字的写法。根据这个"字体表"，中日不同写法的汉字就有好几十个。——译者注

③ 《兰学事始》，日本杉田玄白（号鹳斋，字翼）著，明治二年（1869）东京天真楼出版。这本书纪录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研习西洋学问、特别是荷兰学问的事情。后来，日本人不断研究这部珍贵的纪录。有的人给这本书附加白话注释，有的专做书内提及的人物和书项的考证，还有人给这本书做补充工作，著名的有大槻茂桢的《兰学事始附记》（1913年）。——译者注

④ "东京帝国大学南校"，原文是"大学南学"，指今日东京大学南部的校舍。——译者注

于人们对这些新语不熟悉，所以往往备受非难。麟祥君所创的新语中，似乎只有"权利"和"义务"两译语（right 及 obligation）是从汉译《万国公法》一书取来，其他法律用语，例如"动产"、"不动产"、"义务相杀"、"未必条件"等，都是麟祥君辛苦推敲出来的。尤其是"治罪法"等语，更是备尝艰苦，复得辻士革君多方参议而成的。①

日本人借汉字制作新语时，有时用中国成语的字汇；然而新语却不含这个成语原来的意义，只当作包含一种新鲜意义的词语使用。例如，日本人所制作的"文学"一词，是借用中国成语"文章博学"的字汇而成的；维新以后，这个词汇在日本被用来代表西洋所谓 literature 的意义。又如"革命"一词，来自汉文"革天命"；"革命"原是革天之命的意思。但是，在维新以后的日本，这个词汇被用来表示人民推翻旧政时的 revolution 的意义。

还有一个造词法，就是当中国没有适当的成语可用的时候，日本人组合不同的汉字来制作新语。例如，以"哲学"表 philosophy，"说明"表 explanation，"断交"表 rupture 等是。上述新语，虽然由汉字荟萃而成，却非传统中国语文所固有的。

这种新语的构成，全部依照汉语语法。其构词法有下面几种：

1.（修饰语）+（被修饰语）

A（形容词）+（名词）

例：哲学、美学、背景

B（副词）+（动词）

例：互惠、独占、交流

2.复合同义语

例：解放、供给、说明

3.（动词）+（宾语）

例：断交、脱党、动员

① 大槻文彦：《箕作麟祥君传》页 88—89。

4.上述各项的复合语

例：治外法权、最后通牒、消火器

总而言之，日语新语的造语法，是依据传统汉语的构词法的。特别是第3种造语法，正好和传统的日语造语法相反；虽然大逆不道，日本人仍然乐于取用这种方法，大概是为了缩短音节的缘故吧。日本人借用久已存在于中国的汉字去翻译西洋词语，又依汉语构词法径造新语；不过这些作为并非和中国人协议而后决定的。因此，虽然日本人也在使用汉字，但是可以创出仅在日本才使用的词汇。

中国对于西洋新文化的渴望，比较日本迟出。① 当中国人有此需求时，首先获得的便是西洋人自告奋勇所做的汉译，后来才有严复、林纾等中国人的翻译。

到第一次中日战争〔按指甲午之役，1894—95〕之后，由于西洋人及中国人译书的数量，到底未能满足中国人对于新文化的需求，所以中国人留学日本，而且翻译日本书籍。因为日本书籍使用大量汉字，中日"同文"的要素甚多，故此中国人翻译日文较为容易。那些用汉字制成的新语，乍然一看，有的字面上与汉语相同，其实含义与汉语迥异(例如"文学"、"革命")；有的虽用汉语组合而成，但在传统的中国却不见这种名词(例如"哲学"、"美学")。不过对于这种新语，中国人一听解说便可理解；理解之后，记忆便容易；只要改换读音，便可以立刻当作中国语使用了。

二 中日两国词汇的区别

我们检视第一次中日战争后的中日两国文化情况，可以知道

① 对于"中国对于西洋新文化的渴望，比较日本迟出"一语，参看本书第一章，实藤氏所作《中日近代化比较年表》。——译者注

一种实情：当表现西洋新事物的词汇在日本泛滥时，在中国仍然极为稀少；中国仅有少量为西洋人及中国人所制作的译语，而且这些译语往往与日本的译语不一致。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所搜集的，就有下列中日两国不同的词汇：〔按：括弧内为梁氏原文的译注〕

日本寻常师范学校之制，其所教者有十七事。……，三，国语（谓倭文、倭语）……，八，物理、化学（兼声光热力等），九，博物（指全体学、动植物学）。（上，页39）

……华商之不敌洋商也，洋商有学，而华商无学也。彼中富国学之书（日本名经济书）为皆合地球万国之民情物产。（上，页71—72）

工群问题（日本谓之劳动问题或社会问题。）（上，页143）

关利坚……一战而建造独立自治之国家者，华盛顿时代也……三战而掌握世界平准（日本所谓经济，今拟易以此二字）之权者，麦坚尼时代也。（上，页529）

以通商论之，计学（即日本所称经济财政诸学）不讲，罕明商政之理。（上，页584）

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上，页584）

……若此者，日报与丛报（丛报者指旬报月报来复报等，日本所谓杂志者是也）皆所当务，而丛报为尤要。（上，页792）

专门实际之学，亦多起乎其间。……其四曰平准学（日本所谓经济学）（上，页63）

大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此二语群学之通语，严侯官译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日本译为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此今合两者并用之，即欲定以为名词焉）天演学之公例也。（下，页73）

鲁迅在他的小说《琐记》，关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所授的学科，有这样的描叙：

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①

鲁迅提到的“地学”和“金石学”，与现在的名称（即日本的名称）不同；同时，“格致学”也不是日本的称谓。“格致学”似乎依广义及狭义的概念，包含了“自然科学”、“物理学”、“博物学”、“理科”等意义。②

三　进入中国语文的日本词汇

在明治时代当中国人开始翻译日文的时候，日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在原文几乎全用汉字书写。用假名③书写的，只不过是动词的语尾和て、に、を、は等助词罢了。这类被中国人翻译的日文，简直可以说是以汉字为主而杂以假名的文章。因此，中国人倘若了解那些助词的作用，只要颠倒或变换原文词汇的排列，便可以说理解日文的大意了。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是就这种“日本文”而发的：

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

中国人利用这种“方便”，创造了所谓“和文汉读法”。这是一种学习日语的速成方法。在明治初年的日本语文内，汉字委实太多了。中国人所不懂的，只有假名；即使碰到假名，如果懂得て、に、を、は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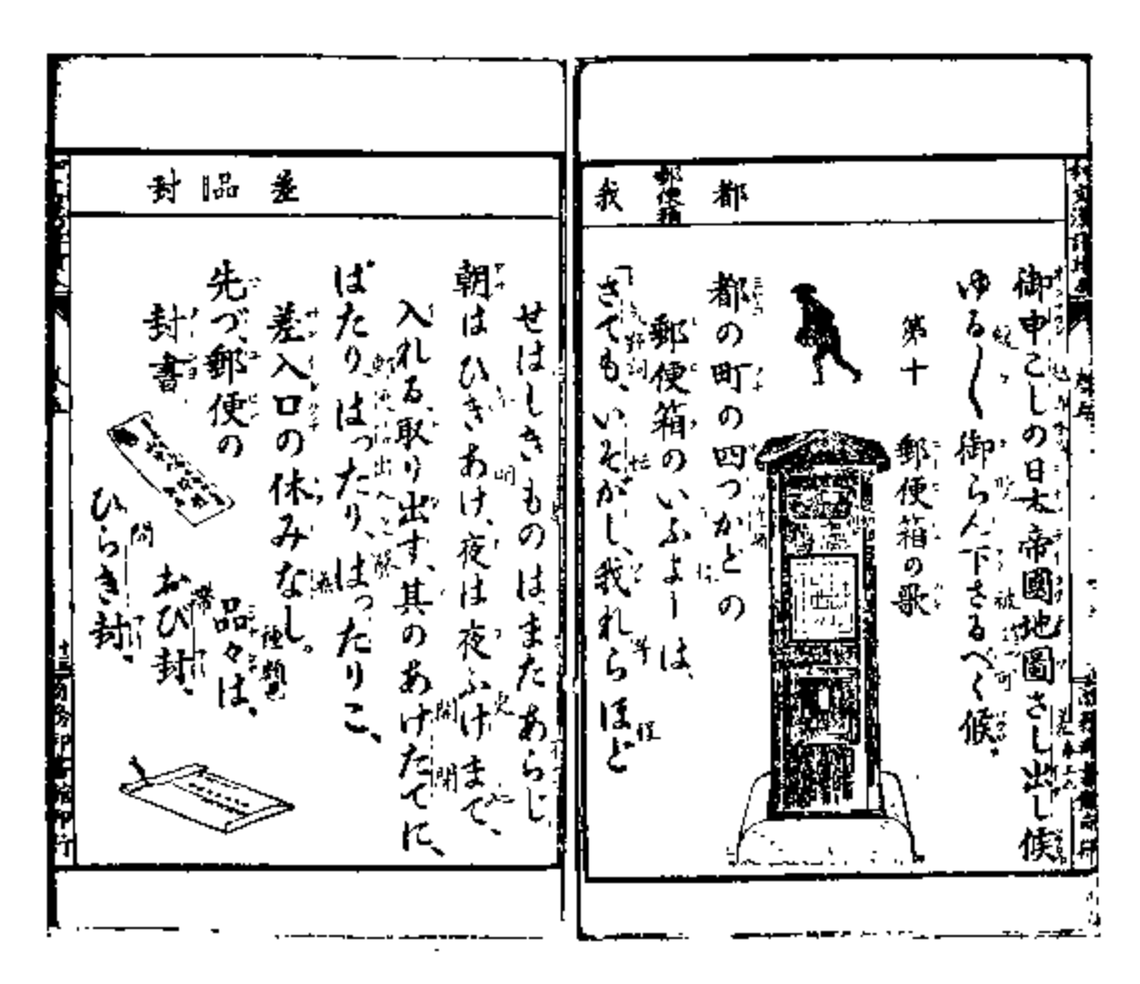
---

①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卷页267。

② 鲁迅在这篇文章内所用的“格致”两字，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注为“博物学”；竹内好日译本（《鲁迅选集》）注为“理科”。

③ “假名”（Kana），是日文字母，一种音标符号。分“平假名”和“片假名”两种体型，从唐代中国文字的草书体或简体得来。——译者注

假名的意义，亦可反覆诵读日文。方法大略如何：首先抓着主语，眼睛马上奔向句子的尾部(即是句号之前)，找出动词，最后转头阅读句子的宾语。例子可在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和文汉译读本》内找到。这书取材自坪内逍遥〔1859－1935〕编的《小学读本》，而译者则在假名旁边注上了七号小楷汉字，以明句义。



〔图 33〕《和文汉译读本》第五卷，第十二页底页(右)和第十三页面页(左)

根据“和文汉读法”，倘使把那些“颠倒”的汉字依中文句法抄正，便可作为日文的汉译了。对中国人来说，这种型式的汉译，名词和动词的使用，虽感生硬和罕见，但文句的结构，已大致近于中文体裁了。在早期的翻译里，这类东西似乎特别多。

不过，早期的翻译对读者来说，有着很多“半懂不懂”、“莫名其妙”的译文。因此，《译书汇编》第七期的“本编告白”，有下面几句话：

本编所译各书，间有沿袭外国名目。难于索解之处，阅者尽可函致本编同人，相与析义问难。同人知力所及，无不竭力以告。阅者鉴之。

这里所称的“外国”，其实仅指日本一国而言。

《教育年鉴》的《教科书之发刊概说》“总论”亦说：

科举废后，正式教科书遂相继出现，有由学堂自编应用者，有由私人编辑者，有由书商发行者，有由日本教科书直译而成者。①

大概这里所谓“直译”的文章，就是指混搀了半懂不懂的语句的东西吧。

《教科书之发刊概说》23号，曾作如下的记载：

同年广智书局发行日文翻译教科书多种，销路甚佳。有《速成师范讲义丛书》，陈文译《支那史》及《中等教育论理学》等数种。惟完全按日人语气及日本材料者。②

这里所谓“完全按日人语气”的翻译，当亦含有半懂不懂的词汇，尤其从“语气”一词的使用来看，用意似乎更要格外显出日本式的表达法。

四　日本词汇的注释

完全“直译”及有“日本语气”的汉译本，中国人读起来，最初还可以把它们作为具有异国情调的东西看待，但久而久之，难免产生隔靴搔痒之感。因此，留日学生最初的翻译团体“译书汇编社”，刊出了“难于索解之处，阅者尽可函致本编同人”的告白。

不但如此，他们在早期的译文内加入很多注释。例如《译书汇

① 《教育年鉴》戊编，页115。

② 同上书，页116。

编》第七期刊登的鸟谷部铣太郎原著《政治学提纲》(共44页)就有如下的译注：[按：括弧内为原来的译注]

为保全己国计，与敌国开战，除好意为仲裁外(仲裁者，中间人之意，局外国居间调和，谓之仲裁国)，决不许他国容喙，是为积极国防权(积极者，犹言阳极，如电气之正极，代数之正号也)……初不受他国制限也。是为消极国防权(消极者，犹言阴极，如电气之负极，代数之负号也)。(页21)

且命令中之最重大者，为紧急命令。而行政权得由紧急命令，不待立法之手续(手续者，经历一定之方法之谓，如立法必先发案，次议决，次公布之类)。(页24)

公使者，为国家元首之代表，故各国皆有特别之礼遇，在治外法权之下(治外法权者，盖谓不受他国法律之制限，如有罪必使其本国自治，他国不得而治之是也)，而不受他国法律之支配(支配者，即处治之意)。(页29)

君主有法人之性质(人有自然人与法人之别；自然人者，天生之人；法人者，法律所承认为有人之资格者也，如团体等类皆有法人之性质者也)。(页35)

英国宪法，为不成文宪法(不成文者，即习惯之谓，凡法律由习惯而成，不经制定之手续者，谓之不成文法，反是者谓之成文法)。(页37)

在《译书汇编》其他号上的译文中，亦有与上举各例大体相同的，对那些"半懂不懂"词汇的译注。

在这段期间内，日本词汇除了通过译文而融汇于中国语文一途之外，也有很多词汇由于中国人读了日本书，受到感染，而在自己的文章内广泛地使用，或者从其他日本书的中文翻译获知这种新词汇。大概梁启超是最好的例子了。

梁氏通过日本书籍吸收新思想，并将自己消化了的西洋思想向中国人介绍；同时，他又被日本人的论文(例如德富苏峰等的作品)所感染，因而一面向中国人介绍这些论文，一面借此抒发自己

的识见，还不时批评日本报纸的文字。梁氏在这类文章中，遇有中国人前所未见的词汇，亦即日本词汇，便加上自己的注解，例如：[按：以下引自《饮冰室文集类编》。括弧内为原译注。]

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即人群)伦理。(上，页113)

以一国之财，办一国之事，未有不能济者也，而又于先事有预算焉。于济事有决算焉(预算者，先大略拟此事费用，逐条列出而筹之也；决算者，征信录之意也)。(上，页318)

欧洲之人，只有此数，其势固不足以分配(即遍布充塞之意)于大地，而其人开明之度既日进，分利之人愈多，而生产之人(即任劳力者)愈少。(上，页349)

今者西人制造物品之原料(即天产之物)。(上，页352)

君主无责任，故其责皆在大臣。凡君主之制一法，布一令，非有大臣之副署(副于君主以署名也……)。(上，页403)

优强民族能以同化力(能化人使之同于我谓之同化力)吞纳劣弱民族。(上，页518)

于是经济上(日本人谓凡关系于财富者为经济)之势力范围，遂浸变为政治上之势力范围。(上，页523)

于是创论理学(即侯官严氏译为名学者)以范之。……亚氏又明哲学与科学(中国所谓格致学之类)之别。(下，页91)

孟氏谓法治国(以法律施治谓之法治)，人人得以为其所当为，而不能强其所不可为。(下，页163)

希腊之地形，半岛也(三面环海一面连陆者谓之半岛)。(下，页533)

故使路得非生于十六世纪(西人以耶稣纪年一百年为一世纪)，而生于第十世纪，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下，页659)

做这类注释的人，不仅梁启超一个。我想：这类译注在日本词汇融汇到中国语文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五　日本词汇的借用

中国因为流行着广含日本词汇的翻译及搀入日本词汇的新作，所以中国的文章体裁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梁启超翻译了日本文学作品《佳人之奇遇》及《经国美谈》①；实际上他一方面是翻译者，另一方面又是充分利用日本知识的评论家。他的文章不但采用日本词汇，而且加进了日本式的文气；因而热力万钧，新颖可喜，人们都称之为"启超体"或"新文体"。让我们举一两个例子看看吧。

> 某顿首，上书于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留学生诸君阁下。某闻人各有天职，天职不尽，则人格消亡。今日所急欲提问于诸君者，则诸君天职何在之一问题是也。②

> 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中国昔虽有一人之报，而无一党报，一国报，世界报。日本今有一人报，一党报，一国报，而无世界报。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也。敢问《清议报》于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党报与国报之间。今以何视之？曰：祝其全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

---

① 《佳人奇遇》，柴四朗（东海散士）原著，是长篇政治小说，明治18年（1885）起分卷出版。《经国美谈》，矢野文雄（龙溪）原著，明治16年（1883）起分卷出版，也是长篇政治小说。两本小说都曾风靡日本读者。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认为《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是梁启超所译。但是最近许常安先生却提出相反理论。许氏在1969年及70年日本中国学会的报告《清议报登载の梁启超译佳人奇遇について》，曾怀疑梁译的确实性。许氏1970年12月16日给译者的信中更指出"《经国美谈》，恐毫无梁译之证据"。——译者注

② 《敬告留学生诸君》，《饮冰室文集类编》上，页713。重点为本书作者所加。

入于一国报之范围，且更努力渐进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乃为祝曰：报兮报兮，君之生涯，亘两周兮，君之声尘，遍五洲兮，君之责任，重且道，君其自爱，罔俾丧兮，祝君永年，与国民同体兮。重祝曰：《清议报》万岁，中国各报馆万岁，中国万岁。①

这种文体，似乎可以叫做"日本化文体"。梁氏的文体，对当时的青年有很大的影响，余波所及，一直到民国以后。

使用日本词汇，受到日本文体的影响，其实也不仅梁启超一人。即使说：所有留日学生都如此，我想亦不为太过。

诸宗元的《译书经眼录序例》(1927)说：

……光绪甲午我国与日本构衅，明年和议成，留学者咸趋其国，且其国文字逐译较他国文字为便，于是日本文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几使一时之学术，浸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遂因此稍稍变矣。②

1911年刊行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的"凡例"说：

吾国新名词大半由日本过渡输入，然所用汉字有与吾国习用者相同而义实悬殊者，又有吾浑而彼画易涉疑似者，皆随条分析。

若虚在《评中国著译界》(《中国新书月报》一卷 2 号，1931年 1 月)一文说：[按：重点为本书作者所加]

东文——就是日文——因为和中文是同文的，所以名词等等倒可以将就引用，因此翻译日文好似比翻译西文容易些。而中国人素来是轻视日本的，所以学术上也轻视日本；于是一班投机的译者都从日文书中找到外国书的译本，糊里糊涂地译了过来，在广告和封面上却大吹大擂说是由西文原书直译；其实，日译未必都是坏，西译未必都是好。只要译得不错，何妨就用日译呢？还有一种文丐勉强学了一二年日文，就动起笔来翻译一切日文的书籍——上自文哲，下至科学——弄得读者莫明其

① 《〈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界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文集类编》上，页798—799。重点为本书作者所加。

②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页95。

妙，那真是糟透了。最是恶作谑的是东洋小鬼，他们做书往往不用原文真名；因此，引得译界里产生了无数笑话，记得从前某君把"伊甸之园"译作"雅典之园"，在文坛上引起了长篇辩驳的文字。……最妙的是处处偷取日人的贡献，还在跟人拚命鄙薄日人的作品。翻开新书一看，十有八九是东洋的来路货；这岂不是新文化上一重大的污点。（页4—5）

这里所谓"翻开新书一看，十有八九是东洋的来路货"，是就内容方面说的；为了引入这些内容，日本词汇亦会同时进入中国语文，这是毫无疑问的。

丽海在《广学会三十六周年纪念册》(1923)的《基督教文字播道事业之重要》一文，宣述文字传道的重要性，曾说：

中国文字界，似尚未有与基督教有把臂入林之雅，故作一文字，引用佛教经典，非但不为先累，而且更觉词藻之佳妙；至涉及基督教经典之字样，便有异常刺目之嫌，此非为佛教古而基督新有所不惯也。如年来由日本贩入之新名词，人人乐用，何尝不反以新为善乎。①

本文主题是基督教的传道问题，不是中日文化问题。因此，我想：在这种场合的发言，应该是十分公平的吧。

六　对日本词汇的责难(一)

清季以来，中国的新名词，便"大半从日本输入"，"人人乐用"，但是某些为中国所习用的日本词汇，曾遭不客气的反对。

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1902)，有这么一句话："纽约、芝加哥诸市，遂为全地球金融之中心点"。他对"金融"一词，作了如下的注解：

谓金银行情也；日本人译此两字，今未有以易之。②

①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页333。

② 《饮冰室文集类编》上，页529。

他对日本词汇“金融”发生了疑问。然而，他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1898)，有“故其争也……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之事。”一语；对于“经济”一词，他解说：“用日本名，今译之为资生。”① 可见他由疑问而进于抗议了②。

他在《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1902)一文，曾说：“于是乎，乐利主义 utilitarianism 遂为近世欧美开一新天地。”梁氏有如下的注释：

> 此派之学说，日本或译为功利派或译为利用派。西文原意则利益主义也。吾今隳括本派之梗概定为今名。③

梁氏不但抗议日本词汇，毅然反对日本词汇，并且试图以其他词汇取代日本词汇。他曾就“革命”一词(从日本借来的)，特别作了《释革》(1902)一文，以推敲这个词汇的意思，结果提议用“变革”两字去取代“革命”一词。让我们摘录其要点看看吧。

> “革”也者，含有英语 reform 与 revolution 之二义。reform 者，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如英国国会1832年之 revolution 是也。日本人译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 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如法国1789年之 revolution 是也。日本人译之曰革命。革命二字，非确译也。“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在《书》曰，革殷受命。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当 revo.(省文，下仿此)之意也。人群中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不有其 ref.亦无不有其 revo.，不独政治上为然也。即以政治论，

---

① 《饮冰室文集类编》上，页551。

② 实藤先生着重梁氏对日本译语态度本身的变化，因而忽略所引例文的年代次序。梁氏《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发表，而《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一文，却刊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后者比前者早出三年。因此，倘纯从年代观点来看，就不能说梁氏“进于”抗议日本词汇。——译者注

③ 《饮冰室文集类编》下，页170。

则有不必易姓而不得谓之 revo.者，……ref.主渐，revo.主顿；ref.主部分，revo.主全体；ref.为累进之比例，revo.为反对之比例，其事物本善，而体未完法未备；或行之久而失其本真，或经验少而未甚发达，若此者，利用 ref.其事物本不善，有害于群，有窒于化，非芟夷蕴崇之，则不足以绝其患，非改弦更张之，则不足以致其理；若是者，利用 revo.。此二者皆大《易》所谓革之时义也。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后者吾欲字之曰变革。①

跟着，梁启超说“革命”只不过是王朝的更换，不啻亿万人中的一人，瀛海中之一滴，毫不重要。西洋 revolution 的意义，作为“国民变革”解释，比起“王朝革命”，更重要得多了。故此，他主张不再说“革命”，必须改说“变革”。② 梁氏的说法，其实与他自己的政治立场有关，不能视作纯粹的语言问题。

当梁启超写那篇反对“革命”一词的论文时，中国正在氾滥着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学革命、诗歌革命、戏剧革命、小说革命、音乐革命、文字革命等等“革命”的名词，而梁氏在那篇文章亦对这些“革命”一一指摘。然而，梁氏尽管奔走呼号，务必改“革命”为“变革”，却终归无效。

梁氏虽然写了《释革》(1902)一文；然而他自己在1904年作《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1905年又写《俄罗斯革命之影响》等文章了。③

七　日本词汇的辞典(一)

从中国人来日本留学开始直到清朝覆亡的期间内(按，1896—

① 《饮冰室文集类编》上，页328—329。

② 同上书，页329—333。

③ 又，在《饮冰室文集类编》(1904)上，页629，有《革命！俄罗斯革命！》短文一篇，但其写作年期不明。

1911，共15年左右），因为中国人翻译了很多日本书籍，大量日本词汇得以流入中国，以致中国人对那些词汇有应接不暇的感慨。

日本词汇不但深入中国的教育及法律方面，而且亦深入到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任何方面。以一人之力，是不能完全读通各方面的书籍的。更加上阅读翻译书籍（后来，甚至一般非翻译书籍）时，难明白的非专门的词汇亦会源源不绝地涌现。因此，中国人需要一些解释来自日本的新语的辞典了。

最初应付这种需求的，是汪荣宝和叶澜编的《新尔雅》（1903年，上海，明权社版，东京并木活版所印刷）。这本书分十四部分：释政、释法、释计（经济）、释教育、释群（社会）、释名（论理学）、释几何、释天、释地、释格致（物理学）、释化（化学）、释生理、释动物、释植物。各部分又有详细的分目。例如"释政"，其详细分目如下：

第一篇　释国家

　　　　释国家之定义

　　　　释国家

　　　　释国家之起源

　　　　释国家之种类

第二篇　释政体

第三篇　释机关

现在举"释计"（经济）中的"释生财"（生产），作为这种体裁的例子。字体下面的圆点（·）都是原文所有；它们有标示新语即标示日本词汇的作用。

> 生财必不可欠之要素有三：曰自然（有时仅言土地），曰劳力，曰资本。自然可分为二：禽兽草木有形物，生长由于天然，而可采供人用者，谓之自然物。发于天然之势力，可为人所利用者，谓之自然力。厥类凡二：风力水力等，不待人力而自然成立者，谓之原始之自然力；电气力蒸气力等，由人力而发生者，谓之诱导之自然力。有一定之面积及自然力

者，谓之土地。生财时所用之心力或体力，谓之劳力。因劳力之性质而其分类甚多：为人所未为之事，或造出世所未有之物，谓之发明；物虽已成，人皆未知，我独显之，谓之发见；渔樵采矿等，取自然之物而用之，谓之采取；农业林业等，产出粗品，谓之粗制；以粗品造精品，谓之精制；运搬种种物品，或卖买之，谓之运送业，谓之商业；医生律师官吏教习等，所用精神之劳，谓之勤劳。劳力又可大别之为生产不生产二种：农工商等，直接间接有裨于生财者，谓之生产劳力；盗贼乞丐等，无裨于生财者，谓之不生产劳力。以过去劳力之结果，助未来之生产者，谓之资本。专卖权、版权、商标之属，与人以无形之利者，谓之无形之资本；机械器具之属，直接与人以利者，谓之有形之资本。用以产物，其损减以渐，非经一次使用而即为消费者，谓之固定资本；用以产物，经一次使用便已消费者，谓之流动资本。（页39—40）

中国初期留日学生的翻译，以法律及教育有关的书籍为主。因此，在1905年，京师译学馆出版了《汉译新法律词典》。原作者是日本“新法典讲习会”。后来由徐用锡翻译，张缉光主编，在东京秀英舍第一工场印刷，封面黑色、精装。全书有 767 页。

这个译本依照原著体例，按“伊吕波”的次序① 排列。最后附以长达76页的部首笔划索引。主编张缉光在序文里说明了这种编排的理由：（按：原文无标点、标点为译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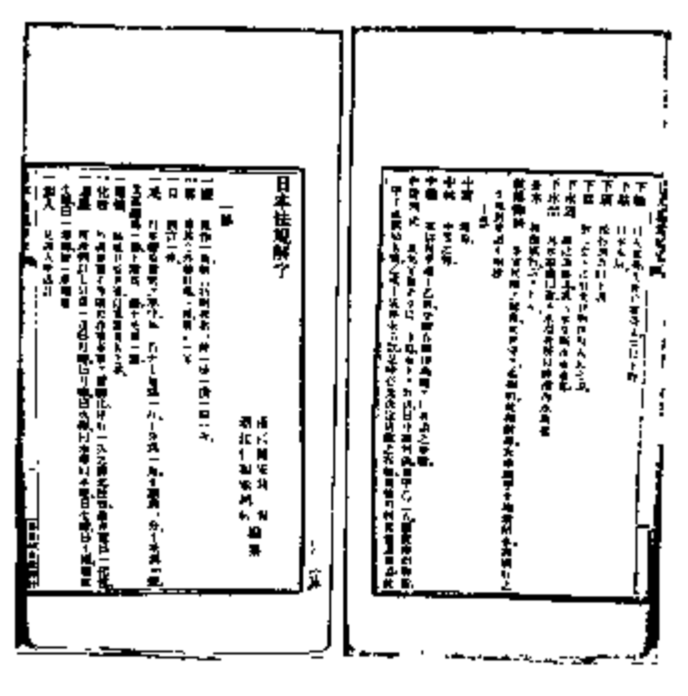
书中所陈，若相手方、若相续、若户主、若隐居、若株主、若言渡、若拂

① “伊吕波”的次序，是“伊吕波歌”的文字次序。传说这首歌是日本高僧空海（弘法大师）用 47 个不同的假名，翻译佛教涅盘经第13“圣行品”之偈的歌谣。原文如何：

いろはにほへど　ちりぬるを
わがよたれぞ　　つねならむ
うゐのおくやま　けふこえて
あさきゆめみじ　ゑひもせ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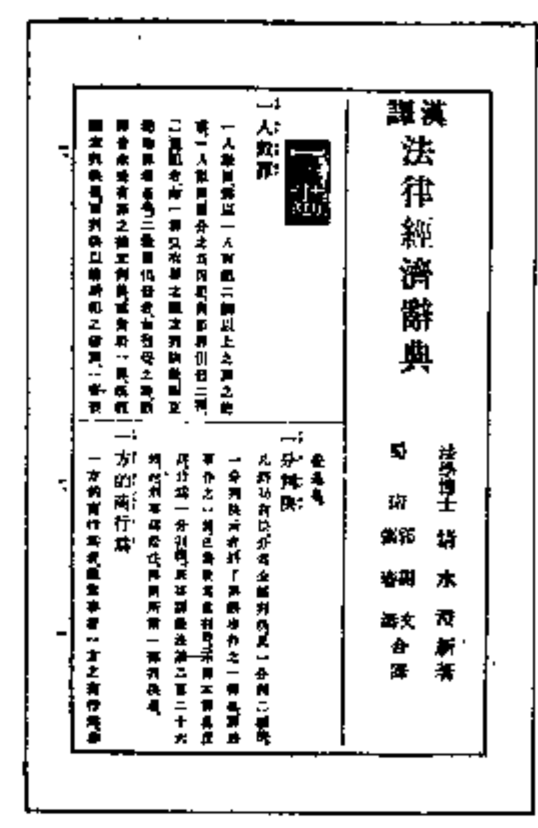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从九世纪末期到现在，这首“伊吕波歌”在日本家传户晓，所以日本人有时用歌内的文字次序来算数，一如中国有人拿“千字文”的“天地玄黄”等字次序来算数。——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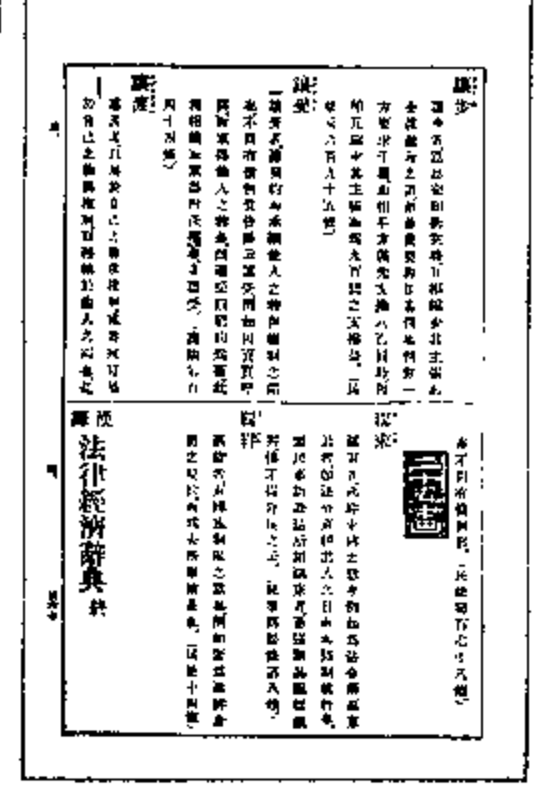
込、若后见人、若手续、若法团财团诸名字，触目皆是。小注所云参照某条者，皆彼中法律正文。



〔图34〕《日本法规解字》第一页面页（左）及第三页底页（右）

1907年，《日本法规解字》出版了。当商务印书馆编印《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共80册，这是日本《六法全书》的全译本）的时候，敦请钱恂和董鸿祥两人详细注释其中难懂的名词，于是他们编撰了按部首次序排列的《日本法规大全解字》（线装，共202页），作为"附录"。当它作为单行出版时，便取名为《日本法规解字》。编者们





〔图35〕《汉译法律经济辞典》的首页（左）及末页（右）

在“编后话”中说：

> 嗣因近来东译盛行，政法等书，多沿日本名词，初学颇以为苦。又将是书刊为单行本，以备读东译者之参考，或不无少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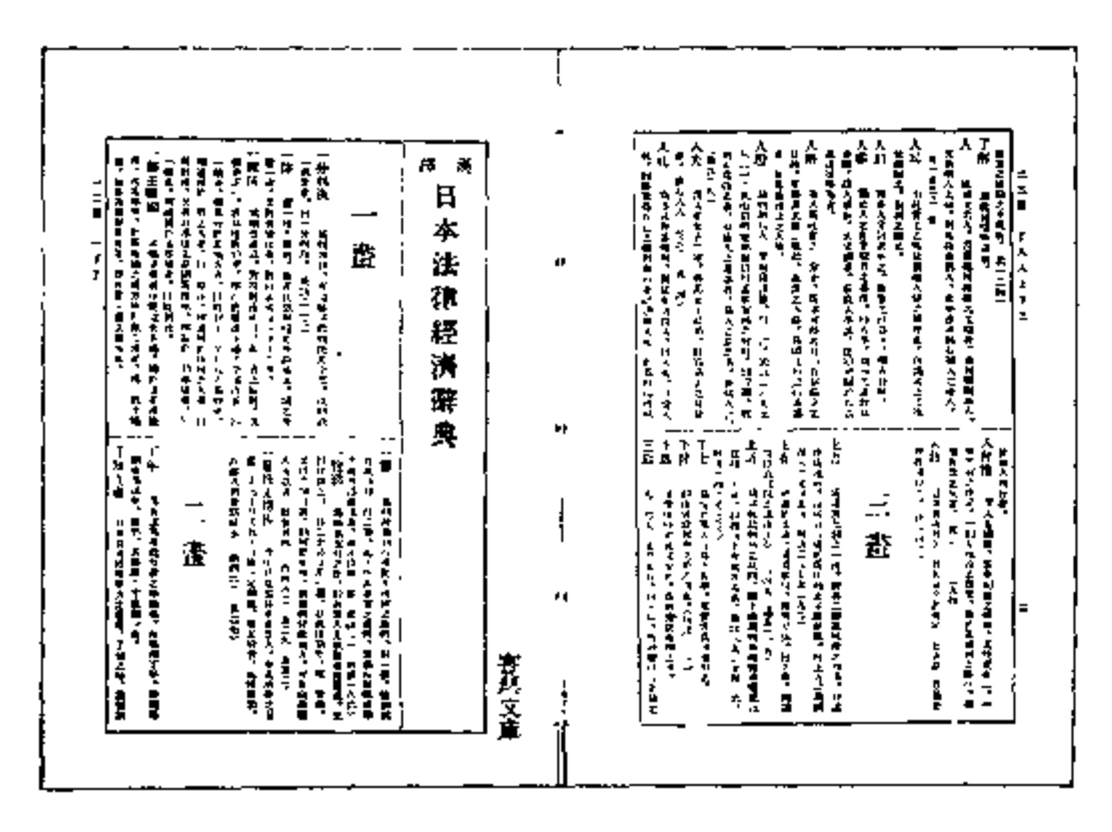
同年，又有一本《汉译法律经济辞典》在日本出版。这本辞典原是日本清水澄特别为中国人编写的，后来由留学东京帝国大学的张春涛和郭开文翻译；并由精通日文的陈介将译文全部校阅，在东京神田区的奎文馆发行。陈介的序文说：

> 吾国人士研究政法者，多取道于日本，累年以来，以数千计。学有心得，复编译新籍，以惠国人，冀以发达其政治思想，普及其经济观念，法至善也。所惜者，名词艰涩，含旨精深，译者既未敢擅易，读者遂难免误解，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辞典之作，其何能已。日本法学博士清水澄先生，因感于是，特有此著。奎文馆主橘君，复请吾国人之留学于东京帝国大学者，集而译之。书将成矣，托为校阅，并嘱为序。余固有志于斯学者，喜其嘉惠吾徒，有益于我国民前途者良多，匪为供参考而已。即将来编纂法典审取名词，亦可奉为圭臬，诚近来之善本也。

这个译本共有 567 页，16开本，每页分上下两栏排印，精装，书背装璜华丽。编者们说，辞典内每项都附以日本假名，就是为了方便留学日本的学生及曾经留日的公务员自修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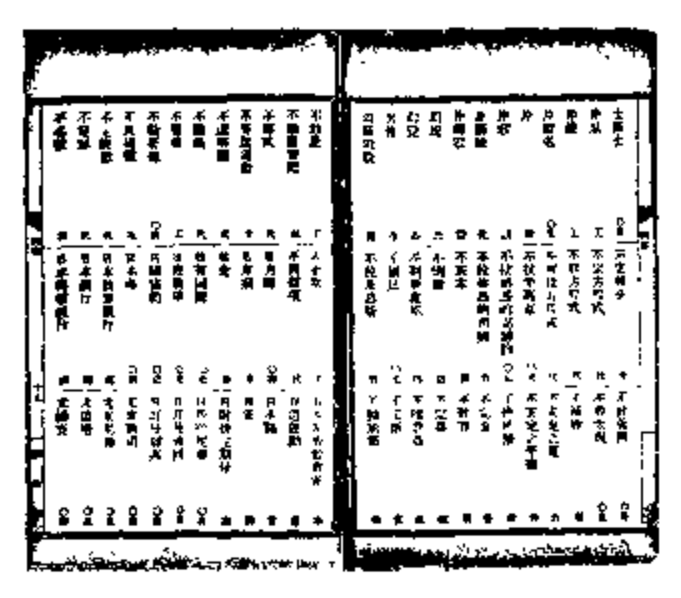
1909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本书为田边庆弥原著，王我臧译。精装，每页上下两栏排印，十六开本，共 148 页。

1911 年，中国词典公司刊行了黄摩西编辑的《普通百科大词典》十五册，收录项目达 11—883 条。这部词典虽亦刊载中国固有的学术用语和历史地理名词，然而仅录最主要用语，挑选至为严格；可是对于外国辞语，则悉力以赴，大量收录。编者加入一些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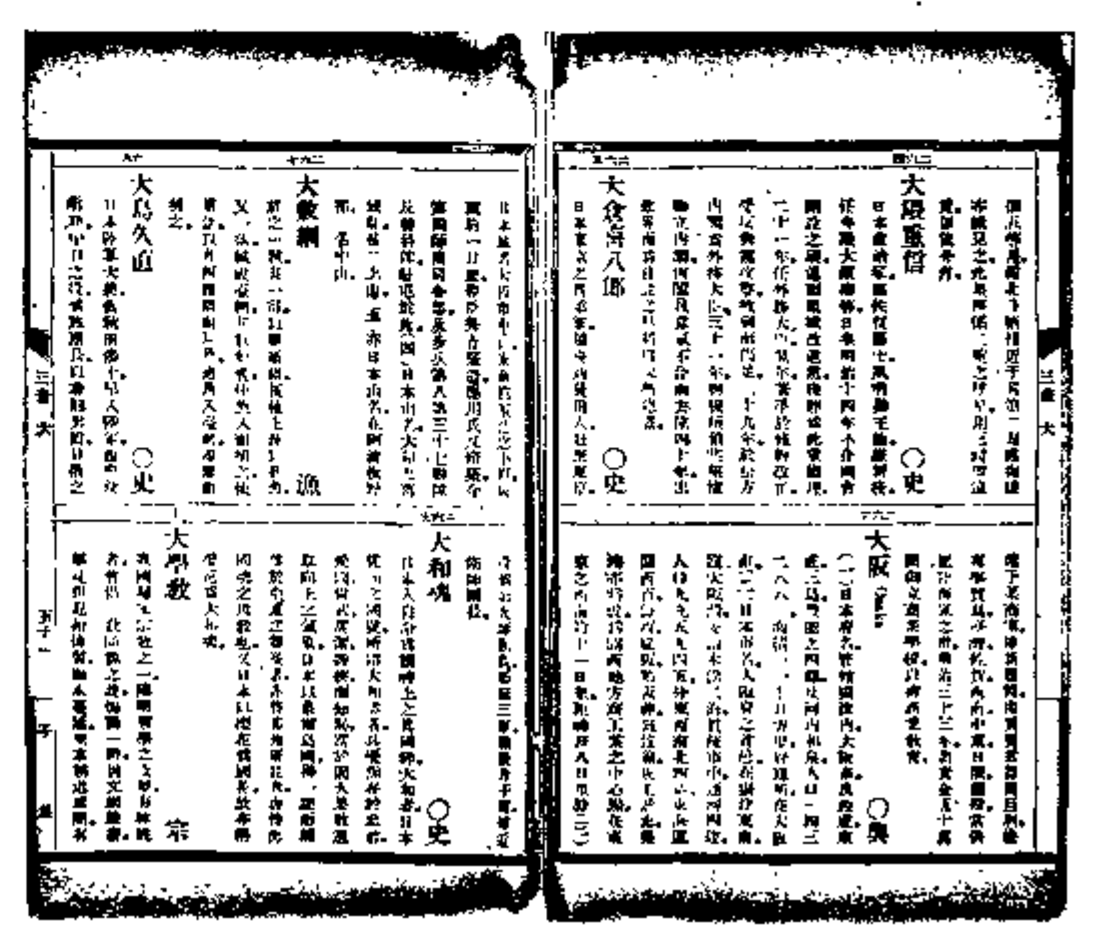
〔图36〕《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第一页(左)及第二页(右)

国固有的学术用语，点缀一下，大概是为了避免"河头卖水"之嫌，兼辞"只爱野鹜而弃家鸡"之责难吧。除了收录大量外国新知识用语(主要是取自日本的译语)之外，这部辞典也刊载日本及西洋的地名和人名。编辑体例，悉依字汇笔画多寡排列，每一词汇编以号码，西洋词汇(普通名词及专有名词)附以原文，必要时加附插图。每一词汇所属学科性质，亦一一注明。学科大略分为政治、教育及格致三大部门，各大部门又有详细的类别：政治十三类、教育二十类、格致三十三类；各种类别均揭一字表示。(按：例如近代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一



〔图37〕《普通百科大词典》总目录十八页面页(右)及十九页底页(左)

项，附以“史”字；日本城市“大阪”，附以“舆”字；物理学上的“不安定之平衡”，附以力学的“力”字。）



〔图38〕《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子集，50页底页及51页面页

八　对日本词汇的责难（二）

1915年，出现了一本专门非难日本词汇、题曰《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著者（彭文祖）以“将来小律师”之号署名。由于这本书是在东京饭田町的秀光社印刷的，可知著者当时是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人。张步先的序文说：

> 顾吾国人之谈新学也有年矣。非惟不受新学之赐，并吾国固有之文章语言亦几随之而晦。试观现代出版各书，无论其为译述也，著作也，其中佶屈聱牙解人难索之时髦语比比皆是。呜呼，是何故耶！是不治外国文之过也，或治之而未深求也。盲谈瞎吹，以讹传讹。曩者大隈氏重信讥

我曰：日本维新以前，汉文行乎日本；自维新而后，日文行乎中土。予闻此语，深慨国人之愈趋愈下而不知自振作也。

首先，著者就所谓"新名词"一语，表示了下面的意见。那些所谓"新人物"，竞相向慕新名词；而新名词是在甲午大败之后，由留学生和新人物（梁启超等）所开始使用的。尽管旧人物对这类新名词大皱眉头，可是新人物却乐而不倦。

辛亥革命之后，新名词泛滥全国，连小学生也说起新名词来，惟恐后人。那些出版商一听到有新名词的书籍，便争相发刊，以取悦读者，同时可图大利（他们居然还厚颜地说甚么"著作所有权，不准翻印"）。人们简直象从祖先方面承受遗产一样，口中喋喋不休地套用新名词（如"手续"、"取缔"之类），即使在通信中，十句便有六句是用新名词书写的（如"目的"、"宗旨"、"绝对"等）。啊，这是多么"恬不知耻"呀！这是一件关乎"亡国灭族"的事，怎能沉默！

依上述旨趣，作者所攻击的"新名词"，有下列五十九个：

支那　取缔　取扱　取消　引渡　样　殿　哀啼每吞书(ultimatum)　引扬　手续的　积极的　消极的　具体的　抽象的　目的　宗旨　权利　权力　义务　相手方　当事者　所为　意思表示　强制执行　差押　第三者　场合　又ハ　若クハ　打消　动员令　无某某之必要　手形　切手　律大律师　代价　让渡　亲属　继承　片务　双务　债权人　债务人　原素　要素　偶素　常素　取立　损害赔偿　奸非罪　各各　益益　法人　重婚罪　经济　条件付之契约　从而如何如何　支拂　独逸　瑞西　卫生　相场　文凭　盲从　同化

对于一些中国人过渡的"同化性"，毫无批判地使用日本词汇，甚至得意忘形地使用一些连日本人也避而不用的、具有"日本语臭"的词汇，彭氏感到万分气愤。

トリ シマリ 上栏小字系日文

取 缔 特录以供参考

予一见此二字，犹铁匠由炉房出而遇烈日，不由得心中火起，深恨大多数国人瞎眼盲从，随风随雨，人云亦云，恬不知耻也。留学生谁不曰取缔规则，取缔规则，报纸亦无日不大书取缔取缔，政界中与学堂中无时不曰非取缔不可，非取缔不可。寻其义与夫来历，则茫然不知。咄！是何盲从之深也。殊此二字之魔力甚大，不独弥漫全国，响映大多数人之心理。大总统之命令文中，且备其位。民国二年六月某命令中，有"自应严加取缔"之句，永为将来史书中之一革命文章，其魔力诚可惊矣。虽然褒姒之得宠，由于虢人；取缔二字之见用，由于吾国现号称为大文豪之梁启超也。梁之文章中，新名词故多不可数，以《新民丛报》为嚆矢，是其建功于国之第一阶也，国人不可不佩服而宗仰者也。今言取缔二字之来源。先说取字，取字在日文中毫无意义，所谓接头语是也。如《左传》"繄我独无"之"繄"字，祭文首句"维万国元年"之维字，同无意思者也。此非据余一面之言，乃据参考者也。日本东亚语学研究会出版之小红本《汉译日本辞典》441页上格取字注下，明言此字加于他字之上，未有意义。凡留学日本者，其初未有不购一册者也，岂视而不见乎！日文中所谓接头语接尾语者，不可胜数，大半皆无意思者也。在吾国言接尾语，亦为数甚多。如呦罗吗等音，皆书不出字，仅表其状态耳。取字已明，兹再言缔字。据《康熙字典》，则缔者，缔结也，结而不解也，闭也。日文取缔二字，即取后二者之意思，而结而不解之意，即不放之意；不放之意，即与闭之义无何差别。再广解闭字之意思，即封锁也；封锁之意思，即禁止不许动也；禁止不许动之意思，即拘束也，管束也。所谓取缔规则，则管束学生之规则，自应严加取缔，即自应严加管束禁止。警察对于吊膀子之恶风，所谓非取缔不可，即非禁止不可。吾国人是何心理，偏嗜不伦不类牛蹄马腿之取缔二字，而唾弃光明磊落之禁止管束等字哉！咄，余欲骂之曰瞎眼盲从。殊大总统犹欢迎之，亦难言矣。谥之曰亡种同化性。阅者以为当否。

著者大声疾呼，认为使用正如"取缔"一词那样毫无道理的外来语，实际上不如用"禁止"、"管束"等中国语，这样的例子委实太多了。

(然而，今日"禁止"及"取缔"两词，同时都通用。)他又说：

ドウインレイ
动员令

此三字无可说。然其为一盲人瞎马之新名词，恰合本书之本旨。所谓动员者，动教员乎，动委员乎，动公务员乎，动国务员乎，意思毫不明了，所指亦无一定。然我国人及报馆漫然不察，人云亦云，惟上帝是从，佑我小民无疆之福。人作禽兽浴，吾效之；人不穿衣裤，吾亦效之；言之令人切齿，深以不能一刃其颈为憾。日人所谓之动员令，即吾所谓之动兵令，虽军舰亦曰兵，无论水陆皆包含者也。何必效曹瞒作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假面哉。

"动员"一词，今日的中国人仍然使用。著者非难的理由，因为这个词不但在军事上使用，而且也在政治上用来表示煽动人民之意。

著者所排斥的词汇中，有"文凭"一词。文凭就是日本所称的证书。细读原作者的文字，便可知道他并不非难"文凭"这个词汇的本身，而批判仅以证书为目的的留学。著者对于那些用钱买证书或伪造证书的卑鄙行为，非常愤慨。故此，著者所怒视的，不仅是语言问题，进而为留学问题和社会问题；他所触及的问题，尚有很多很多。总而言之，彭氏"痛恨"毫无批判地使用日本词汇的人。对于那一小撮毫无批判头脑的家伙不惜愤恨到"令人切齿，深以不能一刃其颈为憾"。

这本书所攻击的词汇，主要是清末所输入的；其实有的词汇，连日本人也有过分生吞活剥之嫌。例如，日语的"各各"一词，有些中国人也"译"做"各各"；其实，中文单写一个"各"字便够了。日文句子如"强盗人ヲ伤シタルトキハ，无期，又ハ七年以上，惩役ニ处ス"，有人译作："强盗伤人者，处无期徒刑又处七年以上之徒刑"；其实，"又ハ"必须译作"或"才行。又例如，日文"损害赔偿"，有些中译亦依样画胡芦；其实，应该译为"赔偿损害"才对。上举各例，都可以确证中国初期的翻译，实在是带有"日本语臭"的。

"各各"、"又"等字的错误用法，不会再在现代中国语文出现了；但是，相当于"损害赔偿"的用法，并未完全绝迹。"文字改革"、"文学研究会"等词语的构词法，就是例子。

在彭文祖所攻击的日本词汇中，倘若作为中国语使用，确有很多是不合理的；日后证明它们也的确不能在中国语文内生存。其中原因颇为复杂，彭文祖的大声疾呼，或许多少有些效果；然而，我想最大原因还是由于这些词汇本身没有发展性，再者是因为后来中国人制作了更好的词汇。

尽管彭文祖咬牙切齿地痛恨这些词汇，甚至要砍掉使用这些词语的人的头，但是时至今日，仍有很多日本词汇融汇到中国语文里去。例如："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的"、"权利"、"义务"、"债务"、"债权"、"原素"、"法人"、"经济"、"卫生"等等，在现代汉词中都是常用的词汇。甚至那些真正的"大和言叶"，例如"取缔"、"取消"、"引渡"、"手续"、"场合"等，亦已在中国语文内生了根，似乎不能驱逐它们出境了。

九　日本词汇的辞典(二)

五四运动(1919)以后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盛行，中国人翻译了很多有关文学及社会科学的日文书籍。这时，中国人对日本语的研究，也变得精细了；乃至有《日语助动词助词使用法》(许达年编，1934年)等书的出版。翻译者有鲁迅、郭沫若等名作家；翻译亦变得正确而且雅达了。

清末之际，译本以法科的占最多，但是五四以后，则以社会问题的占大多数。因此，当时从日本输入的词汇，亦以社会问题方面的占大多数。

由于大量日本词汇的输入，中国人渐渐感到辞典的必要，于是



〔图39〕《新文化辞书》汉字索引，页7

有各式各样的辞典问世。清末的辞典都是直行的，五四以后的却相反。下面介绍的辞典，全部都是横行的。这大概是时代的风气吧。

《新文化辞书》，唐敬杲编，商务印书馆1923年发行。全书1107页，共载7901项，索引157页（汉字索引69页，罗马字索引88页）。

这部辞典，属于“大项目主义”（体裁宏伟）。编辑方针以原文为主，而在原文底下附以译语。项目依ABCD的次序排列。为甚么要依ABCD的次序排列呢？编者的序文说：

> 敬杲敢再以本书编制上底特色，略为报告读者诸君：因为本书底材料大概是外国的，许多术语我国尚未有一定的译名，为检查底便宜上，依西文字母底顺序排列，而另附以汉文索引。

编者虽说“许多术语我国尚未有一定的译名”，但结果仍以汉字将原语译出。这些译语，虽然编者没有明显表示“采用了日本的译语”，然而事实上大都借用日本的译语。只要翻看任何一页汉文索引，都可以看出这一事实。

这部辞典不但刊载外国学者及文学家的传略，连佛教事项也选录，故此所收7901项，并非全是新文化词汇；不过有半数以上确是新文化词汇，而且在任何一页，都可以见到与日本词汇相同的词汇。

〔图40〕《新术语辞典》索引，页 16 和页17

《新术语辞典》吴念慈、柯柏年、王慎名合编，南强书局 1929 年发行。全书 516 页，收录 1359 项目，笔画索引 28 页。

根据“编集凡例”，这本辞典依下列方法编辑，而且具有下列的特色：

一　我国自五四运动以后，不断地介绍欧美的学术进步，因此，读者阅读书报时，就常常碰到许多的“新术语”。读者每以不能完全了解其意义且不知何从查考为苦。本书之目的就在于解决这种困难。

二　本书以一般读者之需要为标准，选择在一般的读物所最常见的属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社会心理、社会问题、社会思想、社会运动、哲学、文学、欧洲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等的术语以及我国自己所有的流行的新术语，一一加以扼要的解释。

三　本书一面力求篇幅简省，使定价低廉，为一般的读者之购买力之所能及；一面力求内容充实，文字简明，使能适合一般的读者之需要。

四　我国翻译外国术语，极不一致。本书采用其最流行的或最正确的，并附注原辞，以便读者对照。

五　各术语中有须阅他术语方能完全了解其意义的，则于其后注明参看某术语；有异名同义的或附载于他术语底说明中的，则于其后注明详见某术语。

六　本书之排列，以中文部首为纲，以笔画为目。末附索引，以便检阅。

七　本书编辑时参考中外书报极多，不克一一列名道谢，谨在此对各著作者及发行者表示歉意。

这本辞典虽然选录了“最流行”（第四点）的术语，但是对一般中国人来说，仍是“不能完全了其意义”（第一点）的，这是因为它们本质上大都是源自日本的新鲜的译语的缘故。第七点所称的“中外书报”，我想大部分是指日本的图书杂志。

第二点所说的在“我国……流行的新术语”，是指例如“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工部局”等语。不过，这种新术语为数不多。第二点虽说收录文学术语，可是数量极少。这本辞典的重点，是放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问题等学术用语上面。

关于日本的项目特别多，是为这本辞典的特色。例如“日本劳动总同盟”、“全日本农民组合”、“东洋自由党”等是。

“取缔”、“手续”、“场合”等纯粹的日本词汇，都是明治时代的法律辞典所必录的，到了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中国词汇了，所以在这本辞典内便见不到它们的形迹了。

这本辞典所录的词汇，究竟和日本词汇如何相似，只要我们看看它的索引，便可体会出来。

《现代语辞典》　李鼎声编，上海光明书局 1933 年发行。总目录 71 页，本文 722 页，收录 4190 项目。编者描述这本辞典的特色如下：

〔图41〕《现代语辞典》的页 116 和页 117

虽然与本辞典类似的书在目前很是不少，但本辞典却是保有它底特点的，因为在量的方面，它搜集的条目比较多，在质的方面，它着重于材料底广博、解释底浅显、编制底统一、文字的经济，而且有许多名辞是为其他辞典所未收容的。（见编者"序"，页 2）

编辑体例如下：

本辞典包括范围，计有社会科学、哲学、文艺、国际知识、自然科学及普通用语诸门类；以社会科学条目最多，哲学文艺次之，国际知识又次之；至于自然科学名辞与社会科学或哲学有相当联系者，始列入之。全书条目约近 5000（其中最新名辞所占条目约 2000 余）。

所录的项目中，有关日本事项的（例如"甘粕事件"、"白桦派"等），共有 78 项。关于"九一八事变"等中国事件，及中国特有的词汇如"田径赛"等，也收录了一些；不过，它们大都与日本词汇相同。我们看看"全书条目"便可知道。

〔图42〕《现代语辞典》全书条目页14和页15

《新名词辞典》 春明出版社编，该社1949年印行。编辑体例大别为国际、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哲学、科学、文艺、人物诸类，然后又逐类分列细目。笔画索引（包括人物索引）60页，本文1118页，共录6575项。

这本辞典在1949年初版，1953年已经增订三版，但内容变更不大。所录项目不单是名词，又有"国际主义的民族观"、"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之类的片语，有"人民文学"、"中山大学"等中国特有名词，并且刊载国内外人物传略及肖像，具有百科辞典的内容，其风格与以前的新辞典都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新词汇亦有载录。而日本词汇（包括与日本词汇结合的词汇），占了大半。

《新知识词典》 新知识辞典编辑室编辑，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出版。项目索引六十四页；本文1550页；项目依笔画次序排列，并刊有图解。

内容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政治社会、经济、地理、自然科学、工农业、生产技术等名词和术语，及与上述各种学科有关的重要著作和主要人物。在这本辞典内，大半是日本词汇或与日本词汇结合的词汇。

十　日本词汇融汇到中国语文的过程

日本词汇是怎样融汇到中国语文里去的呢？让我们就“经济”一词，详细地检查一下吧。在古代中国，“经济”有“经世济民”或“经国济民”的意义。明治以来，日本人用“经济”两字，作为 economy 一词的释语。

诚如本章第二节所述，初期留学生知道中国人对这个译语反感，所以后来有人试用“富国学”、“计学”、“资生学”、“平准学”等词汇去代替“经济学”。

中国人虽然对这个日本词汇反感，而且企图改用其他词汇，可是在日本书的中译本内，却到处可以看见“经济”一词。最后他们还是照日本词汇的老样子使用。例如，1901年7月发行的《译书汇编》第七期，刊登法学博士天野为之的《经济学研究之方法》一文的中译，并且在题目下面，附加一个说明：

> 经济云者，理财或富国之义。因原文通用此名，故仍之。

在这篇译文的第一页（《译书汇编》第七期第89页），就三番四次地使用“经济学”、“经济杂志”、“经济要义”、“经济指针”、“经济原论”等含有“经济”的用语，共有12次之多。倘使翻阅全书，恐怕“经济”两字的出现次数，不会少过几百几千次。其实，中日两国都写“经济”两个汉字，只不过在日本读作keizai，而在中国则读作jing-ji，在读音方面有所不同罢了。故此“经济”一词常见于日文，亦

常见于中文。

现在，让我们检查一下在第七节及第九节所提过的辞典，看看他们怎样解释经济一词吧。

1903 年的《新尔雅》：

论生财析分交易用财之学科，谓之计学，亦谓之经济学，俗谓之理财学。

1907 年的《汉译法律经济辞典》：

经济者，人类之获得财货及使用财货之顺序的活动与其状态之谓也。

1909 年的《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

人类欲得财使用之，以满足其欲望；此种顺序的活动或状态，称之曰经济。通俗亦有以节制俭约之义用者。

1911 年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

经济者，经纶干济也。而吾国通俗以善计者曰经纪，日人输入中语因音近而误作经济。（此类甚多）今此一名词又回输吾国，而沿用为生计义，与原义全别；虽已积习难返，然其本原界限不可不知也。

1915 年的《盲人瞎马之新名词》，则有下面冗长的理论：

经济之语，吾国自古文章中亦有其用法，多用曰某人有经济才云云。然现在所谓经济之语与昔不同，政治学科有曰经济学者，日人翻译而成之也；其意义即曰经国济民之学问。缩其范围言之，即与个人经营事业以济一己之生活无异。以国为主体而言，与以个人为主体而言，皆无不可。其意思本来通顺，无嚼舌之因由者也。虽然，我国新人物一用则大谬不然。动曰经济困难，又曰不经济。前语犹能解释，后语请问是何意味乎？譬如李鸿章向曾国藩函借银圆三百，曾复曰现在经济困难，不能如命。此其为意，即现在手中拮据不能如命之语，犹可通也。然现在一班人所用者，则非此意。竟有以经济二字视为银钱二字之概。譬如云经济缺乏，不能举办某种事业之语是也。又不经济三字之语，梁大文豪亦喜作之。梁之演说中，时有曰“现在人才不经济”云云。此不经济三字所

示者何耶？余辈浅学蒙童殊难索解。只得强释其意曰："现在人才缺乏"。彼所作者，系汉和（和，日本别名）合并文章；余所改者，系人汉独立文章；主观不同，故未可非难彼也。不经济三字之语，犹有一用法。譬如北京米粮贵，天津米粮贱，人有欲向北京买米者，告之曰：天津米价甚廉，汝往北京买岂非不经济乎！此不经济三字，即不合算之意。又为不知打算之意。追其蛛丝马迹，即不懂经营之意。语病至此，可谓深矣。国人日日同化于人而不觉，悲夫！且不经济三字之语，日人亦从未用于谈说之内，不过偶尔见诸纸上耳，何一效人即更有甚于人者耶！总之经济之义即经营人间一切财用以济其生活之意，不可误会于他也。……

上面的论说，并不是要彻底地排斥"经济"一词，而是非难中国人把"不经济"误解为"不善算数"。

不过，1923 年出版的《新文化辞书》及 1928 年的《新术语辞典》，却没有刊载"经济"一项了①。大概因为这个时候，"经济"一词已不算是"新文化"或"新术语"。它已经变成一般用语，人们也忘记它是外来语。实际上它已在中国语文内生了根；如果现在仍要把它拿出来当"新术语"解说，就未免有点儿滑稽可笑。编者们毫不犹豫地使用"经济"的转义语以表示"简单"一词的意义，有趣极了。例如，《新文化辞书》的序文说：

一方面，又竭力的避除繁冗，在能够明白而畅达的范围内，务必应用最经济的结构、最简单的辞句。

1933 年的《现代语辞典》的编者序亦说：

在质的方面，本书力求材料的广博，解释底浅显，编制底统一，文字

① 《现代语辞典》(1933)比《新术语词典》(1929)迟出，但前者录有"经济"一项。不过，这项不是专门用来解释"经济"一词的，而着重说明一些与经济有关的附属语，例如"经济行为"、"经济活动"、"经济人"、"经济主体"、"经济物"、"经济财货"、"经济客体"、"经济关系"等等。"经济"两字只是用来代表上面众多的项目罢了。

的经济。……

现在，让我们看看另一个日本词汇进入中国语文的例子吧。这一类日本词汇不一定是通过翻译而传入中国，却是因为介绍日本事物时，渐渐移植到中国语文内的。例如，日本“不景气”一词，是在1935年左右才传入中国的，最初见的叙述法是：

“日本之所谓‘不景气’。”

不久便将“日本之”三字除去，变成：

“所谓‘不景气’。”

后来，成为：

“不景气。”

最后，连括号都不要，变成：

不景气。

通过这种路径而传入中国的“时局语”或“战时用语”，在数量上远比通过翻译而传入中国的“学术语”为少，这大概也是因为“同文”的缘故吧。在这种“时局语”中，例如“配给”、“防空演习”、“灯火管制”、“空袭警报”等，对中国人来说，似曾引起一些异样的感觉。

十一　从“外国”学来的词汇

在明治时代，日本与中国之间虽有磨擦，但大体说来，两国关系仍算友好。大正时代(1912—1925)二十一条问题首先招怨于中国；后来，激起中国人民抗日思想的“济南事变”、“满洲事变”、“中日事变”等等侵略行动亦逐次展开。

尽管如此，中国人仍然不断来日本留学，日本书籍的汉译仍然非常盛行。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甘苦难言的时代。

这个时候，中国人不想照实明言那些从日本借来的词汇，大概

是人情和面子的问题吧。中国人说“这是从外国借来的词汇”，以代替说“这是从日本借来的词汇”。

在1934年，中国文艺界发起了反省“五四”以来文学上应有的态度。“五四”之后，文学用语大体上都用白话体；不过，因为这种文体大都偏重知识分子的口味，又含有过分的翻译腔调，故此一般民众根本不甚了解，这当然是不成的。在以大众文学为主流的时代里，使用大众所不能了解的语言去从事写作，是错误的。因此，他们大声疾呼：必须使用人人能懂的语言，必须以大众的用语去写作，这便是“大众语运动”。

然而，江亢虎、王西坤、胡朴安、姚明辉、潘公展、顾实等六十余人，则极力反对“大众语运动”。他们提出“保存文言”的口号，组织“存文会”，发表了如下的宣言：

> △发起旨趣书　昔颜习斋标揭四存，曰存人，曰存性，曰存学，曰存治；同人以为今日所需，尚有一存，即存文是已。慨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教育普及功效未见，而国文作风日坏，国学程度日低，近更有昌言废弃文言，并废弃汉字者矣。同人怀伊川为戎之惧，矢文章报国之诚，当存亡绝续之交，尽奔走呼号之责，斯文未丧，来日方长，愿与有志者共勉之。
>
> △宗旨及工作　宗旨：（一）本会专以保存汉字保存文言为目的，联合同志努力迈进；（二）本会认注音为识字符号，如字母反切之用，但反对以之替代汉字；认白话为学文阶梯，有启蒙通俗之功，但反对因而废弃文言；（三）本会主张以群经正史诸子百家乃国文最高之标准；（四）本会主张中等以上学校教本作文悉用文言，一切文字除特殊与必要外亦悉用文言。　工作：（一）向政府当局合词请愿推行本会主张；（二）向各处教育文化学术及出版机关提出意见唤起同情；（三）联络各学校国学国文教员请其赞助实施；（四）推广识字运动，普及文言教育，养成国学师资，提倡文学结社，流通文艺作品；（五）编辑发行存文杂志负下列使命：一、征求当代作家鸿文钜制以端趋向而示楷模；二、选录各学校最优国文成绩，以

资奖励而备观摩；三、批评纠正出版书报之误失，以免谬种流传贻误后学；四、登载本会消息及有关国学国文之新闻。

△组织及规戒　组织：(一)凡赞同本会宗旨者皆得报名为会员，一机关有会员十人皆得设立分会，一地方有会员百人皆得设立支会；(二)会员除共同担任维持当地会务外不另收会费；(三)本会希望会员每人订阅本会杂志一份；(四)本会每月各处开会员会一次，每年联合开代表会一次。规戒：(一)本会除上列各条外，绝不参加其他活动；(二)本会会员不得以本会或会员名义参加其他活动。①

很多学者反对这个"存文会"。1935年4月，《现代》杂志发刊了"反读经存文"特辑；其中，汪馥泉指出：上述"宣言"内有底线的词汇，是在任何"群经正史诸子百家"都见不到的。其实，大部分有底线的词汇，就是日本词汇。②

1942年，毛泽东在以《反对党八股》为题的演讲中，认为从群众中及由外国学来的词汇，多是生动而且恰当的。他说：

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合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词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词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③

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1943)及《中国语法理论》(1944)两书中，都有专章讨论中国语文内"欧化的语法"；前者用了85页，后者有97页的篇幅。其中关于日本词汇的部分，摘要如下：

---

① 《申报》1935年3月1日。

② 有傍线的词汇，例如"白话"、"支会"、"工作"及"认……为"、"除……外"，都是中国的新语。其他有傍线的，便是日本词汇了。同时，汪馥泉没有指出的，例如"文化"、"文学"、"杂志"等语汇，都是由新的（日本的）意义所形成的；"国文"、"国学"、"汉学"等，也是近代用语。

③ 《毛泽东选集》，页794。

在所谓"欧化"之中，有语法、风格及词汇诸事。在风格上，正如"书籍是人类的精神的食粮"这个句子，其表达型式很不错；但语法上真正的欧化，比起词汇的欧化来，还差得很远。

因为词汇欧化了，结果复音的译语大量产生，例如：

society 社会　right 权利　reason 理由
action 行为　happiness 幸福　patient 忍耐
attack 攻击　attempt 企图　consider 考虑

（以上是复意法）

animal 动物　circumstance 环境　instinct 本能
truth 真理　absolute 绝对　relative 相对
international 国际　improve 改良（改善）
realize 实现　mobilize 动员　bless 祝福

（以上是拐弯法）

新兴的欧化记号出现于语尾的，有"化"、"性"、"度"、"品"、"家"、"者"等。

"化"是从英语的语尾-ize 译来的。例如：标准化（standardize）、普遍化（generalize）。尚未有这些译语之前，standardize 译作"使合标准"，generalize 译为"使成普及"。因为使用了这个"化"字，所以可以制作了"人间化"、"具体化"等英语所无的字汇。

"性"是英语语尾 -ty -ce -ness 的翻译。例如：possibility 译为可能性，importance 译作重要性，mysteriousness 译作神秘性等。在未有这些译语之前，importance译作"重要"，mysteriousness 译为"神秘""玄妙"。

"度"是英语语尾-th 译过来的。例如：depth译作深度，strength 译成强度。（从前叫做深浅、长短）。

"品"是由一些英语名词译来的。例如：work 译为"作品"，food 译作"食品"。

"者"是英语语尾-er -or 的翻译。例如：reader 译作"读者"，creator 译为"造物者"。

对于欧化词汇及语尾欧化记号的创造(或来源)，《中国语法理论》解释说：

> 在本节(第 41 节"复音词的创造")里，我们没有辨别日本的译名和中国自造的译名，因为大致说起来，日本也是利用汉字(至少，中国所采的日译是用汉字的)，而且大半也是用拐弯法，和中国的翻译方法并没有甚么分别。例如"银行"，咱们如果不追究它的来历，几乎要说它是中国自造的一个译名。①不过，其中也有和中国字源学不合的。例如"经济"，本是"经世济民"的意思。日本把 economy 译为"经济"，若凭中国人去创造译名，不会得到这种结果的。至于 affirmation 之译为"肯定"、negation 之译为"否定"、positive 之译为"积极"、negative 之译为"消极"，在中国语里可说是费解。不过，现在大家用惯了，也就不觉得了。②

又，《中国现代语法》注释"银行"一词说：

> 有些新名词并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采用日本语的。但日本人当初创造新名词的时候，也是利用汉字，和咱们后来创造新名词的方法大致相同，所以不必分别讨论。③

王力在论中国的欧化词汇中，虽然承认了有从日本借用的事实，可是认为除了那几个曾被引用的词汇之外，并无必要加以溯本求源地甄别。

十二　从日本学来的词汇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自从 1910 年代以来益形恶化，后来，更不

① 这是指被中国人所采用的日本译语"银行"而言。

② 《中国语法理论》下，页 266—267。

③ 《中国现代语法》，页 313。

幸发生为期八年的战争。结果，日本军国主义覆亡，中国胜利。

战胜国的中国对战败国的日本，伸出友谊的手，以德报怨；送还残留在中国的日本人，互相派遣文化使节等等。虽然国交还没有恢复，文化交流却兴盛起来了。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诞生以后，用前所未有的热心去推行文字改革。例如，选定常用字、普及简化字、采用罗马字等等。与文字改革息息相关的运动——普及标准国语运动，也展开了；为了使标准国语普及，于是进入了严格地把中国语规范化的阶段。中国语的规范化有三方面：读音、词汇和文化。在词汇的规范化内，也留意到学术用语、外来语等其他问题。现在马上就要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外来语，但是应该如何着手呢？——中国语言学者们把这些问题都列入他们工作的日程内。

他们根据种种事实及其变化，将那些一直尚未明确表明“从日本借来”的外来语，直截了当地承认是“从日本借来”的事实。② 到1958年2月，更出现了一些讨论这些事情的书籍及杂志论文。例如：高名凯、刘正埮合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及王立达的《现代汉语中从日本借来的词汇》（《中国语文》总第68期）等是。

高名凯、刘正埮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共有六章：

第一章　外来语是甚么

---

① 指1958年5月以前时期。

② 中国的语言工作者不但明显地承认从日本借来的词汇，而且公开承认抄袭日本人作品的事实。例如，董秋斯（中国作家协会）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以《翻译工作中的汉语规范化问题》为题，作了如下的报告：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部比较好的英汉词典可用。一般翻译工作者用得最多的是商务印书馆的《综合英汉大词典》。这本词典是抄袭了日本人的……英文方面是这样，别的语文方面当然更要差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第202页。）——译者注

第二章　汉语外来语历史的回顾

第三章　现代汉语的外来语

第四章　现代汉语外来语和汉民族文化发展的趋势

第五章　现代汉语外来语的创造方式

第六章　现代汉语外来语的规范化问题

作者们在第一章说，在发音和文法方面，中国语受外国语影响不多；至于词汇方面，即中国语和外国语是互相吸收的。特别是本国所无的关于自然界事物、文物制度及思想的词汇，最易于吸收。不过，这些都是基本词汇以外的东西。新语的制作动机，是因为人们接触到外国新事物，但没有现成词汇可以表达。例如，中国人见到 aeroplane 这东西，便制作了"飞机"这个新语。这个新语是意译的词汇，有"外来义"，但不是"外来语"。发音和意义两方面都是来自外国的词汇，才是外来语。①

第三章分述来自下列语言的外来语：英语、法语、德语、日本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中国少数民族语等。②

该书第四章第二节讨论"现代汉语外来词所表现的外来事物及概念"。作者把全部外来词分成 29 组，又将各组依国别和数量而排列。现在按照该书所录的数目，制成"汉语外来词所表现的外来事物及概念一览表"。

根据这个一览表，来自日语的外来语有 459 个，而英语的有 547 个；来自英语的外来语似乎多到出乎意料之外。不过，这只是表面的看法，若按内容去查考，便会发觉使人吃惊的事实。

在这个一览表内，全部外来语共有 1270 个，其中来自日本语

① 郑奠先生有不同的说法。他认为外来词有五种：1. 音译，如"逻辑"logic；2. 意译，如"马力"；3. 音译兼意译，如"啤酒"beer；4. 借用，如"手续"；5. 描写，如"飞机"。

② 原著以下引录该书第三章第五节全文，因引文颇长，从略。——译者注

汉语外来词所表现的外来事物及概念一览表

事物概念＼来源	西藏	蒙古	回纥	日本	俄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英国	西班牙	印尼	合计
政治	4	7	4	39	26	5	5	2	23			115
文学·艺术			5	12	2	2	12	10	51			94
币制					3	5	6	3	51	16		84
哲学				61		2	1		12			76
经济				47	2	2	1		21			73
度量衡			1		6		29		37			73
化学				7			1		57			65
文化·教育 出版·体育				27	1		3		23			54
社会		3		17	4	2	6		17			49
医药				12		1			35			48
宗教	7	10	3	4					22			46
饮食	1	1	1	2	4		3		33			45
物理				23		2	3		14			42
军事	1			23	1	2	1		13			41
法律				39								39
心理				17					9			26
动植物		2		4	1				17			24
机器				3	3				15			21
日用品				2	1				16			19
交通		1		8					9			18
建筑	1	1		6	1				6			15
数学				9			3		2			14
纺织	1	1			1		1		9			13
服装	1			1	1				9			12
地质·地理	3	3							4			10
生理				5					5			10
外交				6					1			7
言语				1					4			5
其他	2	4	2	84	3		3		32		2	132
合计	21	33	16	459	60	23	78	15	547	16	2	1270

的有 459 个，大概占全体的35%强。可是，来自日语以外的语言的词汇，有很多不是中国人所熟习的；相反地，来自日语的词汇，似乎大都是惯熟了的词汇。①

来自日语以外的外来语，看起来总是“外国的”；不但日本人有此感觉，就是中国人也如此感觉。证据可从下面叙述的事实内见到。

中国人叙述其他外来语时，通常有一个特征：必定解释该语的意义。例如，叙述来自英语的外来语，《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便分下列四点：（1）中国语的词汇；（2）英语的词汇；（3）英语的来源；（4）语的意义。即使叙述来自中国少数民族的词汇，亦有“语的意义”一项。可是，在叙述从日本来的词汇，便不同了。该书只分下列三点叙述：（1）中国语的词汇；（2）日语的发音；（3）日语的来源。对于日语的意义，不加说明了。关于这事，该书有一个注解：“从日本语汇来的外来语的意义，因为都是我们周知的，所以‘语的意义’一项，便不需要了。”是的，来自日本的词汇，都是常见的——不但日本人有此感觉，连中国人也有同感。

来自日本以外的汉语外来语，为甚么连中国人也会感到不熟识呢？理由很多。

第一，这些外来语只有名词而无动词。来自日本的则不然，例如“服从”、“复习”、“解决”、“克服”、“支配”等常用的动词，曾大量地传入中国。

第二，这些外来语之中，有些并不是在全中国都通用，而只在粤、沪等地通用；更有不少是必须加以注解才能明白的通商口岸的特有用语。

为了知道那些难以熟习的，来自日语以外的汉语外来语其数

① 来自日语的外来词之中，不是没有不常见的词汇，例如“占地”、“便所”、“美浓纸”等便是。

量是如何的庞大，让我们在那547个来自英语的外来语中调查一下，看看有几个词汇是稍懂汉语的日本人所能了解的吧：

阿们 amen	啤酒 beer	密斯特 Mister
先令 shilling	司的克 stick	泰晤士 Times
华尔街 Wall Street	仆欧 boy	高尔夫 golf
摩登 modern	扑克 poker	托辣斯 trust
道林纸 Dowling paper	达姆达姆弹 Dumdum bullet	威士忌 whisky
福尔马林 formalin	吉普车 jeep	乒乓球 ping-pong
雷达 radar	华尔兹舞 waltz	爱克司光 X-ray
白兰地 brandy	阿士匹林 aspirin	基督教 Christianity
引得 index	面速力达 mentholatum	马达 motor
雅片 opium	普罗列太林 proletarian	维他命 vitamin
歇私的里 histeria	哀的美顿 ultimatum	乌托邦 Utopia
安琪儿 angel	酒巴 bar	酒巴间 barroom
甲必丹 captain	士敏土 cement	冰淇淋 ice-cream
葛郎玛 grammar	幽默 humour	逻辑 logic
密斯 Miss	塞因斯 science	哔叽 serge
西崽 servant	卡车 car	摩托卡 motor-car
巴士 bus	加农炮 cannon	卡片 card
加特力教 Catholicism	德谟克拉西 democracy	柠檬 lemon
模特儿 model	木乃伊 mummy	奥林匹克 Olympic
浪漫蒂克 romantic	巧克力 chocolate	雪茄 cigar
可可 cocoa	坦克车 tank	珂琊版 collotype
德律风 telephone	婆罗门 Brahman	耶和华 Jehovah
撒但 Satan	沙发 sofa	爵士乐 jazz

在547个词汇中，日本人所懂的仅有69个。同时，有些“音译”的外来语，已被日本的译语取代了，例如，“葛郎玛”改为“文

法"、"塞因斯"改为"科学"、"德谟克拉西"改为"民主"、"德律风"改为"电话"等等。虽然高名凯、刘正埮的书里还列记这些"音译"的外来语，它们只不过偶然在早期的文献中出现罢了。

还有一些来自英语而为日本人所懂的语汇，例如"吨"、"俱乐部"、"虎列拉"、"淋巴"、"窒扶斯"、"浪漫史"、"加答儿"等，王立达把它们算入"日本人用汉字音译的外来语"之内。

此外，"绷带"(bandage) 这个"意译"的词汇，虽然也被列入"音译"的范围内，但是，它也是日本人所制作的吧。"淡巴菰"(tobacco)一词，似乎亦被认作中国人所音译，然而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1879 年) 里，曾有诗咏"淡巴菰"，并自注云："淡巴菰，烟也。"，大概是因为当时 tobacco 在中国称做"烟"，而在日本叫做"淡巴菰"的缘故吧。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淡巴菰"的确是日本人的音译。

在 274 个英语以外的外来语中，日本人所熟识的仅有下面15个：

来自法文的：

爱美的 amateur	芭蕾舞 ballet	咖　啡 cafe
香　宾 champagne	法　郎 franc	克兰姆 gramme
意德沃罗基 idéologie		

来自德文的：

奥伏赫变 Aufheben	马　克 Mark	先　令 Schilling

来自俄文的：

苏维埃 совет	沙　皇 царь

来自意大利文的：

法西斯 fascisti

来自蒙古文的：

达赖喇嘛 dalai lama	哈　巴 haban

按照上面的调查，为日人所熟识的来自日语以外的汉语外来语仅有 84 个。总计起来，（来自日本的）459 个加上（日本以外的外来语）84个，共有 543 个，在这 543 个之中，来自日本的 459 个词汇，占了 84%以上。

最后，就“质”方面来说，来自日本的词汇的用途甚广，使用的频度亦高；如果精细地阅读上面的一览表，便可理解这种事实了。

对于高名凯、刘正埮与王立达的两种说法，也有些中国人持反对的意见。例如，邵荣芬在他的书评（《中国语文》总第 73 期，1958 年 7 月），指摘高名凯和刘正埮对于日本以外的外来语来源，追溯得不完全；对于来自日语的词汇，所论亦有错误。其指摘综要如下：

（一）所谓纯粹的日本语词汇，例如“服从”、“希望”、“记录”、“命令”，其实是中国古语。

（二）所谓日本人意译西洋语词汇，例如“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全部都是中国古语，现在仍然使用。“民主”一语，王芝在他的《海客日谭》（1872年），便以现在的意义而使用。

（三）例如“军事”、“法则”、“关系”、“刑法”、“交流”、“供给”、“铁道”、“消化”、“相对”诸语，全是中国古语，非日本人创造；不过，日本人把意义略加变化，使之成为译语罢了。

对于王立达的批评，有郑奠的《关于现代中国语的“日本词汇”》一文（《中国语文》总第68期，1958年 2 月）。该文指出：王立达认为“权利”是日本词汇，是一个错误；因为事实上在 1864 年同文馆所译的《万国公法》卷一，就有“人民通行之权利”一句；故此，日本人只不过借用这一个词汇吧了。把 grammar 译为“文法”，见于1627年的《名理探》。① 该文又认为“历史”、“伦理”、“心理”、“积极”

① 日本户水宽人在《新法律词典》序中，也认为“文法”一词是丁韪良所制作的译语。

诸语，也是中国古语。

除了上述的反对论，尚有“化学”一词，似乎不是来自日本而出于中国。丁韪良原著，傅任敢辑译的《同文馆记》，有如下的记载：

丁韪良博士则于毕氏著作出版以前，作了一本关于物理学的书，最先为化学锡〔赐〕以现在的名称。①

上述的批评，不管对与不对，现在的中国人大体上仍然以为它们是借自日语的。特别是“文法”、“权利”、“民主”、“历史”、“作用”、“积极”、“绝对”，这些[常用]词汇，竟被高王等学者共认来自日语。这些词汇就好象那些长期侨居外国的人，一旦白首回乡，常被误作外国人一样。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些词汇早就在中国古典和近代翻译出现过，于是把它们误作来自日语的外来语。批判这种错误的文章，实际上正好反证了一个事实：日语融汇到汉语的程度，是多么的深广啊。

十三　中国人承认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

综合并整理前节介绍过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及《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所纪录的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去除了重复的词汇，可得下面的一览表。②

兹将表内所用的符号说明一下：

“△”　表示一般人（即上述高、刘、王三位以外的中国人）认为不是来自日语的词汇（即认为是中国固有的或为中国人首先制作的译语）。

“×”　表示仅在输入时所通用的词汇；现在有了其他译语，已经不再使用的词汇。

“～”　表示“某某”之意。例如“～化”，表示其他以化字作语尾的词汇，

① 《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8页。

"一元化"、"一般化"、"特殊化"等等。

中国人承认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一览表

一元论	一览表	二重奏	人道
人格	人权	人力车	人生观
人为的	人格化	入口	入超
入场券	七曜	～力	三角
三轮车	三段论法	上水道	下水道
小型	小熊座	大型	大熊座
大本营	工业	工业化	工艺美术
士官	土木工程	土木工学	反映
反射	反动	反对	反应
反党	反革命	方式	方法
方面	方针	方案	方程式
内包	内用	内在	内服

---

② 原表只有 784 个词汇。由于原作者实藤氏及译者分别发现新资料，故同意将原表增补为 844 个词汇。首先实藤氏根据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的变迁和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年出版)，加入46个词汇。其次，译者根据余又荪氏的三篇文章：《日本之康德哲学译者》(《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四期，1934 年 1 月 15 日)、《日译学术名词沿革》(《文化与教育旬刊》第 69 期及第 70 期，1935 年 10 月 20 日及 30 日)、《谈日译学术名词》(《文哲月刊》第一卷第七期、1936 年 3 月)，增补 36 个词汇。

此外，译者在民质《论翻译名义》一文(《国风报》第一年第 29 期，宣统二年〔1910〕10月 21 日)，找得几个被证实为来自日语的词汇：三段论法、政社、政治经济学、换位，亦补入表内。最后，在1958年之前，出版了一本有关的书籍，那就是孙常叙的《汉语词汇——东北师范大学讲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该书在第 21 章(页 304 至 322)中，专论"外来语词汇"，讨论来自日语的汉语外来词颇为详细，其所引用的词汇，除了"拔河"一词外，余皆见于上述资料。以上各项所得词汇合共 844 个。详见谭汝谦：《现代汉语本かの日本语·补遗》一文，收入实藤氏：《近代日中交涉史话》(东京，春秋社，1973 年)。

又，原著下面引录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一文，其中所列举的日本词汇共有 588 个，从略。——译者著

内容	内分泌	文化	△文法
文明	文库(文化)	文学	支店
支持	支部	支配	支线
分子	分析	分配	分类表
手段	手续	手工业	手榴弹
不景气	不变资本	予约(预约)	公债
公开	公证人	互惠	予算(预算)
化石	△化学	予备役(预备役)	
引渡	瓦斯	△心理	巨头
欠点	幻灯	水成岩	火成岩
太阳灯	～化	反～	主任
主食	主席	主动	主义
主笔	主权	主观	主体
生理	生产	生物学	生产力
生存竞争	生产手段	生产关系	出口
出版	出席	出诉	出超
出庭	代表	代理	代数
代言人	△民主	民法	民族
目的	目标	目的物	外延
外在	外分泌	必要	必然
世纪	世界观	可决	可变资本
布景	由于	古典	石油
打消	市场	立场	失踪
申请	右翼	左翼	片艳
未知数	甲状腺	加答儿	～主义
交易	交流	交通	交感神经
交涉	交换	交战团体	交感价值
交际	交响乐	自发的	自然科学
自白	自由	自治	自然淘汰

自然	共和	共同	共产主义
共产	地主	地上水	地下水
地质	成分	成为	有价证券
有机	同盟	同盟同工	泛心论
泛称	印刷品	印刷的	回收
刑法	行政	列车	年度
仲裁	妄想	多元化	百货店
全称	劣势	企业	血色素
光线	休战	吉地(げた，日本木屐)	
巡洋舰	时	米	～式
泛～	低温	低潮	低压
低周波	低能儿	作用	作物
作品	作战	否决	否定
否认	改良	改造	改善
投票	投资	投机	技手
技师	判决	判断	身分
即决	克服	住所	冶金学
形而上学	局限	△材料	冷藏库
攻守同盟	但书	助教	汽船
防空演习	见习	△希望	系统
言语学	决算	抗议	呎
瓩	～作用	法人	法式
法定	法医学	法则	法律
法科	法学	法庭	表决
表现	表象	表情	表演
社团	社团法人	社交	社会
放射	放射线	放送	协定
协会	协议	金库	金融
金额	直流	直接	直觉

物质　物理　批判　批评
拔河　河川工学　服务　△服从
固体　固定资本　命题　命令
空间　空袭警报　免除　免许
例外　使用价值　制约　制裁
性能　治外法权　定义　定额
初步　弧光(电学)　取消　取缔
非金属　非战斗员　肯定　迫害
迫击炮　味之素　味素　拘留
所得税　所有权　长波　周波
突击队　武士道　玩具　典型
注射　并发症　宗教　供给
抽象　虎列拉　承认　知识
事变　和声学　具体　～的
～炎　～法　～性　～物语
～社会　保健　保证　保障
保险　保释　政社　×政治
政治经济学　政府　政策　政党
政治家　美化　美感　美术
美浓纸　美学　侵犯　侵害
侵略　侵蚀　要素　要冲
要点　信用　信托　信号
军事　军需品　军国主义　客观
客体　故意　故障　宣誓
宣战　指数　指导　思想
思潮　促成　促进　退化
退却　重点　重工业　派遣
派出所　版画　便所　革命
封建　背景　活动　差等

前提　　相对　　规范　　建筑

科学　　计划　　马铃薯　　杆

～界　　～型　　消化　　消防

消毒　　消费　　消极　　消火栓

消火器　　消音器　　消费者　　特别

特约　　特殊　　特许　　特称

特务　　特征　　特权　　高温

高潮　　高压　　高利贷　　高周波

财政　　财务　　财阀　　财团

财团法人　　原子　　原则　　原理

原素　　流行　　流感　　流体(物理)

流通资本　　通名　　通理　　通货收缩

通货膨胀　　神经　　神经过敏　　神经衰弱

展望　　展开　　展览会　　时间

时效　　浪人　　浪漫　　连络

连系　　△记录　　记忆　　破门

△破产　　配给　　配电盘　　病虫学(农学)

病理学　　索引　　借方　　条件

症状　　乘客　　海事　　仓库

真理　　△伦理　　狭义　　气体

哲学　　根本的　　真空管　　俱乐部

航空母舰　　哩　　耗　　～时代

～问题　　动力　　动向　　动脉

动产　　动态　　动机　　动议

动体　　动员(政治)　　动脉硬化　　唯一

唯心　　唯物　　唯心论　　唯我论

唯物论　　唯理论　　唯神论　　唯物史观

现代　　现役　　现金　　现象

现实　　理念　　理性　　理事

理想	理论	假死	假定
假想	假释	假设	进化
进步	进度	进展	基于
基地	基准	间接	间谍
组合	组织	教育	教授
商品	商业	侦探	侦察
停止	停战	常识	常备兵
处刑	处女作	国际	国际公法
强化	软化	淋巴	脚本
执行	接近	△宿舍	细胞
偏见	副食	规则	偶然
情报	被动	阴极	曹达
周期	得数	专卖	距离
脱党	液体	牵引车	窒扶斯
参考书	舶来品	～率	劳动
劳动者	×劳动政府	×劳动组合	场合
场所	场面	温床	温度
温室	集中	集合	集团
单位	单子叶	单行本	游击
游击队	游击战	复员	复习
寒流	寒带	视为	视察
提供	提案	换位	运动场
运动(政治)	博士	博览会	最惠国
最后通牒	超自然	超短波	量子
散文	硬化	贷方	报告
短波	备品	道具	登记
结核	景气	雇员	傍证
勤务	阳极	扬弃	过渡
极端	番号(军事)	贮蓄(储蓄)	无机

△绝对	悲观	紫外线	混凝土
吗	超～	电力	电子
电池	电车	电波	电信
电流	电报	电话	电业
电导体	电气通信学	意匠	意志
意味	意图	意识	意识形态
传票	传统	传播	传染病
经理	经验	经济	经济恐慌
解决	解放	解剖	会计
会话	会谈	干事	干部
干线	蒸气	蒸发	蒸溜
感性	感官	感受性	资本
资料	债务	债权	农民
农作物	催泪弹	催眠术	△新闻
新闻记者	号外	节约	暖流
阶级	义务	业务	铅笔
诗歌	想象	话题	△试验
蓄电池	微积分	园艺学	～感
～腺	～阶级	对比	对象
对称	对应	对于(於)	对偶法
演出	演奏	演习	演说
演绎	领土	领空	领海
领域	领会	概念	概算
概括	概括力	概论	漫画
漫笔	漫谈	认可	认为
认识论	图案	图案画	图书馆
管制	管理	说明	说教
数量	数学	硕士	旗手
综合	银行	构造	△算术

汇类　个别　实体　轻工业
适者生存　寡头政治　论文　论坛
论理　论理学　论战　广告
广场　广义　调整　调节
调制　确定　确保　紧张
紧缩　请求　请愿　选举
选择学　导师　导火线　绿化
舞台　卫生　谈判　课程
剧场　遗传　胶着　热带
质量　渲扬　象征　复写
范畴　乐观　腺　膣
～论　～线　学士　学位
学期　学龄　机械　机会
机关　静力　静脉　静态
积分　△积极　独占(估)　独裁
△历史　宪法　讽刺　战线
还元(原)　灯火管制　吨　～学
总计　总理　总体　总动员
讲义　讲演　讲座(教育)　检波器(电学)
检讨　联想　环境　营养
誊写版　隐花植物　癌　～点
断交　断言　断定　关于
关系　归纳　职员　艺术
类型　杂志　优势　医学
双子叶　转换法　证券　沥青
警察　簿记学　议决　议案
议会　议员　悬壅垂　驱逐舰
辩护士　辩证法　△权利　属性
欢送　权威　铁道　摄护腺

斗争	变压器	体育	体操
体积	体验	鉴定	纤维
显花植物	观念	～观	

我们看看上列词汇在中国现代文章内的分布情形，便可知道来自日语的词汇，在中国语文中的作用是如何的重要了。

十四　中国语文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

日本词汇在中国语文内的融汇，到了甚么程度呢？

高名凯指出，现代汉语外来词大部分来自日语：

> 日语词汇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很大，是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外来词的主要来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来源；许多欧美语言的词都是通过日语转移入现代汉语词汇里的。①

由于这些外来词，汉语的复音语增加了。王力说：

> 中国本来是有复音词的，近代更多，但是不象现代欧化文章里的复音词那样多。打个很粗的比例，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复音词数目大约是一、三和九之比。②

由于复音词的增加，原本是单音语的汉语，现在变成复音词的语言了。王力说：

> 复音词对于中国语法的影响——中国语向来被称为单音语，就是因为大多数的词都是单音词；现在复音词大量地增加了，中国语也不能再称为单音语了。这是最大的一种影响。③

---

① 《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页158。

② 《中国现代语法》下，页300。

③ 同上书，页309。

中国语由单音语变成复音语这一事实，若将《论语》原文和白话译文比较，便更加明显了。

〔原文〕 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

〔语译〕 孔子说："看见正义的事情不去干，就是不勇敢！"

〔原文〕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语译〕 孔子说："早晨听到真理，晚上就死掉，我也愿意。"①

单音语的复音化，产生了一种效果：本来是为了表示中国所无的新事物而设立的词汇，结果又使中国语言向更明朗的方向迈进。例如"行"字在汉语向来有"行、走"及"行为"的意义。倘若将英文 action 一字译成"行"一个字，我们便难以知道它究竟指"行、走"抑或"行为"了，要等到译成"行为"才算精确明显；"虑"字有"考虑"及"忧虑"的意义。译 consider 为"考虑"，意思便不会不清楚了。

因为这类复音词多了，表达法也变得细致和详密了，复杂的理论和情感亦易于表达。与以前的文章比较起来，现代文章就变成长得多；这就是因为现代文章显得更细致，更详密之故。王力说：

有时候，若要运用现代的思想，使文章合于逻辑，确有写长句子的必要；……句子的欧化应该是不得不然的。②

王力认为现代文章的变化，有下面的表现：

从民国初年到现在，短短的20余年之间，文法的变迁，比之从汉至清，有过之无不及。③

中国语文的复音化，与其表现法，变得更致密和详尽，这是中国语文本身的进步。至于表现中国所无的事物的词汇日益丰富，

---

① 白话译文，取自倪海曙的《论语选译》(1954)。

② 《中国现代语法》下，页336。

③ 《中国语法理论》下，页258。

却是中国语文的发展。甚至可以说，由于这件出色的武器，使中国在摄取近代文化时，得到最大的便利。在整个通过日本书籍吸收近代化的过程中，适宜吸收近代文化的近代汉语便产生了。充分使用这些近代中国语，必将有利于中国的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王立达说得对：

> 综上所述，可知在现代汉语中，实包含着许多从日语借用过来的词汇。由于这些词汇的输入和流行，不仅使汉语的词汇更加丰富，同时也给我们在接受近代科学技术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①

过去，来自日语的词汇对中国现代化有所贡献，今后亦将有贡献；② 同时，这些词汇给阅读中文的日本人带来了莫大裨益，这种

---

① 《中国语文》总第68期，页94。

② 1950年代中国语规范化，并没有清算来自日本的语汇。

《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现代汉语外来词在语法上的创造方式"及"现代汉语外来词的规范化问题"两节有下面的意见。

所谓"外来语"，就是中国人把外国语改造，而以中国语法去利用的东西；故此，外来语是中国国语的一个要素。这是中国人曾经施加劳力，花费相当代价而后获得的，并非"坐享其成"。外来语是一种创造，也是一种在其他民族所创造的基础上所作的改造。外来语的增多，使汉语词汇更加发展，更加丰富。

但是，在外来语中，也有一些足以妨害国语健康发展的。有些汉语外来词有五花八门的写法，读音也不一致，十分混乱。

外来语规范化，概以一语一音一字为原则。如果外来词与国语或新语相似的话，就以后者取代之，例如：

吉他 guitar→六弦琴

麦克风 microphone→扩音机

披亚诺 piano→钢琴

司必令 spring→弹簧

生风尼 symphony→交响乐

透平机 turbine→涡轮机

现代汉语与欧洲语并非出自同一语系；发音、语汇和语法都与欧洲语言大不相同。因此，要使欧洲外来词适合现代汉语的内部发展法则，是不容易的；必须在纯粹的汉语内改造它们。

裨益，势将继续③一段时期吧。

在制作新语及改造外来语的时候，现代中国语文内出现一种特殊情况：这就是利用日本人用汉字制作的外来语去取代来自欧洲语的汉语外来语。例如：

(英文原文)	(初期中文译语)	(日本译语)	(后期中文译语)
democracy	德谟克拉西	民主	民主
dictatorship	狄克推多	独裁	独裁
economy	爱康诺米	经济	经济
science	塞因斯	科学	科学
telephone	德律风	电话	电话
ultimatum	哀的美顿	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
unit	幺匿	单位	单位

大部分日本人所创造的外来词，都是用汉字组合的"意译"词汇。这些汉字的结合法，大抵上与汉语的造词法吻合，所以与中国人自己所制作的词汇没有多大差别。

由此看来，所谓外来语的"规范化"，并不针对来自日词的词汇，而是针对那些由中国人自己音译的译语。

因此，从前融汇到汉语的日本词汇，敢信将来也会是一种发展新文化的武器，而且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武器。

③ 直至文字改革进展到完全使汉字变成表音文字为止。

第八章　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

一　中国革命的进展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方面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史，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史。在辛亥革命以前，不少革命活动是在日本策动的。从事革命活动的人物，包括亡命客、留日学生和日本的“支那浪人”等。

在论述亡命客和留日学生的史事以前，必须从一般的情势讲起。中日甲午之战，中国失败；有些中国人认为中国由此而讲求自强之策。实际上就在这场战争结束时，便有人发起种种救国运动。

不过，早在甲午以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萌芽了。康有为在1884年以前[①]就创办万木草堂，媲美于日本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从事讲学著作，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及《大同书》，鼓吹新思想。1894年更纠合广东、广西新学之士，组织桂学会。

孙文在1892年发起了革命的组织兴中会[②]。1895年，孙文在广东起事失败，康有为在北京发动了“公车上书”，进“变法自强”之策。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竭力宣传“维新”。1898年，康有为组织保国会。所谓“保国”，乃反对列强在中

① 康有为于1891年以后，才开始于广州聚徒讲学。万木草堂当于此后成立。参看胡滨：《戊戌变法》，页27。——译者注

② 兴中会于1894年成立于檀香山。——译者注

国强行“租借”土地。

同年6月，因徐致靖奏荐，光绪帝召见康有为，接纳变法的建议，下诏定国是，拔擢维新派人物，锐意改革。以废八股为首，一时新政之诏令，密如雨下，但受到守旧派的反对。9月21日，因袁世凯告密，慈禧发动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死难，康、梁逃亡日本，戊戌新政仅百日而告失败。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和团产生了。当时有识之士觉悟到期待清廷改革是愚不可及的事，“灭满兴汉”的思想遂成为汉族思想的主流。维新派争取到较上层的力量，而排满党则在较下层社会中扎下了根。

这两派都认为义和团事件是“奇祸”，事先没有联系便同时举事。唐才常所领导的维新派在汉口发难，而孙文则在惠州起义。

灭满兴汉派，除孙文的兴中会（广东）外，还有黄兴一派的华兴会（湖南）和章炳麟一派的光复会（浙江）。1904年，华兴会命哥老会头目马福益至广东联络会党举事，并在长沙策动起义与此呼应，但未发而事泄，主要成员逃亡日本（光复会的章炳麟则由于邹容的《革命军》一案，正在狱中服刑）。惠州起义失败后，为筹募革命经费而周游欧洲的孙文，亦到东京。

1905年，三派势力终于团结一致，在东京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为革命运动开一新纪元，此后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举要言之，有如下各项：

（1） 萍乡起义（第二湖南事件）（1906）

（2） 北京车站吴樾行刺考察宪政五大臣事件（同年）

（3） 黄冈起义（1907年）

（4） 七女湖事件（1907年）

（5） 徐锡麟暗杀安徽巡抚恩铭事件（同年）

（6） 钦廉起义（同年）

（7） 镇南关起义（同年）

（8） 云南河口起义（1908年）

（9） 安徽新军事件（同年）

（10） 广东新军事件（1910年）

（11） 汪兆铭行刺摄政王未遂事件（同年）

（12） 温世才暗杀广东将军孚瑙事件[①]（1911年）

（13） 黄花岗起义（同年）

（14） 陈敬岳、陈敬缶刺杀广东提督李准事件[②]（同年）

清朝一方面严厉压制革命运动，一方面表示推行新政，并在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但是同盟会指为“伪立宪”，加以反对；维新派则不断请愿，要求速开国会。清廷财政的困难与官吏的腐败已达到极点。

1911年10月10日，革命旗帜飘扬于武昌，各省闻风响应。1912年1月1日，孙文于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诞生。

二　亡命客与留日学生

大力鼓吹留学日本的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列举留学日本的理由有四。第一个理由是：“路近、费省，可以多遣。”所谓“路近”，最初仅就派遣留学的决策者而言，因为费用既可节省，则人才自能大量遣派，故当政者当称便利。后来，被派遣者也体察到“路近”的好处，他们在日本能就近呼吸文明空气，并谋求改革祖国之道，即使一旦有急事，亦可立即归国，故亦觉对他们十分便利。

随着留日学生人数的增加，中国革命形势亦有所变化。几次革命的失败者都陆续逃亡日本，而这些亡命客的周围聚集了很多

① 当为温生才刺杀署广州将军副都统孚琦事件。——译者注

② 刺伤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应是林冠慈和陈敬岳。——译者注

留日学生。在某一意义上，亡命客本身亦可视为留日学生。留日学生与亡命客共同策划祖国的革命，再加上日本志士的参加和援助，三类人物汇合在一起，频频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从事革命活动。故此，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内涵变得异常丰富，并非仅仅记叙为学业而留学的留学史。

不论维新党也好，革命党也好，一旦失败，则逃亡日本，这似成为当时的公式。这固然是基于地理的缘故；不过，他们对日本有所信赖也是一个原因。亡命客周围常有留日学生相从，有如众星捧月，为了追随亡命客而赴日本留学的人，更如铁之为磁石所吸引。严格而言，亡命客与留日学生之间往往不易加以区别，尤其是那批政治犯，他们亡命日本之后，多真正成为留日学生；他们也可以说是追随大亡命客的小亡命客。

最初到达日本的"亡命客"是孙中山先生。1895 年，他在广东计划首次起义失败，秘密逃到香港，但由于香港政府颁下不准居留的禁令，故与郑士良和陈少白等一同东渡日本横滨。孙中山把他在夏威夷结交的日本知己菅原传介绍给陈少白，使与日本志士联络，自己则赴檀香山。1899 年春，他自欧洲再到日本，在日本居留数年，其后再赴安南和美洲。1905 年第三次到日本，组织同盟会，直至 1907 年被日本下令离境为止。这两年间，他在日本展开种种的革命活动。

1898年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因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协助亡命日本，此后，在日本居留时间颇长。康有为最初由英国军舰搭救，后来亦到日本。不久便离开日本而去南洋。

1900 年，以戢翼翚为首的留日学生，参加维新派的第一次、亦是最后一次的唐才常起义，事败后也逃至日本。

梁启超亡命日本时，不过 26 岁，抵日本后立即创办旬刊《清议报》，几乎每一期都是独自执笔撰稿。百期以后，改为《新民丛报》

(1902 年),杂用日本文体,文笔颇具魅力。此外,他还提倡以文学作为政治革命的武器,编刊《新小说》作为《新民丛报》的姊妹杂志。虽然这些杂志都被清廷禁止内销,但仍巧妙地被运入国内,不但在日本一版再版,备受欢迎,即在中国国内亦流行多种翻版,可见畅销情况的一斑。

黄兴最初是官费留日学生,在弘文学院习师范科。1903 年回国后,创立明德学堂,鼓吹新思想。1904 年计划在长沙起义,但举事前事泄,与宋教仁等一同亡命日本,创刊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留日学生视黄兴等为英雄,追随的人甚多。

1899年,章炳麟来日,结识孙中山。回国后,因言论过激,被通缉而逃至日本。1903年,章因《苏报》事件入狱三年。1907年出狱,三度到日本,获同盟会的欢迎,主持《民报》。在章炳麟的周围,集结了鲁迅等一批奋发有为的留日学生。此外,如同孙中山的左右手的陈天华和汪精卫,都是法政大学的学生。

留日学生对孙中山的支持是很重要的。1904 年,孙中山从安南出发,在环球旅行的途中,路过日本,受到廖仲恺夫妇、马君武和胡毅生等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

1905年夏,孙中山自欧洲抵日本时,获留日学生极盛大的欢迎,约有一百名留日学生到横滨来迎接他。8 月 13 日,留日学生在麴町区富士见楼举办的欢迎会上,出席者达一千三百多人,连屋外也挤满了人,盛况可谓空前。从此,革命团体的活动,急速地发展。孙中山的兴中会、章炳麟、蔡元培等的光复会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的华兴会,迅速展开大团结运动。7 月 30 日,在赤坂桧町黑龙会(内田良平宅)内,召开了筹备会。到会者有孙中山、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冯自由、田桐、梁慕光、吴春阳、程家柽、居正、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但焘、时功玖、曹亚伯、马君武、董修武、邓家彦、张我华、何天炯、康宝忠、谢良牧、刘道一、黄复生、蒋尊

篡、张树枬、朱执信、古应芬、杜之杕、姚粟若、龚国煌、李烈钧、唐继尧、阎锡山、尹昌衡、汪精卫、李根源、吕天民、于德坤、孙毓筠、周代本、胡瑛、石志泉、李书城、耿觐文、何晓柳、张昉、秋瑾、宫崎寅藏、内田良平[1] 等七十余人，大部分为留日学生。这次会议的结果，产生了统一的革命团体——中国革命同盟会（略称中国同盟会）。8月20日，在赤坂区灵南坂的坂本金弥的住宅举行成立大会，加盟者四百余人（除甘肃以外，包括了17省的人）。自此以后，革命运动更加如火如荼地进行。

日本于是成为中国革命舞台，出场参加的人物，除亡命客和留日学生外，还有日本的志士（支那浪人），著名的有头山满、犬养毅、内田良平、宫崎寅藏（滔天）、宫崎民藏、北辉次郎（一辉）、平山周、清藤幸七郎、萱野长知、福本日南、柏原文太郎、平冈浩太郎、山田良政、坂本金弥、末永节等。

在这些志士中，虽然不乏从私利私欲出发的人[2]，但大多数都希望对岸的中国不至被西洋各列强分割，有的甚至为中国革命事业而牺牲性命。例如在1900年惠州之役中，东亚同文书院干事山田良政战死于虎头山。

日本志士亦曾尽力促使维新党与革命党合作，但因两者主义不同，无法达成协议。

最遗憾的是大部分日本志士后来却挑唆日本军阀侵略中国。

---

① 以上的出席者乃综合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的“中国同盟会”一章与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所记。

② 例如，“……有所谓布引丸事件。孙中山在广东附近筹集款项，向日本购买弹药。托犬养毅代为斡旋。犬养毅托之于信州出身的议员中村弥六。经中村的斡旋自大仓商事会社购买数千支手枪及一批弹药。由布引丸（船名）运载，其后此船于途中沉没，武器亦埋于海底。但后来得悉从大仓购买的枪支全部是不能使用的废枪，没有弹药，而且沉船是一艘废船，传说于途中故意弄沉。因大仓当作废枪出卖，故其间中村吞没了数万金之事终被发觉，中村卒被社会所唾弃。”（见于《中央公论》53卷之1《快傑秋山定辅》一文）

三　清末留日学生与新思想

日本志士对中国革命的支援，远不如日本思想和学问在中国人士心中所引发的革命火焰来得重要。北一辉说：

> 中国革命非来自太平洋外遥远之云间，其实，对岸之岛国——日本，其思想乃最重要之原因。①

留日学生不断吸收当时日本的学问和思想。这些东西本来源自西洋，留日学生加以消化和改造，使之适合中国国情，并向中国国内大事宣传。

本书第五章所述翻译活动就是此种思想运动之一大事业。另一种大事业是经营杂志，其中虽亦有少数是纯学术的，一般而言都是介绍启蒙思想和宣传革命的杂志。

邹鲁在《中国同盟会》中说：

> 时（1905 年）各省学生皆有学生会，会中多办一机关报，报以不言革命为耻。②

中国留美学生所办的《留美学生年报》，在 1910 年的一篇文章说：

> 日本之留学界，国人类能道之，美洲之留学界，国人知之者少。③

该文结论说：

> 中国似醒未醒，又似初醒之时，人其从新欤？从旧欤？未定也。因日本留学生之书报，日本留学生之骂詈，日本留学生之电争，而通国之人大醒。开明者，因明而醒；顽固者，因骂而醒；不进者，因驱而进；退后者，

① 引自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
② 转引自《辛亥革命》II，页 3，
③ 朱庭祺：《留美学生界》，见《留美学生年报》（1910 年第 1 册）。

因鞭策而前。在此醒悟时代，日本留学界，大大影响中国。①

中国留英学生主办的汉文杂志在1927年才出版第一期，而其发行的两大理由之一是："供留英学生练习中文写作"之用。但距此二十多年前的留日学生出版物，已经不是无关宏旨的"练习"，其内容全是大是大非，掷地有声的。

留日学生在日本刊行的杂志，不仅达到一般杂志的水准，而且在质素方面还领先于国内的杂志，发行数量亦较国内的杂志为多。直至辛亥革命为止，中国人在日本发行的杂志有以下各种：

清末在日本刊行的中文杂志目录

（创刊日期以旧历为主）

（杂志名称）	（编　者）	（出版者）	（创刊年月日）
清议报	梁启超	本报馆（横浜）	1898.10
译书汇编	坂崎斌	本　社（东京）	1900.12.6
开智录	郑贯公・冯自由等	（横浜）	1901.5.10
国民报	戢翼翚・秦力山 王宠惠・唐才律	本　社（东京）	1901
新民丛报	冯紫珊	本　社（横浜）	1902.1.1
新小说	赵毓林	本　社（横浜）	1902.10
湖北学生界	王璟芳・尹援一	本　社（东京）	1903.1
直说		（东京）	1903.1
浙江潮	浙江同乡会	本　会（东京）	1903.1
江苏	江苏同乡会	本　会（东京）	1903.4.1
游学译编	湖南同乡会	本　会（东京）	1903
汉声	（湖北学生界　改名）		1903.6
女子魂	抱真女士	（东京）	1904
民报	张继	（东京）	1904.11.26
汉帜	黄一铸	本编辑所（东京）	1906.阳1.25

① 朱庭祺：《留美学生界》，见《留美学生年报》(1910年第1册)。

音乐小杂志	李叔同	发行所(中国) 印刷(东京)	1906.1.20
法政杂志	张一鹏	本事务所(东京)	1906.2.20
新译界	范熙壬	本社(东京)	1906.10.1
云南	吴琨	本社(东京)	1906.10.7
中国新报	陈籽美	本社(东京)	1906.12.7
法政学交通社月报	孟昭东	(东京)	1906.12
二十世纪之支那	黄兴、宋教仁	(东京)	1906
复报	柳亚子等	(东京)	1906
鹏声	雷铁崖等	(东京)	1906
洞庭波	杨守仁等	(东京)	1906
直言	直隶留学生	(东京)	1906
医药学报	中国医药学会	本会(千叶)	1907.1.1
政法学报	沈其昌	(东京)	1907
学报	何天柱·梁德猷	(东京)	1907
汉风	时姓	本杂志社(东京)	1907.阳2.20
中国新女界杂志	燕斌	本社(东京)	1907.2
牖报	李庆芳 (留日学生)	(东京)	1907.3
大同报	权达	本事务所(东京)	1907.5.5
天义	何震	通信处 印刷所(东京)	1907.阳5
远东闻见录	李士锐	陆军部留学生 监督处(东京)	1907.6.10
科学一斑	(留日学生) 科学研究会	(日本)	1907.7.6
秦陇报	本社	同上(东京)	1907.7.20
粤西	本杂志社	同上(东京)	1907.10.10
四川	本杂志社	同上(东京)	1907.12.5
河南	武人·朱宣	(东京)	1907.12
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	恨海女子	(东京)	1907

大江报	夏重民等	（东京）	1907
醒狮	高天梅		
关陇		本杂志社（东京）	1907
夏声		本杂志社（东京）	1907
滇话报		本社（东京）	1907
晋声	景定成等	本杂志社（东京）	1907
国报	曹澍	本杂志社（东京）	1908.1.2
学海	北京大学留日学生编译社	本社（东京）	1908.1.28
预备立宪公会报	孟昭常（日本留学生）	本社（上海）	1908.1
江西	本杂志社	本社（东京）	1908.6.11
日华新报（五日刊）			1908
农桑杂志			1908
武学杂志			1908
海军	海陆军留学生监督处编译社	本社（东京）	1909.6.1
宪法新闻	李庆芳	（北京）	1909.8
宪法新志	吴冠英	（东京）	1909.8
中国商业杂志	陈籽辉（东京）	（上海）	1910.1.15
中国商业研究会月报	本会	本会（东京）	1910.1.30
中国蚕丝业会报	同会	本会（东京）	1910
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	李文权	（东京）	1910
中国青年学粹	本社	本社（东京）	1911.2.10

1907年在日本创刊的杂志共21种，较该年在中国创刊的杂志为多，出版的册数亦甚可观。① 不仅是在数量上占多数，内容方

① 《浙江潮》第8期的出版部数为五千册，又第1—4期三版共五千册，第5—6期再版共五千册。

面亦远较国内杂志为优，具有很高的启导作用。

在日本的中文杂志出版事业中，日本人或明或暗地加以援助。例如《译书汇编》的编辑兼发行者是坂崎斌，《国民报》的印刷人是船津输助，《游学译编》的编辑兼发行者是熊野萃，《民报》的印刷人是末永节等，这都是为了应付日本当局的烦扰而作出的安排。又《神州女报》虽在上海出版(1907 年创刊)，但其“本报特别赞成员”中有“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卒业，长谷川宇太治君”；又《浙江潮》及《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封面画像，似是日本画家之手笔，至少亦受到当时日本画的影响。(参见书前图版)

上述主要是与留日学生有关的杂志，此外，作为鼓吹革命思想的有力武器，尚有书籍和小册子。其中有年方 20 岁的邹容所写的《革命军》一书，因为这是革命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作者邹容和为它写序的章炳麟，都被下狱 3 年(所谓《苏报》事件)，邹容且死于狱中。但《革命军》一书却秘密地传遍天下。

与邹容并称的陈天华著有《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等小册子，将革命思想扼要地穿插入故事中。而且极秘密而迅速地流入中国(特别是湖北湖南)学堂和军营之中。这些书籍如何输入并且流布国内呢？曹亚伯回忆说：

> 斯时(1902 年)新化留日陆军学生杨源濬(字伯笙)，新自东京归，带有陈天华之《猛回头》七千册。①

又说：

> 予〔曹亚伯〕从容向吉安民众演说，并散《猛回头》、《警世钟》诸书。②

可见办法是多式多样的。

---

① 曹亚伯《自叙》，见《武昌革命真史》前编，页 4 。

② 同上。

四 清末留日学生与革命实践

对中国国内腐败政治深恶痛绝的留日学生，目睹新兴日本欣欣向荣的面貌，就再不能安坐书房中了。在辛亥革命（1911 年）以前的革命活动，与其说是留日学生起了重大的作用，毋宁说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而实践了革命。《支那革命外史》的作者北一辉说：

> 日本人对中国革命之贡献，非在于直接之物质援助，或妓楼置酒而争功者之个人交游；实际乃在于因日本国势兴隆及其思想所促发之中国国家民族主义。兹以不侫于上海亲见之事实说明之。当时出入于秘密机关者几乎全为留日学生，而参加袭击机器局之大军，其服式俱为结襟金扣。当听闻武汉突变之消息，即马上各自奔赴本省与同志汇合，率先打破各省革命之障碍者，彼于昨日仍为寄宿东京神田公寓而未经告假之士官学校学生。留日学生之制服甚至被称为革命服。①

北一辉又说：

> 南京同志之革命机关被击破之后，散发之青年仅因不结辫子而被杀者，多达一千人。大屠杀后之都城，腥风满目，实施戒严，晚上就连外国人亦不能外出一步。②

在中国革命的实践行动中，没有一次是没有留日学生参加的。正如北一辉所说，留日学生制服简直就是革命军制服。兹再举一、二事例说明之。1911 年广州事件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即有八人是在学中的留日学生：③

---

① 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页 82—83。

② 同上书，页 94。

③ 曹亚伯：《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见《武昌革命真史》前编，页359—360。

(人　名)	(年龄)	(学　籍)
喻培伦	26	日本千叶医学学生
林　文	25	日本大学学生
方声洞	26	日本千叶医学学生
林觉民	25	日本庆应大学学生
石德宽	26	日本警监学校学生
林尹民	25	日本陆军士官毕业
陈与燊	24	日本早稻田学生
陈可钧	24	日本正则学校学生

又在武昌起义(1911 年)后不久，即同年 10 月 30 日，在云南起义的干部(以昆明之陆军高级干部为中心)四十人之中，考其学历，留日学生竟达三十一名之多。①

(姓　名)	(籍贯)	(留日就读之学校)
蔡　锷	湖南	士官学校
李根源	云南	士官学校
罗佩金	云南	士官学校
殷承瓛	云南	士官学校
韩建铎	河南	士官学校
谢汝翼	云南	士官学校
李鸿祥	云南	士官学校
唐继尧	云南	士官学校
沈汪度	湖南	士官学校
张开儒	云南	士官学校
刘存厚	四川	士官学校
庾恩旸	云南	士官学校
黄毓成	云南	士官学校
刘祖武	云南	士官学校
顾品珍	云南	士官学校

① 《辛亥革命》VI，页 247—251。

张之贞　云南　士官学校
苋镛英　云南　东斌学校
杜韩甫　云南　东斌学校
赵复祥　云南　士官学校
曲同丰　山东　士官学校
杨振鸿　云南　振武学校，陆军测量部
王养生　四川　东斌学校
刘九畴　云南　明治大学(《云南》发行者)
李烈钧　江西　士官学校
方声涛　福建　士官学校
赵康时　湖北　士官学校
吕志伊　云南　弘文师范，早大政治科
赵　伸　云南　成城学校(《云南》编辑者)
席聘臣　云南　京都大学法科(《云南》编辑者)
张耀曾　云南　东京帝大政治科(《云南》编辑者)
姜梅龄　云南　士官学校(《云南》编辑者)

女子留日学生也参加了革命运动。同盟会最著名的女同志是秋瑾女士。赴日以前她已是一子一女的母亲，因痛愤于庚子(1900年)之变，卖掉簪珂作为学费，独自留学东京，为最早加入同盟会之会员。因"取缔规则"愤而归国，在上海办《中国女报》，以后非常活跃。1907年，徐锡麟暗杀恩铭，她被指为徐的从妹，被捕后处死，死前留下"秋风秋雨愁杀人"之句，照耀古今。为了纪念她为革命而牺牲，一份妇女杂志《神州女报》在同年11月创刊，该杂志其后造就了许多革命女同志。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自从与丈夫一同留学日本以后，即奔走革命。

我们相信，如果没有留日学生，则中国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是难有进展的。

五　成城学校入学事件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由学生发起的爱国运动，毛泽东以这个运动为界，划定在此以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在此以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①

五四运动有反封建主义及反帝国主义两方面。而在留日学生运动中也有两个重心。1902 年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可算是反封建性质的；1905 年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则可视为反帝国主义性质的。

1902 年 7 月，自费留学生钮瑷等九人，准备进入当时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成城学校攻读。但是校方规定，学生如没有清国公使的保证，则不准入学。而清国公使蔡钧拒绝在九名留日学生的入学证件上盖章。原因是在此之前谣传留日学生图谋革命，事态危险，蔡钧密奏清廷请停止派遣留日学生。留日学生认为是清廷计划阻挠自费学生学习军事，故集体闯进公使馆，逼公使盖章，但公使坚不答允。留日学生则坚持直至公使答允他们的请愿为止，否则不离开公使馆。公使馆报请日本警察将主谋学生拘捕，冲突益形激烈。

这是事件的梗概。以下试详细考查当时的报导资料。

李宗棠的《查办学生案日记》

李宗棠于 1901 年受两江总督之命，到日本视察学务，此后屡次受命到日本，前后至少有九次之多。他将每次旅行日本之事写成日记，题为《东游纪念》，共成六册。（此书扉页题字是日本长冈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页643—644。

护美子爵的手笔)。他可说是视察日本的专家。①《东游纪念》之二是《查办学生案日记》，此即李氏为了调查成城学校事件而在日本所写的日记。

李氏受两江总督的"密令"，在旧历7月10日(阳历8月13日，事件发生后第17日)自南京出发，7月18日(阳历8月21日)抵东京，住在帝国酒店。是日即拜访尚在留学中的旧友，又会晤长冈护美子爵、近卫(笃麿)公爵、外务省通译官小林光太郎等，展开调查。翌日，除近卫公爵等到来答礼之外，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留日学生十余人亦先后到访。他在《日记》中对这次会面，详为记录，似颇能以较客观的立场来看此事件，他并表态度说：

> 留学生等备述此次骚动之由，虽不能尽信之，暂且记之，以俟识者。②

以下根据李氏《日记》所录，略述事件的始末。

有关留日学生的报告

南洋公学教师吴敬恒(稚晖)是这一事件的主角之一，但算起来，他留学日本的时日尚浅。吴氏因听闻江苏、江西和浙江三省的自费留学生九名欲入成城学校，故写了一封长信，反复恳求公使予以保证。此外，他还建议由在学的学生五人联保一人，并声明会预先将保证书送到公使馆。当时适逢中国著名学者吴汝纶到日本视察学务，吴稚晖更往留学生会馆谒见，托他向公使恳求，希望迅速

---

① 实藤氏原书谓：和李宗棠一样写各种日本游记的中国人，未见有第二人。他除了出版游记外，更著有《日本学校章程》136种(共16册)，《日本小学校新令》(1册)，《日语类纂》(2册)等。有关他的著译，见《千仓旧主(李宗棠)著译书目》。——译者注

② 据原书所引《东游纪念》之二《查办学生案日记》转译，页码未详。——译者注

给予保证。吴汝纶将其意转达公使，这是6月9日（阳历7月13日）的事。过了五日，吴汝纶致吴稚晖的信中说：

关于保送五人入学堂之事，蔡公使已允可。惟嘱照尊议，取五人联保，与名单并送。谓是使馆旧章。谨奉闻，即乞赐交，以便转达。

吴稚晖获得复信后，立即走告希望入学的人。于是，章宗祥等20余人即准备好八封联署的保证书，由章宗祥代表送到小石川区第六天町的伊泽邸（实藤注：伊泽邸是伊泽修二的住宅，吴振麟是伊泽修二的女婿）。并从吴振麟那里亲手接到他的保证书。章带着这批保证书，翌日即到吴汝纶的寓所向他提交。但过了数日，一点消息也没有。

至21日（阳历8月24日）傍晚，吴稚晖再会吴汝纶，请代为催促公使。（吴汝纶已作允诺）翌日，吴稚晖又访留学生监督夏某。夏告诉他说："昨日已闻此事。公使已命参谋本部书写公文。"吴因此称谢而回，并以此汛转知希望入学各人。23日（阳历8月26日）傍晚，吴稚晖突然接到吴汝纶的来信说："顷接参谋本部复蔡星使书，谨奉呈一览。"该复函解释了拒绝入学的理由，所说如下：

敬复者。顷接来文。现由在京贵国留学生章宗祥等，保送江苏、浙江、江西自费学生九人，恳入成城学校肄业等因。准此。惟向例进学均由贵大臣保送，方准进校。今据来文，似稍与向例不符。仍请贵大臣亲行保送，以符向例，是为至祷。专复。顺颂
时祉。

再者成城学校，现值暑假之期。一俟新历九月初旬，再行开课。此时未便即准进学。顺此。附达
蔡钦差阁下

参谋本部第二部长　青木宣纯敬具

吴稚晖接此信后，深夜带同此信往访章宗祥、吴振麟、胡尔霖、



〔图43〕《文明小史》一书中所见的留学生会议

曾泽霖等，并与希望入学各人约于翌日往见吴汝纶。

〔6月〕24日（即阳历7月28日）上午，吴稚晖与保证人胡尔霖、庄君达、刘勋臣及希望入学学生钮瑷、李显谟、刘锺英、夏士骧、顾乃陈〔珍?〕、陈秉忠、许嘉澍、吴荣鬯、董瑞熙、张懋德、闵灏、陆辅、陆爽、俞亮、沈纲、段彦修、吴宗椿、吴宗杰、沈觐恒、沈觐鼎、孙揆均等一同往访吴汝纶。吴汝纶早已明白他们的来意，故一见面即说道："参谋本部不答允，公使亦不允亲自保证。我亦无力左右公使。"众人听后均十分愤慨。向吴汝纶告辞后，即径往公使馆，打算面谒公使。众人既抵公使馆，首先会晤专责学务的王宗炎君。王责问各人何事结队而来？众人便详述原因，要求面谒公使。王遂将事情向公使转达，但公使说有要事，不能接见。王虽委婉拒绝，但众人仍坚持要面谒公使。王氏只好再为转达，但一直等不到答复。过了一会，公使馆的仆役到会客室，要求众人离去，谈话至此决裂。于是，公使馆中即忙于打电话，请参谋本部的藤青少佐及外务省的小林通译官到来解围。小林来到公使馆，多方斡旋，但终亦不能帮助解决，遂告辞而去。如是者双方僵持对峙至傍晚五时，但仍不获公使接见。不久，吴汝纶到来，尽力调停。但因双方仍坚持己意，无法解决僵局。留学生更声言如不获见公使，决不离去。小林氏亦再度折返，多方劝解，且谓一、二人面谒即可。留学生则认

为若许一、二人晋见，为何不可一齐面谒。吴汝纶与小林通译官为传达双方意见，进进出出，不下数十回，已到声嘶力竭、舌敝唇焦的地步。

至七时半，公使急召日本警察到场，请求保护。事情因而更趋恶化。（原注：以后两段情节不便记录。）不久，警察来到公使馆，连夜将吴稚晖、孙揆均两孝廉逮捕带走。（以上之事，与昨晚小林君所述大体相同，附记。）

据闻，二人被警察带走后，警署署长非常谨慎处理。并将二人送回寓所。但吴、孙两人视此事为极大耻辱，不肯退回寓所。到了翌日（6 月 25 日，阳历 7 月 29 日），两人才勉强同意离去。

是日下午，吴氏又往警署，抗议被捕之事，小林当时亦在场。署长对吴说：

> 逮捕的事，并非日本警察的主意，而是贵国公使的命令。你们何不向公使责问？

吴氏非常愤慨，表示要前往公使馆申论，小林氏劝解他说：

> 公使馆明令：三日之内，留学生不准到访。还是过三日后再去吧。

吴氏无计可想，只好折回。

又据所闻，当吴去警署的同时，留学生十四五人（四五十人？）风闻使馆召日警拘人之事，群情激愤，直闯公使馆，要求面谒公使。当进入公使馆时，即与警察发生口角，先去的 20 余人虽没有被捕，但后至的 20 余人则被带至警署，略受盘问之后，即行释放。

翌日，即 6 月 26 日（阳历 7 月 30 日），是皇帝万寿节，吴氏又与 20 余人到公使馆。当时使馆前有警官二三十人列坐，禁止任何人等进入。吴氏向守门人表示要入使馆，但遭拒绝，遂声言明日独自再来。27 日下午，吴君果独自前往，但又被警察及守门人拦阻。自此之后，吴君周围，都有巡警跟踪。6 月 30 日（阳历 8 月 3 日）范

源廉留吴氏一宿，但整晚巡警都守在门外。7 月 2 日（阳历 8 月 5 日）早晨 6 时，突有一警官到吴稚晖寓所，通知吴氏与孙揆均二人须立即到警察局，又命巡警三人护送，把吴、孙二人带至警视厅的会客室等候。此时，警视厅的主事菅井诚美出示内务大臣内海氏的命令，上面写着：

> 自清国来本邦居留之吴敬恒、孙揆均二人，因触犯妨碍治安之例，饬令离开本国。特令彼二人于明朝六时，与巡警同乘火车至神户，即日登轮返国，此令。

吴孙两人接此递解令后，曾请求延期，但不获准。菅井解释说："此事纯因贵国公使的请求，我国警官才到公使馆逮捕留学生，绝非我国要行使强权。你们不要弄错，请立即离去吧。"听到这个回答后，留学生骚动起来。于是，秦毓鎏、张肇桐、吴柒鬯、胡克猷、杨我江、夏士骧、许家澍、钮瑗、顾乃珍、沈宏豫等联名写了一封长信，上书公使。这封信在 7 月 9 日（阳历 8 月 12 日）寄出。另外，他们为了得到明确的答复，更计划一同往见公使，但怕引起公使猜疑，不愿接见，故仅派秦、张二人代表去公使馆。二人走到了公使馆，果然碰上警察的诘问。于是道明来意，谓想见公使。司阍的人答说公使拒见来客，二人遂转面请见王监督。

正当秦、张二人与司阍人争持之间，刚巧公使随员张季生出来。秦、张二人马上抓着机会，对他说明请见公使的原因，张听后转身入内，过了一会儿出来说："诸位的信尚未收到。九人入成城学校的事，公使断无不许之理，但要等参谋本部的福岛（安正）回来商量后才可决定。吴、孙离境的事，是依日本法律而行，与我馆无关。"

张肇桐听后不禁大怒，并与张季生争辩起来。张季生说："公使今日因有要事，不能接见。如有话说，下次再来吧。"秦、张二人

无法，只得辞去。

11日下午，顾、钮两生又到公使馆，会晤王监督，但所得到的答复与张季生所说的相同。

12日下午，秦、沈、夏三人再到公使馆问消息，亦未获接见。司阍人对他们说，明日再来当会有答复。到了13日，一同上书的留学生便齐集一起，向使馆出发。且由秦毓鎏先行探路。因有警察把守，不许秦进入。不久，司阍人走出来，问秦为何事而来？秦答谓想见公使。司阍人说："公使不见客。"秦追着说下去："那么谒见王监督可以吧？"司阍人没法，只好让他入内，且说："公使早已说好，即使学生到来，也不会接见。那九个人决不保证。学生的信，亦无须回复。"秦氏进入王监督的办公室后，王监督则向他多方劝解。过了不久，九人亦随后来到，说一定要见公使。

彼此往来争论，直至黄昏，还不能见公使，气氛更形恶劣。于是公使馆向日警请求派出警官二人，并带同警察七八人到来应付，先将秦带走，其他各人随后亦被带去。出了公使馆之门，警察即命各人解散回家。但众人不服。警察于是将秦等带回警署，软禁于会客室，又拿出饭及汤叫他们吃。坐了一会，一位熟谙中国语的警官，拿了一张纸来，要各人写下姓名。不久，秦被带入署长室。署长给他纸笔，要他自述闯入使馆的缘由。署长看罢他的自辩书，那位懂中国话的人传话说："署长对你们的事很了解。你们好好地回去。今后若去公使馆，不可超过三人同行。"秦出来后，日警又召胡〔胡尔霖——译者〕及其他人等亦依次入内。经同样方式的处理后，众人即被释放返家。当时已过11时矣。

以上是五日前所发生的事。李宗棠的日记还指出自此事发生以来，留学生群情激动，愤慨异常，并认为此一纷争未必容易了结。

蔡使要求日本警察入署拘捕学生始末记

当此事件发生之际，因戊戌政变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正在横滨主编和出版《新民丛报》。这份杂志，不但受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的欢迎，而且还经海路秘密运回中国，被知识分子争相购读，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杂志。

《新民丛报》在7月1日（阳历8月4日）出版的第13号中最早报导此事件。在论说栏中，刊载了梁启超所写的《论学生公愤事》一文。同期的"国闻短评"栏中，有《蔡钧蔑辱国权问题》一文，而"余录"栏亦有《蔡使要求日本警察入署拘捕学生始末记》的报导文字。这一期的《新民丛报》可以说是成城学校事件的特刊。

《新民丛报》在以后几号中，还继续报导此事，今细列如下：

第14号（7月15日发行）

《蔡使要求警察入署拘捕学生始末记》(续)

《第二次要求警察入署拘捕学生始末记》

第15号（8月1日发行）

《敬告留学生诸君》

《上蔡公使书》

第16号（8月15日发行）

《论留学生之责任与其箴言》

第17号（9月1日发行）

《留学善后事宜质疑》

将《蔡使要求日本警察入署拘捕学生始末记》与李宗棠日记的《留学生报告》比较，所记的事情始末虽大同小异，但有关留学生最初闯进公使馆日期是6月24日，即阳历7月28日的记事，则颇有不同。尤其是以下的两段情节，李宗棠没有记录，而《新民丛报》所述则十分详细。原文如下：

二十四日，阳历七月二十八日

（吴敬恒等廿六人往见吴汝纶，不得要领。众人愤慨辞出，前赴使署）

至使署，因闻主张学生事者，为王文案雷夏。吴君（稚晖）遂告阍人曰，我们要见王雷夏，王老爷。阍人曰："在山下儿住。你们去找吧。"

至王文案室。王君兼教读，见吴君等至，诘众人之意。具告之，并恳转告公使，愿赐一见。王君入，久之出曰：

"钦差告诉你们，进成城学校的事情，已经碰过钉子，万万不能再写信去。过几天，钦差当面见了参谋本部的人，再给你问一问吧。可是成不成，不能一定。你们要见钦差。钦差说，可以不必。"

吴君等益悲愤，再反复参谋部复函，觉京卿所言，与王君所述离题太远，愈弄愈错，因思非见公使，不能得要领。遂坚求一见公使。

王君云："你们一定要见，兄弟再进去说，请少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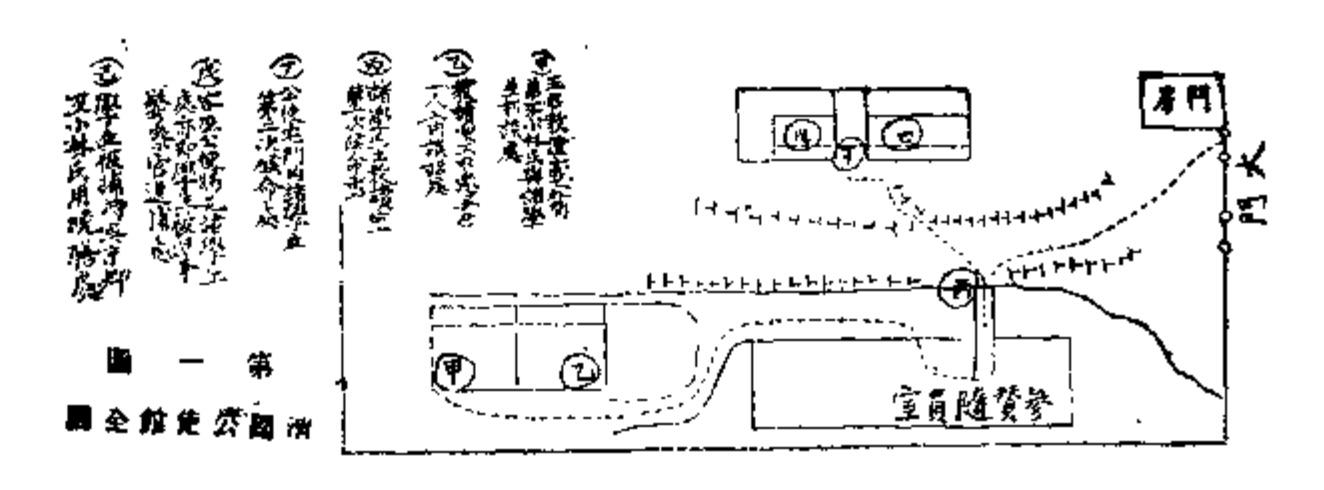
斯时十二时向近，天气甚热，腹饥不得食，静待之。三时尚杳然，无复音。众皆面面相觑，同人均焦急。吴君劝诸君少安，云，"王君既允，决无不复之理，公使事冗，或未得暇。"又久之。有身着洋式号衣者，怒目疾视，阔步入室，操东音，不知云何，其人乃使署服役者。公使因洋人有积威，中国官吏皆崇拜不已。拟令其人骇吴君等出。众皆哂笑。列坐不一顾。彼技穷乃去。

少顷，又来三西装者，戎服佩刀。参谋部之藤青少佐也。绅士装者，外务部小林翻绎官也。短身曲背，发半秃，微有须，口衔雪茄烟，尾小林氏后者，不知其为谁。入门各为礼。小林氏能操北京语。众人详告以故，又出参谋部复书与阅。小林氏谓："学生保送学生不行。要进成城学校，不必要公使保送，就是做买卖的亦好。"并嘱诸君取入校人名单。诸君写交。小林氏阅毕，探囊出一纸，载五人名，皆即九人中所有。指谓诸君曰："这五个学生，是湖南监督胡先生交给我的。我因为福岛少将没有回国，参谋本部必不能答应。我想现在又添成九人，是一定要等福岛少将回来再说。福岛少将回来，兄弟和你们公使同吴先生，终要竭力想法子。"

吴君等闻小林氏之言，虽若可感。然再反复参谋部复函，觉离题益

远，愈弄愈错，愈说愈奇。遂觉非见公使不能剖白。向小林氏亦坚称欲见公使。

小林氏持众人名单代达。数往返。再后，阍者请入，众尾之行，出随员室。至公使宅左〔参看图 44〕。小林氏迎谓曰："公使不肯见。兄弟再三说，只允一二人。"诸君候久。必欲同一见，腹饥口渴，僵立树下，持同见之意甚坚。小林氏不悦曰："你们不听我的话么。你们公使馆的事情，兄弟实在无能为力。那么，我就去了。"



〔图44〕清国公使馆全图(《新民丛报》第13号所载)

说明：(甲)王君教读室之外间第一次小林氏与诸学生相谈处

(乙)教读室王君邀吴君一人入内谈话处

(丙)诸学生出教读室第一次候命处

(丁)公使宅门内诸学生第二次候命处

(戊)客座公使赐见诸学生处亦即学生被日本警察官逮捕处

(己)学生被捕时吴京卿及小林氏用晚膳处

遂乘人力车径去。诸君无可如何。徐至公使宅。伺于客室门外。冀公使得闻或出见。久待无影响。

时已五时，吴京卿急临。谓众人曰："你们这时候午饭没吃。到我寓所去吃午饭吧。公使既然不肯见你们，你们有什么法子想呀。"诸人执欲见，小林氏又来。乃言："进学校的学生，公使一定同他们想法子。你们要见，就请一两人去见见吧。余下的，过两天再见。到底如何？"诸君云："学生到此不易。公使既能见一二人，余人同见，似亦无妨。若来而不

见，见面尚如此之难，即隐为不肯送学之代表。但见一二人，于事本可。今所以欲赐伺见者，即望公使慨然允许，以表真爱学生，如此而已。”

京卿无奈，偕小林氏及参随二人同入。其时电灯荧荧，钟记六时。前所述短身曲背之东官，偕一警署官来。屈指数人数而去。久之，京卿负手耸肩，由屋后怏怏出。漫告曰：“钦差找不到。”又摇首曰：“钦差找不到。不知那里去了。”诸人为之失笑。

须臾，小林氏亦从屋后来。谓曰：“公使勉强见你们。可是，你们不好有一点无礼。”众设誓：“如稍无礼，即请小林先生曳之出，处以死刑。”小林氏笑颔之。遂以吴京卿先入。

七时三十分余，启半门。京卿与小林氏夹门两旁，诸君鱼贯入。先欲坐于洋客厅，忽计不可。又开对面华式客座。命毕入。入者共二十有六人。所陈椅杌不能容。诸君遂以东礼沿南窗席毡坐地上。遵小林氏旨，甚整列。至被捕始末，未移尺寸。附图注明如左(参看〔图 46〕)

列坐甫定，公使入自室门。身着湖色纱长衫，枣红铁线纱马甲，仆从纷沓，警察守门。馆中参随各员立室门外。观者如堵。吴京卿、张随员及小林氏，雁行参立。公使睥目皤腹。面发紫色。一足方逾阈，即厉声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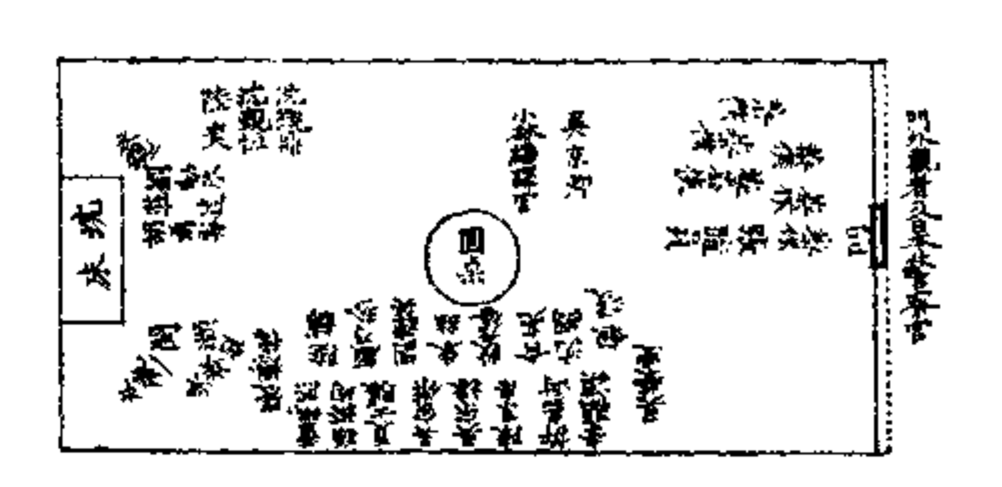
〔图45〕《文明小史》一书中所见的清国公使和留学生

“你们要见我，有什么话说。赶快说。”

诸人皆折腰俯首，同声曰：“请钦使坐，容学生等容容禀陈。”

公使曰：“不必坐，说几句，就得咯。”

京卿亦云：“说几句，就好了。”



第二圖　中歷六月二十四日即日歷七月二十八日晚間蔡公使接見諸學生之圖

〔图46〕蔡公使接见留学生图(《新民丛报》第13号所载)

吴君长踸进言曰："前求公使保送自费学生入成城学校。蒙示参谋本部复函,已邀允准。惟函内云。留学生自保学生，与例不符，仍请贵大臣亲行保送,以符向例云云。不知此次钦使,何以不即亲送。"

公使云："啊！你们这话从何说起？那一天,吴先生,哼，吴大人，拿了你们的证书送进来。本大臣马上就送参谋本部去咯。这是参谋本部不答应。有什么法子可想。"

吴君曰："此必因钦使文内叙明留学生保送之误。只须更正之可矣。"

公使曰："向来保送学生,终要有本国督抚的咨文。或者有原籍地方官的印结才可保送。你们既没有咨文,我这儿又没有办过这种案卷。我如何能开这个端。这会子,吴先生,哼,吴大人来给我说：'咱们政府屡次说述，自费学生不可再送。'这儿福岛又这么说。我很为难。我同吴先生,哼,吴大人再三商量,我说：'既是他们在校的学生,五人互保一人,该靠得住。姑且给他们碰一碰。'谁知道参谋本部一定不答应。啊！你们要知道,本大臣从你们把保证书送来,就马上给你们办,又没有一点儿耽搁。这时候参谋本部不答应,其权操之于他,如何怪起我来。"

吴君等闻之,瞠目相顾,又可悲，又可笑。默计参谋部复函，但觉离题已不知几千万里。愈弄愈错，愈说愈奇。愈求开通，愈加实窒。只能朗诵参谋部复函,以冀一悟。曰：

"敬复者,顷接来文,现由贵国留学生章宗祥等,保送江苏、浙江、江西自备资斧学生九人,愿入成城学校肄业等因。"

因公使言福岛少将云自费学生不可送，故吴君于“自备资斧学生九人”诸字再诵之。乃续诵云：

“准此。惟向例进学，均由贵大臣保送，方准进校。今据来文，似有稍与向例不符。仍请贵大臣亲行保送，以符向例。仍请贵大臣亲行保送，以符向例。”

诵毕，吴君曰：“参谋部何尝不准，惟因钦使之不送耳。”

公使曰：“这是什么话。你们查去就是咯。本大臣何尝亲自保送一个学生。这是参谋本部的人不通汉文弄错的。”

公使说至此，皆粲然。小林氏默然。吴君骤不知所对。乃笑曰：“请去忌讳，以告钦使。如果因参谋部汉文不通，现小林先生方在座，彼实外交官，肯代参谋部担任汉文不通之咎，学生等即当俯首无词。”孙君（揆均）亦曰：“参谋部既误，钦使即不应不驳。当时甚可备文辩明。何以漫然即交吴京卿，转示学生，借词搪塞。”公使变色疾视。孙君又曰：“堂堂大日本国，难道参谋部于区区汉文，果真不通乎。”公使默然。小林氏曰：“可以不必说咯。这九个学生，参谋本部虽不肯，好在离开学还远，我同你们钦差及吴先生，等福岛少将回来，终要同你们设法。”吴君曰：“参谋部已准。何以云不准。难道参谋部果不通汉文乎。”小林氏笑曰：“错是不错，大约保送二字，平日总写咨送。”语未毕，吴京卿曰：“好了，好了。不要说了。”吴君恍然，知保送者下对上之词，咨送者平行之词。此次公使所行之文，本为咨送。惟使馆文案所叙事由，不曰现有留学生钮瑗等九人愿入成城肄业，乃曰现有留学生章宗祥等保送留学生九人。宜参谋部疑公使令留学生向参署直保，有意亵慢，遂承上文而言，一则曰均由贵大臣保送，再则曰仍请贵大臣亲行保送。其词简严，皆由自取其辱。乃公使不察，一见保送二字，遂引为可耻，至诿其词曰参谋部不通汉文而又搁其事曰本大臣从来不曾保送过一人。又知此意无可发泄，因作不耐烦之语曰参谋部不准。吴京卿从而和之，小林氏因而遂之。参谋部不准一语，竟成铁案。而且大人先生之护过，每惟恐不力。中国南面坐而冤抑乡愚者，虽投恒河沙不能计也。又心知近日党派之争，少年盛气者流，多不满于腰金衣紫之徒。于是无可奈何，乃正言以告之曰：

“方今国帑奇窘，官费学生，不易多派。有私费学生，愿出游学，以补不足，正应竭力提倡。至于武备学生，我国重文轻武，无人肯当。幸而现在少年中，明白者日多。知各国皆以陆军为主义。国家失其爪牙，则无能存立。又东方文胜，积弱成痿，非救之以陆军严肃之教育，不足以振动文气。与列强齐抗。武事虽为国家之务，然日本陆军之组织，原系征兵。既习陆军于日本，即不可不注意于征兵之组织。将来中国欲与各国齐立，非改征兵，无可言武事。既欲注意征兵，则自费习武，即可为征兵之基础，宜鼓舞尽力若何。至公使所责，宜在原籍请领咨文。钦使岂不知我国情形乎？督抚衙门之深严无论矣。即州县官衙门，亦岂易求乎。故皆图其便利，不如远来海外，径求公使。”

语至此，众曰：“现在官场夤缘奔走者太多。”公使曰：“这恐未必吧。”吴君曰：“这不能为我国讳。现在官场，夤缘奔走之人，所在皆是。学生等亦有能向督抚乞得咨文。所以不屑者，近顷出洋之风甚盛，官场每有请咨游历，逗留旬月，便充洋务人员者。将来捐免出洋，捐免卒业之事，又难保其必无。故不愿在官场请咨，其苦心当为公使所深谅。”

公使曰：“可不是？我深知道你们自费生的难处。我亦很愿意你们来进学堂，长些学问。这时候国家艰难的时候，你们有点学问，自然能同国家出力。所以往常学生们来请见，我终见他，同他详谈。我想学生们常常来，亦可考察考察。好的就给奖励，不好的我亦可以知道。所谓以人事君的意思。”

诸君曰：“今日学生等来求见，自午后一时至八时，始获赏见。殊觉困难已极。”

公使曰：“如果你们分着来见，亦何妨见见，但是你们这些人来，我如何能见。”

吴君曰：“学生等别无所求。但求咨送入校，五人互保，已蒙钦使允行。此次愿进成城学校之九人，因欲求公使迅赐重行咨送。即以后续来者，亦当照五人互保例，俾能入学无阻。”

公使曰：“我终没有什么不肯送。倘参谋本部不肯，我亦没有什么法子。”

吴君曰："学生敢冒忌讳，以告钦使。钦使若于当送之学生，任参署不准，即为尽力。如此亦无贵有钦使，但有钦使之贵价已足。学生闻诸古训，使臣者折冲樽俎，苟有不便，争之惟力。今日虽有小林先生在座，不便深言，然大日本国既知与我国有唇齿之谊，必望我国有人。我国时事已艰，交涉匪易。倘有应争之事，定当随事力争。就切近而言，即与大日本有所争执，必当以理力争，无所退让。争之不可，宜明进退之节。讽励盈朝，即可翛然远引，以让能者。"公使闻此，勃然急应曰："那很好，我服官三十年，什么么官都做过。你们当我真恋栈么。本大臣因天恩高厚，没有法子。罢了，你们在这儿不是说话，尽是抬杠。这算什么意思，去年就有一班学生到公使馆，竟把公使混骂。本大臣以前做过镇江道，去年学生内有一个姓朱的，还是我的部民。我在镇江的时候，他还止十八九岁。他那一天一见，就当了面叫我和甫(蔡钧的字)。"

诸君曰："我们是来求钦使咨送入学的。并且守了小林先生之约，一点不敢无礼。"

公使曰："骂是由他骂。本大臣从前在德国，在英国，在法国，常看他们的新闻纸。连他的总统都要骂。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

吴君曰："钦使不去官，因为天恩高厚，学生便不敢附和。"公使大怒曰："吓。天恩高厚，你还不以为然么。还有什么话对你说。"吴君曰："请公使毋怒。以我国圣贤古训而言，普天率土，谁非蒙天恩高厚者。公使乃尽职之官。苟能尽职，尽人可为，岂有高厚之天恩，独私于公使之理，今钦使因为公使，而念天恩之高厚，似朝廷以公使一官为天恩，独高厚于钦使，颇非朝廷之盛德。故学生不敢附和钦使之言。"公使闻之，怒虽甚，姑默然。

吴君又曰："诟人骂人，虽于路人不可，何况公使。至于极言谏诤，时当叔季，正当提倡此风。即敬谨于事君。所谓忠焉而诲，勿欺而犯。孔子之言，断非给人。孟子又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我国滔滔皆贼，故国事日以颓败。学生等虽不获谏诤于朝廷，而就见长者，亦不敢唯阿取媚，以随人后。故钦使当为诤臣，学生于钦使，愿为诤学生。此次吴先生来日考察，亦何等任大责重，尚冀钦使与

吴先生，痛洗官场敷衍旧习。即如留学一事，所来学生，不患其意气过高，但忧其品行卑劣。时势至此，正不宜敷衍谬论。藏头盖尾，为无谓之忌讳。《同文沪报》曾载袁总督之言，虽不能审其虚实，而议论至为平允精确。其言曰：'有人问袁督，蔡使以密书阻留学，其事信否。'袁督云：'其书大抵不实。至留学一层，中国尚无学可学，不能不借资日本。若忧至日本将浸灌于平等自由之说，则岂知平等自由之理，欧美实以之立国，即禁学生不外游，能禁译书不内销乎。吾意平等自由之说，苟利用之，安知不有利于国家。吾所虑东游学生惟冶游饮博，为可念耳。'以袁总督之言验之，某公子则为踰闲之行，某军人等则好窥邻之女。留学生名誉之堕地，将由此辈。钦使极当注意。不必全于开敏之士，深加遏抑也。"

当吴君畅陈右说，公使方有所思，如不欲闻。吴京卿小林氏并止吴君，勿于题外着议论。吴君唯唯，遂申前说，欲公使许三事。其一，嗣后学生有愿入成城学校者，苟得妥实留学生五人互保，公使即应咨送。其二，既已咨送，日政府无故咨驳，即应力争。其三，力争不应，要之以辞职。小林氏以为辞职之言，非学生所当出。吴君曰："诚是。然以先生之明，不难知我国官场之习。仅仅言力争，安知公使之左右，异日并未力争，不谬以力争再三为对，则学生于何取证。故求公使以辞职相要者，特欲推而至于极，以表公使之能为学生尽心耳。且以今之公使，淡于荣利，为非常人，故敢以辞职为讽。若彼顽钝无耻之公使，固不欲以此言聒其耳也。"

语未终，见有人自后曳公使之衣者再。公使乃发盛怒，厉声曰："你骂我顽钝无耻，我就算顽钝无耻。你瞧不起本大臣，便是瞧不起朝廷。本大臣还能同你们说话么。"恨恨拂衣而去，口尚厉声呵骂，其语不可辨。①

此事的下文续载于《新民丛报》第14号。内容则详细记录了公使大怒走出室外后，留学生们仍然态度强硬，不愿接受吴汝纶和小林氏的调解，而终于被日警带走的事。

① 《新民丛报》第13号(1902年7月)，"余录"栏，页107—120。

吴稚晖的自杀未遂

《新民丛报》第13号上，刊登一段《附记一则》的文字，记载吴稚晖被日本政府命令于7月3日（阳历8月6日）离开日本，试图自杀的消息。这是7月3日早上的事，杂志上则注明“初三日下午记”。尽管这一号印明是7月1日发行，从其记载了7月3日的事来看，则这杂志比原定发行日期稍迟出版，自可了然。其所记的事如下：

吴君之被逮也，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梦，起国民权利思想。乃于初三日午前六点钟警吏拘引出境时，自沉于河。以救获苏。吴君非厌世主义，欲一瞑以谢责也。亦非有所畏而自戕也，欲以此示不为奴隶者之模范而已。呜呼！留学生其念之。呜呼！国民其念之。吴君被告后，友人检其衣底得一小包，封题曰“其言也善”四字。内一书云：

信之以死，明不作贼，民权自由，建邦天则。削发维新，片言可决。以尸为谏，怀忧曲突。唏嘘悲哉，公使何与。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

吴敬恒绝命作此。敬恒所以就死于大日本国者，奉劝大日本念唇齿之义，留学一事，不可阻碍。如欲兴我国家，尤以顾全私费学生之便利为最要。若专取现在政府之信用，恐未得其益，先受其害，因我国皇上方蒙难，官场之腐败为二十四史所少见。若大日本国官人久与相处，与之俱化，则支那之利益不可得，而大日本之良风隳矣。大日本良风一隳，将胥黄种人尽奴于白种人，岂不可哀矣哉。

又敬恒一人已伏其罪。一切被连引之孙君等，宜可复其自由归国之权。　光绪廿八年七月三日，即明治卅五年八月六日。①

---

① 《新民丛报》第13号（1902年7月），“论说”栏，页7—8。

留学生等致蔡公使书

吴稚晖、孙揆均离开日本后，留学生再起骚动。同月九日（阳历8月12日）秦毓鎏等十人写了一封长信，致送公使。信的全文，见于李宗棠的记录，而《新民丛报》亦刊载之。其文如下：

钦使大人节下

日前迭来晋谒，未睹钧颜。不数日间，乃日人遽来干涉。有吴、孙二君退去之命。诸生惶恐，莫知所为。不惴冒昧，敢竭愚忠，为左右陈之。

吾国晦盲否塞，孱弱极矣。内乱外侮，环视迭起。兵戈死丧之惨，牛马奴隶之悲，中原四顾，为期匪遥。我生不辰，罹此巨厄。嗟乎，上下之人，亦可以知所鉴戒，急图救死矣。今同国之人，来寓斯土者，上有钦使，下有学生。为钦使者，当如何竭诚尽忠，以称其职；为学生者，当如何相勉相劝，期各致力，以报其国家。故设钦使漠视学生，以学生为不足恤，知己之可以为力而不为，或为焉而不力，是钦使负学生；负学生，即负国家也。设学生薄视钦使，以钦使为不足恃，知钦使可以为力而不请，或请焉而不坚，是学生负钦使；负钦使，即负国家也。钦使不愿学生负国家，学生亦岂欲钦使负国家哉。

乃知事有大谬不然者。吾国留学生欲学陆军，必入成城学校。入成城学校，必钦使咨送，是成例也。迩来有私费学生数人，求请咨送未蒙俞允。

窃谓私费留学，宜蒙奖励，乃反遭摈斥，是何意耶？贤者用意，良非下愚所知。意者节下驻扎此邦，职重外交，故学生入学一事，可置之不问乎？然已入成城诸生，皆经咨送者也。抑官费学生，有王公大人之恃，当垂青眼，私费学生，下贱者多，宜遭白眼乎！然成城学生，未尝无私费者也。抑陆军定额节下预有成算，成城诸生，学成而归，已足干城之选；余者可概置不理乎？抑后来诸生，均有宿仇，不宜辅虎以翼乎？数者均小人臆度，君子谅不出此。然可以为力而不为，学生等疑惑不解者一也。

吴敬恒孙揆均等，亦留学生耳，热心爱国，不忍坐视，于是有联名环

保之议。经吴京卿之请，而承节下允准。惟不愿亲自保送，径以环保诸人向参署保送，该署因与向例不符，即行驳回。而节下不图更正，延搁至今。夫始不肯送，继因不得已而送。乃又不自保送，致参署照例驳回，而又不思更正。种种阻抑，学生等所疑惑不解者二也。

吴孙二君因此人署请谒，面陈衷曲，时因钦使适有要公，无暇接见。吴孙等忍饥以待，自午至夜，无有倦容。既得赐见，坐地陈辞，未尝失敬。至力争辞职等语，缘节下非喜誉恶直者流，故不自居于失言之列。况父有诤子，君有诤臣，古人以为美谈，载之史册。吴、孙之言，何以异此。上足追古人之遗风，下足矫当今之谀习。乃节下不察，始而忿不可遏，拂衣而去；继而电请警察，押入警署。夫学生本国之学生，警察外国之警察，借外人之威力欺本国之学生，稍有人心，当不出此。而节下竟毅然为之。是学生等大惑不解者三也。

翌日复有学生二十余人，相率求见；而警察林立，如临大敌，被捕者复有数人。辱士辱国，莫此为甚。数日前，日本政府逮命吴孙二君退去，警察遮护，无异虏囚。呜乎！逐吴、孙二君，辱学生，小事也；钦使与学生交涉，而日本政府强行干预，失国权，大事也。使退去之令，出于钦使之请，是钦使惟恐国权之不失，而求外人夺我权也。是惟恐学生有志，惟恐学生热心，已无辞摧残热心有志之学生，假手于外人以偿私志也。是惟恐有志之学生忠君爱国，君祚长，国势强，已不能为贪官污吏，故挫辱之使无所成也。是惟恐热心有志之学生，国家必爱护之，辱士辱国之臣子，国家必惩罚之，诬以国罪，治以国法，无从为计，故不惜失国权而使外人治之也。呜乎！如是者，尚得谓人乎？贤明如节下，岂忍出此！是必外人无故而干预也。然事经数日，岂不知之，而漠不动心，一无所谋，是学生等大惑不解者四也。

要而言之，学生欲入成城学陆军。学生未尝自暴自弃以负国家也。环求咨送，坚请不已，未尝藐视钦使，以负国家也。吴孙二君不忍旁观，始而恳求，继而谏诤，终而受辱。是厚待同学，重视钦使，热心爱国者也。而节下始则不允咨送。继则不肯亲送，是失职也。负学生负国家也。不责己之不尽职，不咎己之不纳谏，反召外国之警察，捕本国之学生。及学

生受无故被逐之大辱，仍袖手缄默若不闻。是大负学生，大负国家也。

前事往矣。节下忍以之待学生者，学生决不忍以之待节下。来者可追，今学生请之，愿节下允之。钦使职重外交，非专为留学生一事而设；然钦使自有照料留学生之责成。留学生万无要挟钦使之情理。若钦使不失其责成，学生何从而要挟。钦使苟失其责成，学生有恳请之实，自不得避要挟之名。此次钮瑗等九人，尊谕本云徐图转圜，但徐而又徐，久之又久，吴、孙二君既冒昧而受巨辱，谅节下必不因此而食前言。仍请照例咨送。俾遂钮瑗等入学之愿。书至此，又见第二次尊谕。因有革逐劣生，辞退狂生在内。故碍难咨送云云。夫无论革逐辞退不当其罪，改过即为无过，古圣明训，夫人知之。即不邀宽宥，而九人中除狂劣诸生外，可不容波及。仍请照例咨送，至以为祷。以正吴、孙等急迫之罪，以明节下爱惜抚慰之心。此毓鎏等所恳求者一也。

吴孙等初次求见，有力争辞职等言，是规谏非谩骂也。尊谕称之曰谩骂，盍举其词，以服人心。伊等多名列胶庠之士，或登桂籍，或任方州，非若贾竖贱贩者流，左弃筐筥，右绾组符之比也。况为入学之事特来请谒，以礼列坐，长跪谨对，毫无决敬之容。而尊谕称之曰突入、曰闯入、曰索送、曰要勒。非拟稿者措词失当，即深文周纳，借曰有之。而使馆为治外法权之地，何损于日人，而日人干预之耶？至道上行走，通衢阛达，区区数十学生，岂实不能容。而日本政府罪之曰妨害治安，窃所不解。即曰妨害，数日之内，前后趋谒者，不下百人，吴、孙所识者，仅居其半，而独以妨害为二人罪，是何以故。虽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此列强外交家之要诀也。彼日以进，我日以让，得寸则寸，得尺则尺，涓流不息，将成江河。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惟有仰求节下具文驳诘，声明前事。嘱其收回成命，彼如不允则力争，力争不允则要挟以辞职。钦使所以尽其职者在此，所以报国恩者在此。不然，学生求见钦使，彼即下令斥逐，求见钦使者益众，被斥逐者亦益众，势必尽逐而后已。学生既尽，将继之以商人，商人既尽，将继之以钦使。缅想前途，怒然心伤。因循任之，势必至此。学生所恳求者二也。

所陈四惑，所求二事。容后趋谒台从，恭聆训诲。当言不言，学生即

为负国之民；当争不争，钦使即为负国之臣。据理而谏，以身徇道，当仁不让，虽死无悔。呜呼！鬻拳要君，左氏美之；言论自由，文明公理。国步艰难之日，非阿附谄谀之时矣。专肃。敬请

崇安。统希

荃照不宣。

留学生　秦毓鎏、张肇桐、
吴荣鬯、胡克猷、杨我江、
夏士骤、许家澍、钮　瑗、
顾乃珍、沈宏豫同上言
七月初九日①

当时对此事件的批评

《新民丛报》除了对此事热心报导外，还不时刊登评述的文字，如《蔡钧蔑辱国权问题》即为一例。文中说：

蔡钧何人也，其名岂足屡污我《新民丛报》，然而竟相污至再至三，是亦蔡钧之好手段也。

六月二十五、六、七日，有蔡钧与留学生纷争一事，其详别见本号"余录"门中，兹不赘述。此事之起，由蔡钧不肯送留学生入学也。日本例，凡入学校者，无论本国人外国人，均须有人为之保证，亦属情理之常。蔡钧者，文明之敌也。恨不举东京留学诸生，一旦而驱之出境。其于官费生，固已视之如眼中钉，其咨送也，不得已耳。至私费生，其仇之愈甚，故出全力以阻之，抵死不肯咨送。盖惧吾国之多才而欲戕其萌蘖也。其罪一也。

不送则不送耳，不过得罪学生团体已耳。然而蔡钧乃缩头曳尾一种类，无此胆量也。乃出其官场枕中秘之手段，曰模棱、曰掩饰、曰推宕、伪

① 《新闻丛报》第15号（1902年8月），"余录"栏，页109—114。

许以五人互保，便允咨送。彼其时固本无欲送之心也。无欲送之心，而以为学生之可欺。其罪二也。

已则不送，而欲嫁其责于日本人，谓参谋部不肯收纳。夫参谋本部咨复之文具在也，学生如非蔡钧之胸无点墨，何至并文中之意而不能解。蔡钧食言而肥，犹欲掩耳盗铃以欺人。其计之拙，亦不可思议矣。其罪三也。

学生求见不见，质问不答。岂不思汝所处之地位，为一国人之公仆耶？何物铜臭，无礼乃尔。其罪四也。

以上四罪，顾犹可恕，其最不可忍者，则最后蔑辱国权一大问题也。①

文章继续抨击蔡钧假借日本警察之力逮捕留学生的事，明显地表示对留学生行动的支持。

此外，日本人如何看待这事呢？对此，《新民丛报》作了如下的报导：

（报　章）	（立　场）
《时事新报》	袒护蔡钧
《中央新闻》	袒护学生
《东京朝日新闻》	袒护学生
《日本新闻》	袒护学生
《东京日日新闻》	中立
《国民新闻》	中立
《每日新闻》	袒护学生
《万朝报》	袒护学生
《二六新闻》	袒护学生
《大阪朝日新闻》	袒护学生
《每夕新闻》	袒护学生
《都新闻》	袒护学生

① 《新民丛报》第13号(1902年7月)，“国闻短评”栏，页63—64。

《读卖新闻》	袒护学生
《日本时报(Japan Times)》	袒护学生①

可见日本舆论界大都同情和支持学生。

事件的结果

这件事件的结果如何？由于吴汝纶与日本外务省总务长官珍田舍己及外务政务局长山座圆次郎交涉，复因东亚同文会的长冈护美子爵和柏原文太郎在日本当局、蔡公使、以及留学生会馆的干事之间居中斡旋，中日之间终于达成协定如下：

一 凡拟入日本文部省直辖学校者，须由东京同文书院、弘文学院、清华学校三校中之一校保送外务省，再由外务省咨送，方得入学。

一 欲经上述三校保送者，须具下列之资格：

甲在校半年以上，品行端正，成绩优良者；

乙旅居日本十年以上之男子，得校方认为适当，复得二人保证，并纳保证金三十元者。

一 曾在上述三校中肄业，但中途退学或遭拒绝保送者，未得该校同意，一概不得保送。

一 欲入海陆军学校者，当俟福岛少将回国后，再行商议。

一 依中国政府之复函，在日本设置留学生监督一员。

根据上述协议，中国方面于是年阳历 9 月，决定派遣汪大燮为首任留日学生总监督。

以前，各省本已有派留学生监督，为了区别二者起见，遂把全中国留学生监督称为总监督。汪大燮于翌年1903年 1 月 1 日到东京。汪氏后来出任驻日公使、大臣等要职。

---

① 《新民丛报》第 13 号(1902 年 7 月)，页 65。

《新民丛报》第17号(阴历9月1日号)刊有署名"东京留学生来稿"的《留学善后事宜质疑》一文,对这个协定的精神和留学生会馆干事的交涉方针,提出反对和批评。该文认为这个协定只是会馆干事与日方一、二人所决定的东西,"并未招集我全体留学生互商认否",对协定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

长期以来,留日学生人数虽不断增多,但大体上分属于一些地方性的小组织,这可从他们出版的杂志名称《江苏》、《云南》、《浙江潮》等得知。可是,自从清国留学生会馆设立以来,就有全体中国留日学生的概念。逆言之,因为有全体中国留日学生的概念,就必然有留学生会馆的出现。因此,这里就出现了未经全体留学生会议承认的讲法。全体中国留日学生发挥威力的时刻,在下文所述的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运动时,更为明显,而运动的规模也比这次大得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反对《取缔规则》运动的幼芽已在此次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中成长。

"东京留学生来稿"接着反对的,是关于设置留学生总监,必须听取日本政府的意见一事。这被认为有伤中国的主权。作者坚持"何必求日人之无异议耶?",又说:"今仅仅派一总监督,亦须问日政府之有异议与否。……以为日人许我政府派总监督矣,若不胜荣幸者。仆等诚不知何所为而出此也。"接着又指出:"噫! 诸君结此条件,实欲送国权与外人,送自由于政府,其于我留学生果有何便利之足云耶!"①

由于这是对中国政府的非难,故可视为反封建的斗争,但也可以说在此时已埋下抨击日本(反帝斗争)的种子。到了下文所述的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运动时,便成为明确的反日运动了。以此来说,成城学校事件当可视为其后的留日学生一连串运动的

---

① 《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2月),"余录"栏,页114—115。

伏线。

其次，"东京留学生来稿"所批评的是：这件事原来是因为成城学校入学问题而发生的，而有关九人的入学问题却始终没有任何决定，甚至被清廷认为连交涉的价值也没有，因此事件后的安排根本不能算是什么协定。

不过，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悲观。其后，蔡钧公使被调走了。九名留学生在翌年（1903）1月获得保证，正式进入成城学校。一如协定的第四项，福岛安正返日本后，在1903年7月，为陆军学生在东京牛込河田町建立振武学校，原在成城学校肄业的武学生全部转到此校，继续攻读。

这次运动的结果，是留学生方面取得最后胜利。至于留学生总监督的产生一事，由于这是带有管制留日学生革命活动的意味，可以说是为后来的留日学生反政府运动埋下种籽。

六　反对《留学生取缔规则》运动

《清国留学生取缔① 规则》

1905年，留日学生人数达到八千人。日本文部省在11月2日公布了《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

第一条　公立或私立学校，在许可清国人入学之时，于其入学申请书中必须附加清国驻本邦公使馆之介绍书。

第二条　公立或私立学校，得依清国学生本人志愿，于该校所定学科中，阙修一科或数科。

第三条　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立或私立学校，须备有关教职员名簿、清国学生学籍簿、考勤簿、以及来往书信文件登记册。

① 取缔二字有管理、管束、监督之意。因为当时的汉文杂志曾沿用取缔二字，故从之，下文同。

前述之学籍簿，须记载学生之姓名、原籍、年龄、住址、入学前之经历、介绍入学之官厅名称、官费或自费、赏罚、入学转学退学之年月日及其学年、毕业之年月日、转学及退学之事由等。

第四条　公立或私立学校，如欲许可清国学生转学或退学时，其申请书必须附加清国驻本邦公使馆之承认书。

第五条　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立或私立学校，须于每年一月及七月份两次将其前六个月期间许可清国学生入学之人数，呈报文部大臣。

清国学生之转学、退学以及毕业人数，亦依上述规定呈报。

第六条　公立或私立学校，遇有清国学生毕业或饬令退学时，须于一个月内，将其姓名及饬令退学之事由，报告介绍其入学之清国公使馆。

第七条　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立或私立学校，经文部大臣认为适当者，将特选定之，并通告清国政府。

第八条　公立或私立学校，欲得前条所述之选定时，其管理者或设立者，须具下列事项，径向文部大臣申请。但依特别规定，既已申请或经认可之事项，得省略之。

一　该校教育清国人之沿革。

二　校规中关于教育清国人之规定。

三　校长或学校代表者之经历。

四　教员之姓名、资格、学业经历及担任学科科目。

五　清国学生名额及学年学级现在人数。

六　清国学生在校外之监督方法。

七　清国人毕业人数及毕业后之情况。

八　供清国学生使用之校舍及宿舍之蓝图。

九　经费及维持方法。

十　教科书、教具、器械及标本之目录。

前述第二项及第八项如须变更，须经文部大臣之许可。

第九条　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其供清国学生宿泊之宿舍或由学校

监管之公寓，须受校外之取缔。

第十条　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不得招收为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饬令退学之学生。

第十一条　文部大臣如认为必要，得派员临视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之考试，或查阅考试问题及答案。

该员如认为考试问题或方法不适当，得命其变更。

考试问题、答案及成绩表最少须保存5年。

第十二条　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于每学年结束后一个月内，须将清国学生教育之概况，呈报文部大臣。

第十三条　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如违背此“规则”或其成绩不良者，文部大臣得取消其选定资格。

第十四条　依本“规则”呈报文部大臣之各种文件，须经由地方长官呈报。

第十五条　本令之各项规定，亦适用于小学及与小学同类之各种学校。

附则：本令自明治三十九年(1906)一月一日起施行。①

规则的目的

这个规则之中，首先成为问题的是第九条的“校外之取缔”，与第十条的“性行不良”。特别是所谓性行不良，可以泛指堕落的学生，也可以泛指革命派学生。日本方面则说是指前者。

文部次官木场氏的谈话，对此有所说明：

在芸芸学生当中，实有不少无法无天之徒就读于各式各样之牟利学校。放纵淫靡、忘其学生之本分者，日渐增多。故文部省之颁令，旨在一面励行监督此类学校，一面谋求刷新堕落学生之道，而决非有束缚清国

① 《新民丛报》第三年第23号，“特别论说”栏，页5—7，有本规则的中译文，读者可互为参照。——译者注

留学生自由之意也。①

事实上，无论在何时何地，芸芸留学生之中，总会有些操行不良的分子。即在革命的前夕，没有这样的留学生是不可能的。1906年出版的警世小说《伤心人语》的第七章《东京中国留学生现象记》，收录归国留日学生的谈话中，就有如下的笑柄：

兽吃：留日学生两手捧持橘子，一边走路一边把橘子掷进口里去，日本人称这举动为兽吃。
中国人的鼻涕。
皮靴与中国人的习性：不擦皮靴。
怪模怪样的服装：中日混合。
东京的中国饭店：中国饭店在神田、本乡开了三十多间，留学生爱在这里闹事。
香水与粉饰：留日学生爱打扮。
科举考试与留学生的关系：留学日本不是为了祖国的前途，而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
吉原妓寨的财源。
旅馆及浴池的怪现象。
车夫与学生的问答：日本人力车夫嘲笑留日学生洋泾浜的口语。
温习室的墨画：中国人因有画壁画的习惯，招来日本人的讨厌。
教室的果子：上课时爱吃水果。
教室里的竞争：争先恐后地推翻座位，其状可怖。
王阳明是日本人：有些留日学生以为王阳明是日本人。
速成留学之弊与退学之弊。

这些笑柄中，虽或有无恶意的谈笑之资，然其中亦确实可见堕落学生的形象。留日学生亦有承认这种情形。

① 《读卖新闻》1905年12月15日。

吾人亦闻学生中有不良分子。虽然有良则有莠，九千学生之中，岂无多少恶劣书生厕身其中？①

不过，日本文部省颁布这规则的真意，并非只为了取缔“性行不良”的留日学生而已。对清朝而言，派遣学生留日虽属必要，但留日学生又是革命的原动力，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因此，清廷一方面奖励留学，同时又不得不加以戒备。最使其担忧的三股革命势力——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居然在1905年夏天团结起来，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这样一来，一向对留日学生革命运动神经过敏的清廷，请求日本对留日学生，特别是自费留日学生，加以监督管束，那是当然的事了。

1906年，适逢日俄战争结束，在北京进行中日协约的交涉。当时，由于清廷强烈要求取缔留日学生，② 因此日本文部省就颁布了这项规则。留日学生逐渐知悉规则的真意所在，遂展开反对运动。留日学生这样看这件事：

规则第十条性行不良一语，不知以何者为良不良之标准？广义狭义之解释，界说漠然。万一我辈持有革命主义为北京政府所忌者，可以授意日本，竟诬指为性行不良，绝我入学之路，其设计之狠毒，不可思议。③

留学生对该规程之不平在于“即使自费留学生，其进入本邦（日本）学校之际，亦须取得清国公使之证明”一点。盖若厉行此一规程，则清国自费留学生大部分将受所谓清国公使馆之制肘，失去求学之自由，其结果恐不能达到游学日本之目的。④

---

① 程家柽：《清国留学生取缔规程に反对の理由》，见《朝日新闻》1905年12月11日。

② 参看永井算己：《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の性格》，见《信州大学纪要》第2号。

③ 梁启超：《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一文中所录《学界大多数对于此规则之批评》之七，见《新民丛报》第3年第22号，“特别论说”栏，页11。

④ 《总代の进步党访问》，见《每日新闻》1905年12月16日。

当时的留日学生大部分是自费学生。自费留日学生大多属革命派。为了反对清国公使馆以此规则对他们加以制肘，故自费留日学生率先发起反对运动。前述木场文部次官的谈话中，也直言不讳地说："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这次文部省颁布的规则，将使他们蒙受一大打击，殆无疑问。"又据"一般留学生受到他们的煽动"的说法，亦可见此规则对自费留日学生实有特别不利之处。

永井算己氏认为这个运动的本质是："留日学生对日本逐渐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提高了警戒，并试图与之对抗，而且也果敢地同急于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以图自保的西太后政府决战。这是留日学生反帝反封建的态度的萌芽。"①

反对运动的序曲

留日学生总会（清国留学生会馆）的干事谈到该项规则，以第九条、第十条有不善之处，因而拜访驻日公使杨枢，请求加以反对。杨公使详细记下反对理由，谓有机会的话，会向日本文部省转达。

干事们召集各省同乡会的负责人，连续举行多次评议会会议，收集反对的意见，写成《学生公禀》，在12月1日寄给杨公使。

反对第九条（关于宿舍或学校指定之公寓之规则）的理由有：

1 于经济有损害：入住宿舍，则须缴交定额费用。自费的穷学生因而不能实行节约的生活，结果必至停止留学归国。

2 于学问无补益：学校的宿舍多有管理不善之处，为学问计，不宜入住该等宿舍。

3 于卫生有妨害：即中国人与日本人之生活习惯不同。留学生每以日本

① 参看永井算己：《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締規則事件の性格》，见《信州大学纪要》第2号。

饮食不合肠胃而生胃病；席地而睡则因潮湿而患脚气病。虽有纯为中国人而设的赁屋，但依此规程，今后已不可能。

4 于兼修不便：留日学生中，以一人而兼赴二、三校听讲者亦常有之。其居处必择二、三校之间交通最便利之处。但如要入住学校宿舍，则不能兼修，不能达到求学之目的。

反对第十条（关于选定学校不能招收在他校因性行不良而被饬令退学之中国学生）的理由为：所谓"性行不良"一语，学校方面可以任意运用。例如，如学生要求学校改良校政，如触学校当局之怒，即可被扣上性行不良的帽子而饬令退学。

以上的理由具陈于《学生公禀》的长函中，而署名的学生有以下诸人：

留学生总会干事长杨度①，副干事长范源廉，学务干事陈幌、蒋方震、陈福颐、李宣威、邢之襄、周家彦、籍忠寅、顾琅，书记干事林长民、傅疆、徐志铎、方枢、钱良骏、陈应龙、刘恩复，庶务干事张继、蹇念益、姚方荣，调查干事谭学夔、刘颂虞、陈荣镜、蒯寿枢、吴永珊、郑家彦，收支干事梁志宸、曾鲲化，招待干事周珍、匡一，各省分会职员长：直隶胡茂如，山东王丕煦，山西蒲修文，江苏高朔，浙江金保康，安徽王赉，河南曾昭文，湖北王镇南，湖南章士钊，福建王兆柟，广西谭鎏翰，广东朱保勤，四川杨湖，贵州韩汝庚，云南张耀曾，陕西康宝忠，江西徐敬熙，及全体留学生谨呈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禀

12月8日，当全体留日学生的反对运动趋于激烈时，文部省发表了复《学生公禀》的信——即《说明书》。据此，关于第九条所称留日学生走读的"校外的取缔"被解释为：对校方之"约束"（译者按：傍注日语读音torishimari，与"取缔"读音同），并非对留学生居

---

① 留学生总会干事长杨度，肄业于法政大学及早稻田大学。

住校外走读之“约束”，使校方负责学生免受不良之徒所引诱。如留学生在学校寄宿有所不便，或居亲友之家，或自行赁屋居住，亦非抵触规则。而第十条所定，乃为“性行不良，如紊品行，害秩序，罹刑律等类”而设，如果学生心平气静陈述其冀望之处，并不在性行不良之列云云。①

全面的反对运动

到了11月26日，在中国留日学生就读的学校一律张贴了告示，文意谓“限令各生于该月二十九日前呈报其原籍、住址、年龄、学历等，若逾期不报，则对该生不利。”

留日学生读了告示，纷纷议论，大都认为颁布这规则是为了镇压革命运动，那是两国政府朋比为奸的杰作，因此断不能接受，故掀起全面性的反对运动。于是各校的留日学生，分别召开各班大会，发表抗议的演说。黄尊三的《三十年日记》中，11月30日（阴历冬月5日）②条中有记：

> 冬月五日，天晴。上午上课，下午接西路同乡会函云：星期日开大会，商议日政府取缔留学生事云。三钟，弘文同学亦开会讨论。群以日本政府专与留学生为难，不尊重吾辈人格。如不取消取缔规则，宁全体退学。言时非常愤激，此外毫无办法。匆匆散会。③

又12月2日，黄尊三的《日记》记道：

> 冬月七日，上午上课如常。晚至麹町区小金楼，访宋遯初，询以取缔

① 《文部省说明省令旨趣书——甲号译文》，转引自李宗棠《劝导留学日记》，页13。

② 日记作者误将日期往后延一日。冬月5日应为4日。

③ 《三十年日记》，页36。

规则究竟。伊言确有其事。问其意见如何。答以个人未有具体研究。留学界颇激昂，问题或将扩大，甚至退学，或归国，亦未可料云。①

最初发表公启（宣言）的是经纬学堂的留日学生，最先向各校发信的是弘文学院的留日学生，而首先印发取缔规条的却是路矿学堂的留日学生。

12月3日（星期日），在留学生会馆召开代表会议，决定各校代表和会馆总干事一同前往公使馆，要求彻底取消此一规则。但由于总干事杨度迟迟不到，各校代表同意组织另一机关推行运动，可是未能即时决定领袖人选。

当时参加集会的学生代表有弘文学院、经纬学堂、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大成学校、成城学校、振武学校、东斌学堂、东亚实业学校等八校，会议决定由弘文学院和路矿学堂的代表负责首次的联络工作。日本议员中村卷治亦出席这次会议，且向留日学生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说，认为规则中的第一、第九、第十条都不能接受。留学必须熟习该国的语言，而住在普通人家中学习语言比住宿舍为佳。限制转学则是剥夺求学的自由，而日本亦会失去每年五百万元的收益。他吁请留日学生坚持反抗，而他亦会向文部省提出意见。

中村演说结束时，留日学生都说："中村的言论，无非为了维护日本的经济利益。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想修改法令的一部分，而是要全面废除这个无理的取缔规则。"

如何达到目的，会上意见纷歧。有人主张集体罢课，亦有人不同意，说："集体罢课是没用的，只有归国才是最后的方法；但还是要试一试请求公使进行紧急的交涉。"又有人说："虽已请求公使进行特别交涉，但尚未有任何答复。再过三周，就是冬假了。再

① 《三十年日记》，页36。

过四周，就是取缔规则实施日期。难道厚着脸皮坐着等吗？如果不实行集体罢课，不可能迅速获得答复。”更有人说：“不赞成集体罢课。如果这样做，外国人（指日本人）将会讥笑我们知识低，才实行联合罢工之类的行动。”结果，各校代表协议翌日同往公使馆，请求公使强力交涉，务求取消取缔规则。

黄尊三《日记》的12月3日条记道：

> 星期日，西路同乡会开全体会议，商抵制日本政府取缔规则事。余上午七钟即往，晤黄君小山，略事周旋。八钟开会，群主张以停课要求，若日本政府不许，则全体退学回国。余主张详细调查日本取缔留学生之原因，与规则内容，及各省同乡会对此问题之应付情形。众以为不必调查，即日停课，多数举手，一哄而散。①

散会之后，黄尊三与友人到泷野川赏红叶。同室的路君赠以照片一帧，并请尊三题诗一首：

> 磊落孤标太瘦生　（注：路君身材瘦而高）
> 中州此日识君平
> 腰间一字横磨剑　（注：路君身为文人而作武装）
> 思化天龙向日鸣　（注：意指取缔规则事）

翌日（4日）上午8时，弘文学院留日学生致书各校留学生，谓该校本部及分校的留日学生皆已开始集体罢课。各校代表因而亦主张集体罢课，理由是他们认为应支持弘文学院的同学。若甲校实行罢课而乙校不罢课，则步调不一致，事情就不能顺利解决。于是，前述八校学生，皆实行集体罢课。可是，陆军学校、法政大学和东亚商业各校的留日学生却没有罢课。陆军学校是由日本陆军部统辖的，本非隶属文部省，故当别论。虽然如此，若取缔规则一旦实

① 《三十年日记》，页36。

施，则会因同情文科学生，及为保存国家尊严而一齐退学。东亚商业学校留日学生人数甚少，且对事情尚未清楚知道，故无表示。12月5日，法政大学留日学生，以多数表决加入集体罢课行列，只有1—2班在当日仍然上课。又东京警视厅附设之警察科留日学生，对此次运动深表同情，亦于5日起，一致罢课。

12月4日，连留日女子学生也召开会议，开始罢课。实践女学校学生秋瑾，作为全体女子留日学生的代表，出席了翌日（5日）在富士见楼的聚会，发表了激烈的演说。①

关于各校代表在12月4日前往公使馆请愿的事，各校联会在12月5日发表的《公布》第3号中，所记如下：

> 三日下午，本会总代表②及各校代表，与同乡会馆部长③杨度一同赴公使馆，请求公使向日本政府交涉事，一如《公布》第二号所记。当晚，归途中相约翌日一时于会馆集合，再与杨君推举之法律研究家张继君商议办法。
>
> 可是，到了四日，张君虽到而杨君却终日不至。本会总会代表及各代表不能等待。当夜，全体同赴公使馆。公使起初拒绝接见，经吾人坚请，终肯接见。吾人对于公使所谓："若仅取消第九条、第十条即可"，曾据理力争，反复驳论。
>
> 翌日（五日）八时，各人又一同前往公使馆。议论纷纷，舌敝唇焦，仍得不到任何结果。且公使谓即使再来也不会接见。吾人认定此事如不能达到目的，就唯有行使自由归国之权利。然即使归国，亦应集体行动。否则，会招致外人之讪笑，讥为一盘散沙。吾人复请诸君坚定团结，以整然之秩序归国。勿失我辈留日学生之人格。归国之规则，一经议定，立即公布。

---

① 以上为留日学生1月15日在偕乐园与李宗棠谈话的内容。

② 这似是在4日选出来的。或为总会第二届选举职员中的干事长曾鲲化

③ 据上文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发出的留日学生的反对文，则为留学生总会干事长。

这里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曾在11月27日寄出的《学生公禀》中带头签名的杨度，在12月4日没有到使馆请愿。这或许是因为他对留学生逐渐倾向联合罢课乃至全体归国表示反对吧！但无论如何，由于杨氏缺席，留学生社团中产生了一个以后称为总代表的机关。

反对这种强硬态度的还有其他人。李宗棠的日记中有《总会第二期选举职员》一则。总会即指留学生总会，所谓第二期职员，大概就是在杨度缺席的那一次聚会中选出的人。他们是（有○号的是旧职员）：

干事长　○曾鲲化
副干事长　○张继
庶　务　王克家　胡瑛　○匡一
书　记　○陈应龙　○钱良骏　王晶坤　韩汝庚
收支科　○周珍　○吴永珊
调查科　朱剑　曹亚伯　丁厚福
招待科　景定成　刘四　赵保泰
学务科　李钟奇　胡承诰　廖家溎

从上面的名单看来，不只少了干事长杨度的名字，副干事长范源廉，学务干事陈幌以下八人，庶务干事蹇念益及其他干事大多不见了。四名温和派的代表因反对强硬派，其中蹇念益和陈幌在第二次选举中落选了。前副干事长范源廉，对这事非常忧虑，其后甚至为此吐血，这是实践女学校教师坂寄美都子所说的。

新任调查科干事的曹亚伯，是《武昌革命真史》的作者。胡瑛（字经武）为辛亥革命后新政府的外交部长；在此次事件中，胡氏后来与程家柽一同发起召开调停会，从强硬派而至调停人，亦可想见其心境的变化。

黄尊三在4日的《日记》中所记如下：

冬月九日，上午上课，下午因取缔规则事，全体停课。余睹此风潮，坐卧不安，绕室徬徨，不知所措。①

12月5日，三百名留日学生会于富士见楼，商议其事。李宗棠记道："其时，女学生秋瑾演说，发挥女子爱国心，至痛哭，哭已复演说。"② 李宗棠随后记述秋瑾因此愤而退学。本来实践女学校的学生原定在校内商议解决，却因秋瑾提议联合罢课，前往赴会，实践女校校长下令："参加联合罢课的人，饬令退学。"秋瑾与同学17人，当时尚未找到住宿之处，亦要马上离开学校的宿舍。

在这个会议上，决议坚决反对文部省的命令，还发表了题为《东京留学生对文部省取缔规则之驳议》的声明：

新历十一月二日东京官报上登载之文部省令第十九号，有关清国人进入公私立学校就读之规定，同人等细绎其词，殆非对平等国人民所宜有也，且妨害我法律上之自由权。今请剖析以言之。

夫世界文明各国现行之民法规定，外国人之私权皆与本国人同等为原则。日本之所以能撤消各国领事裁判权者，盖以改正其法律，使外国人与本国人受同一之保护故也。既得受同一之保护，则不能有特别之规定，其有特别之规定者，则惟对保护国为然，不可以对对等国之人民。日本对对等国人民之营业，皆适用一般民法、商法，而无特别针对某国商民之规定与指定。而关于我国留学生之规定更不宜有，此实为无可置疑者。今文部省明白区别曰"关于清国留学生"，是名义上使吾人受不同等之待遇，而事实上无同等之保护也。考其原则，纯以特别为主义，实非平等国民所能受。故由名义上观之，此不能不取消者，一也。

日本宪法及民法规定之私权，国内外人士皆同等享受之。今文部省令第三条曰：于清国人所入之公私立之学校中，应备清国学生之来往书类帐。夫学校干涉学生之往来书类，是侵害我书信之秘密权。第八条第七项（注：应为第六项）谓清国人生徒校外监督之方法；又第九条凡受选

① 《三十年日记》，页37。

② 《劝导留学日记》，页19。

定之公私立学校应令清国学生在宿舍或在该校所监督之下宿①等处居住要为约束。夫学校有宿舍，宜得使学生寄宿其中。今以校内监督之法，监督校外之下宿，是学校与下宿牵连混合，教育上之权力范围无界限矣。夫学生，在校内则从教育上之规则，在校外则从所在国之国内法。若校外亦用取缔，则教育上兼及警察干涉之权，警察范围之中，又加入学校监督之法。文明立宪之国，果有此两方面之法令耶？且其所谓监督之方法者，既无界线，何有标准哉？是侵我种种之自由权矣。第十条云：凡受选定之公、私立学校，如遇有性行不良之学生，经他校饬退者不得令其入学。夫所谓性行不良者，其范围毫无界线。国际法学者曰：善恶之说，本无标准。在此事以为善者，在彼事有以为恶也。在法律以为恶者，在道德有以为善也。准是以谈，则性行不良，在法律上全无一定标准。若执此以使人退学，则学生之一言一动，凡属防卫一己之权利者，即以性行不良而目之，其言论著作之自由权可夺也。又或因学校之办理不善及因教育之不良，而欲转入他校者，亦以性行不良而目之，则其选择自由权亦可夺矣。故由权利上观之，此不能不请求取消者，二也。

此规程专为公立或私立之学校而设。公立、私立之学校，所理者皆属人民之行为与清国之学生。是人民与人民之关系也。此国际私法所管也。虽曰监督学校，然直接受其监督而有利害关系之人则为清国学生。是又日本国家与清国人民之关系，即国际公法所管也。如官立学校，为直辖文部省者，其直接或间接，施行管理留学生时，则用国内行政法，留学生固无可言之辞也。今所监督者，既属公私立之学校，即非文部省所直辖，国家行政所及者，仅能及学校方面，即如职员之名册、校长或学校代表人之履历、学校选定之校址、校舍之图样、维持经费之方法等而已。即留学生之一面，如第八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七项，亦不能及之。今文部省以管理直辖学校之命令施于公立私立学校学生方面，是超越学校之界限，而直接施于留学生也。即明明越出国内法而入于国际法也。故留学生可得而言之矣。第六条云：凡公立及私立之学校，遇有清国学生毕业或退学之时，应于一个月以内直接向清国公使报告。此为学校与清

① 下宿即学生公寓。——译者注

国公使直接之交涉。第七条又云：凡收容清国学生之公私立学校中如经文部大臣认为适当者，特行选定通知清国政府。此为日本国家与清国国家直接之交涉也。此交涉为国际法之关系，不待言也。既为国际法之关系，则此规定必经清国公使之承认而后可。(学生)对此规程若有不愿之意见，则公使或不能代表之故也。留学生得行请愿之自由，诉理于日本国家矣。日本为立宪之国，不宜用专制政府政府之法以取缔留学生。故愿文部省以文明之举动取消之，既无损法律上之名誉，且增进东亚和平之幸福。留学生等幸甚，中日两国之国交幸甚。

联 合 罢 课

又在这次会议中，决定了以后的方针是：自 12 月 6 日起，各学校一齐罢课，以铁腕对付破坏罢课的学生，同时亦必须密切注意联合罢课中留日学生的一举一动。故制订了《学生自治规则》①，印刷后派发与全体留学生。其条文如下：

一 对于日本之个人，不宜有恶感情。

一 在旅馆及寄宿舍或下宿屋宜安静。

一 不宜于停课期内游公园，上料理馆饮食，并不宜入各劝业场、各商品店购买物件。②

一 因有要事外出，宜自爱自重，勿致为警察干涉。③

黄尊三在 12 月 5 日的日记上说：

冬月十日，天阴。停课无事，随步至少留处，见案头红笺上题菊花诗数首，取读之，少留属和，遂借花遣息，成绝句一首。

冷淡幽芳自不群

① 《劝导留学生日记》，页19。

② 又据李宗棠所记："平素往来，过公园者，今特绕过公园外而行，又禁止数人结队而行。"

③ 据李宗棠记，12 月 12 日，内务省命令若中国学生暴动，即行干涉。

寄人篱下太无因(注:寓留日受制于人)
有心与君谈秋色
无奈严霜遍比邻(注:寓取缔规则意)
写罢回院,致宋遯初一函,问取缔规则消息,九时睡。①

12月5日富士见楼的会议决定罢课,故自6日早上起,各校门前皆有纠察员,不准留日学生上学。纠察员有时配备左轮手枪和短刀。② 数日后公布的《纠察学生自治规约》,这样规定:

一　无论开会议事及寻常谈论,不宜喧哗。
一　各省宜举巡查员,严行稽查,为自治巩固计,对不自爱之人处以重罚。
一　各寄宿舍各旅馆,宜每日轮派弹正员纠察。
一　多约分路秘密探查,若有犯前约及续约之人,秘密探查员勿辞劳怨,轻则极力规劝,重则将其姓名报知该同乡会或总会馆。

以上诸条,实行纠察自治之事。我辈方以日本取缔规则为侵我主权,伤我国体,不甘任受,罢课争之,如因此闲暇,放荡游逸,令日本有所借口。且彼于此时,必令警察严加监视,制造口实,稍不自治,不惟抵抗无效,全国大体、个人名誉,贻羞无穷。故宜格外自治,互相勉励,不可不谨!③

纠察员有508人,④ 以革命派自费生所组成的敢死会为核心。

六日,黄尊三的日记记道:

冬月十一日,天雨。上午开同学会,举纠察员,监视同学行动。十时散。同学借向北翔之寓所为黄镇臣祝寿,……痛饮至十点钟散。张君贻

① 《三十年日记》,页37。
② 据《读卖新闻》1905年12月17日,泽柳普通学务局长谈话。
③ 《劝道留学日记》,页20。
④ 据《二六新闻》(1905年12月13日)的《纠察员の制裁》。又12月20日所载《纠察部临时报告》谓:"23日(阳历19日)下午,于清风亭召开纠察全体会,至会者百二、三十人。"

来，言日本人名福寿究仁者，上书政府，痛骂留学生之野蛮，请用压制手段对待，闻之不胜愤慨。①

12 月 7 日，在京都的留日学生响应东京留日学生集体罢课的决议，前赴东京汇合。就读于东京实践女学校、女子美术学校、共立女子学校、高等女子实修学校、三轮田女学校等校的留日学生，大部份都离开课堂，参加女子留日学生会。反对"取缔规则"运动，终于发展成正式的全体留日学生运动。

且看 7 日至 9 日的黄尊三的日记所载：

冬月十二日，大雨。餐毕，同室路笠农君，以游红叶诗见示。……雨稍歇，时已九点钟，至西路会场开会仍议罢课事。十一点钟散会……

冬月十三日，天阴。访浦市李君家驹，同乡俱在，共议取缔规则事……

冬月十四日，天晴。湖南同乡会开会，决定全省留日学生，一律退学回国。各省同乡会，日来亦纷纷开会，闻多数与湖南取一致态度。午后，陈北襄来，谓同乡陈君天华，为取缔规则事，愤而投海，遗书数千言，勉励同人，非达到取消取缔规则的目的，决勿留东。闻之深为哀悼。陈君湘潭人，年不满三十，貌魁梧，有大志，生平以革命为唯一事业，著有《革命潮》一书。曾一次回湘，宣传主义，演说于高等学堂。余时在堂，得聆其言论。后为当道所闻，下令通缉，再度亡命赴日。此次凶耗传来，留学界全体为之震动。是晚，弘文代表，持愿书找余书名，余即书愿归，并画押其下。复得使馆消息，公使学日本文部大臣，交涉取消规则事无效，同学全体，决定退学归国。上海商会，亦来电愿尽招待之责，中国商人之爱国热诚，亦自可嘉。②

陈天华自杀之消息使全体留日学生为之震动，视之为促成留日学生决心集体归国的近因亦不为过。

---

① 《三十年日记》，页37。

② 同上书，页 37—38。

陈天华忧愤而死

陈天华，1875年生于湖南。1903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法政大学。1904年10月一度返国（当时曾在高等学堂演说，宣传革命），与黄兴在长沙起义，事败再亡命日本。著有《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以平易之文宣传激烈的革命思想，秘密运返中国，国内学生和士兵皆耽爱读之。1905年8月加入同盟会，为重要的成员。

当取缔规则颁布时，由于他善作文，有人请他写文章陈述反对意见，遭他拒绝，谓："否，徒以空言，驱人发难，吾岂为耶？"① 可是，到了12月7日，当《朝日新闻》发表了如下不实的报导后，他大大的改变了。

> 东京市内各校之清国留学生八千六百余人集体停课，……为当下之大问题。此盖由于清国留日学生对文部省命令之解释过于偏狭而生不满，以及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性情所促成，惟其团结之力则颇为薄弱。……②

为抗议这"放纵卑劣"四个字，陈天华愤而自杀。七日晚上，他伏案疾书，直至深夜，一面回想友人劝他为文的情景，终于留下了他的临终之言。

八日晨起食毕，他向友人借得二元，出门而去，前往芝区御门前邮局，将昨夜写好的遗书（原名：《绝命书》）挂号寄给神田区骏河台清国留学生会馆杨度收。

当日下午约六时，有人在距离大森海岸东滨约六十间③ 的海上发现一具三十来岁的男尸。从其口袋中检得挂号信的收条，上

① 《民报》第2号，《陈星台先生绝命书》附"跋"，页8。

② 《朝日新闻》(1905年12月7日)。

③ 一间为6日尺，约等于1.818米。——译者注

书寄信人地址为神田区西小川町一番地东新馆转交，及铜币数枚。大森警吏发电至清国公使馆，使馆转电留学生会馆。九日，陈天华投海事为留学界所尽知。

陈天华的遗书说：

近该国〔日本〕文部省有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固不待言。鄙人内顾团体之实情，不敢轻于发难。继同学诸君倡为停课，鄙人闻之，恐事体愈致重大，颇不赞成，然既已如此矣，则宜全体一致，始终贯彻，万不可互相参差，贻日人以口实。幸而各校同心，八千余人，不谋而合，此诚出于鄙人豫料想之外。且惊且惧。惊者何？惊吾同人果有此团体也。惧者何？惧不能持久也。然……如《朝日新闻》等，则直诋为"放纵卑劣"，其轻我不遗余地矣，……〔留学界〕近来每遇一问题发生，则群起哗之曰：此中国存亡问题也。顾问题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

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

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惟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而死之。夫空谈救国，人皆厌闻，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①

闻此事而感动者，不仅黄尊三一人。黄兴在《绝命书》的跋文中亦说："一人宣读之，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仰。"

---

① 《三十年日记》，页1—2。

因此，留日学生，终于决心集体归国。又发表了《对待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意见书》：

呜呼，祖国当此龙拿虎攫，鹰瞵鹗睬之时局，而尚能登二十世纪开幕之大舞台，占一平等国地位者，曰惟留学生故。惟留学生有自由，有热诚，有团体，能大声疾呼于我四万万之同胞，一齐昂首阔步而不为奴隶。……

吁嗟乎俭孅哉，西半球之奴籍将灰，东半球之奴牢又构，其所奴者，非民、非农、非工、非商、非老大病夫、非凉血动物，乃日日言自由、日日言平等、为五洲视线所环集之青年社会之将作祖国前途之主人翁之留学生也。呜呼，黑奴吁天尚知为奴隶而生，不如为自由而死，况我留学生，况我留学生。

君不见东〔日本〕十一月二日之新闻所登之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一十五条……

呜呼，留学界之自由死，四万万同胞之自由亦将死，我等留学生其何以自处。愚等不揣梼昧，谨坚握束装归国、还我自由，为反对不达之最后办法。①

此外，留学生会馆干事程家柽在《朝日新闻》上发表《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之理由》一文：

某报章曰：清国留日学生因解释文部省命令过于偏狭，结果不满云云。此可谓观察事情最为粗疏之言也。何哉？盖吾人之所愤，在于文部省加于吾人头上之特别取缔之事实。纵不问其规定之内容，吾人亦断不能接受。……今以学生之身，抛弃其学业，而欲维持自家之体面，非有非常之决心，固不能为也。故吾人于停课之先，已对学校当局披沥吾人之胸怀，而当局亦体谅吾人之心志，而后吾人始实行集体罢课。若不能贯彻吾人之意，则吾人唯甘去日本而已。已能自来，爰不能自去？天地悠悠，世界各处，任吾人之翱翔，既恶本国之专制而志欲摧之，又何必郁郁以受异国之专政耶？

---

① 《劝导留学日记》，页24—28。

某报章又曰：此乃出自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之性情，其团结力亦颇薄弱云云。吾人今日何惧于打破此失实之言！呜呼！放纵卑劣，清国人之特性云乎哉？……①

黄尊三的日记亦说：

冬月十五日（阳历12月10日），天阴，早餐后，赴西路同乡会，会议归国事。全体一致赞成归国。唯自费生无资，由官费生相助。余当捐洋五元。十二点钟散会，下午至中国留学生总会，商议归国事。二钟开会，到者数千人，日本警察亦在场傍听。胡经武主席，演说归国理由，颇足动听。最后决议一致归国。

冬月十六日（阳历12月11日），天阴。早七点钟，姚子巽来，言舍监命退学，聆之愤极，当即请子巽代办退学手续，亲至使馆，领学费百元，归院。仓卒收拾行李，暂移居李家驹处。……

冬月十七日（阳历12月12日），天晴，早起，至神田买书。膳后黄镇臣来访，略叙。黄小山亦来，问买船票事。余不欲久留即请其代办。去后，倦极而睡。自取缔规则起，无一日舒展。日既废学，夜不成眠。晚，辗转床褥，呼天长叹，念古人学书学剑，能以一艺自成其志，余求学无地，救国无才，茫茫天壤，归将安为？思至此泪潸然下。

冬月十八日（阳历12月13日），天晴，霜威颇重，寒甚。早起，食后，检点行李书籍。晚，访少留。彼于归国事，毫不豫备，劝其归国，亦不应。余即回寓。以严寒不能久坐，蒙被而睡。②

集体归国

集体归国的先头部队在12月14日首先出发。据《太阳》所记：

其中二百四人，十二月十四日乘邮船公司的上海线的安徽号，首先启程回国。③

---

① 《朝日新闻》（1905年12月10日、11日）。

② 《三十年日记》，页38—40。

③ 《太阳》，1906年1月号。

翻看李宗棠的日记，题为“学生各整行装”一节亦略记道：

十一、十二、十三三日，学生出东京至横滨，趁海船归国者，已复不少。①

又李氏日记录载西历12月20日《各校联合公报》(1号)，其中有题为《同学归国之确数》一条，说：

十三日，安徽出帆。同学归国者近三百人。十六日，法公司之轮船出口，其数亦如之。今日镇安出帆，尤形拥挤，约计不下三百五十人之多。现调查各省之先期写票者，恐后争先。东京回漕各店都有应接不暇之势。大概已归国者，已写票者，实逾二千人外矣。②

则可见13日已有船启程。又据《公报》的第三号，更有所谓《归国办法》与《善后办法》。

第一项　归国办法

1 全体学生一律准备归国。

2 商船开轮一次，为归国一次。每次派招待两人，经理船票、行装等事。

3 每次归国之学生，就中举代表一人，经理一切。每20人以上，就中举纠察员一人，整理秩序。

4 每次归国时，由招待员于购票时，记明姓名，报告总会。

5 每次归国学生，由代表人记录姓名及通讯地址，交在上海总会假定〔临时〕事务室。

6 在上海设立留学生假定〔临时〕事务所。

第二项　善后办法

---

① 《劝导留学生日记》，页20。李氏《日记》所记的11，12，13日，未注明是阳历抑是阴历。若为阴历11月，则11月13日当为阳历12月9日。按12月9日始有陈天华自杀之消息，乘船归国，似属过早。故此处似指阳历12月11—13日，亦与日本方面的记录无大抵触。前三日大抵是整顿行装，齐集横滨，准备出发等；到14日才扬帆而归。

② 同上书，页29。

1 由本会将归国理由报告学部。惟各省学务处，由各省各会，照本会报告之理由报告。

2 要求学部将北京派送留学生之官费给与本会，办理上海专门高等各学校。各省派送留学生之官费，由本省分会请领，在本省开办普通学堂。但上海学校经费有不足时，由各省筹补。

3 开临时总会，由干事及各职员长合会选举特派员二人，赴北京办理一切事务。各省分会选举特派员，向本省学务处商办一切事宜。

4 推选开办起草员二人，教育起草员六人，研究学校办法及教育方法。

5 专门高等学校之教员，聘外国人充当。普通学校教员，本国学问之程度最高者充当。

6 由本会要求公使，电致北京及各省，认明此次特派员回国之理由及其事件。

7 全体归国后，即移本会于上海作总机关，各省选举职员，为相属之分机关，以便统筹全局。①

上文所称的上海专门学校，即下文要讨论的"中国公学"。

归国学生有多少，未能确知。《太阳》2月号作"归国学生二千余人"。虽说是集体归国，实数大概只有这个数字。其中亦有对此事件的性质不大了了的人。

例如，归国学生之一黄尊三的日记便有这样的记载：

冬月十九日，黄小山、张少留、姚季六三君，为余饯行。勉强赴席，下午二钟散。

冬月二十日，即西历十二月十六日，凤琴至，云回国须去使馆请假，以便稽考，余托其代办，许之。去后未几北翔、镇臣亦至，同乡亩衹彝，姚静臣，扶松嵩，廖准夫，姚季六等相继来送余行，谈至九钟而散。

冬月二十一日，天阴。许荫卿来。言彼以代表故，须先去上海招待一切，因无船票，不能成行，请以票让之。余许诺。许去后，大雨。……

---

① 《劝导留学生日记》，页32—33。

冬月二十二日，晨起，廖淮夫来，报告海船二十五日开行。姚、李二君，拟先期至横滨候船，余因票让许君，不能同行。

冬月二十三日，大雨。姚子巽等，上午七点钟起程，因雨故，未亲送。……

冬月二十四日，天晴。七点钟起。餐后，收拾行李毕，写家信，报告退学归国事。未几，许荫卿来，言因事不去，退票于余。于是拟明日搭镇安轮即行。少留来，赠诗数首，余甚感之。许荫卿、黄镇臣均未送行，略叙而别。

冬月二十五日，上午四点钟起，收拾行李。七点钟坐大塚火车至新桥。许荫卿等来送行，由新桥乘火车至横滨。命车夫搬行李至上野屋，再转镇安轮。以换票故，颇费纠缠。幸得纠察员朱君（江苏人），代为交涉。换票毕，二点钟开轮，渡太平洋，风平浪静。①

可见黄氏的同学中，也有不少人没有参加集体归国行动的。

由于留日学生大举归国，盛极一时的弘文学院，也不得不关闭麹町、真岛、猿乐町的分校了。

反对归国派

正当集体归国如火如荼之际，一个以反对集体归国为宗旨的留日学生团体亦随之产生。在第一艘归国船开行后，便有人在东京组织“维持留学界同志会”，在12月24日公布它的会章。

会　章

1 本会以维持学界秩序为宗旨。

2 本会专以研究学界留学生应得之利益而止，不涉及政治上及国际上之问题。

3 此次文部省规则，既经解释，于本会原章之目的已达。应即劝告各校同学，一体上课。

---

① 《三十年日记》，页40—41。

4 本会举代表若干人，理事若干人，调查若干人，代表本会，并司理调查会内会外之一切事项。其职务由理事会自定。

5 本会对于其他团体行动，非经公认者，概不服从。其所生各种关系，本会亦不代认其责。

6 本会一切行动，概不受会外之干涉，如有侵犯本会会员自由者，本会有保护之义务。

7 本会对于留学界一切善后事宜当协助办理，以期增进同学之公益。

8 本会章为临时规定，一俟此次事件办理稍有头绪，再行开会，另拟会章，改为平时组织。

附启者：本会自成立以来，赞同者日甚盛，兹特改定会章，设立事务所于牛込市谷药王寺前町七十一番地。如续有愿入本会者，请将地〔译者按：疑为"姓"之误〕名、住址及原在学校，发函通知本会为幸。

阳历十二月二十四日

维持留学同志会

代表人

江　庸① ○蹇念益② 熊　垓 ○陈　棍

理事

庶务　会计

黎　迈	张孝准	蒋尊簋	李　璆
熊范兴	○谭学夔	李景圻	李维钰
施召凯	熊朝鼎	朱学曾	钱家澄

书记

姚　华	周大烈	汪兆铭	张一鹏
胡衍鸿	许寿裳	朱大符	陈汉第

这样一来，留日学生中产生了两个对立的团体　归国派称为各校联合会或会馆总会。联合会对维持会之争，最先是展开笔战

① 江庸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受袁世凯重视，为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1918年任留学生监督赴日，与留学生教育关系较深。

② 名单中有○号者为11月27日《学生公禀》中署名者。

和宣传战。双方陆续发表意见书和声明，[1] 展开激烈的笔战，声明中更充满了火药气味。

有关两派斗争的情势，在 1 月 20 日齐集于李宗棠办事地方的留日学生有如下的报告。

这次留学界的骚动，大体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归国，一派主张复课。两派的人，互相倾轧，纠缠不清。十数日前，各校学生总代表会议决定复课后，主张归国的人渐渐减少云云。

又说：12 月 24 日，留学生五百余人设事务所于赤阪药王寺町，决议复课，互相激励。自此以后，即分为复课与归国两派，时起冲突。在留学生会馆，似乎每日都有两派学生数百名聚集，互相争论。墙壁之上，贴满了海报，为各自拥护的派系打气。一派贴出了海报，就被反对的一方撕下烧毁。两派学生往往在半夜或黎明以前，静静地撕去对方的海报，改贴己方的海报。撕贴海报的事，有时会引起大纷争。

某日早上六时左右，复课派一个学生潜入会馆，正想贴上海报。此时，归国派学生八九人已涌到，双方马上发生口角，复课派的学生，虽孤军应战，但其势甚锐，意气风发，终于贴了海报后离去。可是，他的海报马上被归国派的人撕去。总之，纷争的情状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不久，有人传出消息说，清政府准备在上海逮捕归国留学生，归国派的气势稍衰。归国派有人主张派人到上海，打听虚实。调查的结果，发现完全是谎言胡说。于是，归国派对全体留日学生宣称："吾等同志诸君，要加紧团结，不可屈服于专制政府之下！"并且在会馆的墙壁大写口号，希望重振声势，鼓励同志。

数日后，复课派的维持会态度转趋软弱，有人与联合会派的人

---

① 维持会方面一连发了十次声明。

士合流。但是，维持会仍坚称文部省准许留日学生有居住公寓以外的自由，主张为祖国前途计，不应放弃学业。

日本学校当局也纷纷劝谕学生返校复课。中国当局且派来特使和公使进行调停，并发出复课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东京的留学生终于在1906年1月11日召开协商会议，虽然仍有少数人反对，复课之议终获通过，乃决定自13日起照常上课。

李宗棠在12月29日（阳历1月23日）的日记中说：

> 《读卖新闻》报载前日晚间，弘文学院、同文书院、经纬学堂、东斌学堂、大成学馆、济美学堂、铁道学校、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成城学校、实践女学校等代表十四五人会集于饭田町富士见轩，互示中国学生之复校人数。其中惟同文书院有三分之二复校，此外复校者，皆三分之一有余。①

其后，逐渐复课的留日学生人数增多，又由中国新来留学，以及重返日本的学生亦相继增加。于是，这一年的留日学生人数又再攀高峰。

日华学生会

一月底，以"促进中日两国学生聚首，坦诚交流"为宗旨的日华学生会诞生。

日华学生会会章②

第一条　本会名日华学生会。

第二条　本会以日华两国学生组织之。

第三条　本会图日华两国学生之亲睦，兼以开进相互之德智为目的。

---

① 《东游留学日记》，页89。

② 同上书，页93—94。

第四条　本会隔月开例会一次，但依时宜得以变更之。

第五条　本会于两国学生中置若干委员，以经理本会事务。

第六条　本会于主重学校为辅助本会之目的起见，可置委员。

第七条　本会置事务所于左东京市神田区锦町三丁目锦辉馆。

第八条　本会受日华两国有志者之寄附金①以补助费用。

日华学生会发起者

日　本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	井上笔次郎
外国语学校	川井光太郎
早稻田大学	川胜藏太
庆应义塾	竹内恒吉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中尾远太郎
东京帝国大学	工藤十三雄
同	八并武治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有吉半祐
早稻田大学	三拙熊太

中　国

成城学校	屠　密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	赵保泰
明治大学	张　继
广岛高等师范学校	李祖虞
弘文学院	夏道南
路矿学堂	韩汝庚
早稻田大学	姚　震
岩仓铁道学校	曾鲲化
早稻田大学	蹇念益
成城学校	吴永珊
大成学校	承胡喆
东京帝国大学	周家彦

① 寄附金即捐赠金。——译者注

1月28日（阴历正月四日），日华学会于本乡座举行成立典礼。来宾约五十人。日本方面有大隈伯爵、青木子爵、长冈子爵、小笠原子爵、嘉纳治五郎、尺秀三郎、根津一、寺尾亨、福本日南等要人。中国方面有李宗棠、马相伯①等要人。两国学生有1,500人参加。登台演说者有大隈、青木、嘉纳、马相伯、李宗棠、程家柽②等。大隈指出，日本在四十年以前，也和中国一样，曾派人到外国留学，或聘请外国人到本国任教。又谓中国人留学于一个同文同种而与本国道德本源相同的国家——日本，较远赴西洋为有利。大隈也提醒日本学生应善待中国留日学生，不要苟且。大隈的演说博得中国人热烈的鼓掌。李宗棠对此事有详细记录。苏高曼只记了大隈的演词。中国来宾方面，马相伯的演说中有下面的名句：

爱国不忘读书，

读书不忘爱国。

为此，他赢得了张之洞"中国第一位演说家"的赞誉。

演说后的余兴节目则有日本学生表演剑舞和放映"幻灯照片"，中国留日学生表演中国音乐和朗诵诗歌等。大会成功结束。

取缔规则事件使中日之间蒙上一层阴影。日华学生会的成立，明显地是为扫除阴影的善后措施。长期以来，日本学生都没有关心中国留日学生的问题，这一次他们竟被动员起来了。

根据会章规定，隔月举行例会一次。其后，似乎有点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日本学生与中国留日学生这次的握手竟是最初也是最后的一次。日华学生会会务不能继续发展，正好证明中日两国学生的关系是如何的薄弱了。

---

① 马相伯是《马氏文通》作者马建忠的兄长，1939年以百岁高龄逝世，他是奉命赴日处理这事件的。

② 据苏高曼的日记，集会之前，有人散发传单，谓"某人谓此联合会乃程家柽发起的"。

中国公学

归国学生之中，有不少人发誓以后决不再踏足日本国土。他们在离开日本之前，已考虑用自己双手在中国兴办学校。

前述的《公报》第三号第二项《善后办法》中，就有人要求北京政府把派遣留学生费用拨交留日学生干事，俾在上海开设专门学校。经多方奔走努力，终于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全国性的学校——中国公学，实践了他们的誓言。但由于清政府不允移拨留学生费用，他们只能亲自筹款来办学。学校取名“中国”，表示有对外和自立的意义，又有“学术独立”的深意。“公学”则表示是由十三省归国留日学生合力创办，而有“公共”意义的“学校”。这就意味着这所学校并非乡党学校而是全国统一的学校。

然而，上海的人，对这所由剪断发辫和穿着洋服的学生倡办的学校，却投以怪异的目光。清朝的官吏更时刻怀有戒心地盯着它。故学校虽以创立，但赞助人很少，经费极度困难，陷于无法经营下去的绝境。身为干事之一的姚宏业，不能忍受个中情景，留下数千言的遗书，于1906年4月6日投黄浦江自杀，宣称“吾为中国公学而死”，又说：

> 若问中国公学之所由起，惟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之争为权舆也。……〔公学〕若不能成立发达，亦为我国人能力劣败之代表也。……我同志等，组织此公学也，以大公无私之心，行共和之法，权何有耶？利何有耶？…… 然自开办以来，海内势力赞助者，除郑孝胥卿等数人外，殊属寥寥。……予性褊急，诚不忍坐待我中国公学之破坏，……故蹈海而死，以谢予之无才、无识、无学、无勇，不能扶持我公学之罪。……予愿予死之后，君等不复念予，但念我中国公学。予愿我四万万同胞，无学、无识、无才、无勇如某某者，皆识予临死之言为可哀，而贵者施其权，富者施其财，知者施其学问筹划，以共维持扶助我中国公学。（若此）则我虽死之日，

犹生之年矣！

姚氏的死给全国很大的刺激，郑孝胥、熊希龄、端方、罗诰等人终于出面资助，在吴淞兴建宏伟的校舍，胡适就是这所学校最早期的学生之一。

该校最初采合议制，不设校长，但其后推郑孝胥为第一任校长。中国公学是中国人自己一手创办的第一家私立大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才停办。从它是由留日学生所倡办，而由反对"取缔规则"的运动所促成这两点看来，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上，是有深刻的意义的。

七　留日学生的抗日运动

日俄战争（1904－1905年）后，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她要把作为侵略中国的障碍——俄国从"满洲"（中国东北）赶出去，把俄国强占的"满洲"夺为己有，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因此，象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运动那么炽烈的抗日火焰就在中国留日学生心中燃烧起来。陈天华的《绝命书》中，也有"近人有主张亲日者，有主张排日者，鄙人以为二者皆非也"之说。可见从此时开始，留日学生中已有排日的空气。

1909年，发生安奉铁路改修问题。留日学生中陆续有人归国，成为京津之间大事宣传抗日的策动者，掀起长达一个月的抵制日货运动。

救国团干部的斗争

大正（1912—1926年）以后，日本的侵略更形露骨，而中日两国关系更形暗淡。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强占中国的胶州湾。1915年,西洋各国由于无暇干涉中国之事,日本乘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包括日本可拥有中国的东北、内蒙古东部、山东至华中广大地区的利权,中国政府须聘日人充任各级顾问和警察等。这不啻是灭亡中国的条约。留日学生大表愤慨,大部分归国,发起反对运动。日本在5月7日,发出了最后通牒。正急于做皇帝的袁世凯只抹去其中数条,便于5月9日同意接受。这一天,中国人民定为“国耻纪念日”。

1917年,苏联诞生。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破坏新生的苏联,决议出兵干涉。3月19日,日本政府以高度秘密方式向中国政府提议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不久,知道这件事的中国人都非常愤慨,因为他们认为,苏维埃革命,是帝国主义的一次挫败,对中国民族的前途,会有很大的鼓舞。日本要镇压这场革命,无疑是把中国推入其阴谋之中,因此中国人对出兵西伯利亚的行动极表愤恨;同时,中国人也察觉到日本要借这个机会,进一步攫取中国各种利权,其意图已暴露无遗。

1918年5月6日,即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的限期“五七”纪念日的前夕,留日学生各省各校的代表在东京神田的维新号(神田,今川小路)召开秘密会议。何以选择在这饭店开会呢?这是由于日本警察对中国人的行动极度顾忌,禁止中国学生集会,更没有日本人愿意借出会场之故。出席的全是学生代表,共46人,其中三名是女子。为唤醒国民注意,有十人提早返国作先行部队。会议在七时左右开始。主席致开会辞指出:

……此次日本借口共同出兵,提出二十条件〔按应为二十一条——译者〕迫我政府承认。看秘约的内容,凡军政、财政、警政的主权,以及矿山采掘权,铁路电讯敷设权都要送给他。甚么条约,简直是一张全行扫卖的契约罢了。……前晚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的联合会议,将留学生全

体归国的问题，已经一致通过了。昨晚的联合会议，又将组织救国的大纲决定了。……往上海的，以唤醒国民，援助政府，一致对外为主。到上海，首先联络报界，为文字之鼓吹，同时电恳政府，否认密约；通电各省长官，请向政府力争，并联络绅商学界的主要人物，一致电政府力争，一面招集国民大会，为政府的后盾。等拒约的事办得稍有头绪，即筹办学校安置三千多留学生，免得半途废学。往北京的，则以哀恳政府，不予签字为主，除效秦廷七日之哭外，他如唤醒国民，联络各界等事，也可去做。……①

会议正在进行之际，负责望风的人咳了一声，全体出席的学生立刻停止了会议，缄口不言，若无其事地继续吃饭。日本的警官数十人与侦探数人持刀闯入，也不问情由，便拳打脚踢，殴击学生。一时桌椅翻倒，杯盘狼藉，场面混乱不堪。学生群起抗议。

学生：你们无故凌辱我们学生，是何道理！

警官：因你们在此开会，扰害治安。

学生：你说我们开会，有何证据？扰害治安，有何实例？……你们如此蛮行，殊有损你们自号文明国的名声。

警官：我警官认你们有开会的举动，有扰害治安的行为，这就是罪名，还要什么证据，什么实例！你们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连日在各处私下集合，都被我警官捉去责罚了一顿，还不知怕，又借饮酒为名，秘密开会。……你们还敢来搪塞。你们亡国奴，还要讲什么文明，多见其无耻而已。

警官语毕，将置辩之某甲之颊，力掌十数。遂将众人一一牵出。某乙因倒椅阻足，行动稍迟，亦吃五六耳光。某丙被日警踢伤腰部，立时倒地，日警复以足踏其臀部，促之起去。某丁见诸人因迟去受辱，疾行而出。日警箝其耳，向上力提，叱曰："你敢逃吗？"力掌丁颊。某戊怒呼曰："野蛮警察！"日警直取戊。且骂曰："混帐东西！你还敢开口！我就先打

① 见《东游挥汗录》中《七年"五七"之前夕》，页3—5。

死你这个豚尾奴。语毕，掌戌数十下。时众人之帽，已被日警堆置外室地下，某已过而取之，日警喝止之曰："不准你拿帽子。"已曰："这是我自己的，难道我拿不得吗？"日警怒曰："不剥你的皮，就是好的。你还想戴帽子吗？什么自己的自己的！你晓得你自己的臭皮囊是你的！"时三女生畏日警蛮横无礼，均唯唯未敢抵抗。

连三名女学生在内，一共46人全被逮捕至西神田警署。

途中经过中华青年会门口，留学生两手皆被反缚，头无帽，足下靴亦不整。衣服大都撕破。破头烂额者约有半数。……皆见咬牙忍痛之状，惟皆面无惧色，慷慨前行。

众留学生从青年会的二楼、三楼的窗户下望，满怀悲痛。

对面理发店某日人骂曰："豚尾奴，亡国奴！你也知道我帝国的威力吗？"

青年会为华人会聚之场，会之东邻上野馆亦尽居我国学生。会中馆中之我国学生，则扬帽大呼"中华民国万岁！救国团职员万岁。努力前进！勿忘今夕之耻！"被捕学生们则点头报之以目。旁观日人则嗤之以鼻。……对面杂货商店主人……向其妇冷笑曰："支那马鹿。"

众人一同入署，即由警员牵入临时监狱分室，室狭小而黝黑。……

未几，日警呼"搜查"，并逼令脱去衣裤。男生皆曰："我们中华礼义衣冠之邦，岂能象你们的风俗，裸体向人么？"

日警哂曰："你们支那人，还讲甚么礼义，什么衣冠！"乃强将抗议者衣服脱下。所存者仅短裤一条。

女学生则几经哀求，始准往别室脱下衣服。

嗣调查各生姓名籍贯、学校、住址。二小时内，查至三次之繁。

署长出来了，看见有学生踞足而坐，拳打脚踢一番，然后鞫问。对答如下：

署长：你们为甚么事开会？

学生代表：我们因国内自相残杀，民不聊生，特开会拍电，请双方当局停

战。

（署）：你们是帮南方的，或是帮北方的？

（学）：我们当学生的，不晓得什么南北。

（署）：我也不问你晓得南北，不晓得南北！但是你说开会的目的是电请双方停战，这却瞒不得我。我都知道了。你那救国团的大纲，不有一致对外的一句话吗？试问你对外是对哪一国？

（学）：一致对外讲究自卫之策也。是我们开会的一个目的。但要问对外是对哪一国，这却不能确实指出来。譬如德国欺负我国，我们就一致对德；俄国欺负我国，我们就一致对俄。（语尚未毕）

（署）：假如我们大日本欺负贵国，你们就一致对日了罢？（狞笑）

（学）：但愿贵国没有这桩事。若是有时，也就说不得了。（正色）

（署）：怎么的对付法？

（学）：万一不幸，贵国有侮辱我国的情事，我们一致归国。协同全国人民，为政府的后盾，同贵国决一死战。

（署）：（冷笑）若贵国国民，真有决死战的勇气，也不致弱到这步田地。你们爱国的心，虽可佩服，但是贵国人有先天的弱点。你们少数人，也无能为力咧。……只是你们的误解处很多，我不能不细细为你们解释。你们这次开会的目的，纯粹是反对中日共同出兵的密约，以为我们欺负贵国。殊不知我帝国不惟没有欺负贵国的心，而且处处保护贵国咧。你们想：贵国的政治，如是的腐败，人民如是的冥顽，财政如是的困难，军队如是的蠢愚，西洋各国在贵国的势力如是的大，而且都抱有并吞贵国的野心，若不是我日本竭力保护，恐怕已做了安南印度咧。……（贵国）屡次向我日本苦苦哀恳，共同出兵。……这纯粹是为保护你们贵国起见，实行中日亲善，并没有旁的野心。你们疑心生暗鬼，就想反对起来，实在辜负了我日本这一片的婆心。你们青年学生，应当专心读书，不管闲事。到学成名遂之后，那时归国，真是衣锦昼行，处处要受人恭维的。你看曹君、章君，还有个陆君，十年前不过一个穷学生，因为肯刻苦读书，诸事不管，才有今日的荣耀。这真是你们的好榜

样。若是你们丢了书不读，今日就归国去，恐怕不惟无益于国家，而且还遭人白眼咧。我念你们平日尚知安分，此次初犯，特别开恩，今晚就放你们出去。……你们以后还是安心读书要紧。若是以后有十人以上在一处聚谈，我就不能容赦你们哪。

（学）：（侃侃而谈，态度安闲）你这段话，只合向着曹汝霖等去说！我们不是那样的人。不钦佩你的教〔训〕！你所批评我国的弱点，不过是一时现象。我中华有五千年未断的历史，有四千年未辍的文化，有渊渊浩浩、器量宏深的特性，有地大、物博、无尽藏的富源。岂尔规模狭小、文化初开的岛民所能测其浅深的吗？至说保护保护，尤其笑话！堂堂一个国家，还要他人来保护，已经说来肉麻。况保护其名，侵略其实！我中华比不得朝鲜！你不要把这话来说了。……你日本把亲善二字，哄我政府，哄我国民，……暗地里就实行侵略主义，真是口蜜腹剑咧。你日本也假充是文明国，为何对于我们开会擅肆解散还不够，又加以逮捕逮捕……（未待语毕）

（署）：我和你们讲亲善，你竟说起生疏话来了！

（学）：还不够，又加以殴辱……（未待语毕）

（署）：罢了罢了，不要多说了。（以手挥警察）快放他们出去！

（十数警察，且牵且赶。众人自行排队出署。天已破晓。时署门前，我国学生守候者颇多，均呼万岁。）

以上录自王拱璧《东游挥汗录》。另外，当时的《朝日新闻》亦这样报导：

支那留学生

四十人传召至西神田警署救国团员会议席上突然出现警官

昨夜八时半，东文（如字）法科三年级支那留学生王兆荣（30）、湖南省同乡会干事陈仅杰（26）、四川省同乡会干事杨衡（25）、湖北省同乡会干事张君宣（26）与同国的女学生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刘某（22）、陈某（23）等救国团员四十人在神田今小川路1之24中国饭店维新号楼上聚集，召开会议，讨论有关中日国交问题之际，突有西神田警署

数名警官出现，把出席者一同带返警署，逐一讯问。……〔引文过长，译者删节〕今晨零时先释放二十名，其余尚在查讯中。①

对日本警察的行为，全体留日学生均表愤慨，陆续返国。数日后，《朝日新闻》报导：

归国支那学生达四百人　有关学校一同停课

留学本国的中国学生最近归国者非常多。11日从横滨出发的有180名，12日约有70名。另外，不限于东京市内，各地的留学生都蠢蠢欲动。仙台的东北理科大学，第二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24名也自7日起一齐停课，与东京方面不断联络，约定17日一齐归国，不再重蹈日本，愤慨无已。就此，寺尾法学博士的评论是：

"对于留日学生开会讨论中日重要外交问题，警视厅竟采取高压手段，剥夺他们集会言论的自由，引致与会者数十人被拘禁。即使事情曲直已明，也是一种不当的处理方法，亦是外交上不能忽视的问题。在日本人之间，这种交涉虽然保持秘密，但中国报章很早以前已经议论纷纷，尤其是上海的日文报纸早已纵笔谈论。故纵使留日学生为了担忧祖国的利害而骚然，也是无可如何的事，其精神是可以体谅的。

但是警察却把他们当作暴民，大力镇压，这实在是十分遗憾的事。为此，民间有志于中日亲善的人虽多方努力说明，亦将无济于事。果然，多数留日学生对政府今次的处理非常愤慨，陆续离开日本返国。留日学生都是中华民国的精英，他日当会成为中央或地方的重要人物，特别是今次拘禁的多是彼国名流的子女。他们怀着愤恨而返，其结果如何，不言而喻。这真是令人寒心的事。本人昨日与头山满氏倾谈，谋求今后应如何善后。但今日知道截至16日为止，坐船返国者已有三百九十余人之多。……这一骚动，使历来招收中国学生的学校一时无法继续上课，大多要停课。今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松本校长来访，谓其学校千多名学生之中，竟无一人上课，可见事情恶化，不仅是教育界问题而已，有识

---

① 《朝日新闻》(1918年5月7日)。

者必须共谋良策，唤起舆论，大力促成政府反省。”①

不幸得很，日本举国之中，似乎再无一人肯为留日学生仗义执言，寺尾博士倒算是个例外了。

于是，留日学生归国后，高举抗日的旗帜，对本国同胞宣传，促使他们认清时局的严重性。又北京的学生，马上表示呼应。5月21日，十数校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派代表到上海，组成学生爱国会（其后之学生救国会）。这就是促成翌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之一。留日学生以无比的爱国热情，再次焕发了中华民族的青春，其功绩无论如何是伟大的。

这时，在中国国内，以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为中心的文学改良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下，尤其是在苏维埃十月革命影响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运动也空前高涨。从这时起，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抗运动，空前激烈，仇恨日益加深。

国耻纪念日的斗争

1919年，巴黎和会不理中国代表的抗议，让日本承受德国在山东及其他地区的权益。听到这个悲痛的消息，中国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五四运动”。以1919年5月4日为界，中国革命从此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可是，这样重大的新闻，日本的报章并没有即时报导，到了5月6日，才把消息报导出来。

北京排日暴动

千余名学生焚烧捣毁曹汝霖邸，章公使负重伤

（4日，北京特派员电）

① 《朝日新闻》，1918年5月7日。

第一报　四日，从正午起，以北京大学学生为首的千余名学生群集安定门(天安门)，举起写着国贼曹汝霖、卖国贼陆宗舆、章宗祥，以及归还山东等旗帜标语，举行示威。其中一部分人与警察冲突。继而又袭击东单牌楼……之曹汝霖邸宅，并纵火焚烧捣毁曹宅。曹氏不在私邸，故幸无恙。(下午8时10分电)

第二报　曹汝霖邸宅之被焚，经警察与消防员的努力，邸宅只烧毁一半。滋事学生多有负伤者。曹汝霖氏与章宗祥氏一同由总督府园游会归来，在谈话中，受到袭击。曹氏及早与家人逃往六国饭店。章氏后脑受重伤，送入法国医院。陆宗舆的私邸，以有三百名警察警卫，得保无事。

又彼等学生所竖立的旗帜标语，除前电所述外，更有驱逐倭奴，及其他对日本非常侮辱之言辞。(下午9时35分电)。①

这则新闻刊出的第二天，东京正举行皇太子成年礼的庆典。但对于留日学生来说，当天却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三周年国耻纪念日。又巴黎和会偏袒日本而拒绝中国的正当要求的消息，亦于是日传来，且又从昨天的报章得知天安门的学生运动，于是在这一天，全体留日学生召开了国耻纪念大会。王拱璧《东游挥汗录》所记如下：

……我留日学生全体议于是日开大会为国耻纪念之表示，并讨论对于青岛挽救方法及向各国驻日使馆递宣言书。乃四出遍觅会场，均被日警预行告诫各处，不准租用。然众议沸腾，群情愤激，势非集会不可。踌躇再四，不得已，乃改拟在我驻日使馆俱乐部开会。因此地固我治外法权所及，日人断不能无理干涉也。先数日由总会遣代表二人，谒代理公使庄景珂。庄不加赞否。吾人以为□〔原引文残缺〕有苦衷，遂发印刷通知各省同乡会及各校同窗会，订于翌日，齐集使馆，并严申规约数条曰：

一　须持稳静态度，严守秩序；

---

① 《朝日新闻》，1919年5月6日。

一　对馆员示相当敬礼；

一　须听职员指挥；

一　禁衣倭服；

一　不得轻与日警计较。

翌日，阅东京各报，登载我公使馆否认开会小字短行广告。当时犹以别有不得已者在也。……同人复发通告，殷申规约，以保我使馆之尊严。

至六日晚，又遣人赴馆为筹备之接洽。及至馆外，见日警密布，如临大敌。而馆内则笙歌喧闹，馆中人正请得梅兰芳演唱《天女散花》，大开欢宴也。以馆员正忙，未侵扰其清兴而返。

七日晨，复遣人探使馆动静。馆外四出路口，已满布兵警，较六日晚尤为严重。始知此种防范，纯为对于我国学生而设。然势已至此，对于四千同人既不能遏其集会，而馆门万里，又不得为亲切之接洽。不得已乃由干事开紧急会议，为秩序之保持。议定分同人为二大组。一在葵桥车站招待，集于附近小公园内。一在三宅坂电车站招待，集于德国大使馆前。……每组各分五小队，每队设队长一人，交涉员一人，掌旗二人，排队进行。分向驻日各使馆投递宣言书。若我国使馆不准逗留，即于日比谷公园聚齐解散。当场推定队长及外交各要职，乃各分头进行。

下午二时顷，两电车站已各达千余人。来者尚不绝于道，皆肃静无哗。其在三宅坂一组，日警以人数过多，勒令解散。由交涉员再四婉求，并约无害治安，乃得整队向各国使馆进行。前到者有将所制白布大旗揭出，上书"五七国耻纪念"、"直接收回青岛"、"打破军国主义"、"保持永久和平"。日警恶之，屡欲夺去。为学生所匿。乃会同马队，于全组行至德国使馆侧之巷口，突施邀击。后队数百人遂被围于巷内。前队已出巷者，被日警拔刀狂挥，马队亦纵横冲踏，不能后顾。组中受伤及受伤不能前进者，约减全组之半。惟白旗幸未夺去。俟日警稍退，仍复整队前进。

至英国大使馆，由交涉员面谒英代理大使。英使谓诸君奔走国事，热忱毅力，深堪钦佩，余当报告敝国政府及巴黎讲和委员。惟诸君对于其他各国公使，可举代表前往。恐人数过多，日警严加干涉，徒增诸君之苦痛而已，尚望珍重云云。交涉员将宣言书递上辞出。复至法国使

馆。……

时已四时余，乃遵约向日比谷公园进发，行至大手町，距公园尚有里许。有日警百余名拦阻去路，抢夺旗帜。我队不得不施正当防御。争斗约数分钟，终以徒手不敌持械，白旗多被夺去，国旗有被撕破者，同人被捕者亦不少。……

至马场先门，去日比谷仅百余步之遥。突被步骑军警数百名围在核心，并有许多游人飞入助攻。人马突刺，拳杖交加。可怜赤手空拳，力无缚鸡之学生，乃展转呼痛于马蹄涂炭之间。有龚君者，坚持国旗不放，日警击其头至于昏倒而夺之。吴君谓"此中华民国国旗，不得轻侮!"日警厉曰："何物中华民国!"力击吴君仆地，众足乱踏。踏毕，反缚牵去。此时后队虽被军警隔断，因见吴君惨状，遂密集冒死前冲，将吴君夺回。相率夺路奔回中华青年会。

是役也，被逮捕〔者〕甚多。即奔回者，亦身无完肤矣。此关于三宅坂方面学生流血之情形也。

同时葵桥方面一组，亦整队向美国大使馆前进。美大使以抱病未克会面。由书记官与代表接洽，深表同情于吾人之行动，允即时电美国政府及巴黎和会委员。并劝告小心持重，如英使言。复至瑞士公使馆，被阻于日警。一再商量，方允代表入内。当由瑞使接见，颇现恳挚辞色。复至俄使馆。……乃复折回我国使馆。行至距馆百余武〔步——译者〕，前面宪兵警察荷戈林立。凡通使馆路口，均被杜截，为数约六七百之多。乃停步遣交涉员及队长向军警领袖陈诉诚意，并力誓秩序无乱。而此数百横暴如兽之军警，不论分晓，忽作长蛇阵，重围环攻，刀枪齐下，马蹄纷踏。较之大手町前，尤为惨酷。

当时执大国旗在前引导者，为山东杜君。日警即战杜夺旗，杜抵死不放，终以孤力难支，负伤倒地。国旗竟被夺去。复拳足交加，将杜击至半死，始行捕去。时众皆愤极，欲集中势力，与蛮奴决生死。奈军警愈来愈多，迨将全队截为数段，使各不相顾，乃得任意蹂躏。使我学生受伤者累累。更有数人，至于垂危者。尤可惨者，有小学生一人，名李敬安，湖南人，年仅十龄上下，亦遭军警毒手，击伤仆地。逾时复苏。某日警犹以

佩刀搥其头部，经众冒刃救出，已奄奄一息。旋又被日警夺去矣。呜呼伤哉！

时队已大乱，不能再行集合，欲夺路赴日比谷，军警坚不放行，只得奔赴葵桥电车站，冀分乘电车回青年会，再作后图。乃军警又不容乘车，纷向学生乱打。电车中日人日妇皆目怒手指骂亡国奴、豚尾奴。直隶赵君已飞入电车，被日警拉出，掌颊十数；赵君亦怒举杖迎之。日警遂蜂拥赵君而去，且行且殴。其余被捕者又数人。众以既不准赴我使馆，又不准乘车而行，不得已三三两两，忍痛步回神田中华青年会。……

嗣后查得受伤者二十七人，……被捕者四十二人。其中七人由警察厅起诉。经东京地方审判厅判决村中以下五人判处徒刑，缓期执行；胡俊判处徒刑十月；赵云章判处徒刑六月。

以上录自王拱璧《东游挥汗录》①。但5月8日的日本报章的报导，竟诬蔑留日学生为不法之徒。例如《朝日新闻》的标题为："千余名中国学生涌到公使馆，竖起煽动的旗帜，与我方警察冲突，又遍访各国使馆。"其报导则谓：

在北京爆发的中国学生之排日暴动，终于蔓延至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之间。……七日上午十时，留日学生周天爵、柳飞雄两人到警视厅，申请准许当日在中国公使馆召开国耻纪念演说会。长谷外事课长答谓日本法律严禁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又中国公使馆亦向我方请求禁止此种事情发生，恳切劝谕，令之回去。然留日学生却集合于西小川町之中华民国基督教青年会馆，有所决议。馆内又张贴有关山东问题的讽刺画及激烈文字，形势颇有不稳之兆。

于是，一如预定计划，彼等在下午一时齐集于三宅坂、葵桥及虎门三处。……离开俄国公使馆，约八百名学生折返葵桥，正与警察议论，谓："我们至此已遍访各国大使馆，实无被拒于自己国家使馆之外之理。"其时，约五百名学生冲破警戒线，涌到中国公使馆。公使馆警卫宪兵及警察约

① 见《东游挥汗录》中《八年"五七"之巷战》，页3—13。

百名，见状从门内飞奔而出，在岛津邸前与学生发生冲突。拘捕了6名可疑煽动者，其他人等，经劝谕后，一齐撤出葵桥。惟表町署的警官佐佐木要人(25岁)被庆应大学学生李子云以菜刀斩伤左腕，李马上被带返警视厅。……"①

据此报导，则受伤者就只有日本警官一人。留日学生这股爱国热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迸发出来，而其与日警奋战的勇气，在不久之后的抗日战争中，更加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气概，再度使日本人无法忘怀。

抗日战争前夕留日学生的抗日运动

1928年，国民党北伐军北上之际，以田中义一为首相的日本政府，借"保护侨民"之名，出兵济南。留日学生组成了中华各界反日大同盟，大举归国。

当时的情况，三神良田有以下的回忆：

当我进入高等学院的时候，正发生济南事变。住在东京鹤卷町边公寓的中国留日学生大举归国之事，记忆犹新。

当时，他们每晚都在我的友人的邻室集会，讨论应该回国好呢？还是留下来继续读书好呢？他们年青的活力和高昂的声音现在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济南事变是他们归国的一个主因。昔日为数众多的中国留日学生，自此之后便大为减少了。②

1929年7月，中华留日反帝同盟产生了，发刊《反帝战线》作为机关喉舌。这时，中国与苏联之间发生中东铁路问题。中华留日反帝同盟喊出了"苏俄还我中东铁路"的口号，且向中国驻日公使馆和日本政府示威。9月1日是预定示威的日子，由于日本方面

---

① 《朝日新闻》1919年5月8日。

② 《早稻田学报》，1958年4月号。

的同志准备未足，而且感到到公使馆去会发生危险，故把日期延至9月4日的傍晚，地点改在东京市中心银座街头。

当日傍晚，日本方面的同志动员了全协会的人，中国方面组织了八队，打算一齐进行示威。他们携带中日文传单，三三五五来到银座集合。游行示威尚未开始，筑地和北绀屋两警署的警员已赶来抓人。结果捕去中国人14名，日本人21名，朝鲜人56名。其后，更有百余名留学生被检举，亦有被逐出境者。

当时，日本学生当中也有人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留日学生的反帝运动与日本学生的反帝运动，本来理应合流的，但二者之间竟没有任何联络。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的社会团体向来都有联系，有时亦会出席其会议，陈述自已的主张，以及发表演说。可是，在这段时期，留日学生与日本学生的运动却是各自为政，漠不相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沟阴谋炸毁南满铁路，却诬指为张学良所为，并借此展开全面的军事侵略行动。这就是所谓"满洲事变"。为此，留日学生几乎全部回国。

其后，中国学生似乎依然赴日留学。不过，他们只是为了学习救国的必要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对日本怀有好感的人几已绝迹。若说留日学生至此已完全采取抗日态度，亦不为过。

"满洲事变"以后，留日学生刊行的杂志种类很多，都或多或少带有抗日色彩。

（志名）	（编辑者）	（出版者）	（创刊年月日）
社会评论	本社（日本及北平）	本社（北平）	1932.1
山西留日同乡会刊	本会	本会（太原）	1933.9.1
东流	本社	本社（东京）	1934.8.1
明天	南京留日明治大学同学会	南京留日同学会（南京）	1934.10.10

文　　化	山西留日司学会	山西留日同学会(东京)	1935. 1. 1
诗　　歌	雷石榆	卒　社(东京)	1935. 5.10
杂　　文	杜　宣	卓戈白(东京)	1935. 5.15
留东新闻	傅襄谟	本社(东京)	1935. 6.12
留东学报	陈固廷	本社(东京)	1935. 7. 1
日文研究	本　社	本社(东京)	1935. 7.18
剧场艺术	林　果	张若云(日本)	1935.10.10
新兴美术			1935
现代文学			1935
独立美术			1935
文化动向			1935
小译业	陈小台、小亚洪	本社(东京)	1936. 5.10
中日文化	程考慈	成光堂(东京)	1936. 5.15
中日论坛	艾　森	本社	1936. 5.
东文杂志	本　社	本社(东京)	1936. 6. 5
新经济	本学会	本学会(东京)	1936. 7. 1
东　　风	中华留日广西同学会	中华留日广西同学会(东京)	1936. 7. 1
言　　殿	范德元、田梦嘉	本月刊社(东京)	1936. 8.10
文　　海	本　社	本社(东京)	1936. 8.15
远东杂志	吴报锦	本社	1936.12.15
学术会	中华留日明治大学校友会	中华留日明治大学校友会	1936
粤中山县同乡会刊			1937. 2.
留东周报	余仲瑶	本社(东京)	1937. 3. 1
剧人月刊	中国留日剧人协会	本社	1937
国际戏剧	林一屏	中华国际戏剧协进会	1937

《留东新闻》最初正如其名所示，以报导留日学界和文化界的事情为主，但不久政治色彩渐渐浓厚起来。由于该杂志显示抗日的论调，其全体干事在1937年1月12日，都以推动抗日活动为理

由，受到日本政府的检举。前后一共发行了三年的《留东新闻》，终于在57号以后被迫停刊。

留日学生的抗日运动，在报章杂志上所表现的毕竟还有若干顾忌。除了公开和合法的方法外，他们每逢纪念日等日子，都以书简和传单从事更深入的宣传。这些宣传文件，有些是从中国的抗日团体送来的，也有些是会由日本寄回中国发表的。

1936年12月25日，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略称“学联”）在日华学会楼上举行成立大会，留日学生监督陈次傅到会，并在会上讲了一番训勉学生的话。其中说：

> 我自去年8月起由教育部派来出任留学生监督，至今时日虽浅，但打算努力将自己的职责抱负和计划付诸实现。其中尤其关心留日学生团体的组成及其目的，并已发出告示，请已经成立及在筹备中的团体到监督处来登记；可是直到现在，还未见有实绩。……贵会成立之后，希望体谅本人苦心，代为说服其他团体同来登记。①

细察这一番话，其实暗示了抗日的秘密工作，正不断地在留日学生之间进行着。

由于从事抗日活动，留日学生被驱逐出境的人数大增。“学联”的工作报告中，就有“救援被逮捕的同学”一项，谓：“最近，在东京有很多同学相继被警察当局检举。据本会调查，确实被捕的有6人。”为此，“学联”代表前往中国驻日大使馆会晤代理大使杨云竹，杨也承认：“对最近不断有留日学生被捕之事，本人深表遗憾。”②

留日学生与日本官宪间这种不能消解的对立气氛，不久也充盈于中日两国政府之间，1937年7月7日的“芦沟桥事变”，使两国陷入全面战争之中。

---

① 未详出处，现据原书转译。——译者注

② 《留东学生》第一期，1937年5月。

八　中国统一的基础

孙中山说："中国人如一盘散砂。"长久以来，中国人的乡党观念很强，但国民意识和民族意识却很薄弱。

观察留日学生的生活，也可印证这种情况。他们赴日留学之时，是以省为单位被派遣来的，故弘文学院有南京普通班、湖北普通班、四川速成师范科班、北京警务科班等班别。留日学生主办的杂志，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云南》、《秦陇报》、《粤西》、《四川》、《河南》等亦多以省份为名。查看黄尊三的《三十年日记》，便可知道自他抵达日本及进入巢鸭的弘文学院以后，在东京小石川的"西路同乡会"是他经常出入的地方。所谓"西路"，就是指以常德为中心的湖南省西部地区。从这儿东渡的学生有十余人，彼此来往甚密。

留日学生生活也是中国国内的缩影。在北京等大城市设有各地会馆，以便同乡人士投宿。象鲁迅在绍兴会馆写小说的事，也是这种风尚所使然。

不过，本是地方性的和分散状态的留日学生，由于在日本生活，也不得不起了某些变化。其变化的原因，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方面。积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日本人爱国观念的刺激，使留日学生深受影响。举例说，梁启超因看了日本送别出征军人的情景，感动殊深，发而为文：

祈战死

冬腊之间，日本兵营士卒，休憩瓜代之时。余偶信步游上野，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有题曰欢迎某师团步兵某君，某队骑兵某君者；有题曰送某步兵某君，某炮兵某君入营者。盖兵卒入营出营之时，亲友宗族相与欢送之，以为光宠者也。大率每一兵多者十余标，少者亦四五标。其本人

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与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其标上仅书欢迎某君、送某君等字样，无甚赞颂祝祷之语，余就中见二三标，乃送入营者，题曰“祈战死”三字。余见之矍然肃然，流连而不能去。①

梁启超继《祈战死》之后，又写了《中国魂安在乎》一文。指出：日本有日本魂，而中国却没有中国魂。他的结论认为：

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欲将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②

日本法学博士穗积八束所著《国民教育爱国心》一书，被忠实地译成中文，由北京大学堂官书局发行，且用为教科书。而日本爱国人物的传记，也有很多中译本：

日本七十三义侠传	3册	1898	神户，东亚书局
大日本维新史		1899	善邻译书局
大日本中兴先觉志	2册	1901	开道社
外国尚友录	6册	1902	明达学社
日本近世豪傑小史	2册	1903	商务印书馆
日本维新人物志	2册	1903	金港堂
雷辑各国名人事略	6册	1905	砚耕山庄

《吉田松阴遗墨》（国民丛书社）和西乡南洲的文集（在四川省刊行），也于此时在中国出版，出版者的目的显然都是为了向国人宣传日本人的爱国精神。

这些事实都直接地刺激了中国人，使他们从而培育出自己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1902年，留日学生愤恨帝俄在满洲的侵略行

① 《饮冰室文集类编》下，页692—693。

② 同上书，页694。

动，组成了“赴敌致死”的学生义勇军，却因日本政府徇清朝驻日公使之请而被迫令解散。永井算已认为这是爱国的主战论者的前驱。[①] 1903 年，章炳麟和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了爱国学社。“爱国”一词是中国过去所未用过的，相信是在日本诞生的新词。

消极的原因是什么？广泛而言，是对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反应。如仅限于日本而言，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以及日本一般国民下意识地轻侮中国人的感情，都强烈地激发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精神。

正如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中所述，自最初的中国学生抵日以来，最令他们反感的是日本人对中国人轻蔑的称呼——Chankoro〔豚尾奴〕。这种情形，日本人也一再指陈。日华学堂的教师宝阁善教的日记（明治 31 年 10 月 7 日）上说：“晚饭后，与学生一同游上野公园，在本乡街散步。常听见儿童‘豚尾奴、豚尾奴’的唤个不停”；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上田万年的《论清国留学生》中也指出：“在附近散步，亦往往听见妇孺之辈‘豚尾奴、豚尾奴’的叫骂声。个中感受，是可忍孰不可忍。”[②]

大正（1912—1926 年）以后，日本人因为蔑视中国而使用“支那”和“支那人”的称呼，中国人听起来也非常难受。当然这与该词在语源上和历史意义的诠释无关，而是感情上的反应，以及直觉的憎厌心理所造成的。这种憎恶日本的情绪，从而激起了他们渴望中国的富强和独立，民族意识和爱国心亦得以滋长。

在留日学生之间，第一件表现民族意识和爱国心的事，莫过于清国留学生会馆的设立。这会馆的干事负责照顾和帮助从中国各地新到的留日同学。在此，乡党观念已消失了。而这所会馆的名字，在《游学译编》中，虽然有“清国留学生会馆”、“支那留学生会

---

① 永井算已：《拒俄义勇军をあぐつて》，见《信州大学纪要》第 4 号，页 59 。

② 《太阳》，1905 年 8 月 28 日。

馆"和"中国留学生会馆"等几种名称，但都视之为留日学生全国性的组织。全国性留日学生组织的产生，较之全国性的留学生监督，或留日学生总监督的派遣，还要早着先鞭。

全国性的留日学生组织虽然成立，但使其威力充分发挥的是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运动。这运动一起，各校的留日学生代表经常在会馆集会，发表声明，推动罢课示威，甚至号召同学集体归国。为此，留日学生超越了省别的观念，结成一个整体，强有力地以行动来对抗日本。如抵制日本船只，改乘欧美轮船返国，即为一项表现民族团结的共同行动。

归国学生之中，更有不少人发誓不再重蹈日本，要以自己的力量来创办新式学校，为国人传授新知，苦心孤诣，惨淡经营，终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学。这所学校是由十三省的归国留日学生合力开设的。取名"中国"有对外和自主的意义；取名"公学"，表示这是各省学生公有的学校。这个校名正是打破乡党观念，务求中国统一的象征。

起自东京的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留日学生运动，又是日后中国国内的五四运动的前驱，也是其后一连串反对日本侵略政策的归国运动的典范。

中国留日学生爱国心和民族意识的形成，也有另一些消极的原因。其中之一，自然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蔑。不过，尤其重要的，同时也是这些轻蔑思想的根源，就是日本一而再、再而三的侵略中国的政策和行动。

1915 年，日本有所谓二十一条的要求，留日学生坚决反对，为了抗议而归国者很多。其次，1918年，日本向中国政府提议共同出兵西伯利亚，留学生亦坚决反对，大举归国，并组织救国团。1931年，"满洲事变"发生，留日学生大举归国，1937 年芦沟桥事件爆发，导致全体留日学生返国，而近代中国留学日本的历史至此亦暂

告终止。

日本的侵略政策，就是这样接二连三地刺激留日学生，激起他们投身于一个又一个的爱国和救国的运动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也一年比一年高涨，以至在1937年后8年间奋起对日抗战。

中国人的爱国心，可说是直接和间接地由日本所促成的。可是，举世之中，也只有日本，成为这种爱国心所要抵抗到底的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一出历史的悲剧。

结　论

中国派学生到日本留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通过日本迅速地输入西洋近代文化。为此，留日学生首先学会日语，然后通过日语去学西方文化。

他们在日本学到的东西，全都给翻译出来。这些在日本翻译和印刷的书刊，一方面促成中国书籍印刷和装订技术的改革，一方面把日本语的语汇带进现代汉语中。中国人进而利用这些近代的印刷术和词汇作为工具，吸收各方面的文化，并使之融合于中国的文化之中。

此外，由于留日学生在日本生活，受到直接间接的影响，使他们发展了在中国从来没有深刻体会到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成为他们要建立今日强大中国的原动力。留日学生虽然遇到种种苦痛的经历，也碰到不少值得愤慨的事情，不过，从结果来看，留学日本毕竟是大大成功的。

在日本，虽然也有人认为教育中国留日学生，是为了报答中国过去在文化上所给予日本的恩惠(见第四章)，但大部分日本人却认为这是为了中日友好。这个目的，达到了吗？不，留日学生从日本人学到的近代知识，和从他们得到的轻蔑对待，混和了他们自己对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政策的愤恨，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终于使他们团结一致，抵抗日本。有些时候，他们决意集体回国，作为抗日运动的先驱；有些时候，他们成为日本政策的评述者，参加了全中国的统一和抗日的事业。作为留日学生第二故乡的日

本，竟然沦为难以饶恕的敌国！真是一个大悲剧。

中国的确从日本学到不少东西。但日本人能因此而感到自豪吗？不，绝对不能。因为日本人大体上没有真心诚意地教导中国学生。留日学生是一面忍受着日本人的歧视，一面发愤自学成功的。唯一值得为中国感到高兴的是，日本这个中国的邻邦，能稍先一步学到了近代文化。

即使我们说中国人的爱国心，孕育于留日生活之中，但我们决不能说这是来自日本人的诚意教导，毋宁说是因日本人歧视中国人和侵略中国所激成的。从1896到1937年共四十二年之间，虽然日本接纳了五万名中国留日学生，并负起教育之责，但其后八年间对中国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却蹂躏广大中国领土，杀害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二者之中，我们有必要作理智的比量。又汉奸之中，很多是留学日本的人，当我们想到这里，心情更不禁沉重、复杂起来。

由于中国留学生的到来，日本文化本身也进步起来。那就是由教授日语而带动的日语研究的深化，以及日语文法的改进。

从大处看，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是失败的，那是国策的错误使然；但归根究柢，还是文化脱离不了政治的缘故。

日本人希望以留日学生的教育事业作为促进中日友好的手段，这本来并非坏事。不过，所谓友好纯为日本本身的利益，变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友好”，故此虽然指望友好，友好毕竟不会出现。反之，中日友好也不能仅以中国为中心。这应该是在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和平等对待的基础上发展的友好关系。我们固然敬爱自己的祖国，也要尊敬别人的国家。我们所希望的是互相教育和彼此学习。将来中日两国，更应互派留学生。

附　录

一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前史简表

公历	中国历	日本历	与留学史有关系的重要文教事项	
			（中　国）	（日　本）
1516	明正德11	永正13	葡萄牙人初抵广东。	
1543	正德22	天文12		葡萄牙人抵种子岛，传入枪炮。
1549	嘉靖28	天文18		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在鹿儿岛上岸，为日本传入基督教之始。
1552	嘉靖31	天文21	圣方济各沙勿略抵广东上川岛。	
1575	万历 3	天正 3	西班牙人到广东。	
1580	万历 8	天正 8	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来华，为西人来华传教之始。	
1582	万历10	天正10	葡萄牙人"租借"澳门。	
1584	万历12	天正12		西班牙人到日本。
1587	万历15	天正15		丰臣秀吉禁基督教。
1600	万历28	庆长 5		荷兰人漂流到日本。
1601	万历29	庆长 6	利玛窦献《万国舆图》，著《乾坤体义》。	
1604	万历32	庆长 9	荷兰人抵广东。	
1607	万历35	庆长12	徐光启译《几何原本》（利玛窦著）。	
1613	万历41	庆长18		英国与日本开始通商。
1626	天启 6	宽永 3	金尼阁译五经为拉丁文。	
1633	崇祯 6	宽永10		日本禁止国人出国。
1635	崇祯 8	宽永12	英国人抵澳门。	
1674	（清）康熙13	延宝 2	南怀仁著《坤舆图说》。	
1709	康熙48	宝永 6		新井白石著《西洋纪闻》。
1713	康熙52	正德 3		新井白石著《采览异言》。
1720	康熙59	享保 5		将军吉宗解除部分洋书之禁。
1740	乾隆 5	元文 5		青木昆阳、野吕元丈开始习荷兰语。
1754	乾隆19	宝历 4		山胁东洋等在京都解剖尸体。

公历	中国历	日本历	与留学史有关系的重要文教事项（中国）	（日本）
1774	乾隆39	安永 3		杉田玄白、前野良泽译《解体新书》
1783	乾隆48	天明 3		工藤平助著《赤虾夷风说考》。
1784	乾隆49	天明 4	美国人抵广东。	
1805	嘉庆10	文化 2		俄使抵长崎，要求通商。
1807	嘉庆12	文化 4	马礼逊到中国。	
1811	嘉庆16	文化 8		天文方设蕃书御用局，翻译《厚生新编》。
1815	嘉庆20	文化12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澳门创刊，是中国最早之汉文期刊。	杉田玄白著《兰学事始》。
1817	嘉庆22	文化14	华英学堂创校于澳门。	
1819	嘉庆24	文政 2	梁亚发携《劝世良言》至广东。	塙保己一《群书类丛》完成
1823	道光 3	文政 6		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策》
1825	道光 5	文政 8		幕府颁《异国船打拂令》，加强海防。
1833	道光13	天保 4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创刊。	
1841	道光21	天保12		水户弘道馆开设。
1844	道光24	弘化 1	英国女传教士爱尔特脱（Miss Aldersey）女士创立女子学校于宁波，是为外人在华创立女校之始。	
1845	道光25	弘化 2	美国圣公会创立学校于上海，即圣约翰书院前身，是为外人在华创立教会大学之始。	
1846	道光26	弘化 3	容闳等赴美留学。	
1852	咸丰 2	嘉永 5		日本翻印汉译洋书。
1853	咸丰 3	嘉永 6		美国军舰到浦贺。《澳门月报和解》发刊，《海国图志》始于日本翻刻
1854	咸丰 4	安政 1		日美和亲条约。 日俄和亲条约。
1856	咸丰 6	安政 3		蕃书取调所开设。 吉田松阴设松下村塾。
1858	咸丰 8	安政 5	西洋人最早经营的汉文日报《中外新报》在香港创刊。	福泽谕吉设庆应义塾。

公历	中国历	日本历	与留学史有关系的重要文教事项	
			（中　国）	（日　本）
1860	咸丰10	万延 1	于俄罗斯馆中附课八旗子弟外国语文，是为学习外文运动之始。	
1861	咸丰11	文久 1	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862	同治 1	文久 2	设同文馆于北京。	派遣学生留学荷兰。
1863	同治 2	文久 3	上海设广方言馆。	《横滨新闻》创刊。 伊藤博文井上馨脱藩留学美国。 萨英战争。
1864	同治 3	元治 1	广东设广方言馆。 美国长老会创立文学堂于山东。 英国教会在北京天津各设女子学校一所。	
1865	同治 4	庆应 1	江南制造局成立。	派遣留英学生。
1866	同治 5	庆应 2	福州船政学堂成立，是为技术专修学校之始。 英国浸信会创立广德书院于青州。	
1867	同治 6	庆应 3	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理化等科。	柳川春三办《西洋杂志》。 美国教士Hieburn《和英语林集成》完成，为英和辞典之始。
1868	同治 7	明治 1	《教会新报》创刊，为《万国公报》之前身。 容闳初建议派遣留学生。	明治维新。
1869	同治 8	明治 2		初设电讯。
1870	同治 9	明治 3	容闳及陈兰彬办理留学事宜。	
1871	同治10	明治 4	开办留学预备学堂。 上海、香港间铺设海底电线。	为缔结通商条约，伊达宗城使清。
1872	同治11	明治 5	《申报》创刊。 中国第一次留美学生30人出发赴美。 《循环日报》在香港创刊。	东京、横滨间铁路通车。 采用阳历。 颁布新学制。
1873	同治12	明治 6	中国第二批留美学生30人赴美。 《昭文日报》创刊。	帝国大学成立。 明六社成立。

公历	中国历	日本历	与留学史有关系的重要文教事项（中国）	（日本）
1874	同治13	明治 7	第三批留美学生30人赴美。	兴亚会诞生。
			容闳在上海创办《汇报》。	新岛襄创办同志社英校。
1875	光绪 1	明治 8	沈葆祯派遣福建船厂学生数人赴法习船政。	福泽谕吉著《文明论之概略》。
			第四批留美学生30人赴美。	
1876	光绪 2	明治 9	李鸿章派遣学生赴德习军事，是为中国军官留学之始；又选派福建船政学堂三十名赴英、法习机械制造及驾驶。	
			上海、吴淞间铁路通车。	
1877	光绪 3	明治10	益智会创立。	田口卯吉著《日本开化小史》。
				日本试用电话。
				中国公使何如璋到日。
1878	光绪 4	明治11	张焕纶在上海创办正蒙书院，是为华人自设小学之始。	
1879	光绪 5	明治12	黄遵宪著《日本杂事诗》。	植木枝盛著《民权自由论》。
			天津创设电报学堂。	
			广东创办女校。	
1880	光绪 6	明治13	李鸿章奏请创办北洋水师学堂于天津。	《新约圣经》日本译本完成。
1881	光绪 7	明治14	广学会成立。	驻日公使黎庶昌履新。
			中国撤废留学美国之制。	西园寺公望主持之《东洋自由新闻》创刊。
1882	光绪 8	明治15	福建船厂留学生返国，从此至1896年间，中国停止派学生出国留学。	大隈重信创立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
1883	光绪 9	明治16	筑地活版所在上海设代理所，名为修文馆。	马场辰猪著《天赋人权论》。
				矢野龙溪著《经国美谈》。
1884	光绪10	明治17	日本于上海设东洋学馆。	鹿鸣馆举行西洋舞会。
				岩本善治《女学新志》创刊。
1885	光绪11	明治18	李鸿章奏请创办武备学堂于天津，是为陆军军官学校之始。	坪内逍遥著《小说神髓》。
				东海散士著《佳人之奇遇》。
1886	光绪12	明治19	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陆师学堂于广东。	
			周馥奏请设立博文书院于天津，课以中西学问。	

续4

公历	中国历	日本历	与留学史有关系的重要文教事项（中国）	（日本）
1887	光绪13	明治20	葡萄牙占领澳门。	王韬著《普法战纪》在日本翻印。
			广东创办水师学堂。	
			李鸿章建议创办北洋大学。	德富苏峰《国民之友》创刊。
1888	光绪14	明治21	美国美以美会创立汇文书院于北京。	三宅雪岭等之"政教社"成立。
			康有为第一次上书。	
1889	光绪15	明治22		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
1890	光绪16	明治23	日清贸易研究所在上海创立。	第一届国会开幕。
			南京水师学堂成立。	
1891	光绪17	明治24		丁汝昌率舰队访日。
1892	光绪18	明治25	湖北创办矿业学堂及工程学堂，附设于湖北矿务局。	黑岩泪香《万朝报》创刊。
			卢戆章创造"中国第一快切音标新字"，是为中国音标运动之始。	
1893	光绪19	明治26	天津创办军医学校，是为中国自设西医学校之始。	
			湖北设自强学堂。	
			美国公理会创立潞河书院于通县，又创立北京汇文书院，为燕京大学前身。	
1894	光绪20	明治27	中日甲午之战。	日清之战。
			日人于上海经营《佛门日报》，是为日人在华经营汉文报纸之始。	
1895	光绪21	明治28	马关条约签订（4月17日）。	驻日公使裕庚履任（9月）。
			强学会于北京成立。	孙文于横滨成立兴中会。
			康有为"公车上书"。	三国迫日本退还辽东与中国。
			盛宣怀创办北洋西中学堂，分为头、二两等，是为吉逝学校成立之始。	朝鲜学生114人入庆应义塾就读。

二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年表

（有△号者为阴历）

年　份	留学史关系事项	其　他　大　事
1896 （光绪22） （明治29）	（△3月）中国派遣13名留学生赴日，由嘉纳治五郎负责教育。 （△5月）李端棻奏请立学堂并派留学生。	（△1月）设官书局，由孙家鼐主持，选译洋书及外国报纸。 《时务报》创刊。 长沙时务学堂创立，梁启超任教授。
1897 （光绪23） （明治30）	横滨大同学校创校。	（△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创立。 （△2月）《苏报》创刊。 （10．26）严复等于天津刊行《国闻报》。 （11．14）德国占领胶州湾。 上海经世女学创校，此为中国人经营的第一所女校。 统一国语运动热烈进行。
1898 （光绪24） （明治31）	（　3月）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促请中国派遣留日学生。 （△3月）张之洞著《劝学篇》，鼓吹留学日本。 （　4月）台湾协会成立（监管台湾留日学生为其任务之一）。 （　6月）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先修学校）设留学生部。 日华学堂创校。 （8．22）上田万年在《太阳》发表《关于清国留学生》一文。 （　9月）福州东文学堂创校。 （△10月）梁启超于横滨创刊《清议报》。 杭州日文学堂创校（日本东本愿寺经营）。 姚锡光著《东瀛学校举概》。	（2．21）谭嗣同等于长沙组织南学会。 （3．19）康有为组织保国会。 （　3月）俄国租借旅顺大连。 （　4月）法国占广州湾。 （6．11）德宗下诏变法维新。 （6．23）从宋伯鲁建议，诏命废八股。 （△6月）张之洞《劝学篇》颁布全国。 （7．1）英租借威海卫。 （7．3）设京师大学堂。 （9．2）英德协议在华之势力范围，长江沿岸归英，黄河沿岸归德。 （9．22）戊戌政变。 （10．9）西太后恢复科举，废农工商总局，禁结社。 （11．2）东亚同文会创立。 （　12月）新任驻日公使李盛铎赴日。

续1

年 份	留学史关系事项	其 他 大 事
1899 (光绪25) (明治32)		(3. 29)英俄协议在华铁路敷设权之范围。 (3月)山东义和团运动兴起。 (7. 20)康有为于加拿大域多利市组保皇会。 (9. 6)美国发表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11月)郑士良等与哥老会首领会于香港，推孙文为首领，组成兴汉会。 本年日本朝野推行"改正条约运动"。
1900 (光绪26) (明治33)	(2. 15)长濑凤辅在厦门创办东亚书院。 (5. 1)东亚同文会在南京创办同文书院。 (7. 4)日本颁布文部省令第11号《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委托生规程》。 (7月)成城学校第一届留学生毕业，共45名。 唐宝锷、戢翼翚著《东语正规》出版。 横滨大同学校设女生部，河原操子任教。 (△7月)梁启超等于东京开办高等大同学校。 (12月)《译书汇编》创刊。	(3月)康有为离日赴美。 孙文从欧洲到日本。 (6. 21)清廷向八国列强宣战（义和团事件）。 (7. 3)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与各国领事成立东南互保协定。 (8. 22)自立军起义计划失败，唐才常被捕杀。 (10. 8)惠州起义。 (11月)八国联军入北京。 (12月)清廷与八国媾和。
1901 (光绪27) (明治34)	春，广东留日学生在横滨成立广东独立协会。 (3. 20)中岛裁之于北京开设东文学社。 (6月)川岛浪速受委托经营北京警务学堂。 (9. 16)清廷命各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并定游学奖励及管制规程。 (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直辖学校外国人特别入学规定》。 女子留学生首次留日，师事下田歌子。 台湾留学生2人赴日。 章宗祥著《日本游学指南》出版。 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国民报》。	(7. 24)清廷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 (9. 7)"辛丑和约"订立。 (11月)李鸿章卒。 蔡钧出任驻日公使。 日本人于北京创刊《燕京时报》(即其后之《顺天时报》)。 近卫笃麿访问华北各地。

续 2

年 份	留学史关系事项	其 他 大 事
1902 (光绪28) (明治35)	(1. 19)东京同文书院创校。 (1 月)弘文学院创校。 (2 月)邹容留学日本(1903年归国)。 (3 月)蔡钧密奏清中止派遣留日学生。 (4 月)鲁迅留学日本(1909年归国)。 (5月至9月)吴汝纶赴日视察教育。 (7 月)因成城学校入学问题留日学生与驻日公使发生纠纷。 (8. 6)吴敬恒因成城学校入学事件被逐离日，愤而企图自杀。 清廷决定派遣汪大燮为留日学生总监督。 嘉纳治五郎来华视察教育。 清国留学生会馆于东京神田区设立。 实践女学校设中国女生部。 本年留日学生450名，官费生占一半以上。	(1 月)英日同盟签署。 (2. 8)梁启超于横滨创刊《新民丛报》 (2 月)清廷许满汉通婚，并下令禁女子缠足。 (4 月)蔡元培、章炳麟等在上海组成中国教育会，传播新学与革新思潮。 (6 月)同仁会成立。 (11. 16)上海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学社，据《苏报》攻击清廷。 中国最早之妇女杂志《女报》创刊。 商务印书馆设编译所，长尾雨山为顾问。 宗人府奏请宗室子弟外游。 颁布《钦定学堂章程》。
1903 (光绪29) (明治36)	(1. 1)留日学生总监督汪大燮到任。 春，陈天华留学日本。 (3.26—4.15)弘文学院留学生罢课。 设振武学校，成城学校习军事之学生转入此校。 东洋妇人会(下田歌子等主持)附设中国派遣女教员养成所。 (4 月)保定东文学堂学生开始穿着制服。 (5 月)东京中国留学生组成拒俄学生军。 (10月)成城学校开办文科班。 清廷禁止私费生学陆军。 中国人再度留学西洋各国(包括英、德、俄、比等国)。 东斌学堂创校。 弘文学院增设大塚校舍。 是年湖北留学生近百名(据《湖北学生界》)；江苏留学生近百名(据《江苏》)。	(4 月)俄国向清廷提出撤兵条件共七项。 (10月)驻日公使杨枢履新。 (12月)黄兴、张继、宋教仁、陈天华等于长沙组织华兴会。 是年发生“苏报案”，章炳麟、邹容入狱，爱国学社及《苏报》均遭封禁。

年 份	留学史关系事项	其他大事
1904 (光绪30) (明治27)	(△1月)据驻日公使杨枢《奏请兼学务摺》，时留日学生总数约千三百余人；其中文科生有千一百余人，武科生二百余人。 (9月)经纬学堂创校。 朝鲜贵族子弟50人留学日本(1895年5月已有114人入东京庆应义塾)。 (11月)实践女学校开设清国留学生部 弘文学院增设麹町分校、真岛分校、猿乐町分校及巢鸭分校。 法政大学设速成科。 中国派遣练兵处学生百名入振武学校。 袁世凯奏请对留日归国学生再加考试。 本年朱执信官费留日(1906年返国)。	(1. 13)颁布《奏定学堂章程》。 (2. 8)日本对俄国宣战。 (2. 12)清廷宣称于日俄战争中保守中立。 (7. 3)宋教仁、刘静庵等在武昌结成科学补习社，鼓吹革命。 (10.23- 26)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黄兴等亡命日本。 (12. 22)清廷向美国提出要求收回粤汉铁路（此为收回利权运动之始）。 冬，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
1905 (光绪31) (明治33)	(1. 1)寺田勇吉于《中央公论》发表《清国留学生问题》一文。 (6月)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 (8月)秋瑾留学日本(1906年返国)。 (9. 11)早稻田大学开设清国留学生部。 (△9月)服部宇之吉等于北京开设豫教女学堂。 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程》。 (10月)越南维新会派三名学生留学日本。 (11. 26)《民报》创刊。 (11月底)留学生反对取缔规则，联合罢课。 (12. 8)陈天华投海自杀。 (12. 14)留日学生集体归国运动开始。 弘文学院分校关闭。	(1. 4)日军占领旅顺、大连。 (3. 8)日军占奉天(沈阳)。 (8月)中国同盟会于东京成立，加盟者有留日学生百余名。 (△8月)清廷废科举考试。 (9. 5)日俄议和。 (△10月)清廷弛禁发令。 (11月)日韩保护条约签署，韩国正式成为日本之保护国。

续 4

年　份	留学史关系事项	其　他　大　事
	中华基督教会派 Dr. Lyon 及张佩之赴日，调查学生实情，并准备开设华人青年会。 奉天省定每年派15名女学生入实践女学校。 《日本留学指掌》出版。	
1906	（ 1月）留学生大部分复课。 （2．23）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奏请严定选派学生出洋留学章程。 （ 2月）清廷颁布《选送留日学生限制办法》，规定中学毕业以上程度始得留学。 春，华人青年会于神田成立（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前身）。 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刊《中国新女界杂志》。 （ 7月）当时在中国之日本教师多达五、六百人。 （8．7）学部电各省停派留日速成科学生，并谓当时留学生人数达一万二、三千人。 （△8月）留学生考试，留日学生成绩不佳。 （ 10月）弘文学院毕业生1959名，在学者1615名。 （ 11月）《太阳》杂志为留学生设《清国时文栏》。 （12．2）清廷颁布《管理游学日本学生章程》40条。 是年留日学生监督处发行月刊《官报》。 是年因反对"留日学生取缔规则"而归国之留日学生于上海开办中国公学。	（△3月）学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为教育之旨趣。 （△6月）清廷派提学使一行往日视察教育，留日达数月之久。 （△7月）清廷颁布"预备立宪"之上谕。 （ 11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 （12．4）江西萍乡、湖南醴陵起义。 （12．7）湖南浏阳起义。 （12．13）萍、醴、浏起义失败。 （12．16）上海绅商设立预备立宪公会促进立宪运动。 日本人于奉天创刊《盛京时报》。 日本颁布新闻条例，进一步管制新闻自由。
1907 （光绪33） （明治40）	留日学生之中，习速成科者占60%，习普通科者占30%，中途退学者5～6%，进入高等学校及大学者1%（据《学部奏定日本官立高等学校收容中国学生名额摺》）。	（3．8）清廷颁布女子师范学堂及女子小学堂章程。 （5．22）同盟会策动广东黄冈起义，失败。 （6．2）同盟会策动惠州七女湖起义，失败。

年份	留学史关系事项	其他大事
	依中国学部要求，日本文部省特约一高、东京高师、东京高工、山口高商、千叶医专五校每年录取中国学生165人入学(此为五校特约协定)。 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早稻田分会，并设寄宿舍。 留日女学生会成立，会员七十余人。 日本人经营之上海留学高等预备学校扩张校舍。 蒋介石留学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 王克敏新任留学生总监督。 中国女子首次留学西洋。 出洋考察五大臣端方赴美，与美国三所大学(Yale,Cornell,Wellesley)协议免费教育定额中国留学生。	(6月)日法协约签署。 (7．6)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被杀。 (7．15)秋瑾于浙江大通学堂谋举事，未成，被害。 (9．1)同盟会策动广东钦州、廉州起义，事败。 (9．20)清廷设立资政院。 (10月)李家驹新任驻日公使。 (11．30)同盟会策动镇南关起义，事败。
1908 (光绪34) (明治41)	(4月)实践女学校为中国女子留学生设立松柏寮(宿舍)。	(2月)汉冶萍厂矿公司成立。 (3月)二辰丸事件，华南一带排斥日货 (4．29)同盟会策动云南河口起义，事败。 (5．25)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与中国，用作教育经费。 (8月)胡惟德新任驻日公使。 (8．27)清廷颁宪法施行程序。 (9．2)清廷发表宪法大纲、议院选举纲要。 (10．4)各省谘议局开会。 (11．14)光绪帝崩。 (12．12)宣统帝溥仪立。
1909 (宣统1) (明治42)	(8．6)安奉铁路问题起，北京、天津、东三省各地发动排斥日货、大批留日学生返国。 至11月末止，在中国之日本教师共311名(据中岛半次郎《日清间之教育关系》)。 据《学制五十年史》，今年留日学生不下五千人。 弘文学院停办(入学者总计7192人，其中毕业者3810人)。	(9月)伊藤博文于朝鲜被杀。 (12月)上海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要求速开国会。

年 份	留学史关系事项	其 他 大 事
	游美学务处于北京郊外之清华园成立，首次选学生47名赴美留学。	
1910 （宣统2） （明治43）	经纬学堂停办（3月底止入学者2862人，毕业者1384人）。 （ 9月）早稻田大学之清国学生部停办。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东京神田区北神保町设置总部。 台湾总督府为台湾留日学生在东京设高砂寮。 中国政府停止补助普通科学生之官费。 中国留学生入特约五校就读。 中国禁止留学生与外国人通婚。	（2．12）同盟会策动广东新军起义，失败。 （4． 2）汪兆铭行刺摄政王未遂。 （4．13）长沙发生抢米抗捐暴动，其后波及浙江、安徽、河南、江苏、江西、湖北、东北等地。 （ 5月）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之"大逆事件"发生，秋水被害。 （6．12）山东省莱阳县发生抗捐运动 （ 8月）汪大燮新任驻日公使。 日本吞并朝鲜。 （10．22）资政院决议即开国会。
1911 （宣统3） （明治44）	（△6月）学部奏请于北京设立游学日本高等五校预科，但因革命爆发，未付实行。 日本实业家（三井物产会社山本条太郎等）组织留学生同情会，贷款与留学生作归国旅费。 设立肄业馆（清华大学前身）。	（4．27）黄花冈之役（七十二烈士中，有七人为留日学生）。 （5． 9）清廷公布铁路收归国有 （6． 4）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以孙洪伊等为首，于北京组织宪友会，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 （ 7月）日本第二次改正条约生效。 （7．31）中国中部同盟会于上海成立。 （8．24）成都发生保路风潮。 （10．10）武昌起义发生，各省纷纷宣告独立（辛亥革命）。 （12．29）孙文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 （民国1） （大正1）	（ 3月）由于中国政局关系，留学生大举归国。成城学校停办。 （ 10月）成城学校留学生部重开。 "东京朝鲜人留学生学友会"成立（最初会员97人） 今年留日学生数目达一千四百人（据《学制五十年史》）。 蔡元培、吴稚晖等组织留法俭学会。	（1． 1）孙文于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2．12）清帝逊位。 （3．10）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3．11）孙文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中华书局创立。

续7

年份	留学史关系事项	其他大事
1913 (民国2) (大正2)	是年，中国留学生居东京者有二千人以上(据四片之《说报》)。 中国政府教育部废除留学生监督，由各省派出经理员。	(3月)宋教仁被暗杀. (4. 27)袁世凯无视国会反对，向五国借款. (7.12—9.1)二次革命，国民党主要人物亡命日本及美国。 (10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 (10月)台湾罗福星等武装抗日。 (11. 4)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 中国决定采用注音字母，但未正式公布。
1914 (民国3) (大正3)	(1月)松本龟次郎创立东亚高等预备学校。郭沫若留学日本(1923年归国)。 (2月)政法学校创校。 振武学校停办。 中国教育部公布《管理留学日本自费生规程》(自费生必须中学毕业以上，且为中学以上学校之教员)。 不肖生起草《留东外史》。 是年留日学生至少有五、六千人(据松本龟次郎之说)。	(3月)陆宗舆新任驻日公使。 (7. 8)孙文于东京组成中华革命党。 (7. 28)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8月)日本对德宣战。
1915 (民国4) (大正4)	留日学生反对"二十一条"，大举归国，在上海组成国民对日同志会. (6月)中国留法勤工俭学会成立。	(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中日为此交涉， (3月)上海、汉口、广东等地展开排斥日货运动. (5. 9)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 (7月)台湾台南余清芳等武装抗日。 (9月)《新青年》创刊。 (12. 11)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 (12. 25)蔡锷等起兵于云南，讨伐袁世凯(护国之役)。
1916 (民国5) (大正5)	留日学生的学术性团体丙辰学社在东京创立(此为中华学艺社前身)。 (5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东京大学演讲"日本对印度之使命"。 (9月)"东京朝鲜苦学生同友会"成立。	(3. 22)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 (6. 6)袁世凯死. (6. 7)黎元洪就任代大总统。 (6. 29)黎元洪宣布恢复临时约法，重开国会. (8月)章宗祥新任驻日公使。

续 8

年　份	留学史关系事项	其　他　大　事
1917 (民国 6) (大正 6)	中国教育部颁布留日学生监督处简章。 (　10月)中国留日学生不满日本驻美特使石井之演说，要求中国驻日公使提出抗议。 周恩来留日（入法政大学附属预备学校，与大杉荣接触，1919 年 3 月归国)。 华法教育会成立,往法国留学者渐多。	(　1 月)胡适、陈独秀等发起文学革命运动。 (7.1—7.12)宣统帝复辟。 (8．1)冯国璋就任大总统。 (9．10)孙文自任大元帅，于广东成立军政府(护法运动)。 石井—蓝辛协定。 (　11月)俄国革命。
1918 (民国 7) (大正 7)	(3．20)日本第 40 届帝国议会提出"关于支那人教育之施设建议"案。 (3．23)同议会提出"关于日支文化之施设建议"案。 (　4 月)日华学会创立。 (　5 月)留学生监督江庸就任。 留学生反对中日共同出兵西伯利亚,大举归国,并组织救国团。 (5．6)救国团干部被捕。 (　10月)日华学会经营之宿舍第一中华学舍落成。 彭湃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与建设者同盟接触,1921年 7 月归国)。	(3．19)日本向中国提出共同出兵西伯利亚。 (5．21)北京国立各校学生二千余人前往总统府请愿，要求废止"中日军事协定"，并公布其条文。 (　8 月)日本各地发生"米骚动"。 (11．11)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签订和约。 (11．23)中国公布注音字母。
1919 (民国 8) (大正 8)	(　2 月)望月军四郎为成城学校留学生教育捐出五十万日元。 (5．7)留学生在东京举行国耻纪念示威游行，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 日本物价腾贵,中国留学生减少。 德国马克币值暴跌，中国学生留德者渐多。	(1．18)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代表要求山东权益归还中国。 (3．1)朝鲜"三·一"运动。 (5．2)《新青年》六卷五期刊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5．4)五四运动。 (6．28)北京政府拒签和约。 (10．10)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920 (民国 9) (大正 9)	(　1 月)台湾留学生在东京成立反抗日本统治之"新民会"。 (7．19)日本第 43 届帝国议会中提出"关于支那共和国留学生质问主意书"。 (　10月)日华学会之第二中华学舍落成。　政法学校停办。	(　1 月)国际联盟成立。 中国教育部下令小学教科书改用语体文。 (2．2)中国教育部公布新式标点符号。 (　2 月)北京大学准许女子入学。

年　份	留学史关系事项	其　他　大　事
	（　11月）周恩来等留学法国。 （　12月）中国留法清贫学生及留德学生各千余人，由于法国社会经济影响，困难颇多。	（7．14）直皖两系军阀大战，皖系败，段祺瑞辞职。 （　8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　10月）毛泽东在湖南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 （民国10） （大正10）	（　1月）新民会向日本国会请愿，拟于台湾设立民选议会。 （2．9）日本第44届帝国议会中提出"关于支那共和国留学生质问主意书"。 （3．24）同议会中提出"关于支那共和国留学生教育建议书"。 （　5月）日本政府给予日华学会十五万日元补助。 （　7月）郭沫若等"创造社"在日本成立。	（1．10）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 （5．5）孙文就任非常大总统。 （7．1）中国共产党诞生。 （　10月）台湾文化协会创立（总理林献堂）。 孙文派遣陈季博至东京建立国民党东京支部。 法国送还中国之工读留学生。
1922 （民国11） （大正11）	（3．6）日本第45届帝国议会中提出"关于退还义和团事件赔款建议"案。 （3．9）同议会中提出"关于对支文化事业施设建议"案。 （3．14）同议会中提出"关于支那共和国留学生教育请愿"。 （　4月）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会馆受大地震破坏。 废止五校特约。 张振汉新任留学生监督。 是年留学生总数为2246名（据文部省调查）。	（　2月）华盛顿裁军条约签署。 （2．27）孙文于桂林宣言北伐。 （　4月）北伐开始。 （4.26—6.14）第一次直奉战争。 （5．12）张作霖宣告东三省独立。 （6．16）陈炯明叛变，北伐失败。 （　11月）中国颁定新学制。 英国向中国提出，将庚子赔款之余额拨充中英两国互惠事业之用。
1923 （民国12） （大正12）	（3．15）日本政府于第46届帝国议会中提出"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 （3．20）同法案通过。 中国教育部为推行日本所建议之"对支文化事业"之计划，派遣朱念祖赴日交涉。 （　4月）台湾留日学生创刊《台湾民报》。	（　1月）孙文与越飞发表共同宣言，苏联宣称支援中国革命。 （　2月）孙文于广州就任大元帅。 （　3月）中国要求废止"二十一条"，日本拒绝，收回旅顺事件起。 （5月—8月）因收回旅顺事件，中国各地发生排斥日货运动。

续10

年 份	留学史关系事项	其 他 大 事
	(6 月)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修复工程完成。 由日华学会及中华青年会主办房州馆山留学生消夏团，成为以后每年例行活动。 (7 月)《有关中华民国留学生排日问题宣言》发表。 (9 月)关东大地震，留学生钟明厚等25人罹难。 日华学会尽力协助留学生避难及归国。 东京同文书院，横滨志成学校因地震停办。 (10. 10)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被烧毁，另筑临时营幕，继续授课。 是年留日学生达千人（据中华青年会报告）。	(6 月)中共于广州召开三全大会，决定国共合作，组织联合阵线。 (11月)孙文决定联俄容共。
1924 (民国13) (大正13)	(3 月)中国教育部公布《日本对华文化事业补助留日学生费分配办法》。 (4 月)日本外务省对支文化事务局设立特选留学生制度。 (7月—8月)东京高等预备学校及日华学会之临时建筑完成。 (10月)中华青年会之临时建筑完成， (12. 20)日本外务省之对支文化事务局改组，于亚洲事务局内设"文化事务部"。 (12月)文化事务部资助北京国立八校之教师50人到日本视察。 美国公布移民法，限制亚洲学生入境。 当时留美学生总数为1637名。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容共政策。 江荣宝新任驻日公使。 (2 月)南方革命政府派遣蒋介石赴莫斯科。 (6. 16)黄埔军校创校。 (6 月)泰戈尔赴日，对日提出警告。 (9. 18)第二次北伐开始。 (9.18—10.23)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大败。 (11. 12)孙文经日本出席北京之善后会议，发表要求召开国民大会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宣言，对日本亦加以批评。 (11. 24)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
1925 (民国14) (大正14)	(4. 22)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移交日华学会经营。 (5 月)中国全国教育联合会庚款事宜委员会反对日本之"对支文化事业"之建议计划。 (8 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决议拒绝接受日本及英国之"文化侵略"政策。	(3. 12)孙文逝世。 (5. 30)五卅惨案发生。 (11. 1)苏联于莫斯科设孙逸仙大学。

年份	留学史关系事项	其他大事
	(10月)受日本操纵之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于北京开会。	
1926 (民国15) (昭和1)	(2月)日本第51届帝国议会中通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之"改正法律案",将每年支出250万日元以内改为300万日元以内。 (2月)朝鲜留学生组织"新兴科学研究会",热心介绍社会主义思想。	(1. 4)国民党于广东召开二全大会,汪兆铭、蒋介石掌权,西山会议派失势。 (3. 20)中山舰事件。 (5. 15)蒋介石提出"党务清理案",限制共产党员之活动。 (6月)朝鲜6.10运动。 (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
1927 (民国16) (昭和2)	(3月)朝鲜留日学生组织"高丽共产青年会日本部"。 (4月)中国留日学生左(共产党系)右(国民党系)两派冲突。 (7月)日华学会出版《留日中华学生名簿》第一版发行。《日华学报》创刊。 (8月)倾向共产主义之"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诞生。 (9月)舒新城著《近代中国留学史》出版。 (10月)徐鸿泽新任留学生监督。 (12月)起 松本龟次郎在《日华学报》上连载《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 是年留日学生1924名(据日华学会《留日中华学生名簿》——以下数字均据此出)。	(2月)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 (4. 18)南京政府成立,发表清党宣言。 (7月)田中内阁发表声明,保卫在华权益。 (7. 13)第一次国共合作告终。 (8. 1)中共军策动南昌暴动。 (8月)留学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之中国学生陆续归国。 (9. 6)武汉政府,南京政府复合;蒋介石下野。 (10月)毛泽东于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日本之文化事业部在北京设立人文科学研究所。
1928 (民国17) (昭和3)	(4月)中国东北各省留日学生于牛込区设立中华同泽俱乐部。 (5月)因济南事件,留日学生大举归国。中国留日学生组织"中华各界反日大同盟",批评日本之文化事业部。 (9月)中国留学生组成留日中国共产党筹备会。 姜琦新任留学生监督。	(2. 2)国民党第二次四中全会,蒋介石任革命总司令,总揽军政大权,主持北伐。 (4月)红军与在井冈山之毛泽东所部会合,建立红军第四军。 (5. 3)日本出兵济南。(济南事件) (6月)日本军人暗杀张作霖。 (7. 7)国民政府宣布修改不平等条约。

年份	留学史关系事项	其他大事
	留学生监督处发行《留日学生统计一瞥》。 是年留日学生2480名。	(7.25)美国承认中国之关税自主权。 (7月)北伐完成。 (8月)中国教育部提倡语体文教育。 (9.26)中国教育部公布国语罗马字。 (10.8)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 (11月)美国正式承认南京政府。 (12月)英国、法国先后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并承认南京政府。 (12.29)张学良将东三省复归中央,全国统一。
1929 (民国18) (昭和4)	(2月)成城学校留学生部宿舍落成。华侨学校于东京创立。 (5月)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校本部落成。 (7月)中国留学生之"中华留日反帝同盟"发刊《反帝战线》。 (9月)中国、朝鲜留日学生与日本学生举行"关东大震灾纪念示威",与警察冲突(此为三国共产主义青年联合行动)。 (11.9)中国教育部公布《限制留日学生考验日语办法》,规定至少应习日语半年,经监督处考验合格,始可留学。 是年留日学生共2485名。 至本年底止,以庚子赔款赴美留学者有一千九百余人。	(1.19)梁启超死。 (3.3)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成。 (10月)世界经济大恐慌开始。 (11月)朝鲜光州学生运动。 (12.28)国民政府单方面宣布收回领事裁判权。
1930 (民国19) (昭和5)	(6月)日华俱乐部主办学生恳谈会,其后时有会议。 (7.5)中国教育部通令今后不得接受日本文化事业部之补助。 (7月)成城学校留学生部新建校舍落成。 王克仁新任留学生监督。 是年留日学生共3049名。	(3月)北京《顺天时报》停刊。 (4月)伦敦裁军条约签署。 (6月)中国要求日本退还全部庚子赔款,日本拒绝。中国教育部训令小学校教科书中完全废止文言文。 (10月)台湾雾社事件。日本开始称呼中国为"中华民国"(不称"支那")。 由日本文化事业部资助,本年由中国至日本视察之团体共20个,为去年之一倍。

年 份	留学史关系事项	其 他 大 事
1931 (民国20) (昭和6)	(2月)东京朝鲜留学生学友会被迫解散。 (4月)日本文化事业部于上海设自然科学研究所。 (9. 26)九·一八事变后，东京中国十七省留日学生代表集会于中华青年会，决议全体归国，并向公使馆要求支付旅费。在此前后，留学生归国者甚多。 (10. 8)留日学生监督发给部分归国学生船票。 至五月止，本年留日学生有2972名。	(1月-5月)日华绘画展览会。 (7. 2)万宝山惨案。 (9. 18)九·一八事变。 (9. 23)上海各校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 (10月)蒋作宾新任驻日公使。 (11. 5)南京政府禁止抗日活动。 (11. 27)中共成立苏维埃政府于瑞金。 毛泽东任主席。
1932 (民国21) (昭和7)	(2月)留日学生监督处发给660学生归国旅费。 同泽俱乐部关闭。 (9月)成城学校留学生部开始上课。 本年至六月止留日学生共1421名(其中311名为伪满洲国学生)。	(1. 28)一·二八事变。 (1月)中日外汇市场开始对中国有利。 (3. 1)伪满洲国成立。 (5月)日本五·一五事件。
1933 (民国22) (昭和8)	本年五月止，留日学生计有1357名(伪满洲国留学生占311名)。 秋季始，留学生来日渐多。 (12月)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留学生达1059名。 本年之留学生监督为黄霖生。	(3. 27)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5. 31)中日签订“停战协定”。
1934 (民国23) (昭和9)	(1月)善邻协会(包括蒙古留学生部)在东京成立。 (5月)周宪文任留学生监督。 (6月)驻日监督处在上野美术馆主办中华民国留学生美术展览会。 (8. 1)日本《新青年杂志》(15之9)刊《中华民国留学生座谈会》一文。 至6月止，留日学生共2198名(其中伪满洲国学生占749名)。 9月，10月，来日者亦增至七、八百名，至11月为3000名。	(4. 10)中共发表《告全国国民书》，提出成立统一战线，抗日救国。 国民党推行新生活运动。 (8. 27)中国恢复祭孔。 (10. 15)中共红军脱出瑞金重围，开始长征。 中国开始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续14

年份	留学史关系事项	其他大事
1935 (民国24) (昭和10)	(4．19)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改称东亚学校。 (4月)中华同学新剧社于一桥讲堂上演曹禺之《雷雨》，此后留学生竞演新剧。 伪"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设立。 (8月)陈次溥新任留学生监督。 (12．8)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会馆失火烧毁。 至6月止，留日学生有3781名(其中伪满洲国学生占1133名)。 秋季新来者约2000人，10月末6500百人，11月8000人。 (12月)日本外务省创立"国际学友会"(会长近卫文麿)，以协助来自东南亚之留日学生。	(1月)中国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 (1．13)中共召开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之领导权。 (5月)中日两国公使升格为大使。 (6．10)国民政府禁止抗日运动。 (8．1)中共号召组织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八一宣言)。 (8月)国民政府公布324个简体字。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活动"。 (12月)北平学生反对"华北特殊化"，举行大示威(一二·九运动)。 许世英新任驻日大使。
1936 (民国25) (昭和11)	(2月)日本东洋妇人会协助中国女子留学生组织共乐会。 (6月)伪"满洲国留学生会"举行成立大会。 至6月止，留日学生计有5662名(其中伪满洲国学生占1805名)。 (11月)"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成立。	(2月)日本二·二六事件。 (5．5)红军撤出山西，通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停战，一致抗日。 (5．31)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翌日该会发表抗日救国纲领，向国民政府要求联共抗日。 (8．25)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国共合作抗日(8月书简)。 "文艺家协会"与"文艺工作者"提倡国防文学。 (10．19)鲁迅逝世。 (11月)绥远事件。德日防共协定。 (12．12)西安事变。
1937 (民国26) (昭和12)	(1．12)《留东新闻》之编辑被日警检控(该刊至第57号停刊)。 (2．14)中华民国留日同学会之成立会中，反对派扰乱会场，决定通信选举职员。 至6月1日留日学生有5934名(其中伪满洲国学生1939名)。 (7月)留日学生陆续归国。	(1月)于筑地小剧场开"鲁迅先生纪念美术展览会"。 (2．10)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议国共合作。 (2．15)国民党三中全会同意国共合作。 (6月)朝鲜金日成于普天堡起义。 (7．7)芦沟桥事变。 (7．8)中共呼吁对日全面抗战。

续15

年　份	留学史关系事项	其　他　大　事
		(7．17)蒋介石、周恩来庐山会议。 (8．15)蒋介石下对日抗战总动员令。 (　10月)印度加尔各答排斥日货。 (　12月)日军南京大屠杀。

以上两表主要是根据实藤惠秀氏所编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年表》(《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附表)制成。在编制的过程中,译者还参考了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台北,正中书局,1963)、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中《辅篇——中国现代教育史年表》、《近代日本综合年表》(东京,岩波书店,1968)、田中宏编《アジア留日学生年史》(收入《アジアレビユ——》42期)等资料,予以补充和订正。

三　有关中国留日学生的五个统计表

表1　留日学生数（人）

表2　留日学生毕业人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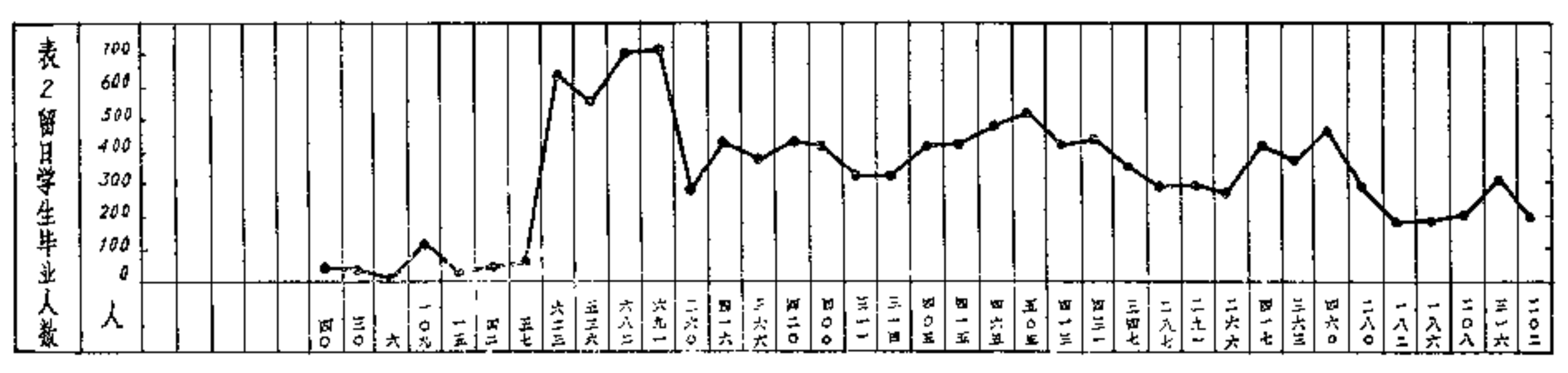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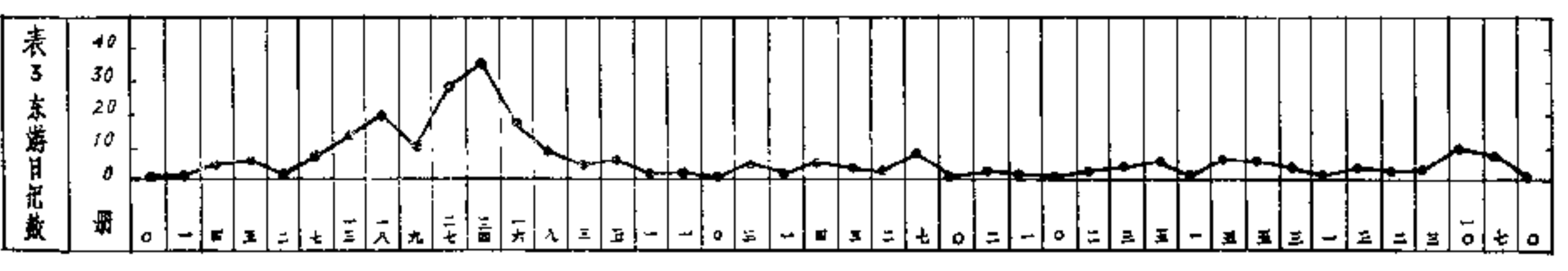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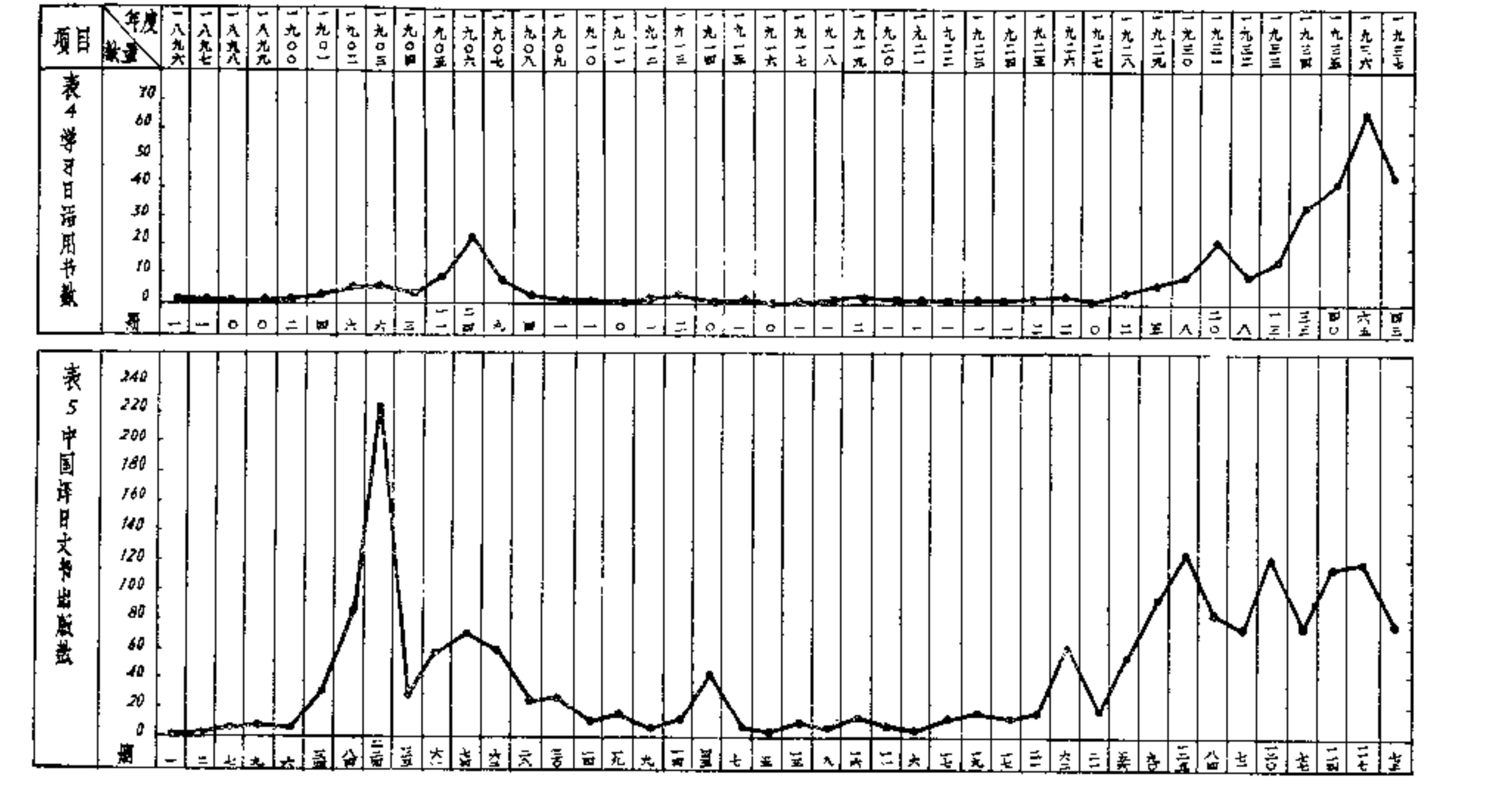


表3　东游日记数（册）



年度	表1 留日学生数（人）	表2 留日学生毕业人数（人）	表3 东游日记数（册）
一八九六	一三		〇
一八九七	九		一
一八九八	一八		四
一八九九	二〇七		五
一九〇〇			二
一九〇一	二八〇	四〇	七
一九〇二	(五〇〇)	三〇	一三
一九〇三	(一〇〇〇)	六	一八
一九〇四	(一三〇〇)	一〇九	九
一九〇五	(八〇〇〇)	一五	二七
一九〇六	(八〇〇〇)	四三	三四
一九〇七	(七〇〇〇)	五七	一六
一九〇八	(四〇〇〇)	六二三	八
一九〇九	(四〇〇〇)	五三六	三
一九一〇		六八二	五
一九一一		六九一	一
一九一二	(一四〇〇)	二六〇	一
一九一三	(二〇〇〇)	四一六	〇
一九一四	(五〇〇〇)	三六六	五
一九一五		四二〇	一
一九一六	(四〇〇〇)	四〇〇	四
一九一七		三一一	三
一九一八	(三〇〇〇)	三一四	二
一九一九	(二五〇〇)	四〇五	七
一九二〇	(一五〇〇)	四一五	〇
一九二一	(二〇〇〇)	四六五	二
一九二二	二二四六	五〇五	一
一九二三	(一〇〇〇)	四一三	〇
一九二四		四三一	二
一九二五		三四七	三
一九二六		二八七	五
一九二七	一九二四	二九一	一
一九二八	二四八〇	二六六	四
一九二九	二四八五	四一七	五
一九三〇	三〇四九	三六三	三
一九三一	二九七二	四六〇	一
一九三二	一四二一	二八〇	三
一九三三	一三五七	一八二	二
一九三四	三〇〇〇	一八六	三
一九三五	(六五〇〇)	二〇八	一〇
一九三六	五六六二	三一六	七
一九三七	五九三四	二〇二	〇



〔说 明〕 **表 1** 留日学生数

（1）有括号之数字表示为留学生之约数。

（2）有…… 号之地方为数字不明者。

表 4 学习日语用书数

译者按：实藤先生原书图表所列数字略欠精确，今据谭汝谦编《中国人研习日语用书目录》（未刊稿）改制。实藤先生原表共计 255 册，新表则共得 328 册。

表 5 中国译日文书出版数

译者按：据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小川博编辑《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年），此四十年间出版之译书有 1906 册，惟此数字未包括 1911 年以前出版年份未明之 262 册及 1911 年至 1945 年间出版而年份未明之 624 册。

实藤先生原表虽亦不包括出版年份不明之译书，惟所得之总数为 1357 册，较上述所列之1906册少收几达三分之一。故另制新图表以改正之。

四　征引及参考文献目录

一　史　料

一宫房治郎:《支那共和国留学生教育に关する建议案》,见于《大日本帝国议会志》第44议会(1921年3月24日)。

丁鸿臣:《东瀛阅操日记》,中国,著者自刊,1900年。

三矢重松:《三矢重松の日记》,转引自松本龟次郎《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东京,东亚书房,1931年。

三宅喜代太:《致中岛裁之函》(1906年)。

大藏省理财局:《东洋经济年鉴》

王之春:《蠡测危言》,1885年刊。

王拱璧:《东游挥汗录》,1919年著者自刊。

《日华学堂日记》,1898年刊。

《日华学堂日志》,1899—1900年刊。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

外务省情报局编纂:《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国人名鉴》,东京,东亚同文会,1932年。

沈翊清:《东游日记》,1900年刊。

《辛亥革命》第一卷至第八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李宗棠:《东游纪念》六册,1901年著者自刊。

《劝导留学生日记》,清光绪年间刊。

《考察日本学校记》十六册,1902年刊。

吴汝纶:《东游丛录》,东京,三省堂,1902年。

《私立成城学校留学生部沿革》

谷崎润一郎:《谷崎润一郎全集》,东京,中央公论社,1957年。

《东京留学生、文部省取缔规则に对する驳议》(1905年12月)

东亚同文会编印:《支那年鉴》第三回(1933年)、第四回(1934年)

松本龟次郎:《支那共和国留学生教育に关する请愿书》,见《大日本帝国议会

志》第 45 议会(1922 年 3 月 14 日)。
郁达夫:《郁达夫全集》,台北,文化图书公司,1967 年。
冈千仞:《观光纪游》,东京,著者自刊,1886 年。
周缉之:《东游日记》,著者自刊,1903 年。
郭沫若:《沫若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959 年。
《保定师范学堂各学每星期教授时间表及教习姓名表》,转引自《教育杂志》(直隶学务处编辑,1905 年 6 月 15 日版)。
高桥本吉:《支那人教育の施设に关する建议案》,见于《大日本帝国议会志》第 40 议会(1918 年 3 月 20 日)。
容闳:《西学东渐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
《振武学校课程概要》,1903 年刊。
《振武学校规则》,1903 年刊。
夏衍:《夏衍剧作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留日学生总会编印:《中华民国留学生、排日问题に关する宣言》,1923 年 7 月。
孙文:《国父全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 年。
清水留三郎等:《支那共和国に关する质问主意书》,见《大日本帝国议会志》第 43 议会(1920 年 7 月 19 日)。
《清史稿》,北京,清史馆,1927 年。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东京,河边半五郎发行,1904 年。
康有为:《戊戌奏稿》,1911 年刊。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1860 年刊。
张之洞:《劝学篇》,1898 年刊。
张之洞、刘坤一:《复议新政折》(1902 年 12 月),收入《光绪谕折汇存》卷 21。
张百熙:《学务纲要》(1903 年)。转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 年。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及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1931 年刊。
汤震:《危言》,1890 年刊。

黄尊三:《三十年日记》,1930年著者自刊。
黄璟:《东游日记》,1901年刊。
《游历日本考查农务日记》,1903年刊。
单士厘:《癸卯旅行记》,1904年刊。
载振:《英轺日记》,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
杨枢:《奏陈管学务情形折》(1904年),收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8。
郑观应:《盛世危言》,1890年刊。
梦芸生:《警世小说》,写本一册,1906年刊。
蔡尔康译:《广学会第11次年报记略》,收入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第三篇卷四。
关和知等:《日支文化の施设に关する建议案》,见《大日本帝国议会志》第40议会(1918年3月23日)。
鲁迅:《鲁迅全集》.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1938年。
鲁迅著,竹内好等译:《鲁迅选集》,共12卷,东京,岩波书店,1956年。
兴亚院编印:《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东京,1940年。
魏源:《海国图志》,六十卷本,1842年序。
岁江荷笠者:《瀛海论》,东京,著者自刊,1876年跋。
ソカウマン[苏高曼]:《琐琐录》,写本。

二 专书

《七十五年の步み》(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史),东京,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1952年。
大桥乙羽著、忧亚子译:《累卵东洋》,东京,爱善社,1901年。
大槻文彦:《箕作麟祥君传》,东京,1907年。
小岛友于:《现代中国著作家》,大连,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7年。
文部省编纂:《学制五十年史》,东京,文部省,1922年。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增订版)2卷,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2卷,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不肖生:《留东外史》,上海,世界书局,1925年。

《留东外史补》,上海,世界书局,1926年。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香港,太平书局,1964年。

中岛半次郎:《日清间の教育关系》,1910年。

中岛裁之:《东文学社纪要》,熊本县,中岛氏自费出版,1908年。

日华学会编:《日华学会二十年史》,东京,日华学会,1939年。

《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

平川清风:《支那共和史》,上海,春申社,1920年。

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1915—1921),东京,大镫阁,1921年。

竹柴其水:《会津产明治组重》,东京,春阳堂,1929年。

伊泽修二:《同文新字典》,东京,1908年。

汪荣宝、叶澜编纂:《新尔雅》,上海,明权社,1903年。

沈兆祎:《新学书目提要》,上海,通雅书局,1903年。

李鼎声编:《现代语辞典》,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

吴念慈、柯柏年、王慎名合编:《新术语辞典》,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

松本龟次郎:《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东京,东亚书房,1931年。

津田道治编著:《津田真道》,东京,东京阁,1940年。

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

唐敬杲编:《新文化辞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

唐宝锷、戢翼翚:《东语正规》,上海,作新社,1900年。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倪海曙译:《论语选译》,上海,东方书店,1954年。

清水澄著,张春涛、郭开文译:《汉译法律经济辞典》,东京,奎文馆,1907年。

章宗祥:《日本留学指南》,东京,著者自刊,1901年。

启智书社著译:《留学生鉴》,东京,启智书社,1906年。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正编,曹氏自刊,1929年。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

张星烺:《欧化东渐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张绳光编集,徐用锡翻译:《汉译新法律词典》,京师译学馆,1905年。

国际文化情报社编:《画报近代百年史》,东京,国际文化情报社,1953年。

崇文书局编集:《日本留学指掌》,东京,崇文书局,1905年。
摩西编:《普通百科新大词典》,上海,中国词典公司,1911年。
彭文祖:《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东京,秀光社,1915年。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
实藤惠秀:《日本文化の支那への影响》,东京,萤雪书院,1940年。
实藤惠秀:《近代日支文化论》,东京,大东出版社,1941年。
实藤惠秀:《中译日文书文录》,东京,国际文化振兴会,1945年。
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东京,日华学会,1939年。
实藤惠秀:《日本语の纯洁のために》,东京,淡路书房,1956年。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刘国钧:《中国书的故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
钱恂、董鸿祎编纂:《日本法规解字》,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
斋藤阿具著、林长民译:《西力东侵史》,东京,闽学会,1903年。
顾凤城编:《中外文学家辞典》(订正三版),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4年。
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

三 论 文

大槻智雄:《中国留学生状况》,见《草原》(法政大学中国研究会编集),4号,1959年1月。
小野秀雄:《我国初期の新闻と其文献について》,见《明治文化全集》(东京,日本评论社)第四卷,1968年,页2—20。
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本借来的词汇》,见《中国语文》第68期,1952年2月。
平野义太郎:《梅谦次郎博士と中国留学生》,见《草原》4号,1959年1月。
中村忠行:《春柳社逸史稿》,见《天理大学学报》,21、22号,1956年。
永井算巳:《拒俄学生军をめぐって》,见《信州大学纪要》,4号,1954年。
《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の性格——清末留日学生の一动向》,见《信州大学纪要》,2号,1952年。
邵荣芬:《评高名凯、刘正埮著:〈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见《中国语文》,第

73 期，1958 年 7 月。

吴秀三：《洋学の发展と明治维新》，见《明治维新史研究》（史学会编，东京，富山房），1929 年。

谷崎润一郎：《シナ文化研究の态度》，见《新中国》，1 号，1949 年 3 月。

青柳笃恒：《支那人の子弟は何故に我邦に游学せざる可からざる乎》，见《早稻田学报》，141 号，1906 年 11 月。

《支那留学生と列国》，见《早稻田学报》143 号，1907 年 4 月。

《支那人教育と日米独间の国际的竞争》，见《外交时报》，122 号，1902 年。

《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第一回卒业式演说词》，见《早稻田学报》，148 号，1908 年 7 月。

青柳笃恒：《现政府の对清政策を难んず》，见《外交时报》，124 号，1908 年。

儿崎为槌：《支那学生思想界の一般》，见《教育研究》，12 号，1904 年。

若虚：《评中国著译界》，见《中国新书月报》，第二卷第二期，1931 年 1 月。

郭沫若：《中日文化の交流》，见《高远》，1 号，1956 年。

郭沫若：《关于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态度》，见《宇宙风》，1936 年 9 月号。

细川护立：《庚午の年头に本会の前途を祝す》，见《日华学报》（高桥君平等编，东京，日华学会），1930 年 1 月创刊号。

商务印书馆：《三十年来之商务印书馆》，见《最近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庆祝商务印书馆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上海），1931 年。

郑奠：《现代中国语中的"日本语语汇"之研究》，见《中国语文》，第 68 期，1958 年 2 月。

实藤惠秀：《西洋人の中国女性观——"全地五洲女俗通考"のこと——》，《新中国》，第 4 号，1946 年 7 月。

《东亚学校沿革概评》，见《日华学报》，第 55 号。

《反读经存文》特集号，见《现代》，1935 年 4 月号。

四　报刊及杂志

《二六新闻》（东京，1904）

《大陆》（上海，1902）

《女子世界》(上海,1903)

《女报》(上海,1902)

《太阳》(东京,1895)

《中央公论》(东京,1899)

《申报》周刊(上海,1936)

《江苏》(东京,1903)

《民报》(东京,1905)

《民彝》(东京,1916)

《每日新闻》(大阪,1888)(《大阪每日新闻》)

《东京朝日新闻》(东京,1905)

《东京日日新闻》(东京,1872)

《浙江潮》(东京,1903)

《清议报》(横滨,1898)

《粤西》(东京,1907)

《留东新闻》(东京,1935)

《游学译编》(东京,1902)

《湖北学生界》(东京,1903)

《新民丛报》(横滨,1902)

《译书汇编》(东京,1900)

《读卖新闻》(东京,1905)

《谠报》(东京,1913)

后　　记

——我和中国

1920年，我进早稻田大学附属高等学院时，原想攻读日本文学，那时山口刚先生告诉我："要学好日本文学，首先要学好支那语。不懂支那语，无论如何也学不好江户文学的。"因此，我便选择了"支那语"为第二外语，青柳笃恒先生那娓娓动听的发音使我着迷了。正在这时，友人三浦英槌君发起设立"支那文学系"的运动，得到了成功，可是开始时报名的只有他一个学生。在他的劝导下，我也相继参加了。其所以被中文的魅力所吸引，除了从内心喜欢中国和中国人之外，可能和我在高小毕业之前就常去寺庙照本宣科地念经书有关。

在大学的三年间，我虽然学习了中国文学，但和我起初的愿望多少有些不一致。除了音读部分是青柳先生担任的《红楼梦》以外，其他则全是古代作品的训读了。

大学时代，有两三件事是难以忘怀的。有一次，文学院院长片上伸先生曾带我去见从中国归来的丸山幸一郎先生。丸山氏给我看了一本白话文的杂志(事后我想起，那大概就是《语丝》)。这虽然是件小事，然而，对我以后前进道路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关于片上先生，有一件事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上。先生赴苏联前夕，突然把我叫到他在西大久保的住处，送给我许多中国新文学的书。其中有：鲁迅译的《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周作人译的《现代小说译丛》、《点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尝

试集》、《胡适文存》第一集，此外还有“文学研究会丛书”等等。这些书上，大部分都署有“片上先生惠存”字样。我当时虽然年轻，但要搬这么多书也着实费了很大的力气。

一天，我随担任第一早稻田高等学院院长的中岛半次郎先生走过大隈会馆前面时，先生说：

“实藤君，听说你在学习支那文学，不过不要只是研究，还要创造出以支那为题材，特别要创造出有日本人和中国人登场的文学。”

这句话对我以后的成长也是很有启发的。中岛先生之所以抱有这种见解，在我以后研究留学史的过程中，逐渐有所领悟。原来先生从 1906 年到 1909 年，曾在天津的北洋师范学堂任教，从那时起，便和中国人有所接触。

我的毕业论文题为《支那志怪小说所表现的命运观》，看上去范围很广，其实不过是以《聊斋志异》为中心，旁及六朝神仙小说而已，可以说是名实不符的。

我在1926年毕业，因为过去就在高轮中学任教，所以不用担心工作问题，因此，我就利用这一年的暑假，单枪匹马地到了中国的沈阳、北京、天津、济南、青州和青岛等地。在这次旅行中，我为第一次讲中国话就能使人听懂，感到十分高兴。不过，觉得中国人的讲话很快，我还是听不懂。我在北京中国人的公寓居住的三个星期里，请了两位中文老师帮我练习。那时我学会了注音字母，倒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我选购的新文学书籍中，有鲁迅的《呐喊》(1926年，第四版)，张资平的《飞絮》，徐祖正的《兰生弟的日记》，东方文库本的《近代日本小说集》等。

两年之后，我和登代子结婚了。不久，又意外地当上了第二早稻田高等学院的教师。过去，我每周要上四十一节课，而现在，到下午三点就结束，时间就显得有余裕了。这一年（1928 年）夏天，

在我妻子鼓励下，我又进东京外国语学校专修科（夜校）去学习中文。当时的同学中有陆军户山学校副官的陆军少校，也有庆应大学的学生，都是一群爱好中国语的人。因为这样，所以彼此之间相处得非常愉快，有时一同到北京饭馆找跑堂伙计练说中国话。此外，还有件令人高兴的事，是去中华青年会馆一楼的留日书店，那里的面积不大，但却有很多新从中国来的书刊杂志，去购买的都是中国留学生。（在这里未曾遇见过日本人。）

这时，我以"内地留学"为名，搬到了留学生集中地区之一的目黑区大冈山。在这里，我结识了不少留学生。我们互教互学，非常亲密。我也常把他们请到家里，成为我家每天的常客。

遗憾的是，除了古汉文，学校里不让我教现代中文。当时正在编写教科书《古今汉文》，我在最后加进了现代中文，这对我多少也算是个安慰。提起这事，当年的学生至今还对我说，亏得您这样做才能够学到了现代中文。

从教外语时起，我读了许多中国的书籍和杂志，还从上海订阅了全年的《申报》，由此我了解到中国人是很讨厌被人称为"支那人"的。学校里，不少班级中都有留学生，所以我便避免在这些班级的课堂上用"支那"一词，而代以"中国"。这样做，在当时的日本学生来说是不能接受和理解的，因此，有一次在我上课的教室中，有人在两块相连的黑板上写满了"中国中国中国……"来讽刺；尽管如此，我并没有退缩，依然使用"中国"这个词，以后在家里也用开了。

当时，在和留学生的交往中，有两件事情是令人难忘的。其中之一是为中国留学生找住处。一次我找到了合适的地方，房租及其他条件也谈妥了。对方问："是什么人来住？"

"是我的朋友，中国留学生……"

我的话音没落，便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噢，是支那人！那就对不起了。"

我就象自己被人家侮辱了一样感到愤慨。

另一件是为一个回国的留学生打电话询问轮船启航时间的事。开始时，那位轮船公司职员很礼貌地回答了我。可是当他知道了我是替中国留学生询问时，对方的腔调完全变了样：

“噢，是这样！……那么你买了票吗？”

我撂下电话，内心受到了比上次找住处更大的刺激。这些事，对作为代理人的我，还有这样深的刺激，更不用说对中国人了。

我虽然担任了早稻田的老师，但是并没有决定要研究的题目。我很想尽快些确定一个题目，想研究老子，又想研究唐诗，还想研究现代的……，东想西想，焦躁、犹豫不决。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我妻子才劝我上外国语大学学习的。

正当我踌躇不决的时候，我看到了前面提到的中国的新的书报和杂志。从中发觉一个情况，即中国正在大量翻译日本的书籍。《申报》的第一版全是广告，其中就有日文书译本的广告，杂志里也有许多日文书的译本的广告，这对日本人来说当然是不会不高兴的。一九二九年的寒假，我打算把这些中译本编个目录，买了笔记本，收集了不少资料。由于数量不断增加，记不清哪些已经记录，哪些还未编入，所以不得不将目录按哲学、文学、经济学等类别重新进行整理。就这样，过了一段时期，也出现困难，只好改用卡片按原著者分别整理。

书归正传，当译本达到七百三十部时，我告诉了日华学会的高桥君平先生。他说：“这很有意思，拿到《日华学报》来发表吧。”我很高兴，就把它整理出来，这就是《支那译之日本书籍目录》。

听说菊池宽看了之后也十分高兴，并为留学生作了有关日本文学的报告。原来，目录中列有不少他的作品的中译本：

《菊池宽集》（章克标译）、《恋爱病患者》（刘大杰译）、《再和我接个吻吧》（路鸾子译）、《藤十郎的恋》（胡仲持译）、《新珠》（周白棣译）、《日

本现代剧选》(田汉译)。

在继续编写这个目录的时候，自然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些书是谁翻译的呢？原来这些译者都是曾到过日本的留学生。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到日本来留学呢？这个问题，我却无法回答；我也问过许多人，他们也一样地说不知道。待问到高桥君平先生时，他不仅告诉我松本龟次郎先生写过有关留学生教育的书，而且还为我从松本先生处要来了这本书。这就是《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这本书详细地记载了松本先生从1903年以来专心从事中国人教育的情况，是十分宝贵的资料；但其中对中国人为什么要留学日本却只字未提。后来得知中国有舒新城著的《近代中国留学史》(松本先生的书是1929年出版的，这一本也恰巧是同年出版)，买回书后看了一遍，这个疑问仍然没有得到解答。

我把这些事告诉高桥君平先生，他说：

“那么，实藤君，你来研究一下不好吗？”可以这样说，他这句话竟决定了我的一生。“原来如此！我今天才明白，要我自己亲手来干！”对我来说，懂得这一点是比什么都好的礼物。

打那以后，我便在授课之余经常地往来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一楼至七楼之间。

开始，我按杂志的发行顺序翻阅了日本大型杂志《太阳》和《中央公论》。《太阳》有“汇报”一栏，刊登一个月来的重要新闻，其中有留学生情况的消息，查阅起来很方便。这样，我在继续编制年表的同时，查找了日本和中国的参考资料，逐渐了解一些中国留学生来日的原因。不知不觉间找到了研究课题，开始了研究生活。

这样研究了五、六年，也是由于高桥先生的好意，我的研究成果得以在《日华学报》上发表；这就是从 1936 年 11 月号起，到1938年12月号止，分十一次连载在《日华学报》上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这本只有九十六页的杂志，有时竟用了六十二页的篇幅来刊

载《留学史稿》。

在学报上刊完后，即在1939年又由日华学会印成三百六十八页的二十五开本出版，分送日中两国与留学生有关的机构。

回溯1937年7月7日，日本和中国之间发生了战争。这对我——象上面说过的，一个"内地留学"，并且和中国留学生交往很密的人来说，内心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日本的一般人仇视"支那"，在他们为每一次胜利而欣喜若狂的时刻，我自己却仿佛身陷敌阵，象挨了打似的感到痛苦和恐惧。

到了12月，或许因为基本上习惯了（身不由己地转变为一般日本人的见识）的缘故，我时常记下自己的感想。当时生怕被别人发觉，凡应写"我"的地方都改用了"他"字。请看：

△ 错误的估计

暑假即将来临的7月7日，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他象大家一样认为这次事件不会扩大的。然而估计错了，他大大的失算了。有一位中国青年是在他的帮助之下来日本留学的。几年来一直和他通信，交换书籍和杂志，成了好朋友。在事变后，这个留学生在和他谈到要不要回国时，他毫不犹豫地劝其留下继续学习，还说："你在日本绝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如果有什么麻烦的事，可以出示我的名片。"

与他料想的相反，事件扩大了。由北支事变发展到支那事变，实际上酿成了日华大战……

就这样，认为冲突不会扩大的看法，对于一个现代中国的研究者来说，是个莫大的失败。对政府所宣称的"不扩大"，竟然也和一般人那样轻信了！政府声称"不扩大"，而实际是扩大，对这套把戏竟没有识破实在是太天真了。尽管对现代中国强烈的抗日意识是有一定程度理解的，可是并没有从思想上有所认识，实在不能不使我感到羞愧。

后来，还发生过一件事。这位留学生在看到中华民国驻日大

使馆下旗撤退后，也决定回国了。我到鹤卷町他的住处为他送行，他把行李装上人力车，孤单单地走了。我送他，直到看不见为止，然后回到学校。我刚要登上前面的台阶，突然被人喝住了：

"等等！"

回头一看，是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

"？"

"我是警察局的。你和刚才被送走的留学生是什么关系？"

便衣特务问东问西，过了好久才走。这样的事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遇到，心里感到十分不快。

不久，刚把这件不快的事忘掉，穿便衣的宪兵又来了，这次是到教员休息室来盘问。

△ 周围是敌人

战争开始时，虽然他什么也没说，却很害怕报纸和广播。具体一些说，他通过报纸所得到的感触，是和周围的人（包括家里的人）完全相反。

一般人在听到"支那军进行不法射击"时，就说是可恶的家伙；一听说"撕毁协议搞了大量活动"，便愤愤地说支那人靠不住。可是，他心中却想，如果别的国家也在自己国家中演习，恐怕日本也不会甘心忍气吞声的。更何况是横暴地闯到别人家园中呢。这和打了人还要说无所谓有什么区别？但他不敢出口。

幸好时值暑假，他无须和别人谈话，每天关在家里，写去年开始动笔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作为他的研究对象——中国留学生，在暑假以前，约有六千人，现在几乎全部回国了。他想，明年完稿时，两国关系将会变到什么程度？到那时，自己最初所考虑的会不会有所变化呢？他还想，到那时，留学史之类的东西，对日本社会是不是还有必要呢？不过，他不想停止此项工作，他也不讨厌这项工作。

偶尔到理发店，人们正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日本军的胜利，他却为自己口是心非去迎合别人的论调而感到苦恼。

报纸天天报道为陆海军捐款的消息，而且款数都不小，报社策划的

"捐献军用机资金"，每天都突破十万元的盛况是他预想不到的。但从另一方面考虑，老百姓们就象大震灾时对所谓朝鲜人骚动而信以为真那样。

偶尔也有学生来玩，有的人这样说：

"什么叫忍无可忍——等等，这可是句相当有力量的话啊。"

与此同时，报纸上还特别报道了同事J捐献数十元"国防献金"的事。

△ 新闻界和他

报纸不消说，杂志刊登的也几乎都是有关事变的记载。"事变临时增刊"一个接一个地出版，大小无数的支那评论家也纷纷登场了。过去写了"支那崛起"那样书的人，现在又写起"谜的国家——支那"了。他觉得开始认识到新闻界这些人的真面目。几年来，他和友人们创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出版了《中国文学月报》。他曾想，将来与其当个学究式的研究工作者，还不如当个新闻工作者。可是现在想来，自己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工作者。因为，不能突然从一个兴趣转变到另外一个兴趣，他觉得只有这些才是自己的东西。

△ 科学者？

过去，他始终是这样想的，因为自己是日本人，所以对中国的研究，首先是为了日本，同时也是为了世界。对日本有用的东西，并不是一味地考虑"为了日本"就能产生的；即使是两国间的事情，倘若不是从极冷静的、科学的立场出发来对待的话，就不可能了解到真正的东西，不了解真正的东西，就不可能对自己的国家有益。

从这个观点出发，展现在他眼前的任何事件都应该是他研究的对象，而不应该有好有恶。但是，他不能过于乐观地看待眼前的"事变"。

这时期，有人请他为杂志写些东西。不过，有关这次事变的东西，他却不想写。

但是，暑假里，他们学校的出版部要他给讲义录的读者写些文章。本来他不打算写，但几经交涉，最后不得不同意写篇《支那与教育》的文

章。在结论中，他写下这些应付差事的话：

"上而所述是现阶段中国教育的概况。从整个教育来说，不能不说是变态的、病状的和不健全的。看来，国家的强弱，几乎是建立在教育这基础上。北支事变爆发后，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声明中，有四次提到'我们是弱国'，这是很自然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作为日本国民应当感谢我国的普及教育，今后也必须努力使其永不衰退。"

如果贯彻自己那种"什么也不写"就好了，可是以这次应付差事为起点，就慢慢地掉进了自己欺骗自己、自己说服自己的泥潭。

△ 他的日记

他今年四十二岁。这次的思想斗争，在他一生中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他二十岁前后发生的宗教上的烦恼，其目的不过是拯救自己而已。可是这一次却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为了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是在大范围内自我拯救的斗争。去年年底，在池袋与朋友谈到战争是应该停止，还是应该继续，现在已经成为极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了。

他在三十岁以前，是一直写日记的。但不久前他觉得与其花时间写日记，还不如写些有关研究的问题好；这样，把日记一度停止。可是现在他又想很好地把内心的变化忠实地记载下来。

几十年来总是说"日支亲善""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等等，然而事变一发生，却又突然变成"贪婪暴戾""鬼畜支那"了。这也许是真心话，然而却令人感到过去几十年讲的尽是骗人之谈。

称之为"敌"却不发"宣战布告"，又说以"军阀"、"共产势力"为敌，不以百姓为敌——这是战争的进步呢还是后退？武士道又将是进步呢还是后退？

用大炮相威胁，侵入到一个没有军舰国家的腹地，取胜是一定的，这如同折断一个婴孩的小手一样。对于这种战争没有热情的人是不是就是不爱国呢？日清、日俄战争时期，尽管在我们看来，敌人是强大的，但是，只要遭到侵略，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哪个日本人，都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从这次事变来看，不能不感到武士道是被毁灭了，甚而也不能不怀

疑过去的武士道是不是也这样。

八幡神社离他的住所不远。清晨，或傍晚，鼓声轰鸣，紧接着便是齐声高喊的“万岁”声。每当此时他便感到一阵畏缩似的冲动。

街上每天都有人出征。因为经常上他家取衣服的洗染店的人也入伍了，他也拿着旗子到八幡神社送行。出征的军人肩上斜背着带子，手里拿着装杂物的奉公袋。面向着排列在大殿前的整齐队伍，各居民会的会长、在乡军人分会、爱国妇女会、国防妇女会和青年团的负责人相继出来致辞，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欢送的人群挤满了神社，说些什么，根本听不到。只见人们举着太阳旗和“祝出征”的旗帜，悄声地谈论着有关战争的情况。

致辞结束后，又高呼了三遍“万岁”，队伍才向火车站走去。

“替天行道，

我们忠勇无比的军队……”

他虽然也张着嘴，可是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声音来。如果要他一个人唱，那么一定是哭腔。

△ “生在日本的痛苦”

在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中，没有一个为这场战争而高兴的，有些人对兴致勃勃谈论战争的人表现出无法掩饰的憎恨。甚至还有人独自嘟哝着：

“我为生在日本而感到痛苦。”

然而，就在这些人中，陆陆续续地也有四个人出征了。不用说，作为帝国军人，他们是决不会作出有辱于这种称号的举动的；这一点，我们是深信不疑的。

△ 适者生存

一提到中文书籍，就不能不联想到主要经营中文书籍的文求堂的 T 氏；这个人与其说聪明，不如说是个与其年龄不相仿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型商人。他一面卖汉文书，一面却又痛骂汉学者的保守；看起来他是同情中国的。就是他，把逃避蒋介石追捕魔手的中国左翼文学工作者置于

自己的保护之下，几年来，一直对他们给以热情的照顾。

因为有事，事变后他第一次访问了 T。对 T 那种趋炎附势的态度，不能不大吃一惊。

T 说：

“前几天有人来说：‘日本如果遇上长期抵抗，经济方面就要发生困难。’我告诉他：‘这都是穷人的论调，有钱的人是无须担心的。’”

他说：

“虽然这样，可是由于我们的内心还存在着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所以很难采取肯定的态度。”

于是，T 令人吃惊地说：

“是吗，我们都学过进化论，‘适者生存’。对日支关系也应该是这样的。”

接着，T 当着他的面，痛骂那些相识的汉学者和支那通。

“汉学者、支那通之类，这会儿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他们应该为自己不识时务而感到羞耻。”

对于这些说法，有些他也具有同感。

“汉文学就是败战文学”，这也是事变后 T 想出来的一个口号。

△ **新学期**

他在走进教室之前就注意到了由于他不知道在学生中有些什么想法，也不了解他们的家长都是什么样地位的人物，所以讲话要十分慎重。

可是，心里想到的东西很自然地就会在讲话中流露出来。在他最初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

“汉文是鬼畜般暴戾的敌国——支那的语言文字。虽然这样，但拒绝学它却是小国民的做法。

‘知己知彼乃兵家之第一义’，唔，这也是暴虐支那的先祖说的。——倘若不是如此，那么近代支那为何这么衰弱？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能尽早地引进和研究西洋文明。所以，我们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都必须了解我们的邻邦——中国……”

△ 后方学生团

他在讲课时，不时在言语中的细微之处掺进些和流行说法相反的话。使他吃惊的是开始上课的第二天，在他担任主任的班级中，有人被征召入伍了；就在他身旁，有人竟匆匆放下笔杆拿起了刀枪。他用不着对这位朋友说些战争无意义之类的话——他的决心更大了。

更使他吃惊的是，正在一年级某班上课时，学习委员竟提出这样要求说："今天打算叫大家一起徒步去参拜靖国神社，能不能请提前一会儿下课。"这时大家都已打上了绑腿，他不能不提前十五分钟结束了当天的最后一堂课。他充分地意识到，从此不能再随便讲话了。

他记得这个学习委员，入学考试时是由他口试的，好象是陆军中将或少将的儿子；以后，这个学生又和曾在士官学校预科学习过的学生提出倡议，在一年级组织了后方学生团，名誉会长是首席教师 K，会长是学生课主任 I。成立大会时，陆军将官和那位上过士官学校学生的父亲，一个贵族院议员，都作了激励的讲话。

△ 校内的战时色彩

变化不仅仅在学生中间。学校的校长，也分批将一万多名学生集中到大礼堂，讲明战时学生的注意事项。

明治节这天，在校门的左侧树起了很高的旗杆，举行升旗仪式。

尽管不十分引人注目，这时期还陆续地规定了教练服、缝制了野外教练时教师用的军帽和在辅助教学名义下聘请教练助手等等。

在这曾被称为自由的校园内，连他这样的人也感到不能安心地生活了。

△ 追随"权威"吗？

他把明治维新以前和现在进行了比较。以前是尊王与佐幕，现在是自由主义与独裁统治（日支亲善与讨伐支那）。如果说前者衰落而后者兴盛的话，那么勤王和法西斯的胜利，在追随时代的权威这一点上，则是相似的。

追随权威极容易，可以照猫画虎，可以模仿，也可以在形式上追随。

当然，在哪里都没有必要硬去反对权威。不过盲目地追随权威也是件苦事。

违心地改变自己的认识是令人悲哀的。虽说如此，没有充分把握时也用不着高唱反调。他认为应该思索。

△ 首先是日本

自己是个日本人，和中国相比，自然是深爱日本的。对这次事变不能自觉地去适应，是因为从长远意义上讲，不能认为是有利于日本的。

他也曾想到，是不是自己对中国人太客气了？

战场日益扩展，飞机的轰炸也波及了全中国的重要城市。由此看来日本是不会撤退的——他最近感到了这一点。他也想到一旦日本失败就不得了。

舞台载着所有的人在转动，不想转的人也会不知不觉地随着“社会”的转动而转动。

△ 评论家是有责任的

然而，他还没有作出积极的肯定。

他认为人生应该是向上的，不是直线地向上，而是波浪形曲折地向上，从总的局势看，是一条向上的路。

“这是教条。”

尽管被人这样说，他也不去计较。他想，如果人生的结局是个无争的世界，那么，人就失去了生存的价值。因此，必须做到“辩而明”，辩而不明就要发生战争。

就这次事变而言，在此之前是否需要做更多的论战呢？中国在几十年来已经开始了抗日的思想动员，报纸、杂志、教科书都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为目标而开炮的。对此，日本的思想家、评论家是否有过还击呢？沉默只能被认为是承认。事实上，用和以前一样的理论作根据，来反击中国人的排炮当然是不可能的，恐怕这是实情吧！

有象苏联那样的先有理论，然后再根据理论而采取行动的，也有先采取行动，然后用理论来说明的。至于哪一种好，当然，只有理论不错，

但在行动之后再加理论化，也是可以的。总之，要能有一个象样的理论。这个理论不是“制造”的，而应该是“发现”的。这个理论只让自己人理解和赞成还不行，必须让对方和第三者都理解才行。他开始这样想了。

△ 谁是敌人

他和学校的同事相互传阅着主要的综合性杂志。事变以后的杂志成了他的教科书。

“最近的杂志数你看得多，好象我们的杂志是专为你订的。”

有的同事开他的玩笑。

他感到报纸、杂志是在时局里呻吟，并且在左右摇摆。

事变刚刚爆发后，报纸杂志上刊登的都是“支那”可恶。过了一个时期，调子就变了。首相的声明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内容：不以支那的民众为敌，只有“军阀”、“国民党”、“共产势力”才是我们的敌人。最近还有的讲：敌人不是和我们作战的支那，而是离间日支关系的英、俄。最后，甚至说敌人就是英国和俄国。

开始时，说敌人是英国的道理，一般人是不易了解的。现在却认为这是正确的了。

“敌人就是英国”的这一理论，并不是后来制造出来的，只不过是最初没有发现而已。这是他的大陆政策理论所需要的根据。

△ “锦绣河山”

他知道自己已几经转变，但还是没有到达能为日本的胜利而高兴的地步。（要想高兴，除非要作九十度的大转弯。）

他虽然尚未积极地去“发现进出大陆的理论”，可是，却也开始摸索这一理论了。

在他头脑中产生这样一些想法。

无论是黄河还是扬子江，从几万年前起就这样的流着，称它们为黄河、扬子江，也是几千年前的事了，但江河本身却和这些称呼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们几万年来就这样流着的。

这些并不是专为哪个民族的，我们仅仅知道它们叫江、河。不过容

易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即它们自始就是"属于汉民族的"。从汉民族自身来说，这个观念更是格外深切。

冷静地观察，这些江河既可以称为"富士河"，也可以称为"Long river"，还可用其他名称称呼它，说不定以前就有过江河以外的叫法。

人们常说"祖国""锦绣河山"。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些还不是孩子们所特有的一种自我夸耀。他记得在童年时，因为家门口有一条小河，所以在和小朋友们争论时，就把自己家前面的东西归属于自己家的。上面说的不正和这相似吗？

然而，这并不是说现在已经划分好了的地方，可以随便地取代的。人类应该象"辩而明"那样求得进步。凭借着力量去获得，那是因为尚处在进步的过程中。

地球上的人们应当平等地利用地球上的一切，应当科学地测定物与人的关系，并且经过争辩来决定。发展经济学的政治理论，即创立"世界经济学"是必要的。

因为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说从哪里到哪里是属于某一民族的，这是如同被地图上的颜色所迷惑的近视观点。对于地球上的"动产"（如城市、道路、运河、万里长城），可以属于从事建设的各民族，可是大地本身则不然，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越往下挖就越清楚。

应该提倡理论上的生存权，而不是军事上的。

有热爱这块土地的民族，也有破坏这块土地的民族。"人事"方面暂且不谈，中华民族是如何对待这块土地的呢？很遗憾，不能说是爱护。他们说"锦绣河山"："荒野"被很好地耕耘，也可以算是锦绣。而"山"很可惜，秃的多。因此，"河"也到处泛滥。这些原因是在于自然还是在于人为呢？现在凭人的努力，是能够绿化秃山的。这难道不是科学在进步吗？因此，从弥补不足、帮助后进的意义出发，对于日本向大陆的进入，应该认为这是"天意"——他开始这样想。

△ 更大的集团

他甚至这样认为——

日本在明治以前被分为大藩和小藩，各藩都有不同的风俗习惯，藩与藩之间的利害亦不同。即使是在日本，不同地方的语言也是不同的，一些人挨饿，而另一些人却可以若无其事。

明治维新以后，这些差别才逐渐消失，从此变成了一个难以想象的统一国家，有了同一的文化。

再往前追溯，本州有过虾夷，九州有过熊袭。有人认为这些民族已经绝灭或正在绝灭，可是另外一种看法则是，他们被融合在大和民族中生存下来。在他们的身上也许正流着曾经互相斗争过的大和民族和虾夷民族的两种血液。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主张先要亚洲民族的合一，然后才能是世界合一。

经过这次事变，亚洲也许会被强行逐渐合成一体。这与其说是由文化所致，还不如说是"次善"政策所致。对于当局来说，不一定懂这道理，可是不这样想，也不能心安理得。

杉森孝次郎、大谷光端等人所提出的类似理论，依次地出现了。但他发现，这种理论尚未成为自己的全部而行动着，他感到孤独。

△ 掌握中国百姓的人

他又这样想——

中国的知识分子只占全国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其他百分之八十是老百姓。谁要能控制这些百姓，谁就能统治中国。国民党能控制，国民党就能统治；共产党能控制，共产党就能统治。如果日本能够控制，那么日本就能统治。

但是，日本对这些老百姓的"心"，了解得太肤浅了。例如，象这次事变后，在日本读书界十分吃香的赛珍珠的《大地》那样，我们对中国老百姓的心了解得太少了。

即使不了解他们的心，而能在他们挨饿的时候施舍十枚银币，使他们不致卖儿卖女沦为奴隶的话，也算是日本的恩德了。——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呢？

在我身旁，有位同事的汉语教师曾经对军方捐过不少款；战争开始时，一同对日本海军封锁南海表示过愤懑的学中文的年轻朋友，也挎上了军刀，当上陆军翻译；曾一起学习中国文学的朋友，则当上了海军翻译；尤其是一位讲中国话十分流利的朋友竟当上了对中国广播的播音员。

每当听到这些，总感到被一种孤独感所袭击。我倒不是不想听朋友的对中国广播，而是没有心思去转动无线电的旋钮。

可是当我的学生来告诉我，说要去北京广播电台时，我不但没有劝阻，反而还鼓励他。为什么，请看：

△ 北京广播电台

进入十二月，进攻南京的部队进展极快，如入无人之境；昨天前进了十公里，今天又前进五公里。

他虽对战况并不感兴趣，可是在电车里看见别人手中报纸上的大标题时，却也开始对敌人这样无能感到厌烦。

那天在学校上完课，刚回到教员室，有人告诉我：

“有位毕业生在等您。”

一看，是在广播电台工作的M。他求学时十分用功，几乎把健康都毁了，现在却是脸色红润、体格健壮，成了一位出色、稳重的绅士。他很高兴地说：

“最近，在北京办起了广播电台，我决定到那儿去。好长时间没来看您了，今天特地来向您报告。”

M在学校时，极热心学习中文，近三年来一直在广播电台工作，但总让人感到他的本领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现在总算两方面结合到一起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高兴的。

“这是件好事。”他说：“日清、日俄战争之后，有人在那里试办教育，但最大的学校也只有二百八十名学生。而广播却能使几百万、几千万人听到啊。”

他兴致勃勃地谈论了这项工作的意义。

"如果您在北京有熟人的话，想请您介绍一下。"

听到这话，就给在特务机关工作的H写了一张名片：

——好久未见，为你的健康与工作顺利高兴。今介绍一位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学生M，请多关照——

M走后，他回味着自己所说的，感到不可思议。迄今为止，从未对H所干的事情有过好印象，不过，用"高兴"二字，也不完全是假话。

M的来访，使他的心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反复分析看，不进行各种广泛的强有力的文化工作，是无法改变目前紧张形势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是解决了事关吃饭的就业问题。

他始终不变地认为需要一个大亚细亚主义的新理论(不是说有过旧的)。有一些变化的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理论的话，就不能跟上社会的发展。

△ 庆祝南京沦陷日

12月14日夜，M从东京车站出发了。在写着"日本广播协会"的红色、蓝色旗子和写着 JOAK 的紫色小旗子之间，还夹杂着酱紫色的早稻田大学东亚协会的旗子。他一个劲地喊着"万岁"。

这一天下午，在他们学校，全校师生都集合在大操场上，举行庆祝南京沦陷的大会。会后他随一个同事参拜了靖国神社，又沿着护城河走到了宫城前，见到男女学生和其他各种团体组成的队伍，都举着旗子，络绎不绝地游行着。

因为距离给M送行还有些时间，他便走进了日比谷图书馆。在这样日子里，图书馆里仍有许多人，我感到高兴。外面游行的人们举着灯笼象火海一样，"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

八点钟，他离开图书馆，经朝日新闻社向东京车站走去。热狂的游行队伍正呼喊着万岁，涌向各家报社。他又为自己无意加入这些行列而感到寂寞。

从车站回来，在小铺喝了一杯饮料，出来后，他的想法有些变了。

"对整个中国，日本要负起责任。"他们校长今天的这番话，对他是有

影响的。在站台上，东亚协会学生说的“M 君是干部了，现在到中国去的人都可以当干部”，这话对他也是有影响的。他想：

“如果说要让日本人去指导中国，那就该尽量让那些热爱中国的人去；象现在这样，只让一些粗暴的家伙去是不行的。虽然都是以权势去压制，然而让热爱中国的人去，就会产生不同后果的。所谓恩威兼施，只有了解中国、热爱中国的人才能办到。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也一定要到中国定居。”

△ 重大的思想发现

一月中旬，他们创办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正在研究工作时，改造社的 Y 陪着刚从前线回来的他的同事 X 来，谈了谈他的见闻。

X 讲完以后，他问：“南北方老百姓的态度如何？”对此，X很有兴趣，滔滔不绝地谈了北方人大多数都欢迎皇军，可是到南方，他们对皇军却抱有很强烈反感，并且举出很多实例。（这一点和他从书本上看到想到的竟完全一致，为此，内心就有些扬扬自得。）

他们又谈了很多。最后 X 说，无论如何总需要有一种能使对方接受的思想。对此，他表示完全赞同。年轻的会员中有人怀疑这难道不是一种反动吗。于是，他比 X 更起劲地作了说明：

“这不是要去制造，而是要去发现。这必须是理性的，必须是全部日本人和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所能接受的。这种东西不能说没有，而是要我们去发现。已经发现这一点的人是现任的总理大臣。”

（这时他的内心似乎想到：一流的杂志必然会来约稿的，想到这里，又不禁感到有些无聊。）

总而言之，这成了谈话的中心，工作问题还一点没有谈，就到了吃饭时间。从会场出来时，每个人的表情都有些激动。一次会议能让人这样激动是罕见的，何况是过去从未触及过的政治问题呢？

△ “棉花改良的问题”

《东大陆》的编辑 S 写了《事变现状和北支发展中的诸问题》，以“棉花问题”为例，阐述了强硬的观点。

“大家在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干涉方面，有不同的看法，我以为，只是在枝节问题上加以干涉是不妥的。支那民众本身，显然是没有能力以自己的力量发展自治组织的。对此，从维持治安和指导民众的政治经济两方面看，日本有必要予以全面的帮助。……例如，可就棉花问题来作考虑。大家都知道，北支可以生产很好的棉花，另外听说日本计划要在那里种植美国棉和印度棉等，然而以往那里没有种植过这些优良品种（其理由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在这里，技术指导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应当首先考虑到，这种技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社会的、经济的原因……”

读到这里，他脑子里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

——本来，日本人对中国有下面三种态度：（1）不打败支那的话，将来是可怕的（三宅米吉博士）；（2）如果不保护支那的独立，就有被瓜分的危险，这对日本是一种威胁，因此，希望支那独立（近卫笃麿）；（3）一切从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对等观。从发展趋势上看，第三种态度肯定要被扬弃的。

中国在近代化方面，确实是落后了，这是一种宿命的观点。同日本相比，两者的差距是不小的。最可怜的是百姓，他们处于军阀势力和外国势力的双重压迫之下。正如孙中山说过的那样，次殖民地的情况比殖民地更坏。从这一点看，这次事件或许是值得庆祝的。

那种认为应该感谢中国古代文化的想法是错误的，同样，过高地评价近代中国的新兴力量恐怕也是错误的。

中国即使被日本吞并了，也不能认为这同过去被满洲、蒙古打败一样，因为日本现在拥有优秀的文化（这些都是梁启超、吴研人讲过的）。难道他们不该考虑怎样才能和日本很好地共同生存（就象熊袭和虾夷生存在我们中间那样）吗？

他虽然这样想，但这些想法尚未变成自己的行动。

△ 两全其美

现在的时代是一个自己拯救自己，亦即拯救一切众生、至少是拯救东亚人的时代。

眼下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东亚人救世主的时刻！谁能成为这样的救世主，即使没有担任总理大臣，实际上却比总理大臣还高明。（3月31日）

△ 为了谁？

听广播是痛苦的。

——鹿地亘在汉口发表了抗日的演说。

——在北京办学校的一个日本人说，只要蒋介石政府还存在，哪怕是在四川山区极小的地方，他也要到那里去。

他也有同样的心情。这倒并非不爱日本，也不是希望日本打败，而是祝愿日本和中国都不战败。

如果能以日本的失败，而使日、中两国的大政治家聚在一起，真正地建立"东亚永久和平之路"（正在放映电影《东洋和平之路》）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倒是愿意日本战败的。（3月31日）

△ 飞机

航研机试飞成功了。这样，不需中途着陆而飞绕世界一周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由此看来，不用说从东京去轰炸莫斯科，就是去伦敦也是可能的。

往后的世界将会怎样呢？会不会由于军备的一再扩张而破产？会不会由于战备的无限扩张，出现相互畏惧的敌视？恐怕会有人这样认为的。

但是我认为，在飞机的性能、技术以及勇气方面占有优势的国家，无论是否经过战争，都是能够统治广大地域的。

除了飞机的性能和技术外，还需要勇气。在这一点上，当中国空军也具备有到日本国内轰炸的条件时，敢不敢来试一下，就可以明白了。

即使原来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但不久就会消失的。这从日本维新时期的西南与东北之争就能理解。

现在国内出现了旧幕时代西南与东北从未有过的互助合作。这从日本东北的饥馑问题上就可以看出来。

* * *

崔承喜被作为日本的知名人士是无须掩饰的。今后的中华民族大概也将如此复兴吧。

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只能被认为是上述趋势之一。(1938年5月)

这样——(后述)

这样，他认识到了日本征服中国的全面的意义后，不自觉地开始一心向完成圣战而迈进了。

为此，他把酒和烟戒掉了。

大家读到这里想必会感到不快，我自己也觉得异常惭愧，浑身禁不住一阵一阵地冒冷汗。研究现代中国的人，却不自觉被政治口号迷惑！竟如此认识不足！

本是想成一名中国研究家的，结果却和一般日本人的认识一样。以前我曾认为，即使南京沦陷了，战争也不会结束：因为我已经知道国民政府的决定，除了首都南京之外，还决定以汉口为陪都，以重庆为行都。

那时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几乎完全不了解，既不知道两万五千里长征，也不知道八一宣言；对于这些，我完全是无知的。

我曾想了解一下中国人的救国精神，可是没能办到。当时没有料到中国不败，如果能料到这一点，虽不能做到象鹿地亘先生那样，也决不会写出(象后面所忏悔的那样)令人感到羞愧的文章。

由于认识不足，导致了软弱，再加上一些不纯洁的私心，因而造成自己欺骗自己的悲哀。

我在这里公开发表这些丑恶的内心记录，对日本人来说是羞愧，对中国人来说则是道歉，目的是为将来决不再干这种事。

我正是在这种内心世界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写完了《中国人日

本留学史稿》的后一部分。在此书的序（单行本的《绪论》）中写了如下一段：

"日华两国迎送了近十万名留学生。在派出国的中国来说，其目的、方法是否正确？派出的留学生有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另外，接收留学生（还正在接收）的日本朝野，是不是也做到了相应的准备和想尽了办法呢？为了两国的文化和其他目的，难道不应该充分地反省这些问题吗？……

"虽说不完全，但我总想能全面和客观地、对此加以研究，一方面希望我国各界重新研究，一方面也想促使邻邦各界的反省。"

这本书里，并没有作出结论性的东西，说不定也是由于我心理上的动摇所致。

这时候，由于我立场的错误，原来为表示我对中国的亲切感而写的《留学生史稿》中，不但可以看到我对中国的错误认识，而且还写出一些令人吃惊的地方。例如：

"（关于出兵西伯利亚问题）留学生间有各种揣测"（263页）
"疯狂地参加抗日运动"（329页）
等等。

由于《留学史稿》的发表，在日华学会的推荐和校方杉森孝次郎先生的帮助下，我被选为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驻支那特别研究员，准备前往中国。但这时发生了问题，原来在我编纂的《现代中国文选》中，选有胡适的《乐观》一诗，在谭子豪的《三月》一诗中，还出现有"普式庚"的名字，这都被说成是不能容许的。在警视厅方面认为是有问题的，听说有人不同意我去。于是我决定将此书绝版，买下了全部未售出的书，才得到谅解。

到中国的目的是为了搜集有关留学史的资料，以作进一步的研究。从 1938 年 9 月开始，用了整整一年时间，以北京为根据地，

走遍了战时的天津、大连、沈阳、哈尔滨、南京、上海、厦门、汕头、香港和广东等地方，对中国人来说，这也是件见不得人的事。更使人内疚的是在日本军刺刀下创立的新民会中，整理了一批以"危险书刊"名义而从各大学图书馆抢到新民塾中的大批杂志和洋装书籍。日本军把这些书刊是作为抗日文献而强行夺取的。从我个人来说，只是为了编写中国杂志创刊目录而整理、摘录而已。不过越想越觉得是做了件对不起人的事。

还有许许多多使我感到内疚的事。在新民塾整理书籍的时候，因为有的书里有需要抄下来的材料，因此就每天晚上借回去摘抄。那位"负责人"看到这情况，就对我说："用得着的话，拿去就是了。"我就这样带了回来，这真是不能容忍的。战败后我想起这件事，从卖给日比谷图书馆的书中找了出来，经图书馆的同意归还了中国。

在华一年中，我一直住在中国人的家里，衣、食、住都是中国式的。我一心搜集书籍，北京不必说，到其他城市时，也是先上旧书店，走遍各个角落去查找书籍。我所收集的是：

1.东游日记(中国人的日本游记)；

2.中国人学习日本语的书籍；

3.日本书的中文译本；

4.西方人写的中国古典书籍；

5.其他，有关现代中国文化的东西。

这些都是和留学史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总共约有四千册左右。

这是后来发生的事，太平洋战争已到十分激烈的阶段，东京几乎天天受到空袭。正担心这些书会不会在哪一个晚上被烧掉的时候，从报纸一角看到了日比谷图书馆为学者疏散藏书的消息。我看后找到田中邦造馆长，提出疏散我藏书的希望。他说，疏散的书必须由图书馆买下……。我当即同意了，这样，才有了现在该图书

馆的实藤文库(约五千册)。文库的书目发表在《日比谷》第2卷第6号上。

另外,我从中国回来后,为杂志写了许多东西。这些都是留学史的副产品——有关日中文化关系方面的。后来把这些文章集中成册出版的有:

《日本文化对支那的影响》 1940年,萤光书院

《近代日支文化论》 1941年,大东出版社

《明治日支文化交涉》 1943年,光风馆

这三册书中所收的都是在完成《留学史稿》以后写的,这说明我已经成了一个普通的日本人(参加侵略中国的日本人)了。请看一下那时的观点吧:

《日本文化对支那的影响》序

"历时四年的皇军奋战中牺牲了许多宝贵的生命。为使其真正有意义,在今后长期的经济建设中,需要开展文化工作是不言而喻的。开展文化工作是文化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所要承担的责任……

"目前日本在整个文化方面,比起中国是处于优势地位。正因为如此,从明治二十九年以后,中国才不断地派来大量留学生……

"事变以前,日本文化的输入中国是中国人的主动行为,而日本人却是对之漠不关心的。今后对中国的文化工作,应同以前相反,由日本主动地去做。"

在这本书中有"文化工作"一章。其中有一篇以《寄中国知识阶级》为题的厚颜无耻的文章。我很不想摘录这篇文章,只请看一下提要吧。

命运的悲剧

"命运的悲剧 贵国识字的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而你们这些称得上知识阶级的人有多少,我不得而知。在'地大物博'、拥有

四万万人口的贵国，最畅销的一流杂志，发行数也没有超过一万册，由这件事实就判定你们这一阶级的人数远比日本少得多。尽管如此，你们却无疑是贵国的领导力量。据此看来，是否可以说：连蒋介石也要受你们的意见支配了。”

先是奉承了一番，接着写道：“如果把思想比作头，经济为腹，军备为上肢，交通为下肢，那么，使人感到中国就象个头和上肢大，而肚子和腿却很细小的不能自行独立的畸型儿。”并且还极无礼地说：“作为头部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失却冷静、眼球充血了。”又说：“对研究贵国近代文化感兴趣的我，不能不把在研究过程中捡到的，对你们有利也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奉告你们。”这尽是一些和“近代文化”的研究毫不相干的而又极其傲慢的胡言乱语。

我还讲：“中国之所以落后，是由于它的文化优越感，这对于传统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来说也许是难以避免的，而在你们中间，目前还有这种优越感，难道不是‘面子’观念在作祟吗？例如：你们厌恶他人称之为‘支那’，但明治时代你们中国人自己也称‘支那’。”我以《鸿迹帖》（第29集）为例写道，因为支那和中国是同义语，所以我们有时用支那这一称谓，有时也就称之为中国。我斥责说：“你们强求别人称呼为中国的作法，难道不正是‘小儿幼稚病’的面子吗？”

（其后，我写了“支那——中国”（收入《近代日支文化论》），作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议论——中国人啊！讨厌被称为支那是错误的；日本人啊！因为中国是固有名词，难道我们不该使用它吗？）

接着，我引了《留东外史》，在这部小说中，写中国人喜欢日本女子而憎恨日本男人；这正是因为他们对日本人缺乏研究才造成的。我还引用了戴天仇《日本论》的开头部分。

在谈到“锦绣河山”时，我罗列了前边引用过的日记中写的那

些蠢话。

最后是引述康有为《大同书》中"取消国界"的说法：

> "(康有为) 订正说：'近来飞机倍出，国界已破，大同之运，不过百年。'这也是个卓见。你们大概也听说了，我国的'航研机'越过太平洋又横过美洲大陆，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确信，在不久的将来，即能飞绕地球一周。因此，象他所想象的事并非难以实现。东亚联合是必然的，难道我们不该早日建立一个理想地区，树立一个互通有无的东亚吗？"

就这样，我完全成了军部的一个吹鼓手。现在我又把这些不堪一读而又无礼的文词重行写出来，不过是说明当时我是以中国人为对象，写给日本人看的。如果真的当着中国人的面说这些话，肯定会被当场驳得体无完肤。

当时除了写文章外，我还干了一件于心有愧的事。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有一位姓叶的留学生，因为急于回国，把他的两件行李、组装的书籍和洋伞托我代管，我答应了下来。可是以后形势逐渐恶化，正当我感到自身处境不利的时候，汪兆铭的机关在东京成立了。于是我急急忙忙把叶君的这些东西交给了他们。这些行李我虽没有打开过，但大致也能想象到是些什么书。我的这种行为，与将友人出卖给敌人没有两样。

长时期搜集的中译日本书目录，于1945年由国际文化振兴会以《中译日文书目录》为题，作为非卖品出版了。其"序言"和"后记"均被译成了中文。这是作为日本的"文化工作"之一，为了给中国人看而印制的，所以大部分都发到中国。不过，听说这些书在途中都喂了美国的潜水艇。

那时，我随动员起来的学生去军需工厂搬货、拆除强行疏散后

的房屋、挖上野的防空壕、挖芝公园的粘土、修建立川机场的飞机掩护堤、为日本镀工、三鹰航空帮忙及修筑相模湖的水坝等，给学生做了大量的鼓动工作，而且常常是枵腹从公……

白费劲，战败了！不会有空袭了，可以放心了。然而还是失望，以前自己的所想所写，大部分是错误的，只不过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不会再派人到日本留学了，这样，就没有必要再为“说服两国各界”而进行留学史的研究了。于是这项研究被停下来了。

战争末期，因为家属都疏散了，我请安藤彦太郎和我住在一起。从他那里，我得到了许多启发。

我们两人商量决定出版《新中国》杂志，还请石浜知行给予协助，由于石浜的提议，又邀请岩村三千夫参加编辑工作。还在友人内山基君的帮助下，由实业之日本社答应出版。这是一种横排本32—66页的杂志，有时出版特刊，一直出到第十九期。如果不是横排本，还是可以继续出版的。

出版《新中国》的时候，平野义太郎和石浜知行等成立了中国研究所，我也当上了会员。这时，我产生了疑问：日本人为什么一定要研究中国？我询问了别人，得到的回答是：从经济上（例如：铁）考虑，日本是不能不和中国交往的；但这样的回答，我感到难以使人信服。

内战在中国继续着，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把国民党军队赶到台湾，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震动，这个震动解决了我的“为什么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的疑问。

但随之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中国在战争以前是落后于日本的（我认为），而现在却比日本进步了（我认为）。这个所谓“后来者居上”，原因何在？这是需要研究的中国问题，也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问题。

带着这个疑问，我和中国的朋友交换了书籍和杂志。为此，我和一些友人很快地把得到的《虾球传》、《四世同堂》等书翻译成了日文。在翻译《四世同堂》的过程中，我多少起了些组织方面的作用，为找到第三部原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这是因为作品中的中心人物瑞宣，挣扎在家与国的矛盾中而感到痛苦的情况，和开战一年以后我的痛苦情形相比，方向虽不同，但总觉得与己很相似。

解决"后来者居上"问题的日子终于到了，那是我读了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之后。这本书写的是朱德从少年开始的记事，它使我懂得在四川省山区还留存着太平天国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太平军，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际上也是继承自太平天国的。

1955年郭沫若率领中国学术代表团来日访问，他在早稻田大学作了《中日文化之交流》的报告，他说："日本从西方引进了许多文化，但也输入了一个多余的东西，那就是侵略主义。"这句话给了我很大启发。

这时我才懂得，虽然说明治以来日本走到前面，中国落后了，可是在这次战争中，日本却失败了。这是因为在中国很早以前就有了许多我们所不了解的优点，这些过去有，现在仍有，目前日本是赶不上的。

另一方面，日本也有比中国先进的地方（如工业）。这在战前有，战败后的今天也有（周恩来说过，日本的工业比中国要进步一百年），中国在一段时期内也是赶不上来的。

这些不同之处，正是过去我所写的"整个文化"是不能从数量加以比较的。因此，不是"后来者居上"，而是各自在自己的长处上发展起来的。

我终于明白了这些问题，于是感到在向中国重新表示敬意的同时，也感到不能因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而对日本全部否定。

我认为，到江户时代为止，日本人是一心向往中国，可是从甲午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却变为一心歧视中国。战后，日本一般国民对中国是友好的（政府则不然），其中还有些是向中国一边倒的人。

无疑，蔑视中国是不对的，但向中国一边倒也是不对的。我认为应该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用历史的眼光考虑问题，从而建立起新的日中关系，即"走不卑不亢、互相帮助、平等互利的日中友好的道路"（与实藤远合著《亚洲的心》的总结）。

我准备继续完成放弃了许久的"留学史"的研究，是在明确了这个态度之后的事。以前的研究是作为日本教育史的一部分，现在则是作为中国近代史或中国革命运动史的一部分来写的。但就了解近代日中文化交流史的性质来说，这两方面是一致的。

用于这项研究的主要资料，有日比谷图书馆实藤文库中五千册左右的图书；此外可以作为这项研究重要资料的有：在《史稿》以后成书的《中译日文书目录》(1945)、《中国杂志创刊目录》（未刊本）、《邦书汉译年表》（未刊本）、《中国人学习日本语书籍年表》（未刊本）和《东游日记年表》（未刊本）等。《史稿》中虽有其观点错误和失礼的话，但作为资料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对于材料的取舍，我也是煞费苦心的。

以下供参考。此书的第一章是将《史稿》的第一章和第三章压缩至三分之一；第二章是将《史稿》第四章到第十章压缩改写而成；第三章以后基本上是"新作"，也有一些是从《史稿》中摘录的。留存于《史稿》中的资料还有不少，例如日本教习的名字等……

最近中国方面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象《民报》、《云南》这样难以见到的资料也影印出版了。如果要全部看一遍之后再写的话，恐怕一辈子也不行。实藤文库所藏的主要是留学史的

资料，我认为就用这些资料作为引玉之砖抛出去也就很可以了。这本书是考虑到很快就会落后于时代之后才决定出版的。

在写这本书时，特别考虑到，除了让日本读者给予批评外，我也希望中国的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我自问做过一些有愧于心的事，对不起中国朋友，但深感重要的是诚心向中国人表示歉疚，于是写出这篇冗长的后记。

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高楠顺次郎、唐宝锷、原口统太郎（新吉）、松本龟次郎等几十位先辈的指教，并承日比谷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京都大学图书馆和天理大学图书馆等给以便利，使能充分利用其资料，谨表谢意。

对于出版这本销数不多而成本高的书，我们得到了早稻田大学的资助。令人高兴的是黑潮出版社同意用目前算是困难的横排版形式出版。

藤井骏一氏和横山宏君就象对待自己的工作一样在校对方面给予了热情的帮助。

谨对各位所给予的盛情表示衷心的感谢。

实 藤 惠 秀

1960年3月1日

于早稻田大学教育系研究室

（曾丽卿译，汪向荣校）